第 一 章

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领导的民主革命

第一节 中国资产阶级政党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

政党是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并为其阶级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时代，才开始出现政党。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是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出现以后，进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在这个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胚胎。毛泽东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589 页，1964 年版。

从十六世纪中叶，明朝中期，到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工商业城镇和市场的大批涌现；自然经济日趋解体，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生，创造了必要的历史前提。但是，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为数甚少，极为孱弱，很不健全。并且还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严重束缚，以及“重本抑末”传统政策的桎梏。这与同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相比较，与业已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较，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已经把东方数千年的封建文明远远地抛在后面了。这样，封建落后的中国，便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倾销廉价商品的主要对象。

英国资产阶级的重炮轰开了“天朝”闭关自守的大门。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历史的转折点。从此，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的侵略日益加深，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日益增长，它“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①

鸦片战争后，中国茶丝的输出有成倍的增长，不仅扩大了国内商品市场，而且也与国际市场发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和城镇的小手工业者，由于外国廉价机制洋纱洋布的输入，有些地方出现了“无纱可纺”的情景；洋布在中国市场销售的结果，使中国的织布业迅速下降了。这样，就有不少农民和手工业者，从原来为市场提供手工业产品的生产者，变为外国机制商品的消费者。“……而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② 农民和手工业者，既受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又受清政府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589 页，1964 年出版。

② 薛福成《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庸盦海外文编》卷二，第 9 页。

转嫁到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加之封建主义的剥削，从而丧失了生产资料，破产失业，沦为廉价劳动力的出卖者。这就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提供了劳动力市场，而且日益扩大。

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东南沿海通商口岸设立租界，使之沦为第一批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外商直接雇佣一批行商，销售外国商品和收购中国土特产品，经理买和卖的业务。这种人的数目逐年增多，职能范围日益扩大，成为完全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买办商人。他们在经济上依赖于外商并与之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其本身也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政治上与清廷封疆大吏有密切的联系，或其本身就是以巨资捐得某种官衔的人。这种人，便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扮演着反动的角色。

鸦片战前，中国的官僚、地主、富商等通过贪污勒索、地租剥削、兼并土地，重利盘剥等手段，聚积着大量货币财富。他们或用于奢侈消费，或购置土地，或施放高利贷，或窖藏大量黄金白银，并没有投放到工业生产中去。鸦片战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备条件日趋成熟；外资在华设厂和洋货销售获利较丰的事实，刺激了这些人对资本主义生财之道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们就将手中的货币财富部分地转化为兴办近代企业的资本。但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却是在外国侵略者掠夺大量财富之余，原始积累并不充分，资金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派军阀官僚兴建的一些官办的军事工业，基本上不是资本主义企业，更不能成为独立的民族工业。但它使用近代先进机器，工人大体上按西方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有不同程度的雇佣劳动性质，与旧式官营工场手工业有所不同，所以它开始带有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

七十年代以后，洋务派又兴办了一些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乃

至商办等民用工业。其中有不少仍含有军事目的，但和军事工业又不尽相同，其产品主要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有些企业的工人是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因而，这些民用企业基本上是资本主义企业，但仍带有明显的封建性和垄断性。这些投资于近代企业的洋务官僚，便形成了早期官僚资产阶级。不少买办、官僚和地主以‘商股’形式投资，他们不代表官方的利益，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①。

伴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分离而出现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阶级，一个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阶级，一个顺应历史发展方向，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阶级。

十九世纪末，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代替了商品输出。而伴随着资本输出的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和瓜分。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中国各阶层爱国人士，提出‘设厂自救’以挽救民族危亡的主张。一八九八年总理衙门颁布《振兴工艺给奖规章》，也刺激了一些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贾，冲破官府垄断，自由投资于近代企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历史潮流。

一八九五年至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八九九年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后又创办通海垦牧公司进行封建性剥削。继有南通广生油厂、大兴面粉厂、大隆油皂公司、大达轮步公司、资生铁厂等等。到一九一一年他拥有企业十八家，参加投资的企业有九家。他“通官商之情”，“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②，并有专利权和垄断权。其他还有祝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590 页，1964 年版。
②《张秀子九录·实业录》，卷一，第 6 页，第 15 页。

大椿等十几家民族资本家，都各拥有为数不等，包括纺织、缫丝、碾米、酿酒、造纸、面粉、硝皮、印刷、轮船、机器修造、铁、煤、铜、金、银、火柴、制呢、银行等民族企业①。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至一九一三年辛亥革命后的统计材料，可看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创办人和主要投资者，即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从地主、官僚，商人和买办转化而来的：

“据不完全统计，一八七二——一九一三年，中国资本开办的二十五家纱厂，在四十一个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中，有地主和官僚二十六人，商人五人，还有十人是买办。

面粉工业，一八九五——一九一三年，中国资本家开办的二十八家面粉厂，在四十三个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中，有地主和官僚十一人，商人十五人，买办十五人，另有华侨二人。

轮船航运也是历史比较长的行业，一八七二——一九一三年，中国资本开办的十二家轮船公司，在十五个创办人中，有地主和官僚九人，商人二人，买办四人。

另外，毛纺、缫丝、榨油、卷烟、水电、水泥、煤矿等七个行业，一八七二——一九一三年开办的八十家近代企业，在一〇三个创办人中，有地主官僚六十七人，占65.1%；商人十五人，占14.5%；买办二十一人，占20.4%。”②

从上述材料，根据民族资产阶级中，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关系亲疏和转化程度的差异，又可以划分为上层和中下层。

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关系较为密切。一般拥有较大规模的企业，资本亦较雄厚，大都是由官僚、地主、商人、买办和某些华侨转化为资产阶级的。他们本身即是

① 《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091—1096页。

② 《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编写组：《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3—24页。

官、绅、商三位一体，受到政府的庇护；有专利权、垄断权，但先天不足。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希望清政府实行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他们是清末维新派和立宪派企图跻身政权的社会基础。而华侨中的上层则是保皇会的社会支柱。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十分明显。

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是由手工业工场主或中小商人转化为资本家的。他们兴办的企业，一般规模较少，资金不足，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关系较为疏远并受其压榨，矛盾较大。同时还受上层资产阶级的排挤和兼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挣扎着，有的发展，有的破产。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较低，到二十世纪初才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但他们却酝藏着强烈的革命要求，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基础；华侨中的资产阶级中下层是革命派的主要支柱。革命派则是他们政治上的代表者，同样也存在着明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组织活动和政党观念的传播

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步步加深。一系列屈辱条约的签订，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没落，已经丧失了独立地统治中国的权力，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奴仆。而侵略者却成为中国的“主人”。特别是世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帝国主义国家更加紧瓜分中国。中日战后，清朝政府变为“洋人的朝廷”。中华民族处于严重的民族危亡关头。爱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成为时代的要求。毛泽东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

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①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试图改革中国封建的政治和经济，提出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政新篇》；实行过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利商政策，但不可能变为现实，他们失败了。

六十年代初兴起的洋务派,热衷于‘西艺’;‘师夷之长技’,追求‘自强’和‘求富’,但毕竟是舍本逐末,无济于事。七、八十年代以后，洋务派的下级官吏容闳、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王韬，以及被列为早期改良派的陈炽、陈虬、何启、胡礼垣等人，就冲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藩篱，批判舍本逐末，要求学习“西学”、“西法”,进而呼唤‘议会’、‘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政治和传播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这批走向世界的人们，通过他们的奏折、日记、书信、译著、撰述和回忆录等方式，输入西方的先进的政治思想学说。这些政治思想学说，尽管自《共产党宣言》问世，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光泽而走向暗淡和没落，但对于古老封建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因素，进步的学说。

对于欧美诸国社会制度的考察和评介，是这些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家们着力论述的重要内容。他们认为，西方国家富强之本，不在于技术的先进，而在于政治制度的优越。他们竭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称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鼓吹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提倡发展民族工商业。

马建忠在论及欧美国家富强的原因时认为，其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他强调得民心的重要意义。梁廷枏在《合众国说》中，介绍美国自建国以来，凡国家之赏罚禁令，都由民主议论决定，然后选举官员执行；国家法律，是民心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58 页，1964 年版。

的体现。他的这种认识，显然没有接触法的实质，有很大的片面性。刘锡鸿在议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精神时说：“凡开会堂，官绅士庶各出所见，以议时政。辩论之久，常自昼达夜，自夜达旦，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官政乖错，则舍之以从绅民，故其处事恒力据上游，不稍假人以践踏。而举办一切，莫不上下同心，以善成之。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① 他所描述的是资产阶级议院辩论问题时的情景。“凡遇大事，必内外部与众辩论，众意所为，而后施行。”② 相反，如非众意所为，在议院中遭到多数反对，没能通过，则不能推行。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朕即国家”，“乾纲独断”比较起来，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评介得更为详备。薛福成说：“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③ 郑观应说“……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他认为西洋各国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④ 其他如宋育仁、陈炽、陈虬，尤其是何启、胡礼垣等，更进一步提出在中国设立议院，实行议会制度的主张。郑观应认为，设议院以通上下之情，执公法以制西人之狡，定则例以持讼狱之平；庶大权不致旁落，而强邻不敢觊觎。在他们看来，如果在中国推行议会制度，中国便会逐步强大起来。这种认识，表现了他们对资产阶级议院的向往。

议院，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权的一种组织形式。人们对它的组成方式、类型、职能及议会民主，评介颇多。薛福成在介绍英国上议院和下议院时说：“上议院人无常额，多寡之数因时损益。……

① 刘锡鸿：《英轺私记》，《开会堂情形》。
②《西洋杂志》，《与李勉林观察书》。
③《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三，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记。
④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戊戌变法》第一册，丛刊本，第 40 页。

而下议院之人，皆由民举。举之之数，视地之大小、民之众寡。其地昔寡而今众，商务日兴，则举人之数可增；反是，则或减或废。举而不公，亦废其例，使不得举。……上议院世爵，多世及，无贤愚皆得入。故其人多守旧，无故不建议。下议院所议，上请上议院，允者七八，否者二三，其事简。下议院为政令之所出，其事繁。’①他简洁明瞭地勾画出英国议院具体情景，说明了上、下院的职能和关系，议员产生的不同途径和方法；特别是下议院议员‘皆由民举’‘政令之所出’这一点，是君主专制的封建国家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于欧美各国议院制度的评介，其他人都涉猎较广，在他们的著述中所反映的那种欣羡之情，溢于言表。同时希冀将这种议会制度移植到中国来，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治的呼声。陈炽主张中国“各府州县，则仿外洋议院之制，由百姓公举乡官，每乡二人，一正一副，其年必足三十岁，其产必及一千金。……每任二年，期满再举，邑中有大政疑狱，则聚咨之。’②而且要求把这种由选举产生的议院制度，从地方到中央逐级施行。何启更具体地提出，男子二十岁以上的读书者皆有选举权，省府县各设议员六十人，讨论地方大事，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是，必须指出，他们所主张的议院制度，无非是为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官僚、富商、绅士们奔走呼号罢了，还远未达到用资本主义制度来代替封建制度的程度。

在他们看来，西方的议会制度有两种类型：“一为民权专重之国，如米利坚、法兰西、瑞士及南北亚美利加各小国，无君位，仅有首领，以听命于议院者也；一为君民共主之国，如英吉利、德意志及欧洲各邦，有君位，有议院，遇事民议之，而君断之者

①《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三，《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记》。

② 陈炽：《庸书》，见《戊戌变法》第一册，丛刊本，第 234 页。

是也。’① 实际是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两种政体。他们认为，“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② 英、德两国是君主立宪国家，也即是他们所说的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的国家。“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③。所以他们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同时，他们对于议院评价很高，推崇备至，认为它是国政之所在，国本之所在，是欧洲近三百年振兴之根本。宋育仁说：“自有议院，而君不能黩武、暴敛逞刑、抑人才、进佞幸；官不能怙权固位、枉法营私、病民蠹国。’④ 这种赞美，未免有些过份，并没有完全反映出议会制度的本质。不过它毕竟是封建专制集权主义的对立物，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思想较为闭塞守旧的中国来说，确实起到了开风气、益民智的作用，使中国人了解到，除了中国这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外，世界上还有另一种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而且希望把这种制度引进到中国来，用西方议院之“体”来改造中国封建主义之‘体”。

特别是这些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家们，当时对于西方的“会”和政党政治，已经有所评介。他们认为，西方各行各业，均有“会’的建立。这种‘会’的组织,对中国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关于政党政治的论述，郭松焘说：“法人君党凡三，民党亦三，议论视他国犹繁。⑤ 马建忠在抨击西方议院制的同时，对其政党政治也有所涉及。他说：“美之监国，由民自举，似乎公而无私矣，乃每逢选举之时，贿赂公行，更一监国，则更一番人物，凡所官

①邹代钧：《西征纪程》卷四，《光绪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记》。
②《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三，《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记》。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
④《泰西各国采风记》第一，《政术》第 11页。
⑤《养知书屋文集》，第十二卷，《致李傅相》。

者，皆其党羽，欲望其治得乎？”① 他道出了美国议院中的政党轮流执政的情形。薛福成对资产阶级政党政治也有过评介。不过，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政党观念和政党制度的真谛，还处于朦胧状态，不甚了解，基本上还处于从地主、官僚、买办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的过程，并且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意识。他们还没有真正完全反映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观点和要求；而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播，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诞生以后，它的中下层力量还很薄弱，羽毛未丰，远未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而它的上层，却有较为雄厚的基础。因而，爱国图存，变法图强，拯救中国，改良政治的历史重任，便落到了它的身上。并且逐步形成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的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康有为，这个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就成为这一政治运动的领袖。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中法战后，他开始著书立说，一八九一年刊行其第一部维新变法的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一八九二年在其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的帮助下编写《孔子改制考》，一八九七年刊行。在这些撰述中，康有为合璧中西，掺杂糅合，涉取了资产阶级进化论思想，奠定了改良派的理论基础，反映了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思潮。与此同时，康有为还参加了实际的政治活动。一八九五年四月，甲午战争，中国败北。康有为在京会试，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讯息轰动京师。爱国人士慷慨激昂，眦裂血沸。康有为痛心疾首，邀集在京应试举人一千三百余名，联合上书请愿。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强调变法是“立国自强之策”的根本大计。这便是颇负盛名的“公车上书”。在清廷严禁士人干政的制

① 《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戊戌变法》第一册，第 164 页。

度下，千余爱国知识分子史无前例地联合请愿，具有重大意义，它表明维新思潮已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稍后成立的强学会，以及一八九四年革命派成立的兴中会和一八九五年的广州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民主派，作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已经正式登上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政治舞台。

设报馆，办报刊，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渠道和媒介。当时，清政府禁止中国人办报，实行思想禁锢。外国传教士、商人等出于侵华的目的，在一些通商口岸设馆办报，延聘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人参与编务。他们在外国人的庇护下，传播西方的政治学说。另外，一八八七年，英人韦廉臣在上海成立广学会，有美国林乐知、丁韪良、李佳白，英国慕维廉、艾约瑟、李提摩太，德国化之安等人加入。他们编译或著述一些介绍外国政治、历史、舆地、教育等方面的书籍：《万国律例》,《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七国新民备要》,《列国岁计政要》等，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维新思想有较大的影响。一八八九年广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刊载时事论著及中外重要政治法令等，对维新思想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康有为数次上书清廷，犹如石沉大海，没有受到重用。于是他便转而在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去寻找支持者，创办报刊，成立学会，开办学堂，制造舆论，大力进行宣传组织活动。

一八九五年七月，康有为在京创办《中外纪闻》，每日一期，由梁启超、汪大燮主持编务。宣传西学，鼓吹变法，是改良派创办报刊之开端。继而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文廷式、陈炽等人发起组织“强学会”，以《中外纪闻》为其机关报。举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任书记，会员数十名，成员很复杂。它得到了帝师翁同和、洋务派军阀官僚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支持和资助。

外国传教士李佳白、李提摩太等人亦参与强学会的活动。该会每三天开会一次，每次都有人讲“中国自强之学”。康有为在《强学会叙言》中，呼吁洋务派官僚、士大夫，爱国官吏及知识分子起来拯救民族危亡。一时颇有影响。

同年十月，康有为得到张之洞的支持，由梁鼎芬、黄绍箕协助拟定章程，成立上海强学会。《上海强学会章程》强调“以求中国自强之学。’标明‘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其宗旨为‘广人才，保疆士，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①提倡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藏书，开博物院。一八九六年四月发行《强学报》，由康有为、徐勤、何树龄主编，它竭力宣传变法立张，第一次在报上公开提出“开议院，立议员，以通上下之情”②的政治主张。强学会的活动遭到顽固势力的弹劾，说它“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攻击《中外纪闻》鼓吹西学是背叛‘圣教’。一八九六年，慈禧太后强令封闭北京强学会，《中外纪闻》停刊。张之洞亦步亦趋，横加干涉，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亦遭解散和停刊的厄运。北京、上海两地的强学会，团结了南北两地的维新志士，扩大了维新派的影响。它是维新派组织团体进行政治活动的发端，锻炼了一批宣传家和骨干力量，数年间，全国各地的报刊和各种组织纷纷建立起来。

一八九六年八月，维新派创办《时务报》，梁启超担任主笔。他以激扬奔放的文字，阐述维新变法的理论，颇受人们的欢迎。《时务报》宣传变法维新，废科举，开学校，育人才，设议院，伸民权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强调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是变法的根本。该报直至一八九八年政变前，被汪康年改为《昌言报》而后销声匿迹，但其影

① 《强学报》第一号。
② 《变法当知本源说》，《强学报》第二号。

响是相当大的。各地纷纷效尤，学堂、学会、报刊与日俱增地出现。

一八九五年严复在天津创办《直报》，发表文章宣传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学术思想，提倡维新变法。一八九七年冬又发行《国闻报》、《国闻汇编》,译载赫胥黎的《天演论》,为维新派提供了思想养料。《时务报》和《国闻报》处于南北舆论的领航地位。

一八九七年湖南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开设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创办《湘学新报》。一八九八年成立南学会时，出版机关报《湘报》，成为当时思想新、影响大的报纸。

一八九七年康有为在澳门创办《知新报》。它与《时务报》、《湘学新报》有“三足鼎立”之称。

随着各地报刊的创办和宣传活动的开展，各种学会也相继涌现。从强学会被封闭后的数年间，即有：蜀学会、粤学会、闽学会、关学会、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保国会，还有上海农学会、不缠足会、戒烟会、湖南的南学会，广西圣学会，江苏测量会等名目繁多的各种会。其中尤以南学会和保国会至为重要。

一八九八年二月在长沙成立南学会，由梁启超撰《南学会叙》。订有章程十二条，总会章二十八条。皮锡瑞任会长，谭嗣同主会务。“设会之意，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① 该会会员千数百人，各县均设分会，每七天集会一次，主讲外国大势及政治原理，并在其喉舌《湘报》上披露。南学会提倡变法救亡，鼓吹革新，议论时局，提倡平等，伸张民权。“地方有事,公议而行”；“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② 谭嗣同说南学会“即不必有议院之名已有议院之实也。”③ 南学会

① 梁启超：《谭嗣同传》，《戊戌政变》，丛刊本，第四册，第50—51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丛刊本，第一册，第300页。
③ 谭嗣同：《上欧阳瓣藏师书》，《谭嗣同全集》，第307页。

的活动，遭到湖南顽固劣绅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诬陷和诽谤，斗争十分激烈。戊戌政变及自立军起事失败后，谭、唐被害，南学会的活动完全被取缔。

一八九八年四月，康有为趁各省举人在京会试之机，发起组织保国会。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设分会。康有为起草《章程》三十条，对会的权限，领导关系，入会手续和会员权利都有规定。标明“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它以保国、保教、保种为宗旨：“为保全国家之政权土地”；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为保圣教之不失”；为讲内治变法之宜”；为讲外交之故。’① 保国会第一次大会，与会者二、三百人，康有为登台讲演，痛陈亡国灭种的惨祸，提出救亡主张。后又连续召开两次大会，与会者均超过百人。康的讲演与《章程》都以救亡为号召，激励爱国热情，是一种爱国的政治运动。列名参加保国会者一百八十五人，与强国会相比较，成员中洋务派官僚已不复再见，维新派的声望却有很大提高。保国会活动一个多月，顽固派便罗织罪名加以攻击，尽管光绪帝为之辩解，免遭查究，但许多会员畏首畏尾，退避三舍，相继散去，人数锐减，形同瓦解。

自一八九六——一八九八年间，各地著名学会有三十多个；报刊五十多种；学堂五十多所。这些学会有一定的组织，却很涣散。即使如南学会、保国会这样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有领导骨干和组织形式，但它的成员也是仅凭一时的政治思想倾向相同而结合在一起的，只能是一种涣散的，没有严密组织的政治团体，还不具备堪称为政党的资格。一九一一年，梁启超在《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中回顾当时的情景说：“彼时同人固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

① 《保国会章程》，《戊戌变法》第四册，第399页。

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① 可见那时人们还不甚明瞭什么叫做政党。

资产阶级政党观念和政党制度，是从西方逐步输入中国的。

在封建专制时代，不仅没有政党可言，而且视“党”为不祥之物，有营私之嫌。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论中国分党》中说：“论语称君子不党，已以党义为非。屈原赋始用党人为指斥之辞，至东汉之季，乃有党祸。自是以后，唐之牛李，宋之蜀洛，明之东林，几代代有之，而与国家之存亡相终始。”② 《时务报》也说：“顾君主专制之世，虽有明党蟠结于朝，未见有一政党于天下。”③ 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西方国家出现议会民主，代议制度，才兴起政党及政党制度。而政党观念的输入，则是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通过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报刊传播于世的。

什么是政党，政党和朋党的区别何在？梁启超说：“政党者，以国家之目的而结合者也；朋党者，以个人之目的而结合者也。’④ 《时务报》也说：“政党者欲把握国家权力，而遂行其志意，故联合同人为一党也”；“朋党者，本小人之事，每以阴险为手段，在在牵制君主之肘，以营利于其间。偶有民人，结作一党，而反抗君主之权，以强迫君主，是革命党耳，非我所谓政党也。”⑤ 这种解释没有说明政党与阶级的关系，显然是极端片面的。

关于政党与议会、立宪政治的关系。《时务报》说：“政党之与立宪政治，犹如鸟有双翼。非有立宪之政，则政党不能兴；若立宪之政，无政党兴起，亦犹鸟之无翼耳。”⑥ 唐才常在《各国政教

① 《戊戌变法》，第四册，第 254 页。
② 《戊戌变法》第三册，第 75 页。
③ 《时务报》第十七册，《政党论》。
④ 《饮冰室合集·文集》，《敬告政党及政党员》。
⑤ 《时务报》第十七册，《政党论》。
⑥ 《时务报》第十七册，《政党论》。

公理总论》中说“:有议院必有党,有党必有公私,固然其不足怪。”西方国家的总统或首相，都由议院中政党推举，然后组织政府，政府由该党成员组织之；如果总统或首相下台，则其党徒俱退出政府，成为在野党。也就是议会的两党制。这种对西方政党政治的评介，在《时务报》上刊载颇多。该报第三册的《美国共和党宣政新论》中说：“美国统领，定制四年一举。国有两党，一日合众，一曰共和，各愿举其党人以任斯职。”在介绍巴西政党制的《伯拉西儿风土记》中也说“:政党分为二 其一为立宪君主党,现值共和党执政之时，此党人等多居国家枢要之官。”而英国的两党制亦是“上载万乘之君，下有二大政党，或进则群居政府，或退则伏在草野，一去一就，相与授受政权。’① 这便是西方议会中的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既符合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形，也反映了人们对政党政治的认识还停滞在政党观念，政党与议会的关系，政党与中国传统的朋党之区别方面。这种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片面的，还没有接触到政党的实质。

关于政党的地位和作用。《清议报》在《政党说》中说“:天下者，党派之天下也；国家者，党派之国家也。欧西各国政治，皆操之于政党。政党者，聚全国爱国之士，以参预一国之政；聚全国舌辩之士，以议论一国之政者也。凡设立内阁，则内阁之大臣，皆政党之魁首；召集议会，则议会之议员，皆政党之名士。用以抵抗暴政，则暴政绝迹而不行；用以代表民情，则民情无微而弗达。故文明之国，但闻有无国之党，不闻有无党之国”。② 《清议报》第七十九号刊载《论非立大党不足以救将亡之中国》说：“党也者，所以监督政治之得失，而保其主权，使昏君悍辟无所得而行其私，其关系于国家者尚已”。显然，这对于政党的认识有进

① 《时务报》第十七册,《政党论》。
②《清议报》，第七十八号，《政党说》。

一步的深化，较之朋党，在认识上出现了一个飞跃，由视党为不祥之物变为对政党政治的崇敬和向往。

关于政党产生的原因，政党的必备条件，组成要素，利弊得失，党内斗争，两党政治，党派竞争，布施政策，党的领袖，争取民众等问题,梁启超等人的《新民说》,《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政党论》等文中,都从理论上有所阐述，对政党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比较充分的估计。但是，总的看来，只涉及政党的表面现象，还没有触及政党的实质。

关于政党的政纲。一九一〇年宋教仁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说：“夫政党组织之要素不一，而其为最重要之一端，且为政党作用之最大武力者，则为政纲。未有政纲不善而犹能存立活动于政治界者也。’① 他十分强调了政党的政治纲领的重要性，这无疑是正确的。

资产阶级的政党观念和政党政治在中国的传播，从理论上已经较为全面和深刻。但在实践上，由于清廷的党禁，人们对党的陈旧观念，一时难于扭转，对“党祸”仍心有余悸。所以，无论改良派或是革命派，都没有将自己的组织公开称为什么党，而是叫什么会，什么社，等等名称。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用了“吾党”的字样，康梁均使用过“政党”一词。一九〇七年康有为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亦称国民宪政党，说什么“开天之幕，政党我先”企图以政党的身分跻身政权，而正式成立时定名帝国宪政会。公开名称仍不敢‘曰党’而‘曰会”。梁启超在《政闻社宣言书》中说：“政闻社其即今世立宪国之所谓政党乎？曰是固所愿望，而今未敢云也。’直到一九一〇年底，康有为在《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一文中，才敢于公开称党。

①宋渔父：《近日各政党之政纲评》，辛亥五——六月，《民立报》。亦见《宋渔父》第一集，前编，民国二年《民立报》馆发行，第47—48页。

上述情况表明，政党观念输入中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逐步为人们所接受；并在实际组织活动中，敢于把自己的组织公开称为政党。这种政党观念的输入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节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出现，兴中会和保皇会的合作与斗争

一、兴中会的成立及其救国宣言和革命纲领

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新的、进步的因素，往往不是以某种单一的形式出现，而是多种形式并存。在遭受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输入而形成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力量，表现尤为明显。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同时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两股政治势力，就是在相互交错、替代，也曾在并行不悖的过程中曲折地前进的。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其变法活动主要在北京、天津、上海、湖南、两广等地，也曾风靡全国，处于领航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由于经济政治力量薄弱，其活动主要在南方和海外华侨之中，声势不著，吸引力小，处于次要地位。两派在政治思想方面，一时还难分泾渭。但都有着爱国的要求和拯救民族危亡、改革现实的愿望，而所选择的道路却大不相同。孙中山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人物。

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原名文,广东香山(今中山县）翠亨村人。青年时代的孙中山，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科学技术、历史名人业绩和文化知识的熏陶。他谙熟英语，博览群书，钻研军事，求知欲强成为一名西方型的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中法战后，他“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①他与杨鹤龄、陈少白、尤烈四人，经常议论时局，鼓吹革命、高谈造反倒满，旁若无人，由是有“四大寇”之称。即孙中山称之为“革命言论之时代。”一八九三年，孙中山与陆皓东、郑士良、尤烈、魏友琴等人，聚会于广州广雅书院内南园“抗风轩”。倡议成立一个革命团体，名为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但并未形成具体的组织。“抗风轩会议”，可以说是孙中山创建兴中会的一次预备会议。不久，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但无结果。

一八九四年十月，甲午战争爆发，孙中山即赴檀香山。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火奴鲁鲁埠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会所在卑涉银行经理何宽家中。与会者二十余人，推举永泰和杂货商店司理刘祥为主席，何为副主席。会议通过宣言九条，选孙中山为会长，程蔚南、许直臣为正副文案，黄华辉任管库，李昌、郑金、邓荫南等为值理。会员均填写入会盟书。会后另设银会，筹备经费；组织会员进行军事训练等。

《兴中会宣言》指出：“中国积弱，非一日矣！抨击清政府‘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揭露列强‘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号召同志‘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规条第一条阐明兴中会的宗旨：“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②这是一篇热情洋溢的救国宣言。

《宣言》第一次提出要求以共和国取代封建帝国的革命纲领，比一年前的‘抗风轩会议’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华夏’又增进了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168 页，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②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辛亥革命》（一），丛刊本第 85 页。

“创立合众政府”的内容，它鲜明地反映了兴中会反清革命，建立共和的资产阶级性质，标志着孙中山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的初步形成。

一八九五年一月，孙中山到香港，联络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黄咏商等人，以及杨衢云、谢缵泰决定取消辅仁文社，一起参与创立兴中会总部。总部设在香港，对外以“乾亨行”名义作为掩护。杨衢云被推为第一任会长。香港兴中会通过修订的《章程》，将“乃以庸奴误国”以下四句改为“乃以政治不修，纲纪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①。这就更明确地把矛头指向了清王朝，更充分体现了兴中会的反清宗旨和革命性质。入会者同样也宣读誓辞。

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诞生。它以民主选举方式和决定重大事项“当照舍少从多之例进行，以昭公允”②的少数服从多数，为其组织原则。这就一扫旧式会党那种层层加封，唯首领之命是从的陋习和宗法制度的遗毒。同时规定“不论中外各国人士，倘有心益世，肯为中国出力”和有志华人“皆得收入会中”，从而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并依据这些原则，先后在国内外扩展组织。计有：茄荷雷、百衣分会。广州分会，并以“农学会”为掩护的设立数十处分会机关，广州起义失败后，机关遭破坏，会员星散。孙中山亡命日本组织横滨兴中会，杨衢云赴越南、印度、南洋、南非等地，组织南非兴中会。一八九六年孙中山抵旧金山组织兴中会，陈少白在台北组织分会。一九〇二年孙中山在河内设兴中会。一九〇三年再赴檀香山恢复被保皇会破坏了的兴中会，改名为“中华革命军”。至此，兴中会没有再发展，活动也极少。但兴中会的革命纲领，却增进了新的内容。一九〇

①《香港兴中会宣言》，《辛亥革命》（一），丛刊本，第 87 页。

②《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辛亥革命》（一），丛刊本，第 86 页。

三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青山军事学校时，将誓辞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革命纲领。中华革命军和改组后的致公堂均采用这一纲领。它包含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奠定了中国同盟会的思想基础。

兴中会的领导层和一般会员计一百七十余人。从它的会员成分看，中小资产阶级是它的阶级基础，华侨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它的主要支柱。所以孙中山说“华侨是革命之母”。华侨中和堂、致公堂以及国内广东、两湖、江浙的一些会党是它的外围组织和主要依靠力量，是它的社会基础。由于兴中会孤悬海外，与国内斗争没有密切的联系，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因而不可能成为领导全国的“革命的中枢”。

兴中会成立初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宣传机构。一九〇〇年孙中山派陈少白在香港主办的《中国日报》才开始问世，但影响不大，与保皇会的宣传相形见绌。另外还发行《开智录》，翻印《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原君》等宣传“反满”的书籍。直至同盟会成立前，革命宣传才有了较大的开展。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便积极筹饷募捐，教练兵操，把武装斗争作为主要手段。香港总部成立后决定发动武装起义。

一八九五年十月的广州起义，曾起草了英文对外宣言和《讨满檄文》。拟于起义后成立临时政府。但起义流产，孙中山被迫逃亡国外。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表明革命派已经作为一支新的力量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的名字从此蜚声政界，为国内外所注目。一九〇〇年十月，孙中山派郑士良在惠州三洲田发动起义，屡败清军，但最终失败；史坚如在广州炸两广总督德寿，被捕牺牲。一九〇三年谢缵泰未与总部取得联系，发动会党洪全福起义，打出“大明顺天国”旗号，印制《独立宣言》，因事泄败露而失败。几次起义的影响较

大。革命派声势日张，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改良派则每况愈下，逐步趋于历史的次要地位了。

兴中会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具备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某些基本属性，可以认为是政党的雏型，但也存在旧式会党的某些特征。它的活动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领导骨干上的准备。

二、保皇会的建立及其忠君爱国宗旨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戊戌政变。光绪被幽禁于瀛台。西太后重新临朝听政。六君子被害，康梁东渡日本，维新运动终于夭折。

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千岛与李福基、冯秀石等人,正式建立‘ 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 ”,简称保皇会。在《保救大清皇帝序例》中,阐明其宗旨说,本会‘ 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 ” “ 凡我四万万同胞，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者皆为会中同志。∞ 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它把忠君与救国连在一起，救圣主就是救中国；救中国必须变法。变法又 “ 非仁圣如皇上不可 ”。救皇上，救中国、救黄种三位一体。忠君爱国的宗旨和反对慈禧、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的思想主张，颇能博得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同情，也能蒙蔽一些仍有正统观念的人们。

一九○○年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保皇会诬蔑义和团为‘ 拳匪 ”,并准备‘ 讨贼勤王 ”,结果他们组织的自立军遭到了血腥的镇压。

《辛丑条约》的签订,彻底暴露了清政府‘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 反动的卖国本质，人们对清廷已经绝望。不少人已摆脱了保皇会改良主义的影响，投身到革命的旗帜之下，革命已成为

不可遏止的时代潮流。然而，康有为仍坚持其保皇宗旨“无论如何万不变”。他拼命抵制革命，奉劝人们“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①。并且制造大同“三世”说的理论。鼓吹只能立宪,否认革命。改良派还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亚东报》、《东方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传君主立宪,讴歌光绪“圣德”，恣意诋毁革命，反对武装起义。

二十世纪的最初两年，保皇会在海外的欺骗宣传，迷惑和蒙蔽了不少侨胞，占据着海外舆论阵地。为革命派的活动和发展制造了严重的障碍，埋下了革命派和保皇派斗争的种子。

保皇会在制造保皇舆论的同时，还在组织上肆无忌惮地排挤和破坏革命团体，扩张保皇组织。梁启超打着“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幌子，四出招摇过市，大挖兴中会的墙脚。三、四年间，檀岛“正埠及小埠均设保皇会所，而兴中会之名则久已不复挂人齿颊矣。”② 梁启超也说：“此间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中山旧党。”③ 其他地方如温哥华入保皇会者“十而六七”。域多利“则殆过半”，纽威士绵士打“几无一人不入会者”④，旧金山致公堂大都入保皇会，横滨兴中会冯镜如也入了保皇会，港、澳、南洋、新加坡、缅甸等地入保皇会者更不乏其人。保皇会在“不数年间，迅百七十余埠，遍于五洲，会众以数十万计”⑤。共建立总会十一个，支会一百零三个。此外还有一些如青年会，学生会等外国组织。兴中会含辛茹苦，创业维艰所开拓的革命地盘，几乎被保皇会蚕吃殆尽。所以孙中山说保皇会“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

①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
②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商务印书馆版，第 33 页 。
③《致南海先生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 124 页。
④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走向世界丛书》本，第 9页。
⑤《开国前革命与立宪之论战》，《建国月刊》，第八卷，第 6 期。

比之清廷为尤甚”① 。因此，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大击保皇毒焰，将革命引上正确轨道，是摆在革命派面前的一项艰巨而刻不容缓的任务。

保皇会内部实行家长制统治和严厉的思想控制。康有为死守保皇宗旨，笃信不变。而梁启超在政变后，思想有所变化，说了不少革命排满的话，与保皇会宗旨发生了微妙的歧异。他起草《上南海先生书》说：“今上圣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既往开来，以报师恩”。签名者共十三人。这实际上是“康门十三太保”②给康有为的劝退书。康得书后怒不可遏，勒令梁赴檀主保皇会事，不得延误。对其他人的一些革命言论，康则视为“反叛”，以“断绝”相威胁。一九〇二年给欧榘甲写信声称，不准其党徒言革命，否则“惟有与汝等决绝，分告天下而已。”无论康有为对保皇会如何统治，如何反对革命，终不能阻止革命洪流滚滚向前。兴中会对保皇会的斗争，使其保皇嘴脸暴露无遗，人心丧失，会员纷纷作鸟兽散，保皇组织日趋瓦解。

一九〇六年清廷颁布“预备仿行立宪”上谕后，康有为大喜过望，手舞足蹈。发出《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蒇保皇会改国民宪政会文》，翌年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名称虽改，但其保皇实质却依然如故，我行我素而已。

三、兴中会和保皇会的合作和斗争

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他们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尽管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却彼此都感到自身力量的单薄，有寻求合作的愿望。两派之间经过多次的接触和谈判，在横滨合作创

①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173 页。
②冯自由：《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革命逸史》二集，第 31—32 页。

办了大同学校等。戊戌政变后，康梁逃往日本，孙中山对他深表同情。孙中山、陈少白同梁启超会谈，讨论了合作的方法。嗣后，陈少白又走访康有为，痛言清廷腐败，非推翻改造无以救中国，“请康改弦易辙，共同实现革命大业。”康有为以冥顽不化的态度予以拒绝。随后即离日去加拿大组织保皇会。而康门弟子梁启超、欧榘甲等人与其师之间却出现了微妙的分歧。通过犬养毅的斡旋,孙中山与他们‘往还日密,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咸主张革命排满论调，非常激烈，因有孙、康两派合并组党之计划。’① 拟推孙为会长，梁任副会长。梁启超还起草“康门十三太保”给康有为“劝退书”。康急令梁赴檀岛。孙中山从梁所请，给檀岛兴中会写了一纸介绍信，结果酿成梁对檀岛兴中会的极大破坏。

保皇会所保之‘皇”,不是一般意义之‘皇”,而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皇”，——因推行“新政”而被西太后顽固势力剥夺了政治权力，被幽禁了的“皇”。这个皇帝当时颇有一定的号召力。保皇会决计“起兵勤王”，拥光绪帝复辟，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事即应运而生。

一九〇〇年，自立军勤王起事，是兴中会与保皇会合作共事的一次试验，同时又是革命与保皇“决分两途”的起点。义和团运动勃兴，革保两派都认为“此时此机，万不可失”。积极进行准备参加自立军的“勤王起义”。孙中山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领袖。”② 唐才常、林圭等人回国活动，孙、梁都出席为之饯行，合作气氛融洽。并派毕永年、平山周赴两湖联络会党准备大举。康梁负责在海外筹款接济自立军。留日学生和不少兴中会员都先后回国协助唐才常起事。唐组织自立军，继又组织“国会”。“国

①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64页。
②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4页。

会”宣布以“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请光绪复辟”为宗旨。

但是，这三条宗旨是自相矛盾的。它否认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又要请光绪帝复辟；既请光绪帝复辟，又怎么谈得上创新自立国呢？因此，章太炎声明“诚欲光复汉绩，不宣首鼠两端自失名义。果欲勤王，则余与诸君异趣也。”① 于是“割辫与绝”，脱离国会，改弦易辙，投身革命。毕永年规劝唐才常与康有为绝交，两人辩论通宵达旦，唐仍坚持己见。自立军因康梁筹款不济而失败。它促使革命派的觉醒和改良派的分化。从此，很多人摆脱了康梁保皇派的影响而走向革命，革保两派也开始划清了界限。一九〇一年章太炎发表《正仇满论》，揭开了革保两派斗争的序幕。因此，自立军起事是革保两派从合作到斗争的转折点。

章太炎的《正仇满论》点名批判梁启超说：“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建立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从此，兴中会和保皇会环绕着反清革命与保皇臣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一九〇二年康有为抛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坚持保皇，诋毁革命，公开挑战。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锋相对地就种族问题，革命与立宪问题，反清与反帝问题逐一予以批驳。

康有为说，满汉已经“同化”，无所谓种族压迫，不能排满革命。章太炎列举清代民族压迫和屠杀的史实，以及康本人被通缉流亡的实际，论证种族压迫的存在。指出当今是“民族主义的时代”排满革命势在必行。

康认为中国民智未开，“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能革命，

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 年第一期，第 118 页。

只能立宪，拥“圣明”皇上复辟，就能避免“血流成河，死人如麻”的‘革命之惨’。章太炎以农民战争的史实，论证人民大众的实践，正是提高觉悟的有效途径；要争得政治上的权利，实现民主政治，必然要付出血的代价。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即使是英、德、日等国的君主立宪，也是数经‘民变’、‘血战’才得到‘自由议政之权’的。对于康氏所保之皇，章太炎直接了当地呼之曰‘载湉小丑’。说他‘未辨菽麦’是清朝的‘亡君’，人民的‘公仇’。连他自身都难保，康氏欲保之立宪，其有何用！

至于反清、反帝问题，章太炎说如果不推翻清朝统治，“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

最后，章太炎警告康有为如再坚持保皇，反对革命，必然会“名实俱丧，为天下笑”。

章太炎批驳康氏反对革命的保皇谬论，铿锵有力，慷慨激昂，淋漓尽致。此后，革命派已明显地替代了保皇派而成为时代的主流了。

孙中山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大击保皇毒焰，扫除保皇邪说，规复革命机关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一九〇三年孙中山到檀岛，大量散发邹容的《革命军》。在希炉和火奴鲁鲁连续召开大会，登台讲演，宣传革命；批驳保皇谬论，恢复了檀岛革命的新局面。同时撰写《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书》两文，与康门弟子陈仪侃论战。

《敬告同乡书》戳穿‘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谎言。揭露康氏“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不可行革命”的胡说，无非是为了‘感恩图报’，延长清王朝之国命。指出：“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庄严宣告：“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

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①。这是一篇痛击保皇派的战斗檄文，显示了孙中山坚定的革命立场。

《驳保皇报书》指出，保皇会标榜的爱国，是爱“大清国乎”抑“中华国乎”？是“非爱国也，实害国也”。批驳“革命招致瓜分”的谬论。文章强调君主立宪并非中国必经之政治阶段，“必先破坏此专制”，然后取法“行之已收大效者”，才能“后来居上”，实行民主立宪。这是“一棹而登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也’②。

经过这场笔战，使许多误入保皇歧途的人们脱离保皇会，转入了革命派。一九〇四年孙中山着手恢复组织的工作，组织中华革命军，不再称兴中会。到美国改造了致公堂机关报《大同日报》，使之成为革命的报纸，这是革保斗争中的一次最大胜利。同年五月，孙中山建议致公堂进行“全美会员总注册”，制定《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改组致公堂。孙中山在美国的活动，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他说：“弟近在苦战之中，以图扫灭在美国之保党，已到过五六处，俱称得手。……保毒当梁贼在此之时，极为兴盛，今已渐渐冷淡矣。’③ 在组织上恢复和改造了被保皇会蚕食破坏的组织，改变了革命派在海外的被动局面。

此外，在南洋、缅甸、港澳等地，革保两派斗争亦甚激烈，革命派也取得很大胜利。侨商纷纷脱离保皇会而转向革命方面。曾资助过勤王的华侨邱菽园，此刻也对保皇派反唇相讥，撰文批判康有为。港澳保皇会会长何穗田宣布与保皇会断交。仰光保皇会长庄银安与保皇会绝裂，与康有为断交，转向革命。

经过一九〇三一一九〇四年兴中会与保皇会的斗争，革命派的革命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扬，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

①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32、237页，1981年中华书局版。
③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40页，1981年中华书局版。

阐明了革命纲领，增加了新的内容，三民主义的思想基本确立。表明革命派在政治上已经趋于成熟，预示着革命政党的即将诞生和革命高潮的即将到来。

四、新型知识分子的爱国运动和革命小团体的涌现

二十世纪初，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式教育和文化事业也相应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在民族危机加深和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他们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爱国运动。并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结合起来，在与保皇会的斗争中，逐步确立了革命立场。在宣传革命思想和组织革命团体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先锋和桥梁作用。这批留日的和国内的新知识分子群，能够为资产阶级“提供他们恰恰缺少的东西：知识、纲领、领导、组织。”①

一九〇〇年以前，中国留日学生不到百人，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五年激增至八千余人。其中官费生不足三分之一，多数是自费生。他们在国外比在国内所受的政治迫害要少，接触资本主义政治思想学说要多一些。因此，政治上较为敏锐，爱国活动和团体也最早开展和组织起来。不过，他们大都经历过从改良到革命的曲折道路。

一九〇〇年，留日学生二百余人建立第一个爱国团体励志会，发行《译书汇编》，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有些成员参加过自立军起事,失败后转向革命。秦力山创办《国民报》,冲破改良派的藩篱，提出颠覆清王朝的主张，鼓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组织国民会。一九〇一年郑贯一等组织广东独立协会，反对清廷卖国政

①《列宁全集》第九卷，第200页。

策。一九〇二年章太炎等人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纪念南明覆亡,以此激励反清革命。同年八月秦毓鎏、张继等组织中国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①,成为具有明显革命目标的团体。其他各省都有同乡会的组织和女学生的‘共爱会’等组织。

随着留学生队伍思想上逐渐摒弃改良而倾向革命,爱国团体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拯救民族危亡和反帝爱国呼声在大量的革命书刊上广泛宣传,从一九〇三年起,在东京和上海形成了两个中心,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拒法”、“拒俄’运动。它使众多的爱国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对革命团体的建立,起了推动的作用。

拒俄运动中,在日本组织一支有黄兴、陈天华等二百余人参加的“拒俄义勇队”。上海拒俄义勇队也相继成立。后东京义勇队改名学生军,以蓝天蔚为队长,进行操练。清廷以“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为由进行的血腥镇压,成为知识分子从爱国走向革命的转折点。五月,黄兴等组织“军国民教育会”,仍以拒俄为目的。七月改组,以‘实行民族主义’代替了‘实行爱国主义”,发展成为一个革命团体。并提出以“鼓吹、起义、暗杀”为主要手段,旋即派人回国策划起义。这就使爱国运动进入了反清革命和组织革命团体的新阶段。同时,伴之以‘革命排满’;‘建立共和’为中心口号的报刊宣传活动也极为活跃,并在整个革命进程中,居于重要的先导地位。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与保皇会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当时,主要的革命报刊有:兴中会的《中国日报》、江苏留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后改为《政法学报》)秦力山等创办的《国民

①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稿》上卷,第45—47页。

报》、黄兴等的《游学译编》、刘成禺等的《湖北学生界》(后改名《汉声》),各省留学生的《浙江潮》、《江苏》、《直说》、《洞庭波》、《汉帜》、《鹃声》、《豫报》、《二十世纪之支那》等。在美洲、南洋以及国内的上海、广州、港澳均有大量的革命报刊相继问世。其中以《苏报》在鼓吹革命、反清拒俄，痛击保皇方面尤为突出。中外反动势力制造《苏报》案后,革命报刊更是有增无已。章士钊等人办的《国民日日报》被誉为"《苏报》第二"接着有《觉民》、《中国白话报》、《抗州白话报》、《萃新报》、《女子世界》、《二十世纪大舞台》……等等，不胜枚举。革命派创办的印书馆，图书局等，出版数十百种革命书籍。其中以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的《訄书》等影响最大，它在唤醒民众，振作革命精神，打击封建势力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的革命宣传家们，揭露清廷的卖国政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打击保皇气焰；扩大革命舆论阵地，传播民族主义思想，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的纲领和蓝图。这些都为革命团体以至中国同盟会的建立，提供了思想条件。革命小团体纷纷涌现：

华兴会：

"拒俄"运动中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派遣"运动员"回国策划起义。黄兴回到长沙，建立革命团体华兴会。

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四日，黄兴以过三十岁生日为名，约请秦毓鎏、章士钊、翁巩等十余人，于长沙保甲局巷彭家恂家集会，决定成立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对外用办矿名义，取名华兴公司。发行华兴票。"① 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五日，在明德学堂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宋教仁、吴禄贞、杨笃生、陈天华等人相继入会。

①黄一欧：《黄兴与明德学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134页。

华兴会在长沙设总部机关，在小吴门正街设东文讲习所，作为活动点，在东街设民译社，作为宣传联络机构。会员很快发展至五、六百人。

华兴会没有留下正式的政治纲领和章程。在革命策略上，黄兴提出革命有二途，即“中央革命”和“地方革命”。他说：“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①，即地方革命的策略。因此，华兴会十分重视联络会党，发动武装起义。并设同仇会以联络会党，设黄汉会以联络军界。一九〇四年，黄兴、刘揆一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准备发动长沙起义。后因事泄流产。马福益等遇害，黄兴等逃往国外。

科学补习所：

湖北是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活跃地区。一九〇三年“拒俄”运动中，留日毕业回国供职的吴禄贞，经常与吕大森、万声扬、时功璧等人聚会，倡言革命，但未成立组织。一九〇四年初，黄兴介绍胡瑛到吴禄贞处避难。他们同张难先、刘静庵等人商讨革命方法。认为“会党发动易，成功难……暗杀为个人举动，不足以摇撼全局”②。“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③。于是许多知识分子相继投笔从戎，在新军中从事秘密的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同年七月三日，在武昌多宝寺街成立科学补习所。吕大森任所长，胡瑛任总干事，曹亚伯任宣传，时功璧主财政，宋教仁任文书，康建唐任庶务。会址设在魏家巷一号。会员以学堂和军营中人为最多。该所表面以研究科学为宗旨，在所内“则以心记之宗旨‘革命排满’四字为主”④。其活动重点在新

①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丛刊本，第277页。
②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卷上，第4页。
③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55页，1946年版。
④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55页。

军方面，介绍大批知识分子入伍，输送会党分子入伍接受军事训练。

科学补习所积极准备响应长沙起义，拟定刺杀张之洞的计划。不料长沙事泄，科学补习所旋遭破坏。

日知会：

留日学生梁耀汉回鄂后，于一九〇五年初，组织革命团体群学社，原科学补习所成员不少人相继加入该社。

科学补习所的刘静庵，应聘到美国教堂中附设的一个阅报室“日知会”任司理。他即以此为名，于一九〇六年二月正式成立日知会，与会者百余人，后发展为数百人，该会设干事会和评议会。“表面为一阅书报社，实则以运动军学会党各界企图革命为目的”① 嗣后群学社亦并入日知会。每星期日召开宣讲会。一九〇六年“萍浏醴起义”后，日知会受株连而遭破坏。刘静庵、胡瑛等人被捕。日知会形同解散。

在湖北还有许多小团体在进行活动。其中以安郡公益社为最著。该社社长彭养元，副社长赵鹏飞。社员均为军学界优秀分子，有数十人。他们多方奔走，营救被捕的日知会员，使无一人受害。张难先等人被保释出狱。该社民元后犹存。

湖北地区革命团体活动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新军中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新型知识分子和新军士兵相结合，成为一种传统，这对以后革命团体的活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武昌起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光复会：

军国民教育会的杨笃生、苏鹏、周咏曾等人发起组织暗杀团，他们回国后发展蔡元培入暗杀团，章士钊、刘师培、陈由已亦相

①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 85 页。

继加入。蔡认为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二是暗杀。军国民教育会的龚宝铨、陶成章、魏兰等人回国活动，直接促成了光复会的建立。

一九〇四年十月，蔡元培在暗杀团的基础上加以扩大，成立光复会（又称复古会）。会址设于上海，蔡为会长。时在狱中的章太炎也参与组织。陶成章成为该会的中心人物，起着主要作用。他联络会党首领，大力发展组织。徐锡麟等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会员先后有五百六十余人。该会拟响应长沙起义，因事泄流产。

光复会以入会誓词“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①。“光复”“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② 会员以知识分子和会党占绝对多数，且有兼知识分子与会党首领于一身者。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和会党的联盟。同盟会成立后，其主要领导人入盟，后又分裂单独活动，直至民元后章另组中华民国联合会，陶被刺身死，光复会才停止活动。

其他地方还成立了许多的革命小团体。在上海有旅沪福建学生会、对俄同志会、上海青年学社。江苏有励志学会，知耻学社，强国会。东北地区有抗俄铁血会。安徽有岳王会。江西有自强会、易知社、我群社。福建有益闻社、文明社、汉族独立会。云南有誓死会。贵州有自治会、科学会。四川有公强会、华阳阅书报社，公德社，等等。星罗棋布，散处各地，一般都宣传革命，议论时政；岳王会还发动过武装起义。

纵观二十世纪初，各地革命团体的建立和活动，冲破了清廷党禁的桎梏。但它们的力量比较单薄和分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旧式会党的某些特点和属性，远未达到资产阶级政党的规模。不过，诸如华兴会，光复会等，以推翻清廷，建立资产阶级共和

①陈魏：《光复会前期的活动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 127 页。
②章炳麟：《〈革命军〉序》。《章太炎政论选集》，第 193 页。

国为最高思想，具备了政党的性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有必要聚集起来，合小群为大群；需要克服地方性的，分散的活动，实现更大的团结，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需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把各革命团体参差不齐的斗争水准，提高到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并使之成为能领导全国革命的中枢，而组成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要求，诞生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政治舞台上。

第三节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革命派同立宪派的论战

一、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政治纲领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历经了自兴中会以来的实践活动，无论从阶级基础、思想基础、组织基础、政治纲领、战略策略、组织原则、骨干力量和领袖人物等诸多方面，都具备了建立革命政党的条件。孙中山业已成为革命派众望所归的领袖。一九〇五年春，他从美国经欧洲又建立了一些革命组织之后，把依靠力量从会党转向新型知识分子。东渡日本后，就把建立革命政党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同年七月，孙中山在东京与黄兴会晤，建议组织统一的政党，得到黄兴的首肯和留学生们的支持。七月三十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内田良平的住所，召开筹备会议。与会者有孙中山、黄兴等七十余人。日人宫崎寅藏、末永节、田良平列席。会议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

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誓词。接着填写盟书，进行宣誓。会议还推黄兴、陈天华、宋教仁、马君武、汪兆铭等起草章程。

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阪本金弥寓所，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大会通过章程草案，即现存的《中国同盟会总章》[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

章程规定同盟会本部暂设在东京。其领导机构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执行部由总理直接主管，下设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计、调查六科。以庶务最为重要，由黄兴主持，如总理他适，则由庶务代理，相当于协理。评议部又称议事部，选举议员二十八人，汪兆铭任评议长。司法部判事长邓家彦，判事张继、何天瀚，检事长宋教仁。三部主要采取联席会形式议事，很少分别开会。同盟会所设各部在以后的实践中又有所变化或兴废。

会章规定同盟会在国内外分设九个支部。国内有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下按省设分会，并推定了各分会的主盟人。东部设于上海，下辖江苏、浙江、安徽等省；西部设于重庆，下辖贵州、四川、甘肃、新疆、西藏等省区；南部设于香港，下辖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省；北部设于烟台，下辖山东、山西、直隶、东三省、蒙古、陕西等省区；中部设于汉口，下辖湖北、湖南、河南、江西等省。国外有四个支部：南洋支部设在新加坡；欧洲支部设在布鲁塞尔；美洲支部设在旧金山；檀香山支部设在火奴鲁鲁。支部下按国别设立分会。这是一套完整系统的组织方案，但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按此办理。对于其他革命团体，章程规定凡宗旨相同而又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

①原章程三十条，己佚。现存的《中国同盟会总章》是 1906 年 5 月 16 日修订的，只有二十四条。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284—286 页，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会员。

自一九〇五年八月至一九一一年七月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式成立，国内外相继建立了支部和分会。计有：南方、江西、辽东、河北、大同、广西支部，福建、云南、上海、浙江、湖南、湖北、四川、山东、陕西等分会，还有江淮别部、信义会、河南总分会、贵州自治学社等。国外有西贡、堤岸分会，新加坡分会和南洋支部，河内、海防分会，暹罗分会、缅甸分会、菲律宾分会，欧洲同盟会通讯处，美洲同盟总会，加拿大支部，檀香山分会，惠灵顿分会，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同盟会组织的发展壮大，许多政治敏锐，朝气蓬勃的新型知识分子加盟，并成为领袖人物和重要骨干。孙中山对此由衷的兴奋，信心百倍。他说：“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就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现舍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之辈、文武才技俱有之。……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诚为有望矣。”① 实践证明，新型知识分子与新军相结合，是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中国同盟会以《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基础,创办《民报》,作为机关报。在《本社简章》中宣布“六大主义”,其中国内三条“: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土地国有”。这与十六字誓词和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揭橥的“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即三民主义，就成了明确而完整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政治纲领。“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②

关于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在誓词、章程、《民报发刊词》、

① 《致陈楚楠函》,《孙中山全集》第 286—287 页，1981 年版。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654 页,1964年版。

《军政府宣言》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等文献中,全面地表达出来。

民族主义,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军政府宣言》指出:“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声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石敬塘、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也就是推翻满族当权者的统治,建立汉族人掌权的政权。着眼于解决政权问题。同时民族主义还包含民族平等的思想,反对狭隘的排满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后来又发展为“五族共和”、“五族平等”。

民权主义,即“建立民国”。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是同盟会纲领的核心。孙中山说:“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①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就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军政府宣言》说得更具体:“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即武装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反对封建君主制复辟。

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军政府宣言》解释说:“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

①《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75 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这便是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而且强调“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①

同盟会的纲领，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领导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矛盾，并力图用革命的手段去解决这些矛盾。列宁称赞说：“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的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②这就是对同盟会纲领的最精彩的评价。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已经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它的成员几乎遍布全球，使国内外的联系得到加强；而且新型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同盟会的骨干，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等的加入，力量不断强大，并成为全国性的统一的政党。

二、革命派同立宪派的论战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民报》着重阐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深刻地论证民主共和较之君主立宪的优越性。然而，清廷“预备仿行立宪”甫颁，保皇会便更名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利用《新民丛报》，拚命鼓吹君主立宪，攻击革命派，叫嚣与革命党死战为第一义。两军对垒，剑拔弩张，一场大论战势不可免。于是以《民报》为一方的革命派与以《新民丛报》为一方的立宪派，从一九〇

① 《民报》发刊词。

②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424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 版，

六年到一九〇七年间，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势不两立，规模巨大的论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波及海外二十余家报刊。可以说是戊戌变法以来又一次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

一九〇六年四月，《民报》第三期号外，发布《〈民报〉与〈新民丛报〉辨驳之纲领》十二条，主要是以三民主义为内容，拉开了论战的帷幕。

（一）关于要不要用革命暴力推翻清王朝。即民族主义种族革命问题。

梁启超攻击革命派说："复仇则必出于暴动革命，暴动革命则必继以不完全的共和，不完全的共和则必至于亡国。"① 他把复仇——革命——共和——亡国连接成一个荒诞的公式。认为"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结论是："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② 这又是一个荒谬的逻辑。立宪派说："吾人之目的，将以改造现政府，而不动摇国家之根本。"③ 也就是保持清朝皇帝及其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统治，作一些颁布宪法，召开国会，建立责任政府的修补，以便资产阶级上层分享一点权力。

革命派以西方"社会契约论"为理论依据，把国家看作永恒的，超阶级的"国民总意"的体现，显然是唯心主义的国家观。但比起"君权神授"，"朕即国家"来说，仍有进步意义。他们揭露立宪派是把"觉罗氏"当成国家的化身，对其政府只能改良，不能倾覆的谬论。指出立宪是大清律的翻版，是为了掩盖清廷卖国政策，

① 饮冰：《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 76 号。
② 饮冰：《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 75 号，77 号。
③ 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 613 页。

以保觉罗氏苟延残喘的统治。因此，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必须进行种族革命，用暴力推翻清政府，不能改良。同时种族革命并非要杀尽满族人，而是推翻爱新觉罗万世一姓的政府。广大满族人民在革命成功后，将“与我汉族同生息于共和政体之下为致足乐矣。”① 因而，民族主义并不是狭隘的排满复仇主义。

（二）关于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即民权主义，政治革命问题。

梁启超认为，“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所以‘不能行共和立宪制’,也不能‘行君主立宪制’,只能行‘开明专制’,这是‘今日独一无二之法门。’② 从开明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只能拾级而上，不能“躐等”。如以暴力躐等而为共和，必将杀人流血，引起下层人的暴动，造成大乱，同时还可能遭受帝国主义的干涉，被列强瓜分而亡国。

革命派从历史上论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其聪明才智并不亚于其他民族，只是长期封建暴君、酷吏的压迫，使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但有很大的潜力，短期内便可以恢复。肯定“我国民必能有民权立宪之能力”。“当负政治革命之责任者，惟我国民；有负此责任之能力者，亦惟我国民。所谓政治革命者，颠覆专制而为立宪之谓也。若能以国民之力，达政治革命之目的，则民主立宪政体必可终获。”③ 针对暴力革命“杀人流血”的滥调，革命派沿引世界历史证明其他国家的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而“杀人流血”是革命不可避免的，是官逼民反的结果。“为国而死，不爱其生，此国民之天职也。’④ 甚而高呼“流血者，自由之母也，立

① 《仇一姓不仇一族论》，《民报》第 19 号。
② 《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 75、77 号
③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 7 号。
④ 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 9 号，第 46 页。

宪者，革命之产儿也。’①“ 青天白日满地红 ”,才能赢得民主共和政体的诞生。

至于“ 瓜分 ”问题，革命派认为中国革命合乎世界潮流，并不排外，不会引起列强干涉。同时认为“ 及今世界，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末由 ’②。只有革命，才能避免瓜分。

孙中山指出：“ 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 ”“ 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立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③ 这就是说，在进行种族革命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政治革命，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政体。

（三）要不要实行土地国有。即民生主义，社会革命问题。

梁启超在《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中，提出“ 三不 ”：即中国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社会革命。理由是中国本来就没有“ 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 ”，也没有“ 建设社会的国家 ”的人才。谁要实行社会革命，就是“ 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不滋蔓，而复从而煽之 ”。其结果是“ 必无成而荼毒一方 ’④。他还叫嚷‘ 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 ”“ 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 ⑤

革命派反驳说，中国尽管不象欧美国家那样贫富“ 悬隔 ”，但也存在贫富之分，不可不革命。社会革命的目的，在于使人民不受资本家的残害，就可以不象资本主义托辣斯“ 为一二私人所垄

① 恨海（田桐）：《满政府之立宪问题》，《复报》第 1 号。
②寄生（汪东）：《革命今势论》，《民报》第 17 号，45页。
③《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75 页。
④⑤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 75号。

断’①，而使国家成为大资本家，由国家分配产品，从而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社会革命还要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即土地问题。实行土地国有，废除土地买卖和土地私有制度。用“定价收买”办法、使地主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国家成为大地主。人民向国家租种土地，向国家交纳地租，用此收入转营其他事业。这样既能使“劳动者有田可耕’②，又可以使国家聚集的社会财富为国民所共享。

这些主张，即革命派标榜的“社会革命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节制资本’和‘土地国有。’其实质不过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的范畴，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

在这场论战中，革命派也明显地暴露出自身的弱点：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纲领；不敢放手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有片面强调排满和大汉族主义的观点；甚至侈谈“毕其功于一役”，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等等。但革命派的凌厉攻势，驳得立宪派理屈词穷，人心丧失。孤家寡人式的梁启超不得不于一九◯七年向《民报》求和,但遭拒绝。《新民丛报》被讽刺为‘纯然监督国民’的‘御用新闻”。梁启超被讥为‘文妖”。在这种气息奄奄，一蹶不振的窘况下，《新民丛报》于一九◯七年八月寿终正寝。论战以立宪派的惨败和革命派的胜利暂告结束。

海外各地的论战，革命派也取得了辉煌战果，如加拿大的《大汉报》，批驳康梁保皇论调，宣传革命纲领，使保皇老巢亦趋于瓦解。

这场论战使得革命派蜚声海内外，革命报刊大批问世，阵地日益扩大，革命力量大为增长，武装起义也接踵而起。相反康梁等声名狼藉，臭名昭著，狼狈不堪。不仅在海外处境窘迫，而且

①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 4 号。
②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 12 号。

在国内也遭到立宪党人的疏远和唾弃。

三、资产阶级立宪团体的出现和资政院政党制度的确立

一九〇六年九月，清廷的立宪骗局粉墨登场。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欢腾喜蹈”，闻风而动，改保皇会为帝国宪政会，梁启超亦有政闻社之组织。国内地主、官僚和资产阶级上层也跃跃欲试，破门而出。霎时间，形成一股立宪运动的风潮。预备立宪公会、宪政筹备会、宪政公会、自治会等立宪团体纷纷建立，出现了海外和国内立宪运动两个派系。

帝国宪政会

一九〇七年三月，康有为正式将保皇会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并在纽约召开成立大会。同时要求禀呈御前大臣和两江、两广总督存案，求得合法地位，企图在国内各省府设分会。

帝国宪政会申明“本会名为宪政，以君主立宪为宗旨”。宣称“救中国之沦亡，必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八字为目的。故欲速变法以救危局，非先得圣主当阳不为功；欲改良以保长久，非改为立宪民权不为治。”仍是一副保皇嘴脸。甚至吹捧过去被他们一贯咒骂的慈禧，企图拉拢皇室贵族为后盾，与国内立宪派联系，同革命派争地盘。“占得一县，即有一县之势力，占得一府，即有一府之势力。”梁启超声嘶力竭地叫嚷“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为第二义；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即有彼即无我，有我即无彼。’① 充分地暴露了他们反对革命的本质。

一九〇八年康有为联合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帝国宪政会会员上书请愿，要求早开国会，使政闻社受株连遭禁。后

①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与夫子大人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 15。

又致电《时报》，要求第五次请愿。一九一〇年底，帝国宪政会改为帝国统一党，向民政部申请注册。由于内部经济纠葛和革命派对它的批判斗争，其声势已不能和保皇会初盛时期同日而语了。

政闻社

一九〇七年十月十七日，政闻社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宣告成立。《政闻社宣言》说："政闻社所持之主义，欲以求同情于天下者，则有四纲焉"："一日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并且声明"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①

政闻社不设社长，康梁均不列名，但梁为其精神领袖和实际操纵者。该社设总务员，常务员和评议员，下设庶务、书记、会计、编纂、调查和交际六科。职员共七十三人。一九〇八年春，总务员马良（相伯）和常务员徐公勉将社本部迁往上海，派人分赴各省设分社。梁启超办《政论》月刊为其机关刊物，鼓吹立宪。该社参与预备立宪公会发起的"国会期成会"的签名，法部主事陈景仁电奏要求速开国会并限三年为期。康指示梁联络室宗权贵奕劻等，企图使清廷蠲除戊戌前怨，开放"党禁"和赶袁世凯下台，排斥杨度的宪政公会。但事与愿违，反遭袁等人的攻讦。加以陈景仁上书事件和《江汉日报》刊载帝国宪政会的《外洋华侨请愿书》等因，慈禧于一九〇八年八月谕令封闭政闻社，社员作鸟兽散。

预备立宪公会

日俄战后，国内有些人认为日本立宪国战败沙俄专制国。一时倡言立宪的呼声高涨。《时报》和《东方杂志》竭力鼓吹立宪。清

①《政闻社宣言书》，《辛亥革命》四，丛刊本，第 111—115 页

廷立宪上谕颁布后，江、浙、闽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人积极组织宪政研究公会。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上海正式成立“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任会长，张謇、汤寿潜任副会长，许鼎霖、雷奋等十二人为干事。设有董事会，每月例会两次，有决定重要事项，选举会长等权。另设常驻事务员、书记、会计等若干人　该会宣布以“敬尊谕旨，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①。并且每年召开常会一次。一九一〇年在北京设立分会。

预备立宪公会成员多为实业界、文化界、政界知名人士，经济实力雄厚。在国内立宪运动中处于领航地位，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九〇八年出版《预备立宪公会报》半月刊，迁京后改《宪志日刊》。出版宣传立宪和法律书籍，创办国会问题研究所和法政研究所培养人才。该会尤着重联络其他团体上书请愿，掀起多次国会请愿运动，但政治上比较保守，体现了上层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

宪政公会

一九〇六年杨度、熊范舆在东京成立“宪政讲习所”，次年改为宪政公会，熊任会长。其《总章》宣称以“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①为宗旨。它抨击清政府“冥顽不灵，贪饕无耻”，“亡国祸根”。主张设立民选议院和上书请愿，要求清廷实现其主张。

该会在国内联络谭延闿设立湖南宪政公会，北京、上海设分会，从事国会请愿的联络活动。杨度返国后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发迹官场，会员遍布朝野，其主张与官方同调，仗势排挤政闻社等团体。杨、熊醉心仕途，会务不兴，日趋停顿，悄然而散。

① 《预备立宪公会报》所刊《会员题名录》。

宪政预备会

一九〇九年唐尔镛、任可澄等在贵州建立宪政预备会，任可澄为会长，陈廷棻为副会长。该会与贵州自治学会斗争激烈，控制贵州行政和财政权力；创办《黔报》和《贵州日报》，宣传立宪，参加国会请愿活动。辛亥后引云南唐继尧入黔任都督，镇压自治学社，控制贵州地方政权。

宪政筹备会

一九〇九年五月，湖北宪政筹备会成立，姚晋圻任会长，汤化龙、余德元任书记，张国溶任编辑员。该会是湖北各请愿团体和请愿同志会的核心，积极参与国会请愿活动。书记汤化龙尤为活跃，湖北谘议局成立时，他被推为副议长，继任议长。在国会请愿运动中，他往返于京汉之间积极活动。一九一一年夏，汉口三十三个商团保安会和八十八个商业行帮组织万余人，在汉口跑马场开会，为汤化龙赴京请愿送行。他提出了简任贤能，组织完全内阁；提前实现宪政；速开国会的请愿三要事，成为国会请愿运动的实际组织者和中坚分子。汤亦因此而遭清廷的申斥，同时也就抬高了汤的身价，在国内的名声逐步显赫起来。

粤商自治会

一九〇七年陈惠普、李戒欺等人发起成立粤商自治会（又称广东自治会），主要是广东商业金融资本家和少数知识分子参加，依靠广州七十二行和九大善堂开展活动。

该会领导广东商民参加反帝运动：一九〇七年反对英国在西江缉捕‘盗贼’的斗争；一九〇八年因‘二辰丸事件’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一九〇九年因勘定疆界，开展反对葡萄牙和清廷卖国政策的斗争等。它在参加国会请愿运动中，提出谋取地方政权、保护资本家的要求。其成员复杂：有保皇派对革命持反对态度的；有宣传立宪又讴歌革命的；有不反对也不谈革命的，有同情和参加

革命的。辛亥后该会宣布解散。

其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立宪小团体，如上海的宪政研究会，北京的谘议局联合会，八旗维持宪政会，八旗期成公民会，吉林的自治会。以及海外华侨、留学生的立宪团体等，共约八十个。这些团体都参与了国会请愿活动。

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〇年末，国内立宪团体先后掀起规模不等的五次国会请愿运动。一方面暴露了清廷假立宪、真专制的反动本质；另方面表现了资产阶级上层企图通过召开国会以抵制和消弭革命，对清廷妥协退让的两重性。值得注意的是，国会请愿运动失败，请愿代表团解散时，曾发布《通知书》，要求酝酿改组政党，企图在资政院中争夺席位，参与权力的再分配。于是，全国性的立宪政党在资政院中组织起来，政党制度在资政院中开始确立，但只是昙花一现。

宪友会

一九一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北京中央资政院开议。在《资政院院章》中规定议员分‘钦选’和‘民选’两类,各占一百席。钦选大都是庸碌顽固分子，计有宗室王公世爵十六名，满汉世爵十二名，外藩王公世爵十四名，宗室觉罗氏六名，各衙门七品以上三十二名，硕学通儒十名，多额纳税者十名。民选议员由各省谘议局选举产生，大都是官绅转化而来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或立宪派，其中留学生或出洋考察过的二十四人。

一九一一年五、六月间，直省谘议局联合会开会，约请有十四省谘议局正副议长参加会议。他们除要求取消皇族内阁外，主要是商讨组织政党。会议议决成立宪友会。六月十四日在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章程》规定暂不设会长，设常务干事三人（雷奋、徐佛苏、孙洪伊），文书员二人，会计员二人，庶务员二人，调查员八人。总部设在北京。另外支部规则十五条，各省设立支

部，并推定负责人。

该会《章程》二十五条,其基本纲领是‘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具体政纲有六条：一、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二、督促联责政府；三、厘订行省政务；四、开发社会经济；五、讲求国民外交；六、提倡尚武教育①。

宪友会是以谘议局为基础的全国性立宪政党。大多数立宪派知名人士参加，也有不少革命派加入，它是立宪政党中的激进派。

帝国宪政实进会

该会于宣统三年八月九日正式成立，是以资政院钦选议员为主体的，所谓“白票党”人组织之政党，本部设正副会长，常任议员、编辑、审议各科。会长陈宝琛，副会长于邦华，姚锡光。各省设立分会。它的政治态度保守甚至反动，在资政院和谘议局中与宪友会明争暗斗，互争雄长。辛亥后通过决议反对共和政体，实际上是专制主义的附庸和应声虫。

该会会则十二章三十一条，政纲十条。主要是尊重君主立宪政体，发展地方自治能力，完善法律，讲求经济，注意教育等等②。

辛亥俱乐部

一九一年六月成立，其党规九章三十一条。设常议员、评议员、庶务员若干人，本部设于北京，湘、蜀设有支部，成立初，议员非议员几乎参半。议员中多各衙门官吏钦选者为多，少部分民选议员。它以度支部尚书载泽为后台，杨度为其实际操纵者。出头露面的有赵椿年、陈懋鼎等钦选派；罗杰、牟琳、易宗夔等民选派。当时有“官党”之称，有会员二百七十余名。后来有一些革命派人物如宁调元、田桐、魏宸组等人加入，逐渐由官党向民

①《时报》，宣统三年 5月 14日。

② 参见宋渔父《近日各政党之政纲评》，辛亥年五、六月，《民立报》；又见《宋渔父》第一集，前编，民国二年《民立报》馆发行，第 59—66 页。

党转化。在资政院中是介于宪友会和帝国宪政会的第三党。

辛亥俱乐部政纲八条，主要是阐扬帝国精神，提倡军国民教育，发展地方自治能力，以及经济、国防、外交等条款①.

政学会

政学会亦名政学公会，一九一一年春成立。党员二十余人，以资政院议员为限。为首的有汪荣宝、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法政留学生。该会人少力弱，不久即分化瓦解②.

这些立宪政党的建立，一方面表明立宪派对清廷许诺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抱有幻想；另方面也说明他们对清廷的统治，在革命高涨的情势下，能否延续到宣统五年持怀疑态度，而另有他图；或赞成、附从甚至与革命派合作，为加入革命行列作必要的准备。毋庸讳言，立宪党人在武昌起义前的保路运动和在起义后的多数省份直接发动独立和光复，对于结束清廷二百六十余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尽心竭力。起过作用，这是无可否认，有重要意义的。当然，必须强调，在辛亥革命中起决定作用，功勋卓著的，是革命派，这同样是无可否认的。

第四节　中国同盟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其历史局限性

一、同盟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和武昌起义的胜利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在政治思想方面与立宪派进行了

① 参见《时报》,辛亥 5 月 24 日，《辛亥俱乐部之初组织》。

② 参见《国风报》,第二年第 12期，《中国政党历史小志》、《中国纪事》，第 97—98 页。

激烈的、针锋相对的大论战；同时又在军事方面发动了前仆后继的反对清王朝的斗争。立宪派希冀以叩头请愿、保皇臣请来达到分享政权的目的；革命派则以武装夺取政权作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用战争来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二者截然两途，泾渭分明。

一九〇六年秋冬间，孙中山、黄兴、章炳麟等，制定了指导革命党人进行武装斗争的文件《革命方略》。其中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项内容。总的指导思想是：“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①。也就是建立一支由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领导和指挥的国民军，作为斗争的工具，以实现其纲领。

从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一年，同盟会以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实践了武装斗争方略，领导和发动了十余次反清起义。有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马笃山起义、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冈起义、武昌起义等。另外，光复会的徐锡麟还发动了浙皖起义。还有岳王会熊成基发动的安庆马炮营起义。同盟会员余英、熊克武、黄树中、谢奉琦、王天杰、吴玉章等人在四川发动的沪州、成都、叙府、荣县等地连绵起伏的起义，并且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

同盟会领导的历史武装起义，显示了革命党人与清廷反动腐朽统治作殊死战斗的坚定信心，和为实现革命纲领而奋战不息的顽强毅力。这些起义各具特色：有借助于当地群众自发斗争而发动的起义；有以会党为主力的起义；有运动新军的起义；有组织一支突击队，突袭某战略要点的起义。希图武装夺取政权，是革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69 页。

命派最突出的优点。起义中党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身先士卒，浴血奋战，可歌可泣。有的公开打出“中华民国”的旗号和“中华国民军”的旗号，矛头直指清王朝封建专制政体，提出建立共和民国的政治主张；同时涌现出一些英勇善战，所向披靡，使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但是，革命派在武装斗争中，也显露出不少弱点。它依靠会党，却没有很好地用革命思想去教育和改造会党，以提高会党的政治素质，而当会党的弱点暴露后，又对之感到失望。革命党人领导不力，指挥失灵，思想认识存在分歧，步调不够统一，后勤供给脱节，组织较为涣散。起义过程中表现出盲动冒险的倾向。而当起义遭到挫折失败后，领导层之间互相埋怨，甚而分裂。某些领导人又醉心于个人暗杀主义，企图谋杀某个清廷的封疆大吏，便可一举而得天下，当然无济于事。革命党人没有建立可靠的根据地，没有深入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失掉了群众的支持。他们把武器的补给寄托在向某些帝国主义购置，以致弹药不能及时接济，甚至失效无用。当然，革命党人在历次失败中，也悟出一些道理和教训。从而一方面在新军中做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发展和健全革命组织，加强同盟会在新军中的领导核心；另一方面又把主要的工作重心，由南部边境移到中部长江流域腹地，这就为武昌起义的胜利，提供了主客观方面的有利条件。

武昌起义是由同盟会领导的，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直接发动新军起义而取得的伟大的胜利。它是在湖北特殊的条件下，革命党人经过长期酝酿和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取得的。

两湖地区自洋务派官僚张之洞督鄂以来，即推行洋务政策。在兴办工业、组建新军、开设学堂、派遣留学生方面，较为突出。各级学堂的学生和留学生都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湖北留学生在日本创办的《湖北学生界》，宣传革命思想，对湖北学生有

很大的影响；国内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在新军中的工作也颇为得力。二十世纪初，湖北便有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安郡公益社等革命团体的建立和活动。自一九〇七年起，武汉地区又先后建立了一批革命小团体。如同兴俱乐部、集贤学社、湖北军队同盟会、种族研究会、中华铁血军、群治学社、自治团、军队同盟、将校研究团、湖北共进会、文学社等等。其中尤以文学社和共进会最为活跃。它们在新军中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积累了雄厚的革命力量。

一九〇七年一月，湖北日知会被查封，领导人被捕，会员星散，革命党人的组织活动和革命活动一度处于停止状态。南部边境同盟会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各地此伏彼起的群众反抗斗争，深深地鼓舞着革命志士的激情。他们决心在长江腹地再度聚集力量，扎根新军，以图重振旗鼓，东山再起。

一九〇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原日知会员任重远、李长龄、黄申芗等人，经过半年多的联络和筹备，在武昌洪山罗公祠召开会议，成立湖北军队同盟会，会员约四百多人。创办《通俗白话报》宣传革命，从而结束了自日知会被封闭以来革命组织活动的沉寂局面。它的活动仅五个多月，因受清吏破坏，《通俗白话报》停刊，会务又停顿下来。但它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新军中的杨王鹏、唐牺支、郭抚宸、邹毓霖等十余人，将军队同盟会改组为群治学社，并于武昌小东门外沙子岭金台茶馆召开成立大会。《宣言》宣布以“研究学识，讲求自治，促睡狮之猛醒，挽既倒之狂澜”① 为宗旨。简章规定设社长一人，文书二人，会计一人，庶务一人，评议员若干人组成领导机构。社员每人每月介绍二名新同志入社，必须经过考

①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 6 页

查才能加入，但不得介绍官佐入社。社员还须交纳薪金的十分之一，作为活动经费。一九〇九年创办《商务报》，詹大悲任主笔，同盟会员刘复基、蒋翊武参与报社工作。群治学社在李六如继任庶务后，组织有更迅速的发展，新军各标几乎都有它的社员。一九一〇年该社与共进会焦达峰联系，欲乘长沙枪米风潮之机起事，结果暴露了形迹，遭湖广总督瑞澂搜查。事后，李六如、杨王鹏、章裕昆、廖湘云等，商议决定将群治学社改组为振武学社 。

一九一〇年九月十八日（中秋节），在武昌黄土坡召开振武学社成立大会，举杨王鹏为会长，李六如任文书兼庶务。章程规定“专为联络军界同袍讲求武学”为宗旨。建立标、营、队代表制，规定“凡干部会议非标代表不得参与，各营不得互知其内容，以防宣泄；惟承代表之命，分途进行，并传达命令而已。”①社员发展至千人，在新军中力量大增。振武学社的活动被二十一混成协统黎元洪发觉后，他不敢大势声张，只将杨、李二人开除军职，草草了事。嗣后振武学社由蒋翊武主持。他谨慎从事，两个月后，风波平息，便约詹大悲、刘复基、蔡大辅等人，在武昌阅马厂集贤酒馆聚会，决定改振武学社为文学社。一九一一年一月三十日（春节），各标代表在黄鹤楼风度楼集会，正式成立文学社。

文学社名为“联合同志，研究文学”②，实际以“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为宗旨③。推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任文书部长，刘复基任评议部长，邹毓霖任会计兼庶务。各标、营各举代表一人参加领导工作。社员交入

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 125 页。
②章裕昆：《文学社武昌起义纪实》，第 18 页。
③万鸿阶：《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 119 页。

社金一元，每月交薪金的十分之一作会费；社员应尽力介绍新同志入社。继续扩展组织。社员几乎遍布新军各兵种，文学社连续召开了三次代表大会，决定设立机关，发行《大江报》为机关报，增设支部，加强交通联络和对新军士兵的宣传教育工作。这样，使文学社的组织发展日臻健全。湖北地区有些其他革命小团体相继并入文学社。文学社的领导骨干们默默地、脚踏实地地做了许多艰苦的组织工作和革命宣传活动，在新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社员最多时近三千人。这支掌握近代先进武器的革命武装力量，吸引和促进了与另一个较大的革命团体共进会的联合，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政治、思想、组织和物质上的有利条件。

湖北共进会是东京共进会在国内的发展。一九〇七年八月，焦达峰、邓文辉、刘公、张百祥等人，在东京联络流亡到日本的会党首领和部分同盟会员，成立了共进会。推张百祥为总理。张本人就是川东一带会党领袖。共进会下设内政、外交、交通、军务、参谋、财政、党务、文牍等部。

共进会宣言分别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写成：文言文说“共进者，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① 白话文较通俗易懂，主要是针对会党下层而作，反映了推翻满族贵族统治的民族主义思想。但两种文本都没有明确体现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内容。

共进会把同盟会宣言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平均地权”持有不同意见，甚至反感；同时也说明他们借用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口号，来表达他们反对满族统治的民族主义思想。按照共进会军务部长孙武解释是“平均人权，共进一切”②。共进会其他人的解释，却包含着“平等”的

①《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三期。

②《孙武演说》，《亚细亚报》，1913 年 27 日。

思。共进会的入会仪式，明显地表现了封建性旧式会党的色彩：如烧香、结盟、设山、水、堂、香等名目。一九〇八年共进会扩大会务，发展组织，制定三等九级军制，确定国旗式样。本部除任命各部部长外，还委任了一些省的大都督。后又派孙武、焦达峰等人回两湖地区开展活动。

一九〇九年四月，共进会在汉口长清里设立总机关，武昌、长沙等设秘密分机关。并以‘中华山’为名统一长江流域会党，编五镇军队由孙武统一指挥。但会党随意暴动遭致失败，孙武被侦捕，下令停止五镇活动，后赴香港加入同盟会。一九一〇年孙武再至汉口，力图东山再起。次年二月在武昌胭脂巷二十四号设秘密机关，会务又有新的发展；同时将工作重点，由发动会党转向依靠新军。当时黄兴正筹备广州起义，他派同盟会员居正赴鄂联络策划响应。居正曾任共进会的内务部长，与孙武过从甚密，主张也颇为一致。嗣后，谭人凤亦受黄兴派遣到湖北与孙武、居正一起，共同策划响应广州起义。从此，共进会与同盟会的联系更有所加强，其组织在新军中也有较大的发展。五月，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后，居正、孙武、刘公、焦达峰等人在机关集会，商量对策。会议最后认为，将起义地点确定在长江流域腹地进行；如湖北首先起义，湖南立即响应；湖南先行发难，湖北即时响应，最好是两湖同时起义。另外，还推举杨时杰、查光佛、杨玉如等人与文学社联系，商谈两个革命组织实现联合，共同发动起义事宜。

共进会主张在两湖地区首先发动起义是正确的。两湖地处长江之中游，中国之腹地，水陆交通便利，工业发达，经济力量雄厚；武汉拥有大型钢铁厂和兵工厂，武器可以供起义者夺取使用；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工作有很好的基础，并与两湖会党的联系亦较为密切。焦达峰早就在湖南联络会党，并使之加入了共进会。

邓文辉在江西也建立了共进会分会。新军一旦起义，邻省共进会和会党极易于联络和响应。

在两湖地区首先起义的决策，与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领袖人物，宋教仁等所主张的“革命地点应居中”的方略是完全一致的。中部同盟会对于湖北两个革命组织的联合和革命活动，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关注，并且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是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筹划，于一九一一年七月，在上海正式成立。早在一九一〇年五、六月间，同盟会部分领导骨干谭人凤、宋教仁、赵声等，对于孙中山只注重在南部边境起义，并屡遭挫折，而忽视对长江各省的发动和领导，深表不满。因此，他们在东京集会，共商大计。宋教仁认为，武装斗争“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① 并由谭人凤召集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长进行讨论，同时筹组同盟会中部总会。会议议决采取中策，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会后，他们纷纷回国活动。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宋教仁、陈其美、范光启、姚志强、吕志伊、谭人凤、章梓、陈勤生等人，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召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式成立会。会议通过《章程》，发表《宣言》，声称“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宣言》认为，同盟会前此革命之失败，在于同盟会“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表示“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部。”针对同盟会存在的某些弊病，提出“机关制取合议、救偏僻，防专制。总理暂虚设，留以待贤豪”，体现了改组同盟会的意向。同时声称凡中国同盟会会员依本会法律入会者，皆为本会会员。中部总会总机关设于上海，会员二十余

①《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93页。

人（一说四十余人），旋又在南京、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地设立分会。上海总机关设总务干事五人：陈其美掌庶务，潘祖彝主财务，宋教仁主文事，谭人凤掌交通，杨谱生掌会计。中部总会的成立，适应了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它积极从事长江流域的革命工作，并在促进湖北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方面，作了不少工作。

中部总会正式成立以前，谭人凤就在湖北与孙武、焦达峰等人，共商策应黄花冈起义和加紧两湖发难事宜。共进会也决定与文学社联系商讨合作大计。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一日，两个革命团体举行合作会议，双方就联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消除门户之见，解决矛盾的方法交换了意见，但无具体成就。双方在领导人的人选方面，仍存在分歧，各不相下。六月，谭人凤再到汉口，从中斡旋，提出两团体应该和衷共济，相辅而行。“经谭人凤竭力开导调解，才得化除成见，从新合作……。”① 但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合作，各自还制订了起义的应变计划。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联合问题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一九一一年九月十四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了联席会议。联席会决定取消各自团体的名称，废弃原组织负责人的职衔和指挥系统，建立统一指挥，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组织领导机构。推举蒋翊武任军事总指挥，王宪章任副指挥，孙武任参谋长，主持军事方面的工作。指挥部设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同时举刘公担任总理，负责政治方面的工作。下设若干政治筹备员，负责文告、印信、旗帜、符号及炸弹制造等。设总部于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联席会还决定派居正、杨玉如赴上海中部同盟会总部邀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鄂主持革命工作。这样，湖北

① 《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 3 期，第 99 页。

两个革命团体才实现了真正的联合，并将这个联合组织直接置于同盟会的领导之下。这对武昌首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九月二十四日，联席会再次举行，六十多名代表讨论决定武装起义总动员。确定十月六日（中秋节）为起义日期，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各标、营、学堂都落实了具体详备的战斗任务。同时通知焦达峰届时在湖南立即响应。这次联席会议制订的总动员计划，为武昌起义作了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革命党人为“中秋起义”而积极行动起来。

湖广总督瑞澂，根据清廷及外国使馆的情报，侦知革命党人的活动，遂密布鹰犬，严加防范，实行戒严，制造恐怖气氛。而黄兴、宋教仁等也未及时来鄂，因此，起义的时间表未能如期进行，被拖延下来。

十月九日，孙武等在宝善里制造炸弹爆炸。机关被敌破坏。在危急情况下，蒋翊武、刘复基等人挥剑劈案，破釜沉舟，当机立断。由蒋翊武根据九月二十四日总动员计划发布命令：“本军于今夜十二时举义，兴复汉族、驱除满虏。”但，入夜，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被敌人包围。蒋翊武脱逃。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人被捕，旋被杀害。十月十日晚八时许，武昌起义的枪声在工程第八营打响了。一夜之间，武昌全城便被控制在革命党人手中。起义的整个过程基本上是按九月二十四日总动员计划和十月九日蒋翊武总司令的命令进行的。武昌起义迅速取得胜利。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成立了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湖北军政府。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自海外抵上海，及时召开同盟会本部和在沪各省负责人会议。重新发表宣言，修订章程，加强同盟会对革命的领导。批判了章炳麟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错误论调，强调“吾党之责任，盖不卒于民族主义，而实卒

丁民权、民生主义’①，“必完全贯彻此三大主义而无遗。②与此同时，孙中山为组织中央革命政府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十二月十九日，十七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同时从即日起改用阳历，为中华民国元年之始。

同盟会经过浴血奋战取得的成果——资产阶级共和国诞生了，南京临时政府诞生了！二月十二日，清帝溥仪退位，从而结束了统治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二，同盟会的历史功绩及其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遵循这一原则，按照这个标准去评价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历史功绩，便能得出历史主义的答案，而不致苛求于古人。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一文中指出：“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③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丰功”在哪里？“伟绩”是什么呢？

首先，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国同盟会推翻了清朝反动的、卖国的政权，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正如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所说的南京‘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掌握了临时政府的政权。孙中山拥有法定的统治全国和统率全国海陆军的最高权力，同盟会重

①②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82页、8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311 页。
④《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83页。

要骨干控制着政府的大部实权。根据“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各部、次长名单如下：

陆军总长黄兴	次长蒋作宾
海军总长黄钟英	次长汤芗铭
外交总长王宠惠	次长魏宸组
司法总长伍廷芳	次长吕志伊
财政总长陈锦涛	次长王鸿猷
内务总长程德全	次长居正
教育总长蔡元培	次长景耀月
实业总长张謇	次长马君武
交通总长汤寿潜	次长于右任

这份名单中的陆军、外交、教育总长为同盟会员，其他为旧官僚和立宪派；次长除海军次长外，其余均为同盟会员。有的立宪派总长借故不到职，由次长主管。黄兴兼任参谋总长，居各部之首位，故当时有“次长内阁”之称。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及其下设各组领导人，都说明同盟会掌握临时政府的实权。

其次，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在临时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中有较充分的反映，并力图贯彻执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宣告了内政外交方针。三月十一日又公布了具有国家根本大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民主精神。

《总纲》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其他还规定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产生，也可受到弹劾；法院则独立审判。从而基本上确立了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体制。第二章《人民》中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

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有纳税、服兵等义务。这些规定打破了封建君主万世一姓的世袭制度，体现了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三，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和改革措施。

（一）革除封建弊政，废除官场恶习

南京临时政府发布通令，宣称凡政府官员都是“人民公仆”，绝非特殊之阶级。无论官阶大小都着同样制服。实行低薪制，廉洁奉公。官厅中废除‘大人’、‘老爷’的称呼，改称官职。提倡民主作风。政府官员采取考试办法录用，破除卖官鬻爵、上指下派、任人唯亲的弊端，采用任人唯贤的政策。取消跪拜礼，规定普通相见为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打破封建等级和高低贵贱有别的恶习，体现了资产阶级平等思想，文明礼貌和人与人之间人格上的平等关系。

（二）保障人权，移风易俗

南京临时政府根据“共和告成，人道昌明”，“凡属国人，咸属平等”的原则，宣布解放深受封建主义歧视和蹂躏的所谓“贱民”、“蛋户”、“丐户”、“惰民”等，禁止奴婢买卖和贩卖华工，使之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大规模地禁止缠足，解放妇女。政府通过了女子有参与各级政权的权利，冲破了数千年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临时政府公报》还规定‘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而改为罚金或扣留。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五日还下令，限二十日，一律剪除辫子——这个反映清代民族压迫的赘物。此后有辫无辫又成为复辟与革命的重要标志。禁止栽种、贩卖和吸鸦片，对吸鸦片者剥夺其一切公权。其他如赌博、蓄娼、迎神赛会等都有明令禁止。这些政策措施，在当时

历史条件下，对于移风易俗，振作国民精神，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三）振兴实业，改革教育

南京临时政府设实业部，各省设实业司。发布《商业注册章程》、《商业银行条例》等保护和发展农、工、商、矿各业的政策，以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南京临时政府还着手进行币制改革，实行货币铸造和发行权收归中央政府的政策。将前清江南造币厂收归国有，建立中华造币总厂，力图统一币制。发布一系列有关法令、法律、章程等，以建立对货币金融的监督管理制度。当时，临时政府在财政方面十分拮据，困难重重，发行一些军用钞票和开国纪念币等都是必要的。实行币制改革的措施，是资产阶级希望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尝试，但收效甚微。在教育方面，废除封建教育制度，代之以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南京临时政府竭力提倡德育、实利、军国、美育、世界观的“五主义”教育。取缔尊孔读经,禁止‘御批’书籍以及《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等条文的讲授，改授自然科学、实业等实用知识的课程，改旧学堂为学校，男女同校，缩短学制等。这对于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共和国国民具有积极意义。

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它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有的实行了，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有的徒具空文还未来得及实施。这是同盟会掌握国家政权，将其政治纲领付诸实践的尝试。它震撼和革除了封建主义的旧制度、旧观念、旧思想、旧习俗，使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民主思想、共和国观念，大大深入人心，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民国初年，数百家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宣传科学民主、新闻自由、抨击时政、讴歌共和方面，造成了强大的革命舆论。所以，在此之后出现的帝制复辟逆流，无不碰得头破血流而告终。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不成熟的资

本主义产生不成熟的资产阶级。作为这个阶级的政党中国同盟会，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这个阶级的属性，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表现了妥协性和软弱性。

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都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帝目标和纲领。相反，它却强调“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①] 不过，这不等于说同盟会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是无动于衷。孙中山就一直反对领事裁判权，主张关税自主。就职《宣言》中提出：“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外交部对荷兰镇压华侨升旗事件，曾提出抗议和交涉，并取得胜利。

同盟会在反对封建主义方面也缺乏坚决性。民生主义在民国肇建时就被束之高阁，没有着手解决土地问题。相反，对前清官吏、地主的土地，在保护私有财产的借口下被保护起来；农民得不到土地，封建经济没有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就很难发展，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就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民主革命的任务就不能完成。

同盟会对封建军阀头子、帝国主义的走狗袁世凯一再妥协退让，也无力驾驭和阻止立宪派的破坏和篡权活动。革命党人的权力得而复失，民权主义昙花一现。孙中山下野，临时政府北迁，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辛亥革命失败。中国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内部在政治上日趋蜕化，组织涣散，内部派系纷杂，思想上严重分歧，这样的政党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彻底胜利。

同盟会筹备时，黄兴便有形式上加入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的

(1) 《辛亥革命》（八）丛刊本，第 22 页。

主张；对“平均地权”，党内存在着严重分歧，并未从思想上统一认识。一九〇七年的“青天白日旗”风波，孙黄争执甚烈，而黄以大局为重，服从了孙的意见。同年日本政府和商人赠给孙两笔款项，共一万五千元，孙除留二千元作为《民报》经费外，其余投入南部起义之需。章炳麟、张继、刘师培对此大为不满，掀起倒孙浪潮，要求孙辞总理职。随着南部起义的失败，陶成章、章炳麟在东京的倒孙运动也逐步升级。后来这一运动被劝止，但思想上、感情上的裂痕却没有弥合。孙中山对同盟会本部的工作也开始冷淡，并在海外酝酿组织中华革命党，后又改‘中国同盟会员’为‘中华革命党党员”。而章炳麟，张继，刘师培等与国外一些人成立亚洲和亲会，反映了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想。张继、刘师培等又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更加泛滥。章炳麟提出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五无论”，认为‘无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均无一可采。’[①] 这批聚结在《新世纪》和《天义报》的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者的理论和主张，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大相迳庭，格格不入。

政治上、思想上的分野，导致组织上的分裂。一九〇七年共进会在东京成立，表现了与同盟会的离心倾向。同时，陶成章在南洋与李燮和领导的同盟会分部唱对台戏，争夺地盘和影响，重新打起光复会的旗帜，筹集经费，发展会员。这就在南洋出现了同盟会和光复会并存的两个组织。陶成章还草拟了《七省同盟会意见书》，罗列‘孙文罪状”，败坏孙中山的声誉。章炳麟亦参与其事。因而，同盟会内部矛盾冲突越发不可收拾。

一九一〇年二月光复会在东京成立总部，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接纳同盟会，原华兴会中的反孙分子入会，公开

① 《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三次开会记》，《天义报》第 8—10 期合刊。另见章太炎：《五无论》，《民报》第 16 号。

分裂，另立山头。武昌起义后章太炎表示不等孙中山回国就选总统，主张“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①并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②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章便正式“宣布脱离同盟会，并和一些立宪党人搞在一起，专门和孙中山作对。”③ 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他在上海另组中华民国联合会，自任会长，程德全为副会长。三月改为统一党，成为官僚、政客、立宪派的大杂烩，和袁世凯沆瀣一气了。光复会在光复上海、江浙等地，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陶成章被上海都督陈其美派人刺杀于上海广济医院。光复会从此也就销声匿迹了。

民国建立后，不少革命党人以为革命已经成功，便热衷于争权夺利甚至枪杀革命党人；有的洁身隐退，专心从事实业经营，发财致富，不再进行政治活动；有的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蜕化变质；有的结党营私，趋炎附势，别树一帜；有的官迷心窍，跑到袁世凯政府里去做官；有的公开声明退出同盟会，另组他党；有的去搞什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甚至有人提出取消一切政党。特别是同盟会由秘密转为公开的政党以后，大批官僚、政客，前清遗老遗少、立宪党人纷纷涌入同盟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给同盟会的革命旗帜蒙上了一层深深的阴影。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迷信议会斗争，醉心政党政治的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至此，中国同盟会便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同时呈现出民初党派林立的政治局面，党派斗争也出现了另一种新的格局。

①见《胡汉民自传》。
②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64页。
③ 吴玉章：《武昌起义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21页。

第 二 章

中国同盟会改建为国民党，民初政党的兴起,中华革命党的建立，中国国民党的组成

第一节　同盟会内部的分化和国民党的组成

一、同盟会内部的分化

辛亥革命的胜利，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掌握了革命政权。但它刚刚建立，还不稳固，存在许多困难。特别是没有强大的军队作后盾，没有能力以武装力量彻底摧毁清王朝的反动势力。各省宣布独立的军队都在都督手中掌握，这些都督大部分是原清廷的官吏和将领，他们不能为民主共和效命疆场去同袁世凯兵戎相见，根本不听从南京临时政府的指挥。因此，革命党不可能大举进兵，直捣北京，夺取全国的胜利。

新政权在财政上的困难也是很大的。当时独立的地方各省政权多数没有掌握在真正的革命党人手中，他们对南京临时政府当然不能给予财政上的支援，革命政权没有财政来源。海关尚由外国人管理，南方各口岸的海关洋税务司控制着全部税金收入，不

给南京政府分文。由于帝国主义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因而举借外债也不予理睬。民族资产阶级经济薄弱，难以与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相抗衡。

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压力下，加之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反动本性，一时尚未认清，所以新政权成立后，就致电袁世凯，表示承认“南北议和”谈判之继续进行。

袁世凯深知这次革命与往昔不同，单靠武力决难扑灭。因此他采取了武力与和谈的反革命两手向革命进攻，在他被清廷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后，亲督北洋军猛攻汉口，以北洋军的实力，夹清廷以威胁革命，迫革命让步；同时又以革命威胁清室，逼清廷让位。以集全国大权于一身。他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支持下，表示愿与革命军停战议和，以便争取时间，进行反革命的部署，达到篡夺革命果实之目的。

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革命党人步步退却，向袁世凯妥协。议和结果，革命党方面，同意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袁世凯承认共和与逼清帝退位。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优待”的条件下，清朝皇帝宣布退位。接着，孙中山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由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在辞职时，曾经提出箝制袁世凯的三条办法：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临时约法》。这三条办法的中心思想是调袁世凯离开北京这个反革命统治的中心，以削弱他扩张势力的活动。袁世凯当然不肯就范，鼓动北京兵变，威胁南京派来的迎袁专使，迫使资产阶级政党对他再次让步。孙中山不得不再一次迁就，三月六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孙中山于四月一日正式解除临时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夭折了。

资产阶级政党本来应当在取得建立政权的初步胜利后，利用

所掌握的国家机器推进革命，直至推翻反动政权，夺取全国胜利。但他们由于自身的软弱及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等种种原因，却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拿政权作交易，妥协退让。孙中山也违心地交出了政权。虽然他后来认识到了这是个“巨大的政治错误”①，但那是在经过多次失败以后才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为时太晚了。

袁世凯“赞成共和”，清帝迅速退位，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革命已经成功，立即失去一致斗争的目标，革命党内派系之间的分歧与争夺权力的矛盾斗争尖锐起来，行动也不一致，组织涣散，逐渐趋于分化和瓦解状态，不能起到革命领导核心的作用，这种分歧的出现与发展不是偶然的，由来已久。从同盟会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就不时出现过，有时甚至还很激烈。

辛亥革命后，相当一部分同盟会员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装。贪图安逸的思想作风滋长起来，无力抵抗旧的官僚恶习，甚至有些人转化为新官僚、新军阀、新政客，陷入一片混乱。章太炎等人倡言“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对革命党人起了瓦解斗志的作用。上海都督陈其美“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②，武昌起义前被捕入狱的胡瑛，“出狱后娶两妻，复吸食鸦片，日学旧官僚之声音笑貌以自矜”③。等等。加之革命胜利后，一些趋炎附势者“由反对革命之人，均变为赞成革命之人”④。党内各种人员复杂，“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⑤的现象，日益发展。导致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同盟会由思想政治上的分歧也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首先是革命宿将章太炎宣布脱离同盟会与立宪派的官僚合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435 页。
② “龙浩池致陈其美函”，《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集》第 961 页。
③ 《胡汉民自传》。
④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514 页。
⑤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 80 页（中华书局版）

流,先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进而又组织统一党;“以反对中国同盟会为职志，故于袁氏所为，皆极力赞助，满口讴歌”①。恶毒地攻击临时政府和孙中山“无一事足以对天下者”②,企图拉出同盟会的中坚分子宋教仁等。这一切，对同盟会的瓦解产生了很大影响。革命党人对此异常愤怒，指斥他“在革命以前，盛名鼎鼎，人人尊之如麟凤；在革命以后，蝇营狗苟，人人视之若犬马”③。

与此同时，湖北的一些革命党人热衷权势者，孙武、刘成禺等纠集一批失意党人和官僚政客，打着“建设”“统一共和新国家”的旗号，在上海成立民社。举黎元洪为领袖，“与同盟会公开对立”④，拥袁倒孙。早已分裂出去的光复会在两广与同盟会动起干戈。陶成章谋取浙督席位,力图与吴淞的李燮和、镇江的林述庆“联络一气……横绝东南”⑤。结果被陈其美暗指暴徒杀害了。

在组建临时政府时，关于怎样建立中央革命政权问题上，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与宋教仁持不同意见。在一次会议上，孙中山主张采用总统制，宋教仁则力主内阁制。经过争论，与会者多数同意孙中山的主张，采总统制。宋教仁仍坚持己见。之后，在南京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上，黄兴建议新的革命政权的政体采取总统制。“宋教仁仍持己见，反对甚力，主内阁制”⑥。讨论颇久。由黄兴征询众议，多数赞成，照案通过总统制。这是同盟会重要领袖人物的意见分歧，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表面化。

稍后，一九一二年三月三日，同盟会在南京本部召开各省会

①谢彬：《民国政党史》，第 37 页。学术研究会丛书部，民国十三年三月版。
②章炳麟：《太炎最近文录》，第 77 页。
③章太炎：《与孙中山书》，《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 12 页。
④万鸿喈：“民社成立与黎袁勾结”，《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 107页
⑤钱基博：《辛亥江南光复实录》，《辛亥革命》〈丛刊〉第 7 册，第 50 页。
⑥章天觉：《回忆辛亥》。

员大会，商讨今后大计。会上出现分歧意见。一部分人以宋教仁等为代表，认为“武装革命已告终了，应改为公开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复带秘密之性质”。另一部分人，“则以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推广之，不宜倾向于合法的政治斗争而公开一切”①。争论的结果，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一派占居多数。大会决定改秘密时期同盟会为公开政党，并制定政纲九条，将“民族主义”改为种族同化，由反清的革命斗争变成大汉族主义了。将‘民生主义’改为‘采用国家社会政策”,等等,代替了平均地权，它的旗帜更模糊了。这与三民主义相比是明显的后退。

大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于是大批旧官僚、政客、旧立宪派人物，都纷纷涌入同盟会。成员更为复杂，妥协退让日渐占居上风，内部分化，组织极其涣散，原有的革命性质明显地褪色。刘揆一发表《布告各政党请取消从前党会名义书》，提出取消一切政党的主张。宋教仁津津乐道于政党政治，他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企图组织第一大党，由政党组织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制。

同盟会内部分化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同盟会员中有不少人是从封建营垒中刚刚分化出来的革命党人，他们头脑中保留的封建余毒较多，以致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够坚定，干扰资产阶级革命纲领的宣传和实践。这类人物以章太炎为最甚。加上一些同盟会员本是与封建阶级有密切联系的上层人物，他们不能完全接受同盟会的民主纲领。如孙武是汉口百泉的‘家富百万’的子弟,对‘平均地权’持保留态度,他

① 《胡汉民自传》。

既不能忠于同盟会的纲领，也不能真诚地从事革命实践。

其次，同盟会员中有相当部分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厚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狭隘的个人主义和片面性，对党内争论易极端化，易搞极端民主，反对集中，意气用事，合则留，不合则去。甚至发展成搞小团体，产生组织分裂的严重状况。一些人有地方主义与门户之见在同盟会内部也起很消极作用。总统府中粤人胡汉民等与湘人宋教仁不和，宋教仁经常与孙中山意见相左。并蓄谋“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①。黄兴“门下稍有门户之见”②，不尊重孙中山的领袖地位。革命党内称孙中山为“理想家”、称黄兴为“实际家”，不仅属于一般舆论，而且也形成了党内实际上的派别。是一种以地域、门户为区分的派别。影响了党内的团结和工作的开展，以至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孙中山深感自己身为总统，“乃同木偶，……当时同志咸责备弟，且大为反对”③。

第三，辛亥革命胜利后，党内发生陶醉胜利和革命意气消沉的现象，未作必要的斗争，任其发展，对党产生腐蚀作用。正如列宁所说：“随着革命的发展，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各个阶层的地位是要发生变化的。革命愈高涨，资产阶级中最不革命的阶层脱离革命也就愈加迅速”④。许多革命党人在新的条件下迅速消退了革命的进取精神，加紧了猎取个人名利地位和小集团活动。导致党的分化和瓦解。一些革命党人被立宪派旧官僚同化了，成为新官僚政客，满足既得利益，不再革命了。一些掌握军队的同盟

① 章炳麟：《太炎最近文录》，第 77 页。
② 张继：《回忆录》，《国史馆馆刊》第 2 号。
③ 孙中山 1914 年 4 月 18 日致邓泽如书，《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来手札》（邓泽如辑）；参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104 页。
④ 《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列宁全集》，第 10 卷，第 438 页。

会员也向新军阀转化，盘踞地方。自然亦都不顾革命利益了。

第四，更多的革命党人醉心于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梦想在袁世凯统治下实行同盟会的“责任内阁”“政党政治”。这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政治理想，但在中国却永远不能实现这一点，他们当时丝毫也没有认识到。因而由此产生的党内分歧也无法正确解决和处理。再有少数党员如汪精卫等已堕落成袁世凯的内应，一部分人被袁世凯软化、收买，等于退出革命。

革命党的这些腐化堕落、停止革命的现象，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决定的。同盟会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混合体，它又是几个革命团体联合组成的。组织涣散，意见分歧。它当时的革命水准不高，反满共和是它的统一目标。当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南京政府一成立，到后来的清帝退位，袁世凯假赞共和，一些革命党人被迷惑了。立刻沉溺于“革命成功”的幻觉而陷入新的盲目乐观。孙中山放弃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政权，幻想实业救国去搞铁路建设。宋教仁却为实现“议会政治”、“政党政治”而积极奔走呼号。他们所表现的形式不同，但都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

二、国民党的组成

袁世凯篡权窃国后，以伪装效忠于民主共和国的誓言和姿态，增加了资产阶级在中国实现“议会政治”的幻想。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春天，“国内人士纷纷组织政党，一时风起云涌，政团林立”①。为了在即将召开的国会中争取到多数席位，各党派又纷纷改组、合并，极为活跃。同盟会中的一些会员以排满为目

①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第 396 页。

的者，以为清廷推翻，目的已达，也另组他党，与同盟会相异。有的则与同盟会对立，后来变成袁世凯的御用工具。此时同盟会已濒临分崩瓦解之境地，但有些人对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尚未全部消失。仍然幻想在袁世凯当权的条件下，实行“政党政治”、“议会政治”，通过“政党竞争”，发展实业等措施，来扩大和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进而组织责任内阁，把中国政治纳入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轨道。持这种观点最强者是宋教仁。

宋教仁在日本留学六年，饱读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十分倾慕欧美的近代政治，特别是英国式的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并以在中国实现这样的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袁世凯当政后，他以此为武器与袁进行合法斗争。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政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① 宋教仁的政治主张是：“正式政府由政党组织，内阁实行负责任，凡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使总统（立于）无责任之地位”②。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在即将来临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得到半数以上的议席。为此，宋教仁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改组同盟会、建立政党上。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同盟会与受宋教仁影响较大的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四个政团合并，在北京正式组建国民党。领导体制由同盟会的总理制改为理事合议制，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但实际上整个党务由宋教仁代理，即党的实权为宋教仁所掌握。国民党本部设在北京，各省和海外各埠设立支部，国内各交通口岸设立交通部。党

①蔡寄鸥：《鄂州血史》第 225 页。
②《国民党成立宣言》，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第 1 篇，第 130 页。

员人数众多，在临时参议院内占有多数席位，成为第一大党。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靠《临时约法》、争取国会选举胜利，组成政党内阁，实行内阁责任制。

国民党从筹备到成立，发布过《通告海外书》、《组党宣言》、《成立宣言》、《国民党规约》等文件，确定了党的宗旨、政纲和政治主张。它的基本精神主要有：

（一）积极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反对专制，强调民权。公开表明“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①，其终极目的是在中国“完成共和立宪政治”。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有其进步意义。

（二）主张与袁世凯正面抗争，实行责任内阁制。如此，大总统袁世凯便不能为所欲为，国家政权将操在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手中，中国社会将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反对责任内阁制，拥袁集权，则国家政权就继续掌握在地主买办阶级之手，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旧制度。当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搞“议会政治”，实行责任内阁制，这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三）系统地提出了各项政治主张，如单一国制②，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选、发展地方自治、整理军政及财政、开发产业、兴办交通、振兴教育、统一司法等等，都是为了增强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实现资产阶级的愿望。

国民党为了争取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而联合几个小党派组成大政党，势必要把政纲降低，消除同盟会的革命性和急进性。将同盟会秘密时期政纲中的“平均地权”改为“采用民生政

①邹鲁：《国民党规约》，《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 136 页。

②单一国制与联邦制不同。它是由若干行政区域构成单一主权国家的制度。只有单一的宪法和一个最高国家政权机关。

策”。这无异是妥协的，抽掉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灵魂。甚至将同盟会公开后的“男女平权”这样独具革命特色的内容也取消了。把‘力谋国际平等’改为‘维持国际和平”。这是把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外交方针改为不敢触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利益的软弱表现。国民党的纲领与同盟会秘密时期的政纲相比，已大失革命精神，也不如同盟会公开后倒退了的政纲。宋教仁又从扩张“党势”出发，以‘新旧合作’‘朝野合作’相号召，不问‘新旧”，不问派系，把大批官僚政客、立宪党人拉入国民党内，“龙鱼杂处，真伪不分’①。许多临时参议员、国务员、省长或其代表被列为参事干事之类。尤其还劝说梁启超、梁士诒、杨度等立宪党人和袁门走狗加入国民党。黄兴甚至还劝袁世凯和赵秉钧内阁的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袁世凯老奸巨猾，当然不肯屈就于国民党门下，但赵秉钧和他内阁的多数阁员却加入了。除陆军、海军、外交三总长外，都挂名于国民党。国民党开始从资产阶级性质政党向改良主义政客团体蜕化，向官僚政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以至豪绅土棍的混合体的方向演变。

对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从根本上说，孙中山是不赞成的。他对同盟会当时的涣散、闹宗派、官僚化以及离开他的《革命方略》，都非常失望。他当时已下野，政治态度转为冷淡，对“政党政治”亦无兴趣。不但没积极参与政事活动，即对党务亦不多过问，一切党务均由宋教仁主持。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党内状况，他又不得不迁就宋教仁，对同盟会改组国民党并未坚持反对。国民党成立时，孙中山还亲赴北京参加大会并发表演说，同时接受了理事长领袖职位。这表明孙中山对宋教仁改组国民党的政治活动有所支持。后来他还把赵秉钧内阁看成“国民党内阁”。

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 142 页。

曾说：“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并号召全党同志“全力赞助”政府①。在稍后又致书南洋同志，对“同盟会改组政党之后，党势日渐发达”②，感到欣慰。他认为“国民党基础已定，势力已宏，此后当体察大局情形，从稳健上相机行事”。并认为“吾国国基未固，势力衰微”，如要存在下去，“维持之责，是在政党”③。要求凡分设于海外同盟会分支组织，都要改换国民党称呼，南洋支部也“宜即日改称国民党南洋支部”④，以与国内相统一。此后，孙中山也曾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以及日本东京等地的国民党欢迎大会上，宣讲过有关政党问题。如说：“一国之政治，必赖有党争，始有进步”。强调当前应着重“研究”政党内阁等课题⑤。孙中山在一面迁就政党政治同时，一面仍然坚持他的民生主义宣传，这是他的主导方面。在国民党改组后，将民生主义消除，孙中山在党内的指导性的思想理论被否定了，他在党内也失势了，被视为脱离实际的理想派，而注力于经济建设的“社会革命”。认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⑥。为了宣传民生主义，他四处奔波，先后到达上海、武汉、福州、广州、北京、石家庄、太原、天津、济南等许多地方，视察铁路和工矿企业，并到处发表演说。据初步统计，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三年间，孙中山作过五十八次演讲，其中以宣传民生主义为中心内容的达三十三次之多。而且认为兴办实业的重点又在兴办铁路。反复强调当前斗争中心是从事建设，完成经济革命。这是他在政治失意之后，只希望有个和平“小康”之环境，能专心致志于经济建设。并期待在袁世凯能

①孙中山：《国民党当以全力赞助政府》，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
②③④ 孙中山：《致南洋同志书》，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篇，第 143 页。
⑤上海《民主报》 1913 年 1 月 20、21 日。
⑥ 《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册，第 84 页。

维持这个“小康”环境的条件下，宣称“十年不预政治”，自愿以在野身分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以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①。为此，他与黄兴先后北上与袁世凯会谈后接受了袁世凯的委任，担任全国铁路督办。以后，他又奔赴日本东京、长崎、门司、下关、神户、大阪、横滨等地，进行经济考察，企望寻求日本朝野的帮助。

总之，在国民党成立时期，孙中山并不热心政治，而是高唱实业救国，并因此而遭到党内的非议。但党的主要领袖人物之间尚能维护团结，互相支持。如前所述，宋教仁积极热心组建国民党时，曾得到过孙中山一定程度的支持。同时，当孙中山与黄兴北上受到党内非议时，宋教仁也站出来支持孙中山和黄兴的活动。并发表谈话说：国民党新立，“正赖有功高望重如孙先生者为之主持”，“黄克强先生与孙中山先生同为吾党泰斗，关系之密切，天下皆知。此次北来调和南北意见，主持大计，两公无丝毫之异”②。

黄兴对孙中山和宋教仁的活动都予全面支持和真诚合作。他支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张，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时，他就要求创设拓殖协会，开发大西北。南京留守处撤销后，黄兴一心“避政界而趋实业，尤专注于矿业，与孙中山先生铁路政策，相辅相成。”③ 北上以后，在一次欢迎会上，黄兴宣称“我国此次革命，非但种族上革命，非但政治上革命，其结果乃是社会上革命”。主张“提倡土地国有，使多数国民皆无空泛之虑”④。在他热情希望实现民生主义同时，又积极支持宋教仁的组党活动。主张“依政党

①《孙中山在南京国民党及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讲》，《民立报》1912年10月22日。

②《造谣者可以休矣》，《民立报》1912年9月16日。

③宋教仁：《民元九月二十二日出席铁道协会演说词》。

④《黄克强旅京记》，《民立报》1912年9月25日。

政治之常轨,求达利国福民之目的。’① 并在北京到处劝人加入国民党，以支持宋教仁的工作。黄兴在消融孙中山与宋教仁的分歧方面更是努力，力图使政治、社会革命溶于一炉。他认为国民党的建立固然是为了争夺组织政党内阁，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在中国贯彻‘民生主义’,因此他对孙中山非常尊重,对宋教仁也倍加爱护。无论党内矛盾如何，以及他和孙中山、宋教仁之间的分歧如何，他仍坚持“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孙中山，其他不知也’②。

第二节　民元政党的纷起及其重新组合

一、民元政党的纷起与共和党的组成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社会曾出现过历史上仅有的政党林立局面。这种现象,是武昌起义后政治斗争形势的集中反映。它生动的表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各阶级、阶层围绕着权力分配问题，都采取民主的形式来进行斗争。他们的政治代表人物都纷纷展开组党活动，争相发表各种名目繁多的政纲、政见、宣言、洋洋洒洒，五花八门。政党政团数目曾高达三百多个，称政党林立时代③。但也有不少政党政团无明确的政治纲领，亦无固定的组织机构。有的甚至是在政党分化组合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昙花一现的集合体，还称不上真正的政党组织。它们象过往烟云，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转瞬即逝。

民国元年出现这样众多政党活跃于政坛，这是近代中国社会

① 《国民党欢迎黄克强先生》，《民主报》1913 年 1月 28 日。
② 《黄克强手札》,《近代史资料》 1962 年第一期。
③ 谢彬：《民国政党史》，第 4页。

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又为政党政治提供了条件。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辛亥革命前已有一定的发展，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江、浙沿海和大城市、各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

辛亥革命胜利后，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就发布和推行各项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设实业部，颁行一系列保护工商业发展的章程，并以新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代替旧的封建教育制度。临时约法更提供了法律保护。长久渴望发展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异常兴奋和活跃，一时出现了兴办实业的热潮，比之辛亥革命前兴办实业的地区更为广阔、行业更多地增加。从华南到东北、以至西南边疆，民族工业都有进一步发展。孙中山满怀信心地提出，今后“当以工商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①。他特别强调今后首须致力于民生主义。这些思想和言论，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后，急于在本阶级所亲手建立起来的共和国中，实现发展资本主义的宿愿。因此在革命胜利初期，政局虽不稳定，一些革命党人已开始“专心从事开发实业”。这些情形表明民初政党兴起是有其社会经济原因的。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勃兴，反映兴办实业要求和实现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团体相继出现。有的人决心以极大努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开辟新局面，但更多的人是打着这样的旗号，实际是怀有各种政治目的和野心来参与组党活动。其中相当多的人是政客，他们以组建政党作为自己谋取官位利禄的手段。因此有的

① 《总理全集》下册，文电类，第 2 页。

人身跨两党以上，参与组建几个政党的活动，也有的人从甲党退出参加乙党，或两党合并又分离。从他们所建政党、政团的纲领看，基本大同小异，都以“民主共和”、“建立民国”、“振兴实业”、“利国福民”及“发展平民教育”相标榜，但实际行动却与政纲、宣言中的华丽词句大相径庭。在各种各样人物为了不同目的纷纷组建政党时，反动势力的代表者袁世凯也乘机操纵党争，企图以此达到篡权窃国之目的。这就是民国初年政党的特点和实质。这是由当时政治舞台上三种政治势力相互斗争形成的。

民国初年，由于辛亥革命的暂时胜利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封建专制制度和皇权统治已被推翻，但地主买办阶级依然存在，而且还有相当大的势力。它的政治代表是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官僚军阀，他们还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必然要作垂死挣扎。资产阶级将要上升为新的统治阶级，革命派将要作国家政权的正统，但地位还不巩固。立宪派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附从革命，他们也积极攘夺政权。这样，三种政治势力，在民初政治舞台上，围绕着权力分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为扩大自己的势力，三者都力联他党，或与他党合并，以组大党。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第一届国会召开之前，民初各小党派经过斗争、分化、瓦解、合并，阵线渐趋明朗，格局基本形成，三派、四大政党、两大阵营，即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地主买办阶级派三派；同盟会及其改建的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四大政党；分别属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营垒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阵营。

由民元纷起的一些小党首先联合成立的大党是共和党。

共和党是一九一二年五月九日成立于上海。它是为适应袁世凯政府急欲组织最大政党，用以对抗全盛的中国同盟会的需要而组建的。是由民元兴起的以下诸小党派合并组成：

（1） 民社，一九一二年一月在上海成立。发起人有黎元洪、蓝天蔚、王正廷等二十四人。总后台是黎元洪。前湖北共进会领袖孙武等为核心人物，刘成禺、汪彭年等为骨干。推吴敬恒为总干事,何雯为秘书。成立之初,曾发表《民社缘起》、《民社规约》等文件，“对于统一共和政治持进步主义”①。奉卢梭的《民约论》为根本主义。其政纲提倡军国民教育；采用保护贸易政策等。形式上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实际是为自己图官谋位。

民社一成立就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拥护袁世凯取代孙中山为大总统。咒骂反袁的同盟会为‘小毛贼’,欲‘长保南都富贵’②。不久，开始酝酿改党，与其他政团合组共和党。

（2）国民协进会，一九一二年三月正式成立于天津。由范源濂、籍忠寅等发起，大部成员为清末立宪团体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人。成立后本部未设会长，范源濂、籍忠寅、黄远庸等十八人为常务干事。“宪友会要人’籍忠寅、黄远庸是其中‘主脑’③。其政纲也高唱巩固共和政治；确定统一主义；发达社会实力。实际是反对孙中山革命派，而把全国统一到袁世凯那里。他们拥袁拒孙，派代表到南京“报告北京兵变及袁总统不能南来各情节”④。为巩固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而效命。

国民协进会成立第一件大事就是“与民社联合，推黎为党魁’⑤，与其他党派讨论合并成立共和党。

（3）民国公会，一九一二年四月在上海成立。它是以浙江人为中心的政团，由浙江选出资政院议员陈敬弟等倡导组建。会员

① 《天铎报》,1912年 1月 21 日。
② 《民生日报》1912年 3 月 15 日。
③ 孙洪伊致黄与之函 1912 年 5 月 19 日。《梁任公年谱长编》(下)第 391页。
④ 《亚细亚日报》1912年 3 月 20 日。
⑤ 兰公武致梁启超函(1912年 3月），《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第 1184 页。

以杭州、上海人居多。其政纲为保持中华民国之统一；促进民国之进步；保证民国之民权；期望发展国民经济等，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内容。但因成立时间较短，又缺乏强有力的中心人物，遂与政纲条文相同的党派合并组成共和党。

（4）统一党，一九一二年一月三十日正式成立于上海。系由中华民国联合会与预备立宪公会联合而成。章太炎因与孙中山早有分歧，从同盟会内分化出来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因同立宪派张謇、赵凤昌等人在拥袁、捧黎、反孙等方面观点一致，遂合而组党，走向革命的反面。他们组党的目的是企图取代同盟会而夺取革命领导权。统一党的宗旨是巩固全国之统一，建设中央政府，促进共和政治。其政纲有“完成责任内阁制度”、“注重民生，采用社会政策”“发达国民经济”“普及义务教育”①等十一条。但他们的实际行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根本不是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去奋斗，而是在袁世凯的假共和招牌下，为地主买办阶级效劳。

该党成立当时的理事为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熊希龄等四人，唐文治、赵凤昌、汤化龙、温宗尧等十三人为参事，林长民、黄云鹏等十七人为干事。总部移北京后，为扩大党势，吸收了赵秉钧、陆建章等人为参事②。后与国民协进会等合并组建共和党。

（5）国民党（非由同盟会改组后而成立的国民党），由潘鸿鼎、温宗尧等所组成，推伍廷芳为内部领袖。其主义为主张全国统一政治之下，以民为国家主体，完全保护其固有权利，以发扬共和之精神。由于它原来就和统一党接近，关系密切，后来合并组成共和党。

共和党的政纲标榜“保持全国统一，采取国家主义：以国家权

①谢彬：《民国政党史》，第37、38页。

②《支那政に於ける政党结社》，日本宗方小太郎调查报告。1912年7月。

力，扶持国民进步；应世界之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①。实质就是要将全国统一到袁世凯手中。另有党规十五条，支部规则九项。本部设在北京前门内。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程德全为理事，汤化龙、刘成禺、林长民等五十多人为干事②。本部以外，上海设驻沪机关，各地设支部，在内外蒙古、青海、西藏等地亦予定设立支部。

共和党是以清政府时期的有力官员为中坚，其成员攘扩了旧官僚军阀、旧立宪党人、同盟会中的变节分子，以及袁世凯政府中的要员，组成了民国以来最大政党，被称为纯袁派、官僚政党，也称袁世凯的御用党。它以拥袁为己任，自命为国权党。它是为袁世凯篡权窃国而效命，属于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势力。

二　民元政党的纷起与国民党的组成

共和党成立后，在议会里拥有与同盟会相抗衡的政治实力，对革命派构成严重的威胁。

宋教仁不甘示弱，也采取“力联他党为合组大党之计”。经过努力，终于以同盟会为基干，联合原先由部分同盟会员和立宪党人组织的一些小党派，于一九一二年八月在北京组成了国民党。

参加组建国民党的民元纷起的党派有：

（1）同盟会，一九一二年三月宣布为公开政党。以它为基础与其他政团合组成立国民党。

（2）统一共和党，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一日成立于南京。它是由共和统一会、政治谈话会等联合而成。他们因政见相同而谋求统一。在组建过程中，同盟会重要分子景月耀所起作用最大。该党成立时，选举蔡松坡、张凤翔、孙毓筠等为总干事，举殷汝骊、

①② 《支那に於ける政党结社》，日本宗方小太郎调查报告，1912 年 7 月。

袁家普、彭允彝等为常务干事，举景月耀、刘彦、欧阳振声、沈钧儒等二十人为参议，褚辅成等二十五人为特派交际员。大会通过政纲十二条。其主要内容是谋求中央统一；注重民生，采用社会政策；发展交通；实行军国民教育；注重邦交，保持国家对等权利等①。

总部干事、常务干事、参议、特派交际员等，多为政界人物，包括临时参议院议员、省议会议员、各省都督府要员等政界要人和头面人物等。主要是以争取上层政界人物为扩大党势的重要手段。自成立后，立宪派加入者日渐增多，因而它是同盟会员、立宪派人物混合组成的政党。其活动时而靠拢共和党，时而转向同盟会。但终因难以与这两党相抗衡，极谋合并，后经过一系列活动，与同盟会等联合，宣布正式合组为国民党。

（3）国民共进会，一九一二年三月成立于北京。由王宠惠、徐谦等人在天津发起，推伍廷芳为会长、王宠惠为副会长。其政纲是：尊崇国家主义；反对政治复古；同化五大民族②。声称自己是“纯粹政党”。成立后全力投入扩张党势活动，为组织一极大政党而努力。主张发展方向放在西北，提议在该地区“屯垦”，训练“民团”，“商团”，并派干部从事此项工作。该会是以唐绍议内阁的司法总长、次长王宠惠、徐谦、财政部长陈锦涛、大理院长许世英等人为后盾而建立起来的。在政界拥有一定的势力，自认可与其他政党争雄天下。它“雄心勃勃”，极力谋求成为“极大政党”。但由于唐内阁被袁世凯压迫垮台，王宠惠、徐谦等相继辞职，国民共进会顿时失去靠山，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最后不得不与同盟会等数党合组国民党。

（4）共和实进会，一九一二年二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主要发

①《统一共和党规约》，《民立报》1912 年 3 月 10 日。
②《京津时报》1912 年 4 月 14 日。

起人是江苏晏起，武昌起义前他曾潜赴北京进行秘密反清活动。清帝退位后，晏起等认为“民国成立，政体方新，百端待理，非群策群力不足收实效而臻完美”①。因此宣布共和实进会精神在于“崇实”“以监督行政，补助立法为职责。劝导共和十分热心。

该会在成立时，正值建都之争最烈，孙中山为限制袁世凯，坚持要袁亲到南京就职，主张建都南京。共和实进会曾一度主张定都南京，拥护孙中山。后因慑于封建势力、惧怕帝国主义，又倒向拥袁。北京兵变后，它又强烈不满，致函斥袁，“飞电黎元洪统兵北上”，以维持北方秩序②。它维护《临时约法》，主张保障人权。随着政潮的迭起，其政见逐渐转向政党内阁，与同盟会取一致行动。经过协商，合组国民党。其后，晏起因走上反袁道路，终被袁世凯杀害。

（5）国民公党，于一九一二年三月成立于上海。以温宗尧等人为骨干，“以组织建全政党，巩固民国基础，增进国利民福为目的”③ 其政纲要点是：实行平民政治；尊重法律，保护人权；提倡国民外交④。推举岑春煊、伍廷芳、程德全为名誉总理，王人文为总理，温宗尧为协理。党员中确实有为主义奋斗者，也有趋炎赴势者。他们希望同主义相同者合并成一大党，以期将来乘反袁之机，扩大网罗岑春煊系统的人物，活跃于中国政坛。由于它和统一共和党接近，遂与同盟会合并组成国民党。

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新的阶级、新的政治、新的思想的代表者。他们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并为此

①《共和实进会垦请立案呈》，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②《北京兵变始末》，第 109 页。
③谢彬：《民国政党史》，第 43 页。
④《支那に於ける政党团体纪要》，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西田书记生调查报告。

而奋斗。由于他们的奋力拼搏，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皇权被打倒，民主成为不可阻拦的历史潮流。党禁开放，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试行民主，实现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他们联合其他小党组成国民党，以期在国会中成为第一大党，出组责任内阁。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上的软弱性，使它提不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不能把革命引向彻底胜利。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三　民元政党的纷起与民主党的组成

在共和党、国民党相继与诸政团合并组成两大政党对峙于参议院后，立宪派的汤化龙、林长民等亦谋组织第三大党与之鼎足，遂于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成立了民主党。参加组建民主党的民元新兴政团有：

（1）共和建设讨论会，一九一二年成立于上海。由清末立宪政团宪友会的重要成员林长民和孙洪伊等人发起。公推汤化龙为主任干事，谢远涵、林长民等四人为文书干事，尚有会计、庶务、交际干事等。各省成立交际处。会员构成以立宪党人为主，多旧议局议长、旧官僚中的显要人物。各省交通处骨干也基本是“中流以上人物”,且往往由现任都督之类人物发起。经费来源亦大部分出自军阀官僚之手。在立宪派政团中，它与梁启超关系最密切。由于反对同盟会的需要，将当时尚有一些各怀观望，无所归宿的几个小党联合起来组成了民主党。

（2）中华共和促进会，一九一二年二月改组成为政党。以沙淦、厉明度、张明远等军政两界人物为中坚力量，一九一一年末发起于上海，推伍廷芳为名誉会长，陈其美为副会长。改组成政党后，选蒋尊簋为副会长，章辅华为干事。其政纲为促进共和、建单一国制、设内阁总理、主持中央集权；发达经济；实行强制

教育等①。它一方面适应袁世凯削弱同盟会的需要而进行活动，一方面对袁尚有一定的保留。在政治活动中具有一定独立性。后与几个小党派合并组成民主党。

（3）国民新政社，一九一二年三月成立于浙江。以章太炎和陈介石为正副会长。后与共和建设讨论会等合并组成民主党。

（4）国民协会，一九一二年一月在上海成立。推唐文治为名誉会长，温宗尧为干事总长，总部设在上海。部长有张嘉璈等。伍廷芳为名誉赞成员。温宗尧在成立大会上就主义问题发表演说，提出政纲三条：“统一国权；培养国民元气；发展民力”②。它以稳健自称。成员多为旧官僚及地方绅士。四月初，本部干部更迭，唐、温等去职，唐绍仪入会任名誉总理，杨士崎、袁树勋任协理，选参议员二十余人，皆为袁世凯的得力助手。国民协会由他们主宰，发表政纲九条，除‘实行行政区域之厘定’”‘谋求实业教育之振兴’外，根本未提‘民主共和’等条目。此后便开始谋求与他党合并组成民主党。

（5）共和统一党，民国成立后发起于北京之政团。其首领为孙洪伊③因他的尽力，与共和建设讨论会等合并，而为民主党成员之一。

（6）共和俱进会，亦民国成立后发起于北京之政团，后并入民主党。

民主党是经与袁世凯密议后，以共和建设讨论会为核心，与共和促进会等政团合并组成的。汤化龙任干事长，骨干有林长民、孙洪伊等，后推梁启超为领袖。其政纲为：（1）普及政治教育；（2）拥护法赋自由；（3）建设强固政府；（4）综核行政改革；（5）

① 《支那に於ける政党团体纪要》，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西田书记生调查。1912年5月。

② 《支那に於ける政党结社》，日本宗方小太郎调查报告，1912年7月。

③ 谢彬：《民国政党史》，第43—44页。

调和社会利益①。民主党的政纲和实践活动表明了它以拥袁为前提，同时力争实现组阁的政治抱负。因此，梁启超回国后，立即成了“拥袁派”的中心人物，从而加强了袁世凯反动营垒。民主党作为立宪派的政治势力登台表演，不是偶然的。

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一部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方官绅的政治代表。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同封建势力的联系去经营和发展新式企业，这决定了他们不愿与封建统治者分离的政治立场，又受帝国主义压迫，同帝国主义有矛盾，这种矛盾在一定场合下激化，决定了他们希望清廷改革专制制度，仿效英、日等国，采用君主立宪政体，认为这能抵制革命和抗御外患。因此，大多数立宪派的被卷入革命仅仅是权宜之计。他们随时准备拥戴任何一个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人作主子。他们曾流泪看着清王朝的复灭。环顾宇内，手中有一支强大武力而又得到帝国主义垂青的，首推袁世凯。因此他们便跟着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高唱“非袁莫属”的论调，一窝蜂似地投靠到袁世凯的门下，把实现他们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千方百计的为巩固袁的独裁统治效力。这就是民主党政治表现的由来和根源。

四　民元前后其他各政团

如前所述，民元兴起之政党政团，经过分化、斗争、组合，形成了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加上统一党合并后又分离出来一部分自成局面，共有四个大政党。此外，还有一些未并入这四个大党的党派和小政团，如：

自由党：

一九一二年二月三日成立于上海。是由《天铎报》主笔李怀霜、

① 《民国经世文编》正编，政治 3，第 6册，第 16 页。上海经世文社 1914年版。

《民权报》主笔戴天仇（戴季陶）及云南赵铨辛等发起组成。发起者及其成员多为少壮留学生和新闻记者。这是一个急进的集团，人称同盟会的别派。它的政治主张以维持社会自由，驱除共和之障害为目的，倡导绝对自由说。本部设在上海。苏州、广东、浙江、福建、云南等地均设有支部。

中国社会党：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五日成立于上海，发起人为江亢虎。其党纲有八条：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者；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等①。该党推选江亢虎为上海本部部长。基本党员是惜阴公会、《天铎报》馆、女子进行社等团体的“商、学界”人士。党员多数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者，还有一部分下层失业群众。以后，在江、浙和南方各省以及京津等地均设有支部。至年底，已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支部“四百九十余起”，党员达“五十二万三千余人”②。但他们中绝大多数不明党义，有些人是一度签名了事，有的是“假公团以便私图”者③。有些人是无政府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者。

中国社会党成立后，曾拥护共和，抵制君主立宪，拥护孙中山，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它在成立时，正是民主共和制和君主专制进行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中国社会党把“赞同共和”定为头条纲领，这是对民主革命的重要支持。孙中山归国后，它热烈支持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各省军

① 《中国社会党规章》，《天铎报》1911 年 11 月 24 日。
② 《中国社会党传单》，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③ 《中华民报》，1913 年 9 月 2 日。

政府代表在南京议组临时政府时，中国社会党联合上海惜阴公会致电各省代表团，主张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①。它呼吁男女平权，主张实行民生主义，等等。这些在当时都赢得了一部分群众的拥护，使它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但由于它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封建主义、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的大杂烩，因而没有生命力。也不能坚持革命原则。当袁世凯上台后，随着孙中山的去职和南京临时政府的结束，中国社会党也进入了逆境，遭受种种压迫和摧残。党的总代表江亢虎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按照他的政治要求，改造了中国社会党，使它丧失了前期的进步性，变成了袁世凯的御用党。江亢虎的投机政客的本质也暴露出来了。他为适应袁世凯解散一切会党之需要，于一九一三年八月解散了中国社会党。

共和建设会：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日在上海成立，举姚文栋为会长，王河屏、秦瑛为副会长。其宗旨为“拥护共和”。成立不久，即与商界共和会致电袁世凯内阁，敦促清廷退位。南北“议和”前夕，它联合中华共和促进会连电各省都督，表示反对君主立宪，主张共和。“议和”开始后，它又致函唐绍仪，坚持共和。南京临时政府筹建时，它致电十四省代表，提出应举孙中山为总统②。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上书孙中山，陈述建设共和的种种意见。

当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而上台后，它又反对南京政府而拥袁。一九一二年三月一日致电孙中山，反对南京临时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而议借外债，要求将参议院立时解散③。此后基本停止

① 《新闻报》1911 年 12 月 29 日。
② 《民立报》1911 年 12 月 28 日。
③ 《民声日报》1912 年 3 月 2 日。

活动。

商界共和团：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于上海。这是一个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政团。最初由朱葆三、吴登瀛等十三人发起，成员中有巨商、洋行买办，在商界拥有相当势力。他们组织政团是为了促成共和以求自身有更大的发展。它宣布“以赞助共和、扶植民国军为宗旨”。

商界共和团在南北议和时“团结团体”“以为议和代表之后盾”，并上书唐绍仪“赞成共和”。但对议和总的要求是促使袁世凯反正。清帝宣布退位后，它认为目的已达到，便公开倒向袁世凯，与国民党对立。

中华进步党：

一九一二年春在上海成立。其纲领是：消灭阶级、伸张人权、扫除人道之障碍、救济众生苦恼①。四月十七日召开选举会，举谭人凤为正主裁、李经羲为副主裁、苏本言为名誉主裁、李怀霜为名誉赞成员。因党势小，无甚活动。

公民急进党：

一九一二年五月八日召开临时会议，宣告成立。选举沈剑候等十三人为掌理，查士端等十五人为参事。系由上海一部分绅士发起，以拥护民权、发展民意、作全国人民之向导，尽公民之天职、巩固政府、实行完全政治为目的。无大活动，无所作为。

其他尚有为数众多的小党或政团。有的只有组织，无政纲；有的无组织，仅有一纸声明；有的只宣布成立政团而无活动；有的无政纲，只有某些活动。等等。这些小党派、小政团在当时及以后均无甚影响。

① 《支那に於ける政党团体纪要》，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西田书记生调查。1912年五月。

以后在袁世凯的分化瓦解政策下，国民党内受软化者，相继组成相友会、政友会、癸丑同志会、集益社、超然社等。国民党的衰落现象已暴露无遗。

第三节　进步党的组建，公民党的出现，国民党议会斗争的失败

一　进步党的组建，公民党的出现

在分化瓦解国民党，削弱革命力量的同时，袁世凯为加强自己的反动统治，又组织了进步党。在袁的操纵与立宪派的积极活动下，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在北京召开合并大会，组成进步党。发表宣言，制定政纲，设本部于北京。各省和蒙、青、藏地区设支部，各县设分部。在华侨集居的国外要埠也设支部。出版《天铎报》为机关刊物。当时到会者一千五百余人，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举梁启超、汤化龙、张謇、孙武、伍廷芳等为理事。设政务部和党务部，由林长民任政务部长、丁世峄任党务部长。又举冯国章、蔡锷、汪大燮、熊希龄等为名誉理事。但黎元洪的理事长仅是名义，党内实权却操纵在以梁启超和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人物手中。

进步党在政纲中提出，要“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力’①它明确表示要以‘国家主义’对抗国民党的‘民权主义”以“建设强善政府”为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张目。他们在政纲中，根本不提“民主”与“共和”的资产阶级政治主张。甚至连他们自己曾

①谢彬：《民国政党史》，第 54 页。

经为之奋斗过的“立宪”问题，也不敢公开提出。至于所谓的“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等口号，也都是一些骗人的空话，毫无实际价值。

进步党在《宣言》中标榜组党是为了“臻国家于富强”，认为民国之国体虽号称统一，而地方各自为政，破坏殆尽，新建者无力代兴，官僚积弊甚于晚清。其根本原因是没有一个“强善之政党”，因而不能造成“强善之政府”。他们宣扬为了要把国家政治搞好，必须实行“政党政治”，而“政党政治”又必须以两大政党之对峙为原则。认为只有“两党嬗代”执政，才能以多数之民意为进退，民意、民听才能得以实现，国政才能渐趋良好。还认为“政党政治”必须有一大党，能“以独力制多数于国会，然后起而执政，才能治理好国家。反对小党林立，认为没有一个大党可以驾驭诸小党，意见不合，互不服气，或感情不睦，或政策不一，“政局易起暴乱”。可以看出他们的真正意图就是要建立驾驭各党之上的大党，以便控制全国政局，帮助袁世凯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动政府，以巩固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进步党一成立，就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支持。袁世凯不惜在借款项目下拨出一笔巨额资金，作为进步党的活动经费。进步党自然也只能匍匐于袁世凯的脚下，仰承他的鼻息，而成为袁世凯的反动工具。因此，它在助袁为虐方面起了极为恶劣作用。仅举其主要者，述之如下：

（1）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作帮凶。进步党成立时，由于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和非法大借款，遭到了国民党强烈的声讨。它为了对抗国民党的反袁，替袁世凯开脱罪责，于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五日，由握有实权的头号人物梁启超主持，召集了进步党的特别大会。梁在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宋案纯为法律问题”，反对傅赵秉钧到案，反对以政治论处。说“大借款并非总统违法”。在国民

党发动讨袁战争时，进步党的握有实权的二号人物汤化龙（众议院议长）发表声明，说国民党反袁斗争是“叛反国家，应从速扑灭”①。进步党的议员也在国会中提出“征讨案”②，以反对国民党。进步党的反动本质完全暴露无遗。

（2）组织内阁，为袁世凯捧场。在“宋案”和“大借款”的阴谋败露后，赵秉钧的内阁已难以维持下去。这时，袁世凯利用进步党打击国民党，提出要进步党的名誉理事熊希龄出来组阁。进步党认为这是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好机会，不能坐失良机。他们的实际领袖梁启超，对此次“内阁改组”最为热心，一再催促熊希龄到京上任。而梁本人也捞到了司法总长的重要职位。熊希龄网罗了前君主立宪派的名流组成了所谓“第一流人才和第一流经验的内阁”，进步党的汤化龙当上了众议院议长。梁启超为熊希龄内阁拟定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提出了内政、外交、军事、实业、行政、法律、教育等各方面的施政纲领。但他们既无兵权，又无地盘，只能是纸上谈兵而已。进步党是依靠袁世凯的势力建立起来的，它又在为袁世凯所驱使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这表明立宪派与军阀勾结得相当紧密。

（3）为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效劳。

当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要解散国会，实行独裁统治时，梁启超马上于一九一三年八月上书袁世凯，建议他不急于解散国会，应抓紧时机选举总统。上书中说：“今最要者，乘此时机，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而欲达此目的，则以维持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为第一义。现进步党已从各方面极力设法尤望大总统更将尊国会之意一为表示”③。袁得此建议，立即停止

①《时报》1913 年 7 月 24 日。
②《政界之现状》续《远生遗著》第三卷，第 174 页。
③《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民国二年（1913）。

解散国会、清除国民党议员的一切作法，并开始进行选举正式大总统的活动。首先指使党羽制造舆论，强调民国没有正式大总统，不能被世界各国承认，随时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因而当务之急，必先选总统，后定宪法，国始能安。进步党亦步亦趋，跟着叫嚷“先选总统，后定宪法”的论调。终于使袁世凯得以胁迫国会，登上了正式大总统的宝座。

（4）为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停止国会活动大造反动舆论。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后，就视国民党和国会为自己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梁启超这时撰文攻击国会是“八百员颅，攒动如蚁，汹汹扰扰，莫知所事”；“国家大计，百不一及，而唯岁费六千是闻”①。并发表演说《共和党之地位及其态度》，以攻击国民党。大骂国民党搞的是“暴民政治”，大伤了国家元气，不可恢复。说：“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要求袁世凯“不可不思患而预防之”。并建议袁世凯要像镇压“白朗起义”一样，将其一网打尽。这时，早有预谋的袁世凯很快撕下了伪装民主的面纱，制造借口，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四百三十八人，取消他们的议员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然后下令解散国民党，停止国会活动、停止省议会及地方自治等一切活动。所有这些命令都是由进步党名誉理事熊希龄内阁副署的。当国会议员向袁世凯提出质问“民国不能一日无国会，国会议员不能由政府取消”；“以命令取消议员资格根据何法”②时，内阁总理熊希令竟强词夺理地说：这是大总统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的紧急措施。取消议员资格正是为了“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并斥责议员的质问是“危言丛听，殊

①梁启超：《国会之自杀》，《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一册，第 13 页。上海中华书局印。

②《众议员质问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影响及于全国》《中华民国史料》中册，第 8 页。

乖实情”[①]。为替袁世凯辩护，不惜颠倒黑白到如此程度。进步党完全充当了袁世凯的帮凶。

但是，袁世凯在当上正式大总统后，为了恢复帝制，再登上皇帝的宝座，决心踢开把他选为大总统的国会和政党。对于尽心为他效尽犬马之劳的进步党也毫无例外。一九一五年八月，袁世凯指使其亲信组织筹安会，公开上演帝制丑剧。这一切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辛亥革命以来的民主共和与封建专制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固然高举反袁大旗，他们虽是资产阶级各派中反袁斗争最坚决的力量，但却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因而在群众中影响不大。反袁斗争的领导权落到了原来的保皇派、袁世凯的帮凶梁启超等进步党人手中。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在这一斗争中，为什么袁世凯的帮凶梁启超和进步党一反常态，转而成了反袁称帝的“先锋”呢？本来，梁启超早就是个君主立宪派人物，一向反对共和制。如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致罗惇曧转袁世凯的信中，向袁世凯明确表示“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他之所以反对袁世凯称帝，是因为时机尚不成熟。他曾劝过袁世凯，要作皇帝，当前不易操之过急，待条件成熟，国内政治达到“脩明”，百废俱兴，整军经武，对外又能一战而胜，“功德巍巍”,并把割据的群雄‘剪灭之余,乃定于一’后,再称帝不迟。一九一五年四月末，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劝袁世凯悬崖勒马，说：“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驱，为众矢之鹄，舍盘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旧奸雄之结局。”并恳切要求袁世凯“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

①《国务院答复书》《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 96页。

谋”①。但袁世凯对梁启超的忠言相劝却听之藐藐。梁启超对于袁世凯终于完全失望，并预见到他必然垮台的局面。为了抢夺反袁的头功，左右反袁斗争的方向，改变立宪派在辛亥革命时那种为人所弃的局面，就只好举起反袁斗争的大旗了。于是梁启超急忙于一九一五年八月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章，痛斥帝制之非，谴责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时的誓词是“食言自肥”，匹夫贱之。此乃“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②。汤化龙也在《顺天时报》上发表通电，斥责袁世凯搞复辟帝制“非时代所能容。倘不立即下野以谢国人，千夫所指”，必无好结果③。并指使其弟汤芗铭在湖南宣布独立，对袁施加压力。进步党的名誉理事蔡锷和他的老师梁启超秘密商定讨袁决策后，设法逃脱袁世凯对他的监视，经日本转赴云南，和西南军阀一起，发动了护国战争。梁启超在为护国军拟定的文告中，历数袁世凯称帝的种种罪行，指责袁当政以来，“在政治上未偿示吾侪一线之光明，而汲汲为一人一家怙权固位之私斗”、“操纵党派”、“蹂躏国会”、“诛除异己”、“淆钳舆诲”、“驱策霄小”、“帝号自娱”等等。“背弃口誓之宣言，干犯公约之宣典”④。要求将杨度、孙毓筠、刘师培、严复、李燮和、胡瑛等“六君子”和朱启鈐等十三太宝“明正法典，以谢天下”⑤。以“捍卫共和”、“永除帝制”⑥。与此同时，在袁政府中供职的进步党要人，大部离职，张謇回南通；汤化龙到上海；熊希龄返湖南。这样，进步党在全国造成了一种强大的反袁声势，梁启超等人也俨然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

①《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第 453、454 页。
②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九册，第 96 页。
③《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第 118 页。
④《云贵檄告全国文》《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九册，第 4、5 页。
⑤《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电》《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九册，第 2 页。
⑥《云贵致各省通电》，同上书，第 3 页。

“护国战争”以维护民国，恢复共和制为目的，是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保卫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斗争。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进步党人蔡锷主动发难，抱病指挥战斗，是有功的。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也起了积极作用。各省军阀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也乘机反袁。

在“护国战争”中，进步党勾结军阀拒绝同国民党合作。“护国战争”结束后，他们依然“拥护军阀”，同国民党对立。

“护国战争”结束后，共和制度的形势又恢复起来。国会恢复以后，政党活动又重新开始活跃。进步党此时已分为两派：一派以汤化龙为首，成立了“宪法讨论会”；一派以梁启超为首，成立了“宪法研究同志会”。两者又合组为“宪法研究会”，被称之谓“研究系”。成了五四时期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极端反对者。

在进步党组建不久，袁世凯指使其亲信梁士诒组织公民党。其使命还是为了把袁捧上正式大总统宝座。

公民党成立于一九一三年九月十八日，是梁士诒用金钱收买了国会议员李庆芳、康甲臣等近百人拼凑起来的。它以梁士诒为党魁，叶公绰副之。它的成员除被收买的国会议员外（对国会议员参加公民党者月给津贴二百元），尚有不少北洋军阀、政客、官僚分子也纷纷加入。袁系要人如段祺瑞、段芝贵、姜桂题、江朝宗之流的人物，在本部成立时，也争先参加。本部设在北京，又选各省留京人士分赴各省成立支部，以扩大其党羽之基础。气势之盛，几与进步党、国民党有三足鼎立之势。其地方的组织也有不少当地的官僚分子参加。

公民党一成立就议决“以正式总统选举为本党政策之第一步”[①]，在国会内外大肆活动。国会果然加快了选举的步伐。十月

① 杨幼炯：《中国政党史》第 75 页。

四日公布选举法，十月六日投票选举正式大总统。当天，袁世凯派出大批军警到会监视。拱卫军司令和后路统领等都改穿便衣，率便衣军警一千多人，自称“公民团”，将国会团团围住，除外国人外，所有入场者只准进，不准出。他们高喊“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就休想出院”，在会场外面掏乱。公民党在会场内鼓噪，会场气氛十分紧张。议员们从早八时入场，至晚十时，忍饥挨饿，连选三次，袁世凯才免强当选。国会屈服于武力。“公民团”高呼“大总统万岁”,振旅而去。

公民党的出现，是袁世凯利用民初政团兴起的历史条件，利用民主作召牌，以达到加强反民主势力的一种极恶劣的表演。因此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这个公民党也毫无生命力地随着大总统选举的结束，也就转瞬即逝，空留千古骂名了。

二、国民党议会斗争的失败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孙中山的让位，袁世凯的上台，使南京临时革命政府仅仅存在三个月就夭折了。这标志着革命已经发生严重危机，预示着资产阶级要在中国实行“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将要遭受多大的阻力和挫折。但在当时，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民主潮流，仍按惯力向前发展。任何人也不敢公开抗拒。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上依然存在的三种政治势力，将以新的方式进行斗争、较量。即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进行议会斗争，争取选票来加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斗争的主要武器是政党，斗争的焦点在政权。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直至流血。

当时三种势力的情况是：革命派在胜利后蓬勃发展的民气基础上，有条件依靠自己保有的一定实力和巨大声势，来巩固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促进政治民主，发展实业，振兴中华。他们也正

将自己的愿望奋力付诸实践。地主买办阶级势力的代表袁世凯，本是北洋军阀集团的首领，然而在资产阶级软弱妥协中，却取代孙中山而当上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临时大总统。因为他不是靠武力取得的，因而统治地位还不巩固。需要诡称“赞成共和”来掩盖他的反动本质，骗取信任，争得一定时间以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他虚伪地表示：“世凯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①。资产阶级立宪派由于清王朝倒台而失去君主立宪目标，于是他们转而热心参于民国初年的党争活动，积极活跃于政坛。由于早年曾与革命派分歧、对抗，沿至辛亥革命后，依然反孙。在当时革命派与袁世凯对立情况下，他们反孙当然要拥袁，但尚有一定保留，要求一定改革，力图达到控制国会和内阁的目的，以分享袁的部分权力。基于这样的政治形势和特点，中国社会当时出现了罕见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新局面，是旧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较为民主的生动的政治局面。

在这一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追求的，并多年为之浴血奋战的“民主”、“自由”、“平等”等目标，开始出现。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所规定的“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在城市中能大体上得到保障。民主的气氛较为浓厚，在旧中国出现了一个言论、集会、结社相当自由的暂短时期。随着民主潮流的发展，政府允许各种党派注册、开展活动。甚至包括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党和工党之类在内。袁世凯虽曾下令取缔“秘密之集会结社”，但还不敢反对公开的党派组织，由于“结社集会之自由载约法”②。

① 1912 年 3 月 8 日，《袁世凯致参议院》，《辛亥革命》（丛刊）第 8 册，第 39 页。

② 《北京临时公报》，第 153 号。

资产阶级民主宪政、议会制度、政党政治，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标。临时总统孙中山、袁世凯是各省代表会或临时参议院选举产生的，具有否定“君权神授”的划时代意义。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① 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是为了推进这种“巨大的进步”，联合一批新兴政团组建了国民党。在一九一二年冬，全国进行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大显身手，获得了绝对优势的参众两院三百九十二个多数议席，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之合仅占二百二十三席。国民党取得压倒优势的选举胜利，使立宪派为之失色，使袁世凯感到威胁。

这次选举，广大的工农群众和妇女被剥夺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大选过程中，固然有人收买选票、雇人投票、出卖初选代表资格，以及做选举投机生意等丑事。但这次选举，在中华民国整个选举史上还是最好的一次。

大选胜利，使国民党更沉醉在合法斗争的幻想中。连孙中山也欢欣鼓舞。但他仍然表示力辞总统候选人，希望袁世凯任正式大总统，推行民主政治。国民党人对袁世凯并不信任，但又对他抱有幻想。认为袁世凯已“化敌为友”了。可以用约法、议会、誓言、舆论对袁进行约束。宋教仁更是兴高彩烈，国民党在国会中的优势，增长了由国民党组阁，由他出任内阁总理的信心。一九一三年一月十日，袁世凯发布国会召集令，定于四月在北京召开。宋教仁是主张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推行民主宪政的主要代表，他为实现民主宪政而热心奔走，满怀希望地离开北京，在一九一三年春天，到南方各省旅行，遍游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长江流域各省，作政治鼓动。在所到之处，发表演说，批评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55 页。

时政，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应由国会占多数议席政党组织。言论风采，倾动一时。但却引起袁世凯的注意与仇视。总统府秘书将登载于报纸上的宋教仁及其他国民党员在各地的演说词按日剪呈袁世凯。宋教仁在湖北黄州的演说词“甚激烈”，袁世凯阅后极为不满，十分气恼，感到国民党、宋教仁对他的权力的威胁甚大，他立即通过特工头目欲置宋教仁于死地。三月，宋教仁在南方各省进行“议会政治”宣传鼓动后抵达上海，进一步宣扬“政党政治”。并表明决心组阁志向。同时组织国会欢迎团，坚持国会在南京召开。更加触怒了袁世凯。当初，袁世凯为阻止宋教仁此次南下，曾亲自馈赠宋教仁五十万元以收买之。被宋教仁拒绝，将支票薄退回，如期南下。袁极恨之曰：“噫！宋教仁意欲组织政党内阁耶？抑何相逼之甚也。”既非高官厚禄所能收买，乃决意密除之。

事前，宋教仁已风闻袁世凯派出刺客，并得到过忠告。但他泰然置之。三月二十日夜，宋教仁由上海启程，打算沿津浦路北上返回北京。当他刚步入火车站内竟遭袁世凯、赵秉钧派人枪击，伤势严重，延至二十二日晨，不治身亡。时年三十二岁。这位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中国推行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代表人物，为实现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在专制主义最长的中国，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奋斗了一生。对袁世凯又妥协又斗争，在妥协中斗争，至死还“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宋教仁被刺，标志着国民党‘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破产。

宋案发生后，国人愤怒，国民党震惊。孙中山的和平建设、实业救国和资产阶级政治家们的“议会政治”的幻想，全被粉碎了。他们从血案的枪声中惊醒。国民党人开始认识到用和平的手段难以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一些真诚的革命者重新回到革命的立场上来，重开讨袁战争之路。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是决心以武力消灭南方的国民党的信号。他开始调兵遣将，秘密下达战争动员令和进行大借款。在得到帝国主义支持下，召开两次军事会议，制定用兵计划，分兵两路南进。同时在政治上，将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组进步党，以充当他反对国民党的政治打手，以便把他捧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在袁世凯威逼、利诱、打击下，张继等国民党部分议员逃往南方，大部分国民党议员被分化和收买，国会已完全被袁世凯控制了。然后袁世凯便向国民党开刀，先后下令免去黄兴的陆军上将衔、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人的职务，全部夺去了国民党在南方几省所握得的军事大权。

在袁世凯大军压境，咄咄逼人的形势下，国民党起而应战。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会议，决定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但由于宣布反袁各省的意见不统一，行动不一致，有的动摇，投机观望，先后宣布取消独立；有的内部分歧，涣散无力，很快瓦解。特别是国民党已失去了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前的革命性，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而袁世凯却得到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全力支持，加之进步党为袁帮凶等等主客观原因，使孙中山为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所作的一次努力，亲自发动这次武装反袁斗争，不到两个月便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黄兴等人再次逃亡国外。他们在亲自缔造的“中华民国”里，已无立足之地了。

历史的经验应当吸取，实践证明政党政治、议会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行不通的。

第四节　中华革命党的建立及解体，中国国民党的成立

一、中华革命党的建立及其在讨袁战争中的地位

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之后，登上了正式大总统宝座，并立即解散国民党，取消国会，撕毁约法，一切民国的象征都不复存在了。国民党遭到了彻底地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内思想状况是极其混乱的。当时的情形是：“谈及将来事业，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乎一蹶不振，言之不胜慨叹。文主张急进，约束前人，激励后进，重新发起中华革命党”①。孙中山不愧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他没有被革命失败所吓倒。百折不回，志不稍衰，坚持斗争，勇往直前。他以极其痛苦的心情总结了“二次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出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②。由于公开时期之同盟会及改组后成立的国民党，只求党势的发达，“不计品流之纯粹”，因此党员虽众，党势虽大，内部却“意见纷歧，步骤凌乱”③。在“二次革命”中，对号令不能统一，事党魁未能服从”④，致遭革命之失败。孙中山坚决反对这种失败主义情绪，再三苦劝国民党人，陈说坚定革命信心，革命必胜的道理。

① 《中华革命党宣言》，《总理全集》，宣言第 18 页。
② 《致黄兴书》，《孙中山选集》上册，第 96—97 页。
③胡去非：《总理事略》，第 190 页。
④黄警顽编：《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墨迹》，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 1933 年影印版。

孙中山本着坚持革命斗争必胜的信念，重新集结革命力量，他逃亡日本后，创立了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大会，正式宣布中华革命党的成立。他从整肃党纲党纪着手，恢复同盟会时期的革命精神，再度举起民主革命旗帜，迎接反袁斗争的新高潮。

孙中山反复强调“此次立党，特主服从党魁命令，并须各具誓约”①。他在大会上带头当众宣誓加盟，并当选为总理，大会本拟举黄兴为协理，因黄兴不加盟而虚位。任命陈其美、居正、许崇智、张静江、胡汉民、张继、廖仲恺、谢持、田桐、邓坚等为总务、党务、军务等各部正副部长。大会通过并发表了《中华革命党总章》、《中华革命党宣言》、《革命方略》及《誓约》等文件。

为了改变国民党“主持党务者，半为官僚所软化”②，和成份复杂的情况，中华革命党宣告“此次办法，务在正本清源：一，屏斥官僚，二、陶汰假革命党，以收完全统一之效，不致如第一次革命时代异党入据，以伪乱真”③。

《中华革命党总章》明确规定党的纲领是“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④，它几乎完全继承了同盟会秘密时代的民权、民生主义的全部内容。坚持扫除袁世凯的封建专制统治，恢复民主共和制度，重新缔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中华革命党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这是资产阶级政党革命精神恢复的重要表现。它比国民党时，只求在袁世凯统治下分享一部分权力的纲领，显然具有革命的进步性。但它忽视了，也没认识到提出民族主义的必要性，没提出反帝的要求。因此，这个反封建的纲领也难以实现。

①黄警顽：《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墨迹》。

②中华革命党的《第四号通告》，见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 272页。

③ 《总理全集》，宣言第 19 页。

④ 《中华革命党总章》，见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 161 页。

孙中山鉴于辛亥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被反动派所篡夺的历史教训，《中华革命党总章》把革命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统称之为革命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负完全责任”①，不允许官僚政客插手其间。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尤注意武装斗争，主张“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②

在组织原则上，《中华革命党总章》明确规定党员“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凡党员有背党行为，除处罚本人之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③

《总章》还把党员划分为三等。即“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曰普通党员。”④而这三种党员又因地位不同，所享受的权利和待遇亦不同。“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之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必待宪法颁布之后，始能从宪法而获得之。宪法颁布以后，国民一律平等。”⑤这样规定本身就在党内划分等级，使党员在政治上不能平等，党与非党更不平等。使党陷于狭隘的宗派主义小圈子，不利于发动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斗争。

关于中华革命党的性质，《中华革命党宣言》说“党为秘密团体。与政党性质不同”⑥。这是由于孙中山对于革命党和政党的含

① 《中华革命党总章》，见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 161—162 页。
②③④ 《中华革命党总章》，见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 161、162 页。
⑤⑥ 《中华革命党总章》，见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 162、160 页。

义理解不同。同盟会公开以前，活动秘密，破坏旧世界，斗争方式是非法的，以推翻旧的封建统治为目的，称之为革命党。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公开，参加合法的议会斗争，促进“民主宪政”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之实现。因此被看作是政党。其实决定政党性质的并非斗争方式之公开或秘密，而是由政党的思想理论、纲领、路线、实践，反映了那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所决定的。中华革命党的思想理论基本上还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纲领路线以及革命的实践活动，都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反对封建专制而斗争的。它集中的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还在川、滇、黔、晋、陕、甘、苏、浙、闽、赣、鄂、湘各省都建立了支部。

但中华革命党在组织上的弱点和问题也是突出的。它为了克服“前此之散漫不统一之病”，不适当地规定凡入党者必须宣誓绝对服从孙中山个人“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并按指模等。这使党陷于严重的宗派主义，降低到旧式会党的落后水平，难以团结一切反袁力量和其他革命分子。因此，既使是过去很拥护孙中山的国民党的老党员也因不赞成誓词中的“附从孙先生革命”及按指模等做法，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坚决地进行了反袁宣传和武装起义。一九一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创刊《民国》杂志，揭露袁世凯的卖国与独裁的罪行。在南洋、欧美等地也办有宣传讨袁的报刊。同时把主要力量始终放在武装讨袁方面，在大森设浩然炉以培养军事人才，积极筹措军费，派出干部到东北、陕西、山东、江浙、广东等地组织武装起义与暗杀活动。经革命党人努力策动，一九一五年十月，发动反袁武装起义，这是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出现的新局面。这种情况增强了孙中山的信心，当

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时，孙中山立即发表《讨袁宣言》，抨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行。并积极发动广东、福建、湖北、四川、安徽和东北等地的武装起义。

中华革命党是资产阶级各派中反袁斗争最坚决的力量，但由于它提不出明确的政治纲领，不能发动群众，只是搞一些单纯的军事冒险，因而不能领导这个运动。

护国战争的结果，袁世凯在全国人民一致声讨的压力下，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又在全国人民唾骂声中死去，共和制度的形式又恢复起来。但代替袁世凯统治的是段祺瑞，仍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专制独裁。孙中山的所谓“第三次革命”仍然是失败了。然而，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虽未居领导地位，但由于辛亥革命所促成民主思想的高潮，在反袁斗争中仍有其积极影响。

二、中华革命党的解体，中国国民党的成立

护国战争结束以后，黎元洪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段祺瑞任内阁总理，一九一六年十月，冯国璋由国会选举为副总统。政府的官员全是封建官僚和军阀，甚至新任命的各省督军、省长也全是军阀官僚。段祺瑞的内阁中，没有中华革命党的一席之地。黎元洪虽然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重新召开国会，但国会不久又被解散了。

重新召开的国会议员中，有国民党人，也有进步党人。但各自均不以本党人员身分出现，而是另组政治团体。国民党议员组成“宪政商榷会”,无明确政纲。进步党人组成‘宪法研究会”,由此得名称‘研究系”。是拥护段祺瑞的。在一九一七年,关于对德宣战问题,展开了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黎段矛盾发展到极尖锐程度。段祺瑞亲日，主张对德宣战，研究系支持段祺瑞对德宣战。

黎元洪亲美，主张在欧战中中立。五月十日，段祺瑞指使便衣警察冒充各种“公民团”包围国会，殴打议员，企图以暴力逼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引起国会内外非段派的极大不满。黎元洪趁机于五月二十一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段立即唆使安徽等八省军阀进行反黎活动。黎元洪手中无兵，在危急中求救于驻在徐州的军阀张勋。

张勋手握重兵，早有策划清帝复辟的思想与活动。进京后，公开以必须立即解散国会相要挟。黎元洪于六月十二日即发布命令解散国会。七月一日至十二日，张勋演了一幕拥戴清朝废帝溥仪复辟丑剧。此事曾得到在天津的段祺瑞的默许。段利用张勋解散国会并赶黎元洪下台，立即在马厂誓师宣布讨伐张勋，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黎元洪辞去大总统职，冯国璋继任，段祺瑞仍任内阁总理。段的这届内阁共有九部，由进步党演变而来的研究系”就占了五个部。

段内阁施政纲领的重点是毁灭《约法》，武力统一全国，实行中央集权制。他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①。他一方面在政治上要取消原国民党人占多数的旧国会，另行召集“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立法权，以达取消国会、废除《临时约法》之目的；另一方面，在军事上积极布署，扩军备战，甚至不惜出卖国家主权而向日本等国举借外债，大量购置军火，调兵遣将，企图武力讨平南方护法势力，统一全国。毁法与护法之争，已发展到武装冲突地步。

孙中山仍然站在护法斗争的最前列。他当时寓居上海，宣布反对北洋军阀反动政府，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中旬到达广州，领导护法斗争。他尖锐指出：“今日变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

①觉民：《天津通讯二》，《民国大新闻报》，1917 年 7 月 22 日。

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①。他号召海军倒戈，兴师讨逆，“为国民争回真共和”②。这时，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为段祺瑞毁法、破坏民国所激愤，宣告拥护孙中山护法，脱离北京政府，率领第一舰队从上海开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多数国会议员也不满段祺瑞毁法之举，纷纷南下，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斗争。西南地方军阀也支持孙中山护法，陆荣廷、唐继尧等联合谴责段祺瑞解散国会、破坏民元约法之罪行，宣布独立，准备出师讨逆。广东遂成为护法战争的“根据地”。

由于南下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召开国会，故而召集“非常国会”,讨论护法问题,并决定成立护法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九月十日,孙中山宣誓就职，然后出师北伐。北京政府亦下令通辑孙中山等人，护法战争开始。

护法军方面，孙中山是这次护法运动的领导者，在军事上进行了详尽的计划和布署，准备西南各路大军会师武汉，然后挥师北上，直捣京城。

北洋军阀政府在护法军的强大攻势下，急谋对策。一方面，段祺瑞从军事上周密布置武力解决,公开发布‘讨伐令”另一方面，冯国璋从政治上提出和平统一相号召。这两种对策，均在护法军内部发生作用。西南地方军阀畏惧北洋军的实力，为个人地盘着想而动摇。军政府内部发生分裂。陆荣廷与唐继尧，不经孙中山同意就擅在湖南、四川前线宣布单方面停战。他们对大元帅孙中山并不听命，反而觉得孙中山是他们与北洋军阀勾结妥协的障碍。因而图谋排挤孙中山，百般刁难孙中山所主持的军政府，

①② 孙中山：《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总理全集》第二集，第 174 页。

枪杀拥护孙中山的海军总长程璧光。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决定修改军政府组织法，改组军政府，准备取消大元帅的首领制，剥夺孙中山的领导职务。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回到上海。辞职通电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① 这次护法运动失败了。

护法运动与反对洪宪帝制的护国运动一样，都是为"竟辛亥之功"，坚持挽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以武装斗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方向是正确的。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它的政党涣散无力，更未发动群众，不能在这两次斗争中发挥战斗堡垒、领导核心和司令部的作用。斗争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护法运动的失败表明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领导革命前进一步了。孙中山怀着沉痛的心情回顾辛亥革命后七年的历史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午夜思维，不胜痛心疾首！"②

在反对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和反对北洋军阀封建专制独裁的护法运动中，中华革命党经历了严峻地考验。本来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的目的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振作革命精神，坚持革命道路，以挽救共和。然而实践证明还是没有成功。中华革命党在这样重大斗争中的表现是无所作为的，因而它的生命也就自然地终结了。

① 孙中山 1918 年 5 月 4 日向非常国会辞大元帅电，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第 1085 页。

②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04

中华革命党失败的重要历史教训，乃是党员（包括它的领袖人物们）对本阶级的历史使命缺乏明确地认识。党的改组只求解决党内涣散的表面现象。为克服这样缺点，而采取了错误办法，只强调党员服从领袖一人。它没有深刻研讨党的思想统一问题、党的纲领应是反封建与反帝并重、党的任务仍在夺取政权、重建政权、巩固政权以及如何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等重大问题。因此，中华革命党内部思想不统一，没有办法动员广大党员和群众积极参加它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特别是采用党员入党必须宣誓服从孙中山一人等作法，不仅引起一些党人当时的反感，也影响到后来的党内团结，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孙中山又错误地将党员分成三等，造成党群隔阂，党内隔阂,不利于团结，难以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作用。同盟会时代的核心领袖人物黄兴因不满这些作法而出国，他的出走，使孙中山失却了一位诚挚的同志和战友，还有一些任过封疆大吏都督重任的人和革命中坚分子如李烈钧、柏文蔚等，都曾有过不同意见或不过问党事。由于过于脱离群众，把自己陷在狭隘的小圈子内，党内分裂，党外亦未能与全国各地反袁势力汇合形成运动的中流砥柱，显得颇为孤立，终被军阀所排挤。至此，中华革命党已失去政治作用。遂自行解体。

在经过多年艰难奋斗，遭受惨痛失败的情况下，孙中山感到未来渺茫，承认自己对于时局问题，实无具体解决办法，乃从事唤醒民众的启蒙运动，进行革命理论研究，暂不参与实际政治。一九一八年底著《孙文学说》,一九一九年八月著《实业计划》,连同一九一七年写成的《民权初步》三书合为《建国方略》。此书原稿用英文写成，由廖仲恺、朱执信、马君武等译成中文。书出当时，轰动中外。同时还创办了《建设杂志》，由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戴传贤等人司笔政。一九二〇年六月，孙中山又在广州演讲

《三民主义》。七月,演讲《五权宪法》。稍后,又手订《建国大纲》。这些重要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孙中山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建立共和国的主张。

中华革命党，由于在护国、护法运动中，和在这两次重大斗争失败后的一段时期，已不起任何政治作用。且当时在美国、南洋等各地党员，仍沿用国民党的名义在进行活动。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昔日老党员，亦在国民党旗帜下奋斗。种种原因促使孙中山为坚持革命，必须重新整理党务，整顿组织，以改变党的状况。为此，他断然将中华革命党解散，改建成中国国民党。为区别于民元时期五党合并之国民党,在“国民党”前加“中国”二字,以表示中国国民党是从中华革命党所遽嬗而来。

推动孙中山这次改组中华革命党的重要社会原因，乃是五四运动对他发生的深刻影响。孙中山在认真总结经验，继续摸索前进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发生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人民的新觉醒给孙中山以巨大的鼓励和推动。他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地群众运动所发挥出来的巨大威力。他所领导的护法运动最缺乏的要素就是没有这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他从中吸取了新的经验。

就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当即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规约》,发表《通告》。《规约》总纲规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①为政纲，改变了中华革命党“实行民权、民生二主义”的政纲，但这时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仍是大汉族主义，缺乏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

中国国民党规定组织制度为总理制;“设总理一人,代表本党，

①《中国国民党规约》，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 287 页。

总揽党务。’① 总部组织机构设总务部、党务部、财政部等。并规定各部职责、职员之选举及任期、会议制度等等。《规约》详细规定党员条件、入党手续、党员权利义务。本部设于上海，总理全党事务。下设总支部、支部、分部。

中国国民党虽然改变了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方式，但没有一个使政党与群众相结合的组织路线。

中国国民党成立时，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为徐世昌所盘据，南方的护法军政府又被陆荣廷等地方军阀所占有。中国国民党在国内不能公开活动，党务活动的注意力几乎全在海外。只能在国内着手从事以武力重新夺取政权的斗争。

一九二〇年七月，直皖战争爆发。孙中山利用北洋军阀混战之机，派人向党人陈炯明传达命令，令其统率粤军回广东逐出桂系军阀陆荣廷。十月粤军进入广州，未迁走之军政府驻沪办事处，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废督军)统一军政。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参众两院联合会议议决《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依大纲选举大总统,孙中山当选为广东革命政府大总统。四月十日，国会通告全国。五月五日，孙中山于广州就大总统职，发表对内对外宣言，主张维护民主政治，发展实业，保护平民，维持国际平等地位，保障远东永久之和平。声明广东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合法之政府。政府组成人员为：外交部长伍廷芳并兼财政部长，司法部长徐谦，陆军部长陈炯明并兼内务部长，海军部长汤廷光，秘书长马君武。

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设本部办事处于广州，以张继为干事长，田桐、黄复生等先后为干事。他们经常与孙中山联系，开展党务工作。有不少民众与士兵加入国民党。随着军事的推进，党

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 288 页。

务之发展，中国国民党认为工作将以长江为中心，由上海本部足以控制，遂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五日，将广州办事处撤销。

中国国民党在广东建立政权后，北洋军阀反动政府无一日不在设法消灭南方革命势力。桂系军阀也无一日不想恢复广东地盘。两者互相勾结，分路进攻广东，被南方军队击退。南军直抵南宁。孙中山以两广既定，便商于陈炯明图谋北伐，陈炯明表示反对。经再三商定，孙中山率师北上，驻节桂林。由陈炯明主持两广。孙中山要求陈炯明‘惟毋阻吾北伐,及切实接济饷械而已’①。陈炯明阳奉阴违，暗中与湖南的赵恒惕密通，反对孙中山。北伐的饷械接济，主要依靠廖仲凯和粤军参谋长邓坚办理。陈炯明为阻挠北伐，将邓坚杀害于广州车站。

邓坚被害，群情激愤。桂林大本营召开会议，决定改道反粤，再行北伐。陈炯明以辞职相威胁，孙中山召他不来，乃下令准其辞职。陈炯明离开广州转赴惠州，将其所率亲信均布防于石龙、虎门等要处。孙中山统大军绕道北伐，在缴获敌军遗弃文件中，发现陈炯明密电北洋军，愿充当内应，双方夹击北伐军。当即根据原文转电大本营胡汉民、廖仲凯等，详研对策。陈炯明在北洋军阀加紧策动下，于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率其所部叶举等，夜袭总统府。孙中山在卫队保护下，离开总统府，登永丰舰，坚持和叛军斗争近两个月之久。但终因孤军无援，不得不离开广州回到上海。

中国国民党经此严重打击后，更没有战斗力了。孙中山陷于绝望中。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实现了晚年思想的伟大转变，改组了中国国民党。

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第 1095 页。

第 三 章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准备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的提出

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自一八四〇年以来，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以鸦片战争为序幕，中经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前夜这七十多年间，是中国人民进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其中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三次革命高潮。这些斗争都给予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具有伟大历史意义。但这些革命斗争都没有成功，它们只能以民主革命先驱作用载入中国史册。

中国人民近代革命斗争的历史表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广大农民群众，虽然是反帝反封建最基本最伟大的力量，但以农民革命思想为指导的单纯农民战争，抵不住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联合起来的力量，不能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把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推向最高峰，它的伟大功绩是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但辛亥革命并没有成功，它同样没有使中国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领导这一革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很软弱，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缺乏认识，害怕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他们不敢，也不可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这决定了他们不能成为把民主革命引向彻底胜利的领导者。孙中山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的一再受挫，直至彻底失败，表明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并不是改造中国的科学武器。毛泽东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①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继续加深。帝国主义，特别是英美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军阀割据混战连年不息。中国社会到了极端黑暗、贫弱的境地。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横行无法阻挠中国历史前进，在中国社会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03页。1964年版。

的内部，新的革命因素在增长，中国的工人阶级在发展、壮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探索改造中国道路的新文化运动兴起。这为中国新的革命运动的产生，并为其从黑暗走向光明准备了条件。

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是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民族经济的一定发展而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一向被压抑的中国民族经济乘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也发展起来。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仅有产业工人六十万人，而到了五四运动时，短短几年间，中国的产业工人增至二百万人。中国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和体现者，是最有远见，最有前途的阶级。它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大公无私，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大生产的集中性，造成了无产阶级严密的组织纪律性。虽然中国的工人并不太多，但却非常集中，主要集中在沿海少数大城市的大企业中。中国工人这样高度集中的情况，使其易于联合，团结斗争，具有坚强的战斗力。中国工人阶级大多数出身于破产农民，和广大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便于在革命斗争中结成联盟。

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中国的工人运动也有了初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一八七〇年到一九一一年，四十年间，有记载的工人运动是一百零五次，而从一九一二年至五四运动前夕的几年间，有记载的工人运动达一百三十次，斗争的规模也有了扩大。时代的变化，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失败，使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

一九一七年，俄国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给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指

出了争取解放的光明道路，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的解放，英勇奋斗了几十年，许多先进分子为了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但都失败了。国家没有出路，情况一天天的坏下去。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人民，“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巴黎和会为导火线，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五四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②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显示了阶级的觉悟和政治的威力，因而使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达到坚决彻底的程度，并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五四运动促成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由于中国社会的需要，由于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发生了联系，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很快取得了成果，它进一步启发了工人阶级的觉悟。马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0页，1964年版。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60页，1964年版。

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

一九二〇年初，陈独秀和李大钊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问题。不久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在北京、上海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九二〇年三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来中国了解情况，帮助建党。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等，随后由李大钊介绍，他们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商讨了建党问题。一九二〇年夏，陈独秀在上海首先建立了共产党组织，经上海党组织与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联系，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中心城市，以及在日本东京的留学生中，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上海共产党组织继一九二〇年九月，把《新青年》杂志从八卷一号起改为自己的公开的机关报后，又于十一月创刊《共产党》月刊，通过这些刊物除系统介绍马列主义理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外，还着重介绍了俄国共产党的建党经验和列宁的建党学说。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在深入宣传马列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工人运动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这就进一步促进了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到一九二一年夏天，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时共产国际又派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来到上海，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光荣诞生。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1、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2、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3、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4、联合第三国际。”

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和李达分别负责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表明，她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她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先锋队组织，中国人民有了英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她是无产阶级胜利完成民主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的根本保证。

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有组织地开展了各项革命活动，特别是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一九二一年九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做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创办机关刊物《劳动周刊》，以加强对工人运动的指导。又在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设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分部。在党的领导下，各地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先后爆发了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粤汉铁路部分地段、陇海铁路机工、汉口人力车工人的罢工等。一九二二年一月爆发了有三万人参加的香港海员和运输工人，后来发展成为香港全市十万工人的大罢工。由香港海员罢工开始，形成了全国工运的第一次高潮。五月初，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一百六十二人，代表着十二个城市，一百多个工会，二十三万会员。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以及‘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工会组织’等决议案。这次大会进

一步加强了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促进了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和罢工斗争的高潮。

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党的组织自身也得到了发展。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要求各区党组织要重视组织自身的发展。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明年七月召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党的组织发展，实现了中央的要求。除原有党组织的党员有了发展以外，还在一些新的地区建立了党的组织，旅法支部与中央建立了联系，留德、留俄、留美学生中也有了党的组织或党员。到一九二二年六月底，全国党员数已从“一大”时的五十余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人。其中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八人，留日四人，留法二人，留德八人，留美一人。

在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在华盛顿召开了美、英、日、法、意、比、荷、葡及中国北京政府参加的九国会议。会议签定“九国公约”，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侵略原则，使中国又恢复到被几个帝国主义共同支配的地位。

华盛顿会议后，中国各派军阀，在其主子——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取得第一次直奉战争胜利，把持北京政权的曹锟、吴佩孚，提出要“武力统一中国”；其他军阀为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地盘，提出‘自治’或‘联省自治’与直系相对抗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提出“好人政府”的口号；南方政府的孙中山联奉、皖反直未成，又为粤军头目陈炯明发动政变，赶出了

广东。

面对这种复杂的政治局面，中国共产党在明确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目标之后，必须对中国现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提出适应目前革命任务要求的纲领，才能为中国人民指出一条光明大道，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方面进步力量，以推动革命前进。中国共产党也初步具备了完成这一任务的条件，一方面，在一年来的实际斗争中，党的队伍有了发展，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是我国贫穷和内乱的根源；另一方面，党对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阐述的民族殖民地国家革命理论的认识，以及把这一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有了一定提高。在这方面，共产国际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给予中国共产党以很大的帮助。

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包括的方面比较广泛，既有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又有国民党及其他革命团体的代表，共三十多人。会议强调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当前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的最大敌人，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表示了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和希望。这次会议，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了解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革命理论，这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国际国内形势，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政治立场，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的政治主张。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

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的部分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向大会作了报告。大会最重要的贡献是根据列宁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第一，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会议宣言指出，帝国主义是靠压榨、掠夺亚非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而生存的。他们抢夺殖民地“竞争的结果，便须诉诸战争”，而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屠杀了数千万的劳动群众”,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重遭瓜分。“帝国主义的列强历来侵略中国的进程,最足表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本相”。他们不仅使“中国已事实上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而且帝国主义的不断争夺造成帝国主义走狗——军阀间的不断混战，这是形成“中国的特殊的政治状况”的根本原因。

宣言还指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世界政治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一）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二）是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两种革命势力日趋联合，“必定会把世界资本主义的枯骨架推到资本主义自己掘成的坟墓里去。”而“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

第二，分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各阶级

的地位和动向，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方向。

宣言深刻分析了中国国内的经济政治状况，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就整个经济来看，“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而封建军阀，则完全变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军阀们一方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的利用唆使，一方为自己的利益把中国割据得破碎不全，……这样的情形，即是中国政治上一切纠纷内讧的复杂基础。”“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的。”因此，当前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目的是建立“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和平。”

宣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初步分析。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欧美商品不能顾及中国，日本商品又遭抵制”的良好机会，得以发展。但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不“能自由发展和自由竞争而达到独立的地位，只不过做世界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中间物罢了”。而“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要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中国的农民以独立耕种的小农、佃农、雇农占大多数，他们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穷困和痛苦”。为了“除去贫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他们“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也因为“日趋困苦，甚至破产失业”，“痛恨那拿痛苦给他们受的世界资本主义，加入到革命的

队伍里面来。’中国工人阶级队伍‘ 亦见迅速扩大 ”,中国第一阶段的工人运动,已证明他们是‘ 伟大势力 ”;‘ 工人们处在中外资本家的极端压迫之下，革命运动是会发展无已的。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 ”

《宣言》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是“: 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 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然后进行‘ 第二步奋斗 ”,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 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

为了贯彻党的最低纲领,大会还作出《关于‘ 民主的联合战线 ’的决议案》。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自一八四 ◯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前这八十多年间，中国人民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是可歌可泣的。各阶级和政党,提出过各种救国方案,进行过不同方式的活动，但是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由于领导这些运动的政治代表人物或政治派别，受阶级的，历史的局限，不懂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不懂得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缺乏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定性，他们或者对帝国主义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摆脱不了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影响，所以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为中国各族人民的斗争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第二节　中国青年党的建立和它的政治纲领

一、国家主义派的出现

国家主义派，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一个政治派别，这个派别和国民党右派一样，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极端的反革命派’①。国家主义派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我国阶级斗争深入发展的产物，也是阶级斗争更加激化的表现。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我国革命出现了焕然一新的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有了新发展，国共合作将要实现，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即将形成，这预示着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为主要目标的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必将到来。这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是沉重的打击，他们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在对人民革命进行武装镇压的同时，还在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中寻找他们的工具。国家主义派，就是适应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种反革命的需要而产生的。

国家主义派的骨干分子有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曾琦（一八九二——一九五一），字慕韩，四川隆昌人。曾留学日本、法国。一九一八年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曾任教于上海大夏、法政、学艺、同济等各大学。是青年党的创始人之一。李璜（一八九五——）别名幼椿，四川成都人。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曾任教于武昌大学和北京大学。青年党创始人之一。左舜生（一八九三——一九六九）谱名学训，湖南长沙人，参加“少年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 页，1964 年版。

中国学会”。留学法国,先任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主任。后任教于复旦和大夏大学。参与创办《醒狮》周报并任总经理。国家主义派的骨干分子是从少年中国学会中分化出去的。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人数最多，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文化团体。会员中成分复杂,信仰各不相同,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革命的深入发展，这个兼容并包的组织，内部发生了比较尖锐的矛盾和斗争。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学会的宗旨，要不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斗争的中心。李大钊等人主张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学会的宗旨，要走俄国革命的路。曾琦、李璜等右翼分子,则坚决反对。李璜诬蔑社会主义‘是一种假道德”,说‘俄国的社会革命，以致彼此相杀，闹得无有人道了”①。其实,这些右翼分子阻挠学会接受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实行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已有流传，曾琦、李璜、余家菊等先后又去法国留学，进一步接受了当时正在欧洲流传的国家主义。

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少年中国学会中的右翼分子，感到再用那种分散的方式和学会要不要规定主义的简单办法阻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已经无济于事。于是他们公开打出了国家主义的黑旗。在法国的曾琦、李璜、余家菊等人，写了一些宣传国家主义的文章,发表在《先声》和《中华教育界》上。他们又急忙把这些论文编辑成小册子,取名《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九二三年由左舜生把持的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留在国内的左舜生、

① 李璜：《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载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 1 期，1919 年 3 月 1 日。

陈启天等人，乘少年中国学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参加实际斗争，无暇顾及会务的时机，夺取了学会的领导权，大肆宣传国家主义。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在南京分会第三次会议上，他们决定“标揭新国家主义作为教育上努力之目标”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新国家主义特号”宣扬“社会主义不能实行于今日之中国，必须改辙易途，而趋重新国家主义焉！”①

二、中国青年党的建立和移至国内初期的活动及其组织发展

在宣扬国家主义谬论的基础上，他们开始在法国巴黎筹建国家主义政党。他们建党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曾琦说：“中国共产党已成立，得俄之援助，大肆活动于国内外，而国民党孙中山又有联俄容共之议。予深知大乱将作，国命或为之斩，因决意另组新革命党”②。青年党发起人之一李璜也供认：“见国际共产主义，因有党的组织，在国内外皆得青年知识分子暗中趋赴，如不及早起而与之对抗，将令史太林赤化中国诡计更易成功”③。正在他们酝酿建党时，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七日，国内发生了山东临城土匪孙美瑶的劫车案，帝国主义借端要挟，提出了许多苛刻的要求和条件，甚至扬言要共管中国铁路。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义愤，七月十五日，巴黎华侨集会，声讨帝国主义，支持祖国人民的反帝正义斗争。曾琦等人极力破坏华侨的爱国行动，企图把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向“暗杀运动”、“舆论运动”的歧途。他们的言行遭到了旅法共产党人的严厉驳斥和有力揭露。旅法共产党人根据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分

①陈启天：《新国家主义与中国前途》，《少年中国》第4卷第9期，1924年1月。

②《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第76—77页。

③李璜：《学纯室回忆录》，1973年7月15日。

析了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真正原因，强调指出，只有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是救国的唯一正确道路。经过这次斗争，特别是国共合作新形势的出现，使国家主义派非常孤立。曾琦等人更加感到“非有新革命党组织，不足以对抗共产党。”① 于是他们加快了建党的筹备工作。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他们在巴黎近郊玫瑰城共和街，举行了结党式。参加发起的人是曾琦、李璜、李不韪、张子柱、何鲁之等。会议通过党纲、党章，发表了宣言，选举了领导人，组成了领导机构。曾琦为委员长、张子柱、李璜、何鲁之为执行委员。确定《先声》周报为机关报。中国青年党的建立，标志着国家主义派成为有组织的政治派别。由于青年党的名称长期保密（直到一九二九年九月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才公开党名），对外活动都是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出现。又因标榜国家主义，所以人们称他们为国家主义派。

一九二四年秋，曾琦、李璜等回国，中国青年党的活动中心，随之由法国巴黎移至国内。李璜在谈他们回国的目的时供认：“周恩来等旅法共产党既纷纷回国，慕韩预料国内的共产活动必日益加强，认为非跟踪追击不可！”“慕韩以哀者的心情，抱勇士赴难的决心，准备回国与国际共产党奋斗到底”②。他们确定回国后的任务是“宣传国家主义与全民政治，组织青年党”。活动的方针是“先行办报，从主义与政策的宣传，以吸引青年知识分子 期之三年，有了可以信赖的干部同志，站住脚后，然后再将青年党公开出来，以与国共两党相周旋”③。按着他们的行动方针，回国后首先办报，经过一番筹备，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醒狮》周报出

①《中国青年党殉国死难及已故同志传略》，《曾琦》第 43 页。
②李璜：《学纯室回忆录》（上卷），1973年7月15日。106—107页。
③李璜：《学纯室回忆录》（上卷），112—115页，1973 年 7 月 15 日。

刊。《醒狮》周报出版宣言说，办报的目的，是要发动一个“醒狮运动”。“我们中国四万万人就是四万万个睡狮。……须得睡狮一齐醒来，合力扫除一切家内家外的小窃大盗，这种事情，我们就叫他‘醒狮运动’，换句话说，醒狮运动，就是中国国家主义运动。”后来《醒狮》周报作为青年党的机关刊物，成为青年党的喉舌。因此，人们又称青年党为“醒狮派”。

在宣传国家主义的同时，开始在国内发展建立组织。一九二五年十月公开建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学生，先入团，经过一段训练，再秘密吸收到青年党，国家主义青年团成为青年党的预备组织。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宣言宣称，他们“主张内求统一和外求独立的国家主义，而反对不合国情的共产主义。”他们的党徒四处活动，建立国家主义的团体，一九二四年秋至一九二五年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先后在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安徽、山西、山东、江西等省和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市，先后建立了三十多个国家主义团体。如上海的“醒狮社”、“中国少年自强会”、“复旦青年团”，北京的“国魂社”，广州的“独一社”、“狮声社”，四川的“惕社”、“起午社”，湖南的“固中学会”，浙江有“宁波青年社”，湖北有“国铎社”等。在留日学生中有“孤军社”、“江声社”。在留美学生中有“大江会”、“大神洲社”等。在德国华工中有“工人救国会”。在这些小组织的基础上，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成立“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以及北京、南京、武汉三个分会。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的宣言宣称，中国“方今内有军阀与共产党之横行，外有列强与苏俄之侵略，吾倚信仰国家主义者抱内求统一，外求独立之目的，持‘内不妥协，外不亲善，之态度，完全立于背水之阵，以与国贼强权相周旋。倘各个团体‘单独作战，，则势分而弱，必将为敌所乘 若团结一致，‘共同作战’，……则‘内除国贼，外抗强权’，

不难拯同胞于水火，跻祖国于富强”①。

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扩大政治影响，这个时期他们出版了许多书报、刊物。他们自供：“吾人认反共纯恃武力不够，纯恃少数秉政者不够，必从理论上廓清共产之邪说，故三四年来发行之书籍三十余种”。上海有《醒狮》周报、《独立青年》（《孤军》改名）北京有《国魂》周刊、《新国家》。宁波有《爱国青年》等。巴黎有《先声》周报，纽约有《侨声日报》等。出版的主要报纸有《申江日报》、《新中国日报》、《中华日报》等。出版的书籍主要有：《国家主义的教育》、《国家主义论文集》、《国家主义讲演集》、《国家主义概论》、《国家主义浅说》、《国家主义小史》等。通过这些书报、刊物，散布国家主义谬论。

一九二五年冬，青年党中央党部由巴黎移到上海。次年八月在上海召开中国青年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中央党部，曾琦、李璜、陈启天、余家菊、张子柱等七人为中央委员，曾琦为委员长。

三、中国青年党的政治纲领

中国青年党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作为总的政治纲领；“实行国家主义，实现全民政治，实施社会政策”作为行动的具体纲领。

（一）“实行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它产生于欧洲，最早提倡国家主义的代表之一，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费希特（Fichte一七六二——一八一四）。他在一八〇六年拿破仑进军普鲁士攻陷柏林的时候，提倡国家主义，

①《爱国青年》第 18 期，1926 年 1 月 31

对鼓励德国人抵抗拿破伦的侵略，起过积极作用。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这种思潮被法西斯主义利用，成为直接为帝国主义、法西斯服务的极端反动的社会思潮。

中国青年党实行的国家主义，一个重要内容是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观和国家至上论。

中国青年党以资产阶级的“自然起源”论来解释国家的产生。他们说“：国家之起源，乃生于人心之自然作用”；“组织”是人性的要求；“组织”的不断发展，国家也就自然产生了。

他们抹煞国家的阶级实质，说国家就是“一定的人民，占有一定的土地，保有一定的主权”，是“全民所有共同托命的一个忌体”，是“保种卫群之最善的制度”。

在宣扬超阶级国家观的基础上，极力鼓吹“国家至上”。他们宣称国家政权是自然存在的，“国权有最高性，故为自主的，其存在不待他人之承认，其权利不受他人之限制，仅依自己的意思而存在，而决定其权利的范围。……国内之一切团体和个人，皆于国家的承认之下始可以享有权利”①。

他们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观和“国家至上”论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说明军阀专制主义的国家“国权”的“永久性”和国家存在的“无限期”性。他们说“：国家为团体，个人为分子。分子间新陈代谢，生死相续，变换更改，无有已时。然而团体之为团体，则始终自若也。”这就象河流一样，“河中流水，奔腾而去，转眼之间，后水已非前水，现流已非旧流。然而河之存在，不因旧流之逝，而影响其毫末”②。另一方面是为了欺骗人民去爱那个旧国家，阻止人民起来革军阀专制主义国家的命。他们说：“国家是最高无上的，

① 余家菊：《国家主义概论》，第 26—27 页。
② 余家菊：《国家主义概论》，第 25 页。

个人的道德责任，在牺牲一切，拥护国家。’① 他们“认定变更国体’极易引起不幸的纷扰”，为了保护军阀专制的旧国家，他们要求人人都要做到‘拥护国权’”“奠定国基’”“发扬国光’”“燮和国民”。

（二）所谓‘外抗强权’

“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是五四时期提出的革命口号。“外抗强权’当时主要是指反对帝国主义。“内除国贼’是反对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封建势力。

中国青年党盗用这个口号，并完全篡改了它的革命内容。

中国青年党高喊‘外抗强权’，但他们并不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相反，他们制造种种谬说，为帝国主义侵略行为进行辩护。他们说：“近数十年来中国国权之丧失，非全由外人之侵略，而实多为国人放弃之事实。”还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不得以的，日本不侵略我们，“就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棉铁问题”。他们还编造了许多理由反对提‘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如‘‘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含有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之意’② ；如果我们提反对帝国主义，他们就会‘一致对付我们”。我们不仅不能提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应该‘对于外国一切之既成条约，均照旧遵守。”

中国青年党‘外抗强权’的真正内容是反对苏联。他们诬蔑中国共产党联合苏联、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帝，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无异于吴三桂的故技”。是‘前门尚未拒虎，后门已迎狼入室”。诬蔑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是民族利己主义，是由于“苏俄之共产主义不得志于西方。然后改取‘东进政策”。……乃以我们中国为共产主义之试验场。试验成功，乃共产

① 陈逸凡：《国家主义之今昔观》，《国家主义论文集》第一集第 31 页，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26 年。

② 曾琦：《‘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释义》，《国家主义论文集》第一集第 100 页。

主义之侥幸，试验失败，牺牲中国亦无害于俄。’①他们攻击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斯大林是‘彼得大帝’。

（三）所谓‘内除国贼’

中国青年党高喊‘内除国贼’,但对真正的国贼——新、旧军阀，他们并不反，有时也骂几句，那是他们内部矛盾的反映。他们是依靠军阀，积极反共。他们与旧军阀（如直系的吴佩孚、孙传芳，奉系的张作霖，西南的唐继尧，四川的刘存厚、王陵基等）大都有勾结,为其出谋划策,助纣为虐。北伐战争期间,‘余家菊投在孙传芳门下当军事教官，曾琦斩头分尸的改名王奇，往来宁济之间，参加孙传芳的机要。’余家菊为孙传芳炮制‘三爱主义’（即爱物、爱人、爱世界）,曾琦为张作霖创造了‘四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民德）,以装璜门面,欺骗人民。他们的机关报《醒狮》周报,公开颂扬军阀段祺瑞‘诚不是坏人,其满心爱国热诚,我们亦不难承认。’他们在吴佩孚的军队中演说‘:凡反赤的军队都是爱国的军队。’因此,当时许多军阀都标榜自己是‘国家主义者’。吴佩孚在所著《中国建设大纲》绪言里声称,他自己‘平日所抱政见,本诸国家主义。’

旧军阀垮台之后，中国青年党又积极投靠新军阀蒋介石，对蒋的反共活动积极支持。当蒋介石提出打击共产党的‘党务整理案’时,他们表示满意,鼓动蒋介石和共产党要‘一刀两断’。‘四一二’惨案发生后，中国青年党对蒋介石表示敬意，‘深赞其勇敢’。声称对蒋介石的‘倒共工作可在联合战线上充分予以协助’,并希望蒋介石对他们‘立即放下一切猜忌和成见，开诚布公的联合一切反共势力’②，共同反共。

事实证明,中国青年党‘内除国贼’的真正涵义,是反对共产

①余家菊：《国家主义概论》，第78—79页。

② 《救国与唯一的问题》,《醒狮》周报第139期。

党。曾琦一九五一年供认，他们指的“所谓国贼大概便以共产党为主体”①。他们说：“反共是中国青年党先天的使命。因为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是两种绝对不能相容的思想，阶级专政与全民政治，是两种极端冲突的政策。”所以自中国青年党成立以来，便不断的和共产党发生激烈的冲突和斗争。”“今后必须挟其全力从政治上社会上军事上文化思想上，加紧我们反共的工作”②。

（四）“实现全民政治”

实现全民政治，是中国青年党的政治目标。他们说：“国家主义，最终之要求甚为简单，一言以备之曰：全民政治与全民福利是也。”③他们解释“全民政治”就是全国“民众合治”，也就是要建设民有、民治、民享的“全民政治国家”。既然国家是“全民”的，那么占全民中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就应该得到管理国家的权利。但青年党说，管理国家的权利不能给工农。因为“夫劳工与农民，既劳其筋力于耕耘操作之中，焉有余力以干与国政，且在今日教育尚未普及，劳农知识多极幼稚，又焉有余力以过问国政呼？”④可见他们要的国家，“全民”是幌子，其实质是维护军阀专制主义的旧国家。

中国青年党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手段，是搞所谓“全民革命”。他们供认，提“全民革命”是为了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他们否定近代中国社会有阶级的存在，认为中国社会到了近代，旧式的封建阶级已因政治的平民化而“早已消灭”，新的资产阶级因产业落后而无从发达”，因此中国根本“无发生阶级分化及对抗的

① 《书生建党的曾琦》，《万竹楼随笔》（新版），第293页。
② 赵毓松：《中国青年党今后的两大使命》，《中国青年党建党十九周年纪念特刊》1924年12月2日。
余家菊：《国家主义概论》，第29页。
④ 余家菊：《国家主义概论》，第11页。

可能”。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故意挑拨阶级的冲突’而造成的。提倡阶级斗争是‘削足适履’;‘药不对症’,完全不合‘中国国情’。它会造成‘社会秩序骚然’;‘消灭人间之和气而制造相互的怨恨’,大大‘减杀对外之战斗力’。因此,‘一国而由其道,国必亡;一家而由其道,家必毁’。他们‘主张‘阶级合作’’,进行‘全民革命’,才能实现‘全民政治’的目标。

(五)“实施社会政策”

“实施社会政策”,实现‘全民福利’,是中国青年党追求的经济目标。“实施社会政策”,就是充分发挥现存国家的作用,运‘用国家政府的力量来干涉国民经济生活’。其具体办法就是现存国家对外实行‘保护主义’,对内实行‘干涉主义’。所谓对外实行‘保护主义’,“就是用关税自主征收外货的方法,以防止外国货制造品之多量输入,以保护本国生产者的一定销场,便于使国富不致过度的亏损,国货可以自由的发达”。所谓对内实行“干涉主义”,“就是用国家的能力,来防止个人各为其私利而害及社会的经济生活,并且来调剂私利的自由竞争的冲突,以使一国的人的经济生活都能够平均的发展”[①]。其具体办法,在生产方面,“就是对于长远为公众利益所关而不能令私人本其私利去办的这种企业,国家都要出来办理或监督。如道路、运河、邮电、自来水以及铁道、矿山、银行等事业。”在分配方面,就是用‘抽税’的办法,让有产者拿出一点钱来帮助维持工农的生活。

显然,中国青年党实施的社会政策,是打着“全民福利”的幌子,在不触及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运用军阀政权的力量,进行一些社会改良,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缓和社会矛盾,达到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目的。

① 李璜:《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国家主义论文集》第二集,第 31 页。

第三节　国共两党合作方针的确定和国民党改组的准备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方针的确定

实现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阶级力量的一次大组合。它对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现决非偶然，它是我们时代的产物，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首先领导了工人运动，从而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由于中国革命面临的局面是敌人力量比较强大，无产阶级虽然具有坚强的革命性，但人数较少,力量较弱。阶级力量对比悬殊的实际,特别是‘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运用马列主义的革命策略，联合各种革命力量，建立统一战线。这是战胜强大敌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不可缺少的条件。

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中国国民党，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时间比中国共产党长，又领导过象辛亥革命那样伟大的斗争，在中国人民中有相当的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时候，首先考虑到联合国民党，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作为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伟大的爱国者，他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能跟随时代的潮流不断前进。他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开创的革命新局面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孙中山真诚的欢迎十月革命，满腔热枕的向苏俄寻求推进中国革命的经验和力量。一九一八年夏，正当全世界的反动势力一致疯狂诬蔑、打击年青的苏维埃国家的

时候,孙中山向苏维埃政府和列宁发的贺电中表示:"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奋斗。"当他接到苏维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给他们信件以后,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写了《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表示他将不顾反革命势力的阻挠,"希望与您与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接触。"并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的军队和教育组织。"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使孙中山看到了人民群众力量的威力,开始改变他过去对群众不信任、不依靠的态度。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给他以深刻的影响,使他"发现了新的力量源泉",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和决心。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他从学西方转向"以俄为师",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是根据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和策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制定的。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代。为了支持民族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列宁批判了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的错误,第一次把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提出了民族殖民地的革命理论。他在一九二〇年六月为即将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同时"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①.

①《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274—275 页。

为了加强对民族殖民地革命的领导，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以列宁为主席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列宁代表这个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民族解放运动与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的报告。再次指出，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

根据列宁的指示，大会以后，很快在巴库召开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在塔什干设立了共产国际中亚细亚局，在伊尔库茨克设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具体指导亚洲各国的革命斗争。共产国际通过远东方面派出了第一位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一方面宣传马列主义，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自己的政党；另一方面考察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情况，寻求东方民族反帝力量的支持。维经斯基在上海同孙中山建立了初步联系，孙中山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英勇斗争表示钦佩，曾要求与苏俄建立联系，但并不愿意与苏俄公开结盟。由于孙中山拒绝公开结盟和中国政治情况的错综复杂，吴佩孚、陈炯明伪装进步，附会时势，反动面目没有充分暴露，维经斯基负责的远东局转而支持吴佩孚、陈炯明，认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

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也曾一度同吴佩孚建立联系，并利用他与“交通系”的矛盾，发动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彻底暴露了吴佩孚的反动面目，中国共产党不仅从此同他断绝了联系，而且还宣布他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是全国争自由的人民的敌人”。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同南方的陈炯明发生了一定的联系，直到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他发动了背叛孙中山的政变，才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一九二一年六月，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马林来中国。他一方面帮助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成立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与国民党建立了联系。马林在上海会见了张继，随后受邀请，在张太雷（共产党员）的陪同下，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经湖南到桂林会见了孙中山。双方通过三次长谈，讨论了苏俄承认孙中山并“与之结成联盟的可能性”，以及“群众运动和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等问题。孙中山“讲述了国民党的策略、它的历史、袁世凯时期在国外的非法活动、与太平洋各国华侨的联系和他们对国民党的帮助。”表示，虽然华盛顿会议已使中国处于空前不幸的地位，但到他胜利结束北伐之前，要与苏俄结成联盟在事实上不可能。他声称，“待北伐胜利结束，立即提议与苏俄公开建立联盟。他的看法是中俄携手将完成亚洲的解放，但如果建立一个不适时的中俄联盟只会立即招致列强的干涉。”“他只表示愿与苏联建立非官方的联系，不再前进一步”①。但是，孙中山对马林关于要有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党；要有武装核心，要办军官学校的建议非常赞同。

马林与孙中山会晤后，到广州恰好遇到香港海员大罢工，经过考察，他认为：“罢工的领导权握在国民党手中。国民党的领袖们支持这次罢工”②。“罢工工人参加了党的民主主义示威游行，全部财政资助都来自国民党……，国民党与罢工工人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致在广州、香港、汕头三地竟有一万二千名海员加入国民党。”③他认为，国民党的主要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因为他有这样三项原则：“反对外国政治；争取民主；争取公民的人的生活。”

根据他对国民党的考察和他在爪哇工作期间，促成社会民主联盟和伊斯兰教盟两个组织的成员，在保留原来身分的情况下，

①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 7 月 11 日。
②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③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 7 月 11 日。

互相加入，从而壮大了组织，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可以而且应该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二年初，他从广州到达上海后，向中共中央建议：“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的人应该利用左翼（廖仲恺）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他们应该加入国民党，但应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①，直到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离开上海前，他仍建议中国共产党应该“放弃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党则不需要放弃独立，与此相反，同志们必须统一他们在国民党中所采取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对马林的建议没有接受。陈独秀特为此写信给共产国际东方局，提出反对的理由是：“（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②。

在马林离华回国际汇报工作期间，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到达广州，他以苏俄全权代表的身分在张太雷陪同下，同孙中山举行会谈，孙中山向达林了解了苏俄的形势，

①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马林在中国的有关材料》。

②《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1922 年 4 月 6 日。

再次说明他对苏联红军的规模、她的组织和政治教育很感兴趣。并表达了他打算同苏俄建立联系的友好感情。达林向孙中山提出国共联合的建议，孙中山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

根据达林的建议，中共中央于四月底召开了当时在广州的党的负责干部会议。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谭平山、林伯渠等二十多人到会。会上达林再次强调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批评了反对国共联合的人，进一步提出在保持共产党政治独立性的条件下，整个组织加入国民党问题。到会的大多数人不反对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但反对加入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是年幼的党，就如何正确理解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结合自己的国情，制订革命的策略，是有个认识过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讨论党纲时，涉及到如何对待其他党派的关系问题，有过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永远同其他党派进行斗争；另一种意见则主张要与其他党派合作，反对共同敌人。在具体谈到孙中山的国民党时，多数人认为孙中山的政府比北洋政府是进步的，也有人认为“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一大”通过的决议指出“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我党应坚守无产阶级立场，并不准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一九二二年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产生了重要影响。大会号召各国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必须建立国际国内的统一战线。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中国代表时，对中国革命表示热情关怀，对国共合作，寄以殷切的希望。大会使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对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与策略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回国后，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对中央的启发

很大，陈独秀在“三大”的发言中，回顾这段情况时说：“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后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到中国社会当前形势，并参加了当前运动。”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在对国民党的政策和活动给予一定的肯定之后，还诚恳地指出：“他们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国民党为保存他在民主革命上的地位计，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主张》还进一步指出：“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为此，提出“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在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同时，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还指出：“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而是要在共产党的旗帜下保持“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同时还提出了联合各革命团体，组成“民主大同盟”的计划。

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是“二大”的重要贡献之一。但“二大”既没有接受马林的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

的建议，也没有接受达林的整个组织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旬，共产国际采纳了马林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并责成他具体贯彻实施。

一九二二年八月，马林返华后，提议在杭州西湖召开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以及马林七人参加了会议。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定。再次强调：“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进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开始多数人仍然反对马林的建议。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加入进去“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①。经过马林的说服解释，多数中央委员从尊重国际指示出发，接受了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决定。西湖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确定国共合作方针的转折点。

西湖会议后不久，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提纲》指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的共产党，应当“参加可给它开辟接近群众道路的一切运动”。会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阐明了关于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原则，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

一九二三年一月，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指出“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因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因为中国目前的一切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华代理人——中国军阀，……而现时工人阶级又尚

①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未充分分化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委认为：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决议还指出“：只要国民党客观上进行着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在民族革命战线上一切运动中帮助国民党，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国民党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同年五月，共产国际又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应力求工农联盟的实现”，只有吸收农民参加运动，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尽管存在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缺点，但它对实现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广州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对国共合作的一些原则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上出现了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以张国[illegible]为代表，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在工农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主张只有到国民党中工作的党员，才能加入国民党。另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主张把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中去，他们的口号是“：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大会经过热烈的讨论，否定了上述两种错误观点。表示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强调‘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要不断扩大我们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根据马列主义的策略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正确地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促进了国共合作的迅速形成。

国共合作实现的过程，也是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在共产国

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总结经验教训，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过程。

孙中山在和苏俄、共产国际代表的多次接触中，加深了对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对苏俄的友谊和支持中国革命的真诚态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多次表达了联俄、联共的愿望。但由于孙中山对帝国主义还存有幻想，又怕他们干涉中国革命，所以还不敢公开与苏俄结盟。

为了帮助孙中山实现思想转变，在建立统一战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向导》周报等刊物，针对孙中山脱离群众的弱点和他在《工兵计划宣言》、《和平统一宣言》、《实行裁兵之宣言》中提出的，幻想借助帝国主义的帮助，运用工兵计划，裁减全国军队，调和各军阀之间的矛盾，和平统一中国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善意的批评和劝告。指出，政治上的统一，“不是混合和调和各大军阀的旧势力可以做成的”,同‘握有兵权者’谈裁兵,和平统一“不但是与虎谋皮，而且是助虎作伥”①。特别是“因裁兵而主张邀请外国帝国主义者干涉内政，”更是错误的。这样“一味去求援于旧势力”,会动摇‘国民革命运动的精神’“使国民运动脱离正当规道’②。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宣传民众”“结合民众”“继续做推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的民主革命”，“用革命的手段根本破坏旧军事组织”，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还指出：“离了劳动者的群众势力，中国国民革命将不可能”。对群众如果是“愈离愈远，那么国民党将变成无国民的政党”③，国民革命也将“还是局促于局部的军事行动而疲于奔命”。这是国民党自辛亥革命以来十二年奋斗一无成就的主要原因。建议国民党应有“努力于普遍全国的

①和森：《中山先生的兵工政策是为军阀说法的吗？》，《向导》第七期。
②和森：《反对‘敦请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向导》第十九期。
③春木：《羞见国民的中国国民党》，《向导》第二十九期。

组织和宣传的觉悟’①。这些批评和劝告颇为孙中山所重视，对实现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杭州西湖会议后，加强了同孙中山的联络工作。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共同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孙中山对共产党人这种诚恳的帮助感到高兴，他和李大钊“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之后，李大钊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最先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对李大钊说：“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②。”不久，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张国焘等中央负责人，也先后加入了国民党。孙中山对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十分敬佩，认为“在斗争中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③，是非常重要的。

正当孙中山积极进行北伐之际，不意祸起萧墙，国民党内部握有军事实权的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陆军部长、内政部长）的陈炯明，于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发动政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仓促登上泊于白鹅潭的豫楚舰，后转永丰舰，亲率海军各舰抵抗陈的围攻，并指挥北伐军回师讨逆。不幸回师讨伐失利，孙中山于八月九日离粤赴沪，另谋进取。

陈炯明叛变的沉重打击，使孙中山觉悟到，要使革命成功，必须另寻新的途径和方法。可是由于英美对陈炯明、吴佩孚暗中支持，因此，他们对孙中山没有兴趣。孙中山在无情的事实面前，终于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他在这时，进一步认识到联俄、联共的必要。他在陈炯明叛变后，通过陈友仁向达林表示：“在这

① T·C·L（即李大钊）：《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向导》第二十一期。

②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五期，1926年3月。

③ 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1962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① 。他在由粤赴沪的船上同他的随行人员也曾谈到，中国革命的许多地方须‘ 借镜于俄国 ”。他认为‘ 今日中国之外交,以国土邻接，关系密切言之，莫如苏维埃俄罗斯 ”。这是孙中山决心联俄联共的转折点。

正在这时，越飞来华，从一九二二年八月至十月，越飞同孙中山的多次来往信件中，谈到了中俄关系的迫切问题。八月下旬，孙中山在上海会见越飞的代表，就“ 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方法 ”进行商谈之后，又委托廖仲恺就联俄联共问题，同越飞进一步会谈。为避开特务的侦察，他们的会谈移到日本。在日本他们详细交谈了反对帝国主义及中俄合作的初步意见。一九二三年一月，越飞从北京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双方就中俄关系进行了几次会谈，于二十六日发表《孙文与越飞联合宣言》，确定了平等友好的中俄关系。双方共同认为：“ 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 ”宣言还就中俄联合共同反帝等问题作了原则的决定。《孙文与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最后确定。

宣言签定之后，廖仲恺受孙中山之委派，又一次陪同越飞到日本的热海，就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会谈，使宣言更加具体化。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马林带着中共中央杭州西湖会议的决定再次与孙中山会晤，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决定。从此，国共两党合作的方针最后确定下来。

①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26页。

二、改组国民党的准备

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召集了改组国民党的会议，与会者有张继等五十三人，会议赞同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主张。九月六日孙中山指定茅祖权、覃振、丁惟汾、张秋白、陈独秀、陈树人等九人，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起草委员，胡汉民为宣言起草委员，陈独秀为党务改进计划起草委员。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会议审查国民党改进宣言。同时委任居正，陈独秀等二十一人为参议。一九二三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并公布了“党纲”“总章”。

在国民党改组准备工作进入紧张的具体行动阶段的时候，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孙中山召廖仲恺回上海。廖仲恺在陈炯明叛变时被囚，获释后，他积极参加了孙中山同越飞的会谈，他同越飞长时间的接触后，联俄联共的方向更加坚定，改组国民党的要求更加迫切。他对孙中山最后确定联俄、联共政策，做出了重大贡献。二十一日廖仲恺被委任为中国国民党参议。此后，他不仅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坚定支持者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助手。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评价廖仲恺这段贡献时指出：“此时东方人未知道的许多事情，廖同志便已知之甚详，如俄国之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态度，与俄国何以想和中国携手之原因，都已十分了解，所以十二年间廖同志由东京回广州帮助总理做联俄工作，当时许多同志都怀疑，而廖同志却很勇敢很坚决去干，其中实有原故的。因为有一个月之久和越飞互相讨论，把各种问题统统都研究过了”①。

一九二三年十月，鲍罗廷到达广州接替马林的工作，被孙中

①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 5 期，1926 年 3 月。

山聘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鲍罗廷召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两中央局驻粤委员和两粤区委委员会议，讨论帮助国民党改组的方法并建议孙中山召开改组会议。粤区党团区委组成国民运动委员会，统一领导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工作。

十月十日国民党召开改组国民党的恳亲大会，设常务讨论会，并派林森、谢英伯、胡汉民、廖仲恺、孙科等人参加，指定林森、谢英伯为正副主席，与广东国民党支部科长以上干部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十月十九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李大钊、汪兆铭、张继、戴传贤五人为改组委员，处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十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等人在广州召集国民党特别会议，廖仲恺主持会议并说明了国民党改组的理由。指出，国民党自民国建立以来的十二年中，“多在失败地位，皆由根本不稳固，其故实由于组织尚未严密，今日必须改组，根本整理，本党方有起色”①。会议宣布由廖仲恺、胡汉民、林森、谭平山、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兆铭、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智为候补执行委员，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党全面改组的筹备工作，聘请鲍罗廷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于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每隔三、四天开会一次，截至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九日，共召开会议二十八次，议决要案四百多件，为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做了具体的准备。十一月六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党纲和党章草案。二十五日出版以报导国民党改组消息为主的《国民党周刊》。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得到了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也遭

①《中国国民党周刊》，第 7、8期《会务汇记》。

到右派的坚决反对。当改组宣言、党纲和党章草案公布后，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林之勉等十一人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国民党的改组，并对苏联顾问、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陈独秀进行了肆意攻击。孙中山在他们的报告上批示：“此稿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耳。”①邓泽如等遭到孙中山的严厉斥责后，才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下反对改组的活动。

为了推动北方各省的改组准备工作，廖仲恺在谭平山的陪同下，于十一月三十日抵达上海，同北方各省党的干部，讨论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和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上，就国民党改组的原因，作了报告。他指出，国民党之所以屡次遭到失败，是“因为徒恃军队”，一方面要依靠军事力量，“然一方面不可不有一种力量，能制服军队之力量，即党是也。”但是国民党目前力量很弱，“倘非从下层去做工夫，而拘泥于上层之干部，必不足以负此伟大责任。”因此，改组国民党，是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在廖仲恺的推动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立，上海改组工作有所进展。

为进一步推动国共合作，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三届一中全会。会议作出《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其主要内容是：（1）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党团员一并加入，无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为之创设；（2）矫正国民党的政治妥协观念，促其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和行动；（3）党团员在国民党内要努力站在中心地位，受我党之指挥，但条件不成熟时，不必强行之；（4）用国民党的名义组织和参加各种民众团体；（5）农民是中国国民

①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305页。

革命的最大动力，应在农村建立和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会议决定派谭平山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在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每次会议前需开会统一认识，并注意联络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通知各地方党组织：在“国民党已有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望即将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在国民党已有组织之地方，本党地方会应即与S.Y.地方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即应进行诸事……”。各地党团组织，按着中央指示，积极进行了工作。

在国民党十月召开特别会议后，党的基层的改组工作开始进行，在党员较多的城市，如广州、 上海开始登记党员，在此前后开始进行改组工作的，还有天津、哈尔滨、湖南、湖北、南京、山东、四川等省市。旅欧学生中的工作，也着手进行。在广州，中共粤区区委以主要精力帮助国民党做改组工作，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召开全市国民党员大会，决定分十二个区组织区分部，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周文雍、杨匏安、杨石魂等近二十人担任区党部或区分部的执行委员。他们协助登记党员，建立基层组织。十一月上旬，由于陈炯明反扑，增城失守，广州振动。廖仲恺为了使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受到锻炼，发起组织国民义勇军，进行一定军事训练后，必要时参加保卫广州的战斗。阮啸仙，刘尔崧等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纷纷报名参加。十一月十九日广州东郊防御战，也是在国共两党的党员“一致动员民众”的支援下，击退了陈炯明的进攻。这表明国共合作，在广州已初见成效。

第 四 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及其对全国革命的推动

第一节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合作的建立

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广州隆重举行。国民党“一大”，是国共合作的盛会。在出席大会的一百六十五名代表中，有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瞿秋白、林伯渠等二十三名。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举行了预备会议，廖仲恺在会上作了《关于筹备经过》的报告。会议第一天，由孙中山担任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指出，此次国民党改组要做两件事，第一是把国民党组织成一个有力量的政党；第二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根据廖仲恺的建议，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汪兆铭、李大钊、林森、谢持五人为主席团成员，以便孙中山有事不能到会时，轮流担任主席。孙中山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进一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阐述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向苏俄学习的重要意义。指出：“大抵我们革命，在起初的时候，奋斗均极猛烈，到后

结果,无一次不是妥协。即举‘排满’、‘倒袁’、‘护法’,三役而言,我们做革命都是有头无尾,都是有始无终,所以终归失败”①。过去革命还有一个重要教训,是党基不够巩固。“本党党员从前常有自以为是的,便要独断独行,所以弄到全党的精神,非常涣散,革命事业,不能成功。”我们党“此次改组,就是从今天起,重新做过”,“将十三年前种种可宝贵最难得的教训和经验,来办以后的事”。要学习俄国革命的良好方法:“中国革命六年后,俄国才有革命。俄国革命党不仅把世界最大威权之帝国主义推翻,且进而解决世界经济政治诸问题。这种革命,真是彻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②我们要学习俄国的经验:“把党巩固起来”,使其“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按照办法条理,合全国而为一,群策群力,努力而行,则将来成功,必定更大。”

在二十八日的会议上讨论《党章草案》的时候,方瑞麟等首先提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主张在第一章第二节之后增加一条文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并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一种“阴谋”。对右派分子的这种妄图阻挠、破坏国民党改组的行为,李大钊当场作了发言,并印发了《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予以严正驳斥。指出要想摆脱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非以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作国民革命运动不可。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我们认为在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使国民革命势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其势力,而迟阻其进行”。“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因为在今日经济落后沦为帝国主义下半殖民地的中

①《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532—533 页。
②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514页—515 页。

国，只有国民革命是我民族唯一的生路，所以国民革命的事业，便是我们的事业，本党主张的胜利，即是我们的胜利。我们以此理由，不但自己愿来加入本党，并愿全国国民一齐加入本党”。针对右派分子关于共产分子不准跨党和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党中有党的谬论，李大钊指出：“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加入本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党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国际的团体。”而且我们加入本党，是“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① 李大钊的发言，得到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和大多数代表的支持。廖仲恺说：“对于方君之提案，表示反对。吾人第一要问，我们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国民党？第二要问，我们党是不是有主义的，是否要革命的？如对于我们党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则可不生问题。……只要问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② 会议经过辩论，否定了右派分子的提案，通过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使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大会听取了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柏文蔚作的军事报告，各地代表还作了党务状况报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改组国民政府之必要案》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大会选出了有中国

①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党史研究资料》1980 年第六期。
②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 43 页。

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孙中山指出“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宣言的主要内容是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定了实现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关于民族主义，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宣言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指出：“辛亥以后，满洲之宰割政策，已为国民运动所摧毁，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包围如故，瓜分之说，变为共管，易言之，武力之掠夺，变为经济的压迫而已，其结果足使中国民族失其独立与自由”；“国内之军阀，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故中国民族政治上、经济上皆日即于憔悴”。宣言提出民族主义的目标“对于多数之民众”，“不外反对帝国主义而已”。

宣言提出以民族自决作为处理国内各民族关系的原则。指出：“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之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关于民权主义，宣言批评了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弊端，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为“济代议政治之穷，亦以矫选举制度之弊，”必须实行直接民权，即给国民以选举、创制复决罢免四权，使人民能直接监督政府。并且以实施五权（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分立的宪法做为民权运动之方式。总之，新的民权主义要求做到，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宣言还指出“：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

关于民生主义，宣言指出，民生主义的主要原则一是平均地权，一是节制资本。宣言批判了封建土地制度。指出：“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使得“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实行平均地权，稍后，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并且指出，“要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以保证平均地权的原则得以实施。

宣言以“节制资本”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则。即“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节制资本’的原则,既允许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又不允许由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重蹈西方的覆辙，这是符合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因而是有积极意义的。

宣言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是三民主义的“真释”，贯彻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精神，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使其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新的历史特点，增添了革命内容，适应了革命潮流和历史发展的需要。新三民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基本相同，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的政纲，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新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为依据，适应“危迫已甚”的时势的需要，而提出的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和实行新三民主义的具体方针。

关于对外政策，政纲中，有关对外政策共有七条，其内容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废除帝国主义同清朝政府及军阀政府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他们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如“外

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略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中国与列强所订其他条约有损中国之利益者，须重新审定，务以不害双方主权为原则。’另一方面是改变外债的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此种外债，以至中国坐困于次殖民地之地位。’政纲规定“中国所借外债,当在使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之范围内,保证并偿还之”,但“中国境内不负责任之政府,如贿选、僭窃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债，非以增进人民之幸福，乃为维持军阀之地位，俾得行使贿买，侵吞盗用。此等债款，中国人民不负偿还之责任。”孙中山指出：“盖对外政策果得实现，则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归于消灭，国家独立自由可保”①。

关于对内政策，政纲关于对内政策共十五条，主要是规定了建立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具体政策，以保障民权、民生主义的实施。

对于中央和地方的权限问题，政纲规定要采用“均权主义”。“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规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规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制或地方分权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国家统一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确定县为自治单位，规定：“自治之县，其人民有直接选举及罢免官吏之权，有直接创制及复决法律之权”。还规定了自治县的一系列经济权宜。孙中山指出，确定以县为自治单位的目的，在于“以深植民权之基础”②。

对于人民的自由与权利,政纲规定“实行普通选举制,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

①《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881 页。
②《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880 页。

之发展。”拟定“各种考试制度,以救选举制度之穷。”政纲有关人民权利的规定，一方面是确定人民基本的自由与权利；另一方面也是针对资产阶级代议制政体的弊端，所采取的改良和补救措施。

关于经济方面，在发展资本问题上，政纲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规定：“企业之有独占的性质者，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铁道、航路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在土地问题上，采取制定法律的办法，使“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这些规定的目的，是要贯彻“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原则。

国民党政纲对内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反对封建主义，实施民权、民生主义。孙中山指出：“对内政策果得实现，则军阀不致死灰复燃，民治之基础莫能摇动。”并且还能够“辅助农工实业团体之发达，谋经济教育状况之改善”①。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政纲，虽然还有一些缺陷，但它总的方面体现了新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是个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获得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革命统一战线形成。改组后的国民党得到共产党和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有了很大的进步。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改组和各级党组织的建立

通过国民党一大，改组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是：胡汉民、廖仲恺、李大钊、汪兆铭、谭平山等二十四人。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是：邵元冲、张秋白、林

①《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881 页。

祖涵、毛泽东、茅祖权等十七人。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的是：邓泽如、张继等五人。候补监察委员是：蔡元培、许崇智等五人。

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中，有共产党员三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七人中，共产党员七人。在中央执委会四十一人中，共产党员有十人，占四分之一弱。一月三十一日由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于广州，并分设执行部于北京、上海、汉口、四川、哈尔滨五地。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除设秘书处外，还设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军事八部。共产党员在各执行部和各部中，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

从中央领导机构人员配备的情况看，共产党人占相当的位置，体现了改组后的国民党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国民党各省党组织，也是共产党人帮助建立起来的。有些省国民党的负责人，就是由共产党人来担任的。如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湖南的何叔衡、夏曦；浙江的宣中华；江苏的侯绍裘；北方的李大钊、于树德、李永生、于方舟等。正如周恩来指出的，“当时，国民党不但在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中国共产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如北京和北方的一些国民党组织，就是李大钊等组织起来的。一九二三年以前，国民党在北京的力量非常薄弱，甚至根本没有国民党的正式组织，一九二三年初，李大钊根据我党关于帮助国民党发展和建立各级组织的意见和孙中山的委托，着手在北京和北方一些省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他首先在北京建立了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北京青年国民党

俱乐部 ”,作为在北京的国民党青年的集合机关。同年十一月 ,由共产党人于树德、于方舟、韩麟符等人在天津建立同样的组织，吸引北方的进步青年。由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努力，克服了右派的阻挠和破坏，北京和北方的国民党的组织有了发展。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作为执行委员调到北京，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北方执行部。李大钊担任了组织部长，共产党人于树德、褚松雪分别担任了学生部和妇女部部长。以李大钊为书记的共产党北方区委，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领导北方人民进行了英勇斗争，迅速恢复了‘ 二七惨案 ’遭到摧残的工会组织 ,并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斗争。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国民党的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其他许多省市的国民党组织，也是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下，逐渐建立起来的。国民党‘ 一大 ’前后 ,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员有毛泽东、王荷波、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等。在湖南，国民党组织，完全由共产党人帮助建立起来的，共产党和青年团湘区区委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即计划从组织国民党入手进行政治运动，毛泽东离湘调中央工作后，通过覃振的关系，将唯一留在湖南的国民党员邱维震介绍给湘区区委，商谈筹建国民党组织问题。至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已有一批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旅法学生中的国民党组织，是由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帮助建立起来的。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周恩来、尹宽、林蔚同国民党代表商谈，协议八十余名团员加入国民党。随后周恩来、尹宽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同年十一月，国民党旅欧支部在里昂建立，周恩来被选为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为宣传主任。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巴黎通讯处成立，聂荣臻被选为通讯处长。

第二节　国共合作对中国大革命的推动。中国致公党的成立

一、国民党与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壮大

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加重了自己对于国民党的责任感，遂能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和处理国民党的问题。在思想上，宣传国民党的革命纲领和新三民主义；在作风上，共产党人以刻苦耐劳、廉洁奉公、遵守纪律的品格影响国民党；在组织上，积极为国民党建立党部，发展组织，把革命青年、工农分子吸收到国民党中来，促进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加速国民党革命化的过程。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国民党组织发展很快。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已有正式省党部十二处，特别市党部四处，临时省党部九处，除新疆、云南、贵州外，党部组织几遍全国。全国的国民党员没有作完全统计，仅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所辖北方各省区的国民党人数就达到一万四千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说广东的国民党员，从一九二五年五月到一九二六年二月，由一万五千多人增至四万八千余人。到当年十一月，又猛增至十八万三千多人（英德、和平等五县还未计入）。在广东的国民党员中，最多是农民，约占百分之四十；其次是学生，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再其次是工人，也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商人不足百分之十；其余军、警、法、政、报、自由职业和其他人员，共占百分之几[①]。由此可见，国民党改组以后，不但发展，壮大了队伍，而且改变了组

①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报告》，1926 年 12 月。

织成分，从而刷新了国民党的面貌，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气象。

国共合作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获得了发展。但是，在国共合作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国共产党员大半加入了国民党，忙于国民党的工作，忽略了自己的工作与组织。再加上党内出现的右的偏向,认为中国共产党如果大力发展组织,就会“使国民党误会我们有意拉去他们的党员”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使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很慢。

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对党的组织工作的消弱有所察觉。为了改进工作，会议强调要健全党组织，积极发展党员，提高党员质量。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的思想，并从这一思想出发，规定了扩大党的组织，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为中心的党的建设路线。

大会强调：现在“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如果组织工作不得力,党决不能前进,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工农阶级的一般革命群众的工作。特别是，由于革命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更加密切与劳动群众及革命知识分子的关系“引导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以至乡村经济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实为吾党在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②。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特别是在工厂、路矿和农会中，将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接收入党，建立党的支部。在国民党和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党团，以便实行具体领导。

① 《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1924 年 2 月中共中央第三届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

②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 1925 年 1 月。

在‘四大’组织路线指导下,在‘四大’以后革命迅猛发展并取得重大胜利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进入大发展时期。四次大会的党员人数只有近千人，仅仅经过十个月，到一九二五年十月党的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时，党员人数就达到了三千以上。直属中央的组织，除原有的湖南、北京两区外，上海、广东、湖北均已成立区委；除山东地方组织外，还建立了河南、广西等地方组织，此外还有莫斯科、海参崴、西欧等支部。

一九二五年十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遵照“四大”的组织路线，再次强调发展党组织的重要性，并就党的组织发展确定了许多措施。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指导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应当指示群众以前进的道路，应当提出政纲，使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能够有所根据而向前奋斗，力争国内革命政权的实现和中国的统一，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独立。“为着要执行这种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职任，第一便是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知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要“在一切工人组织、农民协会及革命的知识阶级团体里组织我们的支部和党团”，“在国民党有势力的地方（例如广东）特别注意形成我们党的组织”①；要免除在吸收党员手续上的繁琐形式,将党的‘四大’所确定的新党员入党‘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②改为“工人农民候补期一个月，知识分子三个月”③；要健全和扩大中央工作机构，加强党的地方组织的领导。

① 《组织问题议决案》，1925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

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192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③ 《组织问题议决案》，1925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方针反映了革命发展的需要，符合党的战略任务，所以，从一九二五年十月到一九二六年一月的四个月时间，党员人数就增加了一倍半以上，达到八千人。至一九二六年四月，更发展到一万人以上。全国各省区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以外，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有了党员的活动。此后，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大发展造成的有利形势的基础上，党的组织继续迅速发展。据中央局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份的不完全统计，党员总数达到了一万八千五百人以上。全国在军队中的党员约一千五百人，妇女党员一千九百九十二人。党员的社会成分，仅广东、北方、浙江、湖南四区统计，工人约占百分之六十，农民占百分之十一点七五，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三五。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是拥有五万七千人的党了。

国共两党组织的发展，表明了两党在群众中政治影响的扩大和威信的提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它的组织力量、政治的号召力以及广大党员的模范作用，把革命人民团结起来，形成了一支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为大革命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二、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共关系经验的总结

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好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关系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在国共合作后的几个月，由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工作毫无经验，在处理和国民党关系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偏向。右的偏向认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集全力于国民党

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以为我们既加入多阶级的国民党做国民运动，便只好采取劳资协调的政策，不便鼓动阶级斗争。以为我们应该帮助整个国民党,不必进行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这种思想,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三届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中甚为明显。它多次强调要避免惹起国民党的反感,即使对国民党中间‘极腐败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还规定党以后一切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共产党努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但却模糊了两党的界限,甚至于党的会议停止,有许多问题拿到国民党中去解决。“左”的偏向认为,共产党有单独的组织和政纲,应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无须同国民党合作和参加国民革命。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五个月来的经验，纠正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偏差，确定中国共产党在国民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十日至十五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讨论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会议首先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在这一工作中存在着的偏组织、忽略宣传的偏向。《议决案》指出,国民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思想上及组织上都渐渐的形成起来，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人积极的参加工作。共产党应当赞助国民党办好组织机关，引进思想上接近国民党的分子，然而这不能作为共产党在国民党里的唯一主要工作，相反，“宣传更重要于组织”。“一个政党的扩大,只能在经常不断的普遍全国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宣传及行动的过程里”。“共产党的责任,就是使国民党不断地有规律地宣传‘宣言’里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要求民权的原则。决不能先求国民党数量上的扩大，

而后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

会议分析了国民党内左右派的矛盾斗争，批评了那种为维护国民党的统一而调和两派斗争的错误。会议指出，国民党因有各阶级的分子在内，“决不能同等的代表各部分的利益”。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国民党内的两派分化日趋明显。“照现在的情况看来，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伍；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

会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的方针是：“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①。会议指出，这一方针并不是主张立刻要求开除右派，也不是对右派进行人身攻击或冲突，而是“要求国民党内的批评自由”，以便在国民运动的根本问题上指责右派之错误，批评右派与帝国主义的妥协，削弱右派势力。同时，用种种办法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扩大左派，如加强宣传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反帝、反军阀，要求民权的原则，使左翼的思想巩固不动摇；努力介绍革命分子进国民党，以增强左派势力；组织工人运动赞助国民党左翼，指导他们专帮助国民党反帝；使国民党实行赞助工人组织的政策和农民问题的改良政策；作反对帝国主义的广泛宣传，以迫使国民党全体左倾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纠正了在国民党内工作中一度出现的右的倾向，并对在国民党工作的方针作了具体规定，这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推动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九二四年是中国革命形势从南到北不断高涨的一年。工农群众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运动，广东

① 《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1924 年 5 月。

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巩固，标志着中国政局出现新局面，这是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结果。

然而，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国民党，内部并不平静，国民党右派接连不断地制造事端。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之后，六月，出现了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会黄季陆、孙科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制裁共产党活动的“检举案”。随之，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又为中共党团问题，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这表明，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已经开始尖锐起来。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如何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各阶级的关系，发展国共合作的问题，迫切地提到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为了适应这一历史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大”对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首先，大会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确定国共合作方针的经过，肯定了党的“三大”关于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以及将国民党组织扩大到全国范围和劳动群众中的决定是正确的，大会指出，由于国共合作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不仅帮助国民党使其在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了进步，而且中国共产党“在农民工人中，并且在军事上得到了许多实际工作的机会及能够公开的做反帝国主义运动”[①] 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也批评了有些同志的“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这些错误，虽经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央扩大会议指出并作了纠正，但仍有表现。因此，会议特别强调要警

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 年 1 月。

惕右倾的危险。

其次，为了纠正在民族革命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大会指出，确定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与目的是极为重要的。中国共产党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包括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若是忘了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及党的工作，若是忘了民族运动无产阶级的经济争斗，若是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革命之准备，而沉溺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中，便遗无产阶级以不容易挽救的大害，并且足以减少民族运动之革命性。这些右倾危险，我们的同志应该时刻警戒在心”另一方面，或者“反对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或者“断定中国民族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担任，他阶级没有参加的可能”，这些“左”倾错误也必须防止。为了从理论上弄通“左”倾右倾的错误，大会认为，明确三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第一、中国民族革命有两个特点，一是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反对封建军阀政治，因此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二是反对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含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种子，是和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结的，因此中国革命又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第二、“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第三，“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这是一个重要问题”①。为此，大会

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 年 1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明确提出了以前党的历史代表大会所没有正式提出过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

再次，大会分析了国民党自改组以来已形成左、中、右三派的情况，进一步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的方针。大会指出 当时国民党‘ 左派的成分是工人农民知识阶级的急进分子 ”;“ 右派的成分是军人官僚政客资本家，他们在广东已和大商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合作 ”中派‘ 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中革命分子，他们在数量上虽不甚重要却站在国民党领袖地位，他们总是立在我们和右派之间，操纵取利 ’①。大会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工作，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而工作的方针，亦应有新的决定：第一、国民党包含社会各阶级的成分，因此不免有发生阶级妥协的危险，必须极力反对；第二、国民党虽是国民革命的主要的工具，但不是民族革命的全部，在宣传上应处处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保护工农的利益，攻击右派，阻止中派右倾，如中派右倾亦应反对；第三、应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左派，扩大左派，打击右派，使群众与右派脱离关系，尤其要反对阶级妥协，并且在工农群众中宣传阶级斗争的理论；第四、在国民党势力所在的地方，应将本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大大地扩充起来，并要使其公开，假如国民党有防害工农利益的时候，则极力反对之；第五、我们固然要国民党保护工农利益，同时要使工人自己明白阶级的独立性，并使其明白只有工人自己有力量，有组织，才能推广民族革命。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和国民党合作的历史经验，正确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与目的，确定了在国民党中的工作方针，这些都有利于国共关系

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 1925 年 1 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的巩固和发展。但是，对国共合作已经创建的革命武装问题，大会没有讨论。这种不足，对后来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有着不良的影响。

三、国共合作对大革命的推动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国民党振作起来，焕发了新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也开拓了它的活动范围，为公开地组织领导工农革命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共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形成了一个国民革命的中心，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的革命高潮，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在两三年内就完成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完成的事业”①。第一次国共合作所获得的巨大成就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光荣史册。

(一)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以国民党名义创办的一个新式的军事政治学校。是共产党出力很多的国共合作的产物。

孙中山在他的革命实践中，已饱受了没有自己的军队的苦头，认识到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重要。因此，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他同苏联代表马林的会谈中，就商定建立军官学校的问题。一九二三年春，孙中山由上海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后，开始着手建立军校的准备工作。八月，孙中山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党务和军事，参观苏联红军和各种军事学校。接着，在国民党内通过了一项“建立陆军讲武堂”的提案，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决定后，命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拟孙中山任校长，由廖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335 页，1964年版。

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筹划开办和选定教职人员。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下令以黄埔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作校址，筹办陆军军官学校，指派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在广州南堤设立了军校筹备处，积极进行具体筹建工作。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来自全国的教官和学生，包括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共五百余人，在黄埔举行开学典礼，陆军军官学校正式成立。

军校学习苏联红军学校的编制，建立了组织机构。军校的最高领导机关是校本部，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孙中山为校本部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校党代表。

校本部之下分设政治、教授、训练、管理、军需、军医六部。政治部掌管政治教育、党务和宣传，戴季陶、周恩来、汪精卫、邵力子、熊雄等先后担任政治部主任；张崧年、邵元冲、鲁易等先后担任副主任；胡汉民、肖楚女、张秋人、安体诚等任政治教官；恽代英任政治主任教官，聂荣臻为政治部秘书。教授部最早以王柏龄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训练部以李济深为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以顾祝同、钱大钧、刘峙、陈诚等为军事教官，何应钦为军事总教官。此外，还聘请了一批苏联顾问，除鲍罗廷和加伦将军外，还有顾问长契列班诺夫，步兵顾问白礼别列夫，炮兵顾问加列里，工兵顾问瓦林，政治顾问喀拉觉夫等。

一九二四年十月增设军校教导团，仿苏联建军制度，自连以上设立党代表。

一九二六年三月，为适应形势的发展，集中统一培养军事政治人材，军校将国民革命军各军开办的军事学校合并起来，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归属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

军校还分别成立国民党特别党部和共产党特别支部。国民党特别党部直属中央党部。在特别党部之下，有区党部、区分部，

设于校属各部处。在特别党部里，有共产党员担任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共产党特别支部当时是秘密组织，隶属于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它一面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一面培养和吸收共产党员，团结革命师生，指导党员参加革命斗争，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促进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

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军校迅速发展成为体制健全、组织严密、规模庞大的武装革命组织。黄埔军校一共办了六期，其中第一期至第四期毕业的学生，就达四千九百八十一人。从第五期起，在潮州、南宁、长沙和武汉等设有分校。它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以军校学生为骨干而成立的国民革命军，成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的基本力量。

（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国共合作后，为了进一步发展革命，必须消灭盘踞在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特别是要铲除在广州市的由帝国主义支持的地主买办阶级武装——广东商团，造就一块革命根据地。为此，广东革命政府进行了统一广东的革命斗争。

广东革命政府首先平定了商团叛乱。一九二四年七、八月间，商团私运军火，孙中山得知后即命令扣留。商团乘机兴风作浪，威逼政府，要求无条件发还被扣枪械，并煽动罢市。孙中山在国民党右派包围下，曾一度动摇，代行大本营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则利用孙中山的动摇，坚持主张妥协。商团军见此情景，越发猖狂起来，竟然开枪杀人，张贴反革命布告，要求孙中山下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方面力劝孙中山当机立断，剿灭商团军；一方面、发动广州市民，取得群众的支援。孙中山很快改变了犹豫态度，决心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他随即在大本营成立了镇压商团叛乱委员会，亲自担任会长，特派廖仲恺、谭平山等人为全权委员，命令胡汉民解散广州商团机关。一九二四年十月十

四日，黄埔学生军和一部分革命军队，在工农群众支援下，向商团军进攻，十五日商团军被缴械，取得了这次军事斗争的胜利。

镇压商团叛乱仅仅是初步稳定了广州革命政权，东江的陈炯明、林虎，南路的邓本殷，还有混迹在大元帅府表面上接受革命政府领导的桂军杨希闵和滇军刘震寰，他们和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互相勾结，时刻梦想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一九二五年初，陈炯明乘孙中山在北京病重之机，自封“救粤军总司令”，与邓本殷相勾结，并联络滇桂军阀做内应，准备大举进攻广州。在这一紧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了《檄告广东工农群众。保卫革命。打倒陈炯明》的宣言书，号召广东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起来保卫革命，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打倒陈炯明。一九二五年二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支持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第一次东征，这次参加东征的部队，是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率领的粤军和蒋介石率领的由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及部分学生组成的校军。因蒋介石当时还兼任粤军参谋长，所以也参加对粤军的指挥。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主持第一次东征中校军的战时政治工作，并参予东征的组织领导。东征部队在东江农民的积极支援下，连战皆捷，直捣陈的老巢惠州。正当夺取最后胜利时，驻在广州的军阀刘震寰和杨希闵发动武装叛乱。起初，担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兼代理大本营大元帅的胡汉民，又想采取妥协的方法来挽救危局，曾派邹鲁赴香港请杨、刘两人回省，商量改组大本营问题，但杨、刘非要推翻革命政府不可。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以及谭延闿、程潜、朱培德等反对胡汉民等的作法，坚决主张讨伐杨、刘。广大工农群众也向政府请愿，要求下令讨伐。胡汉民等为形势所迫，也只好同意下讨伐令。广东政府调回东征军，于六月十三日，全部歼灭了杨、刘的反动军队。

为了进一步巩固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七月一日改组了大元帅制的军政府，成立了委员制的国民政府。以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徐谦、谭延闿、孙科、于右任、许崇智、程潜、等十六人为委员，推汪精卫为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设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司法、教育等部。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改组后的政府，接受孙中山的遗嘱，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形成了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本来共产党人应当参加政府机关的领导工作，以便和国民党左派一道在政府中形成优势，但由于对参加国民政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中国共产党当时采取了不参加国民政府而以“在野党”地位监督国民政府的方针。

国民政府成立后，对所辖军队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学生军和一部分粤军编为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谭延闿率领的湘军编为第二军；朱培德率领的滇军编为第三军；李济深率领的粤军编为第四军；李福林率领的粤军编为第五军（第二次东征后，把原程潜率领的湘军改称为第六军）。各军统一于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指挥。改编后的各军普遍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负责进行政治领导和政治训练。共产党人周恩来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任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朱克靖任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罗汉（当时是共产党员）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任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由于共产党人在革命军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和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工作，使国民革命军开始成为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革命精神的军队。

第一次东征没有全部消灭陈炯明部队，趁革命军回师广州讨平杨、刘叛乱之机，陈炯明重新占领了东江一带，准备进攻广州。与此同时，盘踞在粤南的军阀邓本殷也调兵遣将，形成对广州的夹击之势。为了彻底消灭这两支反革命军队，统一广东、国

民革命军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开始第二次东征。此次东征，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和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东征军在省港罢工工人和东江农民的有力配合下，十一月初，完全收复了东江，全歼陈炯明的反革命军队。在第二次东征的同时，革命军又征讨粤南军阀邓本殷。到一九二六年二月，最后歼灭了逃至海南岛的残敌。至此，完成了统一广东全省的任务。

广东的统一，是国共两党密切合作、团结战斗的结果，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广大革命士兵战斗中不怕牺牲，英勇善战，以及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也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为国民革命政府出师北伐奠定了基础。

（三）国共合作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掀起了反帝运动的高潮

国共合作后，由于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扶助农工的政策，由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工农运动的组织和领导，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全国的工农运动就开始高涨起来。

在工人运动方面，国民党成立了工人部，廖仲恺任部长，他积极支持工人运动。在这一有利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推动国民党发布了一些有利于开展工人运动和建立工人组织的法令。一九二四年五月，广州工人召开代表会议，建立了广州工人代表执行委员会，并决定成立工团军。在全国各级的国民党党部中，还设立了工人部。工人部的秘书和干事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他们都在积极地发动和组织工人，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七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广州沙面数千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政治大罢工，坚持一个多月，取得了胜利。沙面罢工轰动了广州和香港，波及到中国的中部和北部，它成为全国工人运动重新走向高潮的起点。

在农民运动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由共产党人林祖涵主持下

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九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十五次会议，初步确定农民运动的计划，决定在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六月三十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三十九次会议，决定派出农民运动特派员到广东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七月，国民党农民部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由共产党人彭湃主持该所的第一届工作，（以后又办了五届，第二届主任为罗绮园，第三届主任为阮啸仙，第四届主任为谭植棠，第五届主任为彭湃，第六届改主任为所长制，毛泽东为所长）培养从事农民运动的干部。孙中山先生满腔热忱地积极支持农民的革命斗争，他多次发表演说，阐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指出，“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① 。他号召农民联络起来，结成团体，练农团军，并要仿效俄国办法，实行耕者有其田。经过国共两党的积极工作，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五月，广东省二十二个县成立了农会组织，有组织的农民达二十一万余人。在广州工人成立工团军的同时，广州郊区农民也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其他各县也组织了农民武装。广东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导和中心。

一九二四年七、八月间，北京、上海等群众团体，先后联合成立反帝大同盟，广泛地掀起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运动，同时，以十月冯玉祥的北京政变电请孙中山北上为契机，掀起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国民会议运动。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发表的《第二次对时局主张》中提出的。冯玉祥倒戈后，中国共产党又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发表的第四次对时局主张中，向全国人民进一步发出召开有各革命阶层的人民代表参加的

①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865 页，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号召。同时，中共中央又发出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推动各地人民团体，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城乡发动群众举行示威，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下，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十二日离开广州，十七日到上海。孙中山在上海受到上海广大群众的革命影响，同时又受了一次帝国主义切实的教训，上海帝国主义分子反对孙中山登岸，《字林西报》散布“负政治上之大元帅，是否适宜居于商务性质之上海”的烂言。孙中山正告帝国主义者：“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是这个领土的主人，他们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职权，在这个领土之内，想要怎么样便可以怎么样”。并且宣布：“我这次到北京去，讲到对外问题，一定要主张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①]。表现了坚定的原则立场。

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为了抵制国民会议运动，筹划召开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对此坚决反对，作出《对段祺瑞善后会议之议决案》，揭露段祺瑞的阴谋。国民党也向全党下达了抵制善后会议的通知。为了同段祺瑞的善后会议相对抗，在李大钊、恽代英、赵世炎、向警予、王烬美等共产党人协助下，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空前的人民集会，到会代表二百多人，历经一月有余。大会虽然没有得到什么具体的结果，但在宣传和组织群众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正当大会进行的期间，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病逝。孙中山在临终的时候，留下了《遗嘱》和《致苏俄遗书》。

①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890 页，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共同奋斗，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孙中山的逝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悲痛。国共联合发动各界举行追悼会，悼念这位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精力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早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即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建树了丰功伟绩。在新的历史时期内，又亲手奠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石，并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成为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人物。全国人民悼念他，对他的哀悼，形成了一次广泛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传，预示着更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一九二五年爆发了五卅运动，这是国共合作以后出现的大革命的第一个高潮，是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所进行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一次伟大实践。

五卅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广州革命政府的积极支持下进行的。

当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的日籍职员枪杀工人顾正红并伤多人的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于五月二十八日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了上海各阶级的动向，决定发动群众于三十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上海学生及其他群众举行反帝游行时，租界巡捕开枪镇压，酿成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向帝国主义反击。五月三十一日，上海工人在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刘少奇、刘华等领导下，成立上海总工会，宣布六月一日举行总罢工。参加这次罢工的工人达二十余万，学生有五万余人举行总罢课，绝大部分商人罢市。当晚，中共中央再次开会，决

定成立“上海工商联合会”，作为统一领导上海反帝运动的公开机关。会议还决定迅速把运动扩展到全国去。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未有的大革命风暴迅速地由上海席卷全国。其中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在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下坚持了长达一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对五卅运动的领导，除了表现在组织方面以外，还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告民众书，指出，“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因此，“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解决之道不在法律在政治，所以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①。并通过工商学联合会提出了十七条要求。这就把一般反抗引到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轨道上去。在斗争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一方面即时揭露帝国主义玩弄的‘六国调查’、‘上海谈判’、‘司法调查’等骗局，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一方面注意统一战线内部的动向，批判资产阶级主张的‘缩小范围’、‘局部交涉’等妥协动摇的倾向，暴露买办资产阶级修改十七条要求等破坏活动，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反帝力量。当时负责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的瞿秋白，遵照党的路线和指示，在《向导》和由他办的《热血日报》等报刊上，还发表了大量文章，从思想理论上指明斗争方向及斗争策略，给予运动以有力的指导和推动。

在五卅运动中，广州革命政府和国民党左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五卅运动爆发后，革命政府以断然的手段驱逐杨、刘，扑灭广东内部的反革命势力，进而以政府的力量援助香港工人的抗

①《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1925年6月6日，《向导》第117期。

英的罢工运动。特别是在省港大罢工中，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廖仲恺的热情支持。六月二十三日，他亲自主持了广州工、农、商、学、兵群众和香港罢工工人共十万人参加的反帝集会和示威游行。沙基惨案后，他领导广东各界对外协会（广东群众性反帝斗争组织，廖任该协会主席）作出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的决议，并明确提出这场斗争“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唯一目的”，号召人民将反帝斗争进行到底。他担任了罢工委员会的顾问，和领导这次罢工的苏兆徵、邓中夏等一起研究情况，制定策略，维护工人的权益，抵制敌人的破坏，竭力赞助和支援罢工工人的正义斗争。他还为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不辞劳苦，四处奔走，解决十余万由香港回到广州的罢工工人的食住问题。国民政府刚刚成立，财政很困难，廖仲恺想尽办法为罢工委员会筹款，平均每月拨给罢工委员会经费一万元。省港罢工所以能长期坚持，廖仲恺是有一分功劳的。

(四)国共合作赢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在广东革命根据地获得巩固以后，国共两党及国民政府，顺应全国人民结束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迫切要求，慎时度势，及时地作出了北伐的决策。

先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中指出：国民党在广东的基础已十分稳固，广东统一业已告成，国民党应致力于加强革命军队的训练和扩充，改革民政、财政、司法和教育，扩大工农及其他人民的革命运动，“以最短时间，积极准备实力，俟南北形势发展到相当时限，即发兵北进，领导全国国民为国事之彻底解决”①。

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特别会议。陈延年、任弼时、瞿秋白、谭平山等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的中

①《政治周报》第 1 期，1925 年 12 月。

心是解决五卅运动以后革命的总的战略方针问题。会议认为：“广东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只有他的势力之发展，可以推动全国民众及接近民众的武力更加爆发革命火焰，而且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声威，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会议确定“党在现时政治上的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①。为了准备北伐，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加紧在农民之中的工作，“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的胜利”。“北伐的政纲，必须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②，必须在北伐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加紧开展群众工作，而特别是要注意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以便接应北伐军，积极支持和参加北伐战争。会议还强调，必须加强北方的军事工作，而目前，主要应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助国民军使之“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使国民军能支撑得住北方的局面，并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应“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③，以便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特别会议的这些精神，对于后来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开会，通过出师北伐案，颁布了出师北伐的动员令，并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为了统一全国民党对北伐的认识，在七月六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革命军出师对于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训令案》。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蒋介石发表了就职宣言。七月十四日，当北阀军先头

① 《中央通报》第 79 号，1926 年 3 月 14 日。
② 《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1926 年 2 月。
③《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1926 年 2 月。

部队抵达湖南之后，国民党正式发表了北伐出师宣言。《宣言》陈述了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压迫的苦难的现状，指出“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号召全国人民“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打倒帝国主义，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①。

由于共产党与国民党都主张北伐，使北伐得以顺利举行。然而，陈独秀在对待北伐问题上也曾有过错误见解。他在七月七日出版的《向导》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论国民政府之北伐》。该文错误地认为，“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因为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②。陈独秀还把这个观点带进了中国共产党在七月十二日召开的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去，他作的《中央政治报告》中说：“南方国民政府之出兵，亦尚只能是防御反赤军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彻底北伐”③。陈独秀对北伐所持的消极态度，和他在其他问题上的右倾思想一样，显然是非常错误的，是与中国共产党在北伐问题上的一贯主张相违背而不能代表党的正确主张的。因此，受到了党内的批评。

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发出第一号通告，纠正了陈独秀的上述错误。《通告》指出，无论是防御吴佩孚之南

①《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1926 年 7 月 14 日。
②陈独秀：《论国民政府北伐》《向导》第 161 期，1926 年 7 月 7 日出版。
③《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年出版，第 53 页。

侵，或是伸张革命势力，均“必须北伐”，因此，党的各地组织必须动员全国民众积极推动北伐，响应北伐。为了落实党关于北伐的战略方针。《通告》还提出了党在各类地区的具体任务“:在广东，一方面应鼓动民众赞助北伐，同时应指出不可因北伐而牺牲民众的自由与利益”；“在北伐军已经占领湖南，应迅速扩大民众运动，……要求废除过去军阀政府所加于人民的各种压迫，取得人民最低限度之自由权利”；“在北伐军战事区域内，如湖北、江西、应当引导当地民众做切实的地方政治争斗……一方面破坏当地的军阀政治，同时给北伐军做一种准备”；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地区，应当“号召民众起来积极的起来响应北伐…… 从事地方政治的直接争斗,以汇合北伐革命的势力,达到全国民众的解放”。《通告》发出以后，在北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北伐的军事战略方针和发动群众运动方面，又提出了一些正确的主张，对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北伐战争是国民革命军进行的军事斗争和工农群众革命运动汇合而成的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参加军事的斗争和领导工农群众革命运动两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国民革命军先后组编的八个军，有十万之众。这支军队虽多数由旧军队改编而成，但由于在政治上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作指导，在组织上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力量充任领导，在思想上有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政治工作人员在国民革命军中卓有成效地进行大量的政治工作，使军队得以初步改造，这就使“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①在北伐军中，还有一支由周恩来亲自领导建立起来的、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叶挺独立团。这支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351 页，1964 年版。

部队在北伐战争中连立战功，为它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北伐军正因为有明确的革命纲领，又有政治工作的指导和共产党人的模范作用，因而能进行一场新型的革命战争，开创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新局面。

在北伐过程中，工农群众的支援和工农革命运动，以空前的规模和水平表现出来。北伐战争开始，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七月二十五日发表了《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号召全国工人“站在一切民众之前，引导一切民众援助国民革命军使之得到胜利”。在这一号召下，各省区工人积极动员支援革命战争。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三千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随军出征。湖南、湖北前线工人组织运输队、铁路破坏队、随军爆破队及武装纠察队，配合北伐军作战。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工人运动也在发展，工人运动的发展，又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在蓬勃发展着的工人运动中，特别值得称颂的是，武汉和九江的工人群众及市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武汉政府的直接参与下，进行了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首先占领了上海，配合了北伐军的行动。这些革命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广大农民的支援和斗争，在北伐战争中也占有特殊的地位。根据地的农民积极支援北伐军出征，前方的农民，身临前线。为了大力配合北伐军，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各地农民运动。毛泽东、彭湃、瞿秋白、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当时，全国农民运动最发达的省份是湖南。北伐以后不到四个月，湖南全省七十五个县中即有五十八个县（包括长沙近郊区）建立了农民协会，共有七千三百二十九个区、乡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协会会员人数由北伐前的四十万迅速增加到一百三十六万。北伐后兴起的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大革命，冲决了几千年专制政治制度的基础，严重地

动摇了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在大革命中建树了功勋。

北伐军出师不到十个月，就歼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从广东打到武汉、南京和上海附近，把革命从珠江流域一直推进到长江流域，席卷了半个中国。北伐战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结果。

四、中国致公党的建立

中国致公党是由洪门致公堂改组而来，以国外华侨特别是海外洪门人士为基础的政党。洪门是明朝末年抗清人民群众的秘密的封建性组织。“洪”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号的“洪”，洪门是暗示洪武门下的英雄，洪门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太平天国失败后，由于革命分子逃亡海外，华侨的洪门组织开始发展起来。洪门致公堂是华侨洪门中最大的一个组织，其成员是侨居在美洲和东南亚的华侨。洪门致公堂以“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侠义除奸”为三大信条①。

一九一〇四年一月，孙中山到檀香山，洪门人士欢迎孙中山的到来，并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成立筹饷局募捐，资助孙中山的革命。孙中山为了与保皇党争夺群众，使更多的侨胞支持革命，毅然加入致公堂。但他认为，美洲致公堂“向章太旧，每多不合时宜；维持乏人，间有未惬众意。故有散漫四方，未能联络一气，以成一极强大之团体”②。这种组织涣散、章程陈旧的状况，不能对祖国革命有所帮助，因此于同年五月在旧金山向致公堂提出举行全美洪门会员总注册的建议，并为致公堂重订新章程八十条。新章程

① 司徒美堂：《祖国与华侨》，下册，第 133 页。

② 孙中山：《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259—260 页。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明确规定，致公堂的纲领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以“协力助成祖国同志施行宗旨为目的’①。章程还在其他方面，如组织领导、组织权限、财务制度等方面也作了具体规定，贯彻了民主的原则。孙中山对美洲致公堂进行改革整顿，把它带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致公堂在辛亥革命、讨袁护法等斗争中，无论在经济上、人力上均积极支持了孙中山的革命工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出了贡献。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革命果实为封建军阀所篡夺，中国人民仍然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榨。华侨在国外受歧视和奴役的地位没有得到丝毫改善。许多华侨希望能有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由美洲旧金山致公总堂发起，在旧金山举行了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会议决定把堂改党，并成立了筹办中国致公党委员总会。

经过筹备之后，一九二五年十月在旧金山召开洪门团体代表会议，讨论了成立中国致公党问题。决议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名为中国致公党。会议决定从“本年十月十日以后，各地致公堂，一律改称致公党”。推陈炯明、唐继尧为正副总理。这就是中国致公党第一届代表大会。

海外华侨洪门团体虽然具有爱国爱乡的革命传统，但各个洪门团体之间具有较强的独立性。第一届代表大会关于改堂为党的决议没有全部实现，实际上形成了堂党并存、堂党不分的局面。

刚刚成立的致公党，由于对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社会发展的趋势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国外又深受资本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其政治主张是赞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 加上刚刚从带有洪门色彩的组织改组过来，在组织上和成员思想上还残存着

①孙中山：《致公党重订新章要义》，《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262 页。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旧的思想传统，而国外的组织又散处各国，联系不易，因此致公党的有些组织被国内的军阀和政客所利用。被国民革命军打垮后蛰居香港的陈炯明，乘机当上了致公党的总理后，利用致公党，兜售反动的政治主张。他宣传“联省自治”，倡导“建国、建亚、建洲”之所谓“三建主义”。宣称：“(一)建国，完成中华整个民族之国家，实行共有、共治、共享之原则，不应再分五族，而应完成中华一族。（二）建亚，使亚洲成一组织，为世界大组织之柱石，中国应负创造亚洲新文明之使命。（三）建世，增进中国文化，尽量贡献世界，协调国际和平运动，以全人类平等共同生活为目的，废除各国军备组织，万国联邦，中国应为其创造者之一员。”① 陈炯明的“三建主义”，根本没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内容，完全背离了致公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三建主义”实际上是封建阶级的“大一统主义”与妄自尊大的狭隘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大杂烩。陈炯明的“联省自治”及所谓“三建主义”的主张，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要求维护临时约法、统一全国的主张相对抗。陈的这些反动的政治主张和行动，由于违背历史潮流而为广大爱国洪门人士所不齿。

致公党由于被军阀和政客利用，因而在一段时期内，政治上的表现是落后的；然而广大的爱国洪门成员，由于侨居海外，身受帝国主义政府的欺负和压迫，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因此，他们热烈地赞助和支援祖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争取侨胞在侨居地的正当权益和兴办侨胞的福利事业方向，他们也尽了很大的力量。

一九三一年，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来自美洲和其他地区的代表数十人出席了会议。大会所解决的中心议

①转引自沈云龙：《有关陈炯明叛孙的资料》，台湾《传记文学》第 32 卷 第 4 期 第 81 — 82 页。

题是堂党不分问题,但因意见分歧、各执己见,会议只好承认堂党并存的现实。会议决议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并决定存堂保党，党堂分家，以党领导堂。这一决议和第一届代表大会改堂为党的决议相比，是一个前进。因为党堂分家，可以在组织上进一步脱离封建形式，向现代政党发展。但会后，决议未能贯彻执行，党堂并存，堂就是党的状况，仍然沿袭下来。大会还决定在香港成立中国致公党总部。

第 五 章

国民党右派分裂国民党的活动。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第一节　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分裂国民党的活动

一、邓泽如等制造“弹劾共产党案”

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于历史的原因，原国民党中一部分地主豪绅、军阀、官僚、政客、买办阶级分子以及他们的政治代表人物仍然留在党内。因此，从阶级成分上看，它包括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地主买办阶级。它们基于不同的阶级立场，对国民党的革命化，对国民革命，特别是对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态度也就不同，从而形成了左、中、右三派的政治分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党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

共产党人和革命的三民主义者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势力，他们代表着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珍惜国民党的进步，诚挚地维护和发展已经建立的革命统一战线，笃信

新三民主义，拥护三大政策，坚定地实行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纲领，是革命的中坚力量。

中派代表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在革命中表现了极大的动摇性，处于急剧的分化中。

右派是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右派之中又有新右派、老右派之分。老右派多为国民党的元老，如冯自由、邓泽如、张继、谢持等。国民党改组，他们反对，特别是由于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三大政策，触动了他们的阶级利益，障碍了他们企图凭借国民党猎取高官厚禄的政治野心的实现，也打破了他们充当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的幻梦。因此，他们就寻找机会，破坏国共合作，分裂国民党。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国民党中还出现一批新右派，这就是资产阶级右翼代表戴季陶以及曾经一度是中派的蒋介石等人。他们对工农的革命斗争产生恐惧，对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非常忌恨，极力想夺取革命的领导权。

有的老右派如邓泽如，在国民党内每每制造事端；有的老右派如张继、谢持公开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另立叛旗；有的新右派如戴季陶，留在国民党内抛出反动理论，力夺“正统”，蒋介石则以阴谋手段步步篡权。新、老右派在分裂国民党，反共、反革命的策略上有所不同，公开反动有先有后，然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为了一个反动的政治目标，制造一起又一起的打击共产党、分裂国民党的事件。

国共合作以后，第一个利用组织手段攻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他们向孙中山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书》中宣称：“现查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刊),‘团

刊第七号，即扩大执行委员会特号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一日刊行），及其他印刷事实，经本委员会审查，认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碍 ”,请‘ 从速严重处分 ”。强调‘ 为本党之生存发展 ”’‘ 绝对不宜党中有党 ”。

张继、谢持在提出 “ 弹劾案 ” 之后，遂于六月二十五日同鲍罗廷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谈话。在谈话中，污蔑共产党对国民党进步所起的促进作用是‘ 致死之道 ”。声称,要解决国民党‘ 组织问题 ”,即所谓‘ 党中有党 ’的 问题，提出共产党与国民党应 “ 分道扬镳 ”，“ 分作两起 ”,这样‘ 更佳 ”。

鉴于 “ 弹劾共产党案 ” 的发生及其他右派的反共活动，七月三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四十次会议，讨论了邓泽如等人纠举共产党的提案报告书。会议针对当时国民党内外对此问题的混乱认识，明确指出，要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政纲宣言为准，“ 凡入党者，如具有革命决心及信仰三民主义之诚意者，不问其从前属于何派，均照党员待遇，其违背大会宣言及政纲者，均得以党之纪律绳之。党中同志不必怀疑，仍须依前奋斗。 ” 七日，发表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重申了国民党容纳共产党这一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为了扩大革命之基础，联合大多数人民，为了改善国民党的组织‘’俾革命事业,得以早成 ”’‘ 故凡有革命勇决之心，及信仰三民主义者，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本党无不推诚延纳,许其加入 ”。《宣言》还针对‘ 弹劾共产党案 ’等反共事件指出，“ 惟数月以来，党内党外，间多误会。以为已加入本党之共产党人，其言论行动，尚有分道而弛之倾向；于反对派得肆其挑拨，同志间遂于怀疑而发生隔阂 ”。对这种情状，必须予以矫正及

补救,解除党内外之误会与隔阂。《宣言》郑重声明:“本党既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①。

八月十五日,国民党又召开了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了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的《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及《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会后,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这两个文件,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

《训令》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及国民党容纳共产党的原因作了具体说明,指出,在帝国主义列强与军阀双重压迫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要想摆脱这双重压迫,非依靠全国各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国民党容纳共产党是为了团结和集中革命的势力,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亦是为了团结和集中革命的势力,双方的基本理论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完成伟大的国民革命事业,因此那种所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是‘匡谬极戾,无待于辩”那种所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分裂者”,是杞人忧天。《训令》还指出,国民党为代表国内各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共产党则于各阶级中特别注意占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因此,“与本党之主义精神,无所违反”。针对邓泽如等责难共产党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和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一日先后印发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及宣言》、《青年团团刊第七号》两种印刷品,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有秘密党团作用,占据了国民党的重要地位,《训令》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国民党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种印刷品是中国共产党告诫共产党员,对于国民

①《中国国民党宣言集》,独立出版社1938年印行。

党“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这不但不能视为恶意，而且是出自善意，以此责难共产党为秘密党团作用，“实为过枉”。另外一种看法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不应再有岐视本党的意见，而且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大钊也曾申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谓之跨党，不得谓之党中有党，这两种印刷品所载为党团作用，不许存在。为了解决对此问题的争议，会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其职权之一，直接与第三国际联络，协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与国民党有关系者的联络方法。《训令》最后希求全体国民党员对于“前此争议，付之淡忘，惟相与努力于将来，以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①。

共产党人对邓泽如等制造的反共事件也表明了态度，恽代英在他撰写的《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一文中，郑重指出，现在有些人责难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占据了国民党的重要地位，这是排斥共产党的论调。文章在陈述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原因以及共产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光明磊落的立场之后说，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仍旧保持他们的独立活动，这是不足奇异的事情。为国民党计，倘若是真心要做国民革命的工作呢，在今天没有惧怕或者嫉忌共产党人的理由”，只有“根本并不要革命的那一部分国民党员，他们的思想方式完全是两样的”②。

国民党中央在处理邓泽如等制造的弹劾共产党案的过程中，由于坚持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联共政策，使这一事件得以平息，从而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维护了革命统一战线。但是，也应看到，国民党中央对右派分子的反动思想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在组织上也没有作必要的制裁，反而在八月十三日召开的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和八月十五日召开的第一届中央执行

①《革命文献》第十六辑。

② 《中国青年》第41期，1924年7月19日。

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立国际联络部，这对共产党员的活动是个限制，也是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邓泽如、张继、谢持等窥测时机，准备着制造更大的分裂活动。

二、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的活动及其政治纲领

自从邓泽如、张继、谢持等制造的弹劾共产党案被平息以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时有发生。特别是孙中山逝世，右派的活动更加猖狂。国民党老右派先后建立了北京同志俱乐部和上海辛亥同志俱乐部等反动小团体，进行反革命的分裂破坏活动。这些还是个别的或小组织的活动。更有甚者，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出现了另立国民党中央，造成国民党分裂的右派集团——西山会议派。

廖仲恺被刺后，广州的政治形势对国民党一些右派极为不利，邹鲁、林森等无法在广州立足，借组织“国民外交团”或其他名义逃出广州。他们在上海筹划召开反对广州国民党中央的会议。经过一段准备，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参加会议的，第一届二十四个中央执行委员中，实际上只有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叶楚伧、邹鲁等八人；五个中央监察委员中，只有张继和谢持二人；后补执委出席的只有茅祖权、傅汝霖、沈定一等人。这个会因为在西山举行，被称西山会议，这一右派集团亦被称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开了四十三天，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结束。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顾问鲍罗庭解雇案》、《决定本党此后对俄国之态度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总理逝世后关于

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案》、《开除汪精卫党籍案》、《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案》、《推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各部部长案》,以及《告国民书》、《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等宣言、通电、议案和文告。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共产派”问题，把矛头集中指向了中国共产党和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十一月二十三日的第一次会议，就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十二月二日的第四次会议，又分别开除了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取消了他们的党籍。

西山会议在政治上背叛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的同时，在组织上分裂国民党，另立旗帜，和广州国民党中央对立起来，破坏了国民党的统一。

西山会议狂妄地宣布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取消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议决“中央执行委员会”移至上海，并推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各部部长：组织部长居正，宣传部长戴季陶，青年部长叶楚伧，妇女部长茅祖权，工人部长沈定一，农人部长覃振，商人部长孙科，海外部长林森，调查部长石青阳；通过了《修正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案》，并拟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举行，地点在上海或北京、广州。

西山会议后，这一伙国民党右派分子除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地方党部外，又集合在上海设立伪中央党部，作为右派活动的大本营。他们操纵了上海《民国日报》,又办了《江南晚报》,以此为宣传阵地。同时，为了篡夺国民党的正统地位，经过积极活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召开了非法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西山会议派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继西山会议之后，分裂国民党、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的又一次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全面篡改了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是与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相对抗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该《宣言》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就是被征服民族抵抗战胜民族，而不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实际上放弃了民族主义的反帝原则。《宣言》把民权主义解释为“全民政治”,抛弃了国民党“一大”宣言中主张的民权主义是有阶级性的观点。《宣言》在解释民生主义时,取消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口号,提出解决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办法是“移民”和给农民贷款，办合作社。解决劳工问题的办法是“制定有益于工人之劳动法规”，等待雇主觉悟是“解决民生之途”。

西山会议派非法召开的国民党“二大”，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委员，并在中央执监委员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封定谢持、邹鲁、沈定一为常务委员，同时决定了各部的部长。此外还拟定建立地方党部。西山会议派成为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动的政治集团。

三、戴季陶主义的出现

在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的同时，与西山会议派同恶相助的还有戴季陶以及国民党新右派。

戴季陶，又名传贤、天仇，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做过孙中山护法军政府的秘书长。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戴季陶既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又反对孙中山采取联共政策。

一九二五年三月以后，戴季陶便积极进行破坏统一战线和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一方面，因为孙中山的逝世，使戴更无顾忌；另一方面，五卅运动的爆发，他因畏惧工农的革命斗争而更加右转，以适应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但是他采取的不是象西山会议派那种公开分裂的策略，他采用的是打入广东国民党从内部来分裂国民党的办法。这正象他后来说的，西山会议派等是“单纯的反共产化”，“是抛却了国民党所应该积极努力的工作，……只消极的反对共产党”。所以，他要“站在很坚实的三民主义的观点上”，开展一个“说的做的……自异于帝国主义者和官僚军阀的反赤运动’①。

一九二五年五月，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发表了由他起草的《接受总理遗嘱宣言》，借机以遵总理之名，提出了建立以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的国民党‘最高原则’的建议。他强调，孙中山的遗教就是党的最高原则，任何人“不得有所独创”。这一宣言的发表，为他任意曲解孙中山的思想而强迫人们信奉，放弃孙中山的革命原则而又称“纯正”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戴又串到了杭州，同原浙江省党部的负责人、国民党老右派沈定一相勾结，由浙江省国民党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宣传工作上对于阶级斗争应取之态度之训令》。《训令》曲解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把具有反帝反封建为政治特色的三民主义,说成是‘实现仁爱之要道’的理论,认为这一理论“乃使吾人确知革命与反革命之分，不在于阶级之属性，而在于认识与

①戴季陶：《对于清党的态度应该怎样？》，《青年之路》第 63 页。

觉悟”。因此，在实行国民革命时，就要“防止斗争之害，消灭阶级之别”。《训令》的内容，反映了戴在反帝反封建问题上的妥协、退让的态度和敌视工农阶级革命运动的立场。

戴季陶为了建立明则“阐扬”三民主义，实则曲解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为了奠定反共的理论基础，住在上海薛坡赛慈安里“季陶办事处”，进行著述工作。在一九二五年六、七月份，先后炮制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这两本小册子，连同他同年五月份在广州发表的《民生哲学系统表》，构成了较完整的反动理论体系。这几篇文章的出笼，标志着戴季陶主义的形成。

戴季陶主义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戴季陶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就是中国两千年来儒家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中国固有之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思想为基础”，“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①。他说，“先生的全部思想，可以用几句简单的话来完全表明他，就是‘天下之达道三：民族也、民权也、民生也，所以行之者三：智也、仁也、勇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诚也，诚也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②。

在戴季陶看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儒家思想为基础，如此，才算“纯正的三民主义”。显然，戴季陶把孙中山革命的民主主义置于中国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去了，这就从根本上歪曲、篡改了孙中山思想的性质，阉割了孙中山及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

（二）戴季陶反对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特别

①戴季陶：《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
②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是反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自从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出三大政策以来，戴季陶一直耿耿于怀。在他看来，三大政策成为新三民主义的主要之点，造成了三民主义的“不纯正”。因此，他声称要恢复“纯正的三民主义”。

他认为实行联俄政策，争取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造成了“事事时时受人之节制”的局面。指责这样做是“把民族的独立性抛弃了，去依赖苏俄”，是“把自己的必要性忘记了去盲从苏联”①。

他认为采取联共政策，改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造成了国民党中存在不相容的“两个中心”，这是一切混乱和纠纷产生的根源。为了制造破坏国共合作的理论根据，他求助于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杜撰了所谓团体“排他性”和“共信不立”的学说。他认为，国共合作没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国共两党没有共同的政治信仰，要图国民党的生存，国民党必须要排他，要独立，共产党员要退出国民党，或者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放弃共产主义，“把三民主义，认为唯一的理论，把国民党认为唯一救国的政党”②，去作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基于这种主张，戴季陶发起了所谓国民党的“独立运动”。

（三）戴季陶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提出了“仁爱是革命道德的基础”的观点。他认为，革命“是从仁爱的道德律产生出来，并不是从阶级的道德律产生出来的”，“仁爱是人类的生性”，“阶级的差别，并不是绝对能消灭人类的‘仁爱性’”；“爱人利他的仁心，更不是一定要同阶级才能够具备，那些不来革命的人，只是不知，如果是能知，他的仁爱性依然是能够发现，依然能够为

①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③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导言》。

受痛苦的农夫工人努力”。因此，戴季陶号召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抛弃他的兽性，恢复他的人性”。他要求工人不要罢工，农民也不要反抗地主，要用“诱发仁爱性能”的办法，使他们“抛弃他自己特殊的阶级地位”①。同时也乞求统治阶级觉悟起来，对被统治阶级也实行“仁爱”。

戴季陶为了实行“以仁爱为道德基础”的革命，而把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对立起来，提出在国民革命中，“要各阶级同具国民的觉悟，国家的觉悟，而不应有阶级的觉悟，”“国家的感情要先于阶级的感情，才是国民革命的基础’②。他认为，在国民革命中，不应该提倡阶级斗争，只应该“阻止阶级势力的扩大’③；工农阶级不应该为改善生活和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只应该为“国家利益”而斗争，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爱国主义者，宣称“我的心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④。

戴季陶还强烈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说“唯物史观能够说明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不能说明各阶级为革命而联合的国民革命”，“绝不须用唯物史观做最高原则，争取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绝不是革命者应取的途径”⑤。

总之，自诩为“纯正三民主义”的戴季陶主义，实则是在思想上背叛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在组织上肢解国共合作，在政治上破坏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反动理论。

戴季陶主义一出笼，形形色色的右派分子都如获至宝，纷纷拿它作为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革命的“理论根据”，实际上成了右派分子的“理论旗帜”。西山会议派的决议、宣言，其内容出自

①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②戴季陶：《因五卅事告中国国民书》。
③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④戴季陶：《因五卅事告中国国民书》。
⑤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戴季陶的思想，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也是在这一反动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蒋介石导演的“中山舰事件”，抛出的“整理党务案”，是戴季陶反对国共合作理论的发挥。戴季陶主义成为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思想武器，为蒋介石最后叛变革命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四、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蒋介石在上海买办市场上遭到金钱失败之后，一九二二年六月到广东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当时正值陈炯明叛乱，孙中山被迫潜入永丰舰，蒋介石跑到舰上，表示誓与孙中山共存亡，因此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

蒋介石参加革命后，他的权欲思想也相随而来，并且随着权势的不断扩大而膨胀。他清楚地懂得，要想猎取更高的政治权力，就必须迎合革命潮流，而走拥护孙中山，拥护三大革命政策的道路，这是他实现政治野心的理想的选择。

一九二四年五月三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参谋长。这时的蒋介石是满口的革命词句。

他高谈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说中国不但要打倒地主，而且还要打倒资本家；“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甚至说：“以完成我国民革命之责任，直接以实现我总理之三民主义，即间接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也”①。

他也高谈联俄、联共政策。当谈到东征军所以取得胜利的原因时慷慨激昂地说道：“今天我们所以能够在汕头与各位同志们开这样的联欢盛会，原因在什么地方？……可以说完全是从我们总理实现中俄联合的一点成效”，“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

①蒋介石：《三民主义信徒与共产主义信徒非联合一致不能完成国民革命》，1925 年 12 月 5 日。

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达到这个目的，大半可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国际的实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的效力。”他说“：叫革命先进国的苏俄来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我们世界革命中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意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去年总理将要北上的时候，对我不但是有面谕，而且是有手谕。总理的面谕，说是：‘鲍罗廷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个样子才好，”。他还说：“我们实行总理遗嘱，不是在形式上的，若要真正的实行遗嘱，要真正的革命成功，一定要照俄国革命的方法去做，才是总理真正的信徒”①。

蒋介石这时在联共问题上讲的也颇为动听。他说：“国民党的同志，对于共产党的同志，尤其不可有反对，因为我们要晓得，‘反共产’这句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反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者的毒计么？”“总理决定下来了的主张，我们是不可违背的。如果不然，就无论你如何信仰三民主义也是假的了。因为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党罪人？”②

此时的蒋介石羽毛未丰，他需要借革命力量打击军阀，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因此，他表面说的一套，实际上干的又是另一套。他的真实思想是反苏反共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

①蒋介石：《在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宴会席上纪念十月革命演说》，1925年11月7日，《政治周报》第4期。

②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选举大会演说词》，1925年9月。

蒋介石在一九二四年三月给廖仲恺的一封私人信中，说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无诚意可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苏俄对华政策“皆不外凯撒帝国主义”①。此话与他前言对照，可见到蒋介石的真假两种姿态。

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回忆说：“有一次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拂袖跑到上海去了。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蒋介石对这些人是提防，限制的”。周恩来说，蒋介石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党代表就可用我周恩来。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左派，我推荐我党的鲁易同志去当党代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他就用鲁易同志为党代表。第一次东征以前，一九二五年二月，黄埔军校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他接着就在四月，在戴季陶的分裂阴谋下，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以相牵制”②。这个“孙文主义学会”，网罗黄埔学生和教职员的反动分子，监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偷窃文件，借故闹事，甚至开枪打人，弄得乌烟瘴气。周恩来回忆说，由于革命力量的发展，蒋介石非常畏惧，“所以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东征途中，他召集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会上公开表示他的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告诉他，所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子也都告诉他。当时我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央才能决定，搪塞过去了。后来他同我个人个别谈话中进一步提

①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 24 页。
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5—116 页，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出，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并假惺惺地表示后者是他所不愿意的’①。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要议决以纪律制裁西山会议派等国民党右派的。蒋介石为了骗取更多的资本，他在会前就作出了反西山会议派的姿态，指斥他们是‘反革命”，是‘总理不肖徒”；‘吾侪当鸣鼓而攻之”等等。会上，他还利用作军事报告的机会，大肆渲染自己，仿佛统一广东的首功应归于他。由于蒋介石的假面具没有被识破，结果，这个原来在国民党中地位并不高的新右派头目蒋介石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蒋介石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接着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相当于后来的总司令）。这就提高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扩大了军事实权，为他从事反革命阴谋活动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蒋介石经过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地位上升之后，野心更加膨胀。同时，由于工农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作用的增强，蒋介石感到这是他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重大障碍，便加速了反共的步伐。

蒋介石深知军权的重要，便首先在这方面打击中国共产党，扩大自己的势力，为此他制造了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件”。

三月十八日，蒋介石指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欧阳格（海军学校副校长），用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达一道命令给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当时是共产党员），称“转奉校长命令，着即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①。中山舰遵命令于十九日晨到达黄埔。他们又佯称“本无此事”，并要中山舰于即日下午返回广州。该舰于当天下午六时抵广州时，他们又放出谣言，说“中山舰无故生火弋游”，“显系共产党阴谋暴动”；“企图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蒋介石也故意表示“惊异”，矢口否认他曾下令调遣中山舰到黄埔候用。三月二十日早三时，蒋介石大动干戈，命令陈肇英、欧阳格占领中山舰及解除中山舰武装，逮捕了李之龙；又派刘峙指挥军队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纠察队的枪枝；令吴铁城率部监视汪精卫，包围苏俄顾问住宅，监视苏俄顾问，断绝其交通；还拘捕了黄埔军校及第一军中的全体共产党员，将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软禁了一天，并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革命军。这就是蒋介石阴谋策划的“中山舰事件”。

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等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周恩来坚决拥护这个主张，并在事件发生后的当天，立即赶到扣押共产党员的广州卫戍司令部（设在广东造币厂），当面质问蒋介石，斥责他制造反革命事件，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扣押共产党人的罪行。经过交涉，蒋介石不得不释放被押人员。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委员会于二十一日发表公开信，驳斥所谓“共产党有推翻国民政府的阴谋”的谣言。在黄埔军校，革命师生贴出措词强烈的反对捕杀共产党员的抗议书。在一些大学里，出现了“打倒新军阀”的标语。

蒋介石为了掩盖他的反革命行径，三月二十五日上书国民党中央，把罪过推在李之龙身上，并假惺惺地表示：“此事起于仓

①《李之龙关于中山舰案报告二则》，《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第22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卒，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请求处分①。他还虚伪地向群众宣布，绝不会背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四月七日，蒋介石以加强革命军人之间的团结为借口，下达了黄埔军校关于《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宣称“除本校特别党部各级组织应由党部加意工作外，其余各种组织着即一律自行取消”，解散了黄埔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八日，他在军校宣布，第一军的党代表“统统调回政治训练部来再行训练”。随后他又强迫第一军及军校中的共产党员撤出军校，篡夺了第一军的军权。十六日，他又取代汪精卫，爬上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宝座。至此，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夺取军权的阴谋已经实现。

接着，蒋介石又制造了打击共产党，夺取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事件。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以“清除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作幌子，提出了四个“整理党务”的提案。其一为“整理党务案”，其二为“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提案，其三为“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其四是关于国民党全部党员重新登记的提议。蒋介石纵操会议，通过了上述提案，分别称作“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整理党务第三决议案”和“整理党务第四决议案”，总称“整理党务案”。其主要条款有：

“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

①蒋介石：《呈军事委员会文》，1926年3月25日，《向导》第148期，1926年4月3日出版。

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①.

很明显，这个提案是蒋介石进一步打击共产党，篡夺国民党领导权的步骤。虽然有毛泽东、何香凝、柳亚子等在会上的反对，但由于共产党领导机关和国民党左派事先无准备，对蒋介石的反动提案斗争不力，提不出抵制这个反动提案的正确主张；加上中共中央派来指导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党团的负责人张国焘、彭述之，坚持陈独秀的错误路线，致使蒋介石的提案虽作过多次修改，然而其基本内容未变，提案终被通过。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组织部长谭平山、宣传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祖涵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刘芬等全被撤职。国民党右派分子叶楚伧担任了中央秘书长，顾孟余担任了宣传部长，邵元冲为青年部长（不久，蒋又推丁惟芬继任），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由陈果夫代理），做了国民革命总司令。根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特任国民革命总司令一人，凡国民政府之下陆海航空各军均归其统辖”“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政治训练部、参谋部、军事部、海军部、航空局、兵工厂等各军事机关，均直属于总司令部”；战事状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其意旨办理各事”②。这样，在北伐前，蒋介石实现了篡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阴谋。

①《整理党务决议案》，《政治周报》第 14 期，1926 年 6 月 5 日出版。
②《军事政治月刊》第四期。

但是，就全国来说，蒋介石的势力还只存在于广东一隅。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中力量虽受很大打击，仍然还掌握着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在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中也还保存着很大力量。蒋介石还想利用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群众的力量来窃取更多的革命果实，所以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蒋介石继续采取两面派手法，以便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实现更大规模的反革命计划。

第二节　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

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改组后的国民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和宣言精神的指导下，表现出革命的战斗精神。但是，国民党新老右派恣意践踏孙中山的革命原则，进行分裂国民党的罪恶活动，也给国民党带来危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无不担心着国民党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他们为了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推进国民革命，对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动逆流，进行了不懈地斗争。

反对西山会议的斗争是一次重大的斗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用联合的力量，制裁了西山会议派。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得知林森、邹鲁、张继、谢持等要在北京西山开会时，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即电告北京，指出这是违法会议。同时指示北京执行部查明情况。当这些右派不顾中央警告并于二十三日在西山召开会议之后，国民党中央于二十七日

致电各级党部，进一步指出西山会议的非法性质：“盖就法理而言，既经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须在广州开会，无论何人不得违反决议。就时势而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属于公开性质，若在北京开会，外则受军阀之压迫，内则有反动分子利用军阀以从中作梗，……使军阀与反动分子得遂其破坏革命之阴谋”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也于十二月发出六十七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委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表通电，痛驳西山会议派。

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为了制裁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于十二月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全会。会议在继续指出邹鲁、谢持、张继、林森等人以个人名义召开的所谓中央全会的非法性质的同时，还指出：取消李大钊、毛泽东等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党籍是分裂革命的反动行为。会议决定，近期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来处理西山会议派的问题。

准备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组织力量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重要会议，因而遭到右派的阻挠。这时，戴季陶之流的所谓‘理论家’,正在大肆贩卖其‘纯正的三民主义’,广州黄埔军校中的一部分反动军官和学生，在蒋介石的卵翼下也建立起“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动组织。蒋介石在十二月三十一日还扬言‘左派、右派都是我们的同志’,反对党内有左派、右派之分②。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虽然还没有暴露他的反革命身份，但在左派力量日益增长，右派势力进攻面前，显得缩手缩脚，迟迟不研究‘二大’的筹备工作。

就在这时，共产党人吴玉章率领四川代表团经上海到达广州，他看到大会一切准备工作还没开始，非常着急，便立即去找汪精

① 《政治周报》第一期，1925年12月5日出版。
②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欢迎会上的演说》，1925年12月31日。

卫,汪愁眉苦脸地说“:大会恐怕开不成了!”吴玉章说“:现在邹鲁等人这样猖狂，他们不但排斥共产党，也排斥广东的国民党，不跟他们斗一斗，怎么成？否则，许多同志流血牺牲换来的这块根据地就要垮台，只怕你这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也坐不住了！”①.催促汪精卫赶快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以筹备第二次代表大会。不几天，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推举吴玉章做大会的秘书长，负责筹备工作。

那时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肖楚女等都在广东工作，陈延年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和吴玉章经常往来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张太雷等，大会的筹备工作，就是由吴玉章和这些同志商量，分头进行的。依靠共产党人的努力，筹备工作进展得非常迅速，大会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开幕了。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二百七十八人，其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代表一百六十八人，中派代表六十五人，右派代表四十五人。吴玉章担任这次大会的秘书长。情况表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很大优势。由于吴玉章、毛泽东等出席大会的共产党人和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大会取得了很大成就。

大会通过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大会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封建军阀压迫、剥削广大人民群众的罪恶，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其必要之手段，一日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二曰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三曰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其二，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

① 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吴玉章回忆录》第 131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土豪。其必要之手段，一曰造成人民的军队，二曰造成廉洁的政府，三曰提倡保护国内新兴工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扶助其发展’①。

大会重申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强调了维护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大会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而苏俄以平等待我，“故对苏俄以诚意与之合作’②。“承认先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共同努力”,这是‘革命的势力集中,为促进国民革命成功之不二原则’③。大会认为“,两年来由帝国主义发出‘反共产’与‘赤色帝国主义’两个口号，号召其在中国之工具——官僚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及各种无聊政派，如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努力作其破坏诬蔑之宣传。其目的为欲拆散本党国内国外之革命的联合战线”，必须“向民众揭露其诬蔑及错误，同时指示民众，使知欲求革命之成功，则国内国外之革命的联合战线，必须扩大而巩固之。’④大会涉及到扶助农工政策时强调，“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主力军，已过去两年事实中完全证实。本党基于扶植农工之政策，以后应多致力于农工组织，扩大吾党基础的努力”⑤。对工人群众的政治斗争，要“予以伟大的帮助”⑥；对农民运动，要把它视为“国民革命之基础”，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给予支持⑦。

大会对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制裁。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

①②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政治周报》第六、七合刊，1926 年 4 月 10日出版。

③⑤ 《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政治周报》第六、七合刊，1926 年 4 月 10 日出版。

④《宣传报告决议案》，《政治周报》第六、七合刊，1926 年 4 月 10 日出版。

⑥ 《工人运动决议案》，《政治周报》第六、七合刊，1926 年 4 月 10 日出版。

⑦ 《农民运动决议案》,《政治周报》第六、七合刊，1926 年 4 月 10日出版。

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西山会议派首要分子邹鲁、谢持的党籍；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邵元冲、叶楚伧、林森、张继、张知本等十二人，由大会书面警告，责其改正，并限于两月内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若不接受大会警告，是甘心背叛国民党，而与谢持、邹鲁同趋开除其党籍；戴季陶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致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大会予以恳切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

大会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谭平山、宋庆龄等三十六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白云梯、毛泽东、许甦魂、周启刚、夏曦、邓演达等二十四人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等十二人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在选出的八十个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员有林祖涵、李大钊、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谭平山、毛泽东、许甦魂、夏曦、董用威、邓颖超、高语罕等人。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月十九日闭幕。这次大会所发表的宣言和通过的决议，继承和发扬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革命纲领和政策，打击了西山会议派等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维护了国民党的团结，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取得了一定的优势，这就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国民党右派分子还占据着重要地位，国民党内潜藏着严重危机。

西山会议派的骨干人物并没有因“二大”对他们的制裁而有所收敛，相反，更肆无忌惮地从事反革命活动，召开了所谓“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此，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召开了中央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西山会议派召开的伪国民党二大作出了严正决议，“授权国民政府以全力制止其开会，并下令通缉叛党分子

归案严办”。国民政府遂即发出命令如下：“去岁冬间，少数叛徒托庇军阀及帝国主义势力之下，在北京开西山会议，在上海开伪中央会议，蓄谋破坏本党基础，造谣煽乱，无所不至”。“近更以三月二十九日开伪代表大会为号召，仍谋在西山集会，不遂，则在上海举行。似此公然叛乱，实属罪不容诛，政府谨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对于此等叛徒，严厉惩治。特此布告：凡有敢在上海北京等处假冒本党最高机关名义以遂其叛党营私之目的者，不分首从，一概拿交法庭照叛逆论罪”。“凡列名伪会者，务于三月二十九日以前声名背签，否则届时定按名通缉，决不宽贷，其各凛之,此令。’①

此外，国民党各级党部也纷纷函电，谴责西山会议派非法召开“二大”的罪行。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政治周报》、《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发表文章，利用各种机会发表演说，严厉地痛斥和批判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行径及其谬论。

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指出，西山会议派等国民党右派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其原因“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的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为了什么左倾的操切。”文章认为，国民党自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政体，有各种人物参加，当初搞辛亥革命时，革命口号只是排满，党的组织和内容也很简单，还没有组织工农群众，还没有共产党，还没有国际的援助。现在不同了，革命目标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有了工农分子参加，有了共产党，有了苏俄作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

① 《中国国民党对于上海伪中央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处置》，《政治周报》第八期，1926 年 4 月 19 日出版。

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①。

恽代英利用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说的机会，无情地揭露了西山会议伪称忠于三民主义，实则背叛三民主义的真面目。他说，西山会议派这班人，鼓吹只要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其实他们并不懂得三民主义是什么东西，“很简单的说，讲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一定是反对帝国主义，一定反对军阀，一定是为平民——尤其是大多数的农工——的利益奋斗。必如此乃可以言国民党。不如此者决不配做国民党”②。他还指出共产党是真实能为三民主义而奋斗，是真实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党。陈独秀在《国民党右派大会》一文中，对西山会议派背叛三民主义作了专门批判。文章用对比的方法，把西山会议派的伪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作了比较，然后结论道：西山会议派已经用取消反帝代替了革命的民族主义；以全民政治代替了民权主义；以乞求恩赐的阶级调和代替了民生主义。

共产党人在批判西山会议派反动言行的同时，也直截了当地点出了他们的反动本质，指出，他们“事实上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③。他们“完全倒到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土豪的怀里去了，变成明显的反革命党”了④。

①《政治周报》第四期， 1926 年 1月 10 日出版。

② 恽代英：《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 年 4月印行

③ 毛泽东《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政治周报》第三期1925年12 月 20 日出版。

④ 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新青年》第 3 号，1926年 3月25 日出版。

二、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戴季陶主义出笼以后，曾经广泛传播，在统一战线内部造成了思想混乱。从理论上战胜它，以维护和发展国共合作，这是当时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迫切、艰巨的任务。为此，恽代英、瞿秋白、肖楚女等发表了许多文章，展开了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一九二五年八月，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八十七期上发表了《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文。他着重批判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继承了中国固有文化”的谬论，驳斥了所谓不相信中国固有文化价值，便不能创造文化，便不能进行革命的反动观点。恽代英指出，孙先生有时亦讲到中国固有文化，这是不错的；但若因此便说不相信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便没有民族的自信力，便不能创造文化，这就“不近情理了”。他指出，承认中国文化的价值这与民族革命的自信力没有什么必要的关系。我们不应拿一国的文化来决定他的命运，更不能以智、仁、勇这些少数圣哲的伦理思想作为革命的动力。更何况这些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是我们必须摒弃的东西。

瞿秋白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这是一篇批判戴季陶主义的重要文章。

瞿秋白在文章的开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戴季陶主义运动的要害就在于“理论上是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C·P·的跨党，甚至于反对C·P·的存在”。“他们这种运动不仅在思想上摧残工人阶级的斗争，实在还是削弱国民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阶级，因此亦就是削弱中国的国民革命”。

接着，瞿秋白就戴季陶主义几个方面的问题作了批判。

瞿秋白指出，戴季陶主义的“根本点，便是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所谓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竟只是仁慈忠孝的伟大人格，竟只是继承尧舜禹汤周孔的道统”，道统说完全抹煞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瞿秋白说，三民主义是中国各革命阶级反帝反封的共同纲领，它并不是什么“仁慈主义”，国民革命也不是什么“慈善事业’和‘君子’爱民的‘仁政’”。而戴季陶用所谓民生哲学的仁慈主义来解释中国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实际上把国民革命变成了少数人的“伐罪救民”的贵族“革命”，变成了“只要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少数人‘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

批判戴季陶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谬论，是瞿秋白这篇文章的重点。

针对戴季陶“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的说教，瞿秋白指出，用资产阶级人性论作指导，不能引导国民革命的成功，不能解决民权民生问题。瞿秋白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才真是中国一般民众现时要求民权民生政策的实际政纲的方针和指导”。“戴季陶虽然在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

针对戴季陶假借民族斗争否认阶级斗争的观点指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是相一致的。他说，国民革命“是中国被压迫的各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它既是一世界的阶级斗争，亦包含着内部的阶级斗争；“中国工人农民阶级的觉悟愈高，阶级斗争愈有力量，他们参加国民革命的力量和反对世界资产阶级（帝国

主义者)的政治觉悟也愈高”。指出他们以反对阶级斗争为宗旨,撇开大多数农工民众利益，而说什么“国家民族利益”，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

文章对戴季陶排斥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理论也作了有力的批驳。指出，不能因国民党中有各种阶级的思想，就否定有各阶级合作的可能。C·P所以加入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的政纲，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要求，能一部分的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因而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可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去进行”。戴季陶“要在这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内，建立所谓绝对的‘中心思想’，那就只有一条路：不准工人农民在国民党中主张阶级利益，就是使国民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著名活动家、理论家肖楚女，为了批判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专门撰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出版。书中，首先针对戴季陶散布的所谓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贻害中国’‘突过了国民之需要”等谬论进行了批判，书中说：戴季陶应该“晓得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结果，而阶级斗争是历史进化必然的事实”。中国也不能违背这一社会发展规律。就中国现状来说,‘眼前所需要的’是‘半殖民地上之国民革命的工作”,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实现这一任务的道路和方法，在国民党的党纲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之后，实在并没有在那里主张过即时实行共产制；更没有在国民党中做过一点实施共产主义的政治设施”,而是‘做那‘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组织农工群众，扩大国民革命之战线与势力，以为将来切实施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之预备”。书中质问戴季陶，你“能够指出哪些事实是要实行共产？为什么要说谎？要

欺骗读者？”肖楚女进一步指出，当前共产党人为三民主义努力的，实在是要使国民党“民众化”，防止国民党里“士大夫派”垄断国民党。这样，当然要用阶级的意识去教育群众，“从阶级上要求他们革命”，“这正是实行努力于国民党的必要的工作”，并不是象戴季陶说的，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是“突过了国民之需要”。

其次，肖楚女还批判了戴季陶污蔑共产党寄生的谬论。书中以鲜明的语言回答说：共产党“有它底堂堂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有堂堂的言论机关，有堂堂的被你所羡称的‘组织极严’的铁的纪律。它是寄生的吗？”不是！CP 在加入国民党之外，还依然保有它的完全的党的组织存在”。至于戴季陶要求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之后，应放弃 CP 组织，这更是荒谬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乃是各阶级的共同要求，有共同联合的可能与必要，同时它是代表工农利益而参加去扩大国民革命运动的，并不是合并，当然也不应该消灭组织。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光明磊落的立场和它自己保持独立性的原因。

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揭破了戴季陶之流自诩为“三民主义真诚信徒”的假面目，暴露了他们的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的反动本质，保护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在思想、理论方面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新右派。

与此同时，国民党左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也都严厉地谴责戴季陶的反共宣传。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在各地散发以后，仅广州、北京、武汉等地就把这本书烧掉数万册。戴季陶在哀叹这本小册子的厄运时承认：“在这一个小册子发行以后果然生出很大的攻击和迫害来。共产党的人一致对这本小册子下总攻击，这是必然的命运，也是当然的行动，无足怪的。然而国民党中……亦复一样对这本小册子下总攻击，……当时竟不能收圆

满的效果。”①

第三节　青年党的反革命活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反对青年党的斗争

一、青年党的反革命活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青年党反革命活动最猖獗，气焰最嚣张的时期。他们与各地封建军阀相勾结，以军阀为靠山，充当其反革命的鹰犬。他们支持国民党右派，疯狂反对和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支持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和新右派蒋介石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反革命活动。他们诬蔑、破坏人民革命运动，妄图阻挠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这充分暴露了中国青年党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奴才和走卒，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一）反对和破坏革命统一战线

一九二四年国共两党合作，引起了中国青年党的仇视和反对，早在统一战线的酝酿筹备阶段，他们就在巴黎进行反对国共合作的反动活动，他们的机关报《先声》周报“发刊反对中国国民党收容共产党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问题专号”②，进行诬蔑、攻击和挑拨离间。咒骂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不讲政党道德”，“是对国民党的打击”。他们还为国民党右派提供反对国共合作的材料，曾琦在巴黎发现一份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材料，如获至宝。他们把材料转给国民党右派分子谢持，谢以这份材料为根据，攻击国共合作危害了国民党，要

①截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重刊序言。

②《中国青年党北京市支部招待各界记》，《民声周报》第23期，1932年4月30日。

求孙中山放弃联俄、联共政策。孙中山没有为右派的攻击所动摇，而是“大大申斥了告密之老党员，……。”曾琦等回国后，直接与国民党右派相勾结，“内外夹攻”孙中山，使其放弃国共合作的主张。一九二四年冬借孙中山北上过沪之机，曾琦经谢持介绍，直接出面“劝其中止联俄容共。中山固执己见，予亦当仁不让，辩论久之，不欢而散。”① 他们攻击孙中山实行联共政策，给国民党造成了“大损失”：（一）为失却海外华侨之同情。……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华侨顿起‘赤化’之疑，而信仰遂渐衰矣。（二）为失却国内‘绅商阶级’之同情。‘绅商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居于重要地位，……乃以收容共产党之故，致若辈望而却步。（三）为失却爱国派青年之同情。信仰‘国家主义’之人，无论如何，不能与信仰‘共产主义’之人同隶一党，而中山乃欲兼容并包，冶为一炉，遂致已入党者时起冲突，未入党者裹足不前”②。

一九二五年底，西山会议派非法通过反对国共合作的决议，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但中国青年党却为之喝采，称颂西山会议派是“真正的国民党信徒”，是我们“合作救国的良友”。赞扬西山会议派的反动活动“是国民党的新觉悟”，对他们的反革命行为“表示十二分的钦佩和希望”③。他们煽动国民党右派彻底分裂统一战线，说什么“这种分家不是一个会议、一个通电，就可以了事的”，要“用斩钉截铁的手段去淘汰共产分子”，才能成功。

当新右派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的时候，中国青年党鼓动蒋介石要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依据‘你不杀我我杀你’的普通常识，……一刀两断用武力铲除共产党人”。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惨无人道地大批屠杀共

①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卷），第 98—100 页，1973 年 7 月 15 日。
②曾琦：《挽中山先生》，《醒狮》周报第 24 号，1925 年 3 月 20 日。
③《爱国青年》第 15、16 期合刊，1925 年 12 月 30 日。

产党人的时候，中国青年党对“蒋介石、李济琛、白崇喜等，最近对付共产党之采取严厉手段，尤深赞其勇敢。”为了鼓励蒋介石反共到底，他们进一步向蒋献策：“第一，反共宜求彻底，不可再事敷衍，……明白宣言开除共产党，并严防其窜入……。第二，反共同时并须反俄，不可一面驱逐共产党，一面又敷衍俄国。……第三，开除共产党后，须设法使其不得挟老国民党员及孙夫人以自重，……。第四，开除共产党，须直以敌党视之，勿再误认为友。……第五，开除共产党后，勿遽认为祸患已绝。……必须与国家主义者及其他爱国团体通力合作，庶足以竟全功而除后患’①。

（二）诬蔑、攻击革命群众运动，反对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

一九二四年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形成了反对军阀的民主运动。军阀段祺瑞为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召开御用的“善后会议”，抵制国民会议的召开。中国青年党站在军阀一边，反对国民会议运动。他们诬蔑国民会议运动受国共两党的‘操纵’”‘受莫斯科共产党总部的指挥”，“受俄红党利用，……专以激起全国暴动为目的”,这样会招至帝国主义‘共管’之结果。

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中,他们变本加厉地进行反革命活动，诬蔑“五卅”运动所以失败，是由于共产党为取得宣传材料,把‘本为一种纯粹的爱国运动’”‘涂以种种不相干的色彩,致帝国主义者得以信口雌黄”，“英人借口中国赤化，联合日美共同压迫我国”，这样“一方破坏我国际的同情，一方离间我国民的一

①曾琦：《国共两党决裂后吾人对于国民党之态度及忠告》，《曾慕韩先生遗著》第 86 页。

致”;致使斗争‘一无结果”①。他们诬蔑“三一八”惨案，是由于共产党人煽动群众对“政府加以非难”而引起的，因此，“杀我爱国民众者虽为政府，而彼共产党人实假手于政府以杀我爱国民众者也’②。

中国青年党诬蔑中国共产党对工人运动进行领导是“煽动工人，使为己用。真正赤化之祸，或且终不能免”为破坏中国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他们提出：“今后之工会，宜由工人自行组织，不必让共产党人参加其间，暗施操纵之术。……所有工会之一切言论机关，……不宜让共产党人主持笔政，借以宣传赤化”。

他们还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是“强迫农民入会，借此可以利用一切”，诬蔑办农民运动的人，“多是些无赖地痞”，“奸淫妇女，勒榨乡民”，无恶不作。他们诽谤农民运动是“互相残杀，社会秩序为之大紊，国民生计因而破裂。”

中国青年党还极力破坏学生运动，鼓吹“求学救国论”，妄图引诱学生放弃革命的政治活动。胡说“现代政治问题，绝对不是不学无术的妄人所能解决的”，因此必须造成一种求学救国的学风，“要把政治的根本解决，建立在学术的基础上”③。在他们控制的学校里，要求学生“埋头求学不许问政治”，禁止参加革命活动。他们还利用各种手段，迫害进步学生。

（三）反对北伐战争

中国青年党为了维护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反对进行北伐战争。在开始准备北伐的时候，他们就扬言，北伐军如果进抵长江流域和华北一带，必然要引起英、日等国的干涉，妄图以此来进行恫吓，阻挠北伐战争的发动，当北伐军攻占湖南后，他们诅咒

①曾琦：《五卅惨案之回顾》，《醒狮》周报第 85 号，1926 年 5 月 30 日。

②《三月十八日北京惨案之面面观》，《醒狮》周报第 18 号，1926 年 4月 10 日。

③《青年的政治运动与读书运动》，《醒狮》周报第 73 期，1926 年 3 月 6 日。

“此次北伐，不惟无直抵黄龙之望，抑且有根本动摇之扰”①。他们制造谣言，说北伐军所到之处，发生了“封报馆、捕记者、禁集会种种专制暴行”。他们还捏造了北伐不能成功的种种“理由”，动摇民心。当北伐军击溃吴佩孚，孙传芳也危在旦夕，整个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中国青年党为挽救北洋军阀的垂危统治，发起了一个所谓“拥护五色旗运动”。五色旗是辛亥革命后制定的中华民国国旗，可是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革命成果被军阀篡夺，五色旗已经完全变成了军阀罪恶统治的象征。广东革命政府作出决定废除了它。中国青年党借题发挥，大作文章，组织了“拥护五色国旗大同盟”，发表宣言、通电。

中国青年党搞的这场闹剧，是以保旗为名，行保护军阀的反动统治之实。这是中国青年党反动本质的一次大暴露。

（四）依附各地反动势力，充当军阀鹰犬

中国青年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积极投靠各地军阀，充当其帮凶。他们供认所以要依附于军阀，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认识到“空言反共无效，非武力不可”，这就需要培养“文化的武人——有文人的修养和武人的技能”；另一方面原因是，中国青年党作为“一个爱国而反共的党，简直弄得无法可以生存，剩下可以接近的，就只有寥寥的几个军阀，”“不去和他们接近，还和谁去接近？”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中国青年党的党徒纷纷投入各地军阀办的军校或讲武堂，有的担任教官，有的接受军事训练。他们自称“曾在各军事学校接受训练的同志，共约一千人以上，而以金陵军官学校及东北讲武堂为最多”。余家菊、陈启天等一批青年党骨干分子，在孙传芳的金陵军官学校讲授国家主义，发展青年党党员。李璜在四川为刘存厚、杨森、刘文辉、刘湘服务。青年

①曾琦：《论蒋介石北伐不能成功之六大原因》，《醒狮》周报第 98 期，1926年 8 月 29 日。

党骨干分子张子柱、张梦九投靠军阀唐继尧，在云南讲武堂任政治教官，一批青年党分子入云南讲武堂。张子柱等还在云南为唐继尧创办“民治学院”,训练县长,同时也借机为青年党训练了大批干部。曾琦到山东找韩复渠，危言耸听地说，山东共产党活跃，建议韩成立特别侦谍队，肃清共产党，大批青年党分子参加特别侦谍队，利用共产党的叛徒作眼线，装扮成进步分子打入共产党的组织内，利用检查信件和进步书刊等办法，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特别是他们利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包围曲阜二师，按着黑名单，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破坏曲阜二师的共产党组织。

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反对中国青年党的斗争

中国青年党的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獗，他们的“理论”虽然非常浅薄，但由于他们盗用了五四时期的革命口号，运用了国家、民族等冠冕堂皇的字眼，加之其骨干分子多有教授、学者的头衔，很容易暂时欺骗一些青年人。因而当他们一出现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就对其进行了坚决批判和斗争。

由于中国青年党初期活动的中心在法国巴黎，因而旅欧共产党组织首先站在反对中国青年党斗争的最前线，周恩来等人一方面深入到华工和旅法学生中去讲演，利用各种集会的机会，当面驳斥曾琦、李璜的谬论，“听众鼓掌之声震屋”。另一方面,以《赤光》为阵地，发表了大量文章，对国家主义派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第一、批驳了国家主义派反对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进行辩护的谬论

针对国家主义派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行辩护，反对提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口号的种种谬论，共产党人指出，中国成为半殖民地，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帝国主义，特别是美、日、英、法使用先进工业国机械的力量，“奴役了我们农业国的散乱民众，掠夺我们的原料，强销他们的货物，以金钱诱惑中国的军阀、官僚，于是借款约成，继海关共管，邮政代管后，有盐税共管，铁路共管，江河共管，驯至全部财政共管，乃便要完全实现共管中国了”①。还指出，国家主义派否定有国际帝国主义，也是荒谬的。对中国的侵略，就不是某个帝国主义的行径，而是国际性的。“试看巴黎和会因对远东问题的分赃不匀，美国竟负气不签和约，结果乃有华府会议”,迫使中国‘承认‘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诸原则,以遂英美共同宰割中国的阴谋”。事实说明，“现今毫不客气地侵略中国，压迫中国人民的，决不专限于某一国，或属某一民族，而乃是国际间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②

共产党人还进一步指出，反对帝国主义，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因为“中国已夷为列强的殖民地，非革命不足以图存了”。国家主义派妄图以宣传‘东方文化’来制止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是“叫老虎不吃人”的梦想。因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根本原因，“是它们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度所不得不然，绝不是他们不了解东方文化所致。”假若如此，“则印度、埃及、亚剌伯、美索博达米这些古国”和中国一样有古老的文化，那“便不会为国际帝国主义所吞灭所保护了”③，但事实是，他们同样做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因此，弱小的民族必须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其它办法，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共产党人还指出，中国的封建势力同帝国主义是互相勾结的。

①伍豪：《革命救国论》、《赤光》第2期，1924年 2 日15 日。
② 周恩来：《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少年中国》第四卷第8 期。
③《再评宣传东方文化》，《赤光》第 18 期。

没‘有内贼,外贼何能张牙舞爪的一无忌惮!’我们只有认清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共同压迫中国人民，才“能找到我们共同的敌人’①。认识到中国人民“唯一的活路便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

第二、批驳了国家主义派反对国共合作的谬论

针对国家主义派诬蔑国共合作是共产党阴谋对国民党的“篡夺”,是要‘打倒’国民党等谬论,共产党人指出,中国共产党所以要倡导国共合作，促成国内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因为我们的敌人在向中国人民进攻的时候，他们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因此，“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对外“目标一致，好集中革命势力；对内能坚固各个革命分子的决心，消弭某些部分人的目前部分利益的争执，训练统一，步骤一致，……号令集中，指挥自如，易于杀敌”。中国共产党倡导国共合作，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只有这样，“中国共产主义者更能以国际的关系促进国民革命成功。这又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国民党中特负的使命”②。

针对国家主义派诬蔑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阶级的“混合”。共产党人参加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是‘半共产主义者”。是“滑稽”可笑的等谬论，周恩来在《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一文中严正指出，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革命，是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从何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呢?这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共产主义者为做他共产主义所能解释亦正三民主义所解释的国民革命工作而加入国

① 伍豪:《革命救国论》,《赤光》第 2 期，1924 年 2 月 15 日。

② 恩来：《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赤光》第 5 期，1924 年 6 月 1 日。

民党，滑稽何谓？共产主义者是兼信合于共产运动在中国的第一步革命工作的三民主义,有何不明了有何‘半’字可加？周恩来不仅正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而且正确指出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指导下的革命运动的关系，有力地驳斥了国家主义派挑拨离间，破坏国共合作的谬论。

第三、批驳了国家主义派宣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针对国家主义派宣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指向援助中国革命的苏维埃国家的谬论，共产党人指出：“我们倡言救国运动是依据于国际政治经济情势，弱小民族地位，非内倒军阀外倒国际帝国主义不足以图存的见地而来，决非狭义的爱国主义运动。我们主张必须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为救国而倒军阀，倒国际帝国主义，但我们心中却不容丝毫忘掉与我们受同样苦痛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亦即是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我们也非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来打此共同敌人不可，故我们的救国运动乃必须建立在国际主义上面’① 。这是因为“压迫阶级是以各强国的资产阶级为中心，各产业落后国的封建军阀只不过是他们的爪牙；”“工业先进国中的无产阶级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都站在同一被剥夺被欺凌境地的”，为了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工业先进国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更应联合起来，一齐向压迫阶级进攻”，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因此，“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我们可引为友之国自不外与我们立在同一境地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和无产阶级之国的苏联俄罗斯。”② 国家主义派把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诬蔑为侵略，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苏俄

① 伍豪：《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赤光》第3期，1924年3月1日。
② 伍豪:《革命救国论》,《赤光》第2期，1924年2月15日。

归还一切租界，取消治外法权，采取平等税则，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退还庚子赔款等等”，这些“所不能得之于华府会议者今竟得之于苏俄”。事实证明，“苏俄是被压迫民族的朋友”。

旅欧共产党人对国家主义派的有力批驳和斗争，揭穿了他们伪装爱国，实际是利用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进行反苏、反共、反革命的真面目。沉重打击了国家主义派，大大缩小了他们的反动影响。

一九二四年秋，国家主义派把他们的活动中心移到国内后，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为了巩固国共合作，推动革命形势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了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肖楚女、瞿秋白、恽代英等人，在《向导》、《中国青年》、《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对国家主义派的谬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批判。

第一、批驳了国家主义派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

中国共产党人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有一百万以上的产业工人”“帝国主义的资本家既在实行对于殖民地劳动者的奴隶制度，中国的资本家又因处于帝国主义强力的压迫与竞争之下，……亦是拼命的向劳动者压榨，以求利润——中国工人阶级对于这种双方两重的剥削，自然不能不开始斗争，而且这种斗争一开始便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绝无改良主义阶级妥协之可能”①。只有阶级斗争的实践，才能够进一步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假如按照国家主义派的谬论，“我们在革命以前及以后，都应尽量防止阶级斗争，那使无产阶级只有在人家愚弄欺骗之中，他们自己阶级的力量不得发展；在外国资本家与中国资本家互相勾结以压迫他们的时候，他们必无法反抗。”②

①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新青年》第 3 号，1926 年 3 月 25 日。

②代英：《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中国青年》第 73 期。

第二、批驳了国家主义派鼓吹的超阶级的国家观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

肖楚女在《显微镜下之醒狮派》一书中指出：“私有财产不废除，资本生产制不改变——一切生产机关不公之于社会而为私人所占有时，阶级是自然要生起来，而且要分化发展得愈明显的。阶级一日存在，阶级斗争便一日不会消灭；国家也便一日不得不被有力阶级——得胜阶级用为工具。有产阶级专政，是用国家这个东西保护自己的地位，役使他人——使阶级继续存在。无产阶级专政，是使生产社会化，废除私有财产，将一切生产工具归之于社会公有——使阶级消灭”。国家主义派否定国家的阶级实质，是利用空洞、抽象的“爱国”之类的好听名词“欺骗无产阶级”，麻痹人民的阶级意识，以维护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针对国家主义派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共产党人指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十分需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中国的产业工人与全国人口之比虽然比俄国少，但“这并不能断定中国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俄国机器工人与全国人口之比不较英美少二三十倍？俄国既可以比英美先成就无产阶级革命”，我们主张现在最主要的是进行国民革命，但“不应因为国民革命而否认中国有无产阶级专政之可能”，更不能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之必要。因为“一切革命没有独裁制便完全是空想：难道革命胜利之后，还能容许反革命派的自由，以便他们推翻革命？”①

第三、揭露了国家主义派的反动本质

共产党人指出，中国出现国家主义派不是偶然的，“是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潮流高涨所激起的一种极反动的思想”。国家主义派“打的旗帜是全民革命，但是没有看见过他们参加何种革命

①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新青年》第 3号，1926 年 3 月 25 日。

行动”。他们高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实际他们“是分裂国民革命的各阶级联合战线与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战线的最坚决的主张者，是民族运动的死敌”①。

可见，国家主义，“是资产阶级保护自己阶级利益之一种政策。”国家主义派同国民党右派一样，“是列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恭顺可靠的保护人！”“是一个借了反对共产党而干反革命事业的大集合”，“是最反动势力的结晶！”②

国民党左派也参加了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他们指出：“国家主义是怯懦虚伪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假爱国之名，以掩饰其不革命，反革命之行为的口号”。“国家主义派，甘受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官僚豢养③，他们“从来不敢，而且不愿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对于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等，则以有时作几句不冷不热的批评，为敷衍耳目之具，而一方面则自告奋勇，为一切反赤运动作前驱。”

国民党左派在揭露国家主义派提出的政治口号的反动实质时，指出：“他们乃故意提出新的口号，如所谓‘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外不亲善内不妥协’，以表示他们与一般革命同志之不同，然而此等口号，有甚么意义呢？国家主义者曾经除了什么国贼，曾经抗了什么强权呢？绝对没有这一回事，但他们却认定一切革命勇敢作战的本党左派分子与共产党员，为国贼，且加以攻击；认定能在精神物质上给中国革命运动最大帮助的苏俄，为强权，尽力妨害中俄民族间亲善的感情”。“他们名为爱国，实际是要牺牲大多数弱小民族与被压迫阶级利益”，为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

①《评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对时局的宣言》，《中国青年》第 133期。
②《醒狮派——最反动势力的结晶》，《中国青年》第 97 期。
③《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反对国家主义派命令》，《反国家主义》第1、2合刊再版，第 70—71 页。

阶级服务。他们“实际是站在帝国主义一方面，向一切不利于帝国主义之革命势力进攻”。他们“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国民运动的仇敌。”①

中国青年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喧嚣一时，但由于他们在政治上极端反动，完全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的组织基础非常脆弱，是一个反革命的“书生集团”。他们没有什么实力，组织非常松散，有的甚至是有名无实，因此经不住人民革命洪流冲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对其有力的批判和斗争，戳穿了他们的伪装，暴露了反革命的真面目，除了那些怀有政治野心的反动政客以外，一时受骗的人，特别是青年人，迅速觉悟起来，脱离了他们的反动组织。当时人数最多的上海“中国少年自强会”自行解散。发表宣言，表示“愿放弃国家主义与进步的革命青年合作”。四川的“起舞社”也瓦解了。自强会发起人彭十严(彭光球)和“起舞社”的发起人宋继武发表文章说明他们放弃国家主义的理由，是他们真正明白了国家主义派的宗旨，并不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看清了国家主义派的行为，不是爱国，而是卖国。从一九二六年开始，这个反革命党基本上土崩瓦解了。当时青年党的头子曾琦不胜感慨的写道：“赤焰薰天势莫当，纷纷余子竞投降”。

② 《反国家主义宣传大纲》，《对国家主义派的反攻》第1集，1926年。

第 六 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大革命的失败

第一节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退让

一、对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三次重大让步

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下的联合。由于阶级利害的不一致，特别是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破坏，必然在统一战线内部发生矛盾和斗争。斗争的焦点，是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各种阶级的力量都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而大资产阶级是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他们的政治代表就是国民党右派。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国民党内部又出现了新右派，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和国民党老右派反革命活动的手法不同，他们不象老右派那样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而是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一步一步地篡夺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由于处于幼年时期，面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

派争夺领导权的挑战，缺乏争取领导权的明确观念，对蒋介石的本质认识不清，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存在“公式化”“定型化”的缺点，不懂得“各阶级代表人物是能变化的”①，“代表性改变了，本来不是敌人也可以变成敌人。”因此，当蒋介石已经变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时，却仍然把他当作资产阶级代表，不敢同他的反革命行为进行斗争，害怕这样会导致同资产阶级关系的破裂。在陈独秀右倾思想的影响下，在北伐战争准备阶段，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的进攻，作了三次重大的让步。

第一次是政治上的大让步。国民党“二大”召开前，蒋介石新右派的面目更加暴露，他在沙基惨案中畏惧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东征中，惧怕农民运动，在革命力量的发展面前，更加动摇，企图加以限制。他公开要求把在黄埔军校和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名单告诉他，要求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党。面对蒋介石反共和分裂统一战线的新动向，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负责人周恩来、陈延年等和苏联驻广东政府的顾问鲍罗廷确定了在国民党“二大”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基本政策。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右派分子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共产党员要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这个政策和计划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左派占绝对优势。如果这个计划实现，将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使统一战线得到巩固。但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中央，不仅否定了这个计划，而且在上海与右派分子戴季陶进行谈判，请戴季陶等右派回粤。由于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政治上的大让步，孙科代表右派回广州，把蒋介石的腰撑了起来。中共中央又派张国焘做这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党方面的党团书

① 《周恩来选集》，第 167 页，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记，张国焘大讲我们过去把左派包办了，提出以后应独立形成共产派，把共产党和左派分开，让左派独立起来。在“二大”的选举上，也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三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员只有七人，比原来计划的少了一半，左派连谭延闿和朱培德算上才十四人，而中派右派却有十五人。右派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和萧佛成等都当选了。监委中右派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的执、监委是经常合在一起开会的，这样的结果形成“右派势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局面。右派纷纷回粤，乘机大肆活动，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使左派受到孤立和打击。

第二次是在军事上，对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的大让步。蒋介石要篡夺军权蓄谋已久。他害怕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特别害怕黄埔军校和军队内革命力量的增长。当时黄埔军校内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力量大大超过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力量；军队中三个师的党代表，共产党占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共产党占七个，在连排班以及士兵中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各军又成立了政治部。蒋介石把这些革命力量看成是隐患，是他篡夺军权的障碍。

国民党“二大”后，右派分子猖狂活动，左派力量受到孤立，为蒋介石制造了有利的政治气氛。在这种情况下，他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勾结右派，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对蒋介石篡夺军权的反革命行为，国民革命军中的谭延闿、程潜和李济深都表示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和蒋介石斗一番。这时如果中共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① 但是，陈独秀不了解蒋介

①《周恩来选集》，第 120——121 页，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不敢分裂，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因而又一次采取了退让的政策，把蒋介石公开打击共产党，篡夺军权的反革命行为说成是误会。蒋乘机立即放人，表示误会。使蒋介石在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了成功。从此以后，汪精卫偷偷离粤，国民党左派束手无策。蒋乘机把广东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解散，压迫共产党员撤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在右派支持下，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巩固之后，为了表示他革命，又回过头来，打击右派，逮捕了欧阳格，不用陈肇英，不理古应芬、伍朝枢，胡汉民也不得不再次离粤。蒋介石采取反革命两面手段，其目的是既打击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左派力量，夺取军权，又不离开统一战线。

第三次是在党务上向蒋介石的让步。蒋介石巩固了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之后，接着又从党务上向共产党进攻。他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目的是为了排挤,打击共产党。但如果这时中国共产党能采取正确政策，予以坚决回击，蒋介石的进攻还是可以打垮的。因为当时他的兵力仍然占少数，所有的民众运动都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他不敢决然分裂统一战线。但陈独秀又一次采取了让步政策,接受了“整理党务案”。结果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几个部长的位置丢掉了，在党务方面已经毫无地位，右派在党务上占了优势。蒋介石乘机捧出右派张静江当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本人做了组织部长并兼任了新设的军人部长。右派利用有利的地位，在各省发展其势力，使各地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受到打击。

二、全面推行右倾投降主义，放弃革命领导权

尽管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中国共产党

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严重的问题发生在大革命的后期。一九二六年底和一九二七年初，大革命处于紧急时期。北伐顺利进展，工农运动猛烈发展，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引起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他们同地主买办阶级联合起来，极力拉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分裂破坏统一战线，猖狂向工农运动反扑。民族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动摇，国民党右派正准备叛变。在这紧急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共产党采取坚决依靠工农群众，进行深入的土地革命，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就可以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制止国民党右派的叛变。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屈服于反动势力的压力，压制工农运动，放弃了革命领导权，使自己陷入孤立的地位和无戒备的状态。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他的政治报告中认为，时局的危险是一方面军事势力有脱离民众而向右走的倾向；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犯了“左稚病”的错误，工农运动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发生了恐惧。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关系之主要原因”。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一方面应防止党外的右倾。但防止的方法不但不是发动群众，而且特别反对武装群众同右派作斗争。他在空喊“武力与民众结合”口号的同时，主张把军权交给蒋介石、唐生智，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实力的均衡使其互相牵制。并且通过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政府，幻想利用蒋、唐、汪的矛盾以减少国民政府军事独裁的性质与形式；另一方面是反对党内的所谓左倾，制止“过火”的农民运动，通过压制工农运动，以谋求与右派妥协。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接受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努力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势力，帮助他们获得党的和政府的领导地位”。“在社会中下层”发展国民党组织，使左

派领袖有党内的左派群众”。这次会议是把一切权利都送给了汪精卫和唐生智，连无产阶级领导权字样也没有提。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会议提出反对中国共产党“包办”农民运动，说“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关于工人运动，会议认为“产业工人运动，宜由罢工时代达到组织时代”，即停止工人斗争，进行“工会整理和党的发展，党的支部训练”工作。汉口特别会议标志着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有新发展，不仅更加系统化，而且更加完备，并且统治了中央。

蒋介石利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乘机全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北伐出师前，蒋的直系还只有六个师，总共八个军中，他只占一个军。但在北伐中，国民革命军从八个军发展到四十个军，其中大部分是蒋收编的军阀部队。蒋以军长、师长的头衔收买了一些旧军阀，使其为自己服务。在蒋自觉羽毛已丰的时候，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公开叛变革命。

在蒋叛变革命，统一战线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召开了“五大”。“五大”虽然“承认了领导权要争，批评了天然领导权的说法”。会上，几乎“所有说话的同志同声一气地指出，中央在革命性质和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关系上，都采取了完全错误的路线”，大会也肯定了若干正确的原则。但是，对“五大”不能做过高的估计。周恩来指出，当时所谓争领导权的“方法是到处贴标语，喊口号，说要争领导权。这只是空的，没有实际意义。”而具有实际意义的是应“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①。但“五

① 《周恩来选集》，第 169 页，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大”和“五大”以后的中央，在这些具有实际意义的关键问题上恰恰没有明确的认识和正确的方针。

关于土地革命问题。支持农民的革命运动使之深入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是巩固革命的基础，挽救革命的重要问题。毛泽东等人当时代表了正确主张，可是陈独秀被当时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愿接受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他说：“虽然我感觉到我们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是太右了，可是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也是太革命了的。”他主张“我们在相当时期以内，必须保持一种折衷的中庸路线”① 。他甚至荒谬的认为，土地革命的深入会影响北伐战争的发展。提出等打倒军阀之后，再来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反对在打倒旧军阀和新军阀蒋介石之前深入开展上地革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由于存在严重分歧，所以“五大”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是妥协的产物。决议虽然肯定了“无贷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这一原则，但立即作了两项限制“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以不没收。”这样，实际使土地问题无法解决，极大地妨碍了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一九二七年夏季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地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②

关于武装问题。“武装是一个中心问题。”它是更广泛发展工农运动，深入土地革命的有力后盾。大革命时期，在国民政府管辖范围内，有两种武装。一种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有叶挺的二十四师，武汉警卫团，和朱德的军官教导团，军校的一部分骨干力量，再加上湖南、湖北的工农武装等。另一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如冯玉祥、唐生智的军队。陈独秀和共产

①转引自米夫：《紧急时期中国共产党》。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2 页题解。1964 年出版。

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对待武装的政策是错误的。周恩来指出：“那时候我们党的政策，不是面向自己的力量，而是面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①]。他们怕发展人民的武装力量，会引起资产阶级的嫉妒和恐惧。一九二七年春，“我们本想建立一支完全由我们党所掌握的军队。因此决定把共产党员连某所指挥的一个营扩充为一个师。人员、粮饷、军械都已经筹划好了。”但陈独秀到达武汉之后“说什么计划中配备的枪械比别的军队都好，怕引人妒忌，他又说自己建立军队，太引人注目等等。就这样前怕狼、后怕虎，这一师军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②]。“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地区外部被敌人严密地封锁，内部又发生了严重动摇，在这种危急的时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不是去积极组织发展人民武装，打破反革命的包围，稳固武汉地区的形势。而是“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可靠，甚至把唐生智、冯玉祥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力量当成依靠，而不去依靠农民和革命武装。他们主张北伐打张作霖，反对东下打蒋介石。其实“所谓北上的中心思想，是想避开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接冯玉祥出来，与国际打通”[③]。所以四五月间，唐生智带兵继续北伐。当冯玉祥从潼关打到郑州的时候，他们对“马日事变”这样严重的反革命动向并不重视，却跑到郑州去会冯玉祥，张国焘去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也去了。这时蒋介石也派吴稚晖到郑州，冯玉祥一面应付武汉来的人，一面宣布去徐州会蒋介石。结果冯玉祥在徐州同蒋介石会面，来了一个大反动，把所有武汉的人都出卖了，于是武汉去的人一连串的跑回来，“这时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余等态度全变了，国民党的人更加动摇了。”陈

① 《周恩来选集》，第 213 页，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 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
③ 《周恩来选集》，第 170 页，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没有做好资产阶级又一次叛变的应急准备，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关于政府问题。周恩来指出，当时应当“建立工农领导的政府”①。武汉政府并不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当时“还有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等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人物坐在政府中，汪精卫则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应该争取领导权，“把改变武汉政府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当作努力的方向”②。同时把农民协会变为乡村政权，以巩固这个政权的基础。陈独秀是用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去看待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他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不是领导，不要争取革命领导权，而应该帮助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可以得到自由，八小时工作制。以后再搞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在这种观点指导下，他们既不去改变武汉政府的性质，又没有组织工农准备同武汉政府决裂。而身为农政部长的谭平山又以“不能纳农运入正规”而辞职，他不但不主张把农民协会变为乡政权，反而希望国民党去整顿、改革下层政权。这样就把中国共产党完全置于无所作为的境地。

关于国民党问题。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目的是要实行国共合作，把国民党改造成为革命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目的和孙中山先生采取联共政策的宗旨基本是一致的。这里的关键是要发展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左派核心力量，争取革命领导权，使国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但是，“陈独秀主张不分左中右，怕人家说我们分化他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喜

①《周恩来选集》，第 218 页，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周恩来选集》，第 165 页，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欢我们分左中右,陈独秀就作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应声虫。”① 本来,左派应‘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包括我们党。’陈独秀‘却把我们从左派划出来,叫共产派。’说什么共产派不应包办国民党的工作等等。这样，就分离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左派核心力量，“不分左中右,结果左派就要跑到中间,最后跟右派跑了。’陈独秀对右派的反革命动向缺乏应有的警惕,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夕，汪精卫回国，立即同蒋等开会，商讨反共的步骤和方法。陈独秀却于四月五日同汪精卫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竭力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进行掩盖,说“: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所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释解。’宣言起到了帮助敌人,麻痹人民革命意志,解除思想武装的作用。

由于中国共产党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领导之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了惨重失败。

第二节　蒋介石集团的叛变。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反对蒋介石集团叛变的斗争

一、国民党的迁都之争，提高党权运动

一九二六年末至一九二七年初，在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场迁都武汉还是迁都南昌的斗争。这场斗争，是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为一方，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阴谋篡权的斗争。

①《周恩来选集》，第 214 页，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它是在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继续。

当北伐军攻克武汉，占据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以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从中国南端迁到内地，这已成为形势发展的要求。为此，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会后，在粤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北迁；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外交部、交通部等所属机关也陆续离粤。时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也宣布自十二月七日起停止办公。先期到达武汉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奉命于十二月十三日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简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徐谦为主席兼司法部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孙科为交通部长，宋子文为财政部长，此外还有宋庆龄、邓演达、吴玉章、唐生智、詹大悲、于树德、张发奎、蒋作宾等。临时联席会议临时负责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执行最高职权。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北伐军占领南昌，蒋介石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这里。他为了实现军事独裁与个人专断的野心，想把他的总司令部置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之上，实行以军治政、以军治党。可是，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不但受不到总司令部的控制，而且总司令部还受国民政府的节制。因此，蒋介石改变了他自己也曾提出过迁都武汉的主张，违背中央决议，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迎到南昌，同时扣留了途经南昌准备去武汉的几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企图造成在南昌发号施令压制武汉的局面。并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在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以“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为借口，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这是蒋介石准备叛变革命的一个信号。

蒋介石的非法决定，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给予了坚决否决。宋庆龄、徐谦、陈友仁等强烈谴责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国民政府的行为。全国人民，特别是武汉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纷纷集会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一月九日，蒋介石到武汉再次提出迁都南昌的问题。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断然拒绝。武汉民众团体纷纷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要违抗中央的决议。

蒋介石迁都南昌的想法并没改变，二月初，又在庐山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迁都逐鲍(鲍罗廷)”。参加这一次会议的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居中斡旋、调停，更以大敌当前，蒋介石也有顾虑，所以“迁都逐鲍”的主张缓和下来。蒋介石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在二月八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决定。

蒋介石在阴谋夺取中央党政大权的同时，也积极进行夺取地方党权、政权的活动。北伐军攻占江西以后，蒋介石指派爪牙，钻到广东、江西省以及下属县市。与驻军、民团勾结一起，压迫农民，解散农民自卫军，改变地方国民党的领导成分。国民党地方党部的负责人员是由党员大会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出来的，在张静江任国民党中央的主席，陈果夫任组织部长的时期，他们对各级党部负责人的任用改变了办法，限制民主，加强了中央的委派权限，指派党务特派员“充实”地方党部，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广东，臭名昭著的陈炯明的走卒吴倚伧被指派到东江主持党务，一向同情国家主义派反对三民主义的段锡朋，被圈定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委员。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由下而上地发出了打倒新军阀，提高党权的号召，在上海、广州、武汉以及全国各地，形成了全面地普遍地提高党权，反对蒋介石独裁的运动。

为了加强对这一运动的领导，二月九日，国民党左派举行高

级干部会议，推举出吴玉章、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余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同蒋介石斗争的领导机关。在会议发表的宣言和宣传要点中指出“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是目前党的第一标准”；“统一党的指导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是现在急切的要求”；“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这是目前不容稍缓的”；“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军队在党指挥下统一起来，并准备与某系的武装决斗”，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①。

二月二十四日，武汉召开了国民党党员大会，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打倒老朽昏庸分子”，“扫除封建势力”，“提高党的威权”，“一切权力属于党”成为大会的中心口号。会议董必武致开会词，邓演达发表演说，大会发表决案和通电，号召全党决心奋斗，巩固中央威权。三月十日，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把提高党权运动推向了高潮。

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至十七日，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参加会议的三十三人，其中中央执行委员有吴玉章、林祖涵、宋庆龄、何香凝、谭延闿、徐谦、恽代英、于树德、彭泽民、宋子文、陈友仁、孙科等十八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毛泽东、董用威（董必武）、邓演达等十一人。

三中全会重申了国民革命的方针是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反对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任何妥协。全会通过了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统一革命势力，加强国共合作，扶助农工运动

①《革命生活日刊》，1927 年 2 月 17 日。

的多项决议案。

会议发表的宣言，分析了自北伐占领武汉以来这个时期的新特点：全国的一半已经从帝国主义的同盟者与工具——军阀的直接压迫下解放出来，全国广大民众的斗争日益扩大。同时，军阀与帝国主义对他们失败并不甘心，在改变着反动的策略。我们的敌人不能抵抗整个革命的势力，不得已采用分化革命战线的方法。宣言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行动方针是：继续援助工人农民和城市中一般民众的革命运动，及改良他们本身生活的斗争；要把一切行政立法权，集中在国民政府手里，防止个人专政或一部分专政的倾向；要以革命的方法统一中国；要继续向帝国主义作战；要继续对北方军阀作战；要继续并且巩固我们对苏联的关系等。

会议作出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中，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大会闭会后，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之间，由九人组成的常委会，对党务、政务、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因常委会不设主席，采取主席团制，这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常会主席职务。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案》、《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组织大纲案》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中，规定了“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军事委员会一切会议之表决，以出席委员之过半数行之”；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而有七人组成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之决议及发布命令，须有主席团委员四人签名方生效力”；“军事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所议决之重要案及办法，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生效力”；总司令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军官任免和出征动员，须经军委会决议，提交中执会通过，再交司令部执行。这些规定，缩小了蒋介石这个总司令的权力。

在《对农民宣言》和《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国民党的任务，是领导农民“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的特权”；“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在乡村中建设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自治机关”。为了保证这一斗争的胜利，“农民得到武装，实为重要条件之一：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如民团、保护团，及团防局等均须解除交与农民”；“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

在《统一革命势力案》中，确定工农运动由国共两党共同指导，由共产党派负责同志，加入国民政府及省政府，共同担负政治责任。

在《对全体党员训令案》中，针对蒋介石的独裁倾向着重指出：“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之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领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弊害甚多”。为了防止这种倾向，“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①。

全会选举产生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呈玉章、谭平山、汪精卫、谭延闿、徐谦、孙科、顾孟余、陈公博、蒋介石等九人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宋庆龄、林祖涵、邓演达、陈友仁、宋子文、王法勤等六人为中央政治委员，连同常务委员一起，组成政治委员会。各部的任职是，吴玉章为代理组织部部长，邓演达为农民部部长，何香凝为妇女部部长，彭泽民为海外部部长，陈其瑗为商民部部长，顾孟余为宣传部部长，孙科

① 《国闻周报》第四卷 12 期，1927 年 4 月 3 日。

为青年部部长。

武汉国民政府也同时进行选举。国民政府委员有谭平山、吴玉章、汪精卫、宋庆龄、冯玉祥、谭延闿、程潜、唐生智、于右任、李宗仁、李济深、徐谦、孙科、陈友仁、彭泽民、宋子文、朱培德等二十八人。国民政府各部部长分别是：农政部部长谭平山，劳工部部长苏兆征，外交部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军事部部长谭延闿，交通部部长孙科，司法部部长徐谦。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在大革命高潮时期，在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提高党权运动中召开的。会议所通过的宣言和各项决议，是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的重大打击，支持了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进一步密切了国共关系，维护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是，这次会议仍然受到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三中全会选举当时还远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职务，并继续让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随即以总司令的名义调集嫡系部队至沪宁一带，在帝国主义和买办性的江浙财阀的直接指使和援助下，加紧准备反革命政变。

新成立的武汉国民政府，是广州国民政府的继续和发展，它吸收了共产党直接参加政权，武汉政府是国共联合的政权，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新的形式。

武汉政府（也包括由共产党人参加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前期，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作出了贡献。在武汉临时联席会议阶段，它除了大力支持工农运动外，还通过了二百六十多个决议案①，并以革命的手段处理了一批重大的内政、外交问题，如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统一财政，整理湖北金融，发行公债及国库券，没收军阀及党徒的财

①《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9日。

产，改善交通行政，恢复发展生产，改革文化教育，注意法制工作，领导提高党权运动等。在“四一二”政变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还领导了反蒋的斗争，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惩治土豪劣绅，反经济封锁以及反武装叛乱等。这些工作和斗争，主要依靠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特别是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密切合作取得的，这段国共合作的历史，在两党关系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资产阶级的相继叛变，在武汉政府后期，显然政权完全落入汪精卫集团手中，武汉政府发生了质的变化。

三、蒋介石集团的叛变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蒋介石在其迁都南昌的阴谋计划破产之后，便进一步地投靠帝国主义，积极部署清除共产党，预谋反革命政变，准备建立自己的反动政权。

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军进驻上海时，蒋介石就密令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国的口号。他一到上海，立即向帝国主义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①]。帝国主义则应许以其驻扎在上海的二万余军队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群众；同时又会同上海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送给蒋介石一千五百万元，作为他进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经费，并预定在大屠杀后，再送三千万元之巨款，作为蒋建立南京反革命政权的资本。以黄金荣、杜月笙为头子的反动帮会流氓势力，也慷慨答应听候蒋介石的调用。在取得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地痞流氓的支持以后，四月初，蒋介石先扫除上海外围的革命势力，调何应钦到南京，缴了卫戍南京的拥护武汉

① 《北华捷报》，1927 年 3 月 31 日。

政府的国民革命军三个团的枪械，解散了南京共产党支部，从四月一日开始，他同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古应芬等召开了一连串的秘密会议，商讨“清共”计划。四月二日，吴稚晖、张静江等八人在上海召开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吴稚晖提出所谓“举发中国共产党谋叛呈文”，诬称共产党已决定了“铲除国民党之步骤”，“现中国国民政府，已为俄煽动员鲍罗廷个人支配而有余”，要求将这一“十万急迫”之问题，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共产党委员及未附逆委员临时讨论”,进行‘非常之处置’。四月三日,蒋介石同刚回国的汪精卫及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吴稚晖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1、四月十五日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由汪精卫通知陈独秀，在开会之前，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2、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一概无效；3、由各军队、党部、民众团体、机关的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以予制裁；4、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反对政府的阴谋团体，不准存在。这是他们反革命政变的具体行动计划。他们决定四月十五日正式分共。接着，蒋介石纠集流氓、地痞组织‘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以反对上海总工会。他下令制止上海市政府的成立，指使吴稚晖、钮永建、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取代上海市党部，总揽上海的军事、政治、财政的权力。四月九日，邓泽如、黄绍竑、吴稚晖等又联名发表了所谓“护党救国”通电，攻击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大有背于本党治国之精神，极端毁灭本党组织之根本旨趣，减少群众对本党之坚固信仰”。同时，蒋介石公布了战时戒严条例十二条，严禁集会、罢工、游行。

蒋介石在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地痞流氓支持下，完成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以后，便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开始了大屠

杀。四月十二日，从租界内出动全付武装的流氓、特务，向闸北、南市、吴松、浦东等地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大批军队跟在后边，收缴纠察队的枪械。工人纠察队死伤三百多人。上海广大工人，奋起罢工、游行进行反抗，四月十三日上午，在宝山路又遭血洗，牺牲百人以上，伤者无数。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如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先后被杀害。十三日下午，白崇禧指挥军队查封上海总工会。十四日上午又封闭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和各群众团体。

继上海大屠杀后，他们又于四月十五日在广州进行了反革命的屠杀。

除上海、广州外，凡是蒋介石统治的地区，大都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进行了大屠杀。

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血泊中，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于四月十八日正式成立。南京反革命政权建立后，立即通过清党决议，提出首批被通辑的共产党各级领导人的名单，包括鲍罗廷、陈独秀等一百九十七人。五月七日成立以邓泽如为首的中央清党委员会。五月十日，中央清党委员会提出“清党条例”十一条。同时在军队、海外及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四川等省进行清党。

蒋介石南京政权，是个彻头彻尾的卖国政府。英美日积极争取蒋介石，斗争的结果，英美胜利，日本建立蒋——张联盟的计划破产。蒋政权成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

四、武汉国民政府的讨蒋决策。共产党人的讨蒋主张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激起了革命人民的无比愤怒，武汉政府和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大屠杀表示了强烈地反对和

声讨。

蒋介石叛变后，武汉政府马上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四月中旬下令革除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委任冯玉祥接替蒋介石的职务，并任命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为副总司令。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续国民革命，斥责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的罪行，并且发布了《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命令指出：“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命令宣布，蒋介石所统辖的第一集团军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方面军及总预备队，统归军事委员会指挥①。

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坚决拥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除党籍和拿办的决定。中共中央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是革命的叛徒。宣言揭露，蒋介石在“三二〇”政变以后，就代表国民党内的资产阶级与封建分子，依照他们阶级的利益去领导革命，但是“等到他不能够将整个的国民党变为封建资产阶级的反动工具时，他就与国民党宣战了”②。

四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余、谭平山、陈公博、吴玉章、邓演达、宋子文、程潜、朱培德、张发奎、宋庆龄、何香凝、林祖涵、王法勤、陈友仁、经亨颐、于树德、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毛泽东等四十人，联名发表

① 《国闻周报》第四卷17期。

② 《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向导》第194期，1927年5月出版。

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电文指出，蒋介石由反抗中央而进于自立中央，阴谋蓄之已久，特别自其抵沪以来“首与帝国主义妥协，不惜拾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之唾余，以反共产口号，博其欢心，更不惜屠杀民众，为其贽见之礼物，明知此种行为，必中央所不许，故不得不出于反抗中央之途”。电文说，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追随蒋介石从事反革命；一切革命分子，皆被以共产党或勾结共产党之名，除之务尽”。电文号召民众及全体国民党员，尤其是武装同志；“依靠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①。

黄埔军校学生和民众团体也纷纷通电讨蒋。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各期学生的讨蒋通电指出，蒋介石背叛三大政策，反抗中央，无所不用其极，敝校同人；“愿荷枪实弹，听中央趋策，作民众之前驱，誓溅热血，灭此朝食”②。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曾于十五日夜开秘密会议议决，电请武汉中央迅速讨伐蒋介石，并准备中央一旦下令讨伐，在粤立即响应，表示“本党部谨率所属武装党员，枕戈披甲，屏营待命，为政府与民众之前驱必除此凶残逆贼乃可”③。湖北农民协会在讨蒋通电中列举了蒋介石的十二大罪状，并决心“率领全省一百五十余万有组织的农民及全省农民，联合全国革命的同胞，与此獠决以死战，虽牺牲一切亦在所不惜”④。四月二十三日，武汉三十万群众在武昌举行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和示威游行，“打倒蒋介石”的标语，贴满了武汉三镇。

当时，武汉政府面对着北面张作霖和东面蒋介石两个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主攻方向是继续北伐打张，还是东征讨蒋，这是

①《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②《革命生活》月刊社《讨蒋特刊》，1927年4月23日。
③《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8日。
④《革命生活》月刊，1927年4月18日。

武汉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抉择。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内就有争论。在中央工作的瞿秋白主张东征讨蒋。一九二七年四月中旬在上海的周恩来、陈延年、罗亦农、赵世炎、李立三等联名向党中央发出一封意见书，也建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周恩来在意见书中分析了东征讨蒋的必要性，列举了蒋介石种种反革命行径，指出如不迅速讨蒋，“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既使武汉北伐，能直捣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亦未尝不可与国民政府成直接冲突”。因此，东征讨蒋是唯一正确的，“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意见书还进一步分析了讨蒋取胜的可能性。从总的实力分配看，宁汉分裂时，国民革命军主力部队有十二个军，其中有九个军表示服从武汉政府，有三个军驻在苏皖地区受蒋介石指挥。地方军阀投诚改编的杂牌军有十六个军，受蒋介石节制的有十多个军，它们的战斗力也很弱，又脚踏两只船，不能依靠他们作战。而蒋介石用来作战的只有一、九、七这三个主力军，其中李宗仁的七军属于桂系，因为蒋桂矛盾很深，能否坚决助蒋难予断定。所以，“蒋介石能直接使用的军队仅五个师”，其中第一师、第二师、第二十一师已死伤过半，“在南京者仅为三师、十四师、如何能抗东下之兵？”最后建议强调，讨蒋军事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名义、有负责人、有密函，方能使左派军官相信中央政府”①。

中共中央内部，多数人的意见不主张东下。蔡和森主张在立即实行土地革命等条件下进行北伐。张国焘、谭平山主张南征回广东，首先打李济深。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赞成鲍罗廷北伐

①周恩来：《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6、7 页，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的主张，其理由是：第一，蒋介石仍在高喊北伐，在部分群众中尚有欺骗作用；第二，东征会与帝国主义过早发生冲突；第三，如果东征讨蒋，张作霖会从后面来打武汉；第四，继续北伐可与冯玉祥会师，打通国际路线。最后，党中央否定了东征讨蒋的意见，决定先进行第二次北伐，打奉系张作霖，同冯玉祥会师，然后再回过头来打蒋介石。这种继续北伐的主张，符合了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和国民党许多将领希望同蒋介石妥协的心理，因此，最后在汉口南洋大楼连续举行几天的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上（国民党出席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余五人，共产党方面是鲍罗廷、罗易、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参加会议），决定先行北伐。四月十九日，武汉政府在武昌南湖再次誓师北伐。

二次北伐，尽管取得了战役上的一些胜利，但由于放弃了讨伐当时的主要敌人——蒋介石集团，使立足未稳的蒋介石得以站稳脚根，巩固了反革命政权，形成了全国的反共中心。同时，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武汉的封锁包围，策动叛乱，扰乱后方，使武汉政府陷于财政恐慌，政局不稳的困境，以至武汉革命形势恶化。

第三节　汪精卫集团的叛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一、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武汉地区的局势出现了复杂化的情况。

一方面，武汉政府所控制的湘鄂赣三省广大地区的革命运动还在继续高涨。在第二次北伐中，打败了奉军，占领了河南全境。

武汉的工人接管了反动资本家关闭的工厂，并建立了一支拥有五千人、三千支枪的工人纠察队。全国有组织的工人达到二百七十多万人。农民运动从减租减息，发展到摧毁地方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有的地方农民自动起来插标分田。农会组织也进一步扩大，两湖地区，在五月份农会会员达到七百多万。农民自卫军普遍建立起来，不仅有梭标，而且不少地方还夺取了地主团防的枪枝，在自卫军中成立了常备队。农民运动的兴起，镇压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长沙的几个大劣绅叶德辉、李佑文等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

另一方面，武汉地区的危机也逐渐表面化了。一些投机革命的反动军官本来就仇视工农运动，加之帝国主义的支持，蒋介石的策动，汪精卫的庇护，更助长了他们的叛变活动。

五月中旬，驻守在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武汉主力部队入豫作战之际，背叛武汉政府，与驻守在川东的第二十军军长杨森互相配合，直逼武汉。

杨森受蒋介石密令于五月五日由万县举兵东下，夏斗寅原是奉武汉政府命令，驻守宜昌防范杨森的，但当他得到杨森叛变的消息后，即召集旅团营长会议，准备船舶，秘密行动，响应杨森，并派遣船二十艘，协助杨森运输军队。其实，夏斗寅、杨森都是受蒋介石指挥的，蒋介石曾向东方记者供认：“夏斗寅之起而宣言反对共产，与杨森、刘湘同受余之命令”的①。五月十三日，夏斗寅发表反共通电，污蔑共产党“借口总理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民政治，扰乱我两湖”，指责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镇压土豪劣绅是“以法律赋予威权，为个人报恩报怨’②。十八日打到离武汉仅有四十公里的五里界、土地塘和纸坊一带。武汉形势非常紧张。武

①《晨报》，1927年5月21日。

②《国民党政府公报》1927年第1集上册。

汉政府任命叶挺为讨伐夏斗寅的前敌总指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率所部七十二、七十五两个团，及中央独立师第一团（武汉军校学生组成），驰往纸坊，相机进剿。师党代表恽代英，亲赴前线。五月二十日，击溃夏斗寅叛军，武汉转危为安。

继夏斗寅叛变之后，许克祥于五月二十一日在长沙叛变，因二十一日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又称马日事变。

许克祥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的团长，三十三团原驻湘乡、湘潭一带，何键与国民党右派、湖南省代主席张翼鹏串通一气，将许团调到长沙，准备发动军事政变。五月十七日，许克祥等反动军官开会，根据何键的指令，决定于二十一日在长沙叛变，并推举许克祥担任军事政变的指挥官。许克祥为搞政变制造借口，散布农民运动过火，工会侵犯革命军人家属的谎言，造谣说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即将袭击驻军。他们自己还秘密贴出“打倒三十五军”的标语，企图嫁祸于人。十九日晚，三十五军留守处部队开始在长沙公开挑衅，夺走电气工会工人纠察队枪支。五月二十日，许克祥派人把守邮电局。二十一日晚十一点左右，许克祥率领一千余人以白袖章、白符号为标记，以“土豪劣绅”为口令，分头袭击省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省、市党部，省党校，省特别法庭，省工运训练班，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等二十几处，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土豪劣绅，枪杀了一百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劫夺了武汉国民政府购买粮食的巨额现金，长沙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就是‘马日事变”。

五月二十四日，湖南反动派在长沙曾公祠内召开所谓各界联席会议,正式组成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解散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国民党省、市党部。会议推举唐生智、张

翼鹏、许克祥、王东原等十五人为委员，由许克祥、王东原等为主席团。会议宣布脱离武汉革命政府，“拥护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拥护蒋汪合作”，废止前省党部和省政府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及其他一切革命法令，通令恢复全省地方武装、团防局及都团组织，指令各地土豪劣绅摧毁农民协会和工会，指控共产党是“暴徒”，宣布肃清“暴动分子”。此后，许克祥更肆无忌惮地在长沙及其附近各县摧残革命团体，屠杀革命群众，至六月十日左右，湖南二、三十个县就有一万多人被杀害。

“马日事变”是继“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又一次严重打击。“马日事变”表明，尚隐藏在革命阵营之内的国民党右派汪精卫、何键配合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开始行动了，它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动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对“马日事变”，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了依赖国民政府和平调解的方针。当中共湖南省委委员郭亮、柳直荀等动员长沙附近的各县农军围攻长沙的时候，中共中央下达了撤退的命令。陈独秀唯恐进攻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企图依靠武汉国民政府用合法手段解决湖南问题。他同鲍罗廷与汪精卫一起组织国民党中央赴湘特别委员会（由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周鳌山、邓绍芬五人组成），赴湘调查。他们一面“查办”许克祥，一面查办农民运动“过火”，这种用合法手段“查办”反革命，用束缚自己手脚去感化反革命的作法，当然是无济于事。

六月四日，由陈独秀签署的，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致中国国民党的公开信，提出了解决“马日事变”的六点办法：“第一，国民政府明令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之委员会系反革命，并令军队联合革命的民众共同推翻之。第二，解散叛徒的委员会另委合法的省政府。第三，火速派兵讨伐叛乱，与唐

总指挥以派兵之权消平之。第四，取消叛徒窃据之省党部，另由国民党中央下令改选新省党部行使职权。第五，国民政府照令宣布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在湖南得享完全的自由。第六，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之发生。”① 从“马日事变”到六月四日，半个月时间过去了，中共中央还没有认清事态的发展，还不及时武装自己，对抗敌人，而坐此静待人家处理，不仅是徒托空言，也无异鱼游斧底了。

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最后破裂

汪精卫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从国外归来。他一到上海，就被蒋介石集团包围，从二日到五日，汪精卫与蒋介石、张静江、吴稚晖、古应芬等连续举行会议。蒋介石集团提出，马上发动政变以“分共”。汪精卫则出于自己没有实力，既怕蒋独吞果实，又怕失去武汉革命力量的支持，因此不同意立即“分共”。汪的最后主张是，由他赴汉口，“疏通”在汉中央委员于四月十五日到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讨论“反共”，解决“党事纠纷”。

汪精卫抵达武汉之后，耍了两面派的手腕。他高唱革命词句，大叫“革命的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开去”，革命群众一时看不清他的真面目，拥戴他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

随着武汉地区工农运动的发展和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尖锐化，汪精卫日益暴露出他的反动立场。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借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名义，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反对共产党，攻击和镇压工农运动。

四月底，武汉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要求下，组织了查办湘鄂

①《向导》第197期，1927年6月8日出版。

赣各省“过激”言论行动的特别委员会。五月八日，武汉国民政府通告工农团体，不准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不准有反对外人的行动。五月十三日，以保护寺院为名，下令禁止反对神权的活动。五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发出训令，禁止工会、农会逮捕反革命和没收其“逆产”。五月十九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充分保护工商业者之利益”,限制工人的‘过火要求”,禁止工人纠察队的活动的训令。五月二十日发出保护所谓公正绅耆和要求各级党部及政府制裁民众‘越轨’行动的训令。五月二十二日,汪精卫下令湘鄂各地制止赤化运动，声言要逮捕工会和农会的领导人或者驱逐出境。五月二十三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向湖北省总工会下达了一个特别通告，要总工会“整顿”工人的纪律，禁止工会对不法资本家实行逮捕、罚款。五月二十四日，武汉政府发出“保护军人田产令”，一律禁止土地革命，已没收的要“清查发还”。五月底，武汉政府下令解散湖北省内最大的黄岗和黄陂两个革命工作开展得很好的县农民协会。这些摧残工农运动，打击共产党的条例和法令的不断出笼，表明汪精卫从四月底开始，已在做“分共”的准备了。

继夏斗寅、许克祥叛变之后，六月五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又在江西公开打出叛旗，以“礼送”的方式驱逐共产党人和政治工作人员出江西，同时捣毁了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屠杀工农领袖。武汉政府内这些反动军官的叛变加深了武汉政府的危机，汪精卫加紧了叛卖革命的步伐。

六月初，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接到共产国际发来的“五月指示”电报以后，不向中共中央传达，竟首先告知汪精卫。汪精卫得到这个电报，如获至宝，以此作为公开叛变革命的借口。六月五日，他解除鲍罗廷国民政府最高顾问的职务。同时，召集武汉地区非共产党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开会，“商量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

并在唐生智，张发奎的部队中进行反共的宣传活动，令其“听候中央议决，努力奉行”①。

六月十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人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反共会议。会议决定：组织开封政治分会，以冯玉祥、于右任、徐谦、顾孟余等十一人为委员，以冯玉祥为主席，指导陕、甘、豫省政务；成立陕、甘、豫省政府，冯玉祥为河南省政府主席，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扩编为七个方面军，指挥河南前线的全部军事；所有在河南的北伐军一律撤回武汉，以镇压湖南、湖北的工农运动。汪精卫用扩大冯玉祥权力的办法，撤回了唐生智的部队，以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郑州会议后，冯玉祥派人联络蒋介石，决定在徐州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军事及党务等问题。六月十九日，冯玉祥赴徐州会见蒋介石，二十日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蒋介石、冯玉祥、胡汉民等。会议确定了“宁汉合作∞国共分家”的方针。会后蒋、冯联名通电，表示意见一致。二十一日，冯玉祥依会议之决定，电促汪精卫、谭延闿“速决大计”，宁汉双方“既异地而同心”，就应“通力而合作”②。奉行反革命政变。徐州会议是一次破坏国共合作的会议，为联合一切反革命力量实行“清党”反共铺平了道路。

郑州会议后，汪精卫回到武汉，积极进行叛变革命的活动。六月二十九日，驻武汉的反动军官何键，在汪精卫等人的授意下，发出了反共训令，宣布与共产党分裂，拘捕了共产党员，解散了工会、农会、工人纠察队、童子团等团体。唐生智借“处理湘事”为名回到长沙后，也公开反共。

革命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了。但是陈独秀并不觉悟，顽固地坚

①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1927 年 11 月 5 日。
②《冯玉祥致武汉汪谭等电》，《清党实录》。

持其右倾投降主义。六月二十八日，为陈独秀所把持的党中央，借口避免给反动军官以反共的口实，决定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六月三十日，陈独秀在鲍罗廷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支持下，又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一个关于国共合作的所谓十一条政纲，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这时，共产党内许多同志从血的教训中逐渐认识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危害。同时，共产国际又有新的指示到来，决定调回鲍罗廷，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停止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在中央的领导工作。这次改组虽然还谈不上对右倾投降主义的纠正，但开始改变了陈独秀等人统治中共中央的局面，改变了向汪精卫反动集团的一味妥协退让的政策。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政局的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并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退出政府。宣言宣告，中国共产党人要“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继续反对军阀的斗争”；“永远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宣言表示：“中国共产党决意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只要他们能够诚实的、坚决的根据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奋斗”①。

七月十四日晚，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的计划。十五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即“分共会议”，决定：第一，在一个月内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讨论严厉制裁共产党问题。第二，在四中全会召开前，中央党部应制裁共产党一切违反本党主义与政策言论及行动。第三，派要员去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十六日，又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由武汉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报告了《容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1927 年 7 月 13 日，《向导》第 201 期，1927 年 7 月 18 日出版。

共政策之最后经过》，伪释“分共”的“理由”，掩盖反革命面目。十九日，武汉国民党中央训令军事委员会在军队中“清共”。国民政府各部也纷纷发出通告、训令、布告，取缔共产党和一切革命活动。随后，反动军队封闭了一切工会、农会和革命团体，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大规模地逮捕，疯狂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仅武汉，数日之内被杀者即达千人。轰轰烈烈地大革命由于汪精卫集团的叛变而最后失败了。

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过程中可以看出，国共两党的合作又破裂的关系，对中国政局有着重大影响。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实行合作，加强了革命力量，大大加速了革命的步伐，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也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破坏了国共合作，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这段历史告诉人们，一个改组后获得新的生命的革命的国民党，没有经得住国民党右派的蛀蚀，蒋介石、汪精卫篡夺了它的领导权，排斥打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推行一套反对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纲领和政策，坚持亲帝国主义的路线，逐渐地把国民党演变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把国民党拉向倒退。

这段历史还告诉人们，具有伟大革命精神但尚幼稚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问题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特别是在这个时期的后期，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不敢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活动进行有力地揭露和斗争，放弃了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不敢发动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放弃了无产阶级最广大的同盟军；不敢发展工农武装，放弃了对武装斗争的指挥权。因此，中国共

产党尽管在大革命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没有战胜革命队伍中的反动势力，没有抵挡住强大敌人的联合攻击，革命终归夭折，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以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财富，它帮助了中国共产党逐步地走上了成熟的阶段。

第 七 章

共产党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
委员会建立

第一节　国民党的蜕变及其反革命政权的建立

一、宁汉合流与特别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以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和武汉国民党政府都走上反革命道路。宁汉合流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分裂剥削政策以及各派反动势力利害冲突，永远也不能作到真正统一。因此，汪精卫集团和蒋介石集团有合流的契机，仍存在着争夺成为国民党正统的尖锐斗争。汪精卫集团一面“分共”一面以唐生智为总司令东征讨蒋。“驱共倒蒋”口号在武汉流行一时。汪精卫还暗示以蒋介石下台为宁汉合作的条件，以实现夺取国民党大权的野心。当时除宁汉两个对立集团之外，还有占据东北和华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割据山西的阎锡山，占据洛阳的冯玉祥，盘踞两广的桂系、粤系势力李济深、黄绍 竑。桂系另一部分李宗仁、白崇禧则在南京与蒋介石合作。各帝国主义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坚持不同主张。日本帝国

主义希望蒋介石集团联合阎锡山、张作霖，以进攻汪精卫和冯玉祥；英美帝国主义希望宁汉联合以进攻张作霖。蒋介石认为汪精卫是他争夺国民党最高统治权的强敌，主张联合张作霖进攻武汉，消灭汪精卫势力，铲除汪的政治影响，实现独占国民党正统地位。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主张联合汪精卫以进攻奉系，倾向英美主张。于是，七月底，冯玉祥致电宁汉双方：先解决北京，再及党内争执，并提议召集开封会议讨论党务。武汉汪精卫复电表示，如有和平统一方法，战争可不必有。并表示可以迁都南京。李、白也电请武汉汪精卫到南京开一中央全会。八月十日，汉方汪精卫、谭延闿、陈公博、孙科等复电，表示愿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消灭国民党内分崩现象。这样，蒋介石独占国民党大权的企图由于内外压力难于实现，又不愿意同汪精卫集团平分秋色，只得别图新路。蒋介石凭其政治经验，认识到要独揽国民党最高权力，并能使其统治地位得到巩固，必须取得帝国主义的有力支持。于是，他于八月十二日离开南京到上海，十三日通电辞职，以退为进，伺机卷土重来。蒋介石下野促进了宁汉合流的实现。南京方面胡汉民表示，对武汉方面去共已有充分谅解，并希望武汉方面到南京“共同柄政”，武汉方面也复电赞同。八月二十五日，武汉政府宣布迁都南京，宁汉合流正式实现。国民党在组织形式上又归于统一。

汪精卫、陈公博等一向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正统”自居，到南京以后极力运用政治方法统一国民党各方势力，进行政治分赃。由于蒋介石下野，胡汉民避居上海，当时主持南京政府政治军事大权的只有李宗仁和白崇禧。李建议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必须邀请宁方元老胡汉民和吴稚晖等参加。汪精卫为实现不动兵戈独据国民党最高权力，九月八日亲自到上海邀请胡汉民和吴稚晖筹组并参加四中全会。胡汉民和吴稚晖以反共“先进”居功，反

对汪精卫以‘正统’自居,借口武汉清共无诚意,拒绝接见。西山会议派更以反共先进之先进自居，必须重新占有国民党的重要席位。汪精卫操纵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计划落了空,不得不声称‘防共过迟’;‘自请处分’。西山会议派则乘机提议召开特别会议。九月间，宁、汉、沪三派国民党分子取得妥协，十五日三方代表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每方推出六人成立特别委员会,并宣布原来三派中央不再行使职权,接着又重新改组‘国民政府’,实权落在西山会议派谢持、邹鲁等人手中。宁汉合流被特别委员会代替了。

特别委员会成立由于分赃不均，仍然没有解决反革命内部矛盾。汪精卫虽原来同意成立特别委员会的倡议，但后来看大权旁落也未参加，武汉方面只由谭延闿、孙科等参加了。顾孟余等重回武汉,策动唐生智打出‘护党’的旗帜,成立武汉政治分会。占据湘、鄂、皖三省与南京抗衡。十月，唐生智被李宗仁所败，放弃了两湖，宣布下野。汪派遭此打击以后，其骨干陈公博等陆续到广州。决定在广州成立中央执监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同南京对抗。此时汪派中央执监委员会被称为‘粤方委员’。他们极力拉拢粤系军阀张发奎、黄琪翔。粤系军阀便积极主张汪精卫夺取国民党中央的权力，而桂系军阀则主张蒋介石复辟，实行所谓“蒋汪合作”。于是汪派便企图依靠粤系军阀势力,消灭桂系李济深、黄绍竑的力量，统一两广，出现了粤桂矛盾和宁粤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

在宁汉战争期间，北方阎锡山与奉系军阀战争爆发，奉系的直鲁军和冯玉祥部也发生了战争。阎、冯都希望尽快结束国民党内纷争，并希望蒋介石重新上台，以便联合起来攻打奉系。国内出现了蒋介石卷土重来的有利形势。十一月间，蒋介石在取得日本谅解和美国支持的许诺以后，重新回到上海。蒋介石回国后发

表演说,极力散布‘汪蒋合作’的烟幕,迎合汪派统一两广的野心,极力鼓动汪以赶走桂系李济深、黄绍竑作为合作条件。汪派在蒋的鼓动下,乘李济深同汪精卫赴上海参加筹备二届四中全会之机,于十一月十七日凌晨,由张发奎、黄琪翔以‘护党’的名义发动了粤桂战争,将驻广州的桂军和李济深的留守部队缴械,独占了广州。十二月二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下令讨伐张发奎、黄琪翔。蒋介石利用官僚政客,借口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攻击汪精卫集团‘通共”,指控汪精卫、陈公博等‘纵袒弄兵,酿成共变”,‘危害民国破坏革命’①。由于蒋介石策划的反汪攻势,迫使汪精卫集团不得不提出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并愿将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之事交由蒋介石办理。至此不仅特别委员会寿终正寝,汪精卫也被迫流亡国外。

二、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确立及其反革命政策的实施

各帝国主义支持着各派军阀,各派军阀为他们的主子和自己利益进行斗争,是近代中国政治基本特点之一。北洋军阀势力土崩瓦解之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都需要物色新的代理人,建立新的政权,实行新的统治。以投机起家的蒋介石,为实现统治中国的野心,急需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一九二七年九月,他偕张群等到日本以后,住在日本大特务头子头山满家中,表示和日本帝国主义‘亲如一家”。头山满也对外界宣扬蒋介石无论如何是与日本一致的。蒋介石还以不危害日本在中国东北特殊利益的保证换取日本的谅解。同时蒋介石还与美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蒋介石由日本回国以后,通过美国大买办宋氏家族和美国建立了

①《中央监察委员会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函》,《汪、陈、甘、顾出席问题》。

密切关系。他还通过与宋美龄的政治婚姻，取得了江浙财团的支持，并以参加基督教会，表示对美国主子的忠心。这样，蒋介石就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最理想的代理人。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到七日，在蒋介石操纵下，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了戴季陶起草的四中全会宣言，随心所欲地阐述了国民党所谓‘三民主义革命’的内政、教育和经济生活建设之方针。会议通过了陈果夫、丁惟芬、蒋介石等《中央党部改组案》，确定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下，设立组织、宣传、训练三部和民众训练委员会。会议决定继续保留政治会议，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处设立政治分会，按区域专理政治不兼管党务。会议还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与监督’，政府委员人选由中央委员会推举。会议通过的《整理各地党务决议案》，规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派七至九人，组织‘党务指导委员会’接管地方党部权力，领导地方党部整顿及党员登记事项。会议选举蒋介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政治会议主席，加强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会议宣言极力鼓吹三民主义不仅是中国国民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且是一切人类和平与进步‘绝不能背离的原则’，攻击共产主义运动是‘民族独立运动之大敌’。会议确定对内实行‘法制主义’，对人民实行统治。

四中全会是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一次反共反革命的会议，它全面篡改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抛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确定国民党反革命的理论纲领，为建立法西斯的蒋家王朝作了舆论和组织准备。

四中全会以后，蒋介石致力于集中军权，吞并军阀，完成‘北伐’。会议刚结束，蒋就赴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将第一路军改为第一集团军，自兼总司令。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蒋赴开封将国

民革命联军改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北方国民革命军改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任总司令。两湖地区部队改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任总司令。这样，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蒋、冯、阎、桂四派新军阀取得了暂时的妥协。四月间，这些新军阀开始了一场对旧军阀争夺地盘的“北伐”战争。第一集团军进攻鲁南，击败了直鲁军阀张宗昌，攻克济宁，与第二集团军会师于黄河南岸。第三集团军东攻石家庄，西取归绥，北出雁门关占大同。第四集团军沿京汉路北上，占领保定。国民党新军阀的军队迅速地逼近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六月三日放弃北京，退出关外，专车行至沈阳附近皇姑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事先埋伏的炸弹炸成重伤，不久毙命。在河北滦东一带的张宗昌、孙传芳的残部，不久也被国民党新军阀所消灭。

日本帝国主义妄想乘混乱之机扶植清皇族溥伟等复辟势力成立“满蒙帝国”，并以武力威胁国民党新军阀的军事进攻。于是，国民党新军阀改用和平方法使东北“易帜”。在美帝国主义斡旋下，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发布“易帜”通电，东北三省和热河完全隶属南京国民政府。至此，蒋介石联合新军阀完成了“北伐”，实现反革命政权形式上的‘统一”。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训政纲领》,并于十月四日公布。纲领规定 在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修改及解释国民政府组织法。

在公布《训政纲领》的同时，国民党中常会又公布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织之”。国民政府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监督下，“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十月八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选出国民

政府委员、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院长，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李济深为参谋长。从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控制了国家政权，建立起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

蒋介石为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血腥统治披上“合法”外衣，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国民会议组织法》。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召开了蒋介石御用的“国民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共八章八十九条，将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和《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的民主内容全部否定，而塞进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精神。如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国体“永为统一共和国”以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代表光明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而统一于蒋介石一人独裁。第二章“人民权利与义务”，虽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自由”，但又有“非依法律不得停止和限制”的说明，其言尤未尽；“依法”即可“停止和限制”，而国民党的法完全是蒋介石的囊中之物，只要稍有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马上可以罗织罪名“依法”加以限制和镇压，根本违背孙中山先生“主权在民”的原则。第三章“训政纲领”根本没有人民参政的规定。第四章“国计民生”根本没有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第七章“政府之组织”其权利组织程序：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五院——各部。国民政府主席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名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及副院长，国民政府主席请命于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蒋介石是国民政府主席，又是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人。这样，蒋介石就是一个自请自命的独裁者。下级对上司是蒋介石请命蒋介石，上司对下级是蒋介石命令蒋介石。蒋介石是国民党，又是

“国民政府”。国家一切大政方针由国民党中央制定，也就是由蒋介石制定。这就是国民党统治全国人民的法律根据。即所谓党国“法统”。蒋介石就“依法”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也是最后的独裁者。这个政权是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其阶级实质“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①

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与北洋军阀比较，其主要表现为这个新军阀手中握有国民党这个组织形式，这个政党是孙中山创建的，并改组成为几个革命阶级的联盟组织，曾经高举过民主革命的旗帜。蒋介石等一伙新军阀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改变了国民党的性质。但是，仍利用国民党曾有的革命历史欺骗群众和中间阶级，为蒋介石反革命政治服务，成为他实行独裁统治的工具。蒋介石则利用投机革命的历史，作为大资产阶级和地主豪绅阶级的代表，在中国建立起蒋家王朝。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极力推行投降卖国的外交政策，首先表现在对“南京事件”和“济南惨案”的处理上。一九二八年三月，南京国民政府竟向英美帝国主义表示歉意，赔偿损失。甚至下令通缉在南京领导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共产党员林伯渠，以此向帝国主义表示忠诚。

继南京事件外交解决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又同日本就济南惨案进行谈判，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达成协议。中国政府承诺以全力保护在华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承担保护屠杀中国人民的侵略者的责任，换取帝国主义的谅解，实现“视此不快之感情，已成过去，以期两国邦交，益臻敦厚”②。对中国外交官和数千人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7 页， 1964 年版。

② 《日外相芳泽谦吉与中国外长王正廷互换照会》，《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 9 号。

民惨遭杀害，却只字未提。南京国民政府就是以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帝国主义欢心与支持。

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独立自主的要求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为欺骗人民也不能不提出一些主权国家所应有之要求，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依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发表修约宣言，正式照会各国，拟以收回关税自主权和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重订新约运动。其原则，（一）中外条约已满期者，当然废除，另订新约；（二）其尚未满期者，则以相当手续解除，而重订之。（三）其旧约业已满期而新约尚未订者，应由国民政府另订适当之临时办法。七月二十五日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接着又与德、挪、荷、比、意、葡、西、英、法等国签订友好通商条约或新关税条约。这些条约虽标明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又都有订约国均“应与其他国享受之待遇毫无区别”的规定，或签约双方都享互惠待遇。十二月二十日签订的《中英关税条约》的附件中规定：中国课英国货的最高税率，不得超过一九二五年关税会议所订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附加税。其他国家依最惠国条款也照此办理。这样，南京政府实际仍然没有自订关税税率和管理海关行政的权力。帝国主义国家所谓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只是一句空话。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的关税自主权也是自欺欺人之谈。

至于所谓领事裁判权的废除，更是有名无实。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南京政府向英、美、法、荷兰、挪威、巴西等国分别发出照会，要求各国废除在华的领事裁判权。各国只空言同意，实际是一致拒绝。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定自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起，凡侨居中国之外国人所享领事裁判权一律废除。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由于各国一再反对，根本无法实行。这样，废除领事

裁判权毫无成效。

南京国民政府依附于帝国主义，奉行投降卖国的对外政策，对内则采取残酷高压手段，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国民党对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一方面是实行严厉的白色恐怖，解散其群众组织。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国民党政府淞沪司令部下令严禁罢工运动，违者军法从事。汉口桂系军阀派兵搜查苏联领事馆、大肆逮捕共产党人。一九二八年一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下令取缔抗租罢工等群众运动。广州反动当局下令取缔工会组织。二月间，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制止共产党阴谋案》，确定凡经审查确定为“共产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均应积极铲除”。三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刑法》,规定‘意图颠覆政府､僭窃土地或紊乱国宪而实行暴动者”，要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徒刑。八月，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民众运动案》，规定组织任何民众团体“必须受党部的指导和政府的监督”。这些法令和政策的实施，把大革命高潮中人民群众争得的民主权利完全剥夺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群众实行疯狂的大屠杀，仅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就有三十三万七千多人惨遭杀害。到一九三二年前被屠杀者达百万以上。共产党许多优秀干部，如陈延年、赵世炎、恽代英、罗亦农、彭湃、向警予等，都在这期间牺牲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使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摧残。另一方面，散布改良主义幻想，进行欺骗宣传。一九二八年六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劳资争议处理法》。一九二九年九月,公布《工会法》,十二月公布《工厂法》。一九三〇年六月公布《土地法》。这些法律法令也有冠冕堂皇的饰词，如《工厂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童工不得超过八小时，最低工资应以当地工人生活状况为标准等。但根本不予实行，只是一纸空文。这些法律法令都是维护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法律依据，完全剥夺了人民群众的任

何权利，其罪恶目的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革命。

蒋介石法西斯独裁政权建立以后，不仅依靠政治军事力量对人民实行残酷统治疯狂镇压，而且还勾结农村封建豪绅阶级，聚敛财富，发展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本，垄断全国的经济命脉，成为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一九二八年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决议和《训政时期财政设施纲领》都具体规定：划分国地收支统一财务行政，改组财政组织，编订财政法规，更新税则，整理国债，厘定军政费用，厉行预决算，确定银行制度，保持国库独立等。但是，南京国民政府除改厘金为统税外，其他实质性改革一项也没有。

为进行内战，国民党政府把财政收入和公债绝大部分用来购买军火。四大家族又是买办军火商人。四大家族在残杀人民的内战中，横征暴敛，搜刮军费，滥发公债，建立起金融垄断，进而垄断工商业。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共同压迫下，日益破产。广大工农群众所遭苦难尤为深重，不得不在死亡线上挣扎。南京国民政府的‘ 德政 ”,就是残酷地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榨取人民血汗。

第二节　国民党的分裂及其斗争

一、国民党民主派的反蒋斗争

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以后，抛弃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和三民主义,将革命的国民党变成了反革命的政党,成为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工具。蒋介石等倒转历史车轮，不仅根本违背了广大民众的革命愿望，也违背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意愿。这样，势必引起国民党的分化。以宋庆龄为代表的一部

分人，坚信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始终拥护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和政策，继续高举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大旗，坚持革命斗争，形成了国民党民主派。

汪精卫把持的武汉国民党叛变革命前夕，宋庆龄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严厉谴责蒋介石、汪精卫之流违背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她严正声明：“我只有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她宣布退出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同孙中山的叛徒公开决裂。最后她满怀信心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八月底，宋庆龄怀着革命必然会胜利的坚定信念，去苏联。临行前她在上海发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重申仍然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订的三大政策”。她称颂“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苏联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壮大。”“国民党如能和这两种伟大的革命力量建立正确的关系，就会大大的帮助革命，使中国获得国家的独立”。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才使国民党在广东取得惊人政绩和北伐的伟大胜利，使“国民党在中国历来只有失败和耻辱的国际舞台上还获得一些值得纪念的成就”。她义正词严地谴责蒋介石、汪精卫之流违背三大政策，杀害革命者，已经和北洋军阀“不相上下”，表示“我要亲自到莫斯科去说明这一点”，她充满激情地号召：“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们必须设法拯救那些真正的国民党，使它不至于堕落成为那些以阴谋与叛变得逞一时的新督军府的附

庸 ”。宋庆龄到达苏联后不仅实地考察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表明了忠于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民主派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向全世界人民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革命的罪行，而且积极参与国际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运动。一九二九年五月，宋庆龄经柏林回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先生的国葬仪式。为戳穿蒋介石的政治阴谋，她在回国前发表声明说：“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 ”，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与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势不两立的立场。仪式结束后，她又摆脱了蒋介石集团的欺骗和束缚，赴欧洲旅行和从事国际反帝和保卫和平运动。“ 九一八 ”事变发生后，宋庆龄回国，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决地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积极投身于伟大抗日民族革命战争。

宋庆龄以坚定革命信念，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继续高举着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大旗，成为国民党民主派的杰出代表。她联合其他反对蒋、汪叛徒集团的民主战士，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宋庆龄成为国民党民主派反蒋斗争的一面光辉夺目的旗帜。

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另一代表人物。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斗争，先后曾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及教育长等职。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武汉政府时期，邓演达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曾与毛泽东同志一起举办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邓演达笃信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积极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身体力行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斗争。一九二七年初，蒋介石抗拒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擅自迁都南昌，和当时的武汉革命中心相对抗。邓演达敏锐地识破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

动企图，发表著名论文《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指出：革命的忠实同志同蒋介石的斗争，“是封建与民主之争，是革命与妥协之争，是成功与失败之争”。他要求“拿党的纪律作制裁，拿党的要求作标准，去统一军事的指挥，统一军事的行政”①，同蒋介石的分裂行径作坚决斗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邓演达极力主张讨伐蒋介石，以拯救革命，并亲自参加与领导武汉掀起的反蒋斗争高潮。六月，当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酝酿“清党”时，邓演达二十九日毅然辞去所任国民党党政军各项职务。在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的险恶条件下，他不为外力所屈，不为地位、权势和财富所动摇，继续为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实现而奋斗。六月底，邓演达化装成检查电线的工人，沿着京汉铁路步行离开武汉到郑州，后又经西安转赴西伯利亚，最后到达莫斯科。他在出国前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一封告别信——《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申明：“总理的三民主义是我们革命的张本，照着总理的三民主义做去，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农工群众的拥护，可以完成国民革命”。他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曲解和背叛三民主义，屠杀工农群众，摈斥革命分子的罪行。尖锐指出：这些倒行逆施，“不独党的革命意义和权威消灭，而且必然招致反革命的结果”。他重申“革命是我们的职业，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是我们的立场”，表达了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念。

邓演达在国外期间从未间断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他认为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领袖背叛革命，是革命领导机关的罪恶。要继续进行国民革命，为工农群众的解放而战斗，必须否定被蒋介石、汪精卫所把持的领导机关，建立一个真正革命、代表农工利益的指挥机构。十月，他和正在莫斯科的宋庆龄、陈友仁

① 《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

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为了不中断中国革命，有必要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关——临时行动委员会。其任务在于揭露南京、武汉的国民党“中央”的罪行，迅即筹备召集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选出临时中央委员会，以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根据这一精神，由邓演达起草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在莫斯科发表。《宣言》严肃谴责蒋介石和汪精卫“阴怀叵测，借名行私”，背叛革命。他们虽然打着三民主义旗号，“实已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他宣告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历史使命，是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指导下，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把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完全实现。

邓演达先后到欧洲和亚洲十几个国家进行访问和政治考察，了解各国的革命形势、政治制度，研究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办法。一九三〇年五月，邓演达在回国前，发表声明说“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的且又残酷的。”“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①] 他不愧为早置生死于度外的坚定的国民党民主派革命家。

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何香凝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决不跟孙中山的叛徒合作共事。她为表示决不与独夫民贼蒋介石为伍，拒绝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时的“证婚人”，并拒绝出席他们的婚礼。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时，何香凝明确表示：联共是孙中山先生和廖仲恺先生主张，“分共”是背叛孙中山和廖仲恺的主张，决不赞成。当叛徒陈公博煽惑说，

①宋庆龄：《纪念邓演达》，《宋庆龄选集》，第153页，中华书局印行。

若不“分共”恐怕大家都要跟共产党跳水的。何香凝义正词严地说：“跟共产党跳水我也愿意’①，决不背叛孙中山先生革命主张。她毅然辞去国民党内及政府中各项职务，回到广州创办仲恺农工学校，“思树立解放劳动群众运动之基础’②，并在一九二八年赴菲律宾和南洋群岛，以卖画为该校筹集经费。后来，她又离开广州移居国外，以示决不和蒋介石、汪精卫之辈同流合污。“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于十二月从国外回到上海，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这些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组织，但信仰一致，主张相同，成为没有固定组织形式的国民党民主派。他们笃信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坚定民族民主革命立场，以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高度的献身精神，为中国革命奔走，呼号，不愧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坚强战士。

二、国民党改组派

国民党自“清党”以后，地主、资产阶级政客和党棍打着国民党旗号结党营私，造成国民党派系丛生，小组织林立。如南京派、广西派、西山派、胡汉民派、冯玉祥派、阎锡山派、政学系派、安福系派等。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二八年夏，为着摧残和镇压革命运动，曾结成某种程度的反革命统一战线。但随着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建立、美帝国主义与英日帝国主义矛盾的扩大，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日益扩大。国民党改组派的出现就是国民党内权利竞争和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蒋介石利用粤桂战争施展权术，既搞垮了“特别委员会”，又打击了汪精卫。一九二八年二月，蒋介石把持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再次发动反对汪精卫派的攻势。会议根据蒋介石、丁惟芬、陈果夫等人提案，通过

①陈公博：《苦笑录》第96页。

②《民国人物传》第二卷第72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整理各地党务决议案》，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这样，不仅把汪派完全排挤于四中全会之外，甚至有的连党籍都难于保留。会议选蒋介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建立起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独裁统治。这是汪派不能容忍的。

汪派骨干分子陈公博、顾孟余、王乐平、潘云超、朱霁青等秘密潜入上海后，以法租界为踞点，利用一部分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彷徨苦闷的青年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继续打着汪精卫旗帜，策划反蒋活动，以图东山再起。陈公博等首先办起《革命评论》，发表一系列反对独裁、鼓吹改组国民党的文章。同时创办大陆大学，为国民党改组派成立作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一九二八年夏，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王乐平等在上海集会，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一九二九年三月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央设总部，各省市及海外设支部，县区设分部，基层设小组。总部设有总务、组织、宣传三个部门。总务部由王法勤、潘云超负责；组织由王乐平、朱霁青负责；宣传由顾孟余、陈公博负责。决定由顾孟余主办《前进》杂志，作为改组派的机关刊物。以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中汪派委员组成全国临时领导机构。汪精卫虽未参加大会，但改组派骨干分子与汪根深蒂固的历史联系，仍奉汪为实际领袖，汪也默认。

改组派全国组织成立后，立即派人赴各省市利用国民党原有地方组织发展势力。很快地在南京、北平、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和江苏、安徽、浙江、湖南、江西、广东、四川、河南、山东、山西、绥远、辽宁、甘肃等省成立了国民党改组派支部；海外法国、日本、越南、新加坡及香港都设有支部。仅南京支部所属就近七十个小组，人数最多达五百多人。最盛时期全国成员达万人以上。

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纲领有以下内容：

（一）宣称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继承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努力改组运动，务期重新建设能担负实现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①；强化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实行“党的民主化与民众化”②；加强集权制。实现“以党治国、以党建国”③。（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建设民生主义国家，努力扫除封建势力，抑制资本主义，实现经济平等。（三）“恢复农工政策”，“代表农工小市民的利益”，“确定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④。（四）提高工农民众政治地位，改善工农民众经济生活；“扶助民众行使政权”⑤。实行“农村的自治，确定下层的民主制度”，“组织农村的合作事业”，“健全农民协会的组织”，“执行百分之二十五的减租”，允许工人“建立工会和地方的合作事业”，“促进工人的红利制”，对商民实行“奖励商人的投资”，“保护和奖励私人资本”⑥。（五）坚持反共立场，视共产党为不共戴天的“恶化势力”，“皆应努力扫除之”⑦。他们对共产党具体政策是“对其团体尽量反对，并严厉制止其活动”；“对其主义和政策尽量指摘与批评；对其份子，在可能范围内，予以自新，使其脱离共产党之组织”⑧。（六）反对帝国主义和第三国际。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为保障殖民地之故，决然妨害中国国

①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辑六册。

② 存统：《党的民主化与群众化》，《革命评论》第十二期。

③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辑六册。

④ 肖淑宇：《打到北京以后(三续)》，《革命评论》第六期。

⑤ 《汪精卫等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辑第六册。

⑥ 陈公博：《今后的国民党》，《革命评论》第一期。

⑦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辑六册。

⑧ 陈公博《党的改组原则》，《革命评论》第十期。

民革命，第三国际为利用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之故，也决然妨害中国国民革命”①。因此，反帝是国民党改组派的“坚强纲领”②，为使中国革命成为“一切被压迫民族解放之先锋”③，使国民党承担起“领导东方民族的重大使命”④，必须组织一个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东方国际”或称“第四国际”，使三民主义扩大为国际的主义，使国民党成为世界革命的霸主。

国民党改组派是大革命失败后，大动荡、大分化历史条件的产物。成分极其复杂，有国民党官僚和失意政客；有在革命低潮中脱离革命的意志薄弱者；还有既害怕共产党土地革命又不满意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统治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被欺骗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这些人参加改组派地位和政治态度不同，主张也有区别。归纳起来，可以把国民党改组派分为三部分：一是汪精卫、陈公博等国民党官僚政客，他们拉起国民党改组派组织，成为改组派的领导核心。二是汪陈等拉拢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他们随陈公博、顾孟余等办刊物发议论，成为改组派的骨干分子，有的参与改组派的领导集团。三是被欺骗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青年。前两部分人可谓改组派上层，后一部分人可谓下层。

汪精卫、陈公博等国民党官僚政客叛变革命以后，虽然仍以“左派”自居，但本质已经与蒋介石一样，成为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的历史罪人。国民党内争权夺利斗争中的失利，迫使他们结成国民党在野派反蒋政治集团。他们凭着反动政治嗅觉观察政治风云，抓住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改组的巨大影响，举起三民主义和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的旗帜，倡导重新改组国民党。

①②③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辑六册。

④陈公博：《今后的国民党》，《革命评论》第一期。

他们主观愿望是以国民党改组派的组织作为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的工具。因此，他们攻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抨击西山会议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等老朽腐化势力与蒋介石的勾结，要求掌握国民党中央权力。

一部分被拉拢的资产阶级分子，迷信资产阶级民主，响往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的思想有一定代表性和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对改组派的政治主张有一定影响，并使某些主张带有一定民主倾向、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进行政治改革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但这些主张往往表现为先天软弱和自相矛盾。他们一面标榜继承总理全部遗教，又曲解三民主义，否认三大政策；既反对军阀割据，又依靠军阀势力，进行军事投机；既主张恢复民众运动，又仅限于使工农群众成为资产阶级的追随者，甚至屠杀工农群众；有些减轻小资产阶级负担的主张，但也只是一些空话。

国民党改组派基层组织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青年为主。在大革命时期，他们中许多人参加了反帝反封的国民革命，但表现动摇和软弱。在大革命高潮中，他们害怕工农革命胜利，怕共产党，怕流血牺牲，有的脱离革命，有的消极观望。大革命失败后，他们不满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又没有勇气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处于愤激和徘徊之中。当《革命评论》、《前进》杂志宣传改组派主张时，他们欢欣鼓舞，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派组织，成为改组派领袖驾驭的工具。当改组派领袖们借改组之名，行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的真面目暴露以后，他们有的解散基层组织，有的悄然离开改组派。

国民党改组派领导权操纵在国民党官僚政客汪精卫及其少数亲信手中。他们的真正意图是借改组之名，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

的统治权。国民党改组派，实际上是代表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蒋在野派。

国民党改组派成立后，没搞什么全国统一性的活动，只是地方组织搞些反蒋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四日国民党改组派南京市党部领导的反圈定三全大会代表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八月，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定实行训政，撤销广州、北平、武汉等地政治分会，并定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举行国民党三全大会。为使会议贯彻蒋介石的意图，确定只有南京、上海、广州、广东等三个特别市党部和一个省党部可选举产生代表，其他省区及军队党部代表均为指派和圈定。总计三百六十名代表中选举产生的只有八十七人，占代表总数百分之二十；指派圈定的二百七十九人，占百分之八十。这就引起了广大国民党员的不满。汪精卫等乘时发表关于最近党务问题政治宣言，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南京市国民党员纷纷要求市党部召集党员代表开会讨论。三月十四日，市党部负责人迫于压力，在没有准备情况下就召开了全市党员代表会。国民党改组派代表操纵了会议，掀起一个反对圈定三全大会代表运动。会场内外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提出“ 反对独裁 ”“ 反对圈定和指派代表 ”。蒋介石派CC分子和宪兵大打出手，驱散了会议。国民党中常会决议解散南京市代表大会。南京国民党改组派在蒋介石高压下遭到了严重摧残。

国民党三全大会以后，蒋、桂、冯、阎四派军阀斗争日益尖锐，国民党改组派便在反蒋派军阀之间奔走联络，企图利用反蒋各派发展势力。一九二九年冬，粤军张发奎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通电拥汪反蒋,自称“ 护党救国军 ”,举兵向广州进攻。在改组派联络下,驻在郑州的唐生智和驻在浦口的石友三也参加了“ 护党救国军 ”,宣布反蒋拥汪。于是京沪一带改组派活跃起来,江苏

改组派发动了溧阳暴动，南京改组派也拟定组织暴动响应。由中央军校一个改组派航空教官驾驶教练飞机，准备在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时，炸毁中央党部会议厅，造成混乱，乘机暴动。后因张桂军失利和气候条件不利于飞机起飞，因而使这次暴动计划未及执行就破产了。这时，蒋派何应钦入粤与陈济棠联合击退张桂“护党救国军”，调刘峙北上攻打唐生智，又拉拢阎锡山、韩复榘加入反唐阵营。一九三〇年一月，唐生智溃败，通电下野，石友三重新投降蒋介石。国民党改组派反蒋军事投机宣告失败。

一九三〇年春，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军事联盟业已形成。四月，爆发了蒋、冯、阎、桂之间的大规模战争。阎、冯、桂为利用汪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扩大反蒋政治力量，极力拉拢国民党改组派参加反蒋大联合。汪精卫为了急于夺取党权取蒋而代之，也愿意参加反蒋大联合。三月，汪精卫由香港派陈公博到太原活动。这时西山会议派也因不满蒋介石统治而积极活动，于是一拍即合。形成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等国民党在野派和阎、冯、桂等军阀反蒋大联合。五月，汪精卫提出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共商国是。七月下旬汪精卫到达北平。七、八月间扩大会议由汪主持在怀仁堂召开多次，选举了扩大会议常委、秘书长及委员会主任、委员等，通过了宣言。决定组织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选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推阎为国民政府主席。成立约法起草委员会，筹备召开国民会议。九月九日阎等就职。这时中原大战前线阎、冯军已呈败局。九月十八日，张学良通电反对扩大会议，就任南京政府海陆空军副司令，十九日出兵入关。二十一日扩大会议主要成员由北平逃到太原，扩大会议及其国民政府垮台。汪绕道逃到香港，陈公博、王法勤、朱霁青也都作鸟兽散。至此国民党改组派的中央组织便宣告瓦解。后来追随国民党改组派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和被欺骗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青年纷纷脱离改组派。一九三一年初，汪精卫在香港宣布改组派解散。

三、国民党再造派

国民党再造派是胡汉民和孙科操纵的既反蒋又反汪的国民党内的政治派别。

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内右派势力嚣张起来。胡汉民经常约集孙科、邓泽如、邹鲁等人策划反共反革命活动。不久，胡毅生、朱卓文等勾结粤军及英国势力阴谋杀害了廖仲恺。胡汉民曾涉嫌此案，一度被拘留。后来在汪精卫支持下，借考察欧洲政治为名，躲避国内一时颇大的反胡呼声。胡汉民、孙科等出国后，钟天心、周一志、梁寒操等在上海创办《再造旬刊》和《民众日报》，拥护胡汉民，为胡汉民卷土重来作舆论准备。这些人便称国民党再造派。

国民党再造派不满意蒋介石集党、政、军权于一人，实行独裁统治。他们也反对汪精卫以“左派”面目出现，以国民党正统自居。他们主张‘再造国民党”,实现所谓‘全民革命”。他们批判国民党改组派所谓“农工小资产阶级联盟”，是马克思主义的翻版，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背叛。他们企图排斥汪精卫集团，抑制蒋介石势力发展，实现胡汉民掌握党权，蒋介石控制军权，实行党军分治的政治格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汉民加紧同蒋介石勾结，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成为南京国民党反革命罪恶活动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一九二八年一月，胡汉民适应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需要，和孙科、伍朝枢到欧洲考察政治。九月胡汉民回国后，为反对汪精卫派进一步和蒋介石勾结起来，加强国民党一党专政。为使南京国民政府披上合法外衣,他提出《训政大纲》和《国民政府组织法》。主张国民党中央作

为“中华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实行五院。蒋介石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欺骗民众，建立独裁统治，便接纳了胡汉民提案。十月，国民党中常会讨论通过，蒋介石依法当了“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当了立法院院长。他帮助蒋介石出谋划策，先后打败湖北桂系与河南的唐生智，又打败了阎锡山、汪精卫与西山会议派勾结的扩大会议组织，实现了反革命的统一。

胡汉民派为了反汪精卫，尽管加强了与蒋介石反革命勾结，但并不能消除胡蒋之间的权利冲突。蒋介石为加强个人独裁统治，利用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特务集团，以控制中央到地方各级党部，同时提高黄埔系军官的地位，以控制军队，逐渐排斥胡于“尊”而无权的地位。胡汉民则以国民党元老自居，事事都希望以党的名义过问，高唱“党权高于一切”，鼓吹“以党治国”“以党治军”。东北易帜蒋介石许给张学良陆海空军副司令，并给其部属几个国民政府委员及部长职务。胡则以维护“国家名器”，“爱人以德，不应诱之以名利”①为借口，持坚决反对态度。一九三〇年十月初，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前夕，蒋介石便由开封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约法”，以尽早取得五院之上的总统宝座。于是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便依蒋介石的意旨，决定召开“国民会议”。胡汉民打着召开国民会议必须完全尊依总理遗教的旗号②，坚决反对制定“约法”。其目的在于反对蒋加强个人权力，以便保持党权高于政权，使自己的地位不致于削弱。这样胡汉民势力便成为蒋介石实现个人独裁的主要障碍，蒋胡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蒋介石便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勾结许崇智“运动军队”，“反对约法”，

① 《蒋胡斗争》，《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辑七册。
② 胡汉民《尊依总理遗教开国民会议》，《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二册。

“破坏行政”①等罪名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

孙科在胡被扣期间成为国民党再造派的领袖。他重返广州按胡汉民意图联络古应芬、邓泽如策动实力派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并拉拢汪精卫与其合作，组织反蒋政府，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组织。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唐绍仪、汪精卫、肖佛成、邓泽如、孙科、邹鲁、林森、古应芬、李宗仁等十六人当国府委员，以广东为基地，反对南京国民政府，通告蒋介石在二十四小时内即行隐退。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全国人民团结抗战，共赴国难的呼声日益高涨。广东“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形势已为时局所不容。南京国民党便派陈铭枢、蔡元培、张继等三人为代表，于九月二十八日抵香港，同粤方非常会议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等会谈。会议决定：“(一)最低限度先释放胡汉民；(二)全体联名请胡复出，函交陈铭枢代表带往；(三)本决议案由京代表电蒋。”② 蒋介石迫于形势，于十月十四日恢复了胡汉民自由。胡到上海后电唐绍仪、汪精卫、孙科等人推派非常会议正式代表来沪谈判。十月二十二日粤方非常会议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伍朝枢、邹鲁、陈友仁等同南京国民政府代表李石曾、张继、蔡元培、张静江、陈铭枢、吴铁城等在上海正式会谈。胡汉民、蒋介石当然也是会议的主要参加者。会谈决定：(一)彼此须求得外交一致，共赴国难；(二)关于党政军问题，由南京代表和非常会议代表在沪继续协商定出初步方案，再入京开正式会议。

双方代表在会谈党政军诸问题时，粤方坚持一、二、三届中央委员决定党事；政府、军队等必须实行改制。其意在迫使蒋介石下台，交出党政军权。南京则坚持以建国大纲和约法为根据，

① 《蒋胡斗争》，《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辑七册。

② 陈铭枢《“宁粤合作”案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

维护党的法统，其意在于维护蒋介石独占的党政军大权。历经多次会议，最后决定广东和南京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广东开会时又出现内部分裂，汪精卫派返回上海单独开会，广东则选出二十二名中委。胡汉民因调解粤方内部受阻而赴香港。孙科在粤方委员支持下作了行政院院长，但为时不足两个月，由于原财政部长宋子文暗中捣鬼，孙内阁陷于一筹莫展之境。汪精卫与蒋早有勾结，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时，汪蒋在杭州会谈，蒋又复职，主持军事，汪代替孙科任行政院长，孙转任立法院长。孙科主持的“合作政府”又被蒋汪合流政府所代替。追随孙科的国民党再造派政客有的到南京作立法委员或其他闲职，过着优裕的官僚生活；有的作海上寓公或借孙科资助到欧美去留学。再造国民党的理想也成为泡影。到抗战时期，国民党再造派更进一步分化，有的思想进一步向左转，从事抗日民主运动，有的被蒋介石拉去作了“党国”要员。

国民党再造派是国民党官僚胡汉民、孙科为了争夺党权的需要而组成的政客集团。它没有系统纲领和严密的中央组织机构及地方组织。他们曾一时倡导革新，再造国民党。但更多的是由胡、孙操纵参与争夺国民党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国民党再造派实际是代表粤系官僚政客及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在野派。

第三节　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策的实施

一、武装起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创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

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进行改组，解除了陈独秀总书记职务。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等五人组成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政治局职权。常务委员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指派周恩来为南昌起义的前委书记；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八月一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指挥下，集结了在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指挥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共三万多人，举行了南昌起义，歼灭了盘踞南昌的敌人朱培德部六个团，缴枪万余支。南昌起义的胜利引起敌人极大恐慌。蒋介石、汪精卫马上调集大量军队，围攻南昌。起义部队按原订计划，于三日至六日分别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在转战途中，由于缺乏经验，未能与江西农民运动相结合，在潮汕地区遭到强大敌人的攻击而失败，一部分起义部队转战于粤北和海陆丰地区。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南昌起义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它在白色恐怖下，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在全国人民中竖立了一面坚持革命斗争的红旗。南昌起义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推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土地革命的新阶段。

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于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文件。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①]，会议确

①《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赣粤等群众基础较好的四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应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会议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职务，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的统治。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

八七会议反对了右倾投降主义，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继续坚持战斗的方向，在革命危急关头坚决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挽救了共产党。但是，会议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时，没有及时注意防止“左”倾情绪的滋长，导致了会后不久盲动主义错误的发生。

八七会议以后，在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分赴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等省，率领广大革命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向敌人开展了新的斗争。从此，中国人民革命进入了创造红军、创造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负责传达会议精神，并改组了湖南省委；成立了秋收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前委书记，直接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毛泽东指出秋收起义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直接目标是夺取政权，为此必须掌握军队，建立革命武装。起义前毛泽东集中精力组建革命武装，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九月十一日，秋收起义暴发。起义开始时，部队就提出“打倒国民政府”“农民夺取政权”等口号。起义部队曾一度占领浏阳、醴陵县城。但终因敌人力量过大，革命又处于低潮形势，起义部队虽英勇奋战，也难免受挫。九月十九日，起义部队退到浏阳文家市，毛泽东主持召开一次前委会议。决定放弃进攻长沙，改向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进

军，将战略退却同战略进攻巧妙地结合起来。二十九日，部队抵达永新三湾，进行了改编，将起义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同时，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党小组，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营、团以上建立党委，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在连以上各级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清除军阀主义和雇佣思想。三湾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这是共产党建立人民军队的开端。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率这支部队到了罗霄山脉中段茨萍，开创了中国革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暴动的农民武装，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后，五月四日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总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作为边界党和军队及政权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

毛泽东领导部队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巨的工作。首先，恢复、整顿和重建边界各县共产党组织。同时，分兵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和各级民主政权。在部队建设中，坚持党代表制度和民主制度，加强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规定红军三项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筹款；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又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就使红军从根本上区别于任何旧军队。为适应武装斗争不断发展的需要，创建了正规红军、地方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开展了人民革命游击战争。

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是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是革命遭到暂时失败形势

下，革命力量被迫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中心城市退却下来，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革命力量较雄厚的乡村，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是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许多优秀共产党人竭尽全力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流血牺牲的结晶；是中国革命通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恽代英、聂荣臻等，领导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五千多人，举行了广州起义。经几个小时激战，占领了广州大部分城区，成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但起义部队未能转入农村同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最后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联合进攻下，起义部队虽英勇奋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工人赤卫队总队长周文雍等领导人和许多战士英勇牺牲。

广州起义，是以工人和革命士兵为主体，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较雄厚的大城市爆发的武装起义，是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又一次伟大尝试。它表现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白色恐怖的英勇斗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是对国民党叛变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打击。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连在一起，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立红军的伟大开端。

一九二七年十月，以彭湃为首的东江特委领导的广东海丰、陆丰农民自卫军起义，成立了工农兵政府，坚持到一九二八年底。十一月，鄂东特委潘忠汝、曹学楷、吴光浩等领导黄安、麻城农民起义，转战于黄、麻、光（山）边界的柴山堡山区，实行武装

割据。一九三〇年三月间会同商城、六安工农起义组成的两个红军师，扩大根据地范围，成立鄂豫皖边区特委，统一改编为红一军。以后红一军与鄂中红十五军会合编成红四军团。鄂东北、豫东南、皖西三区联合一片形成鄂豫皖根据地。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了赣东北的弋阳、横峰等县农民起义，一九二八年初，集中起义队伍骨干力量，以磨盘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三月，贺龙、周逸群等领导湘鄂边桑植地区农民起义。一九二九年冬成立洪湖区工农民主政府，开辟了洪湖根据地，于一九三〇年春发展为湘鄂西根据地。

除此之外，还有郭滴人、邓子恢等在闽西龙岩，张鼎丞在闽西永定、上杭等地领导的农民起义；陕西谢子长、刘志丹、唐澍等领导渭南、华县农民和西北军许权中旅举行起义；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的湖南平江革命士兵和农民起义，成立工农红军第五军；邓小平领导百色农民和士兵起义，开辟了广西左右江根据地。

总之，从八七会议到一九三〇年，共产党先后发动百余次武装起义，开辟十五块根据地，全国红军发展到十万左右。斗争的烽火遍及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浙江、安徽、江苏、河南、河北、陕西、山东等十几省三百多县。“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越燃越旺。

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土地革命的开展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分析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规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任务

和策略。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等。

这次代表大会正确地肯定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阶段革命的中心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的真正统一”；“推翻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大会发布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权，没收地主阶级一切土地，耕地归农等民主革命的十大政治纲领。

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但是，由于引起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这些矛盾的继续发展和扩大，必然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所以大会规定——党在当前的策略是争取群众，发展工农群众组织，为迎接革命新高潮到来积聚力量。

大会批判了右和“左”的错误，强调指出，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与争取群众是不能并存的，争取群众是党现时主要任务，因此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是现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

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确方面是主要的。在革命遭受挫折的紧急关头，及时正确地回答了当时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并向全党提出了领导群众继续革命斗争的口号，使全党有了统一认识，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斗争的发展。

但是，大会也有一定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对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政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片面强调国民党各派“反革命力量的大团结”。大会不适当地强调了“城市领导作用”，对于农村革命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

识。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需要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也缺乏必要的认识。大会以后，党中央机关仍然留在上海，以城市为主。由于大会这些缺点错误，因而妨碍了“左”倾错误的彻底纠正。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等七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任总书记，李立三任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长，周恩来任组织部长，后又兼任军事部长。

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任何从事民主革命的党派和个人，都必须提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政策。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曾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但由于诸多原因未能实现。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但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以及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农民土地问题没能得到解决。“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以后，共产党就把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和巩固根据地、壮大红军、支援红军战争的根本措施。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以来，共产党就领导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毛泽东在广泛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写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分析了湘赣边界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和农村阶级关系，使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和土地政策的制订有了客观依据。在调查研究和初步发动群众基础上，根据地全面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各县、区乡都设立了土地革命委员会，确定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①。“实行以乡为分配土地的单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68 页，1964 年版。

位”,按‘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的原则①,满足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要求，得到农民群众多数拥护。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毛泽东主持下，制订了《井冈山土地法》，共九条十四款，这是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对推动农民土地革命运动起了伟大历史作用。但由于没有经验,《井冈山土地法》也有原则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在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进军中，一九二九年四月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改正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明确规定只“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用。中共闽西‘一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和《土地问题决议案》，根据“六大”土地政策，结合闽西土地革命的实际经验，第一次提出“抽多补少”的原则，明确规定只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不要“过分打击”；对大中地主有所区别，“对农村小地主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他过分打击”；对商店采取保护政策（即不没收）。由于规定了正确的政策，从而使闽西出现了土地革命大好形势，在很短时间内解决了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等县五十多个区，五百多乡的土地问题，约有六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有力地推动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红军战争的发展。一九三〇年二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赣南特委，五、六军军委扩大会议（二、七会议），纠正江西省委关于土地革命中只求扩大，不求深入，打土豪不分田，不废债的错误，端正了赣西南地区土地改革的方向。会议强调一要分，二要快的精神，确定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则，推动了赣西南土地革命的广泛开展。除此之外，鄂豫皖、湘鄂赣、赣东北、湘鄂西等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70 页，1964 年版。

根据地也开展了土地革命，出现了分田运动深入发展的形势。农民废除了苛捐杂税，分得了土地。市镇由萧条冷落变得繁荣起来。他们热情拥护苏维埃和红军，出现参军参战的蓬勃发展局面。

随着土地革命运动深入发展，迫切要求正确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一九三〇年六月，在闽西长汀的南阳召开了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南阳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流氓问题》等决议案。提出了限制富农问题，规定分配土地时应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不准富农隐瞒土地及把持肥田。重申按人口平均分配办法，批判了全部土地归苏维埃所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写了《兴国调查》、《东塘调查》,回答了许多政策问题，发现田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对私有观念很深的小生产者来说，有极大影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给江西苏维埃政府写信，要求省委明确指示各地各级政府，“过去分好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准许出租”在“红色区域准许自由作生意，赚得钱来，均归本人”。五月份，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布告》，贯彻了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政策。由于明确规定了分配土地后的地权，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许多地方不但恢复而且超过了革命前的生产量。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年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于一九三〇年，制定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这条土地革命路线成为党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农民反封建斗争胜利的

保证。

三、新民主主义政策在革命根据地的实施

在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和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都有很大发展。到一九三〇年，红色区域已达三百多县，人口达几千万。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并建立了省级的政府机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省瑞金城北的叶坪,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的各根据地及地区代表共六百多人。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以及经济政策等重要决议。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了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刘少奇、任弼时、瞿秋白、王稼祥、彭德怀、贺龙、关向应、邓子恢、方志敏、张国焘等六十四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工农民主共和国。

《宪法大纲》规定 中国红色政权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政权;“ 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这一专政的目的,是‘ 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少数民族享有民族自决权。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政体是工农兵代表大会制，最高权力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组织、军事、外交、内务、劳动、财政、教育、司法、检

察等人民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议决案。这种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合而为一的政权组织形式，便于体现工人、农民和红军士兵的意志，也便于发扬民主。

政权建设是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方面。各根据地普遍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工农革命群众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中央根据地参加选举者占全区选民百分之八十以上，只有患病和担任警戒人员未能参加。选举的程序是，先产生选举委员会，进行选民登记，然后张榜公布，实际是发动群众对选民资格进行审查。候选人也在每村和每个选区进行公布，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工农民主政府不仅向选民报告工作，而且还动员和引导选民批评工作，最后由选举委员会主持正式选举。人民选出的各级代表及各级政府委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有假公济私，玩忽职守、不负责任者，选民可以罢免，另选群众拥护的人。这种选举办法使广大工农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被选到各级工农兵代表会议和政府中工作，参加工农民主政权的管理，体现根据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掌握了政权，激发了根据地人民极大的革命热情。各地工农兵代表和政府工作人员来自人民群众，又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既可以及时了解工农兵群众的意见要求，又可以贯彻共产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成为工农民主政府和人民联系的纽带。

为驱逐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一系列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没收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实行按农村雇农、苦力、劳动农民人口平均分配。没收一切封建主、军阀、地主、豪绅的动产与不动产、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充为公用和分给贫苦农民，彻底消灭农村中一切封建关系，促进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将操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

经济命脉实行国有（银行、海关、航业、矿山、工厂等）。中国资本家的工业及手工业，由工人监督生产委员会及工厂委员会监督生产；商业方面既保证经商自由，又严禁商人投机和提高价格；废除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保证工农民主政府的财政收入。除此之外，工农民主政府为粉碎敌人的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还领导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毛泽东在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作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说，阐明了经济建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批判了经济建设上的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战争环境中不可能进行经济建设工作。另一种观点是把经济建设看作是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否认经济建设必须服务于革命战争中心任务。到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又发表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提出：红色区域经济建设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善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并且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共产党经济政策是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大力发展合作社经济，在法律范围内奖励私人经济的发展。

各级工农民主政府认真贯彻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内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经济成份被铲除，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已应革命需要而产生。根据地内的经济已经脱离了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体系，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体系。

在文化教育方面，工农民主政府规定：“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革命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

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应该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的领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①。教育总方针是‘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②。规定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③.

各级工农民主政府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依靠工农群众力量和智慧，创造了各种新型学校和各种崭新的教育机构。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及新民主主义施政纲领和各项政策的实施，改变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先声，是首创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伟大实践。

第四节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建立及其反蒋斗争

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建立及其政治主张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

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一九三四年一月。
②③ 《毛泽东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15页。

宣布：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革命手段中止南京武汉伪党部中央职权，自己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建立工农为中心的平民群众政权，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这就宣告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成立。但该委员会还没有正式办事机构和基层组织。一九二八年春，谭平山、章伯钧等人联合一些既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又不同意共产党主张的国民党左派和从共产党内游离出来的分子，在上海组织了中华革命党。自称既区别于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信奉三民主义，代表平民利益，致力于民族解放的新政党。这个党自成立就与国外的邓演达保持联系。一九三〇年春邓演达回国后，具体领导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八月九日在上海召开有十几个省区的代表参加的中华革命党全国干部会议，到会的代表，包括黄琪翔、章伯钧、季方、朱蕴山等二十多人。邓演达主持了会议。会议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原则通过了《组织工作大纲》、《宣传大纲》、《各地民运工作纲要》、《军事运动方针》等重要文件，并将该党的名称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选出了中央干部会，邓演达被选为总干事，郑太朴任中央干部会组织委员会主任，章伯钧任宣传委员会主任，黄琪翔和季方分任军事委员会正副主任，李世璋任青年委员会主任。中央干部会成立以后，随即成立中央、上海、北平、香港四个直属的区干部会，然后又陆续在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河北、山西、陕西、广东等省建立省市地方干部会,并出版《革命行动》(半月刊)和《革命行动日报》等刊物。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主要有：

第一、中国社会是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双重支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状况。指出，中国经济从主要方面说，“还是农业手工业生产的阶段”，虽然土地私有，可以自由买卖，但是地租剥削依靠政治强制手段来实现的；商业资本的不等价交换和高利贷剥削还占支配地位，近代资本主义工业资本还非常微弱，而且受封建势力束缚和帝国主义压迫；从政治组织上看，中国依然是封建官僚主义处于支配地位，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还带着很浓厚的氏族社会的色彩。”所以，整个中国社会“还是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的时代”，同时又受“帝国主义势力支配”，呈现复杂的状况，也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都是使中国社会不能向前发展的大障碍”。这就正确地揭示了中国社会性质。

第二，中国革命是民族、民权、民生三项任务结合在一起的复杂革命。

《政治主张》指出：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任务。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以及依附他们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不是单一的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是“具有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性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

他们主张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所谓民族革命，就是“要彻底的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所谓民权革命，就是要依靠广大平民群众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一切反动统治势力，使平民群众取得政权；所谓民生主义，实行保护民族经济的政策，“消除帝国主义者在华的经济统治势力”；实行关税权绝对自主，以保证本国工农业的发展；用金融国有政策，一方面收回由外人经营的产业及本国大规模的私人企业，一方面集中资金建

设大规模国有企业，实行“大产业、关键产业及独占性产业的国营、公营并促进合作社的组织”。农业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使广大农民有耕耘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为过渡到‘土地国有’准备条件，这就是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政策付诸实施。

第三、复兴中国革命，建立平民政权。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总结中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出南京国民党政权虽然标榜是三民主义信徒，实际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它曲解三民主义，是封建官僚勾结帝国主义的政权。

中国资本主义因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束缚不能顺利发展。除蒋介石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已为帝国主义奴仆之外，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依存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及经济的势力以保障资本的安全”，形成了他们依附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实无独立的进行资本主义革命的能力。”

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佃农、雇农及设计生产、管理生产、担任运输分配等及其他辅助社会生产的职业人员，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而受封建势力和资本势力压迫，都是要求解放的平民。特别是工农群众占中国人民绝大多数，他们在政治上受的压迫，经济上受残酷剥削，是平民的重心。因此，必须组织他们参加伟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统治；“建立平民政权，进行经济的解放”。

为建立平民政权，必须组成新的革命武装——平民革命军；然后依靠武装力量去消灭反革命的武装，组成革命委员会以临时接收部分政权；再由革命委员会全权筹备和召开县、省等人民议会(或称国民议会)，接收县或省的一切权利。地方平民政权建立后就应立即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及旧的法规制度，实行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规定的新税率及制度，将政权置于国民党临时行动委

员会的领导之下。平民政权机构的成员，来自各职业和准职业团体的代表和直接参加生产的农民和工人，并规定农工等直接生产者代表必须占百分之六十，职业和准职业团体代表占百分之四十 。

平民政权对外执行独立自主平等的外交政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条约。对苏联，以双方完全平等不干涉中国革命为限，与之恢复邦交；与各弱小民族结成亲密关系，建立反帝国主义联盟。坚持关税自主、收回外国资本经营的关系国计民生的一切银行、铁路、航运、通讯机关、矿山及其他重要企业为国有。对内坚决推翻南京反动统治；金融机关和一切具有独占性质的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允许中小规模私人企业存在和发展；实行耕者有其田；确定直接生产者参加管理；限期实行义务教育等。他们概括平民政权的特质“：平民政权是由生产者所构成而进行社会、经济、文化的解放，并使之平民化的一种权力机关。”①

但是，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主张，不承认无产阶级领导权。他们错误的认为共产主义只能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国还处在半封建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力量很薄弱，中国共产党“ 不是中国客观的社会要求所产生 ”；而是共产国际培植的结果。他们错误地认为 “ 中国共产党决不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②；“ 共产主义革命 ”是不合中国国情的，是“ 不对症的药方 ” 。他们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红军游击战争，甚至把共产党在农村建立的红色政权和国民党南京反动政府相提并论，看成是所谓“ 相互依存 ”的“ 一物之二面 ”③，都应在消灭之

①邓演达：《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 —— 平民革命》，《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二辑第215页。

②《邓演达文集》第164页。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③ 《邓演达文集》第271 页。

列。因此，他们的结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既不能属于蒋介石或改组派的国民党，也不能属于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才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建立平民政权。他们既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他们要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外，成为独占中国革命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人们称之为第三党。他们幻想在国共两党以外寻找一条使中国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间路线。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它的主要方面是反蒋的。它是适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而提出的。他们严厉斥责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充当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奴仆，要“于最短期间把反革命统治推翻”①。他们笃信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的指导思想，并提出“立刻召集真正由人民代表组成的国民会议，以接收全国政权”②，建立平民政权。同时策动国民革命军中的农工平民大众分子，变军阀军队为“平民革命军’③。这些在当时动员群众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方面，是有进步意义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堪称为具有很大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但是，他还不懂得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中国革命，才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使中国过渡到科学社会主义。而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指导，小资产阶级为领导进行平民革命以及通过建立平民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只能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幻想。

①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干部“通告”》第二号，《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二辑。

②③ 邓演达：《现实国际及中国的形势与我们斗争的路向》，《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二辑第 165 页。

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反蒋斗争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就把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作为己任。邓演达在一系列政治论文中，始终把矛头指向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率领其组织成员在政治上进行了大量反蒋宣传。他们严厉痛斥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背叛革命的罪行，全面揭露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他们指出南京国民党的统治“已明白的投降了帝国主义，已完全为腐朽官僚的分赃机关，已明白的代表地主豪绅买办大银行家及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加紧向民众剥削”①。南京政权是在与革命势力斗争中产生的，它集中成千累万的党棍、党官、文官、武官，组成黑暗残酷的统治集团。“一面以‘礼义廉耻’的假面去复古，使与曾国藩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和谐，一面更通过基督教徒与美国相勾结，为镇压革命势力的外援。……现时反革命的南京统治，在本质上实与太平革命时代的满清统治无异”②。所以，南京国民党统治“就是军阀、官僚、政客、党棍、高利商人、地主豪绅联合对抗小百姓造反”的政权③。它“投降帝国主义，军阀专政的官僚统治与野蛮狠毒的屠杀剥削，较之从前北洋军阀时代尤为残酷”④。

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领袖邓演达等还发表大量文章，具体分析南京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组织，财政基础及意识形态特征。指出蒋介石反动统治倒行逆施，无法逃脱必然灭亡的命运。

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还领导了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运动。

① 《通告第一号》一九三〇年八月十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二辑 1 页。

②③ 邓演达：《中国到哪里去？》，《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 160页。

④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1930 年 9 月 15 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二辑第 54 页。

蒋介石在打败冯、阎、桂系军阀以后，为伪造民意，使其反动政府披上合法外衣，借以堵塞反蒋势力的借口，巩固统治地位，于一九三〇年十月三日通电拟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发动了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运动。一九三一年四月发了《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宣言》，指出：南京国民党政权召开国民会议是“想用伪造民意的方法以欺骗人民，以减少它自己卖国殃民的责任。”南京政府伪国民会议，其代表“都是屠杀人民的凶手，剥削人民的贪官污吏，蒙蔽欺骗人民的牧师”。所以这个机关只能是蒋介石的御用工具。严正申明“反对反动的伪国民会议，否认伪国民会议一切决议和行动，坚决推翻反动的南京统治，“建立平民政权”。还发了《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宣传大纲》并以《革命行动》为阵地，广泛地开展了反对伪国民会议的宣传斗争。

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除在政治上进行反对蒋介石政权斗争外，还进行了军事反蒋的策划。该委员会刚成立就制订了军事运动方针，阐明武力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没有进步的武力，实无法可以发动初步的斗争”①，并确定了军事运动十项方针，致力于“造成一支以黄埔学生为中坚的革命军”②。以党团组织和个人关系极力影响黄埔学生和黄埔军人同情革命和参加革命。邓演达回国以后利用他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和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的旧关系，于一九三〇年夏秋间，在上海秘密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联系黄埔系军人，策动他们参加反蒋斗争，分化和争取蒋介石的军队。为便于开展工作，成立南方区、中央区和北方区三个执行委员会，区以下设省市分会，分会下设小组。黄埔革命同学会成员及其同情者最多时达到五千余人，约占当时全国黄埔系

①②《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军事运动方针》一九三〇、八，《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二辑第 116 页。

军人总数的二分之一。邓演达等还多方面利用个人关系，作蒋介石非嫡系军队的工作。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与杨虎城、冯玉祥、程潜、陈铭枢等军事集团均有一定联系，并酝酿互相支持结成反蒋联合阵线。一九三一年“宁粤分裂”期间，邓演达与陈铭枢、蔡元培等商定：陈铭枢到江西吉安，利用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回广东进攻陈济棠之机，待军队至粤北，即急转潮州和梅县，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由邓演达、陈铭枢、蔡元培共同署名发表对时局宣言，树起停止内战和反蒋的旗帜，控制局势。邓演达去江西临川一带，策动围剿红军的十八军起义；同时，联络武汉驻军以及西安和华北方面原西北军一齐响应，以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为适应反蒋军事行动之需要，在上海办了干部训练班。因此，蒋介石对邓演达非常害怕，派出大批特务四处搜扑。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七日，正当邓参加训练班结业式时，由于叛徒告密，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会同上海租界巡捕所逮捕，很快地转解到南京，因而武装起义夭折。在狱中，蒋介石对邓演达采取了威胁利诱的办法，妄图拉拢邓同他一起反共。但是，邓演达大义凛然，“反蒋志不移，一句话回绝——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① 蒋介石慑于邓的威力和对黄埔学生影响太大，在他被迫下台前，于十一月二十九日秘密杀害了邓演达。邓演达的牺牲给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邓演达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英勇的民主战士。

①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邓演达》，《人民日报》1981年11月26日。

第五节　中国托派的产生及其政治主张

一、中国托派的出现与各小组织的“统一”

联共（布）为帮助中国和东方被压迫民族培养革命干部和军事人材，一九二一年创办了“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东方大学”），一九二五年又创办了“孙逸仙大学”（简称“中山大学”）。中国共产党为培养干部，选派了大批留学生到这两所大学学习。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拉狄克是托洛茨基派的骨干分子，他把中山大学作为托派活动的重要据点。拉狄克和其他托派分子极力向中国留学生灌输托洛茨基观点，拉拢他们从事反对共产国际和苏共的活动，使一部分中国留学生参加了托派组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苏共中央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党，拉狄克也被撤销中山大学校长职务。同时对中山大学、东方大学中参加托派活动的中国留学生也作了处理，一部分参加托派组织的留学生被遣送回国。他们回国后，背着中央组织托派小团体，出版刊物，宣传托洛茨基的理论和主张，于是中国境内便出现了第一批托洛茨基分子。中共“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他没有很好接受教训，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此后，在党内形成了一股反对中央正确领导拥护陈独秀的势力，即“陈独秀派。”这些人不接受党的教育，反对中央新的领导及路线，进行派别活动。当陈独秀看到由托派留学生带回来的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以后，便欣然接受了托洛茨基观点，认为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看法比斯大林正确。

这样，由苏联遣送回国留学生中一部分托派分子和中国共产

党内陈独秀一伙人就成了中国托派主要成分。由于他们之间互不服气，勾心斗角，互争托派正统，而形成四个小派别组织。

（一）“我们的话派”

一九二八年，由苏回国的托派分子梁干乔、区方、陈逸谋、张特等，在上海成立托派小组织，出版《我们的话》，被称为“我们的话派”，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托派组织，主要在上海、北平、华南、山东、香港等地活动。

（二）“无产者社派”

它是早期托派组织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组织。主要成员大部分曾在共产党内担任过领导职务，如陈独秀、彭述之、尹宽（安徽省委书记）、关超麟（党的机关报《布尔什维克》主编）、马玉夫（江苏省委工运负责人），出版《无产者》月刊，被称为“无产者社派”。

他们成立秘密小组织，有计划地在共产党员中间进行活动，发展托派组织。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要求陈独秀“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但遭到他们的拒绝。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决定开除陈独秀的党籍，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马玉夫、汪泽楷、蔡振德四人党籍。陈独秀便公开宣布“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即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之下，坚决的、不可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①。十二月十五日，陈独秀等八十一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进一步阐述他们的取消主义纲领，狂妄地要求联共和共产国际恢复托洛茨基的工作，要求中共“立即

①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公开讨论根本政治问题”,并“决定新的政治路线”。同时他们还积极从事建立和扩大反对派组织的活动。

（三）“十月社派”

一九二九年八月，刘仁静由国外回到上海，公开自己托派身份，表示不再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一九三〇年一月，他纠合王文元等人起草了《告同志书》，作为团结共产党反对派的基础，然后又纠合宋逢春、罗汉、濮德治等组织一托派小组织，称“十月社”,办《十月》刊物,即“十月社派”。

十月社派成立不久，刘仁静以回国途中曾见过托洛茨基为资本,便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妄自尊大，导至十月社派分裂。王文元、宋逢春等利用组织名义将刘仁静除名。刘仁静便单枪匹马办《明天》油印刊物，以“老托代表”身份继续进行活动，《明天》只出一两期就自动停刊了。

（四）“战斗社派”

游离于以上各派组织之间的托派分子刘胤、赵济等人于一九三〇年纠合在一起,办《战斗》刊物(仅出一两期),便称“战斗社派”。它是中国托派小组织中成立最晚人数最少的一个。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底，中国先后出现四个托派小组织，各有自己的领导机构和机关刊物，直接或间接地和托洛茨基发生联系，各自尊大，互相攻击。“无产者社派”自以为人员最多，其骨干都曾是共产党的各级干部，社会影响大，自然要在托派组织中居领导地位。“我们的话派”则认为自己是中国最早成立的托派组织，其骨干在国外就参加了托派组织及活动，有的还见过托洛茨基和拉狄克，以托派正统自居，应为中国托派组织核心。“十月社派”和“战斗社派”也都想与其他托派组织平起平坐,占有一席位。因此，中国托派小组织自成立起，就勾心斗角，处于分裂状态。托洛茨基为了加强中国托派势力，一九三一年一月写了《给

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要求各托派组织不要“去制造人为的分歧意见”,应该‘确定的合并起来’。以后又连续两次来信,就召开‘统一’大会有关事宜作了具体的部署。即参加大会代表不以组织为单位，而以人数比例推选；统一大会前组织——协议委员会,委员会由每派推选一人组成，负责起草会议文件、审查代表资格等。他还强调统一工作要以陈独秀为主，只有接受陈独秀的领导，中国托派的事业才有前途。在托洛茨基的授意下，中国托派小组织经过几个月协商，决定成立一个“统一协商委员会”，协商成立统一组织问题,筹备‘统一’大会。

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至三日，中国托派四个小组织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大会”。陈独秀致开会辞并作政治决议草案的报告，宣告‘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简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正式成立。会议通过了中国托派的“纲领”，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陈亦谋、郑超麟、王文元等为常委，陈独秀任书记，陈亦谋任组织部长，郑超麟任宣传部长。会议决定出版《火花》作为中央机关刊物。

会后由罗汉起草一份致托洛茨基的电报,称‘:他的中国同志正完成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将飘扬在全中国’①，反映了中国托派分子得意忘形的情绪。“统一大会”是召开了，但是中国托派组织并没有真正统一。各派野心家为争进领导核心打得不可开交。会议前准备阶段，彭述之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和遭陈指责,彭便写信指责‘统一’是‘上层勾结’,大会是‘虚伪的’;‘可耻的’,表示拒绝参加大会。当大会选彭为中央委员后,彭却‘虚伪’无耻’地参加中央委员会议。马玉夫因未被选为中央委员，便向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去告密。梁干

①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126页。

乔因未被选为中央委员，便跑到南京当军统特务去了。

二、中国托派的政治主张与艰难生涯

中国托派组织是涣散的,思想理论也没有独立体系,他们只是把托洛茨基和拉狄克等关于中国革命的反动观点全部接受下来，加以转述。“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基础，自然也就是中国托派的圣经。他们以“不断革命论”为思想理论基础，提出一系列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政治主张。

（一）强调“不断革命论”。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日，在《无产者》杂志上,陈独秀发表《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系统地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观点。文章首先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关于不断革命论的论述，然后硬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理论是一致的。接着，他阐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有革命不断深入和扩大两方面的意义，“深的方面就是不停顿在每一个阶段，而不断引向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广的方面就是不停顿在每一国家，而不断引向世界革命”。据此，陈独秀认为，谁要把社会主义革命分作两个阶段来完成，谁就犯了“机械的阶段论”的错误。他还认为苏联十月革命是跳过民主革命阶段，才取得胜利；中国大革命就是由于没有跳过民主革命阶段而遭到了失败。他攻击中国共产党仍坚持必须经过工农民主专政阶段，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转到无产阶级专政阶段的主张，正是犯了“机械的阶段论”的错误。托洛茨基派所鼓吹的“不断革命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只能说明他们是对马列主义的反动，在实践中必然遭到可耻破产。

（二）歪曲中国社会性质，取消革命。

托洛茨基分子认为：中国封建制度的崩坏，比欧洲任何国家

都早。自秦汉以来就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货币地租，商业资本在国家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更加商业资本主义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作用及其特有的矛盾形态,不但占领了城市,而且深入了乡村”。大革命失败以后，“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领导的统治”，封建势力“受了最后打击”，已经“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①。因此得出结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必须使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之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托派分子歪曲历史事实，否认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城市买办阶级和地主豪绅阶级性质，编造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谎言，从而否认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实际是取消革命。

（三）歪曲政治形势,鼓吹以“国民会议”,反对暴力革命。托派认为,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进入了“反革命势力全盛的时代”①。民主革命已经完结，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尚未成熟，这是两个革命中间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将是漫长的。革命高潮只是“有到来之可能”。他们不懂得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建立后，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不但没有解决，相反更加深刻了，引起革命的因素依然存在。他们也不懂由于引起革命的各种矛盾发展，革命高潮必然很快到来的科学道理。而恶毒攻击共产党对形势的分析是给工农群众“打吗啡针”，是盲动主义的表现。他们以极度沮丧情绪认识形势，只能看到一片漆黑。

他们基于对形势极度悲观估计出发，提出的策略任务是：“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应力争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②。并且提

①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②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出“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民族独立”等口号,以充实国民会议的内容。他们还表示对国民会议的态度不仅要积极号召,而且还要积极参加,实现“由要求资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主义,走到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①。这无疑是以“合法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从根本上取消革命。他们攻击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是“官僚的冒险政策”,是“机会主义的军事投机”“在革命运动上将没有一点意义,没有一点前途”②。他们以无耻卖身投靠、换取蒋介石的青睐,以在野党身份参加“国民会议”。一再不遗余力地去粉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的“太平盛世”。

托派的政治主张违背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注定它不可能有很强的生命力,政治上破产,组织上瓦解是必然的。十几年的生涯可谓在破产和衰败中挣扎。

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国托派召开“统一大会”期间,其成员达二、三百人,是中国托派的全盛时期。统一大会后不久,由于马玉夫告密,托派中央除陈独秀、彭述之、罗汉三人外,全被国民党逮捕,而罗汉从此便更名改姓逃隐无踪,托派中央机构遂告瘫痪。九月,又有一些托派骨干分子被逮捕。陈独秀虽尽力收拾残局,重整旗鼓,但十分艰难。大约经过半年多时间,陈独秀才拉上罗世藩与保外就医的宋逢春、濮德治,加上彭述之五人组成“临时常委”。常委每周开一次会,争论不休的问题仍是“国民会议”和逐渐恢复组织问题,也涉及“九一八”后中国政治形势问题。

一九三二年十月,刚拼凑起来的“临时常委”,又遭国民党逮捕。五个临时常委和一部分骨干分子被逮捕,对托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很长时间没有人再出来收拾残局。各地基层组织也频遭破坏,如河南的托派机构被破坏;山东的托派领导向当局自首;

①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②陈独秀:《论红军问题》。

两广和福建托派因经济枯竭而导致内部分崩离析。自此，中国托派从中央到地方组织，都呈现名存实亡状态。后来，狱中的陈独秀通过刘静真探监的机会与上海残存的托派分子建立了联系。在陈独秀指示下，由陈其昌、蒋振东、赵济等组成新的“临时常委”，维持残局。尹宽出狱后也参加了“临时常委”工作。陈独秀仍在狱中为这个“临时常委”起草文件指示等。

一九三三年底或一九三四年初，托洛茨基派第四国际代表李福仁来华，企图帮助中国托派重整旗鼓。长时间不得志的“老托代表”刘仁静便以李为靠山，积极活动争夺托派的领袖地位。他首先从北平将其支持者史轻生、王椅本、刘家良等青年托派分子调来上海‘充实”临时常委”,使陈独秀支持的原‘临时常委’陈其昌、尹宽等处于少数地位。实际是以刘仁静的拥护者取代陈独秀的拥护者。然后，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发出《临委紧要通知——关于召集上海代表大会》，其目的是从组织上赶走陈独秀的拥护者，取而代之。召开上海代表大会紧要通知刚一发出，陈其昌就跑到南京监狱找陈独秀研究对策，确定以“全国代表大会”解决内部意见分岐的办法，对抗“上海代表大会”。但这时“上海代表大会”在刘仁静等操纵下已经召开了，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新的‘中央委员会”于一月二十一日发出《中常委通告第一号——关于最近上海代表大会及其决议》，公开指名批判陈其昌、尹宽等“机会主义”错误,并声称 放弃机会主义意见;‘我们是同志,否则开除!”一月二十五日，刘仁静等又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出《中央委员会给雪衣同志的信——关于表示政治立场及怎样解决组织问题》① 指责陈独秀在对待自由资产阶级、苏联国家性质、红军问

① 雪衣——即陈独秀。

题及组织问题等都‘犯了原则错误”。二月四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发出《中常委通告第二号》，决定将陈其昌开除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取消商吉士的党籍。接着又“开除”陈独秀。这个决定刚作出不久，刘仁静、史轻生、刘家良、李福仁等均遭逮捕，开除还未及执行，中常委的寿命就结束了。

刘仁静等被捕以后，陈独秀又从狱中写信、提议由陈其昌、赵济、王文元三人主持托派工作，后经在上海的托派代表会选出一临时中央委员会，其成员有陈其昌、蒋振东、尹宽、王文元等。这个“临时委员会”出版《战斗》、《火花》两个刊物。抗战暴发后，彭述之、刘家良被增选为“临委”。陈独秀被释放后不再过问和参与托派活动。

一九四〇年后，由于对中国抗日战争性质问题的分岐意见，导致托派的再次分裂。王文元为首的一派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帝国主义大战的一部分”，应持‘革命失败主义’态度。彭述之在香港托派刊物《火星》上发表文章，则认为“不管中国抗战如何与帝国主义战争相结合，其进步仍然不变”①，应该支持国民党领导抗战。同意彭述之观点的为“多数派”。同意王文元观点的为“少数派”。一九四一年夏，“多数派”把持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少数派”被排斥于大会之外。“少数派”另办《国际主义者》刊物，与“多数派”对抗。中国托派实际再次分裂为两个对立组织。一九四八年底，“多数派”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国革命共产党”。“少数派”于一九四九年春也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直到全国大陆解放，各作鸟兽散。

中国托派自出现以来、并没有独立的政治纲领，只以托洛茨

①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基主义为信条，在超革命的鼓噪声掩护下，干反革命勾当。他们把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共产党，实现取消人民革命的目的。中国托派从来就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政治派别，只是一个孤立、狭隘、反动的小集团。

第 八 章

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共产党和各党派的抗日反蒋斗争

第一节　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一、“九一八”事变，国内阶级关系新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并把东北看作是它侵略扩张的“第一个重大关键”，叫嚷“必须使用铁血”侵占东北。一直在窥测时机。

一九二九年秋，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暂时稳定局面结束了。这次危机从美国开始，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东方，日本也同样遭到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一九三一年日本的工业产量降低到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六十五点五，采矿工业与重工业有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没有开工。工人工资急剧下降。失业人数由一九三〇年的一百五十五万人增加到三百万人。危机波及到农业，农产品价格锐减，农民受着更残酷的剥削。这样。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化。

为了摆脱危机，日本疯狂扩军备战，决心向外寻找出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国际条件有利于它发动侵略战争：欧美各

国正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之中，忙于应付国内事务，无力兼顾远东；中国国内，南京国民政府正集中大批兵力“围剿”红军，南京与两广之间又酝酿着大战。同时，长江流域发生空前大水灾。十六个省惨遭波及，灾民七千万，流离失所，无以为生。

日本帝国主义借此时机，制造一系列挑衅事件，以对中国大陆进行大规模的公开侵略。一九三一年七月，日本间谍机关在中国东北边境制造了挑拨中朝民族关系的“万宝山事件”。八月，又借口一个日本军官中村大尉在东北“遇匪失踪”，把大批军队调入东北，增强驻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战火一触即发。接着，日本关东军自毁南满铁路柳条沟路轨的一段，诬为中国军队所为，于九月十八日夜，袭击沈阳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到十九日晨，沈阳全被日军占领。接着，日军分兵进占安东、本溪、营口、牛庄、长春等地。二十二日，东进吉林省，占领省会吉林及吉长、吉敦两铁路，不久又进攻黑龙江，侵占齐齐哈尔。一九三二年一月初，日军占领锦州。总共不过三个多月，整个东北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三千万人民，四千余公里铁路和无数宝藏，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断送了，东北从此被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卖国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义愤。从“九一八”事变第二天起，上海、北平、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广州、福州、武汉、南昌等大中城市的学生首先发动，纷纷罢课，抗议、游行、宣传并组织抗日救国会、救国义勇军、抗日救国十人团、日货调查团、抗日讲演队、军事训练班等组织，开展抗日活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南京国民政府向国联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驻日内瓦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议天津共管，南京国民政府外长顾维钧向日使泽芳直接交涉。这些丧权辱国行径，使全国学

生更加愤怒，纷纷组织示威团，向日本帝国主义示威，向不抵抗主义者示威。十二月三日，北京大学示威团抵南京，五日举行大示威，被南京卫戍司令部派兵击散，殴伤学生三十余人，逮捕一百八十五人，武装押回北平，这就是有名的“一二五”事件。

全国各地学生为响应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及援救他们的被捕，先后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一二五”事件第二天，上海中等以上各学校抗日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援助北大同学，一致通过决议，质问政府为何逮捕北大同学，并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否则全市总罢课，向南京出发；反对锦州中立区，以及天津共管计划。十二月七日，上海学生一万五千余名举行总示威运动，九日因上海市党部凶手绑架和殴打北大、中大学生代表，再度激起学生公愤，交通、复旦等校学生八、九千人包围市政府，提出不准压迫抗日运动、释放被捕同学、惩办凶手等要求。

全国工人群众的抗日热潮也迅速沸腾起来。在上海，九月二十四日有三万五千名码头工人爆发了反日大罢工。他们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搬运，迫使满载煤炭、器材、货物的大批日本船只只得停靠码头，无法行驶。九月三十日，上海八十万工人派代表去南京请愿，并于十月二日召集代表大会，通过了请南京政府立即出兵抗日；通电全国工人一致对日经济绝交，组织义勇军，并请政府发给军械；建议抗日会严惩奸商及一切奸细；请抗日救国会通电全市工厂、商号，限于十日内将所存日货，完全交抗日会保存。在北平，邮务工会先行组织抗日救国会，成立了邮工义勇队和邮工宣传队，进行抗日活动。此外，南京、汉口、广州、汕头、长沙、重庆、青岛、太原、桂林等地工人群众，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日爱国活动。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地威胁和危害了中国民族工商业，此时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改变了政治态

度。“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众及城市工商业者展开了抵制日货及禁止对日本贸易运动。_上海各界救国会通过对日经济绝交决议，并实行检查日货，商界代表亦宣誓自十月一日起，决不买卖日货。其他各城市的群众也卷入这个运动，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据统计，日本对华输出一九三一年九月比上年九月减少百分之三十四点七，十月减少百分之五十九点七，十一月减少百分之六十八，十二月减少百分之六十三点八，日本在华的商业地位由第一位降到第五位，在华航业几乎停顿，在华厂商经营活动也几乎停业。一九三二年四月，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报刊——《申报》、《大公报》等均发表评论,要求国民党南京政府改变卖国内战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批评国民党“对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对于共产党势在必剿”的反动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使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间也发生了政治分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江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的率领下，于宁都举行起义，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这一大规模的起义行动，震动了坚持内战、不愿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反映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危机。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国内形势表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东北的侵略行动，迅速改变了中国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低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高潮逐渐地接近成熟。

二、国民党实行安内攘外政策，民族危机的加深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和依赖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国联进行解决。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它就下令东北军‘遇于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事变发生

时，又训诫士兵们“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事变后，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三日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讲话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①。同日，南京政府又发表了《告全国军民书》，公开声明东北事件已“诉诸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②。要全国军民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辽宁、吉林两省失陷后，蒋介石十月十二日在“国府纪念周”讲话中还一再声称：“我们在精神上已有最大的胜算，无论敌军怎样强大，怎样来威胁我们，我们只是处之坦然，……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横暴不足畏，威力不足屈，我们要和平奋斗，以捍御此次的国难，以拥护国际的公约”③。

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野心，日军在占领东北后即寻找新的借口，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日僧五人在上海马玉山路向中国工人义勇军挑衅，发生冲突。日本帝国主义蓄意扩大事态，调集兵舰，故意寻衅。二十日晨，日本特务机关指数十名日本浪人焚烧中国三友实业社工厂，杀死中国警察一人，并召开上海日侨大会，游行示威，捣毁沿途华人商店。二十四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纵火焚毁日公使重光葵公馆，作为进攻上海借口。二十七日，日领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道歉、惩凶、赔偿损失及解散抗日团体等四项要求，限二十四小时内圆满答复，否则日军采取自由

①②《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3 页。

③ 《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3—4 页。

行动。上海市长吴铁城已答应一一照办，而日海军陆战队却于二十八日晚开始军事行动，先占天通庵车站，继向北站、江湾、吴淞等处进攻。当时驻防上海的蔡廷锴十九路军，在上海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英勇奋起反击，于是爆发了上海的抗日战争,即著名的‘一二八’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企图转移中国和国际对东北的视线，稳定它对东北的统治；上海又是中国最大的都市，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如果占领上海，不仅可以直接用武力威胁南京国民政府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而且也可以作为进攻中国内地的中心基地。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援和配合抗日军队作战的热潮。除交通、水电工人外，几乎全上海的工人实行罢工，在小沙渡、杨树浦等工人集中地区，举行了盛大集会。五十四家日厂的六、七万工人，一律自动退出工厂；在日清、大阪等轮船公司做工的华员、侍员、女佣等，也纷纷告退。各商店相继举行罢市。广大市民特别是工人和青年学生踊跃参加抗战工作，几天之内就组织了许多工人大刀队、手枪队、长枪队、工程队、交通队以及救护队，有的开到前线和十九路军一同作战，或在后方进行募捐和慰劳等工作。全国各地群众，特别是海外华侨，举行广泛的募捐运动，以援助十九路军和上海市民的抗战。

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十九路军英勇奋战，连续打退优势的日军，粉碎了日军要在四个小时占领上海的狂言。上海军民孤军奋战一个多月，使日军三易主帅，死伤万余，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骄横不可一世的侵略气焰。

南京国民政府对于“一二八”事变，仍然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前，南京政府处处迁就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调动抗日情绪较高的十九路军离开上海，由于命令下迟了，日军已开始

进攻，十九路军违抗国民党的意志，奋起反击。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表面上宣布“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实则仍然不抵抗，依赖国联。它不但不增兵积极援助十九路军和上海市民抗战，反而对自动请求参战的第五军官兵也多方留难。另方面，则照会九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乞其转电各国政府，出面干涉，并再次请求国联主持“公道”。当日本帝国主义陆续增兵到十万人、军舰六十余艘、飞机百余架，而十九路军急需援助的紧急关头，南京政府却故意扬言上海战线甚短，仅一团兵力足够。说什么“十九路军有三师共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令而自由动作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① 不仅如此，蒋介石竟密令海军军舰暗中接济日军粮食、蔬菜和鸡鸭鱼肉。南京政府海军次长李世甲，在十九路军血战时，竟与日军司令野村同坐汽车参观各处战壕，万目睽睽，毫无忌惮。在南京政府的出卖下，十九路军于三月三日被迫撤离上海，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淞沪。

上海军民的英勇抗战，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短期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同时，上海是各帝国主义共同统治中国的中心地区，上海战争引起了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复杂化，日军一时难于继续扩大战争。又由于南京政府蓄意破坏上海抗战，对日妥协，使日军的无理要求得到一定的满足。于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干预下，与南京政府举行停战谈判，并于五月五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协定中允许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永久停驻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乡等地区，承认南市、浦东不驻中国任何军队，更在“共同委员会”和“特别警察”的名义下，把从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

①田家英编：《民国以来大事年表》，第 146 页。

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为止的广大地区，奉献给日本及英、美、法、意等帝国主义共管。还答应取缔全国抗日运动，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南京国民政府就这样出卖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卖了淞沪抗战的军民。

三、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着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中国人民迫在眉睫的紧急任务和普遍要求。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严厉斥责和揭露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与日共中央联合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号召。十二月十一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斥责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罪恶行径,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地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无耻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组织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迅速高涨起来。在东北，广大人民群众首先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开展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各地一部分爱国军人也自发地组织起抗日义勇军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中国共产党一面派遣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参加义勇军，帮助他们开展抗日斗争；另一方面，组织城市工人、青年学生深入农村，发动广大农民，组织抗日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把抗日游击队和共产党掌握的部分抗日义勇军联合起来，组成东北抗日联

军，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统治。

上海“一二八”抗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惊慌失措，一月三十日迁都洛阳。在这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地下组织，把上海各界人民发动起来，支持与援助十九路军的抗战。中国共产党号召上海工人阶级和劳苦群众，组织民众义勇军与游击队，参加前线作战，坚决反对“退却”“停战”，反对把上海交给任何帝国主义，把民族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鼓舞下，上海市的工人、学生、市民纷纷组织起来，担任警戒、侦察、运输、检查、通信、宣传、救护等各项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前线的作战。同时，上海各界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捐献运动，现款、金银、日用品、药品、器材等堆积如山，极大地鼓励了抗日的将士。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宣言以铁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人民爱国运动的罪行，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置国家民族存亡于不顾，对于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企图消灭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并以此转移国内视线，掩饰其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要不是国民党军阀集其全力来进攻苏区与红军，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早已与抗日的英勇士兵和义勇军站在一起直接对日作战了”①。宣言还指出，帝国主义的国际联盟组织及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都在计划瓜分中国，而国民党南京政府却“依靠某一派帝国主义反对另一派帝国主义，企图挑拨世界大战，以便帝国主义强盗在大战中来解决瓜分中国问题”②。只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被压迫民

①② 《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2 年重印。第 229 页。

族和苏联，才是真正能联合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力量。宣言郑重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国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①.

接着，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出《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指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与红军各级总政治部、红色区域军事委员会、各地军区指挥部、各县赤卫队部，应对全体红军战士进行对日宣战的动员，同时指示各级民主政府，立即对广大群众进行对日宣战的扩大宣传和动员，积极扩大红军力量，准备对日作战。

第二节　乡村建设派，中国国家社会党的建立及其政治主张

一、中国国家社会党成立及其政治纲领

中国国家社会党是由张君劢和张东荪等人发起组织的。

早在一九三〇年,张东荪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就宣传国家社会主义主张，不久即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主讲哲学。当时，张君劢亦任教于燕大，见李璜、曾琦等组织青年党俨然成为一种政治力量,遂与张东荪商议,并联络曾主编《新月》杂志、后为天津《益世报》主笔的罗隆基,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在北平发起组织‘再生社”,象征再造中华民国之意,发行《再生》周刊,从事宣传活动。再生社在北平设总部，在天津设特别区委，在上海、武汉等地设立分部，张君劢来往于平津鲁豫间指挥一切。此时，属于

① 《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 1982 年重印。第 229 页。

再生社组织之活动，也可以说是国社党的酝酿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制造“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怒，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要求更加迫切。此时，再生社社员约三百人。张君劢认为组织政党已刻不容缓，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召集再生社临时代表大会。此次大会，即是国家社会党成立大会。

该党标榜国家社会主义，其内容是“绝对的爱国主义与渐进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国家社会党的理论基础。张君劢在其所著《立国之道》一书对“绝对的爱国主义”解释说，人民之爱国非为自己谋利益，而是行其心所安；在国破家亡时，不特无好处，还得自己去牺牲，终不变其爱国之心。实际上是要人们无条件地去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而渐进的社会主义，即是改良主义，主张对现有制度加以改良，反对暴力革命。

国家社会党政纲，在国家民族方面，主张国家民族本位，反对阶级斗争。认为，民族观念是人类最强之信念。“阶级观念决不能与之相抗。无论是以往的历史，抑是目前的事象，凡民族利害一达到高度无不立刻冲破了阶级的界限。”“只有民族的纵断而能冲破阶级的横断，却未有阶级的横断而能推翻民族的结合。”① 认为马克思主张的以阶级的横断打破民族国家的纵断，“实是一种迷梦”。以苏联而论，其成功不在阶级斗争之国际化，只在社会主义之民族化，更加“证明民族观念是强于阶级观念”的②。他们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把“有民族自觉心的民众”组织起来。实则，以树立民族观念为幌子，泯灭人们的阶级观念，否认阶级斗争。

在政治方面，提出“以民主政治为根本原则，依国情充量实现之”。该党主张“必须建立一种政治制度在原则上完全合乎民主政

①② 《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 1932 年 5 月 20 日出版。

治的精神；在实施上必须使党派的操纵作用不能有所凭借。于是这种政制，在平时，不拘两党或多党都能运用，即假定无党亦可运用；而在紧急时候立刻可以集中全民的意思与力量，不分党派。我们相信这样的制度不是不能创造的。”① 这样的民主政治不仅要借重专门家的知识，而且要使专门家占有地位，“这个地位是不为党派作用所左右，或政潮所冲动”。认为，只有这样的“民意政治”或“科学的民主政治”，才能既打破多党的纷争，又防止了一党的专政，使一般的民主政治弊病“减去殆尽”。

国社党根据上述原则，设计的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是：第一、一个行使国家主权之国民代表会议，由全体公民每若干万选出代表一名组织之，其职权为（甲）选举宪法起草委员会与修正宪法起草委员会；（乙）表决宪法与宪法修正案：（丙）议订法律；（丁）表决政府预算并监督之，惟不得行使西欧国会之所谓信任投票，以更迭内阁。第一次国民代表会议决五年以内之行政大纲，有宪法同样效力，非行政院所能变更。第二、一个由国民代表会议选出之中央行政院，各党领袖一律被选，以成为举国一致的政府。行政委员互推委员长一人，对外代表国家，对内公布法令，其余分任各部会政务。第三、一个由各种从事于生产之职业团体推举代表组织全国经济会议，为全国经济计划之咨询与建议机关。行政大纲每过一年或告一段落之际，由国民代表检查其实施情形。此外，实行司法独立，法官须脱离党派并有严格保障，行政诉讼应属于司法范围。设立审计院审核各级政府之决算，确立文官制度，以分科考试录用之。这些主张，表面上似乎给人们提供了参政机会，实际上是在保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条件下，作某些改良，装璜一点“民主”的门面，也为张君励这样有政治野

① 《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 1932 年 5 月 20 日出版。

心的人挤进政权开拓道路。

在经济方面，该党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即把国家社会主义的要素加入中国的经济中，使国家资本的经济与私营的经济以及合作的经济有一个相当的比例，在统一计划之下进行。其具体原则是：第一、为谋个人生存之安全，并改进其智能与境况计，确认私有财产；第二、为谋社会公共幸福，并发展民族经济与调剂私人经济计，确认公有财产；第三、不论私有公有，全国经济，须在国家制定计划下，由国家与私人分担并贯彻之：第四、依国家计划，使私有财产趋于平衡普遍，使人人有产，无贫富悬殊现象；第五、国家以公道与平和的方法吸收、转移私人生产或余值，以为民族经济扩充之资本；第六、谋民族经济在世界经济上取得平等地位，并得辅助之，促进世界经济问题之解决。

国社党的经济主张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主张把政治与经济分开，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该党认为，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贫穷，国家社会主义是唯一的解救办法。“ 因为这种主义的凭借便是民族主义，以民族的团成一体来作一切的根据。其所以与共产主义不相同的地方亦就在共产主义以阶级为立场，而这个主义即以民族为分野。”它认为共产主义“ 把经济与政治冶于一炉 ”,过于注重阶级，“ 把国内的一部分原气牺牲了 ”①。第二是反对共产主义，主张保留私有制。该党纲领明确提出，“ 确认私有财产 ”，不同意共产主义的主张。“ 共产主义还有两点是我要反对的。第一是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国有以后，势必都变为官营。第二是一切生产工具属于社会以后则私产制度必是废除了。 ”②由此可见，国社党尽管其主张自称为“ 渐进的社会主义 ”或曰“ 国家社会主义 ”,由于它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这种“ 社会主义 ” 充其

①②《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 1932 年 5 月 20 日出版。

量是社会改良主义，实质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在文化教育方面，主张发扬民族文化，普及国民教育；增进人民生产能力；厉行公民训练：养成共同生活之道德习惯；提高贡献于人类之学术研究；保障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人民不因财产限制，而失其受教育之平等机会。

国社党组织系统分中央部、支部、分部三级，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为中央部总务委员会，设总秘书一人，执行总务委员会之决议，并分设文书、财政、组织、宣传四处，主要任务是执行党章、筹划财政以及决定该党对政局之态度。此外，中央部尚设有纠察委员会与政务研究委员会，政务研究委员会之下,又设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组。国社党党员以张君劢、张东荪担任大学教授时之学生为多，青年党党员亦有转入者，该党活动对象，多属于上层政治人物，群众基础薄弱。

上述情况表明，国社党是由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在国内政治形势变化时刻，要形成一种政治力量，争取参加政权，而组织起来的一个资产阶级右翼的派别。

二、乡村建设派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三十年代，在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农村经济加速了崩溃和破产，使农村阶级矛盾更加激化，促进农村革命斗争的发展；农村购买力极度低下，使帝国主义在中国倾销过剩商品和收购廉价原料遇到严重困难；农业经济的破产，也严重地影响到地主阶级的封建经济。在这种经济政治背景下,帝国主义者要‘救济’农村(国联调查组提出),国民党反动派要‘复兴’农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于一九三三年五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封建地主阶级要‘建设’农村。于是“救济农村”“建设农村”之声喧嚣一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

乡建派有中国乡村建设学会之组织，亦称村治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普遍全国，工作单位甚多，主张与做法亦不相同，尚未形成政治性之组织。如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五大学华北农村促进会、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国华洋义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徐公桥等地实验区，以及金陵大学农学院之各地农业改良推广等，其活动都以农村为对象，又多着眼于农村局部改良之设施，或从事技术改良之实验。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则着眼于整个中国问题的解决，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所谓乡建派即指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而言。

乡建派之前身为村治派，始于山东王鸿一在北平创办之村治月刊，提倡中国建设应自建设乡村入手；同时，梁漱溟于广东提倡乡治，要"替中国民族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走"①，建议当时广东省政府创办乡治人员训练所。一九二九年梁漱溟北上，接办村治月刊，又在河南创办村治学院，使南北主张乡治与村治合而为一。一九三〇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成立，乃奠定乡建派之据点，与各地乡建运动工作单位进一步联系，扩充力量，并组织了中国乡村建设学会，乡建派正式形成。

中国乡村建设学会成立之初，会员仅限于各工作单位的负责人，人数很少，主要负责人有梁漱溟、梁仲华、章元善、晏阳初、杨开道等。梁漱溟著有《乡村建设理论》等书，成为乡建派的理论基础。

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②，人与人是"义务关系"、"情谊关系"，因此，"中国没有革命的对象，只有

① 梁漱溟：《主编本刊之自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华书局 1933 年版。

② 《乡村建设理论》第 28 页，乡村书店 1939 年版

建设的对象”。中国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法制礼俗悉被否认’”，社会才动乱不安，所以唯一出路就是进行‘乡村建设’”，恢复‘法制礼俗’”，维持‘社会秩序’”。

梁漱溟在阐述‘乡村建设由何而起’时，比较充分地论证了乡村建设的必要性。第一，“起于救济乡村运动”。他说：“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但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和共产党，都在破坏乡村：“中国近百年史，亦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因此，“乡村建设运动，是由于近些年来的乡村破坏而激起来的救济乡村运动。”① 第二，“起于乡村自救运动”。他认为，乡村所以遭到‘绝对破坏’”，在于中国近二三十年间政治上无办法：“虽然破坏乡村的，有天灾，有人祸，有国际的因素，有国内的因素等别。细按起来，天灾不能怪天，皆由人事未尽，其责实在政府。”所谓问题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当局不好那些意思，而是特指没有唯一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的局面那一点——这实在是不成政治，或“政治的没有”。在此分裂局面下，南一政府、北一政府、东一政府、西一政府，不但无法应付国际环境，无法防救天灾，而且造成特有的人祸。——乡村成了绝对牺牲品。”由于‘中国乡村无限止的破坏，迫得不能不自救”。“其工作第一步就要防止直接的破坏，对于土匪和杂牌军队的骚扰，必须武装自卫”②。第三，“起于积极建设之要求”。他认为，中国由于经济落后而一切都落后，大家都抱有一种积极建设的要求。“不过有人想走近代资本主义的路，有人要学苏俄，有人要学意大利，所见种种不同。

①《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

② 《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乡村建设理论》，重庆乡村之后 1939 年版。

乡村建设亦是其中一种；并且亦许是渐渐要占势力的一种”①。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解决经济问题，也“必复兴农村入手”；“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路。”乡村建设运动，正“是起于中国社会积极建设之要求”。第四，“起于重建一新社会构造的要求。”梁漱溟说，中国问题究竟在那里？有人认为是在‘帝国主义与军阀’，有人说在‘贫、愚、弱、私’，这两种看法都不正确，为现象挡住了视线，没有抓住根本问题。他说，从事乡村运动，要着眼整个中国，否则就看不清问题之所在，乡村工作也不会发生效果。“须知今日整个中国社会日趋崩溃，向下沉沦，在此大势中，其问题明非一乡、一邑或某一方面（如教育一面、工业一面、都市一面、乡村一面等）所得单独解决”②。所以，乡村建设决不局限于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乡村建设运动乃是‘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或曰一种‘建国运动’，这才是‘乡村建设真意义所在’。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梁漱溟将乡村建设的任务规定为恢复“法制礼俗”，维持‘社会秩序’。所谓‘伦理本位社会’，实际上就是封建时代的宗法社会；所谓‘职业分立社会’，就是蓄意抹煞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尖锐的阶级对立，硬把“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③，麻痹农民群众革命意志，取消革命斗争。简言之，就是要恢复已被破坏的残缺不全的封建社会的一套秩序。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建立乡农学校。乡农学校分乡学和村学两种，乡学相当于普通的区公所，村学相当于普通的乡公所，不过他们兼负着教育农民的责任。乡农学校的校长和理事，由县政府礼聘和委任当地‘有资望有信用’的‘齿德并茂’的人担任，其中大多数是地主豪绅。教员是由外面请来的

①②《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

③《中国文化要义》第87页。

知识分子，这些人下乡前要先到梁漱溟所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进行“党义”（包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和现行法令、公文程式等的学习和训练，方可任教。这种乡农学校的重要特征就是“政教合一”，把学校与国民党政权结为一体。用阶级合作的原则，把地主、贫雇农、债主、债户、土豪劣绅组成一个无等级无差别的一团；“整顿新风”；“造出新礼俗”，保护地主豪绅阶级的利益，以防止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其次，要建立“乡村自卫组织”，训练“有室家财产”的人，组织“连庄会”实际上是建立地主豪绅掌握的地方武装。再次，要“尽力复兴于农业生产”。发展农业必须把握三个要点：“一、流通金融；二、引入科学技术，三、促进合作组织。”① 梁漱溟在国民党政府支持下，在邹平曾建立信用、棉花运销、林业、购买等合作社，地主掌握领导权，贫苦农民不仅没有资格参加，还要受其剥削。所谓流通金融，是要“使资金返输于农村”，解决“金融枯竭”，开发新式农业。引入科学技术，主要是依靠农业改良试验推广机关去办。至于农村工业建设，主要是手工业，即“以自己现成的劳力加工于自己现成的材料，满足自己的需要”②。

梁漱溟提倡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是要同共产党争夺农民群众，争夺青年，指点一条人生的“大道”。他毫不隐讳地说：“当此走头无路，急迫之间，一般人不是穷极思返，折回来走清末民初的旧道；便是穷极思异，激进于共产党。”“共产党在眼前短期间内，将成为一时有力倾向”，这是个“可怕的”危机”；“我们如果不能指点出一[illegible]足人心的新方向，不能开辟一条给社会有力分子情甘努力的大道，则举国青年都要走上死路，其将成为何等的惨事啊！”“我的乡治主张正是切就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为人生

①② 《乡村建设理论》第 401 页、389 页，

大道的指导。”① 他还公开地说乡村建设是农民运动的“正轨”，企图以此代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梁漱溟说：“共产党的作为，实是中国的一种农民运动。农民运动为中国今日必定要有的，谁若是忽视农民运动，便是不识时务；要想消灭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来替代才可以。我们的乡村组织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可以替代共产党。”②

梁漱溟还从“理论”上论证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有三大困难，是走不通的：“第一阶级基础难”：他说，共产党自称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而现代工业“在中国又有几何”？无产阶级在社会中的比例是“微乎其微”；“靠他革命是靠不来的”：农民“保守性格外深重”，要发动农民革命“简直是碰壁不通”。一切劳苦群众都不想革命，“只有失业流落，荒唐嗜赌，或少数例外的人，才去革命”③。“第二革命对象难”：他说：“现在凡是关切中国问题的人，多半痛恨两个势力：一是帝国主义，一是封建军阀。”可是“以此为对象，则为错误。”④“国际的侵略压迫亦不能怪人家，而实由自己不能应付环境，最大原因在自身陷于分裂冲突不能凝合为一个力量以对外。”⑤ 这种倒果为因的说法，同胡适“五魔”乱中华说如出一辙。梁漱溟认为，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封建军阀也不是革命对象，甚至说封建军阀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才出现的。他还说：“现在许多人咒骂剥削，其实中国离剥削尚远，没有秩序那能谈到剥削！”⑥ 这样，把革命对象一一否认了，也就否认了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的必要性。第三“理论统一难”。梁漱溟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而且风马牛不相及地将一九

①《主编本刊之自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华书局 1933年版。
②《乡村建设理论》 279—280页。
③④⑤⑥ 《乡村建设理论》177页、99页、74页。重庆乡村书店1939年版。

二七年后国民党内各派别的争论,说成为‘理论统一难”,进而断言“理论不成其为革命理论，只革命就是了，方向没有准确方向，只行动就是了。”①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理论基础,就是他所说的‘中国文化”,亦即‘乡村文化”。他认为:“一种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②, 所以“凡以中国未进于科学者，昧矣，谬矣，中国已不能进于德谟克拉西。同样之理，凡以中国未进于资本主义者，昧矣，谬矣，中国已不能进于资本主义。”③ 中国的文化是特殊的，一切革命的理论,都不能适用于中国。他指出:“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我们经济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路；我们经济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要走的路。”④ 中国的出路就在于维护固有的“中国文化”,即封建文化。他说,这样‘外国侵略虽为患,而所患不在外国侵略，使有秩序则社会生活顺利进行，自身有力量可以御外也。民穷财尽虽可忧，而所忧不在民穷财尽，使有秩序则社会生活顺利进行,生息长养不难日起有功也。”⑤ 别的理论都不行，只有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才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梁漱溟在大革命失败后提出‘乡村建设论”,鼓吹‘乡村建设运动”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梁漱溟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早在五四时期，他就鼓吹封建文化和旧礼教，反对新文化运动。在大革命年代，他又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主张‘不独要清除共产党分子,还要

①《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中华书局 1933 年版。
②《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第 10 页。
③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第 97 页。
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第 108 页。
⑤ 《乡村建设理论提纲》第85页。

清除共产党的理论”。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革命战争，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的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形成一个强大的不可抗御的革命洪流。这时，梁漱溟更竭力地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叫嚷“要想清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代替才可以。”① 事实正是这样，他以乡村建设为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以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挽救地主阶级垂死的命运。

第三节　生产人民党的建立，福建事变的发动及其失败

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及其活动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华民族面临着国家存亡的危险时刻，抗日救亡迫在眉睫。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卖国投降，对内施行法西斯独裁，发动反革命内战。在国民党统治区里，特务横行，任意绑架、秘密逮捕革命者，酷刑逼供，随意处死，查禁书报，箝制舆论，造成一片白色恐怖气氛。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是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中诞生的，它是对国民党反动政权进行公开斗争的一个组织。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正式成立。同盟总会设在上海，最高执行机构是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一九三三年一月，先后成立了上海分会和北平分会。鲁迅被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并

① 《乡村建设理论》第279—280页，乡村书店，1939年版。

经常参加同盟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与上海执行委员会召开的联席会议。同盟原拟在全国各重要城市普遍成立分会，在此基础上召开同盟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国委员会。后因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未能实现。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进步团体。其宗旨在于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章程中，对同盟任务作了明确规定：（一）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目前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的制度。同盟首要的工作对象是大量的无名囚犯；（二）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三）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一九三二年十月，宋庆龄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中，着重阐明同盟不是一个政党，它的任务十分有限，但是它所处理的问题——争取民主权利和争取政治犯的释放——却是政治性的。这些问题是和震撼世界和震撼中国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而且是这些斗争的一部分。“由于本同盟不是一个政党，它的行列可以容纳一切真诚支持我们的斗争要求的人们。但是那些帮助政府压迫人民或为这种压迫辩护的人们，在本同盟中是没有立足余地的。本同盟也不容留那些只是软弱地‘批评’政府个别的专横残暴的行为，而实则拥护那整套压迫人民的‘合法的’恐怖政策，并支持国民党——地主、资本家、豪绅和军人的政党——箝制民主权利的人们。”①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它通过发表宣言、声明，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揭露它“为极少数的封建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的实质，揭露它“极端残酷地

①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79 年版

镇压工人、农民和学生”的罪行，要求废止“危害民国治罪法”和“出版法”。宋庆龄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形式民主的虚伪实质。指出，这种“民主”只给少数人以民主权利，对人民大众则是有名无实的。这种形式民主，只有在它不妨碍资本家剥削、掠夺人民的“权利”时，才被允许留存。事实上，这些‘民主’制度不过是严密保障着一小撮剥削者的权势的一种制度。这些制度的‘民主权利’不过是掩盖这一小撮剥削者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独裁统治的烟幕。但是连这一点形式的民主，在它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抵触的时候，也要被取消的。’① 她号召人民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力量取得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当时，同盟向国民党的抗议、发表的宣言，在国内不能发表，主要是靠史沫特莱、伊罗生及其他外国记者，用电报发到国外。西欧和美国的进步人士如肖伯纳、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等著名人物，根据这些材料，签名发表抗议和宣言，对国际舆论有很大影响。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做了大量营救政治犯的工作。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七日，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及其夫人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英国巡捕逮捕，随即转交给国民党法院处理。牛兰夫妇辗转于南京、苏州的军事监狱、法院监狱之中，待遇极为恶劣。中外各界著名人士组成国际援救牛兰委员会，积极活动，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牛兰夫妇。宋庆龄、杨杏佛等亲赴江苏第一监狱，探视牛兰夫妇。在牛兰夫妇遭受非人待遇而绝食时，宋庆龄曾电南京当局和汪精卫，要求对牛兰夫妇生命负责，答应其要求，使其复食和获得自由，否则“全世界革命舆论、自由主义舆论皆将指牛兰夫妇之死为国民党所预谋杀害，皆将指此种谋杀仅与德国希特勒式之野蛮残酷差可比拟。’② 一九三三年三月，罗登贤、

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79年版。

②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第55页，1979年版。

廖承志、陈赓等五人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逮捕并被引渡给南京国民政府，同盟立即组织营救政治犯委员会。宋庆龄通过外国报纸发表声明，号召中国人民为保护被捕的革命者起来斗争。她指出：正当蒋介石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准备签订秘密条约，阴谋出卖民族利益的时候，“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工作者和领袖们却因为反对祖国被瓜分和奴役而受到了逮捕、酷刑、处死，在中世纪的牢狱中活受罪”。罗登贤等五人“不是罪犯，而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如果容许这样的革命战士被逮捕、被监禁，甚至被杀害，就是容许反动势力摧残中国民族生命的根苗。她强调指出：“中国的人民大众必须团结起来进行坚决斗争，才能消灭这种罪恶行为。只有我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把我们的国家从帝国主义者及其中国走狗的魔掌中解放出来，建立我们自己的法庭和其他自由人民的机构，才能永远消灭这些罪恶行为。”① 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等还专程赴南京营救罗登贤、陈赓等人，并且探望了他们。随后，同盟正式函请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务将罗登贤、陈赓等移交法院审理，以重民权。此外，同盟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曾要求释放在北平被非法拘捕的许德珩等进步师生；一九三二年二月，抗议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顾祝同枪杀镇江《江声报》记者刘煜生，要求惩办凶手；一九三三年五月，营救被特务秘密绑架的丁玲等。还抗议杀害左翼作家应修人。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曾调查监狱情况，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四项要求：（一）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二）废止滥刑；（三）给予政治犯阅报读书之自由，禁用镣铐及改良狱中待遇；（四）严惩狱吏敲剥犯人及受贿行为。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宋庆龄、蔡元培、

①《告中国人民》，《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

鲁迅、杨杏佛代表同盟到上海黄浦路德国驻沪领事馆递送抗议书，谴责希特勒政府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的迫害。德国驻沪领事贝连，被迫允诺将抗议书转达该国驻华公使。抗议书既是声讨希特勒，也是抨击蒋介石。

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三十多个工人、学生、作家、知识界、商人等团体，成立了“国民御侮自救会”，号召团结抗日力量，反对国民党妥协投降。它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立刻派全国军队，开赴东北、华北，收复东北、热河，保卫华北；立刻武装全部民众，发给枪支军用品；援助东北义勇军；扩大抵制日货，等等。宋庆龄在“国民御侮自救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中，揭露了“国民党政府阻挠人民抵抗，禁止抵货、不援助义勇军、摧残人民的民权”的罪恶行径，号召“在全国各城市乡村我们应一致奋斗来要求：（一）全国军队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配以适当的军械与飞机，应开拔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收复满洲热河、保卫中国；（二）人民应全部武装，组织人民自卫团；（三）人民的民权（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立即恢复，革命分子的监禁酷刑与杀戮应立即废止；（四）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域的进攻。”①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一个自愿加入的群众团体，成员比较复杂，其内部不可避免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同盟的左派主张，争取民权的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分割的。广大工农群众要真正享受最广泛的民主，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能乞求反动统治阶级的恩赐。混进同盟的右翼代表人物胡适，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信徒和国民党反动法制的辩护士，妄图使同盟成为国民党统治体系的附属品。胡适玩弄两面派手法，以保障“人权”为名，行维护

①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第 42 页，1979 年版。

反动政府之实。当同盟提出监狱黑暗的问题时，胡适在参观北平几个监狱后竟向《字林西报》记者吹嘘监狱中如何“自由”，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没有“一点”严刑拷打的“证据”，等等，极力为国民党反动派涂脂抹粉。胡适还说，不能“离开了法律来谈民权保障”，如“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就是“与虎谋皮”。宋庆龄曾气愤地说：“胡适身为同盟的盟员，又是北平分会主席，竟进行反对同盟的活动，他这种行动是不老实的和反动的。”①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坚决反击了右派的叛盟活动，撤销胡适的北平分会主席职务，并将其开除盟籍，捍卫了同盟的正确方向。

国民党反动派除利用它的走卒进行破坏外，还通过《社会新闻》等御用刊物造谣诬蔑，对一些成员进行人身攻击。它们还勾结帝国主义，假手英、法租界巡捕房禁止同盟租用公共场所开会。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蒋介石亲自指挥戴笠派特务刺杀了杨杏佛，并杀死凶手过得诚以灭口；宋庆龄、蔡元培等也不断接到国民党特务的恐吓信；国民党反动派还扬言，要在杨杏佛出殡这一天暗杀同盟中其他人，特别是鲁迅。但是，在杨杏佛入殓这一天，鲁迅毫不犹豫地去送殡，宋庆龄为杨杏佛被害发表声明，她大义凛然地说：“我们非但没有被吓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励，直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② 面对残酷的暗杀和恐吓，宋庆龄和鲁迅等人仍以无畏的革命精神，用各种方式与敌人进行斗争。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虽然存在和活动的时间不长，但是它所进行的政治斗争，是当时中国人民日趋高涨的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它密切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反蒋斗争。起了积

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第 6 页。
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第1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极的作用。

二、生产人民党和福建人民政府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的影响下，驻守在福建的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他们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同共产党合作，开展抗日反蒋运动。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变。

福建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的产物，是国民党内一部分政治、军事领导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卖国内战政策不满而导致的国民党营垒的破裂。

发动福建事变的主要力量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是北伐战争中的劲旅第四军第十师。大革命失败后，它曾一度参加南昌起义，但不久就投靠了蒋介石集团。一九三〇年十九路军组建后，连年参加军阀混战，广大官兵深感蒋介石力图在内战中消灭异己，对军阀战争普遍表现厌烦情绪。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大规模入侵中国，使集结在江西赣州整补的十九路军官兵受到很大的震动，他们开始认识到“连年内战，枪口不能对外，是造成日寇想灭亡我国的主要原因。”①在全国抗日反蒋潮流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号召下，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三万余人，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在赣州体育场举行的阅兵式上，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十九路军调防京沪之后，上海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浪潮，给十九路军广大官兵以强烈影响，推动着十九路军领导人下定抗日反蒋的决心。

①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九辑。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下令将十九路军的三个师分遣皖、鄂、赣参加内战。这个肢解十九路军的阴谋遭到多方反对，蒋介石又令该军到福建“剿共”，其目的在于使十九路军与红军两败俱伤，坐收渔人之利。一九三二年底，福建省政府改组，蒋光鼐任省府主席，蔡廷锴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寇占领山海关侵入华北，蒋介石继续推行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粉碎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由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等三个条件下，红军愿意同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共产党的爱国主张极大地激励了要求抗日的十九路军，推动着十九路军领导人走上抗日反蒋的道路。五月底，蒋介石又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出卖华北、平津的《塘沽协定》，还下令“侈谈抗日者，杀无赦”。六月一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揭露蒋介石的内战卖国政策，反对塘沽协定，重申“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国，争取中国民族的解放与独立。这就使十九路军领导人进一步认识到,抗日必须反蒋,反蒋抗日必须联共;“如今红军敞开大门，我们迫切需要和中共建立密切的关系。”① 从此双方比较频繁的接触，进入休战状态。十月二十六日双方签署了著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协定指出:“双方为挽救中华民族之危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之阴谋，并实现苏维埃政府及红

① 蒋光鼐:《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补充》,《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

军每次宣言，准备进行反日的军事同盟”①。十一月，各地主张抗日反蒋人士应陈铭枢之邀，陆续抵达福州，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这是一次反蒋政治力量的会合，推动着福建事变的爆发。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福州南校场（今五一广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到会的二十几个省市和海外华侨的代表共一百多人，还有十九路军官兵、福建省各机关及社会团体、群众共数万人。大会主席团十七人。黄琪翔致开会词。大会发表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定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徐谦、戴戟、黄琪翔、李章达、余心清（代表冯玉祥）、何公敢等十一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人民革命政府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正式宣告成立，下设三个委员会、两部、一院、一局，李济深为军事委员会主席，陈铭枢为文化委员会主席，余心清代经济委员会主席，蒋光鼐为财政部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徐谦为最高法院院长，李章达为政治保卫局局长。

福建人民政府将福建省划分为闽海、兴泉、龙漳、延建四省和福州、厦门两个特别市，分别任命了正副省长、厦门市长、福州市公安局长（不设市长）。试图仿效西方政体，建立联邦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一共召开了十六次委员会议，先后颁布了《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人民革命政府对外宣言》、《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最低纲领十八条》等重要文件以及一系列政策法令，制定了福建人民政府的内外政策。

在政治方面，福建人民政府对外提出“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认一切帝国主义者强订立之不

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933年十月二十六日，《红色中华》149期。

平等条约”对内提出“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取消党治,还政于民”“打倒蒋介石和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人民有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信仰、示威、罢工之自由”“各民族一律平等”。

为进一步开展反蒋宣传，福建人民政府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发表了《告全国武装同志书》，十二月六日颁发了《通缉蒋中正等》布告。还在政府机关报《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反蒋文章，揭露蒋介石卖国罪行，号召把“枪口对准蒋介石”。同时，实行大赦，释放了一批政治犯，组织了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文化总同盟等群众团体，开展了一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给人民一些民主自由权利。

在经济方面，福建人民政府提出“实行对外贸易统制”，“厉行关税自主”，“外资经营及外人管理之企业与文化事业，有危害中华民族利益者，得制裁没收之”。对内提倡“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立行耕者有其田，实行计口授田。”

十二月二日，福建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通过议案，维护民族资本，奖励建设，绝对尊重民营工商业固有权利并帮助其发展。十二月六日，又颁布了《保护工商资本》的布告，政府领导人还多次召集商人开会，解释政府法令，消除工商界的怀疑情绪。在农村，福建人民政府试图以“计口授田”办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在军事方面，十一月二十三日，福建人民政府第二次会议决定扩充军事，将十九路军所辖的五个师十个旅扩充为五个军十个师的番号，成立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蔡廷锴任总司令，原师、旅长升任军、师长。总司令部还管辖一个独立师、两个独立团，两个空军大队，海军陆战队两个独立旅，以及特务团等武装，共约六、七万人。

上述纲领表明，福建事变领导人在政治上要求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主张打倒军阀、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在经济上主张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民族经济，进行现代工业建设。这些主张，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的利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是有进步意义的。

福建事变领导人认为，“整个国民党为蒋中正所把持操纵”，成为“其残民卖国之手段”，所以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由李章达倡议领衔，陈铭枢，李济深等人通电脱离国民党。二十四日，十九路军高级将领也通电脱离国民党。随后，十九路军部队官兵均宣布脱离国民党。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也于十二月十一日发出《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宣告解散启事》，说明该党一九三〇年在邓演达领导下宣布的政纲，其内容与中华共和国的基本原则人权宣言相同，无独立组织之必要，故正式宣布解散一切组织，与其他政治主张相同之革命势力，共同担负中国革命任务。各派领导人决定以集体签名方式发起组织“生产人民党”，由陈铭枢任总书记，并起草了党纲。当时在福建地区，脱离国民党的分子，已解散的第三党人，少数共产党的脱党分子，以及十九路军中级以上军官大都参加了这个组织。此外，马来亚、日里（即印度尼西亚的棉兰）、越南等地华侨多人也来到福州，参加了“生产人民党”。参加生产党的主要是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阶级代表人物。它在形式上是一个统一的政党组织，实际上只是把有关的党派和政治团体捏合一起，队伍并不整齐，步调也不一致，它在福建人民政府中不能起核心领导作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它转移到香港存在一个时期即自行解体。

福建人民政府根据《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初步合作。十一月二十七日，陈子航、张云逸分别代表中华人

革命政府闽西善后处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签订了《闽西边界与交通条约》，明确划分了军事疆界线，解决了双方人员往来的安全与交通问题。共产党和红军代表还驻在十九路军总部里，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就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进行了广泛接触和联系。双方还进行贸易往来，红军用粮食换取闽方的食盐和杂货，这种联系一直坚持到一九三四年二月才中断。

蒋介石集团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坚决消灭的态度。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晚，国民党急忙召开第三百八十四次中政会，议请国民政府严厉处置“闽变”。二十二日，蒋介石连续发表了《告十九路军将士书》、《为闽变致剿匪将士及全国各军长官漾电》，派飞机到福建广为散发，叫嚣平定“闽变”，坚持“剿共”。汪精卫亦通电各省、市政府，主张用军事手段解决“闽变”。二十三日，国民党第九十九次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的党籍，并交政府严行拿办。蒋介石派人四处活动，收买了两广军阀。于是，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反对“闽变”。蒋介石还以金钱、官职收买在福建的刘和鼎、卢兴邦等部，收编了原闽省军阀张贞、陈国辉的旧部及地方“民军”，组织“讨贼军”、“讨逆军”，从福建内部配合蒋军的进攻。此外，又通过各种关系收买十九路军高级将领毛维寿、张炎、黄强等，派遣特务潜入十九路军内部，收集情报，分化瓦解十九路军。

一九三三年底，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调派大批军队向福建进攻，派飞机轰炸福州、漳州等地，派海军封锁福建海口，进袭福州、厦门等地。蒋介石又指使亲日分子陈仪到台湾与日本侵略者签订秘密协定，请求日本出兵协助。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日军进入马江，一九三四年一月占领厦门。一月五日，蒋介石军队与十九路军激战于延平、古田一带。十五日，蒋介石军队

攻陷福州。福建人民政府虽分兵三路迎击敌人，但是，它在政治上是软弱的，军事上又没有正确部署，事变后不敢发动和依靠工农群众，其内部又发生叛变。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曾请求红军稍向东移，靠近闽北，与十九路军相联络，以免为蒋军所乘，从中间突破。由于中共中央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没有及时地援助十九路军。这样，十九路军在优势的日蒋军队联合进攻下，终于失败了。

福建事变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失败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逐步转入了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三、国民党强化反动统治，加紧对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破坏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阶级斗争的激化，蒋介石为镇压革命人民，维护和强化其反动统治，设立了恐怖性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国民党以“一切为了剿共”为中心，认定“心腹之患，甚于外敌。”[①] 早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国民党的四全大会上，已经组织了“剿共问题起草委员会”，专门研究剿共方案。同时，蒋介石在汉口召开湖北各县长会议，提出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理论，采用保甲制度，厉行连坐法，改组反动的地方武装队伍，成立保安队、壮丁队、铲共义勇队，强化各级反动的政治机构，要求地方土豪劣绅回乡主持地方行政，配合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工农红军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在对鄂、豫、皖、湘、赣五省军政长官讲话中，把“围剿”红军的成败，看成是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生存死亡的关

①《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第 37 页。

键”。因此,国民党反动派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失败后,加紧“攘外必先安内”的欺骗宣传,宣扬“剿共不成必亡于俄,抗日不成亡于日,亡于日尚可徐图恢复,亡于俄将永无翻身之日”的反动谬论。并且提倡“新生活运动”鼓吹“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企图以此来麻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意志。

国民党反动政府为镇压抗日群众运动,曾颁布了许多紧急法令。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南京政府便宣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四月又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施行条例”;一九三五年六月发表“敦睦邻邦令”,一九三六年九月又重申“睦邻令”;同年二月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这些法律都是专门用来对付一切抗日群众运动的。在“敦睦邻邦令”中,更明白地规定“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均处以妨害邦交罪。”

在“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中规定:“(一)遇有扰乱秩序,鼓动暴动破坏交通以及其他危害国或之事变发生时,责有公安责任之军警,得以武力或其他有效方法制止;(二)遇有以文字、图画、演说或其他方法而为前项犯罪之宣传者,得当场逮捕,并得于必要时以武力或其他有效方法排除其抵抗;(三)军警遇有妨害秩序煽惑民众之集会游行,应立予解散,并得逮捕首谋者及抵抗解散之人;(四)遇有前述各项之事变时,应将携有武器者,立即缴械及逮捕之,并得搜捕嫌疑犯;(五)明知为违犯本法之人犯,而藏匿留容或之隐避者,得逮捕之……。”① 这样,就为国民党反动军队、警察、保安队等枪杀抗日群众,逮捕救国分子,解散救亡团体,封闭救亡言论机关之反革命暴行,提供了所谓“法律”上的根据。

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出现新的高潮时,

①《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第 48 页。

蒋介石仍然坚持对日妥协投降政策。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三日，蒋介石在“中央纪念周”讲演中又说：“我们要解决外交问题，先就要解决内政问题，自从‘九一八’以来，中央一贯的方针就是‘安内攘外’四个字，认定内不能安，不仅外不能攘，而且‘外交’二字也说不来，……只要内政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外交问题自然得到完满的结果。”① 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对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破坏和镇压，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

第四节　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对中间派的错误政策

一、共产党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形成

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陈绍禹），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台，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形成及其在中共中央统治长达四年之久，是同共产党国际相关的。

王明等人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但他们并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指南，而是看作万世不变的教条，生搬硬套，夸夸其谈，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从一九二九年秋到一九三〇年，王明先后在《红旗》、《布尔什维克》等刊物上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宣传了许多“左”倾错误观点。

一九三〇年夏，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① 《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第55——56页

错误。同年九月，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左”倾错误。王明乘机加紧宗派活动，三中全会后他写了一本叫做《两条路线》即后来称做《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三中全会调和路线”“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要求“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从而，掀起了反三中全会的风潮。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米夫的把持下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这个会上居然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江苏省委书记，实际上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

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虽然也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但主要是批评李立三的所谓“右倾”，指责三中全会对“以‘左倾，词句为盾牌的以立三为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这本小册子是新的“左”倾纲领，成为王明“左”倾错误的“理论”基础。

第一、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夸大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强调“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得到彻底胜利”，从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第二、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当全国革命形势基本上还处在低潮的时候，王明却否认敌强我弱，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他认为，“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分”，“中国革命在全国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首先在一个或几个重要省区的

胜利”。因此，他主张，党的策略路线应该是进攻的，而不是防御的，要求在白色恐怖严重的国民党统治区“加紧发动和领导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各种方式的斗争”，“在政治上、组织上、群众基础上真正准备和创造武装起义的一切必要前提”；要求红军“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第三、在党内斗争的问题上，王明片面夸大党内斗争的意义和作用，认为“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应当是党的一切行动和指导的基础”,要实行‘不调和的无情的斗争”。当时“左”倾是党内的主要危险,王明却强调‘集中火力去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和‘对于不正确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把对他们有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的同志一律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等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六届四中全会后,他们还有系统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和新的领导干部，以贯彻他们的‘左’倾路线,开展‘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级党的领导”,进一步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把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和错误的肃反政策混淆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遭到诬陷，造成极为痛心的损失。

王明的这些错误主张，都是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那里来的，几乎他的每一个结论都可以从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中找到出处。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因此，王明这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新的‘左’倾错误,比前两次‘左’倾更有一套空洞的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为完备。

二、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对中间派别的错误政策及其恶果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虽然也承认现阶段中国革命是民主主

义性质的革命，但是他们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甚至把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并列起来，夸大民主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与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认为，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不可能存在中间营垒或第三派，否认资产阶级自由运动的存在，断定它们都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由于第三派在人民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进而把它们看作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要求和他们进行‘决死斗争’,主张‘打倒一切’。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怒潮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要求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改弦更张”，停止反共内战政策；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队将领也反对不抵抗主义，迫切要求抗日。在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冲击下，蒋介石集团处于相当困难的局面。

王明“左”倾领导人无视中间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否认它们的抗日要求，仍然把它们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同等看待，认为中间派别提出的‘要求国民党对日宣战’、‘断绝邦交’、‘对日经济绝交’等口号，“在实际上不过是掩护国民党的出卖与投降的烟幕弹，而且实际上是同样的出卖民族利益的必要的条件。”① 甚至武断地说，这些派别“更利用他们在野的地位，帮助国民党，用许多‘民族的,‘爱国的’以至所谓‘革命的’主张,愚弄民众,来巩固地主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② 要求揭露这些派别的‘欺骗’,揭露“它们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整个统治的作用”，使这些团体里的

① 《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1932 年 6 月 24 日),《六大以来》(上)第 255 页。

②洛甫：《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1931 年 10 月 26 日),《六大以来》(上)第 157 页。

群众“脱离它们的领袖”，实际上要瓦解这些要求抗日的团体。当时，国民党一些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冯玉祥等，表示要对日宣战，准备出兵平津，反映了国民党营垒对日主张的分歧，有利于人民革命事业。但是“左”倾领导却认为，他们“所以如此一致地主张对日宣战，主要的目的，还是在对付革命，维持在革命恐怖之前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①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领导下英勇抗战，得到上海各阶层人民支援，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可是，“左”倾领导人却拒绝同赞成抗日的反蒋各派势力进行联合。他们提出“要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推翻国民党军阀的这一领导，把领导权拿在民众自己手里。”要“革命的士兵，立刻组织兵士委员会，直接接收与分配民众的捐款与慰劳品，监视与逮捕一切不抵抗的长官，并加入民众的革命组织。”② 这种要兵不要官的所谓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不仅不积极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反而促使十九路军内部的分裂。这样，“左”倾领导人不可能把一切可能成为共产党的抗日同盟者团结在自己周围，反而孤立了自己，有利了国民党结成反革命统一战线向革命进攻。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机械地从“两个政权对立”的公式出发，不承认“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事实，否认中间派别的反蒋要求。当时，中间派别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不满，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取消党治”、“实行宪政”、“全民政治”与“国民会议”等政治口号和主张，这些不仅反映了中间派别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

① 洛甫：《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1931年10月26日），《六大以来》（上）第157页。

② 《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1932年2月26日），《六大以来》（上）第204页。

态度的变化，而且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左”倾领导却把这些看作是“玩弄‘左’的词句，以民主政治的烟幕弹来维持反革命的统治”，说他们是“反革命派别”，“都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奴役统治的拥护者，同时它们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不残酷的无情的揭露它们，不消灭它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工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① 这种主观武断和错误策略，使党的领导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把可以争取团结的广大同盟者又推到敌人一边。

一九三二年一月底，南京国民政府因上海抗战而迁都洛阳，许多在野派别，也包括一些群众，都反对南京的卖国政府，要求成立一个各党派各阶级的政府或抗日民主政府，蒋介石被迫下野。此时，如果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策略，和各派反蒋势力建立统一战线，提出国防政府口号，就会使当时的形势朝着有利于抗日反蒋的方向发展。但是，“左”倾领导拒绝“国防政府”的口号，认为只有工农民主政府才能革命。他们说：“目前时局的特点是：世界上两种不同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和矛盾，从没有象现在这样地猛烈发展，国内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对立的尖锐，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② 因此错误地断定，中间派别主张建立国防政府的目的，是“投降帝国主义，协同帝国主义来镇压革命”，“是在团结一切反革命力量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立”，③ 因而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这样，就把革命的有利形势丧失了。一九三二年一月，蒋介

① 《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1932年 6 月 24 日），《六大以来》（上）第 258 页。

② 《苏区中央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 年 6 月 27 日），《六大以来》（上）第 268 页。

③ 《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六大以来》（上）第 165 页。

石与汪精卫合作，重新控制了南京政府，镇压抗日运动，继续“围剿”革命根据地，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潮流低落下去。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作了充分准备之后，动用一百万兵力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这次进攻虽然比过去更加凶恶，但这时根据地也更加巩固，人民群众革命热情十分高涨，红军也发展壮大了，同时红军与福建人民政府签订了《抗日作战协定》。在这些有利条件下，如果运用正确的军事战略思想指挥红军作战，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这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已经贯彻到各个方面。一九三三年一月，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仅采取了一套完全错误的军事路线，而且对中间势力的关门主义错误更有所发展。他们完全抹煞了福建事变的积极意义，认为这“完全是反革命派别骗人的把戏”。说，福建人民政府“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① 当国民党反动军队攻打十九路军时“左’倾领导不给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援助。蒋介石在镇压了十九路军之后，又集中力量疯狂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被迫举行战略大转移——长征。

① 《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民众书》（1933年12月5日），《六大以来》（上）第484页。

第 九 章

国共两党停止内战,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

第一节 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各党派积极响应，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建立

一、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各党派积极响应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独霸中国的野心，将其侵略势力进一步扩展到华北。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加强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造成整个中华民族空前深重的灾难。广大的工人、农民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城市小资产阶级陷于破产和失业的境地。中国民族工商业也日益衰落。他们都迫切要求抗日和民主。毛泽东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①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三五年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233 页，1964 年版。

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指出“：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一切党派军队和各界同胞都应当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作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抗日”。宣言建议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中共和红军愿作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参加者和发起者。这个宣言还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长征以后，中共中央针对华北的严重形势，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出卖华北宣言》；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再次号召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政党、武装力量、社会团体及任何个人，广泛地联合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斗争。中国共产党自《八一宣言》以后，改变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提法，而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是赶日本侵略者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二十五日，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确定了共产党的策略路线。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会国人民的力量去对付全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制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

针。

会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重要报告，他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阶级分析观点，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说明，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报告》根据"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出发，分析了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论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报告》还依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和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进一步论述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指出：由于革命力量暂时还小于反革命力量，从而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因此，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成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十分必要的。"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为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参加抗白民族统一战线，《报告》提出以"人民共和国"口号代替"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并规定人民共和国性质及各种政策。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为主体的，同时容纳其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阶级。因此，它首先是保护工农群众的基本利益。同时，对于工商业者在经济上采取保护政策，在政治上也给予一定的民主权利。

《报告》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指出"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奴仆"。同时又指出必须不再重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使革命遭到失败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这次会议既批判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同

时也总结了使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正确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问题。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下，北平首先爆发了伟大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冲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恐怖气氛，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成为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起点。广州六千铁路工人、上海邮务和沪杭甬铁路工人，先后召集群众大会，发出通电，支援学生爱国运动，要求对日宣战，讨伐汉奸殷汝耕。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各业、各厂、各派职工，支援学生爱国运动，组织工人抗日救国联合会，与全国各界一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不仅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而且也激发民族资产阶级抗日救国的热情。许多社会名流、在野政党纷纷发表通电、宣言、谈话。他们拥护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人民共和国的主张。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首先举起抗日救亡的旗帜，大声疾呼：“我们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全民族争生存的问题”。① 中华民族图生存的唯一途径，“只有巩固着一条战线，冲破重围，用大众的力量，……作自救的英勇奋斗！”②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等二百八十多人，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华北又将成为第二个“伪满”形势下，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表达了他们对民族危亡的深切忧虑和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的坚定决心。他们表示：“在这生死存亡之间不

①邹韬奋：《华北问题》，《大众生活》第一卷第三期。

② 邹韬奋：《我们的灯塔——〈大众生活〉发刊词》，《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54 页，1981 年版。

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够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族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尽量组织广大民众以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斗。并且提出：坚持领土和主权完整，否认一切有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反对以“地方事件”解决东北和华北问题；以全国兵力财力反抗敌人侵略；讨伐冀东和东北伪组织；严惩一切卖国贼。天津《益世报》在纪念“九一八”五周年时,发表了《我们要生存权》的社论,指出:"五年来，日本用武力掠夺了中国的东北、内蒙及华北几省，其面积大过英、法、德、意、西班牙各国本部合起来的总数，照此类推，中国领土虽广,亦何能持久?""我们要生存权";"到了生存权被威胁破坏的时候,我们的反抗乃当然的事实"。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加深形势下，对日态度也逐渐强硬起来。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香港九龙召开全国第二次干部会议（又称“全国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通过《临时行动纲领》,阐明政治方针和主张。该组织由反蒋排共转变为抗日联共反蒋，承认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呼吁各界人民联合起来发动民族革命战争;"搏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完成此项任务;"就必须全国人民合作,共同负担起来,如只依赖现政府或国民党单独来做,那是不可能的奢望"。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发表《'组织反日阵线'提议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以最快的速度,组成全国的'反日阵线,'";"发动反日战争"。特别强调:"各党派间的任何分岐,都不能否认集中力量反日的必要"。"反日阵线";"只能由各党派各社团共同集结而成,决非某一党派所能包办"，凡愿为民族解放出力的党派、团体都应参加“反日阵

线”。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批判国民党不要民族革命‘昏头乱脑’的错误观点,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一二九’爱国运动影响下,也表示拥护“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主张。他们主要干部都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发起和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工作,为抗日救亡运动奔走呼号。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人士,拥护共产党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创造了条件,作了必要准备。

二、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成立和政治纲领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以后,国民党内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于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创办了《大众日报》,宣传抗日。十二月,公开发表政治宣言,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基本政治主张①,提出八项具体行动纲领: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民族革命;策动全国海、陆、空军武装全国民众对日作战;收复失地;推翻南京国民党政权,召集人民代表大会解决国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没收一切汉奸财产;联合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一切民族及被压迫阶级,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争取人民的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之绝对自由等。

该同盟竖起反蒋抗日的旗帜,提出“联合战线,武装抗日”的口号②,呼吁各党派各民众团体都应以民族利益为前提,捐除一

①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政治纲领》,《抗战中的中国政治》第 44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

②陈铭枢:《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一周年》,《救国时报》1936 年 7 月 25 日。

切成见，站在民族抗战的前线，发动全国民众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指出：抗日与反蒋是民族革命战争“不可分离的任务”；“抗日如不打倒蒋介石，决不能收抗日的实效”；“倒蒋而不抗日，也决不能实际倒蒋”①。南京国民政府是军阀、官僚买办、土豪劣绅的政权，自成立之始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它有极强的“奴隶性与附属性”②，必然反对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中国大众只有团结于反蒋抗日的旗帜下，以无畏的牺牲精神，用鲜血头颅才能换得民族之独立解放”③。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严厉谴责南京国民政府的“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抨击其镇压抗日民主运动的罪行。指出：蒋介石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不惜牺牲全民族的利益，当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踏入中国，始则不抵抗依赖国联调查和国际制裁，次则宣言长期抵抗，继则声称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终则认贼作父，公然倡言中日亲善。其实自始至终是欺骗全国民众。蒋介石政府是“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甘心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④，在四年内，断送了八百万方里的土地，三千余万人民。进而又出卖华北，出卖全中国；“我四万万人民的身家性命，无日不在南京政府的拍卖之中。”⑤ 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戮抗日人民群众，查封抗日报刊，禁锢抗日宣传。他们用人民群众捐献的飞机轰炸抗日的军队，残杀抗日的人民。他们的逻辑是“卖国有功，救国有罪，降日者升官发财，抗日者格杀无论”⑥。蒋介石政府“安内攘外”政策，“对外的一面是战战兢兢的双膝；对内的一面是刚决残酷的双

①② 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对时局宣言》，《救国时报》1936 年 1 月 4 日。

③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为学生爱国运动告同胞书》，《救国时报》1936 年 2 月 24 日。

④⑤ 李济深等《对时局宣言》，《救国时报》1936 年 1 月 4 日。

⑥ 李济深等：《对时局宣言》，《救国时报》1936 年 1 月 4 日。

腕’①。

一九三六年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采取逼蒋抗日政策，引起各党派、人民团体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响。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总结一年来工作基础上，又提出新的八条目前行动纲领：召集人民救国会议；讨论救国方案；组织抗日的国防政府；成立全国抗日联军；释放救国政治犯；争取救国的一切自由；恢复十九路军；扩大民族反日战线等。还特别强调将‘联合战线，武装抗日’的口号切实贯彻到行动中。呼吁全国‘非停止内战无以抗敌，非全国抗敌无以图存”，并愿为‘国共合力救亡’负斡旋之责②。改变了该组织成立时提出的‘反蒋’口号。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是一部分具有民族爱国思想的实力派代表人物，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组成的反蒋抗日政治派别。它主张抗日救亡，顺应历史发展方向，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一支队伍。它抨击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没有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基层组织，只停留在一部分资产阶级爱国者中的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第二节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及其救亡活动

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① 陈铭枢：《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一周年》，《救国时报》1936 年 7 月 25 日。
② 陈铭枢：《致蒋介石电》，《救国时报》1936 年 10 月 25 日。

线的号召，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指明了方向，对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大众生活》出版和文化界救国宣言发表为标志，开创了上海各界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各界抗日救亡组织纷纷成立，救亡运动如火如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沈钧儒、史良、胡子婴、陈波儿等发起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教育、新闻、出版、电影、戏剧、法律各界知名人士三百多人出席会议，沈钧儒主持了大会并致开会词。会议推选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等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发表第二次救国宣言，提出“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阵线”“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等抗日救亡主张。一九三六年一月，周新民、潘大逵等六十多人成立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表示义不容辞地站在青年学生面前，共负救亡责任。除此之外，还成立了上海学生救国会等民众抗日救亡团体。

随着爱国救亡运动的发展，为了集中救亡组织的力量，加强各救亡团体的团结和联合，文化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大中学学生救国会等组织，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慷慨激昂地致了开会词，宣告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热情称赞了“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战的壮举。此外，王造时、李公朴、史良等也作了演说。选出马相伯、沈钧儒等三十人为理事。会议决定扩大组织，筹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二月九日，沙千里领导成立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二月二十三日，陶行知领导成立了上海国难教育社，还有新闻记者救国会也参加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后，先后创办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亡情报》，作了大量爱国救亡运动的宣传工作。还结

合各种纪念日多次举行爱国救亡集会和壮烈的示威游行，不仅唤醒了上海各界群众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各地也引起极大的反响。北平、南京、武汉、天津、广西、山东等地妇女救国会和文化界救国会相继成立，并与上海妇女救国会及文化界救国会取得联系，希望给予指导和帮助。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日本侵略者继续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华北五省名存实亡，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形势发展迫切要求成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救国联合阵线，以便将全国各地救国力量团结起来，统一步调，更有成效地从事救国运动，推动各党派的联合。为此同年三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备会，曾将促进全国各界救国会的成立作为自己工作任务之一,会后并派人去华北、华中、华南各地联络,物色邀请出席全国学联成立会和全救会成立会的代表。经两个月的筹备，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的号召和领导下，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十八个省市六十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筹备委员代表报告了开会宗旨及筹备经过，会议还听取了平津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上海、南京、厦门、香港等地救国会的代表的报告,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四十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十四人为常务委员。

沈钧儒（一八七五—— 一九六三),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人。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从事立宪运动，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国民党改组后，他拥护国共合作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北伐军攻占浙江以后，他任浙江省临时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浙江省政府被强迫解散，沈钧儒一度被捕。获释后，他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

同时执行律师职务。一九三三年，他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法律委员。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言和政治纲领等文件，全面阐述了该会的政治立场和主张，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要作用在于灭亡全中国，亲日派官僚鼓吹的“合作”、“亲善”、“敦睦邦交”等口号都是堕落民族气节的无耻谰言。指出：任何热衷在敌人刀锋底下埋头内战，自相残杀，都是消耗民族力量，助长敌人气焰，替敌人卖力。中国人民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我们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立刻全国团结一致以全力抗敌”①，进行一场争取自由独立的民族革命。“我们在横的方面，坚决的主张各党各派的合作；在纵的方面，诚意要求社会各阶层分子的合作”②。

实行民主政治是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重要条件。救国会主张，各实力派应同时释放政治犯，给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任何党派和政治团体，“想用武力征服敌党敌派，用权威排除异己，用权术巩固政权，那结果反只有使人心离散，而自陷于覆亡！”③文件明确指出蒋介石政府已往的错误，“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民族革命的任务，而只在武力上企图征服全国”④，目前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作孤注一掷⑤”。同时还指出：南京政府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和制订的“宪法草案”都是非法的，应以普遍选举方式召开“国民救国会议”，“迅速的建立起来一个统一的救国政权”⑥。

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救国会》第8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版。

②《抗日救国的初步政治纲领》，《救国会》第99册。

③④⑤《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第89页。

⑥《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救国会》第100页。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提出：抗敌政府必须实行有利于抗战救国的对外对内政策，“联合全世界反日、反战的人民势力，一面发展救国阵线的力量，一面增强抗敌战争胜利的把握”①；实行国难教育，改善士兵、劳工、农民、妇女等生活待遇，救济灾民解决失业，以利于发展和巩固救国阵线，巩固国防。

七月十五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署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精辟地分析了自“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重申救亡阵线的“不躲避，不退却，不放弃立场，不动摇意志，一直到中华民族解放运动达到完全胜利的一天”的坚定抗日立场。要求国民党政府马上做到“第一、停止对西南军事行动；第二、和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第三、开放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

救国会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以鲜明立场和坚定的态度、主张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对国民党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政策进行了大胆批评，表达了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毁家纾难，舍身为国”的决心，反映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思想和救国要求。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发起者，主要是具有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后来有京沪一带一部分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地下党员参加，并成为骨干。他们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使其成为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救亡阵线组织形式。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后，各地纷纷成立全救会分支组织。孙晓村、曹孟君等于八月成立了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南救”）曾以“绥远抗日后援会”的名义公开从事抗日

① 《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救国会》第1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救亡活动，李章达、何思敬、吴涵真等在香港成立全救会华南区总部(简称“南总”),负责指导香港、广东等地的救国运动。一九三六年初，西安一些学生和教职员成立的西北抗日救国会，在全救会成立以后改名为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承认全救会的宣言和纲领为自己的纲领，并大量翻印发放了这两个文件，在西北颇有影响。全救会派执委张语参加“西救”工作。“西救”成为全救会在西北的分会。它在“一二九”一周年纪念日发表了“一二九”宣言，组织了万名学生和市民的游行示威，并准备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发生。西安事变之后，“西救”正式公开活动，并在西安《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了全救会的宣言和纲领。其他各地爱国民众和海外华侨也先后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在抗日救国总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因分散各地，组织上与全救会没有隶属关系或指导关系。

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抗日救亡活动

全救会成立以后主要活动有三个方面：一是宣传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揭露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活动；二是号召并直接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三是作国民党内赞成抗日，同情爱国运动的上层人物工作，推动他们影响国民党改变妥协投降政策，督促南京政府抗日救国。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开幕，全救会发表宣言，呼吁二中全会接受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给人民抗日救国的自由；惩办亲日派官僚政客。并推派沈钧儒、章乃器、史良、彭文应、沙千里等为代表，赴南京向二中全会请愿，要求在会上发言。国民党当局以“中央委员会议，人民代表不能列席”，拒绝了全救会代表的要求，请愿未获结果。沈钧儒、

章乃器等在京招待各报记者，介绍了全救会主张及成立经过，希望新闻界尽量多登载救亡运动消息，扩大宣传，推动救国运动。

九月十八日，全救会召开第二次执委会，针对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五省自治，中日合作防共，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救国团体等灭亡中国新条件，要求严密组织，扩大救国阵线，加强吸收落后人物和争取张学良、冯玉祥等上层人物的工作。接着，发表了《全救会为团结御侮告全国同胞》,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是亡国灭种的条件，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外交谈判，团结全国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收回失去的领土主权。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发动《为中日外交已到最后关头宣言》签名运动。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伟大文学家鲁迅逝世，在救国会主持下，举行了三天群众性悼念活动，一万多群众前去瞻仰遗容。上海青年学生、工人、作家等各界人士六、七千人为这位伟大民族解放战士送葬。大家循着军乐队的哀乐声，唱着悲壮的挽歌和《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悼念这位伟大民族解放先锋战士,悲愤地呼喊着‘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 纪念鲁迅先生,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纪念鲁迅先生,要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 !‟ 纪念鲁迅先生,要努力民族解放斗争 !’的口号。庄严地送葬队伍足有二里多长，成为一九三六年下半年上海人民一次最大的抗日示威游行。救国会主要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史良、邹韬奋等都参加了这次送葬仪式，并在墓前作了简短悲昂地演说，号召人们继承鲁迅精神，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族革命任务，象鲁迅那样献身民族解放斗争，至死不屈。

一九三六年八月,日伪军开始侵犯绥远,十一月驻绥远的傅作义等部奋起抵抗。全国各界群众开展了援绥运动。全救会发表《全救会为绥远问题宣言》和致国民党和傅作义、张学良电,号召全国

同胞积极参加救国阵线，以全力援助绥远抗日军队，呼吁各实力派一致请缨抗战，敦促国民党政府停止与日寇的秘密外交谈判，停止内战立即动员全国武装力量投入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九月六日，救国会组织了三百多个宣传队，走上街头，散发抗日传单，进行援绥募捐。南京救国会孙晓村、曹孟君等领导人与王昆仑、许宝驹等密切配合，在冯玉祥支持下，推动国民党上层人士张继、居正、覃振等发起援绥抗日运动。十一月上旬召开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援绥抗日大会，国民党左派和许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都出席了会议，大会通过成立《首都各界援绥后援会》。这次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国民党不准抗日救国的禁令。上海日纱厂四万多工人于 11 月上旬开始举行反日大罢工，提出了增加工资、保护工人权益、不打骂工人及侮辱工人，反对日兵进厂压迫工人等十二项条件。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吁请全国同胞援助日商纱厂罢工工人，组织罢工后援会，号召各界人士以实际行动援助工人的罢工斗争，罢工斗争取得一定胜利。

救国会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组织容纳各党各派的统一抗敌政权的主张，并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这些同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基本方针相对抗，是国民党所不能容忍的。国民党政府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救国会七领袖，制造了“救国有罪”的“七君子冤狱”，妄图把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镇压下去。相反，它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义愤。全救会和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提抗议，开展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把抗日爱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十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七日，全救会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发表了《紧急宣言》和《告当局及国人书》，严厉痛斥了国民党政府强加于救国会的莫须有的罪名，表示绝不改变立场，决不放弃抗敌救亡的主张，将更坚决秉承领袖们过去的言

论、主张而继续奋斗。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被捕领袖，公开保护救国运动，立即实现抗战。宋庆龄也为沈钧儒等被捕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救国会七领袖。

北平文化界人士李达、许德珩等一〇七人于二十四日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即日完全开释,勿再拘传’。北平学生救国会联合会决定，自二十五日起罢课两日，并派代表赴京请愿，要求释放救国会领袖。三十日延安《红色中华》报发表沈钧儒等被捕消息，反对南京改府对抗日救国之团体的高压政策。巴黎《救国时报》发表了《争取救国自由》的社论,高度评价了沈钧儒等组织的救国会努力从事的救国宣传和组织工作、谴责了国民党政府奉行的‘爱国有罪’的误国暴政,号召全国同胞应当万众一心,来争取救国自由。

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国民党摧残救国运动的残暴行为强烈不满，曾多方设法营救爱国运动领袖，恳请释放救国会负责人。张当面质问蒋介石“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① 冯玉祥、于右任等在南京发表征集十万人签名营救运动。旅居欧美、东亚各国华侨基于强烈爱国义愤，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应宣告沈等爱国无罪，立即释放。各国名流学者罗曼·罗兰、杜威、爱因斯坦等也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恢复沈钧儒等自由。

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统治者开始被迫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救国会所倡导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主张初步得到实现。沈钧儒等爱国领袖有功于国家，理应无罪释放、恢复自由。但是，国民党政府还继续羁押甚至还以所谓“危害民国为目的而

①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7日。

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之罪名①，罗织“十大罪状”，对沈、章、邹、李、沙、史、王七人提起公诉。一场救国无罪和‘救国有罪’的激烈斗争又重新展开了。

在起诉书提出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又进行阴谋劝降活动。七人如表示不再从事救国活动，即可撤回公诉，遭沈等严词拒绝。沈等认定个人自由事小，争取救国无罪是民族存亡的大事，宁可不出狱，但愿‘救国无罪’四个字‘永留史册”。沈钧儒等和他们的二十一名辩护律师发表了长篇答辩书，以大量事实据理驳斥“起诉书”中谬误和诬陷。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②。救国会也写了答辩并告全国同胞及会员，呼吁各界同胞予以声援，申张正义。沈钧儒等大义凛然地戳穿了国民党不经审判即送入反省院和非法秘密判决的阴谋。在公开审判中，沈等雄辩地中述救国无罪，抗日有功的民族正义呼声，驳得审判长理屈词穷，狼狈不堪，使‘法庭’成了对国民党‘救国有罪’谬论及其辩护士的控诉。审判不得不以审判者的失败而收场。

与此同时，全国救国会和各界人士掀起了更广泛的营救运动，强烈要求国民党对沈钧儒等宣判无罪释放。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赞扬沈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③。要求国民党彻底放弃过去的错误政策，立即释放一切爱国领袖和政治犯。六

①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起诉书》，《救国会》第 235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沈钧儒等答辩状》，《救国会》第2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 。

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救国会》第 31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十六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宣言，制定救国入狱运动规约，提出如爱国有罪，愿与沈等同受处罚，如爱国无罪，则与沈等同享自由。七月初，由宋庆龄率领亲往苏州高等法院要求羁押。全救会华南区总部为沈等代募讼费，各地人民群众纷纷集会组织抗议示威游行，开展签名运动，推派代表赴南京请愿，开展营救运动。

由于沈等坚强不屈的斗争，救国会和抗日团体的营救以及全国各界人民的热烈声援，在“七七”抗战爆发以后，于七月三十一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将“七君子”释放出狱，救国会的营救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

第三节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日政策的变化。共产党的逼蒋抗日政策

一、民族危机愈加深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日态度的变化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吞并全中国的野心，向华北地区发动新的侵略，制造了华北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在制造华北事变的同时，还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华北的铁路、矿山、金融、棉业、纺织、面粉等重要企业大部分为日本垄断资本所控制。日本还凭借武力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日货充斥中国市场。整个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危险。

在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要求更为迫切，以“一二九”“一二一六”为导火线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界人民发出了“反对华北

自治、停止内战,共同对日 ’的呼声。各界救国会纷纷成立,并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各种救亡刊物风起云涌，全国不下千种，仅上海一地就有百余种，如《大众生活》、《永生》、《现世界》、《新学识》、《知识》、《东北知识》、《妇女生活》、《中国农村》、《世界知识》等,其中销售量大者如《大众生活》达十七万份以上。

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国民党的一些中下级干部，因为退出华北、撤销北平及天津两市党部，而不满于国民党的降日政策；许多工商业资本家，也联名通电要求政府抗日；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将领也公开反对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投降政策。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这时也发表谈话，抨击南京政府对日屈辱政策，并表示他自己“现在正在想如何促进南京当局的觉悟，与如何团结力量以从事于救国”。①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势力的扩张，严重地损害了英美在华北的利益，使英美与日本双方的斗争进一步激化。华北事变前，英美帝国主义认为日本占领东北，是作为进攻苏联的准备，现在日本的刀锋不北向苏联，而南下要灭亡整个中国，使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华北事变后,英美在华投资大大落后于日本。石油、汽车、毛织物、瓷器及卷烟纸的入口额，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份就减少了五分之二。英、美为保住他们在华北的经济利益，也加紧扩张势力。一九三五年夏，美国经济考察团到中国。同年冬，英国财政顾问主任李滋罗斯来华，帮助中国改革币制。一九三六年，国民党政府同美国签订立‘ 中美白银协定 ”;规定美国财政部向中国购买白银五千万盎司，以卖价所得，稳定法币外汇价格。十一月间，又与英国

① 《从“九一八 ”到‘ 七七 ’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第 26页。

政府成立了十万磅的信用贷款。这些措施，使英美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也是它们与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表现。英美两国政府还谴责日本，英美报刊公开称日本是“国际上的强盗”、“黩武的国家”。英美与日本争夺中国的斗争，反映在中国国内的政治上，就是促进了国民党内部英美派与亲日派的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经济扩张，也严重地损害了国民党政府与四大家族的利益。日本在华北的武装走私与非法掠夺使国民党政府主要财政收入中的关税、盐税、统税急剧减少。据统计，仅关税一项，从一九三五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即减少约三千万元，使国民党政府财政受到很大损失。动摇了它的财政基础。所有这些，使南京政府对日政策发生变化。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正当华北事变时，亲日派头目汪精卫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被刺受伤，旋即出国医治。不久，亲日派重要人物唐有壬（当时的外交次长）被刺殒命，亲日派力量受到打击。同年十一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发表对外关系演说，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外交方针，表示日本如果无止境的进攻，超过了“和平之限度”，只有“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了。蒋介石的“最后关头”说，虽含混不清，毕竟表明对日政策的某些变化。随着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蒋介石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他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求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

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①

上述情况表明，华北事变以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无止境的侵略，全国人民抗日民族运动的蓬勃发展，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才使南京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开始转变。

二、工农红军回师通电，共产党的逼蒋抗日政策

一九三六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傀儡式的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五省已名存实亡，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

但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于一九三六年仍命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到陕西进行反共战争。中国共产党决定争取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停战，并和他们订立抗日协定。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红军领导人，联名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了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甘肃、陕西打红军的阴谋，就是使愿意抗日的东北军和决心抗日的红军都受到牺牲和损失，实现其削弱乃至消灭异己的计划，东北军只有抗日反蒋才是唯一出路。信中，不仅重申了党的抗日主张，而且提出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际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建议互派代表，协商关于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受到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拥护。

为了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的实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于二月十七日公布《东征宣言》。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准备出师

①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演词《东方杂志》三十三卷16号。

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但是，抗日先锋军却遭到阎锡山军队的拦阻、堵截。蒋介石也下令调洛阳、徐州、浦口等国防要地重兵三十三万人，开赴山西，协助阎锡山进攻抗日先锋军。并命令在陕西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等部队，向北挺进，以捣乱陕甘宁苏区的抗日后方。

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考虑到国难当前，不应损伤中国的国防力量，并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促进蒋介石及其部下的觉醒，所以抗日先锋军在山西虽然取得了许多胜利，仍毅然回师河西。五月五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回师通电——《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在揭露蒋介石阻拦红军抗日罪行的同时，重申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表示愿同一切放弃进攻红军的武装部队停战议和，并警告国民党政府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其反动统治必将为人民所推翻。通电要求首先在陕、甘、晋三省内停止内战。

在通电中，中国共产党估计到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侵略，全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情况下，代表英、美利益的蒋介石政府，有可能为了减轻人民抗日运动对自己的压力，维护其统治集团和英美在华利益，改变对日态度，因而放弃了“反蒋抗日”口号，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同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除继续揭露国民党内战卖国政策外，再一次呼吁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① 提议“立即召集由全国人民及全国愿意抗日的武装队伍选举出来的

①《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重印。第773页。

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抗日救亡大计，由此大会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并“坚决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成为这样的国防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担任一定的战线，并保证每一作战任务的完成。”① 在这封信中，中国共产党用“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代替“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以动员更广泛的阶层参加统一战线。

为了统一全党的策略思想，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党的方针应由“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逼蒋抗日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中日民族矛盾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对蒋介石集团采取的以斗争求联合的政策。当时，蒋介石集团作为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他的被迫倾向抗日，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着原则区别。所谓“逼蒋抗日”政策，就是一方面对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及其一切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进行揭露与斗争，动员人民群众继续开展抗日民主运动，给蒋介石造成一个强大压力。使他感到非抗日无以图存；另一方面，根据“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原则，对蒋介石转向抗日的某些表现，给予肯定和支持，向他建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订立抗日协定，使他感到只有联合抗日才是出路。还指出：“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的各派反蒋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并强调“在全国人民面前，我们应表现出我们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决主张者，是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并通知全

①《六大以来》（上）第 774—775 页。

党‘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① 这一指示向全党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和中共中央的具体作法。

第四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

一、“西安事变”及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不同反响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各地工人纷纷发动反日大罢工，学生界、文化界组织了许多救亡团体，出版抗日救亡书报。甚至国民党内部的两广军阀，这时也以‘抗日救国’名义联合反蒋。

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积极开展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毛泽东派汪锋为代表，持亲笔信到西安会见杨虎城，申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双方还就停止内战、互派代表、在西安建立交通站及准备联合抗日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间，中共中央派李克农前往洛川同王以哲、张学良进行谈判，双方就联合抗日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口头协议。四月九日，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在延安进行会谈，双方就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守原防、互派代表及

① 《六大以来》(上)第778页，人民出版社， 1982年重印。

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方面联合抗日救国的一系列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接着，中共中央又派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改造部队，准备抗日。这样，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

东北军和西北军长期以来对蒋介石实行损人利己政策严重不满。蒋介石不接受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联共抗日”建议，反而把他的大量的嫡系部队纷纷西调，准备进攻红军和压迫张、杨的部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蒋介石亲到西安督战，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否则即将东北军调到福建，西北军调到安徽，另派他的嫡系蒋鼎文为“剿共”前敌总指挥，胡宗南到陕西边境，切断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联系。张、杨深知无论接受那一种办法，前途都不堪设想。因此，仍然乞请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并痛切陈词，要求蒋介石采纳。蒋介石不仅严词拒绝，还强令张、杨屠杀西安抗日青年，镇压人民抗日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决定逮捕蒋介石，实行“兵谏”。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张、杨两将军在部下与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逮捕蒋介石于临潼华清池，并逮捕其重要将领陈诚等十余人。这就是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

十二月十三日，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权利；（七）确实遵行孙中山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震动了全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纷纷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解决办法。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左派、中派和右派中的英、美派，竭力主张和平解决。宋子文、宋美龄曾为此飞西安与

张、杨谈判。这些主张反映了英、美的立场和态度。西安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大权有被亲日派夺去的危险。因此，英、美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甚至表示只要蒋介石还能继续统治下去，就不妨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

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想乘机扩大中国内战，遂暗中支持亲日派何应钦“讨伐”张、杨。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军权操在亲日派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手里。在亲日派把持下，十六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学良，并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调大军沿陇海线进攻华县，并派大队飞机准备轰炸西安。十七日，又电召赴欧养病的亲日派头目汪精卫立即回国，以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建立亲日政权，进而在日本支持下扩大内战。

全国一些救亡团体纷纷通电，斥责蒋介石的误国政策，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主张。指出蒋介石“坚持安内先于攘外，剿共急于抗敌，对外一省一省断送，对内一寸一寸苦攻，民族元气，摧残无遗，国家领土，论亡几半，救国有罪，不容他人置议，卖国有赏，已成蒋氏定猷。”① “我们认为张杨两将军对蒋介石‘兵谏’的行动是一个伟大的民族革命行动。这个行动是适应全西北民众的要求，是适应全民族的总要求，是为中华民族谋彻底解放的初步行动”②。东北民众救亡会明确阐述了西安事变的正义性，认为在民族存亡关头，每一个有良心的有意识的中国人，都深切地明了对于日本的侵略，只有抵抗才是生路。认为“张杨等顾全大义，不得已实行兵谏，同时公布了救国的八大主张”。这八大主张“完全是对外的，而非对内的；是求统一的，而非破坏统一的”，它反

①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致全国将领全体武装同志》（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

②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拥护张杨救国宣言》（1936年12月17日），《西北文化日报》。

映了‘全民众一致的要求’，一定能得到举国民众热烈的赞成与拥护’①。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后，希望得到各地方军阀有力的响应与具体的支持。阎锡山在各地军阀中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张、阎之间曾有心照不宣的谅解。阎锡山在事变前对张学良的处境表示同情，并唆使张学良必要时对蒋介石采取非常行动。但事变发生后，阎锡山却反对张杨的兵谏行动，说此举‘与国不利’，‘增加国人之忧虑’，向蒋介石献媚讨好。

两广方面，于四个月前同国民党中央军打过仗，广东垮台后，广西维持半独立状态，两广都派代表到西安争向张表示好意。事变后，广西省当局主张西安问题必须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当南京政府亲日派提出放弃政治解决，策动内战时，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十六人举行会议，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确实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对外。其要点如下：（一）用政治方法解决西安事件；（二）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三）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四）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战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②。

此外，整个西南都是反对南京的。云南、贵州军阀把西安事变看成是他们摆脱南京对本省影响的机会，但他们对全国政局的作用有限。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立即电告中共中央，请求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在分析西安事变时指出：这一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这次事变是进步的，是为了抗日救

①《东北民众救亡会告西北各界同胞》（十二月十六日）。

②《李宗仁、白崇禧通电》，1936年12月25日《西北文化日报》。

国而发生的，是以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始。中共中央估计到事变的发展有两个可能的前途：或者由于这一发动而爆发内战，而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或者由于这一发动而结束内战，使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得以迅速地建立起来，这一前途有利于全国人民的抗日团结。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用全力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进一步抗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

中共中央于十五日和十九日先后两次通电给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劝告他们接受张、杨的主张，停止内战，召集和平会议。中共中央指出：“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① 建议立即召集和平会议，共商团结抗日救国大计。

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参加谈判。当时，张、杨对于扣留蒋介石以后如何处置，并没有明确的主张。他们的高级将领也是众说纷云，莫衷一是。托派和国民党特务则从中挑拨离间，进行破坏，斗争极为复杂。周恩来等遵照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立即向张、杨及其将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在充分肯定他们行动的基础上，强调指出：西安事变后，中国面临着团结抗日和继续内战两个前途，我们要争取团结抗日的前途，逼迫蒋介石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条路，只要他答应这个要求，就放他回南京。同时指出：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高涨，国民党已分裂出一部分爱国力量，日本独吞中国的行动又与英美在华利益发生冲突，使代表英美利益的蒋介石有抗

① 《六大以来》（上），第 794页。

日的可能。所以，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可行的。张、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周恩来等对张、杨的下级军官也作了大量说服工作，解除他们提出的种种疑虑。同时，也向各界群众、各方人士广泛宣传党的政策，使各方面意见都逐渐统一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团结抗日的方针上来。

这时，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呼吁和平。英美派的宋子文、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外国顾问端纳也先后到达西安。十二月二十三日，一方张学良、杨虎城，一方宋子文、宋美龄，以张杨通电的主张为基础，举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经过多次讨论，最后达成了协议。蒋介石被迫接受改组南京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共抗日、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实行抗日外交等条件。二十五日，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张学良还亲自陪蒋介石飞回南京。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挑拨中国内战的阴谋终于破产。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它“成了当时时局转折的枢纽”，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国内战争的基本结束

西安事变以后，国内大规模内战已经停止，开始出现和平局面。但是，和平还不稳固，蒋介石还没有真正放弃内战政策。为进一步促进国民党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面转变，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以中共全权代表身份直接与南京政府谈判。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关系

和对日关系问题。

中国共产党于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证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国民党“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中国共产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作出以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为取得国内和平，实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一任务而采取的让步。这个让步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其目的是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便于加速实现对日作战。同时，它又是有原则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保持绝对的领导权。电报发出后，受到全国各界群众的热烈拥护，就连国民党的不少党员和一部分上层人士也表示欢迎。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内民主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杨虎城、于学忠也提出西安方面关于八项主张的提案。汪精卫则提出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案。二月十八日,宋庆龄在全会上作了《实行孙中山遗嘱》的讲演。指出“国民党政府中仍有些个别人士仍然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还在坚持“抗日必先剿共”，“这是多么荒谬!”她说：“中国的人民都不愿打自己的兄弟,他们

知道这是违背民族利益的。一切内争是可以，并且应当和平友好地解决。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①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斗争，虽然没有确定坚定的抗日方针，没有批评自己过去的错误政策，但其对内外政策都作了某些改变。在对内政策上，基本上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表示要相当地扩大民主，修改选举法，在一定条件下开放言论和释放政治犯。在对外政策上，表示“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提出“抗战”这个词，比其二中全会的“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是前进了一步。全会通过的《根绝赤祸案》，虽然在字句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许多诬蔑，但实际上，这次会议是国民党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化的开始，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开始。至此，中国共产党所组织和领导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明确指出：“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动，由于本党新政策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结束。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② 要求全党迅速转变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和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之下，以艰苦的工作与模范的行动，去取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③

中国共产党为进一步争取国内民主、准备抗战，一九三七年

①《为新中国奋斗》，1952 年版。

②③ 《六大以来》（上）第 825、829—830 页。

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

第 十 章

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民族抗战局面形成

第一节　抗日战争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

一、“七七”事变，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对抗日的态度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芦沟桥属宛平县，是北平的重要门户。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占北平，首先把矛头指向芦沟桥。七月七日夜，日本侵略军在芦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入宛平县城搜索，被中国驻军拒绝。双方正交涉间，日本侵略军即炮轰芦沟桥和宛平城。中国驻守北平的是国民第二十九军。驻宛平一带的军队是该军三十七师一一〇旅二一九团。日本侵略军向芦沟桥进攻伊始，二一九团立即向旅长何基澧报告，并请求以武力抵抗。何基澧下令向日本侵略军还击，坚守阵地。团长吉星文、营长金振中亲临前线，率部抵抗日本侵略军。

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芦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举进攻，使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从而震动了中国各阶级、各党派。

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向各报馆、各团体、各军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全国同胞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郑重地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① 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要求"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立即"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并表示"红军壮士诚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②

七月九日，红军将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共产党员、机关干部紧急集会，毛泽东在会上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和抗日的革命者，沉着地完成一切必要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与此同时，中国工农红军立即集中，准备奔赴前线杀敌。

在共产党领导与号召之下，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最积极、最坚决的姿态投入抗敌斗争。在地处华北战区的长辛店，芦沟桥的炮声一响，广大工人就行动起来，搜集铁轨、麻袋、枕木等物，冒着枪林弹雨到宛平前线修筑防御工事。"八一三"上海事变后，上海工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有五百多工人拿起武器上前线。南京、武汉、太原等地的工人相继组织了抗敌后援会，其他地区的工人也都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

① 《解放周刊》第一卷第十期，1937年7月12日出版。
② 《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2月20日第二期第28页。

华北地区农民出粮、出草、出柴、出民工，帮助二十九军修路、送饭、送情报、抬伤兵、运送军需物资，支援前线十分踊跃。

平津一带知识分子，早在“七七”事变之前，就为保卫华北、保卫中华民族而奔走呼号。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团体，经常向二十九军作抗日救亡宣传，提出了“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的口号，给二十九军官兵以极大的鼓舞。“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作家协会等二十多个团体，组成了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他们组成募捐团、慰劳团、看护队、战地服务团，进行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支前活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还组织义勇队参加了战斗。上海知识界组织了文化界救亡协会、学生界救亡协会、战时教育服务团等救亡组织，团结群众支援抗战，救亡图存。全国各地爱国的知识分子都表现了对抗日救国的极大热忱。

北平、上海战区的市民，也自动组织起来，给前线抗敌战士送饭、送水、做衣、做鞋，为抗日作出一份贡献。

民族资产阶级、中间党派、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极力主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申报》等呼吁抗战。上海等地民族资本家捐款救国。宋庆龄、何香凝等在上海筹组妇女界援助抗战的团体。七月十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指出“宛平事件是日军侵占华北的阴谋的实行”事件发生后，“举国上下，都充满着胜利的奋斗的决心。准备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但是国民党冀察当局，迷惑于日本“和平”烟幕之下，使敌人从容布置，一俟布置就绪，“便即大举进攻”，势必“使北方危机与时俱深”。宣言呼吁全国同胞全力保卫北方，支援二十九军抗战健儿；要求实施抗战国策。以保证最后胜利，组织人民，给人民以抗日活动的自由；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向着主要敌人日本帝国

主义冲锋①。七月三十一日,国民党政府迫于人民的压力,释放了“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等出狱后,领导救国会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八月三日,“七君子”应国民党政府的邀请,到南京会见了蒋介石等“党政军各要人”以及马相伯等著名爱国人士,“贡献一些关于救国运动的意见”②。随后,沈钧儒去汉口从事抗日救亡运动,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宣传抗战主张。李公朴出狱当天,在日记中用李商隐的两句诗表达自己的意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他写道:“我们追求真理,服务人群,抗战到底,争取民族解放,均应取此态度。”③ 他出狱不久,就到山西去,担任了山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长,并创办了《全民通讯社》进行抗战宣传。七月十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致电国民党政府提出抗日时期的八大政治主张:提前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全国一致遵守的政治纲领;实现民主政治,发挥人民抗战能力;成立武装民众指导机关,借收指臂之效;成立在乡抗日志愿军;成立战时经济计划机关;救济战区人民;释放政治犯。乡村建设派集合力量投入抗战工作。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张对日抵抗。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国家社会党、青年党表示拥护政府抗战。青年党在“沪战初期时”,把抗战分为“应该打”和“不能打”,说“应该打,打是没有错的”,但又说:“能打不一定应该打,而应该打,并不一定能打”,所以他们“只说应该打,并不说能不能打。”④ 这种态度说明青年党实际上对抗战前途的认识有保留。不过,迫于当时形势,青年党还是表示拥护抗战。青年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表示:“准备与全体中国

① 《救国时报》1937年9月18日。
② 《抗战》三日刊第一卷第1期,1937年8月14日。
③ 张曼筠:《回忆李公朴》,1972年12月。
④ 《新中国日报》,1940年9月6日。

同胞携手勇敢地接受'抗战'这个历史任务。'①

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在全国抗战爆发之时，其领导集团对抗日态度分为两派：亲日派以汪精卫为代表，虽尚未公开投敌，但对抗日极端消极，大唱'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亡国论，为投降开路；亲英美派以蒋介石为首，是国民党中的主体部分，对抗日有两面性。一方面从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出发，也从维护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出发，有抗日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在失败主义情绪笼罩下，抗日不坚决，企图谋求对日妥协的途径。

七月八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一事提出了口头抗议。十日，提出了正式抗议。十六日，向英、美、法、意、葡、德、俄、荷、比各国政府发出备忘录，揭露日本破坏九国公约的行为。十七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谈话，表示中国'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蒋介石还未肯定已到最后关头，而是把芦沟桥事变的推演能否结束，作为'最后关头的境界"，因此又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②。根据这种方针，国民党当局对二十九军官兵在人民支援下奋战于华北前线的行动，既不反对也不积极领导和支持；一直同日本谈判，求得战事不再扩大。日本则利用谈判之机，大肆向华北增派侵略军，七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继被日军

① 左宏禹编：《抗战建国中之中国青年党》，成都国魂书店 1939 年 4 月版第 3 页—44 页。转引自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 2 月第 1 版。

② 所引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讲话均见《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 16、17 号。

占领。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这种战和不定的态度有所扭转。八月十四日,国民党政府发表了抗战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份,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而且调派了七十三个师参加上海抗战,先以冯玉祥为总司令,后蒋介石又亲兼总司令。上海抗战一直坚持了三个月,毙伤日军四万余人。上海抗战进行期间,蒋介石接受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驻华大使陶德曼的策动,曾准备同日本举行和平谈判,说明仍未放弃对日和谈方针。尽管如此,国民党及其政府毕竟改变了“九一八”以来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把政策的重点转向了抗日。

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

国共两党商谈合作抗日问题由来已久。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就不断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中爱国民主人士亦主张“联共抗日”。于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国民党政府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和共产党方面的吕振羽(时任北平中国大学教授、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一九三六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等打通国共双方关系。翌年一月,国民党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养甫和中共北平市委领导成员周小舟在南京进行了非正式谈判。周小舟递交一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给曾养甫和谌小岑的信;“信虽只有三四百字,但措词极为诚恳,提出了‘八一宣言’中所说的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① 周小舟还请曾等转交一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给宋子文

①谌小岑:《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谈判的片断回忆》,见《党史研究资料》第三期,1981年3月20日。

的信和一份“八一宣言”。在谈判过程中，共产党方面还转交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给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等人的信件。共产党方面还先后提出了如下的要求：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二、承认苏区合法地位；三、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开放人民抗日的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四、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择路北上抗日；五、改组国民政府，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国民党方面要求：一、停止土地革命；二、停止阶级斗争；三、停止苏维埃运动；四、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斗争。谈判结果，国民党方面表示：一、国方欢迎共方的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但须加以改编；二、共方武装部队改编后，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成立民意机关，共方可派代表参加；四、国方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共产党方面表示：一、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全部历史过程的必然现象，谁也无法停止，也不可能制造出来。但在合作抗日的形势下，为加强国内团结，可实行阶级休战；二、为团结抗日，除没收汉奸卖国贼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外，在战时暂不实行没收地主的土地。但希国民党实行孙中山的“二五减租”政策；三、在组织国防政府的情况下，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的问题将不复存在①。最后，国民党方面表示希望举行正式谈判和直接通电联系。

共产党实行“逼蒋抗日”方针后，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周恩来曾致电陈立夫、陈果夫，陈述了共产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一贯主张，要求国民党“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信中要求与陈立夫、陈果夫直接商谈。此后，毛泽东致函宋庆龄，请她利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身份，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

① 王振合，《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经过大事记》见《党史研究资料》第二期，1982年2月20日。

联共抗日。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朱德致函蒋介石，提出共同抗日主张。在这一系列工作之后，国民党派中央执行委员张冲到瓦窑堡与共产党直接联系，并观察红军动向。张冲会晤了周恩来、毛泽东。尔后，周恩来等到南京与陈立夫会晤。陈立夫代表国民党提出四项原则作为谈判基础：一、遵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政府，改为地方政府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二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又对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谈判中，共产党代表坚持《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所提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原则立场：承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执政党地位，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要求国民党政府分批释放被捕之共产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公开 取消苏维埃政府,将红军驻在地区改名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党政府任命；取消红军名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一指挥。并提出愿将现有红军中最精壮者编为三个国防师，计六旅十二团，每师一万五千人，在三个国防师之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此外，还提出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和停止对西路军的军事进攻等要求。国民党方面，在蒋介石授意下，提出了共产党方面根本无法接受的条件。即：要求共产党放弃独立性，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分割陕甘宁边区，划归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并取消民选制度；红军改编后，服从蒋介石的一切命令，南京政府向红军派遣各级

①王振合：《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经过大事记》见《党史研究资料》第二期。1982年 2月 20 日。

军政人员，每师编制不得超过一万人等。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将上述谈判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十三日，中共中央指示代表：向国民党方面申明“顾、贺提案完全不能承认”，“谈判须重新作起”，要求同蒋介石直接面谈。尔后，周恩来回延安，叶剑英仍留西安进行联络。

三月下旬，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周恩来表示了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重申了共产党关于两党合作的原则立场，向蒋介石提出十一项书面要求和六项口头声明。蒋介石回避应解决的具体问题，只表示原则上同意国共合作。他提出不要提国共合作，只提共产党与他合作；要求共产党拿出一个与他永远合作的办法；并示意可以把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办。周恩来明确表示，国共两党合作到底的最好办法是制定一个共同纲领，作为双方行动的准则。蒋介石让周恩来起草这个纲领。周恩来返回延安，起草了共同纲领，并与国民党约定在庐山商谈。

六月四日，周恩来到庐山与国民党会商国民大会代表问题。并在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参加下，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根本不提共同纲领问题，而是提出；一、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题：由他指定国民党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提出同等数量干部，共同组成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他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共同纲领亦由同盟会讨论；若同盟会工作顺利，将来可视情况，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并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代替共产党的关系。二、军队问题：由共产党根据以前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先发表对外宣言，然后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三个师仍照十二个团编制，人数可容纳四万五千人。在三个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负责部队指挥。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出国留洋。南

各游击区由共产党派人联络，经国民党调查后，对部队进行编遣。原领导人须离开部队。三、陕甘宁边区问题：蒋介石坚持由国民党方面人员担任边区政府的正职长官，副职由边区自行推选。可由林伯渠担任。另外，蒋介石还表示：狱中共产党员，可由国民党分批释放；由共产党指定共产党出席国民大会代表人数，但不能以共产党的名义出席；共产党干部可参加国防会议等。周恩来没有同意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十六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后，返回延安。

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重新拟定与国民党谈判方案，在一些问题上作了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在承认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同意国共两党各推出同等数量的干部组织最高会议，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对同盟会将来发展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关系，不加反对，但必须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并提出，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任选一人任边区政府正职长官。还提出红军改编后，朱德为指挥人等。此方案电告蒋介石后，蒋介石仍坚持红军改编后设立政治训练处，负责指挥部队。故谈判始终未达成协议。

全国抗战爆发后，共产党为促成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建立，以便推动已经开始的全国抗战进一步发展，又作出重大努力。七月八日。在《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中，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七月十五日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给国民党宣言中提出了国共合作及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的迅速的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

（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 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改善人民生活’①.

为了共赴国难，共产党以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郑重向全国宣言：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②.

七月十七日，共产党又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为代表，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进行谈判。蒋介石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问题，双方意见仍存在严重分歧。蒋介石坚持三个师的经管教育直属行营，三个师参谋长由国民党方面指派。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对红军统帅机关名义问题暂作让步，但坚持“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个人”的原则，拒绝国民党派人参与军事指挥。共产党代表还建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由国民党将其公开发表。蒋介石把《宣言》交给康泽修改，企图把它变成共产党向国民党的投降书。

八月九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南京出席国民党召开的

①《解放周刊》第一卷第十八期， 1937年10月20日出版。
②《解放周刊》第一卷第十八期， 1937年10月2日出版。

国防会议。其间,继续同蒋介石会谈发表《宣言》和红军改编中的问题。《宣言》经国民党修改后,把三项政治主张删掉,只留下共产党向国民党的四项保证。共产党方面反对如此修改,并主张《宣言》暂缓发表。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在红军改编后由国民党方面派政治主任的主张，坚决主张设立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指挥。并表示，此问题未解决之前，暂缓出兵。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对抗日态度趋于积极，两党谈判也有进展。十九日，蒋介石表示同意共产党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的主张。二十二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二十五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红军改编命令。红军改编后，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在共产党一再催促下。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该社发表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蒋介石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谓共产党的宣言,是‘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宣言所举诸项‘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相符合’。蒋介石表示‘: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但是,蒋介石的谈话没有能够坦白地承认，过去十年来在民族危机中，国民党所应负的责任，更没有抛弃国民党的自大主义精神，把同他党派的合作说成是国民党对他党派的‘领导’和‘接纳’‘,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①]这种既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又不承认各抗日党派间平等地位的态度，同样反映了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两面性，为

① 《“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时事问题研究会编， 1940年。

日后造成国共关系恶化的根源。

《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的发表,宣布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历史的车轮将经过它‘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①

三、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

国民党、共产党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政党。两党的合作给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事业带来了巨大影响，推动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于九月，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下，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战场作战。时值日军进攻太原，国民党军队正部署保卫太原，阻敌进攻。八路军一一五师为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于九月二十五日，利用平型关天险伏击日军精锐部队板垣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激战一天，毙敌千余人，获得抗战以来第一次大胜利。此后，根据国共双方协商的全国兵力部署原则，八路军开赴华北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一一五师开赴晋察冀边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二〇师开赴晋西北和大青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晋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开赴晋东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后来发展为晋冀鲁豫根据地。山东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5页，1964年版。

同年十月，原在南方坚持革命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下简称新四军）。随后，除军部及第三支队留在皖南国民党统治区以外，其余部队开赴华中敌后，在大江南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江南敌后根据地和以藕塘为中心的江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新四军到一九三八年，已经抗击着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五十八。此外。自‘ 九一八 ’事变以来。共产党就领导了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与关东军、伪军作战。抗日根据地在敌后农村星罗棋布，对敌人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形成包围之势。

国民党对其领导下的军队下达了动员令，并进行了相应的部署，设立军事大本营，作为最高统帅部，指挥全国海陆空军，蒋介石自任大元帅。全国划分为六个战区（后增至十二个战区）。继芦沟桥、上海抗战之后，八月进行了守卫南口、张家口的战斗。十月起为保卫太原在忻口坚持抗战近一个月，在漳河南岸与日军相持十余日，在娘子关激战十余日。十一月间曾抵抗进攻南京之敌。一九三八年初，在李宗仁指挥下，同日军战于徐州地区，三月在台儿庄激战，歼敌七千余人，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又为保卫武汉与日军作战数百次。十月武汉失守，国民党中央迁往重庆。在国民党军队的抗战中，“ 地方实力派 ”表现了较高的爱国热情和实战精神，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一战，曾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

全国各阶层抗日人民也都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男女老幼、各阶级、各党派、各团体，都以抗日为中心开展活动，或参军参战，或生产支前，或锄奸反特，发挥了每一个人的抗日爱国积极性。由于国共合作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统区人民获得了组织起来抗日救国的有利条件，纷纷组成抗日救国团体，进行抗日募捐、宣传、慰劳

抗敌将士、战地服务，争取为全民抗日贡献一份力量。敌占区人民在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开展抗日的工人斗争、农民斗争、学生斗争，大批青年到延安去、到太行山、茅山去参军，也有到大后方国统区去，希望能为抗日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节　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的公布

一、共产党的洛川会议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制定

抗日战争爆发和国共合作建立后，国共两党争论了近六年的应否抗日的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如何抗日即抗日救国纲领问题尚待解决。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提出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体现了中华民族利益，附合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但国民党公布后不正面答复是否可作为两党抗日时期的共同纲领。共产党为了使抗日救国纲领更加全面和具体化，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战的胜利，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指出：七月七日芦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从此，中国政治形势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即“实行抗战”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内，共产党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和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决定》在肯定大好形势的同时。还敏锐地指出抗战中“包含

着极大的危险性。”主要是由于国民党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日。他们把抗战仅仅看成是政府的事。惧怕、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革政治机构,不关心人民的生活。这样的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决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甚至存在严重失败的可能。因此，今后抗战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决定》指出 新阶段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关键是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为此。要争取国内政治民主；共产党员及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把千百万群众组织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去。《决定》还特别指出,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①。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概括了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政治主张，其主要内容为：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四、改革政治机构；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六、抗战时期的财政经济政策；

七、改良人民生活；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① 《解放周刊》第一卷第十五期，1937年9月6日出版。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①

为了实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洛川会议还作出以下具体决定：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所有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群众运动,团结广大人民,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进行斗争,以推动抗日战争胜利进行 在有利于全国人民抗战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鉴于农民是抗日战争的主力，改善农民生活以提高农民抗日积极性极为重要，会议特别决定以减租减息政策作为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会议所决定的一切事项的中心思想是广泛放手发动群众，把抗战发展成为全面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由于当权的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会议特别强调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领导责任，这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二、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抗战建国纲领》的制定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务问题和施政方针问题。

关于党务问题，决定实行总裁制， 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国民党在历史上曾实行总理制，孙中山逝世后，即无法定的领袖制，实际上的领导重心在蒋介石。此次大会法定领袖制，并取名总裁，标志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独裁地位进一步强化，权力高度集中。与此相适应，大会强调党制，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26—328页，1964年版。

规定调整党政关系原则：（1）中央采取以党统政的形态，（2）省及特别市采取党政联系的形态；（3）县市采取党政融化的形态。大会决定取消预备党员制，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招揽青年，使之成为三民主义之信徒。还决定增设中央调查统计局，以加强特务统治①。

关于施政方针问题。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通过了《组织国民参政会案》、《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以及推行兵役制度等要案。这些都体现了国民党的工作重心向战争时期转移。其中最重要的是《抗战建国纲领》的制定和国民参政会的设立。

《抗战建国纲领》②内容分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七项。总则规定以三民主义为抗战行动及建国最高准绳，以蒋介石为全国抗战力量之领导。外交项中规定了“独立自主”、“和平与正义”条文，体现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精神，如有：“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为。”军事项中，规定加紧军队政治训练和民众武力训练，并“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政治项中，规定改善政治机构以适合战时需要，严罚贪官污吏，并组织国民参政机关。经济项中，规定“以军事为中心”，发展农业、工矿业，实行战时税制，改革财务行政，整理发展交通事业，调整和管理内外商业贸易等，并提到“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民众运动中，规定了在有限范围内发动群众抗日，组织群众团体。教育项中，规定实行战时教育，训练青年、妇女及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为抗战服务。

①②《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第二十二册。

《抗战建国纲领》体现了国民党抗战初期进步的政治主张,与抗战前国民党的国策相比，无论是从对外的抗日政策方面或是对内的政治开放方面，都不能不说有相当大的进步。但与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相比,则有原则区别与分歧。在当时全中国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务——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问题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出了明确、全面的规定,包括"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否认对日债务，废除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收回一切日本租界",保卫正在受日军侵略的华北和沿海各地,收复已被日军占领的平津和东北,直至"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充分体现了抗日的坚决、彻底精神。而《抗战建国纲领》对抗日所要达到的目标及诸方面的内容无明确、直接的规定，即使在纲领诸项中涉及、体现抗日内容者，亦仅仅"欲求抗战必胜","使之保卫祖国"等抽象口号，且寥寥数语已。在国内政治民主和发动群众抗日方面，《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触及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要害，提出了抗日时期的根本改革措施。如规定"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抗战建国纲领》则没有,它也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又如:《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规定"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这是广泛而充分的抗日时期的民主与自由。《抗战建国纲领》对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作了限制性规定，只是在"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才"与以合法之充分保证"。反之,即使是民众抗日的言行,如果国民党认为有碍于其"原则","法令",亦必取缔。显然，在各党派、各阶级共同抗日的形势下，这种规定是不民主的。再如:《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对国内政治机构改革提出了根本性措施，即召开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

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包括各党派和人民团体中革命分子，而驱逐亲日分子的国防政府。《抗战建国纲领》除增设一个国民参政机关外，十年内战时期的一党专政的政府机构根本不作变动。在各党之间的关系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一切抗日党派平等合作为原则，提出"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抗战建国纲领》自始自终强调全国在国民党及蒋介石的领导下。以"三民主义"为准绳，片面要求全国人民"摈弃成见"，"破除畛域"，表现出国民党顽固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自大精神和独裁专制主义。对于抗日人民的生活，《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了改善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待遇，农村减租减息以及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救济灾荒、失业等措施。《抗战建国纲领》也有某些类似内容，但对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生活和工人、职教人员等的待遇问题避而不提。更谈不上采取得力措施。这些，都表现了国民党采取的是片面抗战路线，以及对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两面政策。它的最大危害是不利于发动人民抗日，因而它不能成为夺取抗日最后胜利的纲领。

尽管如此，由于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有积极的一面，所以共产党和各党派对它采取了赞助和善意批评的态度。如果国民党真正将其中有积极意义的条文付诸实施。中国尤其是国统区的抗战局面和政治生活亦将有所改观。

三、国民参政会的设立

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抗战期间设立了国民参政会。

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同月十二日由国民党政府公布实施。七月国民参政

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在武汉召开，国民党参政会正式成立。

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①（以下简称《条例》），参政员由年满三十岁的下列四类人员中产生：（一）曾在各省市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之人员”；（二）曾在蒙古西藏地方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著有信望”，或熟悉各该地方政治社会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三）曾在海外侨民居留地工作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熟悉侨民生活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四）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条例》规定参政员产生方法是，先由各省市政府和各省市党部联席会议、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提出候选人，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参政会是国民党容纳各抗日党派并允许各抗日党派代表议论国事的机构，但在参政员资格规定中完全回避了阶级、党派的名额。共产党及中间党派的名额被列入“文化团体”、“经济团体”之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共二百名。其中国民党八十九名，占百分之四十四·五；共产党七名，占百分之三·五；中国青年党七名，占百分之三·五；国社党六名，占百分之三；社会民主党一名，占百分之零·五；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一名，占百分之零·五；无党派者八十九名，占百分之四十四·五。二百名参政员的实际政治分野，有四分之三属于国民党及其附庸分子。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副议长张伯苓，均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

国民参政会的职权，按《条例》规定：“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国民参政会得提出建议于政府”；“国民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参政会的这些权力行使的实效如何取决

①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第二十三册。

于国民党及其政府。《条例》规定：参政会关于政府对内对外重要施政方针的决议案，要“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然后才能依其性质“交主管机关制定法律或颁布命令行之”。换言之，国民参政会的决议案，对国民政府无任何约束力。而且《条例》还规定，遇有“特殊紧急情形”，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可依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连“政府对内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一项亦可免除。可见，国民参政会只是国民党及其政府的一个谘询性机关。它是国民党在抗日的各阶级、各党派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民主呼声的压力下，所采取的一项既作出开放民主的姿态，又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措施。

尽管如此，国民参政会的设立，对于一向不许其他党派和广大人民过问国事的国民党来说，毕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当国民党还没有把参政会作为反共反人民御用工具的时候，各抗日党派还可以借参政会开会之机抒发一下对内政外交的观感，并提出自己的政见，宣传抗日主张和政策。国民参政会成立之初，共产党和中间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出席会议，认真提出关于施政方针的建议。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在武汉开会时，出席参政员一百三十多人。会上，共产党和中间党派、群众团体参政员提出了“正式确定抗日各党派之合法地位”、“严令废止党部及各级政府压抑民众救亡运动”、“根本改革现行保甲制度”、“明令减除苛捐杂税、减少高额地租、取缔高利贷”等提案。第四次大会时，提出了“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为决定立国大计解除根本纠纷谨提具五项意见建议政府请求采纳施行案”、“为加紧精诚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建议集中人才办法案”等提案。各次大会都通过一

些类似决议。这些提案和决议对抗战和改善国内政治状况，发动人民群众，都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可惜实效甚微。

国民参政会共历四届，举行大会十三次。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方针，国民参政会中反动分子日益增加，有利于抗日、民主的活动日益减少。

与全国设立国民参政会相适应，国民政府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公布《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以后又公布了《市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县参议会组织条例》。依此，在省、市、县成立了与国民参政会同类性质的组织。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把参议会改为各该级地方最高权力机关。

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

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较，第二次国共合作有许多重大的不同之处。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成，中间经过十年之久。历史的变迁，国共两党自身发展、变化，两党关系的变化，以及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历史条件等等，都给第二次国共合作刻下深刻的历史痕迹，使之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同，而形成自己的特点。其最主要者为：

第一、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目的，组织成分广泛而复杂。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目的，直接解决国内阶级矛盾。其组织成分，就阶级而论，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裹挟其中的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在合作之初不占主要地位。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为了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建立起来的，它直接解决的矛盾是中日民族间的矛盾。由于是反对异族侵略的，所以组织成分异常广泛。共产党代表工人、农民及其

他劳动人民，并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党派。国民党中居统治地位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第二次国共合作,除汉奸卖国贼以外，一切阶级尽在其中；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了全民族的所有不同党派，不同阶级，不同军队和国内各民族。

组织成分广泛，首先是长处，不是短处，它联合了一切抗日的力量。次要的方面是带来某种复杂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是相互对抗的。在共同抗日的情况下，虽然这种对抗性的阶级矛盾降为次要地位，但并未消失，且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现。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内存在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他们的立场和一切抗日的阶级、党派相对立。不久，亲日派公开投敌叛国，从抗日阵营中分裂出去。

第二、国共两党的关系和各自的情况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共两党都是革命的政党。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帮助和建议，改组了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早已蜕变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党。与此相联系的是两党关系经历了一个合作—— 分裂—— 又合作的反复过程。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共两党都没有取得全国政权。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已是执政的党，它操纵着中国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绝大部分，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有一支拥有数百万人并用现代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是一个实力雄厚、在全国占统治地位的党。共产党的实力远不能和国民党相比，但亦不容忽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是一支政治素质极好，有远大前途的武装力量，是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台柱子。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武装斗争的胜利而不断发展、扩大。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历史较长，政治经验较多。而共产党刚刚建立不久，组织发展及活动范围狭小，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核心还没有形成“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①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② 而且有了两个革命阶段的经验，政治上已经成熟，组织领导上已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扩大了，威信提高了。

国共两党的性质上的差异和力量对比关系都不能不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总的趋势是在复杂、反复、曲折的斗争中，维持长时间的合作，既不容易开诚合作，也不会轻而易举破裂。

第三、没有制定出两党共同承认并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以新三民主义为共同纲领。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并发表了宣言。它对两党都有约束力。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提出的三项基本原则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都代表了全民族的利益,是指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纲领，但国民党不予正面承认。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是一个有重大缺欠不能指导抗日战争夺取胜利的纲领，共产党只能支持其积极的一面，不能把它作为抗日战争时期指导自己行动的纲领。这样，两党在反日这一共同点上实行了合作，抗日是实际上的共同目标，两党只能在这一共同目标之下各自执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73—575页，1964年版。

行自己的纲领。

第四、没有建立起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合作的组织形式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即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合作的组织是执行共同纲领，完成共同任务的工具，对合作者均有组织上的约束作用。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时及建立后，共产党曾多次提出关于合作形式的建议，提议：采取一九二四年的党内合作形式,或党外合作的各级组织形式,或其他方式"只要于团结抗战有利，敝党均愿与诸同志共同计划和执行。"① 还曾屡次主张改造政府，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改造成为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巩固两党的合作。但是，这些建议和主张，国民党均不肯采纳。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整个时期内，没有成立起两党合作的组织机构，不得不经常采用两党临时协商、谈判方式，讨论两党关系及合作抗日等问题。

第五、没有两党共同承认和共同执行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政策。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包括了发动工农群众的政策，而且国民党中的工人部、农民部是两党合作从事工农运动的领导机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虽然口头上也喊发动、训练民众，实际上用法律、组织手段限制群众的抗日活动，经常解散群众抗日团体，干扰、破坏群众抗日救亡活动。因此，为把两党合作发展为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和抗日党派不得不独立进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工作。

①《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1938年3月1日。

上述特点中，既有优点，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面；亦有缺点，合作有不坚固不充实之处。第二次国共合作历尽艰难曲折，经过复杂尖锐的斗争，终于坚持八年，完成了抗日救国大业。

第三节　中间党派拥护国共合作，一致参加抗日民主斗争

一、中间党派主张武装抗日，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斗争

如前所述，中间党派早在“七七”事变以前，就有因力主抗日而入狱者，事变后更大声疾呼抗日救国，和共产党站在一起，是坚决的抗日派。

抗战开始后，中间党派拥护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开赴前线抗战。其中相当一部分党派和人士，极力主张发动人民、组织人民、武装人民抗日，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达到驱逐日本侵略军，争取民族独立的目的。救国会在抗战一开始就公开提出：人民“是抗敌御侮最基本最伟大的力量，他们应该经过组织，而且应该获得最彻底的自由，才能够发抒其潜在的伟力，来拥护政府实施抗战的国策，以保证最后的胜利。”① 邹韬奋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主张加强全民族团结，进行持久抗战，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和妥协投降阴谋。沈钧儒、李公朴、柳湜等创办的《全民周刊》，以“争取全面全民族战争胜利而奋斗”作为自己的“使命”②努力宣传“加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将单纯的政府与军队的抗战转变为全面、全民族的抗战”③。第三党认为“中国在物质

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1937年7月10日。
②③《全民周刊》第一卷第一期。1937年11月11日。

上、军事力量上比不上日本,但政治上的优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不能具备的。中国进行抗日战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因此,中国抗战欲求胜利,必须发挥"本身的优点",促进政治革新,"以集中全国一切的物力人力,充实军事的力量,以雄厚的社会基础,运用进步的战略战术,作长期的抗战"①。上述主张,与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基本精神一致,而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截然不同。

中间党派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和组织,反对一切对日妥协投降活动。《抗战》三日刊第15号刊胡愈之《谨防疫病》一文指出:"妥洽是一种疫菌";"抗战开始后它潜着",遇到一定条件,"就会活跃起来"。因此,必须"谨慎防范。正象夏秋间我们必须打防疫针一样,我们现在应该赶快加强民众组织,肃清汉奸意识,同时对外表示中国抗战决心,以防疫病——妥洽与和平论——的流行。'②抗战一开始,汪精卫就在抗战阵营内散布亡国和妥协论调,《抗战》三日刊针锋相对予以驳斥③,公开反对妥协,反映了中间党派抗日的坚定性,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称赞。

中间党派的成员以知识分子、文化界人士居多。在抗战实践活动方面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他们以其所长,为抗日救国斗争贡献力量。抗战爆发后,中间党派创办了许多刊物,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十二月,沈钧儒、李公朴和柳湜在武汉创办了《全民周刊》。次年七月,《全民周刊》与《抗战》三日刊合并,在武汉出版了《全民抗战》三日刊。它继承了《抗战》三日刊和《全民周刊》的传统,在"全民动员,抗战到底"的口号下,从刊物形式到内容又作了很大

① 《抗战行动》第六期,1938年4月26日出版。
② 《抗战》三日刊第18号,1937年10月6日
③ 《抗战》三日刊第27号,1937年11月16日。

改进，扩大了抗日宣传，每期销售量达到三十万份，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九月救国会在同一宗旨下，创办《救亡日报》、《国民公报》旬刊,在坚持抗战、提倡民主、批评时政方面亦颇有见地,可与《全民抗战》相比美。第三党办《进步日报》、《抗战行动》半月刊。职教社出版《国讯》。国社党办《再生》。青年党办《新中国日报》。此外。《还有战时教育》、《文艺阵地》、《妇女生活》、《大众生活》等。这些刊物,对于推动群众的抗日运动,坚定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在不同程度上起了积极作用。

除了办报刊外，中间党派在图书出版、发行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尤其是邹韬奋办的生活书店“在为抗日战争、统一战线、民主思想及进步思想的斗争中尽了很大的作用。”① 它有一个庞大的发行网，布满前方后方，各分支店深入战区、敌后和游击区。 该书店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出入敌人封锁线。把书籍送到前线去。生活书店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儿童抗敌故事》、《战时读本》、《大众读物》等图书,向群众深入浅出、通俗简明地介绍了抗战建国知识,深受欢迎。仅《战时读本》《大众读物》就发行了五百万册以上。

中间党派领导人和一般成员，为宣传抗战，亲自挥笔著书撰文，创作文艺作品，并组织文艺战士到战地、城乡街头演出。

在组织群众、训练骨干方面，中间党派也尽了一份力量。他们在国统区支持、帮助各种救亡团体的建立。职教社曾就如何调正充实发动民众机构；如何训练发动民众人才；如何发动陷落各县民众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并积极推行职业教育， 培养抗日人材。在上海的各中间党派及无党派的编辑、作家、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在抗战爆发后不到一星期，就成立了编辑人协会及

①凯丰《纪念韬奋先生》，《解放日报》1944 年 11 月 22 日。

文化界救亡协会。尤其是后者，对于救护、慰劳、宣传、动员、训练干部等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李公朴在共产党帮助下，组织了抗战建国教学团，在山西开展活动，举办短期艺术训练队和一些短训班，把抗战教育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胡愈之等还曾在上海创办社会科学讲习所。

中间党派积极参加武装斗争及从事募捐支前、慰问抗敌将士、救济灾民等工作。抗战开始后，中间党派成员中的青年爱国者，不少人直接到前方投身实际战斗。救国会大批成员进入陕北、华北、华中等解放区，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在对敌斗争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乃至生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军队从山东撤退，共产党组织山东人民就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乡建派邹平乡村建设学院的学生的一部分，留在山东，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一起作战。乡建派还曾把从山东退出流亡到大后方的人员集中起来，在河南集训后，返回山东抗日，其中不少人参加了山东敌后八路军的队伍。募捐支前，慰劳前方抗敌将士是中间党派普遍从事的一项抗日救国工作。“七七”事变后，中国致公党发动海外数千万侨胞参加祖国神圣抗战事业，或“踊跃回国服务”，或“倾家输将”以协助军饷[①]，表现了中华儿女高度的爱国热忱。如：抗战八年，仅司徒美堂等领导的募捐活动，捐款即达五千四百多万美元。马来亚致公党负责人官文森，联合爱国侨领，组织“惠侨救乡会”，筹募人力、物力支援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致公党还培养、输送爱国青年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救国工作。沈钧儒、邹韬奋等文化界代表曾赴江西、湖南等地前线慰劳抗日战士。黄炎培在云南劝募战时公债运动大会上讲话后，当场献出一百元钱。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由于正面战场上大溃退，大批灾

①《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九四七年五月十日。载香港《公论》1947年5月10日。

民等待救济。中间党派郑重要求政府“：救济战区劳苦人民、自由职业者、中小工商业者、失业公务人员。”① 上海沦陷时，一批难民临时留住租界收容站，救国会成员组织八百名青年男女到六十几个收容所慰问，发放救济品，向难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使十几万难民中的五万人学会唱救亡歌曲，一千多人学会“新文学”，对改变难民精神状态极为有益。中间党派所能动员的人力、物力有限，对救济工作尽力而为，值得称赞。

中间党派不掌握军队；抗战初期国民党抗日还比较努力；国民党领导的军队无论在数量和装备上均优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再加上中间党派中的一些人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本质认识不清。因此，抗战初期中间党派中一部分人对蒋介石的抗日积极性估计偏高，抱有幻想，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颁布《抗战建国纲领》后，中间党派一方面看到其进步之处，敦促国民党言行一致，付诸实施，批评了国民党的官僚积习；另一方面，又对它估计偏高，特别是中间党派右翼青年党、国社党极力吹捧国民党。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青年党代表左舜生致蒋介石汪精卫信中公然声称“抗战唯一之中心力量”在国民政府“同人等必本爱国赤诚，始终拥护。”②

但后来，绝大多数中间党派从实际视察和切身感受中逐步转变了认识。

二、中间党派主张团结，拥护国共合作

中间党派在抗战爆发前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只其中的右翼极

①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在芦沟桥事变爆发时对国民党提出的八大政治主张(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抗战行动》第六期，1938 年 4月 2 日版。

② 《文汇年刊》，1939 年 5 月出版。

力反对共产党，愿为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效死力”①。外敌入侵，国难当头，各党派中均有人提出“一致对外”的问题。国共两党是中国的两大政党，国共两党关系深为中间党派所注目。全国抗战爆发后，中间党派一致参加抗日，集中全力于救国大业，更力主国内各政党团结合作。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共赴国难，受到中间党派的一致支持和拥护。他们努力于抗战救国的同时，亦积极参加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认为国共合作、共产党七月十五日宣言，蒋介石对这个宣言发表的谈话，是全国团结御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是国难愈益严重以来数年间，“全国忧心外患的人们不避艰险以企求的重要主张之一”；所以共产党“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宣言”和蒋介石的“集中力量救亡御侮”的谈话“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所热烈欢迎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也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所一致赞助的。”②他们认为国共重新合作，使“我国已恢复了民国十六年前全民族一致团结以谋民族复兴的精神。这样的全国团结，是保障抗战胜利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大的打击”③。甚至有人欢呼这是“民国开元以来所未见之大统一大团结的好现象”④。他们把巩固国共合作看成抗战到底的关键所在，积极主动建议国共双方采取长期合作措施。针对国民党政治上、人事上的弊病，大胆直言，指出国民党官员对任何党派不得有厚有薄，当处以公正。

中间党派还呼吁实现全民族的团结。第三党的政治主张中指出：抗战的利益，包括一切人民的利益，除汉奸外，“全国上下，

① 李璜：《述曾慕韩生平政治行动之一贯方针》，原载《民主潮》第十一卷十八期。见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③ 《抗战》三日刊第12号，1937年9月6日

④ 包清岑编：《抗战文选》第二集，1938年5月出版。

不分党派，无间朝野，为民族利益计，为自身及子孙计，都应该牺牲其特殊利益、财产生命，团结一致，共同向战胜暴日的一个目标前进。”①

抗战初期，中间党派对蒋介石合作诚意估计偏高，希望过大，以极其善良的愿望同国民党合作，热心地建议国民党，克服自大主义态度，改变独裁方针，与各党派开诚相见，共谋国事。中间党派中个别人对党派间合作的原则持错误见解，简言之，视合作为向国民党投降，如认为“国民党已经居于唯一领导抗日地位”，其他党派只能绝对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而不能有自己组织的独立性，否则“即是要负破坏统一分裂抗日战线和危害国家的责任。”②

用这种观点观察国共合作关系，必然站在偏向国民党的立场上指责共产党在巩固统一战线前提下正当的独立自主原则。中间党派中右翼代表人物张君劢，公开主张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边区。他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日，《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提出“共产党自有党军，自有特区，自标马克思主义”是长期合作的“障碍”，他竟然忘记了，正是一九二七年共产党中央在陈独秀的主持下，放弃革命领导权，既没有特区，也没有军队，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破坏了已建立起三年之久的革命统一战线。张君劢根据他的不能成立的论点，要求共产党“以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蒋先生手中”，“取消特区之制”，“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③。刚刚从监牢里出来的章乃器，拥护各党派合作抗战，但反对国民党以外的党派作政治号召。说什么“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却应该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使国策可以早点充实起来”，“政府既然已经有确定

① 《抗战行动》第六期，1938年4月26日出版。
②包清岑编：《抗战文选》第二辑，1938年5月出版。
③ 《再生》，第十期，1938年12月16日出版。

的国策，有点心肝的人，谁还愿标新立异以鸣高。’① 他公然提出了“少号召多建议”的主张。章乃器虽然没公开说明他是在指责哪个党派，但一九三七年除国民党而外，共产党是国内大党，而且是最热烈号召人民起来抗日的党。从国共关系方面来讲，人们自然会意识到章乃器是在赞助国民党，责难共产党，要求共产党“少号召多建议”。事实上，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情况下，单是向国民党‘建议’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直接‘号召’民众起来向国民党作斗争。否则，就不可能坚持抗日，也不可能抵抗国民党的反动。

在国共合作成立之后，中间党派中有人鼓吹国民党以外的党派“自愿解散组织”，或不解散组织而“诚意支持国民党抗战主张拥护政府抗战政策”，如此才能使中国“只有法律问题，没有党派问题”，政府可以‘只问人才不问党派’② 。一九三八年四月，国社党代表张君劢致蒋介石、汪精卫信中说：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③ 同时，中国青年党代表左舜生在致蒋介石汪精卫信中表示：“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计”④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发表解散宣言，以表示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公诚”拥护’态度⑤。其领导人之一陈铭枢在该同盟解散之后，竟完全否定了这个组织以往的革命历史，悔恨自己“曾经一度离开国民党和多年的长官蒋委员长”，“组织了一个团体，名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说“这一段历史无论在个人，在国家都是一件不幸的事。’⑥

①《申报》，1937年9月1日，上海。
② 《抗战文选第二集》，1938年5月出版。
③《文汇年刊》，1939年5月出版。
④《文汇年刊》，1939年5月出版。
⑤ 《文汇年刊》，1939年5月出版。
⑥ 《抗战文选》,第二辑，1938年5月出版。

但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改，排斥其他党派，甚至迫害其他党派成员的事实，使中间党派及其成员的绝大多数逐渐了解了国民党政策的实质，打消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坚持团结合作，共同抗战的同时，注意保持和加强自己组织的独立性。

在抗日战争进行过程中，国民党顽固派不顾大局，常常制造反共摩擦事件，使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国内团结逞现不稳固状态。凡遇到这种情况，中间党派的大多数，即出面呼吁团结，奔走调停，为改善国共关系，维护国内团结抗战局面贡献力量。只有个别党派，如青年党之流，曾暗中充当反共顽固派闹摩擦搞分裂的帮凶。一九四〇年初，青年党配合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决定翻印‘铲共须知’‘共产主义批判’‘唯物史观批判’等反动书籍；令下级组织‘护党反共’,并在‘必要时’帮助政府铲共’①。

三、中间党派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求实行民主改善民生

中间党派十分关心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他们在抗战期间的主要政治主张是抗战、团结、民主，而以民主为中心的中心。他们不但把民主政治和抗战联系起来，而且和国内一切重大问题放在一起加以考虑，认为：中国如不实行民主，任何政治问题、党派问题、经济问题、物价问题、抗战问题、军事问题、以及一切社会教育文化问题，都无从圆满解决。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汉口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会上通过了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共十五项，其中关于民主政治方面的占一半以上，内容相当广泛，有革除政治积弊、扫除官僚主义、建立民意机关、保障人民自由权力、取消保甲制度、国内各民族

①《中统局情报》（1940年2月7日），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三四）（二）91，见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一律平等、尊重侨胞政治权利等。救国会坚持抗战前就提出的“民主制度”和“救国政策”，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在将单纯的政府与军队抗战转变为全民族的抗战过程中，要有“更坚定的民族主义的信心，支持长期抗战，更健全、更合于民权主义原则的政治机构，民生主义的经济政策，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为原则的革命的外交，农工政策为骨干的民运”①。青年党提出“促进民主政治，完成各级民意机关”②。国社党纲领也“以民主政治为根本原则”③。总之，民主政治是中间党派一致的政治主张。当然其中各党派要求的民主的内容实质不完全一致。右翼国社党主张“修正的民主政治”，有排斥共产党参加统一政府的选举的意图。不过，中间党派主张的民主政治，主导方面还是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政治的。

中间党派要求的民主政治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最集中的问题是政权问题，主张国民党开放政权，改变一党专政局面。抗战开始之初，国民党有进步的表示和行动，中间党派以为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是跟着民族主义的抗战展开而产生的政治改革的起点”④，等待国民党接受要求，实行民主改革，表现了相当的忍耐精神。因此，对于民主政治的其他具体内容倾注了较多的注意力。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二、三次大会上，中间党派的参政员领衔或联署了许多有益的提案。其中属于民主、民生方面者，主要有：正式确定抗日各党派之合法地位、严令禁止党部及各级政府压抑民众救亡运动、根本改革现行保甲制度、改革人民生活

① 《为争取全面全民族战争胜利而奋斗》——《全民周刊》的使命。见《全民周刊》第一卷第一期，1937 年 12 月 11 日。

② 《中国青年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38 年 9 月 1 日。见李义彬《中国青年党》。

③ 国家社会党的纲领，见《再生》创刊号。

④ 《第三党对抗战建国纲领的意见》，见《抗战行动》第六期。1938 年 4 月 26 日。

增加战时生产、实行战时教育、切实保障人民权利、保障出版自由等提案。

但事实表明，国民党根本不想改变一党专政局面。国民参政会流于形式，决议案通过之后亦不付诸实施。而且，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其对内对外方针较之抗战之初均有倒退，对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压迫日紧，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受到极大限制。中间党派深感其苦，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初，生活书店的五十五个支店，被查封和迫令关闭的达四十八个。国民党特务对中间党派中积极进步人士，极尽威胁、恫吓、迫害之能事。邹韬奋因不堪忍受迫害，不肯向独裁势力低头，愤然辞去参政员职务，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四日流亡香港。他在香港《华商报》上连续发表《抗战以来》长文，以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反民主真面目，认识到抗战初期对国民党的信赖、希望是"发傻"，国民党"政治上最重要的征象"是"表面上是一回事，骨子里又是一回事"①。这表明，中间党派对国民党政治上的幻想发生动摇。因而，他们向着根本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方向迈进，即把斗争目标直接指向政权问题。于是，以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为开端，掀起了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宪政运动高潮。

中间党派对人民生活的困难具有一定的同情心。他们指责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增加人民负担"，使少数人变成暴富，而大多数生活恶化"②。还尖锐地指出："就抗战的立场讲，这种情形，是绝对不能容许的。"③他们要求国民党纠正各种行政上妨碍生产的措施，力谋民生之改善。他们还要求国民党当局救济难民、按置伤员、稳定物价，使人民起码的生活条件得到保障。

① 《韬奋文集》三，第 168—182 页。
②③《国民公论》二卷十二期，1939 年 12 月 16 日。

由于中间党派与民族工商业的社会联系比较密切，使得他们对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掠夺与鲸吞民族工商业垄断国统区经济的状况产生强烈不满。在中间党派创办的报刊上，揭露、抨击四大家族统制下的交通、运输、贸易、税收等方面的弊端颇不鲜见。《国民公论》刊载的千家驹的文章指出‘运输统制机关的不统一,扣车扣船，漫无限制”，因而影响了“后方的经济’① 受帝国主义的牵制，进出口贸易统制做得不好，必然使国内工商业遭受打击。他们要排除民族工商业发展中的障碍，增加生产，以利民生。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开始后，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从总体和主流看，是积极的、进步的。他们自认为是中间势力或第三方面的政治代表，在国共两党发生分歧、矛盾时，往往以中间立场出现。但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表明，其基本的、主导的方面，是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民主，是和共产党站在同一立场上的。周恩来曾精辟地概括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分歧。他说：“在抗战的全部过程中，都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抗战、团结、民主的路线；一条是妥协、分裂、独裁的路线。’② 显然，中间党派坚持的是前一条路线。诚然，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不是静止不变的，抗战初期，中间党派对国民党幻想多些，抱的希望大些，后来，逐渐转为向共产党靠拢，直至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中间党派队伍相当广大，各党派之间、一个党派内部成员之间，均有差异。以政治立场和国事主张可分为左、中、右三部分，其左翼倾向共产党，右翼倾向国民党。

①《国民公论》第一卷八期， 1939 年 2 月 16 日。
② 《周恩来选集》上，第 248 页。

第十一章

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

第一节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新方针，国民党营垒分裂，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

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新方针，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之后，停止了正面战场上的战略进攻，采取了新的侵华方针。把军事进攻的矛头主要指向解放区，对国民党及其政府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以“共同反共”口号引诱国民党，挑拨国共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与国民党政府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改变了一月十六日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进行和谈的方针。

日本侵华方针的变化，必然影响本来就充满着失败主义情绪，又潜伏着一个亲日派的国民党。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自一九三八年春天开始，就与日本帝国主义信使往还，密商投降条件。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日，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表人员影佐、今井与汪精

卫集团的代表人员高宗武、梅思平会谈，达成几项协议：（一）中日两国签订防共协定；（二）中国承认“满洲国”；（三）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有居住经商的自由，日本则考虑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和交回租界；（四）中日经济“提携”，为日本“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提供特别的便利条件；（五）“赔偿”日侨的“损失”；（六）日本撤军（于二年内完成）。双方约定：汪精卫脱离重庆后，日本政府发表以上述条件为基础的公开声明，由汪出面响应。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脱离重庆，次日飞往河内。汪精卫集团的其他人员也相继叛国投敌。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卫按预定计划发表所谓中日关系“根本调整方针”声明（以下简称近卫声明）：（一）中国停止抗日，与“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二）中日缔结防共协定，在协定有效期间，日本要求在指定地区驻兵，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域；（三）中日经济“提携”，中国应承认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特别给予日本在华北与内蒙以开发资源之便利。汪精卫按照预定计划，在河内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二十九日）电”。“艳电”公然颠倒黑白，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辩解，主张中国政府以近卫声明为根据进行“和平之谈判”。汪精卫从此打起所谓从事“和平运动”的旗号，公开充当卖国贼。

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和导演下，汪精卫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在上海召开一次由全体投敌叛国的国民党员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降日卖国纲领和政策，宣布“易抗战建国口号为和平建国”，“以反共为和平建国之必要工作。盖和平所以顺利建国之进行，反共则所以扫除建国之障碍。”① 此会组成以汪精卫为首领的“国民党中央”。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国民

①汪伪国民党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

党。汪精卫打着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招牌，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既为掩盖自己卖国贼面目，亦为便于替日本帝国主义向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诱降。一九四〇年三月，汪精卫又在日本帝国主义导演下，在南京组成以汪精卫为代理主席的傀儡组织伪国民政府，并煞有介事地发表了“还都宣言”。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不是个别人的个别行动，是国民党阵营的分裂。紧跟在汪精卫之后，国民党文武官员投降敌伪者络绎不绝。据统计，一九四一年以后至一九四三年八月以前，国民党中央委员二十人，旅长参谋长以上高级将领五十八人，军队五十万（占伪军总数的 62%）投敌叛国，形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而且在重庆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与汪精卫投敌叛国集团组成的伪国民党、伪国民政府之间不断有信使往还，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时，蒋伪勾结共同反共。

汪精卫投敌后，追随国民党的中间党派右翼青年党、国社党也有一部分成员附逆投敌。他们分别成立了青年党、国社党的伪中央组织机构，并以“在野党”的身份参加了汪伪政权。青年党中央委员赵毓松和成员张英华、李守黑等，国社党成员李祖虞、诸青来等，均在汪伪政权任要职。青年党的领导人曾琦，自一九四〇年起进入沦陷区，来往于上海、香港、南京及华北等地，与日本侵略者、汪伪的头面人物勾勾搭搭。

二、各抗日党派一致声讨汪精卫叛国集团，反对一切妥协投降活动

汪精卫集团的公开叛国投降，激起了全国各界的无比愤怒。抗日的各党派一致声讨汪精卫叛国集团，并反对一切妥协投降活动。

共产党在党内发布《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一九三九年

六月七日）、《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等指示文件，指出：汪精卫正与日寇举行卖国谈判，投降分子，反共分子正在国内普遍的进行破坏工作。因此“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①，而“国民党的反共运动就是准备投降的一个组成部分”②。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③；“继续抗日”。④坚决反对投降活动，坚决反对汪精卫的叛国投敌。

共产党组织敌后根据地军民和全国人民掀起一个声讨汪精卫叛国集团的高潮，举行讨汪大会，发表讨汪檄文。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五日，八路军、新四军发出讨汪救国通电，誓“为祖国流最后一滴血，驱除敌伪，还我河山，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⑤

中间党派也声讨汪精卫叛国集团。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等发出申讨汪精卫叛国投敌罪行的《快邮代电》，认为“汪兆铭背党叛国，通敌求和，违反国策，惑乱人心，固革命政党所不容,亦全国人民所共弃。”该代电表示“:我全国同仇敌忾之决心，绝不致受其影响”，并且“自兹以后，凡属言论行动表现妥协动摇倾向之份子，均应随时揭发，严加制裁，以击破日寇之诡计,巩固革命之阵营。”⑥一九三九年一月，第三党发出《声讨汪兆铭通敌美国》电，认为“汪兆铭今日之公开叛国，实为其过去行为发展之必然结果”。要求国民党“通辑汪兆铭，归案严办”，对其党羽“应撤查缉办，以期除恶务尽。”⑦

有中国各抗日党派参政员参加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大会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二日在重庆召开。此时正值汪精卫潜行国

①②④ 《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一九三九年六月七日）。
③《反对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
⑤《解放周刊》第一〇五期，1940年4月30日出版。
⑥《全民抗战》五日刊第46号，1939年1月5日。
⑦《中华论坛》第一卷10—11期，1945年12月出版。

外，通电投敌之后，大会针对近卫声明和汪精卫“艳电”，作出决议“抗战既定方针，必须坚持到底……”①。同年九月九日召开参政会第四次大会，正值汪精卫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筹备拼凑傀儡组织，大会又一致决议通电声讨汪精卫集团：“忠奸不两立”，“汪兆铭等出卖祖国，已自绝于人类”；“凡其所组织之机关，全为敌人所制造之傀儡”，因此“一致斥伐，以昭大义。”② 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召开参政会第五次大会，汪精卫伪组织业已成立，大会一致通过《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通电，尖锐地指出“敌人占领地，安能有政府？降人订伪约，安能有效力？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以血汗保障之国家主权，安能容敌伪盗窃？无量数忠勇将士及各项辛勤工作人员血战三年取得国防之信誉，安能被敌伪动摇？”③国民参政会的决议代表了抗日爱国的各党各派的意愿和声音。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汪精卫集团本来既排斥，又姑息。精卫出逃后，蒋介石派宋子文到河内，对汪表示同情和愿给以帮助。而且蒋汪之间的某种联系一直不曾间断。但由于两个集团及美日间的矛盾无从解决，更由于全国人民讨汪情绪高昂，蒋介石也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表宣言，驳斥近卫声明；国民党中宣部政治部于同月三十一日为汪精卫投敌发表对外声明，又于次年一月发出为汪精卫投敌致各级党部的对内指示，申明：汪精卫的行为不代表国民党，国民党的抗战国策不变。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国民党开除汪精卫党籍；六月八日，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

①②③ 《中华年鉴》上册，1948 年版。

第二节　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斗争

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方针的制定

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方针的变化，国民党也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及其政府“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其‘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①在这个时期以后，国民党政策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面，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上决定的对内对外政策均较前初期有所变化。这次会上虽仍提抗战到底，但对日主和空气甚浓，决定了依靠国际压力和平解决中日问题的方针。蒋介石对抗战到底的含意解释为“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这种‘和平解决’的代价便是牺牲东北，实际上华北也仅仅保存形式上的统治。它表明，蒋介石集团最关心的是和四大家族、英美在华利益关系最大的华中与华南地区；只要这些地区保存，只要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地位不变，即可牺牲中华民族的重大权益与日本罢战言和。蒋介石集团的这个“和平”价格，与近卫声明是比较接近的。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938 页，1964年版。

会上，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讲话，据此，会议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这个“整理党务”决议，规定了国民党要以防共、反共为中心任务而加紧组织的发展“力谋新力量之增加与培养”“力求在乡村社会力量中之发展”；加强国民党内的思想统治，即所谓“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以及对全体国民党员，尤其是下层组织的严格控制。会议还根据蒋介石的报告与讲话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

会上，还作出一些强化国民党独裁统治，加强蒋介石个人权势的重大决定，其主要者：决定设立党政军一元化的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规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还制定了实施《国民抗敌公约》的办法，其中规定：全国人民以保甲为单位，宣誓“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宣誓后如违背誓言，要“依法治罪”，以此严加控制人民的思想、行动，禁止人民的革命活动。

根据会议精神，会后国民党有关部门制订和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并且还要求国民党“加派有力部队”“前往冀鲁”“以限制共产党之发展”①，并以“收复失地”为名，侵占解放区；经济上搞封锁，既不发饷，又以统一经济制度为名，不许自筹补给②；政治上，不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禁止组织群众团体③，限制文化、宣传工作，阻止青年奔赴

①②③ 《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见《磨擦从何而来》八路军总政治部 1940 年 4 月印。

解放区①。而且还要以特务手段破坏共产党组织,如规定"从事内线工作，刺探其内情，并分化其力量"②；"组织特种党团，打入共党组织"③ 打入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游击队"夺取"领导权"④。在策略手法上尽量采取阴谋、两面派手法，如密令下属对共产党"上层注重'理性之折服',以'严正'对之,中下层则予以'事实上之教训','以严励,对之'⑤";中央可示宽大,地方务须严谨，下级积极斗争"⑥等。

不论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本身，还是国民党会后发布的文件,都还不敢公开丢下"抗日""联共"旗号。为避免外界识破其方针上的变化,要求"绝对机密"⑦,造成表面上的"伟大精神"⑧.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确定反共方针为中心内容，表明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向着退步的、消极的、反动的、投降的方面转变。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没根本改变，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共产党、中间党派，以及包括国民党员在内的全国一切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们，坚决抗日，反对妥协投降，因而也反对国内自相残杀；由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和革命势力日益强大并在抗战中屡建功勋，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因而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无法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那样，公开发动反革命内战，当然也无法公然对日妥协投降。因此，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继续打着"抗日"旗帜，但抗日十分消极；继续打着"联共"旗帜，但不断制造借口，搞军事磨擦。

① 《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见《磨擦从何而来》八路军总政治部 1940 年 4 月印。

②④《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见《磨擦从何而来》八路军总政治部1940年 4 月印。

③⑤⑥⑦⑧ 《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见《磨察从何而来》八路军总政治部 1940年4月印。

二、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共产党组织大发展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制造了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一系列袭击和杀害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后方工作人员、伤员、家属的事件。一九三九年冬，国民党妥协投降活动加紧，十一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定了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政策，密令各地军队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这种活动的继续和发展，就形成了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军事进攻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

陕甘宁边区：早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国民党就在边区周围修筑了由五道沟墙和堡垒构成的封锁线。它西迄宁夏，南沿泾水，东达黄河、绵延千余里，形成对陕甘宁边区的弯月形包围圈，阻塞边区向外进出交通，切割边区与外地联系。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蒋介石下令给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部向边区发动武装进攻，侵占了边区的关中分区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同时又集结重兵准备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晋西区：抗战初期，山西地方群众抗日团体“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在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发动群众，建立了抗日决死队，又称“新军”。抗日决死队分别在晋西、晋西北、晋东南等地配合八路军抗日。阎锡山早已视抗日决死队为眼中钉、肉中刺。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集中了六个军的兵力，向抗日决死队发起进攻，并摧残地方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太行区：一九四〇年初，蒋介石调遣九十七军朱怀冰、庞炳勋、张荫梧等部，在日伪军配合下，由磁县、武安一带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区进攻。

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共投降阴谋早有准备，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河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指出"对非理性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①。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指出国民党反共投降活动已成为当前时局的主要危险，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②。七月七日，共产党发表纪念抗战两周年宣言，进一步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九月十六日，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到处制造磨擦事件的情况，毛泽东又公开申明共产党的立场，他指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摩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在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种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③

据此，八路军一二〇师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主力，奉命由恒山地区调回陕甘宁边区，协同留守部队打退了胡宗南部的进攻；驱逐了绥德分区五县的国民党军，使陕甘宁与晋绥两边区连成一片。晋西的抗日决死队，在八路军的支援下，给阎锡山军队以重大打击，之后，转移到晋西的和太岳区，正式编入八路军。太行区的八路军痛击朱怀冰、石友三等部的进攻，一九四〇年三月，消灭朱怀冰部三个师。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

①《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1979年，内部发行。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537页，1964年版。
③ 同上第553页。

军事上被击退。

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动进攻的同时，又在政治思想上开展反共反人民的宣传攻势。他们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论调，攻击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应当“收起”，共产党应当“取消”等等。不仅如此，对正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权百般诬蔑，说什么“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更进而抛出“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民生主义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等谬论，掀起一种取消异党及其一切抗日事业的声浪，完全背离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原则。这些舆论，不仅压抑国内抗日、民主空气，而且制造思想混乱，使人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发生疑问。

共产党为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思想上的进攻，指明中国发展的道路，一九四〇年一月，发表了毛泽东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一文，该文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有新旧之分，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已不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其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经济纲领是：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允许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和富农经济存在，文化纲领是：发展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在现阶段努力完成反帝反封建斗争任务，奉行孙中山先生制定的新三民主义，将来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因此，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共产主义不能

收起，共产党更不能取消。从而，有力还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攻。

抗战开始后，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艰巨而复杂的斗争。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重创日寇，战功卓著，同时也付出重大牺牲。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解放区战场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抗击着一半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全部伪军，战斗异常频繁。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到处制造摩擦，使得共产党又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力量，进行必要的自卫。其斗争之艰苦，任务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由于共产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投降主义的错误使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得到进一步的贯彻，因而使共产党的组织，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

早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根据“大批革命分子要求入党”的形势，和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作出了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中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决议》要求党的组织发展工作，要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的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特别注意‘在战区在前线”大量吸收新党员,建立强大的党的组织；在后方无党的组织的地区，当地党应有计划的与迅速的去重新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

共产党大量发展党员，壮大组织的目的，着眼于“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

务’①。与国民党的“发展本党党员……以任领导民众，防止共党活动之责’②截然不同。因此，共产党的组织发展，不允许拉伕，而是在严格审查，保证质量的基础上进行的。共产党为了巩固国共合作，还决定在国民党中央军中不发展党的组织，在其他友军中，如果其上层不同意，也不发展党员。

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异常迅速，据统计，到一九四〇年，共产党员已发展到八十万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发展到五十万人，在三年作战中，收复县城一百五十座，解放区和游击区人口近一亿人。解放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进行了减租减息，各阶级、各抗日党派成员，均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力，被称赞为全国的模范、新中国的雏型。

三、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国民党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之后，并未改变五届五中全会方针，对共产党的摩擦事件还不断发生。共产党为了巩固两党合作关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四〇年进一步向党内发出指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实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③

这一策略总方针的中心环节是发展进步势力。进步势力的发展，是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国内民主的基本条件。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

①《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年3月15日。
②《共党问题处置办法》。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03页，1964年版。

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创立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的群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扩大争取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去。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不但要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残酷的斗争，而且要同顽固派作残酷的斗争。同时还必须善于团结中间派，争取更多人的支持与合作。

争取中间势力十分重要。在中国，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不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不可缺少的组织部分，而且往往可以成为共产党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中间势力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三个部分。中间党派也属于中间势力，大体上可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他们。由于这三部分人情况不同，共产党对他们的争取政策也各不相同。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同工人阶级有矛盾，但在沦陷区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在国统区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限制，因此，要抗日，要政治权力，并企图利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的矛盾以达到它的目的。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是一部分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他们虽然同农民有矛盾，但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有矛盾。他们要抗日，不赞成顽固势力的反共政策，也想利用进步势力同顽固势力的矛盾达到其政治上的目的。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争取，既可争取一道抗日，也可争取一道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反顽斗争中，可以争取其中一些人在一定限度内参加，一些人保持善意的中立，一些人勉强中立。地方实力派，是国民党军队中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其领导成分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同进步势力有矛盾，同国民党中央损人利己政策也有矛盾。共产党可以争取同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在同顽固派斗争中争取他

们采取暂时中立的立场。但他们不愿同共产党一道建立民主政权。中间势力容易动摇，要产生分化，共产党争取中间势力是经过许多努力的。而且必须在一定条件之下才能达到争取的目的。这些条件是：共产党自身有充足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同顽固势力作坚决斗争并能逐步取得胜利。

顽固势力就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他们和汪精卫为首的降日派不同，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抗日派。顽固势力始终采取两面政策。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正式实现之后，他们一方面抗战比较积极；另一方面，反对发动广大人民参加的人民战争，限制人民自动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和民主活动。一方面对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过去有了改善；另一方面，仍旧不给各党派以平等地位，并多方限制其活动，许多爱国政治犯并没有释放，仍保持其一党专政的制度。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顽固派仍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根据这种情况，共产党反对顽固势力的斗争，不是反对它的一切方面，仅仅反对其反动政策，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同时支持其主张团结抗日的方面。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倒它，而是以斗争求团结，争取顽固势力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而且时间越久越好，以免国共合作破裂。同顽固势力作斗争，是为了逼迫顽固势力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以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如果共产党对顽固势力不进行斗争，进步势力就有被顽固势力消灭的危险，国共合作、抗日斗争的前途将不堪设想。

为了正确开展对顽固势力的斗争，共产党执行了三个原则。第一，自卫原则，即斗争的防御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第二，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并择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即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打

退顽固派进攻后，适可而止，讲团结，不是无休止的斗下去，即斗争的暂时性。这三个原则又称为“有理”“有利”“有节”原则。

共产党在开展反对顽固派斗争中，坚持对国民党进行具体分析，认为国民党并不等于顽固派”，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①]，顽固派在国民党中占支配地位，但人数并不多。所以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努力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

共产党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在顽固势力连续制造反共事件的严重形势下，消除了内战，分裂危险，坚持了国共合作。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正当八路军在华北举行著名的“百团大战”之际，国民党方面由何应钦、白崇禧出面，发出“皓电”要求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一个月之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由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并企图趁其转移之机进行围歼。共产党方面于十一月九日，由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发表通电，一方面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一方面表示，为了顾全大局，愿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江北。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九千余人，从皖南云岭等地出发开始北移，六日行至茂林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顾祝同、上官云相所部七个师八万人的袭击。新四军被迫还击，血战七昼夜，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害。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封锁消息，掩盖事实真相。并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共产党对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和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08页，1964年版。

的斗争。首先通过报刊揭露了事件真相。一月十六日《新中华报》刊出“朱彭叶项抗议皖南包围通电”；二十三日《新中华报》刊出“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二十九日《新中华报》刊出“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通电”；二月一日《解放周刊》社论“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共产党在国统区办的《新华日报》报导皖南事变消息，受到国民党新闻机关的蛮横扣压，报上开了“天窗”，周恩来在“天窗”上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以示抗议。同时，在全国各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抗议活动。其次，在组织上，共产党坚决反对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一月二十日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二十八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成立，全军扩编为七个师，共九万余人。八路军、新四军作好一切应变准备，随时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任何军事进攻。

共产党此时仍力求以斗争求团结，两党合作，共同抗日，为解决皖南事变善后处理问题，一月二十二日，向国民党提出根本办法十二条：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十七日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让其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军法审判①。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733 页，1964 年版。

此善后办法提出后，迁延月余，国民党未作答复，而且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政治压迫、军事进攻，反而变本加利。三月一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开幕，共产党参政员均未出席。中间党派参政员奔走调解，共产党又由在渝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二人名义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要求国民党方面予以解决，以便出席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方面仍没有接受这些要求，共产党参政员亦未出席这次国民参政会。

皖南事变真相被揭露后，国内外舆论均对国民党进行指责，对共产党寄以同情和支持。沦陷区上海各人民团体发表通电，呼吁消灭内战。在香港的进步人士宋庆龄、彭泽民、何香凝、柳亚子等，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势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香港的大学教授等四万余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呼吁制止内战，加强团结。国际上，不仅苏联，而且英美帝国主义也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内战。

国民党顽固派陷于孤立境地，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预期目的未达到，三月间，此次反共高潮即被击退。

第三节　民主党派对国民党态度的变化、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一、民主宪政运动的兴起，中间党派的初步结合

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国民党加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颁布了一系列的反共法令,攻击共产党为‘ 异党 ”,并到处武装袭击八路军后方机关。自一九三九年四月至十一月制造了多起的重大流血事件。他们把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及其他

抗日党派斗争得来的某些民主权利统统取消，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各党派依旧处于非法地位。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及其在政治上的种种倒行逆施，不仅激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而且也引起了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的不满，他们已再不如抗战初期那样一致拥护蒋介石，而逐渐和国民党产生了对立，纷纷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兴起一个民主宪政运动。

一九三九年九月九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国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的参政员，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毛泽东、秦邦宪等七人在“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中，提出“要实现战时民主，严惩对民众和青年的非法压迫行为，切实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权利”；“加强抗战党派之精诚团结”。为此，必须：

“一、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权利，认真取消防止异党活动办法；

二、严禁对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之歧视压迫行为，严禁因所谓党籍及思想问题而妨害到工、农、军、学、商各界人民及青年之职业及人权之保障，以便造成举国一致精诚团结现象”；

三、在抗战各种工作中，广泛地容纳各党派人材参加，不以党派私见摒弃国家有用人材。”①

章伯钧等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张君迈、左舜生等提出“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要求于最短期间内，颁布宪法，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立即成立举国一致的战时行政院，以求全国行政上的全盘改革；沈钧儒等提出“请政府重申前令，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王造时

①《新华日报》，1939 年 9 月 9 日第二版。

等提出“建议集中人材办法案”。要求国民党推进民权主义，实施民主制度，一切机关尽力发扬民主精神，使人人能贡献自己的意见，发挥自己的才能，承认各党各派之合法存在。最后。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的决议。决议案中提出（甲）治本办法：（一）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二）由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乙)治标办法：（一）请政府明令宣布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为适应战时需要，政府机构应加充实并改进，籍以集中全国各方人材，从事抗战建国工作，争取最后胜利。’①

在实施宪政的决议通过以后，蒋介石依照所定办法指定参政员十九人，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后来又把委员名额扩充为二十五人。同年十一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装模作样地宣布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诞辰）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乘机玩弄宪政的欺骗宣传,但它反对废除抗战前钦定的‘五五宪法草案’和‘国民大会选举法与组织法”，反对重选国民大会代表。

第四次参政会议后，沈钧儒等二十五位参政员发起召开宪政座谈会，接着由座谈会中公推八十五人为筹备委员，筹备组织宪政促进会。重庆的三十几个妇女团体，青年团体代表二十五人，分别发起宪政座谈会。在各大城市和解放区都成立了各种推进宪政运动的组织，如各界宪政促进会，妇女宪政促进会，青年宪政促进会等。在成都、桂林、延安等地先后成立了宪政座谈会及宪政促进会。各党派代表人物，在报刊上纷纷发表关于宪政问题的言论，许多报刊发表有关宪政论文，刊载宪政问题讨论大纲，出版

①《新华日报》，1939年9月9日第二版。

宪政专著等，宪政运动遂在全国范围内兴起。

为了揭露国民党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教育人民勿为其所迷惑，毛泽东于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宪政促进会发表演说，尖锐指出："现在有些历来反对宪政的人，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为什么谈宪政呢？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毛泽东还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宪政的本质。指出，宪政就是民主政治，中国人民要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国民党顽固派口谈的宪政，是旧式的，已经变成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他还最后告诫人们说："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能取得的。"① 这篇讲演就把国民党玩弄的宪政的手法彻底拆穿了。此后，蒋介石便对讨论宪政的各种团体采取箝制、高压政策。九月，国民党政府以交通不便，召开国民大会有困难为借口，宣布召开日期另行通知，宪政运动就此收场。

在这种形势下，各中间党派深感自己人少，势孤力单，既无力促使国民党实施民主宪政，也无力在国共两党之间发挥调解的作用，甚至他们本身的前途也岌岌可危。因而促使国民参政会中各中间党派和部分人士联合起来，建立第三者性质的政党，形成一种"第三者"的立场和力量，以期在国共两党之间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一九三九年十月，国民参政会中各中间党派和部分民主人士，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其宗旨为"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十一月下旬，中国青年党左舜生、李璜、曾琦，国家社会党罗隆基（后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93——694页，1964年版。

提出）、胡石青、第三党的章伯钧，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遹、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的张澜、光升等，在重庆举行会议，拟定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其信约共十二条主张“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一切抵触宪法之实施，应即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但各单位间应有一联系之组织，以共同努力，为固定国策之决定与推行”；“要求吏治之清明，而以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为其最低条件”；“尊重学术思想之自由”。同时又提出，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力促其领袖地位之法律化”；“求得国家之统一”主张“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反对“一切国内之暴力斗争及破坏行动”；“严格反对一切内战”等等。

在组织方面，规定：由全体会议推选常务干事五——七人，办理该会日常事务，每半年改选三——五人，由常务干事中公推一人为主席。十一月二十九日公推梁漱溟为代表去见蒋介石，说明“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的宗旨及其“第三者的立场”。要求他承认“此一联合组织”。蒋介石在审查了“信约”和名单以后，对沈钧儒，邹韬奋参加该会表示不满，硬说救国会是“中共的外围”。梁漱溟说“：与其让他们在这一组织外，还不如约到里面为好”。最后，蒋介石在以不能组织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

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建立，使中间党派初步结合起来，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二、中间党派对国民党态度的变化，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统一建国同志会建立以后，蒋介石继续推行反共反民主的政

策，一九三九年末和一九四一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国共关系异常紧张。在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不仅压制民主，实行反共，而且也排斥和打击中间党派特别是其中的进步人士。一九四〇年十月，国民党顽固派在新疆逮捕了要求抗日的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十二月，拘留了公开批评蒋介石集团中孔祥熙、宋子文贪污问题的马寅初。一九四一年一、二月间封闭了救国会领导人创办的各地生活书店十余处。尤为甚者，国民党悍然取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中国共产党代表以及许多其他进步人士为参政员的资格。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皖南事变及其对中国党派和进步人士的严重的政治压迫，使国内各阶级各党派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他们认为“皖南事变，不仅是国共两党问题，而且是民众与反动势力斗争问题。”① 广大民众、进步势力及一些抗日党派表示对国民党愤恨，同情中国共产党。第三党因国民党顽固派的压迫，积极整顿组织，并提出联苏联共的主张，派章伯钧、邱哲为代表与中共代表进行谈判，表示合作诚意，希望共产党对他们的政纲、组织、宣传及经济方面给予切实的援助。第三党章伯钧、青年党左舜生还集议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拟请中共、国社党、第三党各出一人，参加上梁漱溟、黄任之成立一秘密核心，以领导上述民主联合会工作。”② 开始时，不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公开参加，但要求与中共积极合作以反抗国民党的压迫。为此，第三党章伯钧、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乡村建设派梁漱溟，国社党张君迈。青年党左舜生在重

①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后各小党派及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左派的反应》，1941年 1月 12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1981年 12月出版。

② 中央档案馆编：《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关于皖南事变后各小党派动向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2月。

庆多次秘密集会，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定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一年二月下旬至三月中旬。黄炎培、梁漱溟、张澜、罗隆基、章伯钧等人连续召开秘密筹备会议，起草政治纲领、宣言和章程，酝酿盟的领导人，进行建立民主政团同盟的准备工作。三月十九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鲜特生寓所）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并成立了中央领导机构。会上推举黄炎培、张澜、左舜生、张君迈、梁漱溟、李璜、章伯钧、罗隆基、江问渔等十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并推选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至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不久，黄炎培辞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改由张澜担任主席。

张澜（1872—1955）四川南充人，字表方。清末秀才。辛亥革命前参加立宪派，为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人之一。曾任四川省长，成都大学校长、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救国会沈钧儒，原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起人之一。但有部分发起人认为沈钧儒和救国会与共产党关系密切，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反对，不同意他们参加。至一九四二年初，经多数人同意沈钧儒和救国会才正式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民主政团同盟，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①]，除少数为无党派的个人盟员外，它主要的是由三党三派组成，包括第三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救国会，中华

①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即民主政团同盟有两种盟员，一种是有其他党派关系的盟员，一种是没有党派关系的盟员。凡是加入盟的党派的成员都有两重党籍。既是民主政团同盟的盟员，又是另外一个独立政党的党员，他们不受盟的组织纪律的约束。因此它是一个松懈的政治团体。

参加民盟的各个党派和个人的动机及目的是不完全相同的。有的同情中国共产党、企图组织民盟，把国统区的中间政治力量联合起来，以对抗蒋介石的迫害，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有的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扩张第三种力量，以便利用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向国民党争取一些经济上政治上的利益；有的企图利用民盟，捞取政治资本，准备在相当的时机卖民主，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换取高官厚禄、国社党、青年党即属此类。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初期，青年党把持了民主政团同盟。青年党是一个比较大的政党，四川又是他的活动基地，而民主政团同盟又是在四川重庆市成立的，因此，最初盟的成员中青年党的人数较多，占的比例最大。在盟的中央机关中、青年党也占了多数，而青年党的负责人之一的左舜生又是民主政团盟的秘书长。民盟初期没有设立行政工作机构，一切事务均由青年党总部代办。张澜是四川人，又长期住在成都。因此，青年党实际上把持了盟务，这对民主政团同盟的发展和斗争均有很大的影响。

参加民盟的派别虽然很复杂，但民盟的阶级基础基本上是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并代表它们利益的政党。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绝大多数是有相当社会声望的中、上层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人依附于反动统治阶级外，大都受着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官僚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因而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积极性。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中间势力政治力量发展的一件

大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从此出现了一个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影响和力量超过以往任何中间性政党的新的政党，它是“民主运动的生力军”，它有利于民主势力，而不利于国民党顽固派。因此，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

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势力一向是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政策。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中央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的好转的指示》中指出“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极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毛泽东于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目前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中，正确地分析了中间势力的特点及其重要的政治地位，强调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日，中央统战部发出《关于统一战线工作部的组织和工作的指示》，要求自中央局至省或区党委必须设立统战部”，“负责进行各党派及地方士绅，名流文人的统战工作”。并规定要把各党各派，地方实力派，各种友军作为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邓颖超等同志对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十分重视，做了大量的艰苦的细致的工作，对各民主党派给予积极支持和帮助，在重庆经常同民主人士接触，不辞辛苦出席各界人士、各民主党派召开的各种集会，不分昼夜地接待这些人士的来访，参加他们召开的茶会、酒会，聚餐会、联欢会、报告会，向他们讲解国内外的政治形势，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他们的每一点进步，有利于抗日、有利于人民的言行，都给予鼓励和支持；对于他们的动摇态度则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广泛地团结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力量，大大地推动了各中间党派的联合。

中国共产党对民盟的成立十分重视。一九四一年十月在民盟正式宣告成立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作了报导，并发表了以《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为标题的社论，称赞它“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社论还强调指出，“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希望民主政团国盟纲领，对此亦特别加以注意。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上，从无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①。

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纲领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因此，必须在海外建立言论机关，宣传盟的政治主张，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为此，决定派中央常委梁漱溟赴香港办报。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日，梁漱溟到达香港后，会同曾琦（青年党）、徐梦岩（国家社会党）伍宪子（民主宪政党）、周鲸文（东北救亡总会）、张云川（第三党）等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驻港办事处的具体帮助下，于九月十八日在香港创刊了《光明日报》，做为民主同盟的机关报，梁漱溟为社长。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启事”,向中外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业经在重庆成立,并刊登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同时，由陈友仁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文件翻译成英文，向英美各国在港的各大通讯社记者作了介绍，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国民党顽固派十分恐慌，千方百计地封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消息，国民党中宣部训令国民党各报刊不准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消息和评论。国民党政府立法

①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院长孙科在香港大肆造谣，说梁漱溟在香港是招摇撞骗，在重庆根本没有民主同盟组织，“绝无其事”，并发动国民党在香港的报刊谩骂民主人士为“第五纵队”，策动香港殖民当局搜查《光明日报》。为了公开盟的组织，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中伤，争取盟的合法地位，在重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总书记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四人出面，邀请国共两党的代表和国民参政会中的部分民主人士，开了茶话会，报告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经过及其政治主张，正式公开宣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国民党的参政员王世杰等，共产党的周恩来都出席了茶话会。从此，中国民主同盟以中间党派的身分，公开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纲领，原定为十二条，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正式发表时作了某些修改，并由十二条缩减为十条。（称十大纲领），其主要内容有：“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是协议机关”；“加强国内团结，所有党派最近不协调之点，亟应根本调整,使进于正常关系”;厉行法制，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反对一切非法之特殊处置”；“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① 等主张，它充分表明，中国民主同盟是力主继续抗战，反对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投降，主张团结，反对分裂，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这在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对日妥协，实行反共反人民，消灭异己政策的形势下，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同时又提出了‘确立国权统一,反对地方分裂”;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② 的主

①②《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张。还认为，“中国之兴必兴于统一；中国之亡必亡于不统一”，而统一之道，在于必须实行“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① 在蒋介石打着国民政府的招牌，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的条件下，空谈统一，不指明在什么基础上统一，又将“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并提，不讲清二者的关系，这无疑是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发展人民军队的主张，它在客观上，是有利于蒋介石的。综上所述，它是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益的政治纲领。

①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第十二章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斗争

第一节　国民党顽固派坚持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

一、国民党顽固派强化法西斯统治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在国统区的反动统治，极力强化它的法西斯统治，国统区的政治更加黑暗和腐败。

政治上，蒋介石利用民族抗战，一致对外的形势，由进一步扩张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到完全建立起个人独裁统治。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逝世之后，九月六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掌握全国一切军政大权，可以兼任任何职务，包括行政院长及其他一切职务。十三日，选举蒋介石为国府主席并兼任行政院长，继续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此，蒋介石就成为一个独掌全国党政大权的最大独裁者。

国民党顽固派为了维护其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强化了特务统治和保甲制度。国民党为了扩大其党羽，在抗战后提出了“全国党化”的口号。宣扬“中国人都有加入国民党的权利与义务，中国青年都有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权利与义务”，到处推行“集团入党”、“举手入党”的办法，使许多青年糊里糊涂地成了国民党的成员或三青团员。在此同时，国民党还推行“全党特务化”以加强其特务统治。国民党规定，国民党员、三青团员随时都有加入特务组织、接受特务训练，干特务工作的义务，它每年支出庞大的特务经费，增设了许多特务机构。一九四三年聘请美国特工专家，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以戴笠为主任，美国军官梅乐斯为副主任，参加这个“合作所”的美国特务就有一千多人。国民党经常以诱骗的办法，迫使社会青年充当特务。国民党不仅在机关、军队、学校、工厂、社会及职业团体中建立特务组织，布置特务网，还在全国许多地区设立集中营，囚禁和残杀共产党员、抗日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如上饶集中营、重庆磁器口集中营、贵州息烽集中营、西安集中营等。国民党特务在国民党统治区横行无忌，任意捕杀人民，造成一片恐怖的黑暗世界。

国民党的党化势力，也伸展到了农村的保甲机构，国民党部及其特务系统成了保甲的实际操纵者和指挥者，区乡保甲长必须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县、区党部、特务机关可以直接命令联保主任、保甲长为非作歹。得到国民党及特务机关支持的保甲长横征暴敛，作威作福，欺压百姓，鱼肉人民。

一党专政、特务统治、保甲制度，三位一体互相结合，互相渗透，构成了中国封建法西斯的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特务统治是保证一党专政的工具和手段，保甲制度是实施一党专政的基层机构，一党专政则是特务统治和保甲制度的基础和灵魂。

在这种反动统治下，国统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人身居住、信仰等基本自由被剥夺净尽。一九四二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规定国民党政府对封锁工厂、罢工、怠工和其它妨碍生产之行为，可以“禁止”。“政府于必要时”，“得对人民之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加以限制”。这些反动措施本来是国民党政府早已做过了的，在这时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表明它对人民的政治权利更加露骨的野蛮的剥夺。据统计，仅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就查禁了进步书刊一千四百余种。同时，对许多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加以迫害，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办的《新华日报》经常被禁止发行，销售该报的报童，时常遭到特务的毒打和绑架。

国民党顽固派对学生和教师实行法西斯的统治政策。国民党在中等以上的学校建立特务性的“导师制度”，使有特务身份的国民党员担任主任导师或训育主任。他们经常向学生灌输法西斯思想，对学生的思想进行严格的考察和监视，如检查日记，检查文件等等。全校上下，满布特务，以致教师不能自由讲课，学生不能自由讨论，出墙报、刊物要经过审查，开会要经过批准。课后的一切政治活动，则被严厉禁止，教师和学生不仅没有学术思想的自由，而且人身的自由保障也没有。一九四三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命令各省教育厅转饬中等以上学校，凡有不遵守校规及“思想不纯洁”的学生，无须开除，应交青年训练团（即劳动营之别名）以特别训练后，分发补训处充当壮丁[①]。就是说国民党顽固派对于不满法西斯统治而表示反抗、拥护抗日的进步青年，可以公开地把他们抓到劳动营里去。国民党就是凭借这一反动制度，对人民进行了残酷的统治和压迫。

① 《新中国日报》，1943 年 5 月 30 日。

经济上，国民党统治集团打着抗日需要的招牌，利用反动政权进行毫无限制的残酷掠夺，使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官僚垄断资本，得到了进一步的恶性发展，垄断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整个国民经济。从一九四二年起，国民党政府实行专卖政策，以低价强制收购糖、盐、火柴、卷烟等专卖物品，转手在市场上高价出卖，谋取暴利。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期间共发行法币十万零三千一百九十亿元，它的发行额较之战前，增加了七千三百倍。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公债十七种，数额巨大，由于通货膨胀，人民手中的债券，几乎成了一张废纸，这无疑是对广大人民一种赤裸裸的掠夺。

抗战期间，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由金融垄断进一步发展到商业上的公开垄断。它们先后成立了国民党政府的贸易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专卖事业管理局、花纱布管制局等机构。假借抗战的名义，垄断了国统区的对内对外贸易。同时，四大家族还以私人名义设立了不少商业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及其巨大的金融势力，从而造成具有操纵市场的垄断地位。在工业方面，它们乘民族工业之危，大肆掠夺吞并民营工业。四大家族为了强化其工业上的垄断地位，逐步把官办工业纳入资源委员会与兵工署两大直属系统。据一九四三年国民党经济部的报告，官营工业资本额占资本总额百分之六十九，民营的只占百分之三十一。在农村，奇重的田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对农民的剥削量，高达占农民的收获量的一半左右。高利贷的重利盘剥，农产品的低价征购，再加上拉夫抓丁，天灾人祸，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民族工业生产也处于严重的萧条、破产的境地

国民党各级官吏大发国难财。至抗战后期，国民党大官僚仅在美国、巴西、瑞士的存款即高达五亿美元，如按一九四四年九月的美金黑市价格计算折合法币三千亿元，如动用这部分存款

可以装备三百个机械化的国防师。同年九月，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动用中国人在美冻结的存款三万万美金作抗战之用”的提案，虽在形式被通过，并得到了国统区舆论界的支持，但仍被他们厚颜拒绝。国民党各级官吏，勾结奸商，囤积居奇，营私舞弊，利用地位，贪污受贿，更为严重。据一九四三年三月舆论界的揭露，官僚们在昆明囤积的物资，足供全省五年之用。一九四四年河南粮政局长兼第十五专员李杏村在日本侵略军进犯洛阳鲁山时，乘机将两机关公物盗卖，并捏报损失千余万元，而饱入私囊。又如一九四五年国民党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大贪污案，据该年三月二十二日贵阳《大刚报》的披露，已查有实据者，仅壹丙税一项即高达十五亿元之多。国民党各战区军官贪污现象也极为普遍和严重。如就地抽税，敲诈民财，虚报兵额，克扣军饷，走私贩毒，屡见不鲜。国民党官僚们榨取了人民的大量财富，过着穷奢极侈，荒淫无耻的生活。如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在美国银行存款早已高达一亿美元。据一九四三年的统计，在昆明市内拥有四亿元法币以上的财产者，有十四人，拥有一亿元法币的计有一百四十人。他们穿的是十几万元一套的衣服，住的是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元一座的洋房，吃的是美国桔子，美国白菜，喝的是三千元一瓶的白兰地酒。据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长沙大公报的揭露，“把孔小姐结婚所耗，如用来作军服，可以解决二个师人的全部军服，或五十个伤兵医院的全部伤兵衣服，如用以救济饥民，则一万个饥民可以起死回生”。

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垄断的加强，生产力的破坏，造成了国统区的严重经济危机，广大人民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

二、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

国民党统治的日益腐朽和反动，引起了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端不满，强烈要求结束独裁政治，实施民主宪政。因而使得一度消沉的宪政运动，从一九四四年起，又逐渐活跃起来。一至三月在重庆经常召开讨论宪政，议论国事的座谈会，批评国民党的“五五宪草”，呼吁开放党禁，实施宪政，保障人权，改革政治。同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国民党允许在抗战胜利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和实施宪政，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拖延时间，稳定国民党的统治。但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宪政，就有可能冲破国民党的限制，把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参加这一运动，并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在自己的周围，以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实施宪政，就要先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开放党禁。“有了民主自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绝的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周恩来的演讲，指明了宪政运动的方向，推动了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八日，重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沈钧儒（救国会）、章伯钧（第三党）、张申府（救国会），联合举行文化界招待会，宣布要求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要求民主改革。五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揭露了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的反动本质，尖锐指出：“假定一个国家，其国民不能自由发表负责的言论与主张，不能合理的批评政治的措施与人事，其新闻的纪载只能限于好的一面，而绝不许暴露坏的一面，这个国家便不是民主国家。又假定一个国家，除掉一个在朝的执政党而外，绝对不许其他在野的党

派合法的存在……，从政治的活动上限制他们，这便更不是民主国家。更假定一个国家，其人民的身体自由毫无切实的保障，可以由若干秘密的或来历不明的机关非法拘捕，非法处死，甚至不知拘捕于何地，幽禁于何所，处死于何时……，这更不仅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是一个十足的反民主的国家！”为此，强调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民主体系的形成已刻不容缓，万万不可向后推宕”。并提出，实现民主的起码条件是国民党‘放弃十余年来的特殊地位”,结束训政“无保留无犹豫给予人民以各项基本自由’①。

与此同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纷纷组织宪政实施协进会，民主宪政促进会，民主宪政座谈会。一月到五月，每月于重庆召开民主宪政座谈会。沈钧儒、黄炎培等联络广大民主人士讨论《五五宪草》，抨击国民党的寡头专政，要求“主权在民”。五月二十日，重庆宪政月刊社宪政座谈会上工业界人士吴羹梅提出“政治民主是工业生产的绝对必要条件，没有它，一切都无从谈起”②。中国全国工业协会也发表宣言，要求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九日，黄炎培在重庆复旦大学讲演，呼吁全国人民要努力争取民主，要造成广大的民主运动，要为民主拚命，求得民主政治的早日实现。他说：“民国的招牌已挂了三十三年，宪法仍是没有颁布，宪政仍是没有实施”，“要民主成功，要我们‘求,得有力 要成功得快,一定要‘求,得热烈烈。要想彻底成功,也得拚命地‘求,。’”他还指出“政治问题,不是少数人可以解决的，少数人来‘求，也不成，必须成为一个大的运动才

①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② 《解放日报》，1944 年 7 月 10 日第二版。

行。’①

六月二十日由张澜等人组成的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召开大会，对国是提出十项主张。强调“非立即实行民主，不足以团结各方，争取胜利。”要求（一）切实实行民主，“尊重人民言论之自由”；“人身之自由”；“思想信仰及一切集会结社之自由”；（二）刷新政治，“给予各级民意机关以必要的权力”，“切实改革征兵、征实、征税之弊端，严惩贪污，杜绝中饱，革除苛扰，以减轻人民痛苦；（三）实施全民动员；“组织人民，武装人民’②。

在昆明由一些名流教授创办了《自由论坛》，“鼓吹民主”，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专制主义，喊出了我们的需要“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的口号。此外，各地方报刊，如《华西日报》（成都）、《云南日报》（昆明）、《秦风日报》（西安），也都纷纷发表评论。要求民主改革，开放政权，实行宪政，动员民力，改弦更张，挽救危机。

争取民主，实施宪政的要求，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热烈响应，桂林、成都、昆明等地的大学生纷纷举行座谈会、讲演会，要求改革政治，实行民主。在“七七纪念日”时，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西南联大学生联合举行“时事座谈会”，到会除各校学生三千多人外，尚有闻一多等六位教授。讨论多集中在要求改革政治问题。闻一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抨击了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军事的大失败，痛斥了国民党当局“隐讳痼疾，粉饰太平”的做法，号召青年‘闹’起来；“打破可怕的冷静！”

民族工商业家也参加了这一斗争。五月间，中国西南实业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商联合会以及中国生产促进会等五个工业团体联名起草“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

①《解放日报》，1944 年 6 月 2 日第二版。
② 《新中华日报》1944 年 7 月 3 日。

建议书”，送交国民党十二中全会，要求国民党改变政策。五月二十四日章乃器、吴蕴初、吴羹梅等八十九位工业代表，又在重庆集会，一致呼吁，要求政治民主，生产自由，取消统制政策。九月一日，黄炎培、章乃器等三十人在《国讯》及《宪政月刊》上同时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政府在此外患深急之时，“与民更始”，“一新政策”。并提出九项主张，提出及早实施“人民渴望之民主制度”，“不惟其名，务求其实”。要求给产业界以一切解放”，“维护其一线生机”。

上述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情况表明，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已经深刻认识到，在国民党法西斯的一党专政的统治下，非改变现状，实现民主政治，决无出路。他们的一些要求主张，虽然还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但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认识已比抗战初期有很大的进步。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于国民党的反动独裁统治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但这一运动在当时还存在着力量分散，目标不够集中，不够明确的弱点。

第二节　国共谈判。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口号，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

一、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一九四三年以来，西方的法西斯德国在苏联红军的重大打击下，逐步败退，注定了最后失败的命运；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上的战争也节节失利，开始走向崩溃。国

民党顽固派在这种空前有利的国际形势面前，一则一喜，一则一惧。喜的是他们以为希特勒德国一旦被打倒，英美就可以腾出手来替他们打日本，他们可以不费气力地打败日本，搬回南京。惧的是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一齐垮台，进步和解放的潮流会冲击他们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使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为了在抗战胜利之后仍能维持和扩大其法西斯统治的需要，国民党顽固派丧心病狂地又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三年三月，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制造舆论。

《中国之命运》一书，极力宣扬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恶毒诬蔑共产主义，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说：“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抄袭这样的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就是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蒋介石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才是有用的。蒋介石恶毒的诬蔑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军队和抗日根据地政权是“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决心要在“二年之中”把它铲除。他杀气腾腾地说：“大家如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根本没有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无论怎样宽大，决不能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合理的方法了。”

该书发表后，国民党动用各种宣传工具，掀起一片反共声浪。六月，国民党顽固派又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指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假冒“民众团体”名义，召开会议，发表通电，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退出边区”，国民党反动报刊大肆散布中共“应放弃共产主义”，“取消陕北特区”，“从新改编各地之‘红军’”的反共言论。

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反革命舆论准备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它反共的军事部署，六月十八日，胡宗南在陕西洛川召开军事会议。会后，国民党河防大军纷纷西调，粮弹运输络绎不绝于途。这时，集中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多至四、五十万人，准备分兵九路，闪击延安。七月七日胡宗南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陕甘宁边区人民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给敢于侵犯边区的顽军以迎头痛击。七月四日和六日，朱德总司令分别致电胡宗南、蒋介石，严正抗议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活动，九日，延安三万民众举行万人大会，要求边区人民行动起来，保卫边区，并向全国发出呼吁团结，制止内战的通电。刘少奇在大会上发言，号召边区人民要准备好，“给进攻者以迎头痛击”。贺龙在会上呼吁全国团结抗战，同时宣告，人如犯我，坚决自卫。晋察冀举行万人大会，刘伯承号召太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内战。太行分区举行干部动员大会，邓小平抨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其他各解放区的军民也纷纷举行集会，发表通电，声援边区，坚决要求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内战阴谋。七月十二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质问国民党》的社论,历数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并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指出：国民党“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这两种错误，都是滔天大罪的性质，都是和敌人汉奸毫无区别的”。并正告国民党必须撤退进犯边区的部队，纠正错误。

于此同时，为了戳穿蒋介石的谎言，彻底剥夺他的反动思想武器，更有力地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

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中国共产党人指出,蒋介石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封建主义同外国法西斯主义的大杂烩;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行动上“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①;蒋介石的历史观“是一套复古的封建思想,反映着浓厚的剥削阶级意识”②;蒋介石的国家观,是“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之实”,是“新专制主义的个人独裁,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务统治。”③

《解放日报》还用事实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作用。指出,任何人休想“取消它,解散它”;“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④。

中国共产党人还批驳了蒋介石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歪曲。指出“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状,积累了中国二十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外曲折斗争中形成起来的”;“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⑤。它恰恰是“为中国而学亦为中国而用”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还严正指出:“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中国土地上生根共产主义了。谁要想来摇撼它,谁就会自趋灭亡。”⑥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之命运》的批驳,揭露了蒋介石宣传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对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有力还击。

①②③《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4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④《解放日报》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1943年8月25日。
⑤ 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1943年7月8日。
⑥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不仅激起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同时也遭到了国统区一些抗战党派的指责和国际舆论的反对。如职教社主办的“国讯”，即曾呼吁“每人把他所有智力和体力”，“尽量贡献给中华民族生存的抗战”，反对把力量消耗在内战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致书蒋介石，正告他“正应共同抗战，共同建国，以力求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而达到将来世界之大同，尚何凭借武力以为内争之有？”① 苏联报刊尖锐地指责国民党的这些反共活动，是帮助日本侵略者征服中国，甚至美国的报刊也批评国民党抗战不力和挑起内战之非。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充分准备，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对于国民党反共逆流的坚决揭露和批判，赢得了国内外舆论同情，使其陷入空前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感到如再一意孤行下去，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此，不得不停止军事进攻。九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宣称：“中共的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随后，国民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恢复了同共产党的谈判。

二、国共谈判。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国民党对成立联合政府的阻挠

在解放区战场对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局部反攻节节胜利的时候，国民党战场上却出现了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大溃败。日本侵略军为了救援其侵入南洋的孤军和准备以中国大陆为它垂死的挣扎基地，急需打通从中国东北直到越南的铁路交通线，于是在一九四四年春发动了豫湘桂战役。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日本侵略军开始了对国民党统治的

①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致蒋介石书》，《中国民主同盟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河南地区进攻，在仅有敌军五、六万人的进攻下，几十万人的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结果使日军很快地攻占了郑州、许昌、洛阳等地。在历时三十七天的战役中，国民党丢失城市三十八座，损失兵员二十多万。

河南战役后，日军又调集十万兵力，开始对湖南发动进攻，拥有四十万人的国民党军队，遇敌即溃。五月二十七日，敌军在岳阳以南突破国民党第一道防线，接着相继攻占长沙、衡阳，并沿湘桂铁路向广西进犯，发动对桂北攻势。国民党军队依然不堪一击，十一月十日，日本军攻占桂林，第二天即攻陷柳州。日军从柳州南犯，与其由越南北犯的敌军会攻南宁，二十四日国民党守军弃城逃跑，十二月十日，两股敌军在南宁会合。至此，日本侵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目的告成。

在豫湘桂战役短短的八个月时间内，国民党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分，丢掉了洛阳、长沙、福州、桂林四个省会和郑州、许昌、柳州、温州等一百四十六个中小城市，丢掉了七个空军基地及三十六个飞机场，丧失国土二十多万平方公里，使六千万人民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正是它在政治上极端腐败的反映，国统区人民不堪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奴役，掀起了一个广泛地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争。

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克服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尽可能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国共合作，争取继续抗战，团结和进步，做了大量的工作。曾派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同国民党谈判，解决全国政治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仍然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于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冬，两次派代表到重庆同国民

党谈判。但因蒋介石顽固地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谈判始终未获结果。

一九四四年春，在日本侵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开始不久，四月下旬中共中央派林伯渠为代表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五月二日至十六日，首先在西安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作了初步的商谈，后至重庆继续谈判。

在西安谈判中，林伯渠提出以周恩来三月二十二日演说的基本精神，即要在全国实行民主政治，要循民主途径，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问题为谈判的基础①。但国民党代表反对就实行民主问题进行谈判，主张先谈军事及边区问题。

第一、关于编军数目问题。林伯渠提出，共产党领导的分散在敌后的正规军四十七万七千多人，都是久经对日作战有成绩的部队，要立即予以编整。为使问题易于解决，可先给予六个军十八师的番号，而国民党代表只同意编四个军十二个师。

第二、关于边区问题。林伯渠提出，区域及现行民主制度不变，要求国民党撤除对边区的军事、经济封锁。国民党代表提出，把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要实行国民党政府的法令，只答应给边区以商业交通的便利。

第三、关于党的问题。林伯渠提出，必须予中共以合法的地位，停止捕人，停扣书报，开放言论。

双方经过五次会谈，最后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记录，双方签字，各报其中央，由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林伯渠按双方约定首先在记录上签字，国民党代表毫无诚意，却违背诺言，最后拒绝签字。

① 1944 年 3 月 12 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原文载 1944 年 3 月 14 日《解放日报》。

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到重庆后，共产党中央于五月二十一日电示林伯渠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关于解决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其主要内容为，关于全国政治制度者三条：一、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承认中共及其他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实行名符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关于两党悬案者十七条，主要有：关于编军，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并给以给养、军火医药等接济；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政府；撤销对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停止对敌后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进攻；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中共、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称号；停止特务人员对中共、八路军、新四军与各抗日根据地的破坏活动；停止在报纸上对中共的造谣；释放各地被捕人员，停止对《新华日报》无理检查等等。

但国民党顽固派在林伯渠来重庆之前，即在国民党内部安排了破坏和谈的根本对策。首先诬蔑共产党谈判代表来重庆是“作政治攻势”、“是要作一猛烈的政治宣传”，是在于“将中国战场的弱点暴露于世界”，“乃以谈判不成为目的，决不以谈判成功为目的”①。因此，他们对于和谈确定的对策是“注重其宣传性，而不期待其成功”、“原则上坚持，俾中外人士理解”、“对具体细目表示无不可以商量之态度”②。即在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拒绝民主改革问题上，要顽固地坚持，在一些小的问题上虚于应付。不仅如此，他们还布置了监视林伯渠在西安及来重庆后的活动计划：

①② “林祖涵来渝事应付之要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档案（一）（三）282，转载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第二十四册，第32489-324092页。

“(一)即电西安报饬注意林到西安后之活动,并派员随车来渝，注意其在途次之动态与表现。

（二）到渝后，借招待之名，指定住所，派宪兵担任警卫，借以监视其行动。

（三）发动与林过去有友谊关系的之党国元老与之来往以感动之，设法使其表示愿意脱离延安。

（四）派精通外语及有政治修养之干部，充任对林招待，经常随林出入。

（五）控制其与外人接近，其与外人谈话，事先予以劝导，不得违背国家民族立场”。①

因此，国民党顽固派在谈判过程中，毫无诚意，节外生枝。当将二十条提案于五月二十二日送交国民党谈判代表时，他们声称“条文如此写法,无异暴露国民党之罪状”,拒绝转达。之后，林伯渠又根据中共中央的复示，将二十条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改为口头要求，于六月五日送交国民党谈判代表，但仍拒绝转达。经多日争执，六月十五日始允转达。于此同时，国民党代表也向共产党代表面交一份国民党政府的提示案。该提案顽固坚持法西斯独裁制度和消灭异己的方针。强调所谓“军令政令之统一”“限期取消”五分之四以上的卓有战功的八路军，新四军。把抗日根据地人民选出来的民主政府“一律由各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这个提案，是共产党所绝不能接受的。

这样，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以致经过四个半月的谈判，任何问题都未获得解决。

一九四四年九月初，国民党在重庆召集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开幕。这时，国民党战场继豫湘战役溃败后，桂林又告危急。

①《林伯渠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档案（一）（三） 282

国民党军事上面临崩溃，政治与经济危机也到了无法掩饰的地步。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国民党的寡头政治，彻底改变反动政策，彻底改组国民党政府，把那些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驱逐出去，挽救国家的危局。九月十五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参政会上报告了四个半月来国共谈判的经过和失败的原因，正式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召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十月十日，周恩来在“如何解决”的讲演中，进一步阐明了召集各方代表，开紧急的国事会议，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第一、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国共两党及其它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分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及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三方面）、各地方政府（分大后方各省及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两方面）、各民众团体（分大后方及敌后解放区带全国性的各界人民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第二、国事会议，应于最近期间召开。第三、在国事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错误政策。第四、在众所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吸收全国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各方领导人物，罢免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分子，以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第五、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第六、在联合政府成立后，应即着手筹备真正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①。周恩来强调指出：必须成立真正的民

①周恩来：《如何解决》，1944 年 10 月 10 日，《解放日报》，1944 年 10 月 12 日。

主联合政府，只有这样，“才是全国民主的真正起点”。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反映了当时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愿望，给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获得了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响应。

三、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民响应共产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的积极响应，掀起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的斗争。

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某些地方实力派，都在不同程度上投入了这场斗争。九月二十四日下午，在重庆迁川大厦礼堂召开了有五百名参加的集会。参加大会的有各党派各阶层的代表人士。如各党派的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章伯钧、李璜、左舜生等，国民党冯玉祥、覃振、邵力子、孔庚，工商界代表胡子婴等。与会人士纷纷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会上揭露国民党一党专政造成的恶果，强调了实行民主的重要性。他说：“民国已经三十三年了，我们还是有名无实，这是多年来一党专政的结果，是治日少，而乱日多。如今弄到政治、军事、经济各部门都陷入十分困难之中，非实行民主来唤起民众，团结官民，修明内政，不足挽救危亡。时间不等人，我们将来要民主，而目前挽救危亡，尤其需要民主”①。冯玉祥说“民主就是人民是主人的意思”；“今天如再没有新的改革，亡国之

① 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集会要求改组政府的消息报导，《解放日报》1948年10月17日。

痛,就在眼前。”①

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说:“现在要实行民主,只有靠人民自己起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举行国是会议,民主同盟各党派及一切民主人士共同主张召开各党派会议,实行联合政权这一条路,这是国内的舆论!”中国今天有强有力的共产党,有强有力的民主同盟,只有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②李璜发言,着重指出实行民主的三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是言论自由;第二个是身体自由;第三个是集会结社自由③。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说:“大家所讲联合政权,国民会议,其实都很平常,容易做的,问题在政府能否接受”④。他还提议立即成立重庆民主促进会。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说:“政府所要求人民的,人民都做到了。一千二百万壮丁,三千万石粮食,种种捐税都承受了。而人民所要求的言论集会结社三种自由,还没有得到。不实现这三种自由,不实现民主,中国就要亡国。但是光有这三种自由,今天还不能得救。一定要彻底改革。我们向参政会提出的是召开国事会议和联合政权。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动员起来,团结全国人民,把日寇打出去!”他的发言博得了与会人士的热烈掌声。

同日,重庆宪政月刊社举行座谈会,到会人士一致要求彻底改革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一)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集各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二)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职业、身体的自由,废除现行一切有妨碍上列权利之法令与条例;(三)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立即释放一切

①②③ 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集会要求改组政府的消息报导,《解放日报》1948年10月17日。

④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集会要求改组政府的消息报导,《解放日报》,1948年10月17日。

政治犯；（四）废除特务及劳动营一类的法西斯组织；（五）全国一切派系不同之军队，应本平等待遇之原则，统筹装备、给养、训练、补充之公平，以求得作战指挥之统一，并渐进于军队国家化之正轨；（六）财政绝对公开，凡国家之预算、决算及增加人民负担的各种措施，须交民意机关审查通过；（七）立即停止党化教育，保证讲学自由，保障学生读书、阅报的自由，不得根据党见，加以取缔；（八）保障人民之最低生活，改善士兵及公务人员之待遇，对战时战后受灾人民，尤应统筹统一救济；（九）促进中苏邦交，加强对英美及其他盟邦之联系，以期彻底合作①。

同一天，昆明五千余人举行纪念双十节的群众大会。会上，李公朴、闻一多、罗隆基等呼吁全国一致要求国民党必须立即建立联合政府，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和人民身体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立即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立即彻底改善财政及经济政策；彻底改善士兵待遇，调整军队编制，普遍平均分配全国军队的装备与供应。十月二十五日，由宋庆龄、于右任、张澜、章伯钧、林祖涵、马寅初、郭沫若等七十二人发起重庆各党派各阶层数千人举行追悼邹韬奋大会，与会的许多人士大声疾呼，“现在是向法西斯进军的时候了”！

中国青年党在十二月二日，发表“对时局宣言”及“告全党同志书”，提出立即宣布结束党政，由各党派参加制定战时约法，并依约法成立民主政府。中国国家社会党张君劢发表文章，认为建国之能否成功，取决于国共关系，而解决的办法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应宣布军队专司国防，不事党争，各军饷械待遇，一视同仁”；“于此时将国民党所居之特殊地位及早改变”；“承认民国之为民国的民国，主权在民之原则，顺之此者存之，逆之此者去之……

①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以必达于民主政治之正轨”①。

中国人民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在一九四五年《新年希望》一文中，要求改变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机构，使“举国一致的政府能早日实现”。张申府在“一个呼吁”中，提出应即由各党派及其他社会有力人士，开诚协商订立共同纲领，成立举国一致的统一政府，并“由此统一政府切实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②

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发表的元旦献词中，提出召开紧急时局会议，“树立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最高国策之各党派的民主统一政府”③。

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和一部分工商金融界人士等共六十余人，在一九四五年元旦发表《为转折时局献言》，呼吁国民党与各党各派切实合作，挽救时局危机。国民党内民主派，李济深、冯玉祥也因对蒋介石集团控制和消灭异己的政策表示不满，拥护废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广大工人学生还举行了游行，民主运动出现了新高潮。

国民党顽固派极力压制广大人民立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一九四五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用召开所谓国民大会的空言，来平息众怒，抵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说什么“一俟我们军事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及时“召开国民大会”，“归政于全国的国民”。共产党立即揭破了蒋介石的欺骗，一月三日新华社广播了“延安权威人士评蒋介石的元旦广播”，指出国民党政府曾开过很多“开国民大会，开始宪政”的空头支票，一次也不兑现。事实上，不先消灭寡头专政，

①张君劢：《国共问题公开报告以后》，《民选杂志》第十一期。
②《新华日报》，1945 年 1 月 4 日。
③《新华日报》，1945 年 1 月 1 日。

彻底改组国民党政府，消灭特务机关，也不可能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而只能是袁世凯、曹锟所开过的那种洪宪国会猪仔国会。

虽然国民党以全力反对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中共中央仍以极大的耐心和努力来促其实现。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由延安到重庆，向国民党和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并同国民党的代表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就联合政府问题进行了谈判，但国民党的代表却诬蔑中共“要建立联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开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三月一日，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讲演说：共产党最近要求中央立即取消党治，将政权交给各党各派组织的联合政府，“而我们政府的立场是：准备容纳其他政党（包括共产党）与全国的无党无派的有志之士参加政府。但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决定权，移交各党各派，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理论与事实而不相容的局面”。他还说：“吾人只能还政于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派会议，或其他联合政府。”还说什么组织联合政府，将招致抗战失败，国家紊乱。最后他声称，要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顽固地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蛮横地拒绝了全国人民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正义要求。

中国共产党在三月二日立即通过新华社给蒋介石的演讲以严厉的驳斥，指出“蒋氏这个演讲鲜明地反映了国民党内最反动集团的立场和企图。”是‘专制主义者的一篇低级遁词”。

蒋介石的全篇演说，“其主要不外：一、坚持党治，严拒民主的联合政府；二、曲解国共谈判经过，诬蔑中国共产党；三、玩弄所谓‘还政于民’与‘召开国民大会’的无聊戏法，保持其法西斯

独裁”。

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虽然被国民党顽固地加以拒绝，但是它为全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吸引着各阶层广大群众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从而把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一九四五年春，国统区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反对蒋介石独裁，要求抗战与民主，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声浪越来越高。一九四五年二月八日，马寅初在交通大学发表演说，强调“为今之计，唯有从速组织联合政府”。二月九日，美州十大华侨报纸通电国内，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目前立即建立全国联合政府”。二月二十二日，重庆各业青年包括学生、中小学教师、公司、工厂及机关职员等联名于新华日报呼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二月二十四日，成都《华西日报》又指出：“独裁必成为独夫，无存在余地”，“坚持独裁，结果只有与一般独裁者同其命运，而走向沉沦，特殊例外是不会有的”。二月重庆妇女界胡子婴、李德全、史良、刘清扬、刘王立明等百余人，重庆文化界三百余人，三月昆明文化界潘光旦、闻一多、罗隆基、光未然、曾昭伦三百余人，四月，成都文化界一百余人，先后发表联合宣言，一致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国事会议，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集会的规模由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发展到上万人，斗争形式由座谈会、讲演会发展到游行示威。五月四日，昆明近两万学生在举行纪念“五四”大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沿途高呼：“立即停止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取消特务组织”等口号。三月十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言人发表《对最近国内民主与团结问题的谈话》，重申民主同盟对召开国民大会的态度，并指出：九年前选举国民大会代表时，“国内除国民党外，各党派固无一能享有参与选举之机会；即平日在社会雅负时望之各界人士，如非早已取得国

民党党籍，亦绝少有被选为国大代表的可能；甚至即在国民党党内之若干贤达，对于当时选举之种种情况，亦有深致其不满者，凡此均属全国所周知事实，不容否认。今时移世移，合全国之力以与日寇周旋，为时已八年之久！世界民主高潮，既挟其排山倒海之力以俱至；而全国必须团结以共度此战时战后之难关，又实为时代之迫切要求；如置上举一切事实于不顾，仍举八九年所产生之旧代表，以之应付当前千难万难之新局面；则所谓民主云云，团结云云，岂不将徒托空谈？'①

在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中，各民主党派的一些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在认识上比抗战初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看到国民党的独裁腐败，对其已失去信心，而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同情，逐渐认识到民主是解决国内问题的先决条件，改变了抗战初期把民主与"统一"并提的主张，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就是这样的代表。他在一九四四年八月招待外国记者时指出："中国如不实行民主、任何政治问题、党派问题、经济问题、物价问题、抗战问题、军事问题以及其他一切社会教育文化问题，必都不能圆满解决'②。当然，他们所提倡的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他们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抗战与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及地方组织的建立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组织在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中有了较大的

① 《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对最近国内民主与团结问题发表谈话》，《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年版。

②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招待外国记者会上的谈话》，《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年版。

发展，以重庆、昆明两地为中心发展了一批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自由职业者在内的许多进步分子入盟。到一九四四年盟内无党派关系的盟员，大大超过了其他党派关系的成员，为二十与一之比。因此，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民主运动的需要，盟内无党派关系的盟员，强烈要求改变盟的党派联盟的性质，以利于壮大盟的组织。另外，民主政团同盟的初期，青年党把持了民主同盟。为了打破党派操纵盟务的局面，一九四四年，民盟的昆明支部向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建议，把原来的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民主同盟,把‘ 政团 ’两字取消,使民盟不是以‘ 政团 ’为单位的联合体，而是政治主张相同的个人的大联合。为此，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澜、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黄炎培、潘光旦等人，会议着重地讨论了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的问题。

会议经过了热烈而认真的讨论，决定为了发展民盟组织，取消了团体会员制，盟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取消“ 政团 ”二字，并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会议提出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等六个方面，这是民盟提倡的民主制度的具体化。

会议改组了民盟中央领导机构，选出了张澜、章伯钧、左舜生、潘光旦、罗隆基、李璜、沈钧儒、张申府、梁漱溟等三十六人为中央委员，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李璜、罗隆基、梁漱溟、张申府、曾琦、张君劢、张东荪、潘光旦等十三人为中央常委，并推选张澜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委员会主任，梁漱溟为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张君劢为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从此，摆脱了青年党对民盟的控制。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把三党三派的联盟改为有党派与无党派关系的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联盟，扩大了盟的社会基础，大大地推动了民盟组织的发展与巩固。

民盟全国代表会议后，盟的中央组织加强了对盟的组织工作的领导，吸收大批爱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入盟，有计划地在西南、西北、华南、华北发展地方组织，建立总支部和支部。据不完全统计，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全国约有盟员三千人，其中无党派的盟员约占全体盟员的百分之七十。在全国建立起来的地方组织，计有云南省支部、四川省支部、重庆市支部、广东省支部、华北总支部、西北总支部筹委会、东南总支部筹委会等。

第三节　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一、美帝国主义的扶蒋反共政策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英美和日本的矛盾，美国以大量的贷款、军火和训练军事人员援助蒋介石对日作战，以便牵制、分散日本在太平洋的兵力，保护美国的利益。从此以后，美国侵略势力就进一步扩张到中国来。

珍珠港事件后，一九四二年二月，美国立即给了蒋介石五亿美元的贷款。六月，在华盛顿签订了中美租借协定，规定美国以军火和军用物资供给国民党政府。同年三月，美国委派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企图把国民党的军队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以加强其“战斗效能”和监督美元使用的“效果”。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国民党空军与美国在华空军编成混合大队，由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兼国民党的空军参谋长陈纳德指挥。美

国还派特务头子梅乐斯来华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合作，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在重庆建立‘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以加强蒋介石的特务统治和为美国提供情报。

美国的对华政策，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承认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及其领导者共产党，主张和这个力量合作，以便利用中国人民的力量去抗击日本侵略者；另一种是不承认中国革命力量,只承认国民党政府,支持中国的反动势力,以便使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史迪威在中国的一些主张和做法就代表第一种意见。他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一九四三年九月就正式向蒋介石建议，把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几十万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都调出来打日本。为此，他还要求蒋介石拨出一些租借法案的援华物资，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某些地方部队。这个建议遭到了蒋介石的激烈反对。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反映了美国统治集团和国民党蒋介石的矛盾。但是，随着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展，随着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反共反民主，国共两党斗争的加剧，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愈来愈露骨地实行反共扶蒋的政策。

一九四四年，解放区战场取得了局部反攻的胜利，八路军，新四军及解放区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而国民党战场在豫湘桂战役中，却遭到了惨败。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对于美国在太平洋的作战是不利的，特别是使美国政府感到焦虑不安的是 “ 中国共产党已变成中国最有动力的力量 ”,而‘ 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日趋崩溃 ”,而在这两种力量的战争中,“ 共产党将必然会胜利 ”,因此,他们认为必须‘ 就中国境内实力的新形势加以调整 ”,为了扭转中国上述十分明显的政治倾向，加强中国对抗战的努力，减少美国对日反攻的困难,美国政府于一九四四年六月派副总统华莱士以‘ 调谐国际关系 ” 为名前来中国活动，对蒋介石施加一些压力，授意蒋介石与中共进行谈判，实行一些改革，以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

满。同年七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还以“阻遏敌军的深入”为理由，提出委派美国将军史迪威去统率中国的一切军队。

蒋介石虽然接受了美国要他同共产党谈判的旨意，但是，对于美国要他加强对日作战，进行一些政治改革的要求，是反对的，他仍然尽量避免对日作战，以保存军事实力，用来准备内战，并和史迪威在权利争夺上产生了冲突，因而要求美国撤换他。

一九四四年九月，美国反动军人政客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其主要任务有五项：（一）稳定和控制国民政府，“防止国民党政府的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作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委员长”；（三）缓和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使蒋介石“和美国司令的关系和谐”；（四）稳定国统区的经济，“增进中国境内战争物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五）“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①] 赫尔利的来华，是美国采取公开扶蒋反共政策的标志。

赫尔利到中国后，经过一个月的活动，以“总统支持史迪威则将失去蒋，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为由，建议罗斯福将史迪威撤换。十一月，史迪威被召回国，而以魏德迈为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员兼蒋介石的参谋长，赫尔利接任驻中国大使。此后，美国一方面大力支持国民党政府，积极扩张其侵略势力；一方面介入国共关系的“调停”，妄图帮助国民党取消中共武装，从而扑灭中国人民民主运动，破坏国统区的民主运动。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美国战时生产代表团由纳尔逊率领来华，帮助国民党政府建立战时生产局，并成立以“增产”军需品为主要目的的“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以增强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实力；十二月，在美国的帮助下，国民党政府于昆明成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美国直接掌握这个机构，并在它的主持下，用美械装备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 139 页。

和训练国民党军队。一九四五年一月，美国帮助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战时运输管理局”，控制中国的运输机构。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赫尔利以罗斯福私人代表、国共两党调解人的身份飞到延安，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他表示赞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计划。十一月十日，在延安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协议”，即五点草案。其内容是：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及共产党应通力合作，为击败日本而统一国内所有的武力，并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复兴工作。

（二）国民政府应即改组为一联合政府，由一切抗日政党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所派代表构成之，并应拟定及颁布一民主政策，就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各事项之改革方案予以规定。军事委员会亦应同时改组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由所有抗日军队派遣代表构成之。

（三）联合政府应遵照孙中山先生所倡原则，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联合政府所采政策，其目标应为：提倡进步与民主；主持公道及维护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并给予人民以向政府诉愿之权利，关于人身保护状之权利，以及住宅不受侵犯之权利。联合政府并应采取政策，俾前所规定之‘免除恐惧之自由’及‘免除匮乏之自由’,得以有效实施。

（四）一切抗日武装力量，遵守并应实施联合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之命令，并由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予以承认，所有获自友邦之军事配备，应公平分配与各该武力。

（五）中国的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政党的合法地位。’①

①《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 142、148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

同月，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与赫尔利飞重庆，与国民党政府商谈具体实现联合政府问题。这些协议虽和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有很大的距离，但如能在当时兑现，是有利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而赫尔利认为五点协议对蒋介石更为有利，让共产党参加政府，就可以使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以获得对共产党军队的控制权。他说，五点建议案“是共产党签定协议，将他们武装部队控制权交给国民党政府的唯一文件”①。

当赫尔利回重庆后，把五项协议向蒋介石转达时，蒋介石表示反对。他坚持要共产党先交出军队，然后再考虑作某些政治上的让步。因为，如果承认民主联合政府，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开放民主自由、取消特务制度，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就无法维持下去。而不等把共产党的军队骗到手，国民党的统治就可能垮台。这种情况，是和美国政府关于稳定和控制国民党政府的政策相违背的。因此，赫尔利回重庆以后很快地变了卦，转而支持蒋介石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提出了三点反建议。其主要内容是：（一）共产党必须“竭诚”拥护国民党政府，并把其军队交给它指挥，然后才允许一些共产党的高级军官参加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二）中共领导的军队，改编为“国军”之后，始可享受与国民党军队的同等待遇，方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三）国民党愿依其“抗战建国纲领”的规定，给各项民主自由以保障。但同时，又强调要“受抗战期间军事委员会需要之限制”。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则只字不提，是想用一官半职作钓饵，骗取共产党交出军队。

这个极端荒谬的反建议，当然不能被中国共产党所接受。十二月初，周恩来在返回延安以后，给赫尔利的信中严正指出：“在

①《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 142、148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

这些新建议里面，不可能找到基本的共同基础”。并表示拒绝回重庆进一步谈判。但从抗战大局出发，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再致函赫尔利，表示中国共产党不愿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上继续进行抽象的讨论。直截了当地提出四条要求，希望赫尔利转达给国民党政府当局，看国民党是否决心实行民主和团结。这四项要求是：“（一）释放一切政治犯；（二）撤退包围边区及袭击新四军之国民党军队和华南反共纵队；（三）废止一切限制人民自由之压迫性法令；（四）停止一切特务活动”。① 但赫尔利在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复函中，却声称四项要求不是一般“原则问题”,而是‘特殊细目”.他要求再就‘原则问题”上进行谈判。

一九四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同意重开谈判。二十四日，周恩来到重庆后，国共两党并有赫尔利参加举行了多次会谈。赫尔利与国民党策划了一个新的阴谋，即由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提出了在三点反建议之外的新的补充措施。即在国民党行政院之下，附设一个类似战时内阁的机构，作为行政院的“决策机构”，由七至九人组成，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均被“邀请参加”；由国共两党和美国军官各一人负责拟定改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计划；由蒋介石委派一名美国军官充任中共领导的武装的直接司令长官。

国民党妄图用所谓“战时内阁”这一党专政的民主装饰品，来骗取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政治圈套，同样被中国共产党所看穿。中共代表周恩来严正指出：国民党的建议，是“依然保持其对政府的控制”，反对成立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是准备把军队交给废止一党专政后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决不能把军队的指挥交给国民党；也反对只改编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全国的一切军队都应改编。中国共产党坚持只有在实现民主政治，建立民主

①《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4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1957年。

联合政府的基础上，才能谈“军事统一”，它使美国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无法得逞。

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利不得不撕破他那以“第三者”身份“调解”国共关系的假面目，公开对共产党施加压力。一九四五年二月，他写信给中共代表周恩来，公然反对中共提出的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应由各党派代表组成的合理主张。四月二日，赫尔利又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公开发表声明。一方面他极力为蒋介石涂脂抹粉，说什么“并无法西斯心理”，吹捧蒋介石准备召开‘国民大会’的目的是使国家走向‘民主政府’”另一方面，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有武装的政党’”，是‘统一’中国的障碍，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并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赫尔利的讲话，赤裸裸地宣布了美帝国主义的扶蒋反共政策。同时，魏德迈也训令美国在华武官，不许帮助那些不属国民党政府的个人或团体。

赫尔利在“调解”国共关系的过程中，忠实地执行美国政府的意图。正如他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所坦白承认的那样：“我深信我们的政府，在决定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领袖地位方面是对的。我没有同意过支持过我认为将削弱国民政府或蒋介石的领袖地位的任何原则或任何办法”①。

美帝国主义的扶蒋反共政策，助长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加深了中国内战的危机。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和《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两文中，深刻地揭露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玩弄的政治欺骗，指出了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他指出：“赫尔利蒋介石这一套，不管他们怎样吹得象煞有介事，总之是要牺牲中国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4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了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同时，毛泽东还正告美帝国主义，“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是注定要失败的。

二、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潮中，国民党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一日，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这次代表会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决定继续坚持其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拒绝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在全国人民要求实现民主团结，反对内战危机的压力下，国民党统治集团，装出一副“还政于民”的姿态，宣布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并由这个大会通过一部所谓“宪法”。事实上，国民党所召集的国民大会的代表，是早在抗战前包办选举和圈定的；这个大会所要通过的“宪法”，依然是以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由国民党公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五五宪草”为依据，国民大会的职权及其他职权也得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来决定。非常明显，这实际上是使要那个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强加在人民头上的、不合法的国民政府，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借以抵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维持独裁统治，制造内战的借口。

大会围绕着抗日和民主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国民党民主派屈武等人提出了《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反对以武力消

灭中共”，主张“在国民大会前，先承认各党派之合法地位与活动”。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发表了《向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要求国民党要‘放弃多年党治’;‘与全国抗战各党派共商解决国事’;主张‘政治的革新’;‘确遵民主的法治精神’,保障全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取消现存之特务机关及其性质类似的组织；“明令各党派合法的存在，以促进国家民主与统一”。这些建议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压制。在五月十日，大会举行军事质询时，一个代表（国民党中委王昆仑）提问：为什么大会“对于怎样打败日本没有什么讨论”;‘到底有没有抗战的决心?’的问题时，遭到蒋介石的破口大骂。

国民党的大会，既然在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违反了人民的意志，选择了独裁、内战的道路，它在大会所做出的民主姿态，显然的只能是一种伪善。蒋介石向大会提出：“本党在军队中原设之党部，一律于三个月内取消；在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改属于政府，担任训练青年之任务；在六个月内，后方各县市与各省临时参议会，应依法选举，俾成为正式民意机关；制定政治结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团体得依法取得合法地位；本党党部在训政时期所办理有国家行政性质之工作，于本届党代表大会休会后，陆续移归政府办理”。这如同国民党决定把他的政权交给他所制造的国民大会一样，把他的军队，青年团及其他行政工作，交给实质上毫无变化的国民党政府，使他制造的临时各省市参议会变为正式的。凡合乎国民党之法者，才得称为合法，否则均为非法。反对的,就是‘破坏统一’,就是‘妨碍抗战破坏国家’,就不合于‘政治结社法’。

在这次大会上，国民党通过了《政纲政策》，又一次虚伪地规定“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以及学术研究之自由”，这显然也是骗人的空话。事实上，就在国民党通过这个政

纲的同时，他们的集中营里，还在囚禁着许多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特务到处横行，人民毫无民主自由可言。

在这次大会上,国民党还通过了所谓“农民政策纲领”“农业政策纲领”“工业建国纲领实施原则”“劳工政策纲领”“民族保育政策纲领”等等。在国民党的政策纲领里规定：“都市土地，一律收归公有”；“一切山林川泽矿产水力等天然富源，应立即宣布完全归公”，“凡私有土地，应即速规定地价，照价征收累进税，并执行涨价归公”。这里所说的公有，实质上就是他那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法西斯国家所有，也就是以国民党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的私有。至于所谓“农地除公营者外，应以最迅速有效之方法，实行“耕者有其田”的规定，完全是骗人的谎言。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根本解决不了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他们和广大农民是根本对立的。

在国民党政策纲领里还规定：“凡有独占性之企业及为私人之力不能办者，均归国营或公营”；“原属民营之事业产量未足定额时，由政府筹措”。还规定要“以资金汇总之便利，水陆运输之协助，机器材料之分配”等办法，“扶助民营企业”。对于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来说，做出这样的规定，从表面上看是不可理解的，但实质上，他的真正用意在于限制和压迫中小资本家，是要利用官僚资本主义在金融、运输、物资掌握等各方面的特权，限制民营企业，以至侵吞那些企业据为己有。

在大会通过的《工业建国纲领实施原则》中，宣称要进行经济建设，培养技术人材，发展科学技术等等。实质上，他们的经济建设，主要是扩大四大家族官僚资本。

加强反共，准备内战，是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五月十二日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由潘公展作了关于中共问题的报告，他说：“与中共之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

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的体系，即创造斗争的优势条件与环境。故须从政治上、军事上强固党的力量。当前对中共之论争，应集中于反驳联合政府，反驳抗日战争中有两条路线的论调，反对中共具体纲领，与反对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①。十四日，蒋介石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说：“党内许多同志常夸大中共力量，……不知在某一定情况下，我们必消灭之’②！在十八日的大会上，又强调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③。于此同时，在会议中提出了大量的反共问题的提案。经议决成立一个“特种审查委员会”，由潘公展、王世杰、张治中三人组成，专门讨论反共方案。王世杰提出从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着眼，应对中共问题通过一个用政治方法解决的决议案。但为国民党内CC派所反对。认为这样做只有减弱党的力量，最后决定起草对内对外两个决议。由王世杰起草了一个对外的以“政治解决’的决议，即‘对中共问题的决议”另由CC派起草了一个对内的指导国民党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在其对外发表的《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中，以“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的幌子下，埋下了发动内战的伏笔。因为国民党可以随时假借“妨碍抗战，危害国家”的罪名向中共发动进攻。在其对内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中，则提出“努力奋斗，肃军肃政，加强力量”，以加强反共，准备内战。

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一条坚持独裁，准备内战，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路线。就在这次大会闭幕后的两天，

①② 张秋千：《重庆的喜剧——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内情》，现代史资料社印。

③张秋千：《重庆的喜剧——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内情》，现代史资料社印，

即五月二十三日，国民党顽固派就集中了三战区十个师的兵力，以上官云湘为指挥官，李觉为前敌总指挥，分三路向苏浙军区进犯，妄图将在该区的新四军一举消灭。新四军忍无可忍，起而自卫，苦战五昼夜，终将其击溃。在陕西方面，从七月十五日起，胡宗南调集了九个师的兵力，开到陕甘宁边区南线附近，准备大举进犯。廿一日，国民党军突然向淳化、耀县爷台山一带进攻。我军为避免内战，只进行自卫，未予出击。但国民党军队陆续增兵，大举进攻，八路军遂于二十七日奉命撤出阵地，爷台山遂告失陷。

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九四五年的春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处于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有了极大的提高。中共中央下设北方局、华中局、西北局、南方局，领导着全国的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也拥有一百二十一万党员，九十一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正规军，还有二百万民兵，十九个解放区，将近一亿人口，它已经成了全国抗战的重心和主力军。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仍然顽固地坚持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路线，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加强自己的力量，准备发动内战，抢劫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维护和重新建立它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使中国继续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因此，中国两种命运的斗争日益尖锐。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为了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准备发动内战，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阴谋，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的胜利，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反对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

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准备过程的。由于各种原因，它从筹备到正式召开，经过了七年多的时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和规定如何在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的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下，组织和保障中国人民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讨论新时期党的建设问题，总结“六大”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改造党的领导机关。为了进行大会的准备工作，政治局决定成立了一个以毛泽东为主席的有二十五人参加的准备委员会。

一九三八年的六届六中全会，继续讨论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问题。对召开七次大会的准备工作及其任务，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规定了各地参加代表大会的名额及其产生的办法。六中全会后，各地推选出来的代表先后到延安集中。由于后来“七大”的准备工作改由中央来做，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中央先后调回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北方局书记彭德怀以及彭真、陈毅等人回延安参加召开七次大会的准备工作。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七大代表都参加了延安整风学习运动，有一部分代表还参加了党的高级干部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整风运动重要内容的党的高级干部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学习讨论，宣告胜利结束。它为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四月二十一日，举行了第七次大会的预备会。毛泽东发表讲话，提出了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大会方针。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个前途，光明的前途和黑暗的前途；有两种中国的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七大的任务就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这也是全党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

大会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名，候补代表二百零八名，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十五人为主席团，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大会议程共四项，即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的军事报告、刘少奇的修改党章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的关于《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是会议的中心议程。

毛泽东在报告中，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抓住了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的根本关键问题，庄严地提出了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论述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两条不同路线，深刻地总结了抗日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党在当前革命阶段的总路线与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

关于国际形势。报告中指出，德国法西斯面临最后被消灭的处境，打败日本侵略者已为时不远，人民民主势力一定要胜利，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但是，战后的世界还将充满反法西斯人民大众与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与反民主，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的严重斗争，只有经过长期的斗争，消灭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巩固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

关于国内形势，报告指出：长期的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程度，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空前强大起来。有着强大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民主运动，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切比得上的。因此，人民的斗争，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可能是充分地存在着。但是另一

方面，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我们必须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去争取胜利。

政治报告指出，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两条不同指导路线的存在，即国民党消极抗战的反人民路线和共产党积极抗战的人民战争路线。正是由于国民党采取了对日消极作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招致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人民的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团结的被破坏”。国民党反动政策的总根源，就在于它坚持一九二七年发动内战以来的一党专政法西斯统治，代表一小撮中国大地主、大银行、大买办阶层的利益，企图在抗战中削弱和孤立中国共产党，使它变成了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共产党由于实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抗日的人民战争路线，不但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牵制了敌人的进攻，而且发展和壮大了自己。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成了全国抗战的重心和主力军。

报告在论述抗日战争中两条路线时，还强调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危险性。他们早已准备，“等候某一个同盟国的军队在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种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如果中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他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这种对形势的深刻分析和正确的判断，使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的人民对突然事变有了精神准备。

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克服黑暗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是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具体化。这条总路线包括三个基本要点：

第一、指明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奋斗目标，把抗日战争引向人民胜利的结局。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目标，必须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详尽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和现阶段的具体纲领，这些纲领应作为民主联合政府的共同纲领。

第二、指明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这个组织革命队伍的根本问题。壮大人民力量，主要是发动农民。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毛泽东全面阐明了农民在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工业市场的主体；中国军队的来源；现阶段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和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中国工人阶级人数虽少，但如获得农民这个最伟大的同盟军，就可以组织起雄厚的战斗力量，压倒一切敌人。他深刻指出，国共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来说，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问题上”。

毛泽东指出，强调农民的重要性，决不是忽视作为革命领导者工人阶级的力量，“在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收复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将起着极大的作用”。党要加强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人的工作，并准备好将来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

第三、指明了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加强党的领导，是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完成党的任务，报告总结了共产党建设的经验，强调了必须进一步发扬党在同各种错误倾向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作风，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

大作风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建设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基本经验总结。

修改党的章程，是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作了全面的总结。

报告指出，从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党内外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党，它又面临着新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六大”通过的党章已有许多部分不能适用。因此，有必要以十七年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经验，充实到党章中去，以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组织作用和领导作用，这就是修改党章的出发点。

大会讨论了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制定了新的党章。新党章对于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作风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新党章最显著的特点，是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新党章的总纲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对于中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新党章的另一个特点，是特别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

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必

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听取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刘少奇在报告中，把群众路线提到了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党的根本组织路线的高度，要求我们党的一切工作必须紧密地与群众相结合，使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得到发扬和广播。它对促进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新党章的又一特点，是对民主集中制及扩大党内民主和实行民主统一领导，作了详细的规定，增加了党员义务和权利的新条文。

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总结了党内生活中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批判了民主集中的个人专制主义倾向和极端民主化倾向。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就是集中的有权威的领导和广泛的党内民主相结合，把党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和党员的高度主动性相结合，它是增强党的战斗力，巩固党的统一团结的保证。

新党章的制定，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以及从组织上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均有重大意义。

党的“七大”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朱德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报告总结了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人民军队，实行人民战争的丰富经验，论述了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创造、发展过程及其在抗战中的伟大任务。提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实行从游击战争到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以迎接抗日大反攻。

在大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论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发展和斗争过程；深刻地总结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强调了对抗日统一战线内部要做阶级分析，要牢牢地掌握无产阶级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经过充分的酝酿讨论，选出了四十四名中央委员和三十二名中央候补委员，组织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中共中央主席。

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次大会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这次大会所规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和七月，先后发出了城市工作的指示和整训军队的指示，准备夺取敌人占领的大中小城市。在整训中逐步实行由分散到集中，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大反攻作准备。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在长达四千余公里的战线上，对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大大地缩短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进程。

八月九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号召全国军民加强团结，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敌人。从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大反攻阶段。

八月十日、十一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受降及配合苏军对日作战的七道命令。我军在东北、天津、归绥、太原、平汉、陇海、济南、胶东、津浦、沪宁、运河、广九前线对日伪军展开了全面大反攻。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九月二日，日本

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历时八年的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就结束了国共两党十年分裂内战的局面，开辟了中国革命历史新时期，民族解放战争时期。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有力地动员起亿万军民投入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推动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终于取得了近百年来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十三章

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第一节　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

一、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积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战后，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与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反革命内战，妄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恢复和加强它在全国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仍旧成为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样，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同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

当时，这一主要矛盾集中表现在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实质是沦陷区政权归谁所有的问题。为此，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结束后，采取一切手段抢夺胜利果实。

第一，在军事受降方面，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乞

降照会刚一发出，国民党在美帝支持下，就垄断接收日伪投降的权利。八月十一日蒋介石急忙下了三道命令：一是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一是要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是要伪军“维持治安”，“趁机赎罪”。十二日，赫尔利大使向美国国务院建议“日本须将所有在中国的武器……交给中国政府”①。同时，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但是，当时国民党的多数军队还驻扎在远离日伪占领区的西南和西北地区，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国民党首先与敌伪合作，大肆收编伪军，给汉奸头目封官加委。如：伪南京军委会副委员长兼伪上海市长周佛海，被任命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伪第二方面军司令孙良诚被任为二路军总司令；伪第三方面军司令吴化文被任为“济南绥靖司令”兼市长。还有一些汉奸头目，当上了“绥靖司令”“先遣军司令”，等等。五十万汉奸部队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先遣军”。国民党还公然勾结侵华日军。八月二十三日，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日军在原地“作有效之防卫”，已被人民军队解放的地区，“应由日军将其收回”。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也致电国民党表示：“绝对确保”其所控制地区，以保证移交给国民党政府。

第二，对敌伪政权方面，国民党为了更快地把胜利果实抢到手，还直接利用敌伪政权，把南京汉奸政府的全部班子，原封不动地接收下来。各地汉奸敌伪都受到国民党的委任，地方保甲制度也依然保存下来。一九四五年八月，国民党在“收复地区政治设施纲要草案”中明确规定：“收复地区现有之各行政机构应逐渐加

①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第一卷，第3746页，三联书店，1974年版。

强其组织”；沦陷地区收复后其政治工作由原地方机关办理”。对伪“警官及警长、警士，分别由中央及各省扩充训练”；以备临时调用”。对原“乡镇保甲干部”要“选贤使用”①。国民党内政部还于八月十九日，致电各战区和各省政府，提出了对收复区地方行政紧急措施：(1)迅速恢复收复区各县行政机构；(2)尽量发动当地公正人士维持秩序；(3)运用各县原有自卫武力维持治安；(4)分配保安团队或警察队控制重要据点；(5)县行政机构恢复后同时即成立临时参议会；(6)编组保甲划分乡镇尽量利用原有编制；(7)切实举行户口清查造册②。

第三，在经济上，对沦陷区财产实行空前的大掠夺与合并。战后，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一方面以“接收”为名，把日本多年掠夺中国人民的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加以吞占；另一方面，趁机对各阶层人民进行搜刮和掠夺。因此，在国统区，迅速出现了官僚资本恶性膨胀，民族工商业陷于严重危机，各阶层人民痛苦加深，使国民党反动统治同新接收区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迅速地尖锐起来，称国民党的接收为“劫搜”。四大家族对工业实行独占，他们“接收”敌伪二千四百一十一家工矿企业，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官僚资本企业的资本，已占全国产业资本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全国银行三千四百八十九家中，有两千四百六十六家即三分之二以上属于四大家族所有。他们“接收”了敌伪的一切商业机构和物资，掠夺沦陷区民间保存的大量物资财富。此外，通过发行纸币、税收、公债、经济统治等手段，大规模的搜刮人民的血汗。总之，在抗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① “国民党政府中央统计局档案”《中国现代政治史料汇编》第4辑第2册10360——第1—2页。

② “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档案(276)8933”《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册第10114页。

在“接收”和残暴掠夺之下四大家族的财富骤增至一百亿至二百亿美元，达到了中国官僚资本发展的最高峰。这是国民党蒋介石赖以统治和发动内战的经济基础。

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在庆祝胜利典礼时讲话中就放出了发动内战的信号，他反复强调所谓“国家的统一”“是近代立国绝对必需的要素”，是“民主宪政的唯一基础”，“唯有统一国家才能收获最后胜利的成果，亦唯有统一的国家，才能保障民主制度，发扬民意，集中民力，维护主权的独立，完成建国之大计”①。他还强调“军队国家化”，要共产党把军队交给蒋介石代表的“国家”，以实现“军令政令之统一”②。他特别强调要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使“革命建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不至动摇，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统不至紊乱”③，等等，妄图以此为借口发动内战。

国民党反动派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内战的阴谋活动，是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之下进行的。蒋介石为了维护独裁统治，发动内战，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就必须以美帝国主义为靠山；美帝为了实现其独霸中国的野心，也需要以蒋介石为工具，这样，他们就在反共反人民的基础上进一步勾结起来。

抗战胜利后，美帝国主义进行了一系列助蒋内战的反动活动。

美国出动大批飞机、军舰，把国民党军队从遥远的地区赶运到内战的前线。把美式装备的新六军从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起陆续由缅甸空运到南京；九十四军由广西柳州、靖远空运到上海；九十三军由武汉空运到北平等地。在海上，光是用军舰运到山东的蒋军就有第八军、五十四军、青年军二〇六师等。“在美方协

①②③ 《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第 13 页、12 页，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编印，1946 年 5 月版。

助下运输至华中、台湾、华北和满洲的国军，计空运者三军，海运者十一军”①。从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国海空军运送国民党军到达内战前线者，已达十四个军共四十一个师，外加八个交通警察总队，共计约五十四万余人”②。从而使国民党军队抢占了大量的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打着‘受降’‘遣俘’的旗号，直接在中国港口登陆，替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地和铁路交通线。仅驻在华北的海军陆战队，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就有四万五千人③。同时，美军还直接帮助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派遣军事顾问团，直接帮助和指挥国民党打内战。

美国还出钱、出物援助国民党政府。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美国政府宣布继续以租借物质援助国民党政府。据美国陆军部的记录，到一九四五年底供给国民党地面部队所需的军用物质“已经足以供给完成三十九师计划的需要，其他的租借物资中，包括大量的车辆及军需用品”④。给蒋介石的武器、物资和借款，在马歇尔“调处”期间已达四十亿美元。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国国务院向美国会提出了《军事援华法案》，它赋予美国总统以广泛权力，为国民党编练军队，供给武器和设备。

二、共产党的和平民主方针和反对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战争中死亡一千多万人，损失数百亿美元。战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①《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 702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
②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大事月表》第 23 页，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③ 《马歇尔使华》，第 399 页，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④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 354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

鉴于当时国内外的和平呼声，特别是经过多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阐明了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方针，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生活，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①。宣言还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的六项紧急措施：（一）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收日军投降的地区。(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结束训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避免内战，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宣言最后强调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中国国民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②。

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方针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得到了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的热烈欢迎。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国民主同盟就曾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主张：修改国民大会的组织法和选举法，召开国民大会；保障人民的一切基本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解决当前一切紧急和重大的问题；裁减军队等十项主张③。九月，

①《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第 1 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
②《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　第 1 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
③《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60—61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年 4 月版。

中国第三党领袖章伯钧也对目前时局发表谈话，指出，“凡我全国党派，无论在朝在野，均应以和平建国为共同目标”，强调“国民党应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指出，“今后民主建国大业，任重道远，经纬万端，必须全民合作，党派团结”①。九月，昆明各界人士在为庆祝胜利及和平建设新中国的通电中指出，“我们要和平建设新中国，民主、团结是绝对不能缺少的。”“我们也确切相信，只要大家努力，一切以人民利益为主，则实现和平、民主、团结，是一定可以做到的”②。成都文化界发表对时局的呼吁“坚决反对内战”尤其反对假借敌伪之手来进行内战。”他们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与无党派领袖的政治会议”、“无条件保障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人民基本权利”等六项主张③。

共产党为了争取实现和平民主，一方面，耐心领导全国人民避免战争，寻求实现和平团结的道路，力争在和平的条件下实现中国的某些社会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某种程度的民主宪政，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实行地方自治，保证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和人民力量的存在和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和平愿望能否实现，不取决于共产党，而决定于当时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本性的认识，对它不抱幻想，积极发展自己的力量，作好战争准备，以应付突然事变。如果能够实现某些和平改革，是符合共产党和人民愿望的，应该力争。如果不能实现，也可以通过斗争揭露蒋介石的和平阴谋，教育人民，争取群众，使他们认识到：革命人民只有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彻底消灭国民

① 《新华日报》1945 年 9 月 14 日。
② 《新华日报》1945 年 9 月 26 日。
③ 《新华日报》1945 年 9 月 29 日。

党反动派，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平。

针对蒋介石“寸权必夺，寸利必得”和发动内战的阴谋，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一方面，力争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作好战争准备，坚决用战斗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

针对蒋介石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罪恶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十一日，八路军延安总部连续发布了朱总司令的七道命令，要求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人武器，接受日伪军投降；并指令冀热辽等解放区的武装部队迅速进军东北。针对八月十一日蒋介石的三道命令，八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了他的错误命令，指出“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①八月十五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及其所属一切部队向我投降。同日又致美英苏三国一份说帖（照会），声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的指挥下，有权“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于中国国民党政府之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勿予国民党政府以援助。”②十七日，朱德总司令再电蒋介石，进一步揭露其准备内战的阴谋，并提出，国民党政府要制止内战，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六项要求③。同时，中共中央还指示各解放区，根据情况分别作到：凡能

①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一集， 第 14 页。
② 《解放日报》1945 年 8 月 16 日。
③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一集， 第 27—28 页。

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那怕暂时也好；在不能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地区，必须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解放区各部队坚决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朱总司令的命令，继续向敌占区进攻，收缴敌人武器，接受日伪投降，迅速扩大了解放区，保卫了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从八月十一日到二十六日，解放军收复了烟台、威海卫、集宁、张家口等大小五十九座城市和广大农村。

在和国民党争夺胜利果实的斗争中，争夺的重心是东北，它是两党必争之地。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北靠苏联，西接蒙古，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邻，南与我冀察热辽解放区和整个华北解放区连在一起，共产党如能控制东北，就能改变解放区长期被敌人分割，四面包围的状态，使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同时，东北工业发达，交通方便，物产丰富，它对支援解放战争十分有利。而蒋介石在东北的统治非常薄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不仅长期地坚持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而且在苏联对日宣战后，又配合苏联红军迅速地解放了东北，使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共中央经过周密研究，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发出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我东北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① 随后，中共中央调山东省委书记、山东军区司令罗荣桓率主力部队约九万人进入东北；调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率部队约三万人进入东北；从各解放区先后调往

①刘少奇：《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71—372 页，人民出版社，1981 年出版。

东北地区的部队共达十三万人。这些部队，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成立，彭真为书记）的领导下，开辟了东北解放区。

由于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不顾敌伪的顽抗和蒋介石的阻挠，坚决力争，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已控制了热河、察哈尔两省和东北、山东、河北、绥远、山西、豫北、淮北、淮南、苏北、苏中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根据一九四六年一月统计，解放区的面积已达到二百三十九万一千多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一亿四千九百万(约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城市五百零六座（约占全国城市的四分之一）。这种形势是力争的结果，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

同时，为了作好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充分准备，中共中央还决定在解放区普遍开展练兵、减租、生产三大运动。它为战胜国民党打下了较坚实的物质基础，极大地增强了解放区的自卫能力。

三、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和停战协定的签订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方针已定。但是，由于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很高，它发动内战的阴谋遭到了解放区军民的强烈反对和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又由于蒋介石的军队还远在西南、西北后方，全部调运到内战前线尚需要一段时间。于是，蒋介石采取反革命两手，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下，在加紧准备内战的同时，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二十日和二十三日三次电邀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定大计”。美蒋反动派的这一阴谋是：如果毛泽东不去，就可借此宣传共产党没有诚意，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卸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去了，就可以通过谈判施加压力，用威胁利诱的办法，骗取

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即使谈判不成，也可以争取时间，抓紧部署内战。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及“和平”阴谋，是完全清楚的，并对此作了充分准备。但是，考虑到当时国内外的和平呼声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同时，也考虑到，国民党蒋介石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有可能经过和平谈判之后，有条件地承认共产党的地位。因此，中共中央认为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尽可能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中国社会，成立联合政府，实现建立新中国的目的，中共中央同意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八月二十六日，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我们准备在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必要的让步，以此换得和平的局面，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在我党作出必要的让步之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输了理，我们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受到民主党派领导人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冷御秋、郭沫若等人的热烈欢迎。国民党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参议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也到机场迎接。毛泽东在机场上发表谈话，强调“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指出，一切重要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最后号召“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①

蒋介石对于国共谈判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是共产党提出的。

①《解放日报》，1945 年 8 月 30 日。

国民党蒋介石没有想到毛泽东能去重庆。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就说“毛先生一向不出来,这次也到重庆来了”。并辩解说:“国民党没提出具体方案,是“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定见,而有碍会谈的进行”①。但是,蒋介石对于谈判是有既定方针的。据《蒋总统秘录》十四本记载,在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即“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的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统一,不稍迁就”。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又强调“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要求“军令政令之统一”,强调“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等等。

重庆谈判是国共两党的一场严重尖锐的政治斗争。国民党派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为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进行谈判。谈判中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解放区的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上。国民党企图在“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共产党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除批驳国民党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无理要求外,作了必要的让步。在军队问题上,共产党提出在没有实现政治民主化之前,可先行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重划军区,控制内战的爆发。而国民党声称全国军队整编一事,尚在“计划”中,企图以此拒绝共产党的建议。接着,共产党又再次建议,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比例可以七比一,人民军队可缩编为二十四个师以至二十个师。由于国民党根本否认人民军队的合法地位,它对共产党的整编方案以“可以考虑”为借口,实际上加以否定。在解放区问题上,共产党为了揭穿国民党的谣言,并使解放区的力量更加集

① 《中央日报》1946年1月13日。

中，在坚持国民党必须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原则下，可以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同意退出广东、浙江、苏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八个解放区。但是，即使如此，仍遭蒋介石的顽固拒绝，以致无法达成协议。

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谈判期间作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加强了与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他们广泛地接触各党派和各阶层人士，多次会见和访晤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柳亚子、王昆仑、张申府等，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多次举行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座谈会，就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等问题交换意见，希望他们和共产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民主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还出席了民主同盟领导机关举办的欢迎活动，并数次与民盟主要负责人举行会谈。在历次会见和谈话中，民盟领导人向毛泽东表达了对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的关切，申述了实现和平民主的立场。毛泽东对民盟在国统区反对蒋介石反动政策的斗争表示支持，对民盟提出的关于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的建议，表示赞赏。还会见了宋庆龄，对她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精神表示敬意。冯玉祥是受蒋介石集团排斥打击的一位知名人士，他在重庆谈判期间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一见面，就久久握手，热情问候，称颂毛泽东的到来象征着国内的团结、和平。随后，又设宴欢迎毛泽东①。毛泽东对冯玉祥先生的进步倾向表示赞许。柳亚子一见到毛泽东就非常兴奋，即席赋诗，称颂毛泽东的“弥天大勇”。

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还广泛地会见了妇女、青年、文化界、工商业界人士。

① 《新华日报》，1945 年 9 月 8 日。

毛泽东等还会见了国民党上层人物何应钦、孙科、陈立夫、戴季陶等，向他们介绍了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指出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运动的形势，使他们也不得不假意地表示要“和平建国”，陈立夫还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①。

毛泽东等还会见了许多外国人士和朋友，希望他们在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继续发展同我国人民的友谊。同时还会见了许多国家驻重庆的使馆官员，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对内政策，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所造的谣言。

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和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接触中，反复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基本政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介绍了谈判情况，表达了共产党对和平谈判的诚意，提高了他们对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反动政策的认识，推动了他们参加和平民主运动，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毛泽东等人在广泛地接见民族工商业人士时，还向他们讲明了共产党对民族经济的政策和应有的态度。指出，在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的统治下，中国民族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只有结束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和经济压迫，建设一个民主团结的新中国，才是发展民族经济的唯一正确道路。周恩来进一步阐明了共产党发展经济的方针和政策，着重讲了发展资本、税收和劳资等问题。使工商界人士逐步认识到改革政治，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对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推翻三大敌人的统治，具有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重庆和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以及外国人士的广泛接触和所作的大量工作，形成了一股反对蒋介石内

①吴玉章、龙飞虎等著：《毛主席在重庆》第 34 页，解放军文艺社 1961 年出版。

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舆论力量，推动着重庆谈判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使国民党更加孤立，不得人心。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世界的广大人民”①。

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双方代表于十月十日签订了《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这次会议虽然没有解决军队、政权等根本问题，但它迫使蒋介石承认了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国共“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②；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③；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可以编为二十个师。在解放区和军队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但《纪要》公布了双方的主张和分歧，有助于全国人民了解真相。通过这次谈判，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和平的诚意，揭露了国民党的和平阴谋，教育了中间人士，从而使国民党陷于被动地位。

《双十协定》签字后，中国共产党按照协定，将江南新四军部队撤往江北。但是，国民党却根本不履行协议，十月十三日，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军队发布了内战密令，大举进攻解放区，解放军奋起自卫，连续取得绥远、上党、邯郸三次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共歼敌十一万多人，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气焰及其内战阴谋。

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连遭失败以后，发现自己还没作好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056 页，1964 年版。
② 《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解放日报》1945 年 10 月 12 日。
③ 《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解放日报》1945 年 10 月 12 日。

全面内战的准备。这时，美国政府鉴于国民党内战政策不得人心，独占胜利果实又困难重重，也变换了干涉中国内政的手法，由公开援蒋打内战变为伪装调解冲突，虚伪地打起了和平招牌。美国总统杜鲁门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要求中国停止内战，声称国民党一党政府应扩大基础，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①。并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争端，“希望能尽快地以和平民主的方法达到中国的统一”②。十二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英美苏三外长会议，又重申了主张中国必须停止内战，坚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不得不同意召开双十协定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十二月十六日，中共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有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等参加的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团认为，停止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提条件。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提出了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国民党为求缓兵之计，也同意了这一建议。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成立了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参加的三人小组（或称三人军事小组）。经过多次谈判，于一月十日，双方达成协议，签订了《停战协定》。国共双方当局在当天对其所属部队发出了停战令，规定在一月十三日晚十二时以前，一律停战。解放军在中共中央命令下，忠实地执行了停战令。而蒋介石在美国授意下，坚持在停战协定中将东北除外，以便在东北放手大打，然后把战火烧向关内。蒋介石在下达停战令的同时，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 28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

② 《杜鲁门总统致总统驻华特便（马歇尔）》，《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 626 页。

还密令他的军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对此，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二节　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的成立。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的活动

一、民主同盟全国临时代表大会的召开

抗战胜利后，在和平、民主与内战、独裁以及建立什么国的问题上，国共两党的斗争十分尖锐。中国民主同盟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间，积极开展政治活动，力图通过和平道路实现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为了争取实现上述目标，在国共两党重庆会谈期间，民主同盟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在重庆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推选代表六十多人，代表盟员约三千人。出席大会的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左舜生、陶行知、潘光旦、刘王立明、史良、邓初民等。

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民主同盟纲领》等文件，强调“要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①。为此：第一、主张实行议会制，即“国会为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之最高机关，由参议院及众议院合组之”，“参议院由各省省议会及少数民族自治单位选举之代表组织之，众议院由全国人民直接选举之代表组织之。”第二、主张责任内阁制，即“国家最高行政机构采取内阁制，

①《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71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对众议院负其责任。”第三、主张“司法独立”，“不受行政及军事之干涉”。第四、主张“地方自治”，省县设议会，可“召集省宪会议，制定省宪”。此外，还提出了“国家保障人民身体、行动、居住、迁徙、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之基本自由”① 等等，强调人民为主人，人民组织国家之目的在谋人民公共之福利，其主权永远属于人民。

经济上主张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以保障人民经济之平等；实行减租减息，规定最高限度之土地私有额，凡超额之私有土地，国家于必要时，依法征购之。

军事上主张军权属于国家，非国防不得调用军队，禁止军队之党团组织，实行征兵，军人绝对不得干预政治。

外交上主张保障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与各国和平相处，与美苏英互相合作。

还主张教育普及化大众化，学术研究绝对自由；国家确定适当的人口政策，实行各种保险，实行劳工福利政策；保障妇女权利，男女平等。

大会认为，要把中国建立一个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必须扫清民主的障碍，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权的党治”；“彻底消除内战的危机”，改变普遍贫穷匮乏并且已经陷于破产崩溃的社会经济”② 政治报告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召集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的代表人士会议，用和平协商的方式，对国家的一切问题，逐步地积极地求得彻底的解决；成立联合政府，它是“中国和平、团结、统一的唯一途径”，是“实现军队国家化、彻底消弭内战，平息党争的唯一枢轴”；召开国民大会，它“必须是代表真正的民意

①均引自《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66—6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78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

机关，而不是任何党派包办操纵的机关”，“必须用人民普选产生的代表以组织国民大会”。“国民大会是制定宪法，结束党制的必经手续，同时必须修改“国民大会的组织法选举法及宪草”①.

大会总结了中国民主同盟全国代表会议以来中央组织工作的主要经验，并提出了今后发展巩固组织的意见。第一，扩大中央组织委员会和各支部组织委员会；健全县分部的组织”；提拔培养并训练组织干部”；第二，扩大并巩固组织，盟员中应增加下列成分：工商业家、文化工作者、中小学教师、乡村工作者、人民团体工作者、工商业从业人员、工人、农民”；第三，加强与人民团体的联系，“与各文化，工商，自由主义者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建立经常联系”，“推动并参加各界组织社交机关如同学会、同乡会、俱乐部’② 等活动。大会还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规程》。

大会批判了青年党把持盟务，排斥异己力量，拒绝吸收无党派民主人士入盟等错误，并采取有力措施限制青年党在盟内的派别活动。

大会选出了三十三名中央执行委员，连同原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六十六人。推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梁漱溟、左舜生、史良、张君劢、朱蕴山等十八人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决定张澜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委员会主任，罗隆基为宣传委员会主任。

为了加强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推动全盟工作，大会决定出版一种刊物。经过筹备，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在重庆正式出版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机关报《民主报》。

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某些主张，实际上反映了上

①《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80—81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② 《中国各小党派现况》第80—81页， 1946年出版。

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某些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愿望，这是行不通的。但是，这些主张是对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否定。特别是在实践上他们与共产党合作，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要求和平民主，实行计划经济，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的决议，对于巩固和发展盟的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民主建国会的成立

民主建国会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重庆成立，主要发起人有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章乃器、施复亮（存统）等。

抗战期间，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不断地受到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排挤和兼并，造成产业界许多人士的不满。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垄断的加剧，“美货”到处充斥市场，加上恶性通货膨胀，使民族工商业无法维持下去。为了生存自救，发展民族工商业，民族工商业者认为有建立组织，加强团结，争取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必要，当时重庆，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还有两股力量在成长，酝酿成立组织。

一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员，该社于一九一七年成立，主要发起人黄炎培，任职教社理事长。一九一八年在上海成立“中华职业学校”。黄炎培（一八七八——一九六五）上海川沙人，字任之。清末举人，同盟会员。袁世凯当大总统时，曾要他出来做官未遂。北洋政府又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但被拒绝。抗战期间，积极参加救亡斗争，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积极为实现宪政而努力。一九四五年发起组织“民建会”。职教社的成员多是与民族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文教知识界的中上层分子。它的群众基础较为广泛。

一是迁川工厂联合会成员。该会在抗战期间成立，领导人为

胡厥文(一八九◯年生），上海市嘉定县人，他是我国爱国民族工业资本家。是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又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他从北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长期从事机械工业工作，在上海设有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等，任总经理，并任上海机器工业同业公会主席，上海市棉布市场理事长，很受同行拥护。抗战开始后，他动员了百余家机器同业迁川，支援抗战。迁川工厂联合会以工业界为基础，它的成员多是民族工业资本家及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影响较大。这两股力量要求组织一个以民族资产阶级及与他们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为基础的政治团体。为此，胡厥文、黄炎培、章乃器等经常在一起酝酿，商谈组织进程。在筹备会上，公推胡厥文、黄炎培、章乃器、孙孟起、施复亮、胡子婴等十五人为筹备干事。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在重庆白象街实业大厦召开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出席会员九十多人，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为主席团。首先由胡厥文报告成立宗旨 谓‘ 本会之筹设,其最大目的为促成民主 ”,表示‘ 我们坚决主张不屈服于任何威力，以大公无私的精神奋斗到底 ”①。黄炎培报告筹备经过，章乃器、胡西园等在大会上发了言。大会选举了领导机构，胡厥文、黄炎培、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孟起、章元善、吴羹梅等十一人为常务理事。会议通过了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政纲、组织原则和章程，正式宣告民主建国会成立，并决定创办《平民周刊》，作为机关刊物。

民主建国会纲领分总纲、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五个部分，共四十六条。

总纲部分，主要阐述对建国、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基本主张和指导思想。认为“ 建国之最高理想，为民有、民治、民享。建国

①《民主》第 1 、 2 、 3 期合刊，1946年1 月出版。

途径“采取孙中山先生所定三民主义之重要进步部分，订入宪法，以确定全民共同保信之范围”；“政治须以文化为指导，而以经济为基础”，反对“军人武断政治与夫官僚政客包办政治”；“必须使从事生产之广大人民拥有最大之发言权”，“经济以科学为指导，而以社会为基础。”

政治部分，认为“民主政治之基本条件，为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等之自由”，主张“全国武力属于举国一致之民主政府”，要“铲除贪污，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各级议会，行使各级民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团结苏英美，以爱好和平之赤诚，巩固联合国之基础，用达世界大同之终极目标”。

经济部分，认为“经济建设须有全国性计划”，实行经济民主；“人民有充分经营企业之自由”，反对“国营事业之官僚化与私人企业之独占化”，“由国家征租或发行债券征购非自耕土地”。在《民主建国会宣言》中，还强调“国家必须以全力培养资本，而不应以节制资本的名义消灭资本。”①

社会部分，主张“人民应有工作权，对失业人员，国家‘应负切实救济之责’”；“减少劳资之纠纷”，“扩大妇女教育与妇女职业”，保护儿童。

教育文化部分，主张普及“义务教育”，“教学自由”等等②。

民主建国会的纲领和主张明确表示反对官僚垄断资本，强调发展民族资本，它充分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

会后，陆续在重庆、上海、港九、北平等地成立分会。

三、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

中国民主促进会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上海正式成立。

① 《文革》，13期，1946年1月1日出版。

② 《民主建国会政纲》、《平民周刊第一、二、三期合刊》本，1946年1月。

民进创始人，都是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民主人士，其中大部分是文化教育工作者，一部分是工商界人士。早在抗日战争前，他们就呼吁团结御敌，一致抗日；抗战期间，他们在上海与共产党人一起，坚持民族解放斗争。抗战胜利后，又积极投身到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出卖国家主权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基本队伍，是由两部分民主力量组成的。一部分是以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另一部分是以王绍鏊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

抗战胜利后，马叙伦、周建人 、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等多人经常在《周报》、《民主》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宣传和平民主。为了不断研究时局，商讨斗争对策，这些主要撰稿人还经常和刊物的创办者聚会座谈，共商国是。于是，在马叙伦周围逐渐形成了一股积极争取和平民主的力量。

另一方面，王绍鏊在抗战胜利后又联系了赵朴初、林汉达、梅达君等一大批民主人士，他们也经常集会座谈，分析国内外形势，研究共产党的主张。后来，经过谢仁冰介绍，马叙伦与王绍鏊相识，他们志趣相同，互相往来，十分密切。这两部分人不仅经常集会座谈，还联名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

联合战斗显示了集体的力量，对当时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因此，一些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分别写信给马叙伦、王绍鏊，希望成立永久性的组织，以便长期共同战斗。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影响和推动下，经过协商研究之后，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

“民进”的主要创始人为马叙伦(一八八四 — 一九七〇),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字夷初。他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上海《国粹学报》等报编辑。上海劳动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

授，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抗日战争时期，从事抗日反蒋活动。解放战争初期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上海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正式宣告成立。参加大会的有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林汉达、徐伯昕、赵朴初、陈已生等二十六人,由马叙伦任大会主席。他在报告本会发起经过时说“纵览目前国是，非促进民主不足以建永固之国基，经各方交换意见后，认为有组织团体以谋群策群力之必要。”取名为民主促进会是要发扬民主精神以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大会一致通过了马叙伦的报告。

会议作出四项决议：（一）一致通过本次集会为本会的成立大会；(二)一致通过本会的简章；(三)原则通过本会对时局的宣言，同时继续广泛征求意见；（四）决议本会暂设理事十一人，常务理事三人，并决定在理事会未成立之前，会务由马叙伦负责，王绍鏊、陈已生协助。

大会通过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章，明确规定了民进组织的性质、任务和奋斗目标，指出：“本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宗旨”。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举行了第二次全员大会，出席者三十三人，选举马叙伦、严景跃、陈已生、林汉达、郑振铎（未参加大会）、王绍鏊、周建人等十一人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宣言》全面阐述了民进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立场观点，公开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宣言强调“中国人民已经觉悟，保障中国前途的唯一途径，是消灭国外国内一切束缚他们自由自主的势力”。强调要“迅速实现政治民主”,指出“过去的不统一,正是不民主的结果。”“我们坚决反对用内战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宣言提出八项主张：(1)我们自主

自动地改革政权，实现民主；(2)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地还权于民；(3) 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全国军队，各驻现地，听候调整；(4) 要求友邦从速撤退驻华各军，完成日本投降事件由中国政府自行担任；(5) 重新制定宪法草案，交付正式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布；(6) 宣布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无效，制定普选方法，限期完成正式最高权力机构之选举；(7) 战时机构即核实裁并；(8) 制定适应时代的建国大纲，交付政府制定政策方案。宣言还提出为争取民主，须先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人身的自由，反对一切摧残人民自由的举动。

这一《宣言》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性文献。

一月四日，举行了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一致推举马叙伦、陈已生、王绍鏊为常务理事，并选任周建人为起草委员，严景跃为财务委员，徐伯昕为出版委员，宓逸群任秘书，张纪元任事务。从此，中国民主促进会有了健全的组织机构。全体民进成员在组织的领导下，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四、九三学社的成立

九三学社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在重庆成立。成员大部分是文教、科技界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个组织原名是“民主科学社”，是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组织起来的。一九四四年底在重庆一部分从事民主运动的教授、科学技术界人士许德珩梁希、潘菽、税西恒、黄国璋等对时局感到忧虑，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该会经常举行座谈，讨论民主与抗战，民主与科学等问题。他们强调要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继承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

而奋斗。主张“团结民主”,“抗战到底”。

抗战胜利后，参加座谈会一些同志，希望能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组织，长期存在下去。正在这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了重庆。当许德珩等向毛泽东汇报民主科学座谈会情况时，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许德珩表示我们也准备这样做，但担心成立组织人数太少。毛泽东鼓励他们说：人数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些科学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吗[①]？共产党的亲切关怀使许德珩等很受启发和鼓舞，决心把座谈会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决议把座谈会改为九三学社，成为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并成立了九三学社筹备会。在筹备期间，为争取国内和平与民主，反对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破坏旧政协，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许德珩，一八九〇年生，江西九江人。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曾在广州中山大学、黄埔军校、上海大陆大学等院校任教。一九三〇年后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抗战期间，在重庆发起成立民主科学社。抗战胜利后，在北大任教期间，拥护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为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做了许多革命工作，为著名的民主教授之一。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到会有褚辅成、卢于道、黄国璋、许德珩、税西恒等五十余人，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程西恒为主席团。会议通过了社章、成立宣言、

① 许德珩：《毛主席和九三学社》，《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4日。

基本主张和对时局主张,选出许德珩 、潘菽、张雪岩、税西恒、黄国璋、张西曼、涂长望等十六人为理事，卢于道、何鲁、梁希等八人为监事。

成立宣言强调中国要实现‘和平团结’‘民主宪政”,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对外政策要‘独立自主”,对各国一律平等。强调发扬‘五四’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①。

会议提出八项基本主张：(1)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争取人民之基本自由；(2）从政治的民主化，谋军队的国家化；(3)肃清贪污，反对官僚政治；(4）从速完成国家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改善农民生活及农村佃租关系；（5）建立以民生为主的经济制度，反对官僚买办资本及一切为私人或派系谋利益的经济关系；（6）学术思想之绝对自由；(7）积极普及国民教育；(8）加强同盟国家之团结与合作，促进世界和平②。

会议通过了对时局的主张，要求国共两党军队，立即在东北、中原及中国任何一隅无条件停止内战；无条件实行停战协定；要求马歇尔彻底实行调人责任，对两党争执予以仲裁。在中国政府未改组前，美国政府勿予中国任何一党派以任何援助③。

一九四六年十月，九三学社中央迁到北平，在重庆、成都、上海、南京分别成立分社，密切联系一批进步与中间教授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

这些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亲切关怀和热情帮助下，积极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逐渐倾向共产党的革命路线，与其他民主党派一起站到人民革命方面，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①② 《新华日报》，1946年5月6日。
③ 《新华日报》，1946年5月6日。

五、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的活动

在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之后，各民主党派普遍地进行了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活动。一九四五年十月，中国民主同盟、第三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中国农业协进会、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民主实践社、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人民反内战同盟和二十多家杂志社，纷纷发表宣言、评论，呼吁和平，制止内战，撤退美军，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十月三十日，民盟中央常委黄炎培致函国共会谈代表，呼吁“立即停止冲突”，“从速组织调查团”，“调查真相”，“商谈解决”。“一切基本问题，恐须有待政治会议”，“协商解决”①。十一月二日，民盟发言人发表反对内战的谈话，指出：“当前中国第一件事是停止内战，避免内战，消弭内战”。“谁要是用武力来解决党争问题，谁就负内战的责任，谁要发动内战，谁就是全国的公敌”。“今日国家的一切党派，应以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党派的利益摆在第二”②。十一月十二日，中国第三党发表《抗战结束后对时局宣言》，要求国民党“秉天下为公，的原则，把民主权利交还人民”，“立即停止全国的军事行动”，“用民主方式解决任何有关军事政治的纠纷”③。十一月中旬，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发起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并于十一月十九日在重庆举行五百余人的反内战大会，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号召各界人民用罢工、罢课、罢市等行动制止内战。倡议在全国各地分别成立由各界人士参加的反内战联合会，制止内战，奠定国内永久和平，并且严重抗议美国政府武装干涉

① 《新华日报》，1945年11月3日。
② 《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日。
③ 《中华论坛》第十、十一期合刊，1945年12月1日出版。

中国内战。这一号召迅速在各大城市的人民中间获得响应。十二月三十日，民盟主席张澜致函政协代表，要求国共两党于一九四六年元旦“发令所属一切军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①。三十一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立即给张澜复函，表示“完全同意”。

各民主党派还积极支持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不断地揭露国民党挑动内战的阴谋。国民党制造的“一二一”血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各民主党派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严厉谴责国民党的法西斯罪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民盟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残酷镇压青年学生的罪行，要求国民党政府应查明事实，追求责任，严惩肇事军政首长；抚恤受害青年，赔偿损失，并保证以后不再有此类事件发生；撤销特务，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之民主自由；政府当局勿再听任军警干涉，致生不幸事件②。各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纷纷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支持学生“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这一运动从学生发展到工人，从城市扩大到乡村。重庆、遵义、成都、上海等地都为死难的爱国学生举行了追悼会。从此，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压迫，要求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浪潮不断高涨。

国民党不顾人民的反对，不断地挑起内战，仅一九四六年一月至六月，就向各解放区进攻达四千多次，占领城市四十座，村镇二千五百多个，内战危机迫在眉睫。针对国民党不断挑起战端，各民主党派积极揭露其内战阴谋。一九四六年五月，民盟对时局提出四项主张，要求“全国各界同胞一致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局”。五月二十八日，北平各界人士呼吁立即停止内战。六月，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不仅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的内战罪行，

①《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11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②《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106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

而且还联合其他民主人士一百六十四人致函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停止内战。这一举动很快得到中共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支持。六月十一日中共代表团复函马叙伦，对这一行动表示钦仰，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制止内战，挽救国运于 陷危，张民主之大意。六月十九日，民主建国会发表《为挽救国运、解决国事，奠定永久和平而呼吁》的文件，在上海各报刊登，指出“武力不能解决问题，排斥反对党不能依恃屠杀”，要痛下决心奉协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

各民主党派在蒋介石阴谋发动内战、坚持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情况下，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要求和平民主，揭露蒋介石的假和平真战争的阴谋，它对提高人们对美蒋反动派本性的认识，孤立敌人，牵制反动力量，壮大人民革命声势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节　政治协商会议，在建国方案问题上的激烈斗争

一、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根据“双十协定”规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开幕。

整个会议充满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最初商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社会贤达（即无党派民主人士）四方面组成，每方九人，共三十六人。但是，国民党企图通过会议拉拢民主党派，孤立共产党，使其占绝对多数，通过有利于国民党的提案。为此，他们一方面企图拉拢中间派，以高官厚禄为诱饵，促使右翼与他们合作，以分裂统一战线；另一方面拉拢青年党，企图拆散民主同盟，并私下答应给青年党五个名

额。在国民党的支持下青年党向民盟提出，要占民盟九个名额当中五个席位，否则，就要退出民盟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被民盟所拒绝。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与民盟的团结合作，周恩来等一再到特园向民盟负责人表示，民盟应有九个代表席位决不能让步，希望民盟坚持这个意见，鼓励民盟内部除青年党外，要加强团结，共同斗争。当时，国民党坚持青年党五个名额不能少，共产党坚持民盟九个名额不能动。最后取得妥协，青年党以独立的单位参加政协，占五席，民盟仍占九席。增加的名额，共产党提出自己让出两个名额，国民党让出一个名额，再增加两个名额，这样，政协代表人数由三十六个增至三十八人。结果是，参加会议的代表，中国国民党八人：孙科、吴铁成、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中国共产党七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中国青年党五人：曾琦、陈启天、 杨永浚、余家菊、常乃惠；中国民主同盟九人 张澜、罗隆基(无党派)、张君劢、张东荪(国社党)、沈钧儒、张申府（救国会）、黄炎培（职教派）、梁漱溟（乡建派）、章伯钧（第三党）；无党派人士九人：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①]。三十八名代表的成份很复杂，按政治分野，大致可分左中右三种势力：左派，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主张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右派，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坚持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中间派基本上是民盟，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但民盟的情况很复杂，其右翼幻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青年党已成为国民党的附庸，国社党虽还留在民盟内部，但实际亦

① 《新华日报》，1946 年 1月 7 日。

属于右派势力。无党派人士有左中右之分，中间居多数。共产党的方针是：争取团结中间派，揭露与孤立国民党右派，力争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议。

会上，三种不同政治势力的代表都讲了话，表明了自己的基本态度。首先，蒋介石致开幕词，一方面装腔作势宣称：“要真诚坦白，树立民主的楷模”；要大公无私，顾全国家利益”使民主宪政及早实施；另一方面要“消除一切足以妨碍意志统一，影响安宁秩序和延迟复兴建设的因素”。强调在过渡时期“使国家根本不至于动摇”，以维持法西斯政权。最后虚伪的提出要实施“人民自由”；“政党之合法地位”；“普选”，“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①。周恩来致词中指出，这样的会议，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还是创举。“中国目前现况之不满人意，是毋庸讳言的。”强调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共同制定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化的方案；实现各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的举国一致的政府”。要‘去掉一切落伍陈腐和不合时宜的制度和办法”，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才能真正“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②。张澜在致词（由沈钧儒代读）中，要求国家实现和平与民主，但“一定要先有和平而后才能实现民主”，“永久的和平是中国建国的先决条件”。着重指出，今天要‘建立国家真实民主的基础’③。

会议分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宪法草案、国民大会等五个小组进行，五个方面各派代表二人组成。

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与以民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结成了反内战反独裁的政治联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一起协商，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①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
②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
③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

二、在建国方案问题上的激烈斗争

在政治协商会议过程中，政权问题亦即建立什么国的问题是斗争的焦点。这个斗争主要表现在：

第一、关于政权问题。国民党代表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王世杰又在会上作了说明。根据《提案》和“说明”看出，国民党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其主要内容有：（1）国民政府委员增加三分之一，国民党的名额不仅要比“任何他党的名额多”，而且要具“特定程度的多数”①。这样，尽管各党派参加了国府委员会，但在实际上，国民党仍据有操纵、支配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实权。（2）“国民政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充任之”②。向谁提请选任？王世杰解释说：是由国民政府主席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选任，以维护所谓“法律的系统”。这只不过是为了把“党外人士”来“充任”国府委员会当作装璜门面罢了。（3）“国府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③。它的权力只限于讨论和决定“立法原则”、“实政方针”、“军政大计”等等，而无用人之权。（4）国民政府主席有相对否决权和紧急处置权，等等。

从国民党《提案》的内容看出，它既不愿在当时改组它的一党独裁的政府，也不打算在以后实行真正的民主与宪政，只想在反动政权的基础上，用设置几个党外人士充任国民政府委员或行政院政务委员的“代价”，给反动独裁统治披上“民主”的外衣，获得国民党继续一党专政的合法地位，以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

中国共产党主张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建设独

① “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说明国民党方案概要”，重庆《中央日报》1946 年 1 月 15 日。

②③ “国民党代表团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重庆《中央日报》1946 年 1 月 15 日。

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为了坚持这个方案，针对国民党“扩大政府”的企图，董必武代表共产党作了《关于改组政府问题的报告》，强调指出：“改组政府应有一个共同纲领”，要结束训政，使国府委员会“成为最高决策机关”；“有权决定人选”；政府主要职员大党所占的地位不要超过三分之一”；国府委员人选由主席提交国民党中执会或中常会通过。如此则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形式”，等等①。同时，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明确指出，必须改组政府，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各党派无党派分子，应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一切部门”，使它成为“能够容纳全国各抗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举国一致的、联合的国民政府。”强调“改组后的政府，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应负责协同政治协商会议，商定中国民主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选举法、组织法，并立即根据新的选举法进行选举。”根据新的选举法召开“自由的、普选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正式的民主的联合的国民政府”②。这些主张，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会上，民主党派提出了改组国民政府，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主张。民盟代表罗隆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方案，申述了改组政府的理由：(1)“大家既期望宪政实施，在这过渡时期总希望由一人集权制，过渡到民主集权制”；(2)“结束训政，完成宪政”；“希望各党派能参加政府”；(3)“目前政府行政效率低”。他提出改组政府必须遵循三项原则：“必须有共同纲领为施政共同准绳”；“决策机关，要真能决策”；“各方面人参加执行机关”；“要使它能真执行”。“要是既不能决策，又不能执行，那就违背了我们主张改组政府的原意了”③。接着，罗隆基向国民党代表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

① 《新华日报》，1946 年 1 月 16 日。
② 《新华日报》，1946 年 1 月 17 日。
③《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121—122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如“国府委员由主席提请任党外人士参加，但须经国民党机关通过，这些人是否要向国民党的机关负责？”“国府委员会议是政权机关抑是治权机关？”“主席紧急处置权，紧急两字如何解释”①等等，这些实质上是谴责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个人独裁统治。同时，要求成立联合政府，认为它是中国和平、团结、统一的唯一途径。

第二、关于军队问题。国民党始终坚持“军令政令统一”，强调“军队国家化”，要中国共产党把军队交给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然后再给民主，妄图消灭人民军队。国民党的附庸青年党提出《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宣称“军队国家化实为政治民主化之必要条件，政治民主化复为军队国家化之必要保障”②。青年党代表陈启天对提案作了说明，强调军队国家化的所谓五点“理由”，为“解决国内纠纷，巩固团结”，“集中全国人材精力，加速建设”，“形成完整的国防军”，统一“军令、军政、军训”等等。

共产党坚决反对把人民军队“化”到反人民的国家里的反革命企图。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1)军队国家化必须以国家民主化为前提条件。首先实行国家民主化，然后把军队化于这个民主国家里。如果不是先有国家民主化，还是国民党一党法西斯专政，抽象地先实行军队国家化，就等于把人民军队交给国民党反动派。因此，必须先实行政治民主化，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区军队同时交给民主联合政府和统帅部。

中间集团主张军队属于国家。民盟在会上提出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提案》，强调了整编军队的两大原则。(1)“全国所有军队应即

①《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122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② 重庆《中央日报》，1946 年 1 月 17 日。

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2)“大量裁减常备军额，而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工业建设”①。中间集团某些人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抱有幻想。主张国共双方都交出军队，希望共产党在军事上让步，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

第三、关于宪草问题。国民党坚持实行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通过的由国民党包办制定的所谓“五五”宪草。会上，孙科对“五五”宪草要点作了说明。这个宪草规定人民有四权，即通过国民大会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直接民权。政府有五权，即“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此五种权由政府分别行使，谓之治权”②。即所谓“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权”能”分立。实际上，国民大会是虚的，政府总统权是实的。这样的制度最适合于个人独裁。“五五”宪草的中心是中央集权制和总统制。政府总统有绝对的权力，行政院长，各部部长要对总统负责，总统对立法院有否决权；对司法院有任免权；有统帅三军、公布宪法、决定战争与和平条约等权。这部“五五”宪草是“人民无权，总统万能”。

为此，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提案，认为“五五宪草中规定总统的权力太大，这些都应予以修改”。“希望能制定良好的民主的宪法”③。

中间集团一些人反对国民党的提案，但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内阁制却很欣赏，张君劢等人提出利用国民党五权宪法的形式把监察院作为英国式的上议院，立法院作为下议院，行政院作为内阁。“行政院须对立法院负责”④，而不是对总统负责；“立法院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123—124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年出版。
② “国民党代表孙科对五五宪草要点的说明”，重庆《中央日报》 1946年 1月 20日。
③ 吴玉章：《关于宪法原则问题的意见》，《新华日报》 1946 年 1月 20 日。
④ 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中华民国史丛稿》（增刊）六辑，第 64 页，中华书局， 1980 年 1月出版。

对行政院可以有不信任投票，推翻内阁，另组新阁；行政院如有自信，也可以拒绝立法院的不信任而把它解散，实行大选，产生新的立法院'①。政协宪法小组还提出'省得制定省宪，人民有自由民主等等。罗隆基高兴地说"假使这些修正原则，将来经过宪法审议委员会的工作，都把它们列入宪法草案中，那末，英国的议会制和内阁制不就整套贩运到中国来了吗？'②。当然国民党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等于否定了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政权。

共产党基本上同意这个方案，因为它比国民党法西斯专政是进步的，它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限制了个人独裁，加强了立法院的权力。同时，实行地方自治，共产党可以保持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它是一种过渡的办法，通过政治制度的改革，逐步改造国民党一党专政。

此外，在施政纲领、国民大会等问题上，共产党和民盟、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反对国民党代表的提案，主张重新制定国民政府的组织法、选举法，以便召开自由普选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正式的民主联合政府。

会议期间，没有参加会议的民主党派，在会外也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纷纷向会议提出建议，一月十二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提出立即实现民主，宣布原国大代表无效，修改"五五宪草"，保障人民一切自由，发展民主化经济等七项主张。九三学社筹备会，一月十八日发表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强调开放政权，要求民主自由，切实执行停战令，废除保甲制，释放政治犯等十项主张。民主建国会先后两次提出建议，强调和

① 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中华民国史丛稿》（增刊）六辑，第64页，中华书局， 1980年 1 月出版。

② 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 288 页，中华书局 1961 年 8 月出版。

平民主、改选国大代表，释放政治犯，扶助民营工业等等。

为了加强宣传，扩大政协会议影响，民主建国会决定举办讲演会，并发起“庆祝和平大会”动员群众，争取民主，促使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月十一日，民主建国会和全国救国会等二十三个团体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这个会从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共举行八次各界民众大会，分别由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李烛尘、郭沫若、张东荪、梁漱溟、王若飞等作报告。他们在报告中宣传了政协会议精神，强调和平民主的重要意义，阐述了改组国民政府的必要性，抨击了国民党的扩大政府是“彻头彻尾维持个人独裁的办法”等等。尽管每次会议都有特务捣乱，但群众精神集中，情绪高昂，许多群众纷纷提出开放政权，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基本权利，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等等。这些活动对提高群众觉悟，揭露国民党的破坏阴谋，促成政协会议的成功起了积极的作用。

会议在全国人民的压力、共产党的努力和民主党派的合作下，经过反复的激烈的斗争，终于通过了五项决议。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决议中，确定改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政府，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可以参加政府。规定改组后的国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不但有对方针、大计的决策权，并有对高级官员的任免权。在宪法问题的决议中，确立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的原则。规定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有同意权与不信任权。“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同意、弹劾及监察权”。“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得制定省宪，但不得与国宪抵触”。①

①均见《宪法草案》，《解放日报》1946 年 2 月 1 日，2 月 2 日。

在和平建国纲领决议中，规定全国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之和平发展。在国民大会问题的决议中，规定增加足够数量的新代表，宪法之通过须四分之三的代表同意。它可以保障民主的宪法草案不致被反动势力推翻，有利于政治民主化。在军事问题的决议中，规定依民主政治实行军队制度的改革，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全国军队进行整编。这些决议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愿望，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有利于和平民主团结的。它否定了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统治。这个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密切合作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

第四节　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破坏，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坚持政协决议的斗争

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及其破坏政协的罪行

政协通过的决议是阶级力量对比暂时平衡的产物,因此,各种政治集团对“决议”态度不一样。国民党被迫签字，认为在会上失掉很多东西，它极力抵制决议的实现，并进行破坏活动。

国民党破坏政协是从沧白堂事件开始的。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重庆各界为了促进政协会议的成功，成立了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每天在沧白堂举行讲演大会，邀请政协代表作报告。但是，屡遭国民党特务的捣乱和破坏。一月二十六日，政协民盟代表黄炎培的住宅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非法搜查，“用枪指吓王姓女佣”，“逼问黄炎培藏枪所在，打开文件箱十几口，无所得，迫开锁闭之

卧室，任意翻检”①.

政协闭幕后，重庆二十几个团体，于二月十日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郭沫若、李公朴、李德全、章乃器、施复亮等为主席，到会万人，国民党指派特务进行捣乱，大会主席李公朴等多人被打伤，或被逮捕。接着，二月二十日，国民党又在重庆组织了反苏反共游行。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至十七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在这次会上，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占了优势。他们把政协决议称之为“党国自杀”，叫嚷“不能把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要推翻政协的民主与团结的方针。蒋介石公开号召该会对于政协所通过的宪法原则，“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这样，在法西斯分子操纵下于三月十六日，通过了反对政协协议的五项决议：（1）制定宪法，应用建国大纲为最基本之依据；（2）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用集中开会之方式，行使建国大纲所规定之职权；（3）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4）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5）省无须制定省宪②。这五项决定的目的，就是推翻政协会议决定的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原则，坚持“五五”宪草中的独裁原则。第一项，制定宪法要以建国大纲为基本依据，这是奇谈怪论，宪法不应以某一党的某一文件“为最基本之依据”，这一提法本身就充满了一党专政的味道。按第二项规定，否认了立法院的作用。立法院是长期存在的，能起国会作用，而“国民大会”“每三年由总统召集一次，会期一月”，实际是个人独裁的装饰品，它

① 《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华民国史资料稿》增刊第五辑,第 93 页,《中华书局》，1979 年 1 月出版。

②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之决议》，重庆《大公报》,1946 年 3 月 17 日。

限制不了总统的个人独裁。这条决议表明，国民党顽固地坚持独裁制度。政协决议强调要使行政院成为向国会负责的内阁，但第三、四项的决议却取消了立法院对行政院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法西斯派却要行政院仅仅向总统个人负责。这样，不难看出，总统下面有一个装饰品的国民大会，又有一个不受任何限制的行政院，这是典型的独裁制。第五项规定，表明国民党反动派要取消省的地方自治，而使省成为所谓中央的代表机关，这样，总统不但在中央机关中实行无限制的集权，而且在各省也可以无限制的实行集权。总之，国民党二中全会关于宪法问题的决议，是仍然要维持个人独裁的中央集权制，维持封建买办的法西斯统治。

国民党二中全会还破坏了政协关于过渡期间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的决议。规定“各党派推选的国府委员要经“国民党中常会任选。”并将恢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由“中政会指导国民政府”，这是违背政协决议的。

三月二十日至四月二日，国民党又召开了一手包办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国民党企图利用这次会议的所谓“民意”，把国民党二中全会推翻政协决议的阴谋进一步公开化与合法化。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商讨政协决议和东北问题。开幕式上蒋介石致了训词，四月一日又作了长篇的政治报告，内容有（1）半年来政府争取国际与国内和平的“措施”;（2）东北问题最近之发展；（3）新疆伊宁事件及其解决办法；（4）政协及宪法原则的商讨等等。“报告”的中心是公开撕毁政协决议和东北停战协议。本来已于三月二十七日签订了东北停战协议。但是，由于国民党军及时得到了美国帮助运兵和军火的补充，很快撕毁了东北停战协议，三十一日便向营口、鞍山、四平等地大举进犯。这样，蒋介石在四月一日的政治报告中就叫嚷“东北三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可

言”。说什么：“军事冲突的调处，只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另外，蒋介石在报告中还明目张胆地破坏政协决议，宣称，政协决议案不能代替国民党“训政时期约法”，过去国民党制定的“训政时期约法是根本有效的”。蒋介石还特别强调“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更不能够代替约法。”“如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与全国人民决不能承认的”①。蒋介石报告的目的很明确，政协决议对国民党没任何约束力，他要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

二、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为实现政协决议的斗争

政协通过的决议，共产党是坚决拥护的，并竭力促其实现。

政协闭幕不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向美联社记者谈话说：“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明确指出各党派当前任务：“最重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②。周恩来在庆祝政协会议成功联欢晚会上说“写在字面上的文字要去做，去执行，去遵守诺言”③。朱德在延安庆祝和平民主大会上演说时说：“我们的任务是要使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彻底实现，使民主政治一步步实现，使国内和平一天天巩固”④。

共产党对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国民党特务制造“较场口”事件并捣毁共产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

① 均引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四辑，第二册 10578—第 1—6。
② 《新华日报》1946 年 2 月 13 日。
③ 《新华日报》1946 年 2 月 9 日。
④《解放日报》1946 年 2 月 4 日。

和民盟中央机关的《民主报》社时，中共代表周恩来、民盟代表张君劢立即向国民党交涉，要求政府严惩祸首。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破坏政协决议时，中共中央发言人当即坚决表示：“中国共产党决不动摇地坚持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特别是宪法原则决议，必须百分之百实现，反对有任何修改，并呼吁一切民主人士与全国人民准备为此神圣的任务进行严重的斗争”①。此后，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捍卫和实现政协决议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民主党派对政协通过的决议是坚决维护的。他们认为政协会议的成功，是民主党派的重大胜利，政协路线，就是他们的政治路线。政协会议是“共产党让步多，蒋介石苦恼大，民盟的前途好”②，认为这些决议对实现其民主政治有了保障。

民主党派首先对国民党破坏政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较场口”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中央社于十一日发表消息，肆意歪曲较场口事件，反诬……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刘××等等。”中央日报还叫嚣“解散民主建国会”③。为此，二月十三日，民主建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二十三个团体参加的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向全国同胞控诉书，揭露了国民党制造血案的真相，提出严惩主犯，立即解散一切特务机构，赔偿损失，保证人民自由等七条要求”④。针对国民党捣毁《民主报》及《新华日报》事件，二月二十三日民盟主席张澜致书蒋介石，严正指出，国民党特务制造的事件一次扩大一次，横行无忌，愈演愈烈，是“有计划、有组织，破坏民主团结，反对政治协商

① 《解放日报》，1946 年 3 月 19 日。

② 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230 页，《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中华书局，1961 年版。

③ 《中国民主建国会大事纪》，第 8 页。

④ 《新华日报》，1946 年 2 月 13 日。

之成功”,要求严惩血案主使人,“解散特务组织”,保障人权等①.

他们还坚持政协决议，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暴行。二中全会以后国民党为了坚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在各地制造一系列暴行，迫害坚持和平民主，坚持政协决议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九四六年三月，国民党在西安捣毁民盟西北总支部《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并杀害民盟盟员该报法律顾问王任律师。四月三十日又枪杀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部长李敷仁。（幸未伤要害，被当地农民所救）五月二十九日，民盟向国民党提出抗议，揭露其罪行，要求严惩祸首，赔偿损失。五月初，为了扩大争取和平民主力量，坚持政协决议，反对独裁内战，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民主促进会与上海纺织等四十七个主要人民团体联合组成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并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实行政协决议。六月中旬，正在全面内战迫在眉睫之时，上海人民组织和平请愿团，推马叙伦等十一人为代表赴南京请愿。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各界十万人齐集车站送行，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大游行。当代表在二十三日晚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大批国民党特务的围困殴打，许多代表身负重伤，造成了“下关惨案”。为此，民盟政协代表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揭露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迫害民主人士的罪行。斗争的实践教育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使他们提高了觉悟。“下关惨案”发生后，马叙伦先生在医院握着前来探望他的周恩来的手说：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还有的人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我过去总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要一些枪，现在看来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子弹不能少一粒②。此后,他们坚定地站到人民革命方面，积极参加反蒋反美斗争。国民党特务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李、闻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148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 版。
② 《新华日报》，1979 年 1 月 8 日。

惨案。李公朴、闻一多都是民盟中委，昆明支部负责人。抗战胜利后，坚持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法西斯专政，他们为民主而讴歌，为和平而奔走，置生死于不顾。七月十一日，特务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得知后非常气愤，坚决表示：争取民主和平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决不怕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象李先生那样，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回来。七月十五日在李公朴追悼会上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是历史上最卑鄙、最无耻的事情，愤怒表示“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当天闻一多即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惨案发生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映，七月二十三日民盟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反对“以暴力残杀无武力之在野党派，提出强烈要求惩办凶首和主使者，撤销调查统计局等六项要求。接着，民盟又派梁漱溟、周新民等去昆明调查，尽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阻挠，但在进步同学帮助下，仍搜集了各种罪证。九月三十日发表了《李闻案调查报告》，向全国全世界控诉国民党杀害李闻的滔天罪行。毛泽东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在斗争中光荣牺牲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①。这是民盟和民主党派的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这个时期，斗争的实践，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团结教育，帮助他们认清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本质，使更多的人从对美蒋反动派有一定的和平幻想中清醒过来，他们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而且积极参加了人民革命斗争。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84—1385页，1964年版。

第十四章

国民党破坏第二次国共合作，发动全面内战，共产党关于打败国民党进攻的方针

第一节　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共产党关于打败国民党进攻的方针

一、国民党破坏第二次国共合作，发动全面内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就蓄意破坏第二次国共合作，他们不仅破坏停战协定，撕毁政协决议，而且变本加厉地准备内战和向解放区举行全面进攻。在东北，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国民党先后侵占四平、长春、吉林等地，使东北的内战达到高峰。接着，又把战火引向关内，向各解放区大肆挑衅和进攻，到六月底，国民党已将其正规军的百分之八十（即一百九十三个旅）约一百六十万人调集到内战前线。

六月中旬，国民党在完成了全面进攻的准备之后，为了制造借口，向共产党提出极其荒谬的五项条件，蛮横无理地要人民军队退出下列各地："（1）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2）胶济路全线；（3）承德和承德以南的一切地区；（4）东北的大部分；（5）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后共产党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里解放

的一切地区”①。并声明共产党如不退出上述地区，则国民党政府不能考虑停战问题。中共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为了阻止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后破裂，于二十一日向国民党提出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等四项建议，但国民党顽固拒绝，并于六月廿六日悍然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马歇尔也宣告他“调停”失败，放手让国民党大打共产党，暴露了帝国主义者的原形。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一方面呼吁无条件停止冲突，重开政协会议，反对美帝助长中国内战；另一方面庄重表示：“如果贪得无厌的反动派一定要挑战，那么，就让我们准备着把一切敢于挑战的反动派打回去”②。从七月到九月，国民党军队又相继向苏皖，山东、晋察冀、晋绥等解放区大举进攻。十月，对东北各解放区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同时，继续以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这样，国民党就完全破坏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面大内战。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共双方力量的对比，国民党军事力量明显占暂时的优势。当时国民党兵力包括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特种部队、海军、空军、后方军事机关等总计约四百三十万人，军队武器装备和物资供应大大超过了解放军。国民党统治着三亿人口以上的地区，控制全国所有大城市和绝大部分交通线，接收了日本侵华军队一百万人的全部装备。

人民解放军方面，当时全军只有一百二十万人，武器装备远远不如国民党军队，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没有飞机和坦克。

①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大事月表》第 21—22 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

② 《解放日报》，1946 年 7 月 7 日。

解放区只有一亿三千多万人口,还没有联成一片,其中大部分地区的封建势力还没有肃清,土地改革刚刚开始,后方还不够巩固,又没有外援，一切靠自力更生。当时人民革命力量处于劣势。

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依恃其军事力量的暂时优势，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猖狂向解放区进犯，企图一下子把解放军打得一蹶不振，全部占领解放区。战争一开始就采取了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狂妄地宣称，在四十八小时内消灭中原解放军，两个星期占领苏北，三个星期打通津浦路和胶济路。十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中共军”,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在国民党大举进攻面前，中国共产党只有拿起武器进行战斗，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二、共产党关于打败国民党进攻的方针

在国共军事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有些政治投机者、政客，如张君劢等人，被国民党表面强大所吓倒，投靠了国民党反动营垒。有些中间派的朋友，对人民力量表示怀疑，对美蒋反动派表示恐惧。革命队伍中有的人也对敌人力量估计过高，过低估计了人民的力量，不敢拿起武器进行革命战争。在国际友人中间，有人惧怕美国出兵和原子弹，甚至认为中国内战的爆发，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在这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是拿起武器，坚决领导人民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还是屈服于敌人的压力，丢掉人民胜利果实，不敢斗争，这是关系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

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中共中央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

攻》的指示，坚定地指出，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战争，如果我们不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会变成黑暗世界，只有用自卫战争，打败国民党的进攻，中国才有和平民主的希望。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因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①。国民党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国的援助，都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人民解放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性质，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起决定的因素，是我们战胜国民党的政治基础。为了阐明共产党的根本的战略思想，一九四六年八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中，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②。毛泽东还认为，把一切反动派看作纸老虎，这是从战略上说的，是革命人民的一个根本战略思想。革命者必须在战略上，全体上，蔑视敌人，敢于同貌似强大的敌人作斗争，敢于取得胜利。但同时，在战术上，在策略上，在每一个具体战斗问题上，要重视敌人，善于斗争，要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一步一步地消灭敌人。毛泽东的这一科学论断，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了胜利的信心。

一九四六年七月和九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指示中，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083 页，1964 年版。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091 页，1964 年版。

具体制定了战胜蒋介石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

关于政治方针，指出“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密切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农村，要紧紧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为了减少敌对分子，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在城市，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注意团结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总之，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建立最广泛的反蒋反美的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

在经济上，必须作持久打算，依靠自力更生，十分节省人力物力，力戒浪费，努力生产。

关于军事原则，必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这一作战原则要求解放军在战役、战术的部署上，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首先歼灭敌人较弱的一部分，然后各个歼灭敌人。作战的基本形式，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摆脱被动，争取主动。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解放军歼敌制胜的唯一正确方法。只有这样，在全局上暂时处于劣势地位的解放军，才能保证在局部上的优势，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才能使解放军积小胜为大胜，由局部优势变成全局优势，直至最后消灭敌人，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人民解放军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决执行正确的军事原则，经过八个月（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六十七个旅，约七十一万余人，从而粉碎了国民党

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国民党在全面进攻失败后，为了挽救军事危机，于一九四七年一月，通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共产党提出恢复“和平谈判”，要求实行“现地停火”，企图休整兵力，再作进攻。为了揭穿国民党的新骗局，中国共产党提出恢复谈判必须实现：（1）废除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制定的伪宪法；（2)国民党军队退出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停战协定生效后所侵占的一切土地。国民党的“和平”新骗术被揭穿后，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强迫军调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叶剑英撤回延安。接着又迫使中共留住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董必武、吴玉章和其他工作人员，限期于三月五日前全部撤退。随即宣布：以后如再发现中共党员，即作为匪徒间谍治罪。从此国民党完全关闭了谈判大门，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对此，中共中央负责人于三月三日发表评论，严正指出国民党“最后地关死一切和平谈判之门，妄图内战到底，实现其武力消灭中共及全国民主势力的阴谋”；“已走到了绝路，一切后果应由它负责”①。民盟也于三月八日发表宣言，对国共两党正式宣告和谈破裂表示“痛心”。他们从民族和人民利益出发，愿意继续调解国共关系，不怕当局迫害，坚决表示：“吾舌尚存，必发为言论，吾笔未秃，必写为文章。吾人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之定力，实本吾人有‘苟利于国死生以之’之决心，如定欲横加诬陷，甚而迫害之，则眼前之刀锯斧钥，决不苟避幸免”，“仍愿为恢复和平而努力”②。

国民党全面进攻失败后，被迫于一九四七年三月改为重点进

①《解放日报》，1947 年 3 月 3 日。

②《中国民主同盟为和谈正式破裂发表宣言》《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308—309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年出版。

攻。主要进攻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目的是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振奋军队士气和安定民心，并妄图用进攻两翼的办法，把解放军压缩到华北平原进行决战。从三月至六月的四个月作战，国民党占解放区城市九十五座，解放军收复和解放城市一百五十三座，歼敌四十万人。

经过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一年的英勇作战，解放军共歼敌九十七个半旅，一百一十二万人，粉碎了国民党的战略进攻。国民党军越打越弱，人民解放军则愈打愈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深刻的失败情绪，鼓舞了解放军和全国人民的斗志，奠定了解放军歼灭全部国民党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

三、民主党派反对内战。民盟一届二中全会。中国人民救国会的革命活动

（一）民主党派反对内战

国民党发动的全国大内战，不仅遭到共产党的坚决反抗，也受到民主党派的一致反对，他们纷纷发表宣言、意见，谴责内战。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宋庆龄发表对时局的重要主张，指出，内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混乱、饥饿与破坏”；“城市与农村隔绝”。必须立即扑灭内战的火焰。认为广大农民拥护共产党，断定国民党不能在内战中取胜①。八月，民盟代表就当前时局在沪招待记者会上发表谈话指出：“中国今天正遭受着一个历史上空前大规模内战”。要求政府实施政协决议，一面要停止全国内战，一面要重开政协会议。明确表示，民盟坚决反对国民党以执行政协决议为名，行破坏之实，使中国扩大内战，造成分裂②。九月

①《解放日报》，1946 年 8 月 2 日。

②《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215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年出版。

三日，九三学社发表反内战宣言，指出，“内战愈演愈烈，主权丧失不已。经济濒于崩溃，民生困苦已极，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据此，提出国共双方应立即全面停战，停止一切破坏工作，实行《政协决议》，改组政府等六项主张①。十月三十一日，九三学社鉴于当时时局之严重，又发表六点意见，强调恢复和平谈判，永远停止内战等②。民主建国会于同年十月十一日发表《对当前时局的意见》，谴责内战，要求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全面停战。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国农工民主党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内战爆发后，“中华民族自相残杀的悲剧，今后将愈演愈烈，中华民国的国格，愈将扫地”。提出反对内战，反对分裂，国共问题政治解决，保障人权等主张。

一九四七年三月，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坚决反对内战，强烈谴责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指出，“中国到了今天，无论就整个国家民族来说，或就执政的国民党来说，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不可收拾，必然会走上‘总崩溃的道路”。李济深提出了挽救时局的七点意见：（1）政府必须放弃武力统一政策，双方立即停火；（2）重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中央及地方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3）重新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一部真能反映全国民意的宪法；（4）维护国家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5）立刻大量裁军、减政；（6）保护民族经济，取缔官僚资本；（7）恢复孙总理革命精神，改造中国国民党，废除党内独裁，保证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建国③。李济深的声明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民主党派都拥护李的声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①《新华日报》，1946 年 9 月 3 日。

② 《新华日报》，1946 年 10 月 31 日。

③ 《李济深将军在香港对时局意见及各方反响，关于所谓“违反党纪’及反响》第 2、4—5 页。南联社，1947 年出版。

香港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中国国民党之危机，乃在党内极少数顽固分子把持党务，假三民主义之名，以遂行其反三民主义之实”。要求国民党采纳李将军的意见，并表示“愿与党内外各民主人士共同努力，以促其实现”①。中国民主促进会指出，中国弄到这种地步“应由独裁者负责”，对李济深的主张“我们完全给他诚挚的同意”②。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港澳总支部以及何香凝、朱学范、彭泽民等均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蒋介石，完全支持李济深的主张。

但是，国民党中常委却认为李济深的言论“有背党纪”，诋毁蒋主席及政府”决议予以“惩处”。这一消息传出后，震动很大，各方面纷纷反对。何香凝指出：“李任潮先生根据这些事实”，“以党员的资格批评蒋先生，正是他们忠于党”。明确指出“对于残暴的执政者，人民岂但可以忠告批评，起来革命也是应该的”③。彭泽民列举十项事实说明真正违反党纪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李济深。强调指出“李济深将军并非犯孙中山的国民党纪，而是犯蒋介石独裁的祸民党纪”④。

（二）民盟一届二中全会

一九四七年一月六日至十日，民盟在上海召开了一届二中全会。到会的中央委员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 36 人。会议听取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中央各部门、地方组织的工作汇报。全会通过《目前应采取的政治主张及行动的决议案》和《关于现况下的组织原则的决议案》。

会议政治报告和决议有以下主要内容：

①② 《李济深将军在香港对时局意见及各方反响，关于所谓‘违反党纪’及反响》第 6、9 页，南联社，1947 年出版。

③④《李济深将军在香港对时局意见及各方反响，关于所谓‘违反党纪’及反响》，第 34—35、39、33 页，南联社，1947 年出版。

第一、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确定了民盟对国事的方针。全会认为由于国民党的好战分子迷信武力，坚持武力接收政权的错误政策，因而造成“去年一年的战祸”。国民党进行的和平谈判是“以和养战”。国民党政府现在已经是一个“百孔千疮的政府，在经济破产的关头，还要进行内战，其势必愈战愈弱。”国民党召开的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和将要拉拢一、二个小党成立的新政府，是“一党专政的伪装”，是为了以此换得美国的援助。全会认为国民党这样做下去，“必定是一个不可收拾之局”。

全会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被迫起来进行自卫的，共产党对待和平谈判是“以战养和”。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正确的军事方针，在半年多时间里已消灭国民党军队相当大的一部分主力，“中共必愈战愈强”。

全会指出，美国对华政策是错误的，已经激起了中国人民广泛的反美运动，美国政府对此应负责任。希望美国政府了解中国人民的愿望，更改对华政策，撤退在中国的驻军。

全会基于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提出了解决国事的四项主张：(一)努力促成国共和谈；(二)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三)实行政协决议；（四）成立联合政府。

第二、全会为加强民盟组织建设，对于跨党问题和组织原则问题做出了下列规定：

关于跨党问题，全会决定撤销《调整盟内党派问题试行办法》，重新做了如下规定：（1）有党派盟员和无党派盟员的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2）有党派盟员应有“民盟第一”的组织观念；(3)有党派盟员，如果原有党派之政治路线与民盟政治路线相违背时，应表明态度，脱离原有组织。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又规定了民盟的组织原则：（1）上层争取公开合法，下层采取秘密活动；（2)宣传争取公开合法，组

织保持秘密方式；（3）简化总部，侧重地方；（4）提高盟员的素质，扩大盟员的群众性活动，扩大政治影响，推动民主运动①。

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成员，经过一年来的实际教育，认识到国民党应负内战责任，美国对华政策是错误的，共产党是被迫进行自卫的。这是民盟在政治上的重要进步。它极大地推动了民盟的反蒋反美斗争。

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过程中，民盟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四五年十月，民盟一中全会决定建立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南等五个区总支部。民盟一大后，盟的组织由西南、西北向全国各地发展，特别是华东地区得到很大发展，成为民盟活动的中心。一九四六年四月，民盟中常委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国民主同盟国内外总支部组织规程》、《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入盟办法》等文件，具体规定了总支部分部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入盟和退盟的办法，进一步推动了民盟组织的巩固和发展。到一九四八年三中全会时，民盟在国内外已经有了五个总支部，四十六个支部。

南方总支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正式建立，创办《人民报》为机关刊物。建立以李章达为主委的总支委员会。华北总支部，是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月改建的。张东荪为主委，领导平、津两市和河北省盟务工作。西北总支部，在民盟一大后派中常委杜斌丞兼任总支部主委，先后建立甘肃、宁夏、山西三个省的特派员办事处和西安市支部，会员有一千余人。西北民盟总支部与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开展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西南总支部，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建立筹委会，由潘大逵任主委，领导川、康、滇、黔四省的民盟工作。东北地区民盟总支部筹备组在抗战胜利后到东北筹建时，由高崇民任主委，领导辽、吉、黑三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293—294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省民盟工作。一九四六年二月、四月先后成立南京、上海民盟支部，为中央直属支部。

（三）中国人民救国会的革命活动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冬，集聚在重庆的救国会员开会，鉴于抗战已经结束，民族解放的政治任务已经完成，决定将名改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其宗旨为“团结国人，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民主新中国”①。它的政治纲领是：当前的任务是彻底消灭内战，加强团结，在和平、统一、团结、民主的基础上，实行一切民主改革，经过政治协商会议，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

会议推举沈钧儒、陶行知、史良、曹孟君、李公朴等七人为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为主席，史良任秘书长，陶行知任组织部长，邓初民为宣传部长。

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沈钧儒发起创办了实际上是救国会的言论机关刊物《民主生活》周报。一月十日，沈钧儒作为民盟内部救国会的代表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党召开伪国大时，沈钧儒、史良、沙千里、邓初民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和谈话，谴责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邓初民指出，伪宪法是“掩护反动专制的外衣”是一堆废纸”②。

救国会鉴于民盟二中全会决议取消党派盟员，以后盟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决定以自己的名义公开活动。为此，中国人民救国会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在上海召开一届二中全会。 会议讨论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任务，通过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一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宣言》。

宣言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和平民主的前途是光明灿烂的。

①周天度编：《救国会》，第39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出版。
② 邓 初 民 ，《廓清宪法问题上一切乌烟瘴气》，《文汇报》 1946年 12月 25 日。

对国内，指出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十个多月的事实说明蒋介石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不但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国民党也无法支撑下去，因此，这是“一条残酷的悲惨的绝对走不通的道路！”①

宣言指出了中国人民救国会今后的任务：“与国内各民主团体，共同努力，以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早日实现”②。为此，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反对外国侵略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中国的问题应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③。第二、反对国民党以军事求统一的政策，要求停止内战，实现永久和平。第三、争取人权的保障。第四、争取生存的保障，反对征兵、征粮、增捐增税。宣言最后满怀信心指出，人民民主力量的发展，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壮大，和平民主事业必能成功。

第二节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联合抵制“国民大会”，拒绝参加“国民政府”

一、“国民大会”的召开与“中华民国宪法”的通过

国民党蒋介石被战争初期争城夺地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侵占张家口的当天，下令单独召开所谓“制宪”的“国民大会”。按政协决议，真正的国民大会应当在内战完全停止，政协各项决议已付诸实施，人民自由权利已获得保障之后，由改组后的各党派共同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召集。但是，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导

①②③ 周天度编：《救国会》，第413、4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演下，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于十一月十五日在南京开幕。

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目的，一是想要在“国民大会”上，假借所谓“民意”，通过一部伪“宪法”，使其反动独裁统治“合法”化，使内战“合法”化；一是想要召开“国民大会”，改组政府，用高官厚禄拉拢收买中间党派，以孤立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大会召开前夕，国民党不惜用大量金钱和高官厚禄，对某些中间人士进行收买。青年党早在政协期间就已从民盟中分化出去，成了人们唾骂的“狮子狗”。现在，又积极参加伪国大。民社党一些人也参加了“国民大会”，投靠了国民党。少数的所谓“社会贤达”如王云五、傅斯年、胡霖等也都卖身投靠，参加了伪“国大”。国民党为了多拉一些中间派下水，曾把大会延期三天召开。这对中间派一些人士确实是一次严重的政治考验。

参加伪“国大”的代表，前后共一千六百多人，国民党占百分之八十五的席位，绝大多数代表均系十年前由国民党用指定、圈定、贿选、舞弊等方法产生的。

伪“国民大会”中心内容是制定宪法。蒋介石对此十分关心，他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到会发表“宪草”演说：“我个人本来没有政治的欲望和兴趣，而且我今年已经六十岁，就更不能象过去二十年一样担负繁重的任务，所以必须将国家的责任交托于全国的同胞”，表示要“还政于民”。但马上又说：“目前多数人民还没有行使政权的能力和习惯”。“如果这样毫无保障，就实行五权宪法，我个人认为非常危险。”而且“恐怕将来掌握治权的人”，不能“以国父之心为心”，必须实行“训政”，继续以“治权保护政权，培育政权，养成人民行使政权的能力和习惯。”将来“实行五五宪法，最好由国父本人来行使”。“假如我自己行使五权宪法，我一定能以国父之心为心。”他继续要坚持个人独裁。

伪“国大”通过了一个《中华民国宪法》。按政协决议，宪法草

案只应是以政协宪法审议委员会所修正的“宪草”，作为提交国民大会的唯一的宪法草案。但是，蒋介石的伪“国大”却是以一九三六年国民党包办制定的‘五五宪草’修正案作为‘制宪’的基础。这部伪宪法，共十四章，一百七十五条。为了欺骗群众，表面上塞进一些民主自由的词句，实际上是一部独裁的宪法。

民主的宪法，最主要的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政协通过的宪法草案明确规定：“凡民主国家人民享受之自由及权利，均应受宪法之保护，不受非法之侵犯”①。伪宪法虽表面上也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但在二十三条又规定“以上各条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②。用“除外”二字将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一笔勾销。

民主宪法应当是人民自治权利的保障书。各党派通过的政协决议明确规定‘省与中央权限之划分依照均权主义规定。’‘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③等等，以保障人民实行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但是，这个伪宪法不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是以中央集权为出发点。伪宪法第一〇八条规定由中央制定‘省自治通则’，作为省县“自治法”制定的依据。第一百十一条还规定，在发生争执时，由中央“立法院解决之”，地方只能俯首从命。

民主的宪法应该对中央制度采取责任内阁制，即议会内阁制。政协决议规定：立法院为国家立法机关，其职权相当于民主国家之议会，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伪宪法表面上维持着立法院对行政院的‘同意权’和‘不信任权’，好象维持着责任内阁制。但实际上国民党掌握着行政院，而立法委员绝大多数又是国民党

①③ 《宪法草案》，《解放日报》，1946年2月2日。
②《国民政府法规汇编》第十九篇。

员。在这种情况下，立法院对行政院不会起什么制衡作用，它的行政院仍可以成为总统个人独裁意志的执行机关。

这是一部“人民无权，政府有权；地方无权，中央有权；立法无权，总统有权”的维护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的伪宪法。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宣布改组他的政府。国民党政学系首领，老亲日派张群代替宋子文做了行政院长，背叛政协的反动政客王云五为副院长，曾琦、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为国府委员、政务委员、部长。美蒋反动派宣称改组后的政府是“自由主义’的‘多党政府”；“介乎训政与宪政之间的政府了”。实际它是维护独裁统治的工具。

二、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大会”，拒绝参加‘国民政府”

国民党召开的伪国大和通过的伪法，完全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独裁、卖国专制的法西斯本质，因而，遭到了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强烈反对。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发表《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指出‘这一‘国大，是违反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这一党‘国大，还要通过一个所谓宪法，把独裁‘合法，化，把内战‘合法，化，把分裂‘合法，化，把出卖国家与人民利益‘合法’化”。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他最后表示“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①。十二月二十五日伪国大闭幕后，中国共产党声明：蒋记国大及其制定的蒋记宪法均属非法与无效。

伪国大召开前夕，各民主党派就反对国民党单独召开伪国大。

① 均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42—24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民盟发出关于参加国大问题的声明：“民盟历次宣言，拥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唯一依据，同人等愿竭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召开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以后，即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以前，暂不参加”①。当日晚，民盟主席张澜亲自从重庆打长途电话给留京政协代表团，再三强调说：“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绝不可稍有变动”②。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重庆分会、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分会、九三学社重庆分社等二十一个人民团体，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日，联合发表“我们对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呼吁全民起来制止国民党当局的分裂行动。指出，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事关国家百年之大计，尤关国家之团结和平与其内战分裂，尚望全国同胞，共起图之。”③

伪国大开幕后，十一月二十五日，民盟在南京招待记者，发表书面谈话，除阐述民盟不参加国民大会的理由外，并明确表示：“此次政府公布之‘政协宪草’，渠表示民盟不予承认，且对该宪草若干条深表不满，声明保留批判权利”④。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对伪宪法的声明，深刻指出，国民大会通过的所谓“民主宪法”，“企图借此欺骗国内外不明真象的人士，并向美国继续骗取军事的、财政的以及其他种种的援助，用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继续扩大并延长战争，把人民送上死路，国家送上绝道。”“对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做法和企图”，“表示坚决的反对”⑤。同日，

① 《中国民主同盟大事纪》，第83页，民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46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③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0日。
④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5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⑤ 上海《文汇报》1947年1月1日。

民盟中央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伪国大制定的伪宪法”①.

国民党的改组政府也遭到了民主党派的强烈反对。一九四七年四月，农工民主党留港中委发表对改组政府的意见，尖锐指出改组的目的‘不在立信于民,更不在求国际之和平合作,而在见信于美国之独占资本，以取得借款作支持其反人民反民主的统治。”指出‘国民党专政二十年来,改组政府是常见之事”;‘改组的一方是转移人民、分散人民、和缓人民；另一面集中官僚和暴力，加紧镇压，巩固军事法西斯的统治核心为其一贯目的”②。四月十二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发表对政府改组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四月二十五日，民盟发表对时局宣言，深刻揭露了改组后国民政府的性质，并对改组的政府表示坚决反对。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等民主党派也纷纷发表声明，反对国民党改组政府。

国民党原来想通过伪国大的召开和伪宪法的制定，使其独裁、内战、分裂、卖国合法化，孤立共产党和打击民主力量，但结果是‘搬起石头打自己脚”,使自己在人民中更加孤立。

三、青年党、民社党公开投靠国民党

自从民主政团同盟改成民主同盟以来，一些青年党分子退出了民盟，左舜生也不参加民盟的任何会议。抗战胜利后，青年党为了应付战后的新局势，重振阵营，健全组织，扩大宣传，随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重庆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有十七省区代表。会议修改纲领，重颁政纲，改选了领导，曾琦任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启天任秘书长，李璜任外务部长，杨永浚任内务部长，左舜生任宣传部长，余家菊任训练部长，常燕生任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

①《中国民主同盟大事记》第84页，民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②《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四辑）第26页。

大会发表了宣言。指出当前的急务“:其一,在各方面一致放弃武力万能的迷信，而以军权属之于国家；其二，在从速树立一现代民主国家的体系，而使全国人民可以振奋兴起；其三，若干社会领导人士，尤宜共体时艰，相忍为国，毋徒取快一时，而以国家为孤注之一掷；其四，必使现代政党与现代政治家有在中国生存与发展其能力的可能”①。

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青年党与国民党合谋，分裂民盟，在国民党的支持下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为国民党助长反动声势。在会议期间，青年党站在国民党立场上极力吹捧国民党。胡说什么,在国民党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坚固如泰山之不可动摇,强寇因此而击退,抗战因此而胜利。”强调要与国民党“一德一心,同舟共济”“合作建国”②。随后，他们又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把人民军队“化”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青年党积极参加伪国大。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该党宣传部长左舜生发表谈话,指出“民盟既作暂不参加之决议,中共力主停开,吾人为促成民主宪政之实施”“不愿引起全国日陷水深火热之人民，发生过度失望之感，始将本党代表名单，毅然提出”③。青年党有一百二十多人参加了伪国大。

青年党还积极参加了国民党的改组政府。早在国民党政府“改组”前,青年党就已参加了,先是从立法、监察两院开始的。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国民政府发表新增立法院委员五十名“内有青年党十三名”。新增监察院委员二十五名“内有青年党五名”。新选的国民参政员，青年党有十一人。曾琦还当上了国民党政府新

① 《中国青年党史略及政纲》，中国青年党广东省党部编印， 1947 年元旦增订版。

② 重庆《中央日报》1946年 1 月11日。

③ 《中华时报》，1946 年11 月 16月 。

成立的宪政实施促进会的副会长①。在参加立监两院之后，青年党与国民党进行了关于全面参加政府的谈判，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于四月十七日，签署了十二条施政方针。接着，国民党宣布改组他的政府，青年党马上发表参加政府声明，表示愿意参加新政府，与国民党共同“分担责任”，“共同努力”，以推进民主，“安定国家”②。青年党一些主要头目，先后参加了国民政府，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曾琦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大会筹委会副主任、总统资政，左舜生担任过农林部长，李璜被推任为经济部长，因健康不佳未就任，后由陈启天出任经济部长，余家菊任国府委员，常乃德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后改聘为国府委员。

青年党还参加伪行宪国民代表大会，并发表《青年党参加行宪‘国大,声明》,表示:本党为协助行宪,实现民主,完成建国大业，参加国大实属义所当然”，“故本党决然参加国大，以襄盛举”③。随后，表示支持蒋介石为第一任大总统候选人。四月十八日，青年党就行宪首届总统、副总统选举发表声明，表示“本党应时势之需要，顺人心之要求，决定支持现任政府主席蒋中正先生为行宪第一任总统，以担当促进民主、戡乱建国之重任”④。当蒋介石当选为大总统时，青年党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发出贺电，表示祝贺：“本日国民大会选举先生为行宪第一任大总统，群伦爱戴，征民主之舆情，国运昌隆，卜共和之盛世。请电驰贺。”⑤

青年党还为国民党的反革命内战出谋划策。如他们认为“国军的武器精良，装备齐整而且训练有素”，建议国民党“与共军作

① 柳下、燕生编著：《中国青年党史及政纲》，上海大光明书局 1947年 7月版，第48—51页。
② 《中国青年》周报第二十八期第一版， 1947 年 4 月 26 日。
③ 《中华时报》，1948年 3 月 29日。
④ 《中华时报》，1948年 4 月 19日。
⑤ 《中华时报》，1948年 4月20 日。

阵地战，作城镇争夺战”①，以便取胜。同时，还提醒国民党，注意“共军流窜”；“共军弃了延安，凡属邻近陕西省份的地方政府和民众，更应该加意警觉！”②他们认为国民党采取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总体战”虽好，但“不是治本办法”；“不易获取决定胜利”。因此，建议国民党要它制定“思想戡乱的治本方案”；“使举国上下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对戡乱建国的中心思想信守不渝，庶不致为中共世界革命的邪说所动摇”③。他们还给国民党出主意，把群众组织起来，参加训练，编写宣传材料，要国民党攻击、污蔑共产党为“父子相砍”；“母子相淫”，搞“清算”斗争”；“五分钟解散家庭”。他们恶毒地攻击共产党的目的是企图以此达到人们“对共产党之恶劣印象，认彼为狰狞可怕之恶魔，内乱外患之罪犯”，使“人人得而诛之”④。清楚地暴露了青年党的反革命本质。

民社党在伪国大召开的前夕也公开宣布投靠国民党。中国民主社会党是由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张君劢）与民主宪政党（领导人伍宪子）合并组成的。一九四六年八月，国社党与民宪党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合并，改名为中国民主社会党。其主张由原来的“国家社会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提出“民主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的经济”，妄图建立超阶级越党派的政府，以所谓“公道原则，法律手续，转移私有财产，逐渐达到社会主义”⑤。会议选出组织委员七十二人，成立组织委员会，张君劢为组织委员会主席，伍宪子为副主席。一九四七年七月，民社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君劢任该党主席。

张君劢（一八八七—一九六九）原名嘉森，江苏省宝山县

①② 《新中国日报》社论《国军攻克延安》，《新中国时报》，1947年3月21日。

③上海《中华时报》社论《思想戡乱》，载该报1948年11月23日。

④ 曾琦：《与段之桓论组训民众书》，《青年中国周报》第67期，1948年9月5日。

⑤ 《中国民主社会党纲领》，《中国民主社会党专辑》，再生社1946年12月版。

人。早年留学日本、德国。一九一六年任段祺瑞政府的“国际事务评议会”书记长，后任北大教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被称为“玄学鬼”。一九三二年五月出版《再生》杂志,宣传‘国家社会主义”,主张改良,反对阶级观念和暴力革命。一九三三年与张东荪等人成立“国家社会党”，担任该党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抗战初期散布投降空气，积极反共。他拥护国民政府抗战，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民社党积极参加伪国大，大会召开前夕，张君劢在民盟曾多次表示要坚守政协决议，决不单独参加国民大会，但不久即受国民党的拉拢，不顾民盟的劝阻，竟于十一月二十日致书蒋介石，表示：“在此还政于民之日，自当出席以赞大法之完成’①。并于二十三日向国民党递交了民社党出席伪国大代表名单，公开投靠国民党。为此，民盟中常委会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召开第十一次会议，讨论民社党出席分裂的国民大会问题，“会议决定，民社党参加伪国大，违反盟纪，对盟内的民社党成员参加伪国大者，一律开除盟籍’②。这时民社党已呈现四分五裂状态，张东荪等人不同意参加伪国大，退出了民社党，张君劢与伍宪子等人分为两派。

民社党还积极参加国民党的改组政府。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七日，张君劢代表民社党，曾琦代表青年党与国民党签订了所谓“新政府之施政方针”十二条，并向国民党提出民社党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名单，为国民党“改组政府”装璜门面。

民社党还积极参加国民党的行宪伪国大。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张君劢与曾琦交换意见，结果：“(1) 两氏共认蒋主席为适当之第一任大总统人选，决定予以支持。 (2) 宪法未经实行绝对不

① 1946年11月20日张君劢致蒋介石的信，《中国民主社会党专辑》，再生社1946年12月版。

② 《中国民主同盟大事纪》第84页，民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宜修改”①。民社党还发表了“对于办理选举总统及反对修改宪法之声明”，称赞“此次办理选举为中国历史上创举”。吹捧蒋介石说，“本党同仁等认为蒋先生之领导地位为二十年之史实所造成，当此国步艰难之际，总统之人选非蒋先生莫属”。表示“此届总统候选人应一致拥戴蒋先生”②。声明还表示“此届国民大会系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而选出而召集，对未付诸实行之中华民国基本大法不应轻言修改”。“本党为维护宪法之尊严，为保持国家之基本，绝对同情蒋主席在国大开幕词反对修改宪法之主张”③。最后奴颜婢膝地表示：“本党同仁深愿国民党担负建国之重责，而预祝其成功”，本党愿“竭绵薄之力，掬诚挚之心以助其成功。”④

青年党、民社党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关键时刻完全投入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怀抱，变成了国民党的御用工具，成为社会上人人卑视的无耻之徒。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统区的工作方针。民主党派参加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统区的工作方针。民主党派参加、推动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以后，美蒋签订一系列条约。同年十一月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是一个

① 《中华时报》1949年4月11日。
② 《中国社会党》第1页，再生社4月11日。
③④ 《中国民主社会党》，第2页，再生社1946年出版。

大量出卖中国主权的条约。在中美商约后，又签订《中美航空协定》、《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美国在华教育基金协定》、《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中美农业协定》等。这些协定都是“中美商约”的扩大化和具体化。蒋介石国民党用出卖中国主权换取美国援助，又利用美援大打内战，加给全国人民无穷的灾难。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政府所长期施行的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现在被空前的卖国条约即中美商约所加强了。在中美商约的基础上，美国的独占资本和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其结果，就是极端的通货膨胀。空前的物价高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这种情形，迫使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救死而斗争”①。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指出：在国统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引起人民的不满，有利于群众斗争的发展。“全党必须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②。在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的具体领导下，城市和农村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军事斗争。一九四六年八月下旬至十一月，有五十万工人卷入工潮。一九四六年底至一九四七年一月，由上海摊贩斗争和北平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反美反蒋斗争，标志着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底，上海摊贩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当局“取缔摊贩”命令的斗争。十二月，北平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罢课、示威，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学生运动得到了市民的支持和同情。接着，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大城市学生起来反对美军暴行。南京学生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抗暴运动到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21—1122页，1964年版。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04页，1964年版。

一九四七年二月已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革命风暴，参加人达数十万，运动规模已大大超过“一二九”和“一二一”运动的规模。这一运动迅速得到城市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和响应。

各民主党派积极参加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纷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暴行，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中国致公党在《反对美军继续驻华事发表声明》中，揭露美国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野心，表示中国人民“岂容美帝国主义者肆其野心，是以本党恳切呼吁全国民众急速起来，誓必令美军全体即行撤离中国，以固我主权”。声明谴责国民党政府竟公然不顾国家之权益，违反人民之意志，而“引狼入室”、“为虎作伥”、“此种卖国求荣之行为，实为人民之公敌。若政府不临崖勒马，……是无异自绝于国人，则本党与全国人民当鸣鼓而攻之。”① 在抗暴运动中，一九四七年春，上海三区百货业职工会发起“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二月九日在南京路劝工大楼举行讲演会。民盟中委邓初民等出席讲演。国民党上海当局出动军警特镇压，造成“二九血案”。惨案发生后，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发表声明，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恐怖镇压行为，严惩肇事者，组织了“二九惨案后援会”。二月十五日“后援会”举行各界及记者招待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马叙伦在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国民党当局查明事件，惩办凶手，保障人权。民主建国会捐款数万元，支援上海商业职工。

中共中央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指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

①《华商报》，1947年5月4日.

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①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要组织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②。

在国统区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贯彻中央指示，发动城市各阶层群众参加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一九四七年五月，学生界又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五月四日，上海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喊出了“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同时上海八千工人、学生包围国民党警察局。这一爱国民主运动，立即得到南京、北平、沈阳、青岛、开封等许多城市的响应。五月二十日，京沪苏杭十六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六千余人在南京联合请愿，提出增加伙食费和教育经费的要求，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造成“五二〇惨案”。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工人、教育等各界的支援和参加，使反美反蒋斗争迅速发展到全国六十多个大中城市。一九四七年，仅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主要工业城市，参加反美反蒋罢工和示威的群众竟达 120 万人，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反美反蒋的浪潮。

各民主党派积极参加、推动这一运动向前发展。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及各地方组织积极声援学生的爱国反蒋斗争。南京民盟总部以慰问金名义捐款支持南京中央大学学生的罢课斗争，并派盟员赴各校联络，支援中大学生的斗争。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中国农工民主党领导人章伯钧、中国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轮流到南京中央大学等校讲演，赞扬学生运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释放上海全体被捕学生，严惩凶手，反对军警进入学

①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107、1109 页，1964 年版。

校，反对军警干涉学生开会。九三学社北平分社联合北大教授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发表《北京大学教授宣言》，指出："青年学生所呐喊的反内战、反饥饿，正是代表全国人民一致的呼声。我们应该同情。"并正告国民党当局："青年学生运动的起因是不满现实，唯有改变现实，才能平息他们的不满。推诿与压制则结果适得其反。"①

各民主党派除参加、支持工人和学生运动外，还组织成员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反美反蒋斗争。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就国民党反动当局搜捕北平教育界人士的事件，九三学社组织十三名教授发表了《保障人权宣言》，对政府搜捕教育界人士事件提出抗议，要求从速释放被捕人员，保障人权②。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三月二日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大规模搜捕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及大学生。马叙伦发表《人权保障与保障人权》一文，号召团结一切力量，争取人权，保障人权。国民党当局在强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被捕人士陆续释放。

民主建国会领导人章乃器、盛丕华、胡厥文等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邀请工商界一百余人召开座谈会，讨论国民党当局反动经济政策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参加座谈的人一致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是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造成的。为此，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下列要求：(一)停止内战；(二)国民党政府要废除不合理的"法律"和苛捐杂税；(三)反对国民党当局实行反动的金融政策。同年九月十二日，民主建国会领导人章乃器、陈已生又邀请上海工商界七十多人开座谈会。经过讨论，与会者认为，对日贸易只能在对日和约签订以后才能进行，反对美蒋现在进行的扶日政策。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全国商联会和工协代表大会先后在南京开幕。

①《观察》，第二卷，第十四期，1947年5月31日。
②《观察》，第二卷，第二期，1947年3月8日。

蒋介石对这两个大会实行分化的政策。民主建国会于十一月五日致函两会,希望大会(一)不能离开国家利益;(二)不要受政治势力支配;(三)自己是一种力量,别的方面意见要以对国家是否有利而决定取舍。

一九四七年二月,当国民党关闭和平谈判的大门后,民主同盟发动了和平运动。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作出决议,要求民盟参政员在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联络同情和平运动的参政员、各民主团体共同发起和平运动。民盟中央并成立专门机构,以便推进和平运动。五月二十三日,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等五参政员,在参政会上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在"和平案"中,建议:"确定政治解决党争的大原则,依据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及路线,重新举行和平会议";迅速恢复国共间的联系,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谈判的具体方案"。中国民主同盟关于和平的建议,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拒绝。在参政会上,国民党参政员却又提出了促请政府下令全国总动员,以加速共党的敉平案。在国民参政会开会时,民主建国会发表《对当前和运意见》。在《意见》中指出,坚持政协路线的和平运动和人民争取和平运动相结合,依靠人民才能取得和平并使和平得到保证。

各民主党派除了参加上述反对美蒋斗争外,还出版了《光明报》、《民主生活》、《公论》、《民主》、《民讯》、《新台湾》、《观察》、《民潮》等一大批刊物。这些刊物是民主党派向美蒋反动派斗争的工具和阵地。各民主党派还在《文萃》、《华商报》、《文汇报》、《新民报》等报上发表许多文章,阐述中国革命问题,揭露美蒋罪行,发表关于国事的宣言和声明,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九三学社在上海主编《观察》杂志,发表许多揭露美蒋罪行的文章,起了很好作用。为此,《观察》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一些工作人员被捕。民主党派许多成员还出版图书和小册子。如中国民

主促进会领导人马叙伦发表《民主和平运动提纲》的小册子，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罪行。指出今日重要任务，是团结全国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的人民，共同为争取和平民主与民族独立而奋斗。

民主党派参加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表明了民主党派已经和人民革命斗争相结合，爱国民主运动进入了高潮，形成了反对蒋介石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毛泽东指出：“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①

二、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

中国农工民主党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章伯钧作了党务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农工民主党“(1)代表农工平民利益；(2)彻底完成民族解放，实行民主政治达到社会主义；(3)以邓演达先生政治主张为基本政治纲领，继承党的历史传统；(4)民主集中制”②。会议认为，邓演达所提出的路线，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还检讨过去对农工阶级工作做的不够“在行动上对‘中共’和‘国民党内的进步分子’，没有明确态度”及在组织上存在的问题。会议决定本党正式易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并进行组织整理。规定党的活动区域为长江以南各省和南洋等地。会议发表《本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宣言》。指出，召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20页，1964年版。

②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农工民主党参考资料》，第四辑。

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是为“策进本党工作，以求与全国同胞及民主党派共同推进民主团结，实现和平统一，建设独立富强之中国”①。当前之任务：“则在于停止征兵粮，求农村之安稳。停止通货膨胀及官僚买办之垄断，求工商业之复兴与失业之救济。”宣言最后指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本可先成于抗日之后，然卒次当权政党的利用外援进行内战而自毁其功。若帝国主义势力遂益加深入，吾人势必加以抗拒”。

三月十二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就蒋介石强迫中国共产党联络代表撤离南京、上海等地发表《本党对局宣言》，阐明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对时局的主张（一）坚决反对内战，反对分裂，主张遵循政协道路，恢复和平；（二）国共问题，政治解决；（三）保障人权；（四）保障国权；（五）废除统治政策；（六）反对列强任何形式的干涉中国内政，特别是反对“协助一方面参加或鼓励中国内战”②，要求一切外国军队应立即撤出中国。

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确立“本党今后组织路线的基本方针，为和平的民主的斗争”③，“与全国同胞及民主党派共同推进民主团结，实现和平统一，建设独立富强之中国”④。它对于动员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参加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起了积极作用。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章、党名和党纲的决议。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25人和中央监察委员15人。推选章伯钧、丘哲、罗任一、李伯球、张云川、王深林、郭植成等为中常委，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丘哲为秘书长。

①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农工民主党参考资料》，第四辑。

②③④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农工民主党参考资料》，第四辑。

章伯钧(1895—1969)安徽桐城人。早年先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一九二六年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二八年脱离中国共产党，与邓演达、谭平山等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革命行动委员会。一九三三年参加福建事变。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九四一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彭泽民(1875—1956)广东四会人。同盟会员。中国国民党改组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一九二七年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政变，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抗日战争期间，在海外进行救国活动。

（二）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领导人陈其尤力主重新整顿党务，加入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遂与陈演生等共同努力，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在香港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党的工作，一致通过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海外侨胞书》和《致杜鲁门总统文》等决议和文件。

《大会宣言》揭露了美蒋勾结的反动性。指出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推行的独裁内战政策是造成中国从未有过危机的主要原因。它们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政协决议，发动内战，使全国人民“遍遭涂炭之苦”。在政治上独裁统治，特务肆虐，贿赂公行，无官不贪，无吏不污，鱼肉人民，无所不至；在经济上，由于中美商约的签订和实行的反动经济政策，使民族工业摧残殆尽，而官僚资本则大发横财。由于国民党对农村实行抓兵征实，使农民不得不陷于破产。造成失业者遍全国，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也无法维持；在财政上贪官污吏盛行和大打内战，造成巨额赤字。国民党政府为筹措内战经费，滥发巨额纸币，使通货恶性膨胀，物价猛涨。

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已到山穷水尽，毫无办法之境地”；从社会上看，贫富悬殊，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宣言指出，这种反动统治继续下去“我国民族其何能逃避崩溃与灭亡之命运耶？”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下列的政治主张：解决现在中国的问题：第一步是“国共双方军队，应即退回去年一月十三日停战命令发布前之两方原占地区”；第二步，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步，经政治协商会议产生各党派平等参加的联合政府，代替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等三党组成的政府；第四步，联合政府筹备召开国民大会，制定新宪法，代替国、民、青三党所制定的宪法；第五步，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民主政府，取消国、民、青三党参加的政府；第六步，在民主政府领导下，召开地方国民大会，选举地方政府。大会认为“中国所有一切重要问题，在政治未能实现真正民主之前，则毫无根本改善之方法。’因此，本党愿‘为中国政治真正民主化而奋斗到底！”

大会在《致杜鲁门总统文》中指出：中国的内战是由美国支持的反民主之国民政府对中国的民主势力作战。为此，要求美国总统立即撤退美国在中国的驻军，停止对中国政府的物资援助。“中国问题，应听由中国人民自行解决”。

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推选李济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等为中常委，李济深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陈演生为秘书长。出版《公论》刊物，在香港建立总部。在马来亚、菲律宾、美国、加拿大、香港等地建立地方组织。

陈其尤(1892—1970)广东海丰人。同盟会会员。曾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蒋介石私人驻港代表，后和蒋介石分裂，从事反蒋运动，领导致公党的重建工作。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大会。大会宣布从此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并为此奋斗到底 !在“三大”以后,致公党努力贯彻大会精神，整顿党的组织，重新登记党员，清除和批评党内的反动分子和封建思想，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迈进！

第四节　国民党加紧对民主党派的迫害，民主同盟被迫解散。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

一、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的决策

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英勇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国统区的各阶级、各阶层的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国民党政府已处于全民包围之中。与此相应，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强，士气高涨，后方巩固，人民积极参军参战。这一切说明，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中共中央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于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会议,讨论和布置了全国战略进攻问题。九月一日发出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进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大量歼敌，创建新的解放区。一部分主力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敌人,收复失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战略进攻方向为挺进大别山，夺取中原。占据大别山，就可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为保证战略进攻主攻方向的胜利，党中央和毛泽东命令山东解放军一部挺进鲁西南，太岳兵团进攻豫西，形成品字形攻势。同时命令陕北、山东人民解放军积极作战，以牵制两翼敌人。

人民解放军遵照党中央的部署开始了战略进攻。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标志着中国革命战争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①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的事变。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为了完成中国革命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任务，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到九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的经验，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会议还讨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状况，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问题，因此，会议决定结合农村土地改革，进行整顿党的队伍。

全国土地会议推动了解放区土地革命的胜利发展。在全国土地会议后的一年内，全国有一亿农民获得了土地。整党和整军也都取得了巨大成绩。这就为迎接战略决战，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中共中央在部署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的同时，对国统区的工作也作了指示。指出，由于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各民主党派参加群众斗争，蒋介石政府也必然地要采取进一步镇压革命的对策，也必然地要加紧对民主党派的迫害。为此，中央要求国统区党的组织，“要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开展人民运动。”在“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的同时，要“灵活地既结合又分别合法与非法的斗争”。中央要求国统区党的组织，在城市工作上，“一切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140 页，1946 年版。

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①

二、国民党加紧对民主党派的迫害，民主同盟被迫解散

国民党当局从一九四七年五月开始进一步加强了对民主党派的迫害，五月三日，国民党公布了一个捏造的《中国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和所谓的观察家谈话。在‘谈话’中说，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其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其行动亦均系循中共意志而行”，为镇压民主党派制造舆论。五月十四日，国民党政府新闻局局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再次制造迫害民盟的借口。他说：“民盟与中共曾公开否认宪法及国民大会之合法性，该盟与反叛政府之中共既有密切关系。”七月初，在国民党公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后，又训令国民党各级组织，对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这些党派的上层分子，采取“暂时容忍敷衍”的方针，对中下层分子则不要客气，只要有反对国民党的活动，“一律格杀勿论”。同年十月七日，国民党政府新闻局局长在招待会上宣布民主同盟是“中共之附庸”，“民盟分子破坏总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同日，国民党西安警备司令部枪杀了著名的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委杜斌丞。接着，十月二十三日，国民党派大批特务包围和监视南京民盟总部。二十七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二十八日，中央社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以所谓‘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煽动五月学潮及上海工潮’，‘作叛乱宣传掩护共匪之间谍活动’，并‘企图颠覆政

① 《周恩来选集》，第 270—271 页，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府’等罪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同时下令,要‘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方法》,严格取缔,以遏乱萌。”

民主同盟领导人在上海举行紧急会议，研究了对策。决定派黄炎培等人赴南京国民党政府交涉。黄炎培等人到达南京后，呼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面斡旋，而司徒雷登反劝民盟“光荣解散”。接着，黄炎培等人又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张群等谈判。张群坚持国民党的民盟解散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黄炎培表示：“民盟既经政府认为非法团体，惟有通告盟员停止活动，自经通告以后盟员如有言论，自应由个人负责。”要求国民党当局准许“各地盟员一律免除登记，并享有一切合法之自由”。十一月五日，民盟在上海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黄炎培报告了与国民党谈判的经过和结果。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民盟宣布自动解散。六日，张澜以民盟主席的名义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七日，张澜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余迫不得已忍痛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并呼吁全体盟员“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

民盟被迫解散后，个别民盟领导人，在报纸上发表公开声明，表示与民盟脱离关系。华北民盟总支部负责人公开声明：“民盟华北一切地方组织一律解散，所有盟员一律停止盟务活动。”但是，绝大多数民盟地方组织和广大盟员纷纷抗议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并郑重声明，继续开展民盟活动，从事反对美蒋斗争。民盟总部部分领导者如沈钧儒、史良、周新民等反对民盟内部个别领导人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不同意解散民盟总部。民盟南方支部发表声明，指出，国民党政府违背全国人民的公意，违背政治

协商会议的决议,宣布解散民盟的命令是‘非法’的,并警告国民党当局不得迫害民盟总部领导人员。南方总支部庄重声明:“国民党政府,可以封闭我们南京的总部,可是,它决不能消灭本盟在海内外的广大组织,更不能消灭中国的民主运动,相反,这种暴力政策,只会促进本盟在海内外的发展,更加强民主人士的团结。”随后,各地方民盟组织和广大盟员先后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

十一月六日新华社发表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痛斥国民党迫害和解散民盟的罪行。指出,美帝国主义指使蒋介石解散民盟“只是暴露和加重南京统治的异常紧迫的危机。”无论国民党采取什么反动措施,决不能阻止中国人民革命的发展,“相反地只能教育人民,要有自由,要有真正的和平,就必须坚决用武力来打倒蒋介石。”时评”高度评价了民主同盟的作用。指出“民主同盟在若干历史关节中,实行了与中共在部分民主纲领上的政治合作,从而推进了中国民主事业,是民主同盟的光荣。”时评”同时指出,民盟应该从被解散中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消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

各民主党派也纷纷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解散民盟的暴行,表示今后更要努力为创建新中国而斗争。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马叙伦致函给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张群,怒斥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人民的罪行,并郑重声明:“至伦立身,本来不够,贫富威武,无动于衷。达观早成,生死一致。自今以拥疾之躬,待命陋巷之内,捕杀不辞,驱胁无畏;穷以私剑,投诸浊流,皆系于政府,

于伦无与焉。’①

民盟被迫解散后，各民主党派也被迫转入地下。民主党派领导人一部分转入地下坚持斗争，一部分去香港和解放区，坚持公开斗争。从此各民主党派的斗争也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解放战争初期，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部分民主党派中，有少数右翼分子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即中间路线。他们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既不同于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又不同于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条中间路线，在民主党派中不占主导地位。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他们进行耐心的帮助和批评教育，采取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的迫害；也由于民主党派内部左翼分子对他们的斗争；特别是由于革命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使他们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们中绝大多数放弃了中间路线的幻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走上了革命道路，从而巩固和扩大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

台湾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过了五十年亡国奴的生活。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台湾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国民党即开始统治台湾，以“接收”名义抢劫了台湾企业，建立了官僚垄断经济，残酷地剥削台湾人民。不久，美帝国主义又把台湾变成它的独占市场。随着国民党在大陆上发生经济危机，台湾人民也受到通货膨胀、物价猛涨之害，使台湾人民无法生存下去。一九四六年末大陆人民进行反对美军暴行的斗争，台湾人民也起来开展了斗争。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发生了“缉私血案”。

①民进中央宣传部编：《中国民主促进会简史》1983、10

二十八日，台北人民进行罢市和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台湾当局的镇压。愤怒的群众夺取了电台，呼吁全省人民支援台北人民的斗争，得到全省各地人民的响应。起义遍及台湾省，国民大部分地区的机关被推翻，建立了革命政权。但是，由于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使“二二八”起义遭到失败。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起义中被杀害的革命群众约有三万多人。这次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二二八”起义虽然遭到失败，但是，它反对美蒋斗争的革命精神已经深深埋在台湾人民心中。

参加“二二八”起义的革命者，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召开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委会第一次会员代表会。会议讨论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纲领、章程(草案)》，通过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会第一次会员代表会文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会时局口号》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规程》草案。十二月一日发表了上述文件，宣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

在这些文件中，第一、阐述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基本政治主张。台盟的基本政治纲领是“团结本省全体人民，为争取台湾省自治及影响全中国人民之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之斗争为宗旨”，“为台湾民主自治而奋斗，为人民服务而努力”①。在政治上“打倒独裁政权，实行人民民主制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美军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反对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在经济上，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官僚资本“保护工商业”“取消苛捐杂税”，恢复生产，救济失业者及贫民②。第二、通过同盟名称，确立台盟是省内及旅外台湾省民的组织，规定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台盟组织原则；成立理事会领导

① 《华商报》，1947年11月18日。
② 《新台湾丛刊》，第三辑，1947年12月1日。

盟务工作；决定在省内外各地开展广泛的活动。

一九四八年六月确定台盟为台湾统一战线群众团体的核心组织。台盟的任务是：（一）把本省问题介绍出来，向国内外宣传；（二）向本省人民介绍当前革命的诸问题与战局发展情况；（三）联系旅外台胞，间接地扩大政治影响；（四）对分离运动的阴谋加以揭露和打击。

台盟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公开宣布总部成立。总部负责人有谢雪红等。台盟总部公开宣布成立以后，发展地方组织，建立了台盟地方支部。一九四八年八月在香港建立了支部，盟员有三十余人。一九四九年二月，建立华北支部，七月成立华东总支部并召开盟员大会。八月在北平设立了台盟总部驻平办事处，负责人为林鉴生。九月又建立了天津支部。随着台盟地方组织的建立，台盟的工作也进一步得到开展。

第十五章
共产党联合民主党派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第一节　共产党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民盟一届三中全会

一、共产党关于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口号的提出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战略进攻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及时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

宣言指出，蒋介石及其集团一贯坚持卖国、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使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就必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随后，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

沟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除了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外，还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负责同志参加。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毛泽东在报告中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形势。指出，现在国内形势是人民革命力量实行了战略进攻，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一事变的发生，说明中国革命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在国际形势方面，也是有利于中国革命战争进行的，全世界的民主力量是能够制止和粉碎帝国主义企图要奴役全世界计划的。

毛泽东指出：尽管在我们前进道路上还有种种曲折和困难，“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为了夺取全国胜利，毛泽东全面地说明了党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纲领和政策。

中国共产党基本的政治纲领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毛泽东总结了军事斗争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

会议决定：（1）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2）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3）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党的十二月会议，为中国革命夺取全国胜利，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政策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党的十二月会议后，中央集中精力解决政策问题和加强纪律性问题。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和解放区土地改革顺利进行的时候，在党内出现了“左”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指出：“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上述五方面政策又作了明确规定。由于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正确执行政策，纠正错误，使党的政策很快走上了正轨，这就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作了重要准备。

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民党内民主派先后成立了两个组织，一个是李济深、何香凝组织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另一个是谭平山、柳亚子、王昆仑等组织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抗战胜利以前，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国民党爱国民主派就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81页，1964年版。

开始酝酿成立政党问题。何香凝表示：不要离开中国国民党这个名义，并草拟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章程》。经过一段筹备和联络工作以后，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和四月，召开两次预备会议，宣告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正式成立。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是“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为行动之最高标准”①。

在政治上，反对一党专政，要求国内一切民主党派处于平等地位，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军事问题上，主张军队国家化，“任何党派或个人，均不得拥有军队”②。在经济上，主张“实行民生主义的计划经济，节制私人资本以预防独占，促进国营事业，保护民营企业，提倡合作制度，以发展资本而增加生产”③。在教育和社会事业上，主张实行民主教育，厉行义务教育。改善公教人员生活，兴办各种福利事业，实行男女平等，保护华侨。

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建立以后积极联络国民党内民主人士，开展民主运动。何香凝在香港联系拥共反蒋人士。李济深联系国民党内民主人士陈铭枢、冯玉祥等发动民主运动。他们还利用各种关系作国民党军队将领工作，动员不参加或反对内战。在蒋介石布置内战时，李济深写信批评蒋介石是违反孙中山先生政策的。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是中国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为反对蒋介石独裁卖国成立的政治组织。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在重庆召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到会的有全国十八个省市的代表和会员。大会通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政治主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临时组织总章》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决议案》等文件，宣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正式成立。主要负责人有谭平山、柳亚子、王昆仑等。

①②③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行动纲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第321页、第322页。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政治主张是：“接受三民主义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①。“中国国民党应即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民主自由权利；“国内一切民主党派，一律处于合法平等地位。”在国民大会未成立之前，先召各党各派的代表及无党派的公正人士的政治会议，以解决目前全国所迫切要求的民主、团结、和平、统一诸问题”②。

在军事上，主张“实行军队国家化，在民主政府之下，任何党派及个人均不得拥有军队”③。在外交上，主张“实践中苏友好盟约，并忠实履行大西洋宪章”④，反对任何国家在中国驻军。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男人平等。

在经济上，实行“民主主义的计划经济”：“(一)节制私人资本。(二)发展国家资本。(三)平均地权”；“以逐渐达到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之目的”⑤。

在文化上，保障人民受教育权利，鼓励学术思想自由。在民族政策方面，实行国内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依据民族自决权的原则，组成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大会通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临时组织章程》。章程规定，参加本会必须“笃信三民主义者”。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恪守民主集中制，设立中央临时干事会，各地设分会。

①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政治主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第275页。

②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政治主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第275页。

③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政治主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第278页。

④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政治主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第278页。

⑤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政治主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第276页。

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于上海举行第四次政治会议。在会议的政治报告中说明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国事的认识、态度、主张和立场。

报告指出，国民党中的反动分子，在一九二七年背叛了革命，建立了反动统治。抗战胜利后，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内战。

报告认为，制止内战、取得和平与民主的正确途径：（一）坚决执行政协五项协议、停战协定和整军方案。（二）改组政府，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三）彻底改变现行的反动经济政策。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成立以后，积极参加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斗争。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下旬，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何香凝在大会开幕的讲演中，宣布奋斗目标是：奉行真正的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恢复孙中山的革命路线，号召大家诚心诚意地为继承孙中山未竟之志而努力。

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告本党同志书》,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

第一、大会宣布脱离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制定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

大会指出，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新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但是，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建立了一党专政，在政治上剥夺人民之民主和自由，实行特务统治；在经济上，豪门资本独占国家经济命脉，残酷剥削劳动群众，造成“亲贵肥而天下瘦”，民不聊生；在军事上，镇压革命，排斥异己、扩大自己实力，造成内战不息之局面；在

外交上，卖国求荣，成为美帝国主义之附庸。大会宣言指出，“近二十年来中国国民党执政所造出之罪恶，仅为背弃本党总理遗教的叛徒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反革命集团之罪恶”。

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国民党内民主派一直坚持和蒋介石进行斗争，民主派力量也不断扩大，先后建立了一些组织。在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及其劫持着的党中央机关政府，其反动性与日俱增，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公敌”。因此，中国国民党内民主派“不能再默无所表示，同时更深切感到全国所有党内民主派组织与民主分子，有更一进步团结与提出共同行动纲领之必要，爰有此次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之召开，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之组织。”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的主要内容是：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最高理想。”其行动纲领是“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之对外对内政策为基本原则。’当前主要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①。

第二、宣布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公敌，提出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建立和平、民主和幸福的新中国的口号。大会宣言指出，“坚决认定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政治上之罪恶，均为蒋介石一手造成，蒋氏及其领导下的反革命集团，实为国内一切反动力量——大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土劣、流氓——之集合体。蒋氏在党为三民主义之叛徒，在国为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之公敌。”宣言列举蒋介石反对民主、破坏和平、出卖国家的种种罪行后，提出“当前紧迫的革命任务，为推翻反对民主，破坏和平，媚外卖国的

①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第 247—248 页。

蒋介石之独裁统治。…… 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①。

第三、大会指出，国民党民主派有过光荣的历史，曾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反对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奋斗了几十年。大会号召“本党不乏忠贞之士，诚能团结一致，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奋斗，必可汇成强大之革命洪流，冲涤一切封建反动之遗毒。至于蒋氏控制下之本党进步同志，亦深望其早日脱离蒋氏，参加本会革命工作，盖目前全国人民对蒋氏反动势力已无妥协余地，本党同志允宜率先起义，以铲除此一穷凶极恶政权之前锋自任，为天下倡，庶几稍赎罪愆，以谢国人。时机迫切，稍纵即逝，救党救国，胥视此役”②。

大会选举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61人和监委18人。经过执监委会议，推选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陈其瑗、陈绍宽、朱蕴山等16人为中央委员会常委。设置了办事机构，李章达任秘书，陈绍宽任宣传，朱学范任组织，政治委员会由冯玉祥负责，财务为蔡廷锴。

李济深(1886—1959)广西苍梧人，字任潮。北京陆军大学毕业，曾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代理师长。一九二五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留守广州。一九二七年曾参加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一九三三年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抗日战争时期，响应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号召，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卖国政策。抗战胜利前后，团结国民党民主派，开展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的斗争。

①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第242—247页。

②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告本党同志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第253页。

何香凝(1878—1972)广东南海人。国民党革命派杰出代表，现代画家。廖仲恺夫人。一九〇四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随同孙中山从事辛亥革命。民国以后，积极参加讨伐袁世凯和护法运动。一九二四年坚决支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纲领，改组国民党，主张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国共合作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妇女部长。一九二七年坚决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辞去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进行反蒋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从事抗日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团结国民党民主张，进行反对美蒋斗争。

谭平山(1886—1956)广东高明(今高鹤)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后曾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等职。蒋介石叛变后，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反对蒋介石卖国独裁政策。抗战胜利前后，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开展反对美蒋斗争。

这个时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有党员一千人左右，建立了北方支部、湖南、广东、福建等支部，总部设在香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实现了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它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中国国民党从一九二四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大会以后，一直存在着爱国民主派同反动派的斗争，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国民党内民主派的力量不断壮大。他们在国民党内坚持和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进行斗争，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当中国革命发展到战略进攻阶段以后，中国国民党内民主派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号召，团结起来，和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成立独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说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已经彻底站到人民革命

方面来了。它标志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说明了蒋介石反动派已经彻底孤立，中国民主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已经为期不远了。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积极投入了人民解放斗争，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民主党派特别是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在中国革命胜利形势的鼓舞下，也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军事上失败，政治欺骗的破产，经济上行将全面崩溃，和对民盟的迫害，使民主同盟彻底认识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丢掉了对蒋介石的幻想。认识到中间路线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身上。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下旬，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先后秘密离开上海等地到达香港，与原来在港的民盟中央委员邓初民等着手筹备召开民盟三中全会。十二月十三日，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柳亚子、刘王立明、王绍鏊等召开在香港的中执委会议，决定召开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一九四八年一月五日至十九日，在香港召开了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沈钧儒、章伯钧、史良（沙千里代）、朱蕴山、周新民、柳亚子、邓初民、何公敢、刘王立明、李伯球等二十九人。另外南方总支部、西南总支部、上海市、重庆市、云南、福建、港九、马来亚等支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沈钧儒和章伯钧主持会议。沈钧儒致开幕词和闭幕词。章伯钧代表中央执委会作了政治报告。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通过了《三中全会紧急声明》、《三中全会政治报告》、《三中全会宣言》和《今后组织工作计划草案》等决议。会议总结了民盟过去斗争的经

验和教训，批判了中间路线，重建民盟总部，重新确立了民盟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民主同盟三中全会庄严声明：否认南京反动政府关于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反动决定，并表示“不能接受本盟总部于去年十一月六日在南京反动独裁政府的劫持与威胁下，未经合法会议而发表的‘辞职’、‘解散总部’及‘停止盟员活动’等声明。”宣布中国民主同盟要“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①。

全会的政治报告和宣言，正确地规定了民盟新的政治路线。主要内容有：

第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抗战胜利后，民盟是反对美帝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但是，民盟有的领导人对美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抱有一定的幻想，希望美国政府出面调停中国的内战，帮助中国的建设。而三中全会则认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是造成世界“分裂和动荡局面的主要原因”②。由于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国民党反动集团才“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与全中国人民为敌”③。全会强调指出：“我们要反对中国的反动独裁政府，必须同时也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者”④，只要“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魔手在中国存在一天，中国人民就一天得不到民主、和平、独立、自由和幸福”。对美帝绝不应当存在“一丝一毫的幻想”⑤。“只有坚决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出中国，毁灭美蒋所订的一切新不平等条约，中国的独立

①《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364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8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年版。
③《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382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版。
④《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88—38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⑤《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393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版。

才有保障’①。

第二、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全会指出“：今天南京的反动独裁集团本身就是实现民主的障碍”；“是当前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对象”，“必须推翻这种反动集团的统治并毁灭其基础’②。明确指出：“过去我们曾以和平公开合法的方式去争取民主，但已经失败了。今后应积极的支持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动武装”③。强调只有“粉碎一个独裁反动贪污腐化的政权，才能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廉洁有效的新政权”④，实现“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⑤。

第三、赞成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全会认为：“我们要反对的不只是独裁者个人，而是那代表地主豪绅买办封建的整个集团。为了彻底消灭整个反动集团的统治，中国人民就得彻底消除这一反动统治所寄托的经济基础，那就是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关系，实行耕者有其田”⑥。同时指出：必须“没收豪门资本的财产”，“废除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经济统治’⑦。

第四、批判中间路线，宣布民盟要坚决站在人民的民主立场，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合作。全会指出：我们的态度是“坚决站在人民的民主的这一方面，跟人民公敌、反动集团斗争到底”⑧。表示，在今后斗争中‘决不动摇，决不妥协，决不对反动集团存有丝毫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9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②《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94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③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94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④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75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⑤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7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⑥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75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⑦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7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⑧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94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的幻想”[①]。全会指出，在人民与反人民、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中“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我们民盟坚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至于独立的中间路线，从目前中国的现实环境看，更难行通”[②]。全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历史，日寇投降以来他们为实现国内和平的努力，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本盟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③]。“同时，我们也承认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其他许多民主党派都是我们的友军”。并且“跟其他一切为民主革命而奋斗的人民团体，继续为巩固和扩大民主革命统一战线而奋斗”[④]。

全会重新确立民盟的组织路线，重建民盟总部。三中全会决定实行“群众性的革命性的组织路线”。民盟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全体服从组织，对内必须要尊重集体意见，对外必须服从组织，不容有个人自由主义之言行”。“严密各级地方组织，建立高度的组织纪律”。“盟员均需编入小组，参加小组活动”，“严格吸收盟员”。三中全会还决定在解放区设立盟务特派员，开展盟务活动。扩大海外组织，孤立和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在海外的活动。

三中全会重建民盟总部，对中央领导机构作了调整和充实，由沈钧儒、章伯钧以民主同盟中常委名义领导全盟工作。民盟各处会负责人尚未来港者，由大会选人暂代。周新民代理秘书主任，沈志远代理宣传委员会主任，冯裕芬代理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萨空了代理国外关系委员会主任。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394—395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年版。
②《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95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年版。
③《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76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版。
④《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395—396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版。

民盟三中全会的决议得到民盟各级组织和广大盟员的拥护。民盟英国支部认为：“三中全会的决策是本盟正确的政治路线”，并提出民盟应“以实际行动参加全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对中国民主同盟三中全会表示热烈欢迎。指出：“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集团、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建立联合政府的纲领，乃是一切爱国者所公认的唯一道路。”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中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一道为共同的事业而携手前进。

民盟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会议。全会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批判了中间路线，宣布彻底和美蒋决裂，重新确立民盟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重建了民盟总部。从此，民主同盟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这是中国民主同盟伟大的进步。它对于推动革命的发展，加速民主革命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垂死挣扎。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一、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垂死挣扎

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将近一年，军事上接连失败，政治上遭到人民激烈的反对，经济上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蒋介石的危机，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中旬派遣魏德迈来华进行“考察”，回华盛顿之后，他向杜鲁门提出了一个长达十万余言的报告。在报告中认为中国对于美国侵略世界具有

战略意义，为此提出一个广泛的援蒋计划（包括经济上的五年援助计划，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监督权力等），从此之后，美帝国主义加紧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控制，十月以后美蒋签订了《救济协定》、《海军协定》、《农业协定》等一系列协定。在这些协定中第一，蒋介石使用美国的援助必须在美国监督之下使用；第二，美方得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拟定各项财政方案，在《农业协定》中规定农业的生产、销售和畜牧业、手工业等各项计划，得由美方参加拟定和监督执行；第三，美国顾问团由过去的只负责训练，扩大到参加国防部工作和制定作战计划。美帝加紧了对中国主权的掠夺，从而加速和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化过程。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节节胜利，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日益暴露出无能腐败，美帝国主义又开始了新的侵华阴谋。这个新阴谋包括：（1）扶植桂系李宗仁。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司徒雷登向马歇尔的报告中说：自由主义分子或改良主义分子对蒋介石感到绝望，“他们聚集在李宗仁的周围”①。他认为挽救局面，“李宗仁和他的支持者或者——只是或者——可能作到这一点”②。（2）支持亲美的宋子文经营广东，联络西南和西北的地方实力派。宋子文在广东联络政学系和CC系对抗。联络刘湘旧部刘航琛等组织所谓“和平统一大同盟”，又企图组织“南方联合”或“西南大联合”的防共阵线。（3）组织和扶植中国的所谓“第三种势力”，指使他们混入革命阵营，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以破坏革命。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了镇压国统区的人民民主运动，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颁布了《全国总动员案》，下达了“戡乱动员令”；七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在《动

①、② 美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员案》和《实施纲要》中,(1)表明了蒋介石把内战打到底的决心;(2)借“戡乱”之名,取缔人民的一切民主自由权利,人民如果稍有反抗,就以影响‘戡乱’为名加以镇压;(3)借‘戡乱’之名,进一步搜刮和掠夺人民财产,加紧征实、征税、征兵,如不听搜刮,就以破坏‘戡乱’加以制裁。蒋介石在‘总动员令’下,对国统区人民实行了更残酷更大规模的镇压。八月二日,国民党政府又发布了‘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在《处理办法》中,规定对共产党员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政人员要‘依军法机关惩办’、‘实行监护’、‘感训’,发现有‘嫌疑’者,就要逮捕送司法机关审理。在全国各地疯狂逮捕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民主党派成员。九月,蒋介石又召开特务头子会议,进一步加强特务统治。一九四八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又制定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组织“特种刑事法庭”。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暴政,反映了国民党垂死前的疯狂挣扎。

蒋介石国民党为了粉饰独裁统治,决定一九四八年为所谓“行宪年”。所谓‘行宪’,就是要选举总统,实行总统制。

蒋介石要当总统,但是在“宪法”中总统的权力又要受到限制,因此,他提出不当总统来要挟,实际上是逼国民党中常委给予总统更大权力。国民党中常委开会决定,在宪法外增加临时条款,使总统在特定时得为紧急处置权。蒋介石得到更大权力后才表示可以做总统候选人。

关于副总统的人选,桂系李宗仁要参加竞选,这是出乎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李宗仁所以敢于竞选副总统,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支持。这就造成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加剧。原来蒋介石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并内定孙科为副总统候选人,压迫李宗仁以顾全大局为名,退出竞选。但是,由于李宗仁等极力反对,被迫取消。经国民党临全会确定蒋介石为总统候选

人，拉居正作陪选，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等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四月十九日国民大会举行大会，选举总统，蒋介石当选为总统。四月二十三日开始选举副总统，经过三次投票都没有选出副总统，还得进行第四次投票。竞选者只有李宗仁和孙科。蒋介石为了击败李宗仁，又亲自召开会议布置孙科竞选，结果也没有起多大作用，选举结果李宗仁以微弱多数当选了副总统。李宗仁竞选胜利，使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特别是使蒋、桂系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国民党在军事战场节节失败，政治上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同时，经济上又进一步走向总崩溃。其主要表现在：第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府财政赤字已 900 万亿元，而财政收入仅及其支出的 5％左右。国民党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大量印刷发行钞票。钞票无止境地增发，促成物价的飞速上涨。以上海物价上涨为例，一九四八年八月份的物价和一九三七年一月至六月的平均物价比较，则上涨 500 万倍至 1100 万倍，使法币的价值贬低到不及它自身纸张和印刷费的价值了。第二、生产体系的瓦解。城市工业倒闭，生产大幅度下降。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内，平津两市民营工厂倒闭十分之七八，国统区的轻工业产量比抗战时减少 30％，重工业约减少 70％。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一九四八年比战前减产 40％以上。上述表明，国统区的经济已经到了总崩溃的境地了。

国民党反动政府承认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的危机“现在已到了极严重的关头”① 。国民党政府为了挽救经济的总崩溃，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和以后实行了“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为了推行“币

①张群：《在国民党四中全会政治报告》，1947 年 9 月 9 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档案》，九三九四号。

制改革’和‘限价政策”,设立若干经济区,派经济管制督导员,严厉监督执行，企图用暴力挽救经济，推行改革。但是，改革不但没有挽救经济的总崩溃，反而使已经解体的经济体系更加紊乱，加速了总崩溃。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社会经济已经无法挽救了，正象它在政治、军事上一样，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时间也不会很久了。

二、民主党派的反美反蒋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深入发展。工人阶级为争生存，争自由进行了英勇斗争。一九四七年五月，仅上海一处就有十五万工人参加罢工和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国统区的学生运动也在继续发展。一九四七年十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中共党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杭州、北平、南京、上海、厦门、昆明等城市的师生举行了反迫害的游行示威。

一九四八年二月，北大、南开等学校学生开始争取全面公费的斗争。平津大学教授也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支持学生的斗争。三月上海学生、中小学教师提出改善教师生活待遇的十项要求。四月初，平津的各院校和北平研究院的教学、科研人员和职工，提出“向政府要饭吃”的口号，举行罢教、罢研、罢工。广大知识分子积极参加革命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学生斗争，推动了国统区的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帮助、影响下，在民主党派内部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推动下，从一九四八年一月民盟召开三中全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民主党派的反蒋反美斗争进一步发展起来。

（1）民主党派开始学习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和

政策，密切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民盟三中全会以后，一些地方组织和共产党各级地方组织取得密切联系，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方针政策。民盟上海支部和南京支部在一九四八年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上海支部还学习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民盟苏州等支部出版小报，刊登解放区的消息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工商政策等。一九四七年中国共产党代表向职教社传达了中共关于对民族工商业的方针政策。黄炎培等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向社员和所联系的工商界作了宣传。

（2）积极配合共产党进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民盟湖北省支部搜集武昌营房卷册和武汉城郊城防工事蓝图，及湖北省国民党党政军警机关、团体的地址和负责人姓名、电话名册等情报，送给中共地下组织或解放区。福建省民盟支部派遣盟员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收集军事情报，供给中共领导的福建人民游击队。湖南省支部送电台、收发报机、药品给宁乡游击队。另外，组织和动员国统区民主党派成员和群众去解放区参加军队和建设。民盟西北总支部、江西、云南省支部动员盟员和青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民盟支部青年盟员有一百余人，其中七、八十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民盟北平支部在一九四八年组织将近二百盟员知识分子，去冀中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

在动员参加、支援武装斗争同时，民主党派大力开展了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工作。各民主党派一些成员和在国民党军政中的一些中高级人员有联系。他们就利用社会关系，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争取他们起义，参加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民盟、民革成员在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领导下，做四川国民党军队负责人刘文辉等人工作，策动率部起义。农工民主

党在淮海战役中，策动了吴化文率部起义。担任四川绥靖公署参谋长的农工民主党员把军事部署作战计划送给中共党员，转交二野司令部。

一九四八年一月，民革在发表告本党同志书中，揭露了蒋介石已经背叛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罪行，号召率部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民盟南方总支部在发表《对当前时局宣言》中，指出摆在蒋军面前只有两条路，即与蒋介石同归于尽，或起义参加反美反蒋斗争。

（3）积极参加国统区的人民民主运动。民盟被迫解散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党派各级组织转入了地下，继续坚持反蒋反美斗争。

民主党派中一些成员除参加国统区师生反对美蒋斗争外，还纷纷发表宣言和声明，支持国统区青年学生的反迫害反饥饿斗争。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声明，指出：对国民党最近在平、津、京、沪、蓉等镇压学潮“本盟殊深愤慨”“除表示严重之抗议之外，并愿意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共同一致谴责。”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北大一千多名学生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纪念黄花岗先烈大会。九三学社负责人许德珩、袁翰青、樊弘等三教授在大会上发表反对伪国大的讲演，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事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委吴铸人对北大三教授发出警告和恐吓。这一行动激起了北平一些学校师生们的强烈反对。四月二十六日，北大、清华等四院校九十位教授发表质询文。指出：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是故意歪曲事实，存心威胁，“是进一步迫害的先声’①。教授们对国民党当局伤害学生，包围学校等暴行“表示

① 《观察》第四卷，第十期，1948 年 4 月 23 日。

愤慨与抗议”,对学生表示“衷心同情”。五月二十九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发表抗议书,指出“:执政党的负责人竟然以虚构恫喝之辞,干扰科学家之情智,侵犯其自由,甚至企图加以迫害”;“实属一种极不明智之举”;特此提出郑重抗议”①。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鼓舞了各民主党派广大成员的斗争信心,各民主党派坚持国统区的斗争,也有力地支持了人民解放战争。

三、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运动

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到一九四八年五月,已经是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决战前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经不可避免。全国人民、一切民主党派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共产党认为,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已经是十分必要的了。为此,在纪念“五一”口号中,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五一”口号中特别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共产党这一号召,表达了中国人民的要求,也反映了各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就成为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推动人民革命斗争的重大措施。

五月一日,毛泽东在致李济深、沈钧儒信中,说明现在召集

①《观察》第四卷,第十四期, 1948年 5月 29 日

“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①。对此，征求他们的意见。

“五一”口号发布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五月二日，在香港的民主同盟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讨论了“五一”口号，一致表示拥护。五月五日，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无党派）等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表示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致电中指出 蒋介石南京政府失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旰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行奉达”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电复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对各民主党派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希望一切民主力量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早日实现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希望各民主党派对召开新政协的时机、地点、何人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0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417—418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年版。

召集、参加者范围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

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和宣言，积极参加新政协运动。民盟在致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暨全国同胞书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反映了各民主党派的共同要求，“通过新政协会议以解决国事,即是今日救国建国的唯一正确途径”。发动新政协运动，“尤其在于通过这一运动加速独裁政权的覆灭，以为新民主义中国之诞生造成前提”①。

中国农工民主党指出：中共中央提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是加速胜利有力的号召，亦即是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巩固和扩大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必要步骤，实现新中国的正确途径”②。他们认为，“五一”口号指明了方向，明确了当前任务。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新政协的性质、意义，并确定响应召开新政协的步骤及办法。在港其他民主党派也召集会议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在中共中央华南局的具体帮助下开展了新政协运动。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张澜等发表文章阐述新政协的意义、性质和任务。在这些宣言和声明中指出，为实现五一号召，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必须彻底推翻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扫除建立新中国的障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指出，召开新政协就“必须彻底排除革命障碍，消灭封建军阀及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③。中国民主促进会指出：“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

①《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429—430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年版。
②《中国农工民主党对时局宣言》， 1948 年 6 月 16 日，香港《华商报》。
③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 1948 年 6 月 25 日，香港《华商报》。

党派要团结在这个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①。他们在声明中指出，在当前要把开展的新政协运动和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结合起来，配合革命战争胜利进行。在国统区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要求美国撤退在中国驻军，反对援蒋，号召蒋军官兵放下武器，退出内战。工商界反对国民党经济政策，农民要开展反征粮、反征兵、反征购运动，青年学生和文化教育界把“要饭吃，要自由”运动推向更深入发展。

各民主党派响应毛泽东在给各民主党派复电中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具体问题的意见讨论。民盟联合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共同讨论民主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及新中国的各项政策，以供新政协会议参考。民主同盟并利用《光明报》开展了关于新政协的性质、特点及任务的讨论。中国致公党声明指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②。他们指出新政协应该没有反动分子参加，它包括全国各个革命阶级、革命党派和团体以及爱国人士。新政协要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广泛听取人民意见，各民主党派要进行充分讨论，并拟具出各种具体方案。新政协应确定“新民主主义为新中国建设的最高指导原则”③.

为开好新政协，必须向全国人民作普遍的宣传，努力作好筹备工作，李济深在《迎接新政协》一文中，强调要从思想和行动两个

①《中国民主促进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1948 年 5 月，《中共中央 1948年五一口号发布以后各民主党派团体与民主人士响应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文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编印。

② 中国致公党：《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五一口号发布以后各民主党派团体与民主人士响应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文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编印。

③ 《新政治协商的意义与任务》，1948 年 6 月 15 日，《公论》第三期。

方面作好准备；必须扩大新政协的宣传”，使全国人民对新政协都“有所了解，有所要求，有所建议”①。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七月三十一日召开理事会在港委员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在关于施政纲领中提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为民主联合政府总的政治目标；新中国的国体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其政权形式为各个阶级民主联合政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之领导”；新民主主义为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最高施政原则。”并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

各民主党派在声明中提出，现在是革命和反革命战略决战前夕，现在的问题，不是站在人民方面，就必然是站到反革命方面，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号召一切现在还站在中间地位的人们丢掉幻想，参加到革命方面来。

从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以后，得到全国各个革命阶级和阶层，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爱国华侨的拥护，开展了新政协运动，革命统一战线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扩大，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和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了更好地协商召开新政协，筹备建国工作，中国共产党中央邀请在香港等地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在中共南方局和在港中共代表领导和组织下，躲避了云集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破坏，冲破了港英当局的阻挠，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先后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 350 余人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分 20 多批秘密离开香港，转到东北、华北解放区。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到达解放区，受到了中共中央代表和地方

① 《公论》第三期。

党组织、群众的热烈欢迎。

四、中国农工民主党九月中央扩大会议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一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举行了中央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章伯钧的政治报告和各种工作报告，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了今后斗争的策略方针。

第一、会议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东亚援助蒋介石打内战，扶植日本军国主义，搞“中、日、韩”同盟，这个反动企图已经遭到致命打击，必将“在以中国人民为主导的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中失败”。

以苏联为中心的世界人民民主和平的力量日益强大，苏联力量不断发展，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日益巩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正在壮大，这种民族斗争的洪流，显示着被压迫民族“从黑暗中翻身的日子快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力量也正在扩大，这一切都有利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具体任务是：彻底打败美帝扶日援蒋的政策”，“彻底消灭战争危机”，“确保世界永久和平”①。

第二、决议指出，国民党南京政府统治二十多年，在政治上实行独裁，卖国求荣，在经济上扩大官僚资本，发动残酷内战，造成空前经济危机。会议提出，当前的任务是“结合广大人民和爱国军人扩大爱国的革命斗争，加速反动统治的崩溃”②。

第三，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进行的革命战争是正义的民主的爱国的战争，现在已经取得了优势。为了打倒

①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扩大会议政治协议》，1948年9月21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四辑。

②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扩大会议政治决议》，1948年9月21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四辑。

南京反动统治“本党今后应放手发动人民参加武装组织,武装与各民主党派联合行动”①。

会议认为，在人民政权巩固以后，实行土改，完全实现“耕者有其田”,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保护工商业和劳资合作的增产政策，增加了生产，巩固了解放区，在南京统治区也要贯彻这个政策，扩大爱国自救的战线，为反对官僚资本，反对美帝经济侵略，为保障工商业，实现独立、民主、和平，为发展工商业而奋斗！

会议认为，“本党今后对于各党各派各团体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应加强主动精神，坚持团结合作，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②。

中国共产党是历史上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组织。“我们与中共不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战友,而是建设新中国的长期合作者”③。

我们与民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政党与组织，在历史上有过多年共同奋斗的历史关系，今后要加强团结合作，互相支持，共同为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奋斗。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扩大会议，正确地确定了今后斗争任务和策略方针，决心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次会议是农工民主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

①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扩大会议政治决议》，1948年9月21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四辑。

②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扩大会议政治决议》，1948年9月21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四辑。

③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扩大会议政治决议》，1948年9月21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四辑。

第三节　国共两党的北平和平谈判，民主党派拥护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到一九四八年秋，出现了更加有利的形势。

在军事上，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作战，歼敌将近二百个旅，解放区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 24.5%，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35.3%，解放县城以上大中小城市 586 座。人民解放军也已由 120 余万增加到 280万，经过两年作战获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改善了装备，经过新式整军运动，政治素质有很大提高。

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决领导农民实现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大约一亿人口的区域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封建地主阶级已经被消灭，农民在政治上当了主人，在经济上得到改善，激发了他们生产支前、参军参战的热情，使解放区得到了巩固。东北、华北、中原解放区三大片已连接起来。

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争取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他们响应了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批判了中间路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空前扩大和巩固。在南方几个区域（如闽粤赣边区、湘鄂赣边区、粤桂边区、桂滇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和浙江东部南部等）建立了游击战争根据地和三万游击部队。

与此相反，国民党在军事上连打败仗，军队数量已由战争开始时的四百三十万减到三百六十万人，而其中能用于第一线的兵力只有一百七十万人，国民党军队不但在数量上下降，而且军队

士气低落，内部派系斗争也日益激化。蒋介石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在南京召开了一次重要军事会议。会议充满了悲观情绪，蒋介石在开始讲话时，把战争失败责任全归咎于战场指挥官‘贪生怕死、指挥无能”。他警告说，如不努力，共党控制中国，死无葬身之地。何应钦（国防部长）在军事形势报告中大讲失败和损失，目的是攻击蒋介石和陈诚，何的报告使悲观情绪更加浓厚。会议决定巩固长江以南地区，把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的部队组成强大兵团，防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在长江以南地区迅速编练第二线兵团。这是国民党集团企图垂死挣扎的方案。

中共中央于九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分析了战争形势。提出建设五百万人民军队，在大约五年左右时间内（从四六年七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战略任务。为此，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的作战任务是歼灭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

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发动了伟大的战略决战。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一月结束，历时四个半月，连续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歼敌一百五十四万，使国民党精锐部队基本上被歼灭，解放了东北全部和长江北岸的中下游广大地区 。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全国人民努力的结果。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大战役中，各地支前民工达五百四十余万人，大车三十八万辆，供给粮食九亿多斤。也应当指出，各民主党派也作了许多工作，争取了一些国民党将领起义或接受和平改编。民主党派和国民党爱国将领也为伟大的战略决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失败，一方面继续组织军事力量，企图顽抗；另一方面发动和平攻势。桂系军阀借蒋介石军事上打了

败仗之机，逼蒋让位。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宣布把总统宝座暂让李宗仁，以便集中精力去布置长江军事防线，作垂死挣扎。一九四八年十二日下旬，蒋介石与李宗仁洽商下野让位问题。经过两次洽商达成下列协议：（一）蒋介石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二)李副总统代行总统,宣布和平主张｛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等。蒋介石下野立即得到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他认为蒋总统下野，为进行和谈所必需。十二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会议，研究了“下野文告”。第二天，即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的求和文告就发表了。

蒋介石的求和文告，完全是一个“和平阴谋”。求和文告的基本思想就是保存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反动统治，保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位和财产，保存伪宪法和伪法统。不许解放军进攻，以便争取时间，重新布置内战，卷土重来。

在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后，一月八日，又向美、英、苏、法四国提出干涉中国革命的要求。这个要求首先遭到苏联的拒绝。英、美、法也不得不表示同样态度。

是继续不间断地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就此中断，保存江南势力，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当时摆在全党、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面前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元旦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指出：反动派不会自行消灭的，他们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揭露了美蒋的和平阴谋，批判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妥协思想。指出，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都不要怜惜敌人，要团结一致，要真诚合作，将革命进行到

底，反对搞什么“反对派”和“中间路线”。

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人民解放军积极作战，肃清华北、西北之敌，准备打过长江去，消灭国民党的一切反动军队。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在不久的将来消灭一切反动势力，解放全中国。但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早日结束战争，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宣布八项和平条件，即“（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①。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只有在这八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应以这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声明号召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为实现真正的和平而奋斗。希望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爱国人士，赞助这样的和平建议。要求人民解放军保持高度的警惕，时刻准备歼灭一切反动势力，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二月二日毛泽东、朱德在回李济深、沈钧儒等五十六人的信中指出：“欲求人民解放战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②。

中国共产党关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和关于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也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赞同。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280 页，1964 年版。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18 页，人民出版社，1983 年 12 月版。

他们纷纷发表声明，拥护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揭露国民党的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

一月二十二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五十五人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和平阴谋。指出，南京国民党政府“是快要土崩瓦解了”。它企图利用和平攻势，“以争取时间，让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大江以南或边远省份作最后挣扎”。为此，“革命必须进行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在革命阵线内，必须巩固团结，防止反革命势力之侵入，“亦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①。

《意见》中揭穿了蒋介石在“求和声明”中的所谓条件，指出“有了这些条件，以四大家族为首的蒋朝政权尽可万世一系”②。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愿和全国人民一致为使八项和平条件迅速实现而奋斗。

最后，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③。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于一月二十七日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声明。指出，中国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工农为主力，团结一切革命阶级，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建立新中国，才能实现永久的和平。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先生针对着南京和平攻势阴谋，而提出的实现真正民主和平的八项条件”④。坚决要求将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发表《申斥蒋介石的“和平”阴谋》一文，同月二十日发表《响应毛泽东主席八项和平主张》，指出，蒋介石搞的是一个和平阴谋，“企图利用这个和平攻势来和缓人民武装的进攻，和缓蒋区人民的怒愤，藉以争取喘息时间，重

①②③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505—508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年版。
④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第 265—266 页。

新组织反动的武装力量，以延长战争的祸害”①。民盟表示，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反对蒋介石的假和平。正告国民党当局何去何从，应知有所选择。

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发表《为争取永久和平的宣言》。宣言揭露了美蒋反动派在它发动的反革命战争将要失败的时候，搞什么组织所谓反对派混入革命阵营，又发表求和文告和要求苏、美、英、法四国干涉中国革命。中国民主促进会表示，要团结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目标下，合作到革命最后成功，决不允许反动分子在革命阵营立脚和中间路线的存在。宣言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并和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团结起来，“坚决、迅速实现这全部条件”②，南京政府必须接受这些条件，不准讨价还价。

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彭泽民和丘哲发表谈话，指出，蒋介石的元旦声明，是“制造和平阴谋”，“在今天，中国人民断断不会再行上当”③。

九三学社团结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发表拥护毛泽东八项主张的书面意见。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一月十四日所提出的和平条件，必须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为“推翻反动统治，解放全国人民，创造民主进步的新中国”而奋斗④。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发表声明，指出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是为了“保持其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499—500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 《中国民主促进会为争取永久和平的宣言》， 1949 年 1 月 22 日。
③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 4 辑）
④ 《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拥护毛泽东八项主张》，北平《新民报》， 1949 年 1 月 27日 。

“企图卷土重来”。① 声明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只允许中国反动派接受八项条件，“否则必须同它作战到底”②。

二、国共两党北平谈判

蒋介石下野并不交权。他到溪口以后，仍然控制国民党权和军权，布置长江以南军事，准备再战。三月三日张治中和吴忠信去溪口会见蒋介石，就和谈和组阁问题拟定了意见。关于和谈限度问题：第一、划江而治，“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第二，“使双方在未来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地位”。第三、关于军队改编问题，确定双方比例，“自行整编”。这个和谈限度实质上是一个“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方案③。桂系先是用和谈逼蒋下野，现蒋已下野，下一步是想通过和谈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达不到这个目的“仍然还是打”④。美帝驻华大使派他的秘书向桂系表示如李代总统继续反共，美国也继续给予援助，如和共产党谈判，“则美国的态度要作别的考虑”⑤。

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压力下，由于国民党内部反对派的斗争，桂系为了保持已取得的地位，李宗仁发表声明，表示“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二月，中国共产党通知国民党进行正式谈判。国民党派张治中为和谈首席代表，代表为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等六人。以卢郁文为秘书长。

三月下旬，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林彪为代表（后又加聂荣臻为代表），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齐燕铭为秘书长。决定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为基础，于四月

①②《拥护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声明》，1949年1月17日，《文汇报》，香港。
③张治中：《我与共产党》，第136—142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④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58页。
⑤ 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60页。

一日在北平进行谈判。

国民党南京政府在何应钦主持下拟定了一个《与中共商谈之腹案》和《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与中共商谈之腹案》共有九条,其主要内容是(一)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二)宪法和法统问题,可以重新制定,但制定宪法时,国民党必须有代表参加;(三)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等原则上同意;(四)关于军队改编问题,提出"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双方军队保留数字,另作商讨;(五)关于召开政协,成立联合政府问题,提出"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六)和谈开始前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①。

张治中在动身到北平以前,又到溪口去见蒋介石,请示和谈问题。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张治中等四月一日到达北平。从四月二日至十二日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毛泽东分别约见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李宗仁在和谈开始时致电毛泽东,再次重申"协商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希望国共能够再次合作。毛泽东在回致李宗仁电中表示,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为"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的而奋斗"。

正式谈判开始以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首先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拒绝了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的"停战","人民解放军不要渡江"和不追究战争责任等要求。四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交给南京政府代表团,限定在二十日以前作出答复。

①张治中:《我与共产党》,第 129—13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0 年版。

南京政府代表团对“协定”进行研究后“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①。并决定十六日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带文件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协定。

国民党政府以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均是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长期以来他们不同意蒋介石的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方针，主张和平民主，对共产党持比较友好的态度。张治中先生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就一直反对蒋介石武力“剿共”政策，在抗战和内战期间，在解决新疆共产党案上和重庆谈判时都作了有益工作。这次在北平和平谈判中，代表团表现了和平诚意和爱国思想，对待“协定”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因此，他们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称赞。

黄绍竑代表到达南京后向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黄旭初等人作了北平和谈的报告，交了“协定”文件。何应钦去溪口请示蒋介石后召开行政院秘密会议。会议由何应钦主持。黄绍竑报告北平谈判经过后说：“代表团的全体代表认为中共提出的和平条款是可以接受的”②。会上有吴铁城(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黄少谷（代表行政院）等发言，认为国内和平协定“万不能接受”。最后何应钦宣布，这个和平条款是不能接受的，由行政院作答复。

四月二十日夜李宗仁、何应钦回电答复，通过南京国民党代表团转告中共代表团。要求中国共产党取消协定，“重新予以考虑”，又提出先成立一个“临时停战协定”，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这样，国民党反动派的和谈阴谋就完全被揭穿了。

留在北平的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经过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人工作，希望他们留下来，宣布和南京国民党脱离关系，参

①张治中：《我与共产党》，第 180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0年版。

② 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 60 辑，第67页。

加人民革命队伍。毛泽东与张治中多次谈话，希望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担任人民政府的职务。张治中在六月二十六日发表对时局声明。在声明中除了说明应当接受协定外，指出，现在已经到了最后机会，希望国民党内人士，“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最后他说：“国家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①。《人民日报》就此发表评论——《评张治中声明》，认为“这个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其中对于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劝告，是向他们指出唯一的光明出路”。

第四节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被推翻，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一、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

一九四九年三月，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国民党用以发动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被消灭，中国革命即将要取得全国胜利，为了迅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解决胜利后党的基本政策，中国共产党于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作了报告。

①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第188—18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指出，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要由农村转移到城市。

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经济结构，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总的任务和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毛泽东指出，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的主要矛盾，即“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①。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②

在政治方面，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方面，我国经济是落后的，在建国以后，要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对待占国民总产值90%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要逐步引导它们走上集体化的道路。

毛泽东指出，革命就要胜利了，不要花费更大的气力了，但巩固这个胜利却需要很长时间和花费更大气力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求全党同志防止骄傲自满情绪和以功臣自居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情绪的产生，要求全党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防止在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号召全党同志继续地保持谨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讨论了毛泽东报告，根据报告做出了相应的决议。会议批准了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新的政治协商

①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23页、1327页，1964年版。

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同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其它地方政府与军事当局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是在夺取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在革命转变关头解决了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重大问题。

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不久就退居到幕后，重点布置长江防线。他在一月二十五日于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会上决定集中国民党七十五万兵力和海空军于长江防线，分两个大的战略区，九江以西到宜昌由白崇禧集团防守，九江以东京沪地带由汤恩伯集团防守，妄图依靠长江天险，阻止我军渡江。同时重新布置江南其他地区军事力量，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兼台湾警备司令，并准备训练二百万新兵。在进行军事布置的同时，国民党对国统区实行更严格的控制和残酷的镇压。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制定了“澄清当前局势工作方案”。提出挽救残局的措施：封锁消息，新闻检查，实行全国戒严，检查户口，实行株连制等，企图依靠法西斯手段，控制内部，镇压人民以稳定反动统治。

在北平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作了渡江的准备。当四月二十日晚，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以后，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四月二十一日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出，南京国民党政府已经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要继续反革命到底，为此，命令全军要“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障中国领土

主权的独立完整。’① 命令中还指出，任何国民党政府及地方军事当局凡愿意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可以用和平方法解决。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到命令后，于四月二十一日晨，百万大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摧毁了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多月的长江防线。四月二十三日，解放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各民主党派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四月二十三日，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对进军命令“完全表示赞同,并竭诚拥护”。声明还谴责了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顽固到底的态度。同时号召“在一切解放区，全体人民必须加紧生产，服从命令，动员支前；在解放军作战之界域，及将进攻之区域，所有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民，必须努力动员，迎接解放大军，协助杀敌，并保护一切重要物资免受破坏”②。希望国民党内爱国人士，按照国内和平协定的原则，进行局部和平解放之方法，以减少人民之灾难，而不与蒋介石共招同一灭亡之命运。

南京解放后，国民党内、军内、政府内一片混乱。军队已经溃不成军，政府四分五裂。国民党中央委员分逃他乡。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发表《和平绝望奋斗到底》的演说，他除了诬蔑人民革命胜利，攻击中国共产党外，表示要顽抗到底，反共到底，“无论何时何地，必将始终不贰”③。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在四月二十七、二十八日连续发表《为救国护党对共战争告全体党员书》和《反对中国共产党赤化中国扰乱世界和平宣言》，六月二十日国民党行政院拟定了所谓的《战时

①《毛泽东选集》，第 1340 页，合订本， 1964 年版。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523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版。
③ 《总裁发表和平绝望奋斗到底》， 1949 年 4 月 27 日，《中国国民党宣言集》，第六 十九辑。

施政方针》，提出要动员一切人力物力以军事为核心顽抗到底，要整顿军纪，严厉惩罚，派匪特到解放区，实行全面总体战；在政治上，以法西斯手段镇压革命，加强地方反动武装，强迫征兵；在财政经济方面,要‘ 改革 ’和‘ 整顿 ”,以进一步搜刮民财 在外交方面，争取国际反动势力的援助等措施，企图作垂死挣扎。但这一切反动措施，都挽救不了它最后失败的命运。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后，五月三日解放杭州。五月十七日解放武汉，五月二十七日，在中国共产党 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各民主党派配合下解放了上海。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政府于南京解放前逃亡到广州，后又逃到重庆。

在渡江战役期间，各民主党派为早日取得民主革命胜利，进行积极配合，作了大量工作。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六月发表《告前南京国民党系统党员书》。指出，无论从是非和利害来说，国民党员都不应当再追随蒋介石反动集团了多要“ 投到民主革命的阵营来 ”，为消灭蒋介石集团残余势力尽力。各民主党派还利用社会关系，做国民党军政人员工作，动员他们起义，参加革命，为人民立功赎罪。上海解放前夕，民进总部指示上海分会，要在中共指导下，联合各界知识分子，配合解放军进军；推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完成迎接 上海解放工作和解放后的恢复与发展生产的任务。在下达向江南进军命令的前夕，毛泽东邀请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嘱勉他们为解放上海效力。黄炎培等对解放上海提出许多意见，施复亮等还参加了南下工作团。留沪民建会理监事胡厥文等在解放上海战斗还未结束时，就发表《欢迎解放军宣言》，号召上海人民行动起来，协助人民解放军做好接管上海的十项重要工作。

渡江战役后，人民解放军继续向长江以南各省和西北进军。九月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胜利，

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至此，除台湾省以及一些沿海岛屿外，实现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大统一和大团结。

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美国等十二个西欧和北美国家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这个条约在当时是一个以挑动新的世界侵略战争为目的的，危害人类和平安全的条约。

同一天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声明中明确表示：在世界斗争中，中国站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和平民主力量一边，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指出，和平民主势力一定能够“打败侵略者，推翻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永久的和平”①。

各民主党派关于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说明了各民主党派完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也说明了各民主党派在对外政策方面，克服了错误认识，坚定地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立场上来，这是民主党派的一个重要进步。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引起了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内部关于对华政策的激烈争吵。统治集团的当权派为了推卸责任于一九四九年八月，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在白皮书和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里，充满了颠倒是非、隐瞒和捏造事实以及对于中国人民的恶毒污蔑和深刻仇恨。当时由于杜鲁门、艾奇逊为了说服对手，不得不在白皮书中公开暴露若干反革命的真相。这样，白皮书就在客观上成为一篇美帝国主义侵华罪恶的自供状。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521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版。

为了利用这部反面教材教育人民，特别是争取那些对于美帝国主义还抱有幻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于一九四九年八、九月间先后为新华社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白皮书和艾奇逊信的文章，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并针对国内资产阶级某些右翼分子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号召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民主党派也纷纷批判白皮书，中国民主同盟于八月十六日在北平举行批判白皮书座谈会。八月二十三日发表《对美帝白皮书的斥责》，指出美帝国主义玩弄的任何把戏，中国人民都不会上当的。白皮书是一部教材，教育中国人民只有斗争，中国才有出路。中国人民在世界斗争中只能执行“一边倒”的政策。最后，警告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是不怕经济封锁的，“今天中国人民有了坚强的团结，我们有了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与勇气，是有办法来渡过经济困难的”①。

民主建国会发表了《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指出，在白皮书里比较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美帝想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扶植“民主个人主义者”。声明指出：从这一点上值得“谢谢美帝的提醒，我们应该大大加强内部的团结和警惕。”“白皮书上所提的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好梦是做不成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的工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阻碍和摧残，为了生存进行了某些斗争，它的历史是艰苦的，“可也正是这样的考验，改造了、提高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品质，它也懂得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进行了

①《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美帝白皮书的斥责》，1949年8月23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58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终于获得解放”，今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会有发展。“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今后的观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凭那一条也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声明宣告，我们还得准备斗争。要“为粉碎敌人封锁而斗争，为消灭美帝所加于我们的一切灾难而斗争，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斗争！”我们有信心达到胜利。

民主建国会发表了积极的有原则的声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赞助。毛泽东两次写信给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称民建的声明，是“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①。

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关于工作任务的协商，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和整顿

一九四八年八月以后，随着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进入解放区，各民主党派总部也迁到解放区，后迁到北平。

中国民主同盟从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在解放区建立和发展民盟地方组织，开展盟务活动。一九四八年十月在石家庄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华北解放区联络处。同年十一月，胡愈之、吴晗等六人在河北东鹿县成立中国民主同盟华北解放区第一小组。十二月，胡愈之、吴晗、韩兆鹗、楚图南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交流民盟活动意见。十二月十三日，中国民主同盟华北解放区第一小组致函沈钧儒等和香港民盟总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在解放区的城市中，吸收新力量，使民盟成为各革命阶层的联盟；第二、民盟对新政协的政治主张，要与中共协调；第三、在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33——334 页，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版。

解放区建立民盟小组，联合各小组成立总支部。建议把民盟总部由香港迁到解放区。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民盟总部由香港迁到北平，正式成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推选中常委沈钧儒、章伯钧为临时工委负责常委，领导开展全盟工作，原在香港的“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即告结束。

九三学社在北平解放后，总部也由地下转为公开活动。在上海、南京、重庆等处设有九三学社的分社。有社员五十多人，北平二十人左右，上海有二十八人。

民主建国会在港会员于一九四九年初已有四十多人，二月中旬成立港九分会，由何民麟、黄? 然等负责。黄炎培等于同月，在中共地下组织安排下离沪到港，到港后多次和中共代表商谈，三月中旬离港，下旬到达天津转赴北平，民建的一些领导人也先后到达北平，四月初在北平恢复民建会常务理事会，六月十二日设立了总会北平工作委员会办事处，由孙孟起担任总干事，八月二十一日北平分会成立，南汉宸为理事长。同年四月成立上海分会筹备会，六月一日正式建立分会，六月还建立了广州分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一九四八年八月成立了港九分会，一九四九年二月改为华南分会。六月成立了上海分会。总部迁到北平后，加强了总部建设，并发出指示，加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学习，迎接建国工作。

中国农工民主党总部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以后随着领导人进入解放区而迁移到解放区。解放战争后期在广西、四川、湖南、湖北、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北平、香港、上海、台湾等地都有党的基层组织或党员。全国解放前夕，农工民主党有党员万人以上。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上胜利，新政协已经召开，新中国的全国政权即将诞生。有些民主党派在成立的时候就

宣布是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现在任务已经实现，认为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在一些民主党派内部出现了工作停顿、纪律松弛的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各党派共同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而斗争，人员是互相交叉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需要对工作对象，所联系的群众要有一个相对的分工，以便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九三学社在参加新政协以前，只是以学术界政治团体名义参加政治活动，因此，在各民主党派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没有九三学社。新政协筹委会召开前，毛泽东、周恩来找九三学社负责人许德琦谈话，让他写一个九三学社工作报告给新政协，从此九三学社正式成为一个民主党派。

根据上述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于五月开始分别邀请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就民主党派发展前途、联系对象等问题进行了协商。

中国各民主党派大多数是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在抗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先后成立的。它们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也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参加。民主党派纲领的突出特点，第一爱国，第二要求民主。它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纲带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有些右翼分子主张中间路线，但没有形成主导地位）在行动上,其基本的方面,也是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所以，各民主党派从来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具有或带有统一战线和阶级联盟的性质。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为推翻国民党统治，为人民作出了贡献。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逐步提高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敌人的认识。在发展中，不断和右翼分子作斗争，使自己的路线逐渐发

展成为正确的路线。中国共产党认为，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努力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也应该和各民主党派团结一致，为建设新中国而斗争。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①。根据这个战略思想，中共中央动员和说服一些要解散的民主党派整顿党的组织，统一党内思想，团结一致，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通过协商一致同意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为各民主党派的纲领。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就所联系群众依据历史的渊源作了相对的分工。九三学社主要联系科技界，民主促进会主要联系出版界和中小学教育界，民主建国会主要联系工商界，台盟主要联系在大陆的台湾籍人员，致公党主要联系华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联系原国民党政军中民主派，民盟主要联系高校科研等界知识分子，农工民主党主要联系医药卫生、科技文化界知识分子。

通过这次协商，各民主党派明确了自己的前途、 工作范围和联系对象，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团结一致地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各民主党派根据这次协商精神，开始整顿自己的组织，一些民主党派先后召开代表大会和中央会议，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经过这次整顿，各民主党派接受了共同纲领为自己的政治纲领，纯洁了组织，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作，为社会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27 页， 1964 年版。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次协商中，中国人民救国会宣告光荣结束。中国人民救国会在它存在的十四年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事业的伟大斗争并作出了光辉贡献。救国会在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事业的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通过内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的影响,不断地克服错误，逐步发展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左翼政党。它的许多成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它的著名领导者如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杜重远等为人民革命事业壮烈献身，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光荣代表。

中国人民救国会虽然宣告光荣结束，但它的光辉业绩将作为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载入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青史长留，永垂不朽！

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邀请宋庆龄、张澜、司徒美堂和陈嘉庚等来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代表到达东北解放区与已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就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达成了下列协议：(1)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五一”口号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等二十三个单位的代表组成；(2) 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为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负责起草新政协的文件，负责召开新政协的正式会议；(3) 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送各方审阅，同意后，筹备会集会时正式通过。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共代表到沈阳迎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到北平。四月，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开始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

作。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在北平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华侨代表等 23个单位，134人。会议一致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选出了新政协筹备会的常务委员会委员21人，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常务委员会下设六个小组，分别完成下列筹备工作：(1) 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2) 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3) 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4) 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5) 起草宣言；(6) 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会后在筹备会主持下积极进行建国的筹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说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为建国筹备工作指明方向，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改》著名论文。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论述了对人民民主方面和对敌专政方面的关系以及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形成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奠定了我国国家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统一了全国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批评了在建国问题上的错误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建国的准备工作。

九月十七日，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至此,建国的筹备工作基本上完成了。

九月二十一日，在北平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及国外华侨等 23 个单位的代表，共662人。因为它实际上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因此会议宣布，它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会议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主持，他在开幕词中指出，这次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所以能实现了这个大团结，是因为我们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首都和纪元。

毛泽东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①。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而勤劳的民族，我们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②。

解放军代表朱德，中国共产党代表刘少奇，特邀代表宋庆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和解放区的代表等，在大会上发了言。他们在发言中一致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英勇奋斗取得的，他们表示，在今后更要加强团结，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经过民主讨论，九月二十七日通过下列文件：（一）中国人民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5、6 页。

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元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暂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

大会接着讨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的经过和纲领的特点》的说明。会议经过讨论，在二十九日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会议还在充分的民主协商的基础上，选举毛泽东等 180 名委员会组成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主席、副主席，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五十六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九月三十日由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宣告大会胜利结束。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同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由三十万群众参加的开国大典。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在中国大地上升起庄严的五星红旗，天安门广场的三十万群众和全国人民都浸没在欢庆胜利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各民主党派为它的成立贡献了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此中国的历史开始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

※ ※ ※

中国近现代政党史表明：在中国近现代革命斗争中，只有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能提出彻底的革命纲领，把革命引向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领导者。

中国近现代政党史表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经过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唯一能够行得通的光明大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中国近现代政党史表明：凡是在一定的政治基础上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共同奋斗的政党和个人，其结果都是共同的胜利，有共同的光荣前途。

后　记

为了适应高等学校文科开设中国近现代政党史、民主党派史的需要，我们在学习、研究和教学的基础上写成了《中国近现代政党史》这本专著。

本书由几位同志分章执笔，最后由主编朱建华、宋春修改定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历史文献和资料，又得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一局处长余鉴则同志、研究室二处处长李青同志和民盟中央文史资料办公室主任薛博民、民建中央文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张帆、民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达人、农工民主党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负责人肖翰香、致公党中央宣传部孔凡礼、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卜昭荣、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顾民等同志以及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杭州大学、华中师院、哈尔滨师范大学、江西农业大学、中共吉林省委党校等单位的一些教授、专家、教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不仅帮助研究问题，而且还亲自参加书稿讨论会或个别交谈，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注意吸取了国内史学界科学研究的一些新成果、新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对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主张和活动，由于出版了许多中国共产党史专著，又因大家比较熟悉，故除重点问题和重要活动

外，一般没作详细的阐述。

中国近现代政党史是一门新建的学科，由于我们对这门科学研究得不够，加上受资料、时间、水平的限制，在体例、观点、材料等各方面，都会存在不少的缺点和错误，诚恳地希望专家、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修改。

著　者

一九八四年一月

章 执 笔 人

第一、二章	雷家桓	滕亚屏 （吉林学大）
第三、四、五、六章	刘景富	马维政 （东北师大）
第七、八、九章	李有清	赵春义 （吉林大学）
第十、十一、十二章	陈瑞云	朱建华 （吉林大学）
第十三、十四、十五章	宋 春	黄景方 （东北师大）

前　言

一

中国近现代政党史(1840——1949)是一门新建的学科，它是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现代社会政党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政党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要实现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必须通过建立本阶级或几个阶级的联合政权来实现。在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时期中，每个政党的活动重心总是放在夺取政权、参加政权或巩固政权这一根本问题上。因此，研究各政党对待政权的主张和实践，建立一个什么国家问题的斗争，则是中国近现代政党史研究的核心。中国近现代政党史的研究对象至少应该包括下列内容：

第一、研究中国近现代政党产生、发展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这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政党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发展，各阶级政治斗争的需要，是中国近现代政党产生发展的基因，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则是中国近现代政党产生、发展、变化的外部条件。只有从这些客观存在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出发，研究中国近现代政党史，才能够揭示出中国近现代政党的特征及其阶级实质，和中国近现代政党产生与发展的规律。

第二、研究中国近现代政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和变化的情况。政党代表着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一个阶级为了实现或者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一定要组织阶级队伍，统一本阶级的力量和行

动。因此，每个政党都要有它一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系统，吸收在政治上合乎本阶级需要的并与自己的政治见解相同的人入党，或者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进行斗争，力图发展自己，扩大组织。

第三、研究中国近现代政党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国家问题上的主张、纲领、政策和策略。一个政党的政治纲领，就是它的奋斗目标，政策和策略，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和手段。政党的纲领集中地反映了它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因此，它是判断政党性质的一个重要标准。正如列宁在《对谁有利》一文中指出：“要是一下看不出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为某种提议，措施等等辩护时,那就应该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

第四、研究中国近现代政党的实践活动。一个政党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政纲来决定的。但是，纲领并不能说明一切。最有力的说明，是它们的实践活动。列宁在《论俄国各政党》一文中，曾经深刻指出：“要辨明政党斗争中的是非，就不要相信言词，而要研究各政党的真实历史，主要不是各政党关于自己所说的话，而是研究它们的行动，研究它们是怎样解决各种问题的，是怎样处理与社会各阶级即与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等等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

第五、研究中国近现代政党相互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国近现代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政党，不是孤立存在的。由于它们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过合作的关系，又有过对立、斗争，直至一个打倒一个的历史。政党之间的矛盾、对立和斗争，正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反映。

第六、研究中国近现代政党在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中的各种不同类型的

政党，曾经扮演过不同角色，起过不同的历史作用。我们必须对每个政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对它们的历史功绩要充分肯定，对其缺点错误也要如实反映，对于反革命政党的反动本质要进行深入的剖析，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二

学习研究中国近现代政党史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学习、研究中国近现代政党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党产生、发展规律及其特点，加深认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动本质和危害；正确认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清他们不能指引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道理。从总结中国近现代政党史的历史经验中，加深认识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把中国革命引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近现代政党史表明，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领导者。

第二、学习、研究中国近现代政党史，可以帮助我们加深认识在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曾经有不少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代表人物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而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提出了许多所谓“救国救民”主张和建国方案，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为之奋斗。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包括辛亥革命那样的具有全国规模的，比较更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有了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国家的出路。一九一九年发生了五四运动，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立即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斗争，打败了北洋军阀，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反动王朝——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顺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这就彻底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大同”。

第三、学习、研究中国近现代政党史，可以帮助我们加深认识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凡是在一定的政治基础上同共产党实行合作，共同奋斗的党派，都能使它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在中国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有共同的光明前途，取得共同的胜利。正如中国民主同盟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的那样：“我们越靠近共产党，越能虚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组织就越能健全，我们的工作就越能发展，我们的影响就越能扩大，我们就越能担负起我们的责任，完成我们的使命”。其他民主党派也有同样感受。

第四、学习、研究中国近现代政党史，有助于我们通晓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政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产物。当着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发展到政治斗争阶段时，一个阶级为了维护或实现本阶级的利益就必须组织本阶级的政治队伍，

制定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统一本阶级的行动。在阶级斗争中，政党是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体现者、捍卫者，也是它的领导者。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革命和反革命斗争，重大的政治运动、思想文化运动、军事斗争，大都是由代表不同阶级的政党组织、领导的。因此，只有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政党史，才能更好地通晓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